

2005年《纽约时报》十大好书

TONY JUDT

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战后欧洲史 [下]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骥华 唐敏 等译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ONY JUDT

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战后欧洲史

[下]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骥华 唐敏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欧洲史. 下 / (美) 朱特著; 林骧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25-661-3

I. 战... II. ①朱...②林... III. 欧洲—现代史

IV. 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381 号

Postwar by Tony Judt

Copyright © 2005 Tony Jud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战后欧洲史(下)

[美] 托尼·朱特 / 著 林骧华 / 译

责任编辑: 吕 林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56.625 字 数: 93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61-3

定 价: 88.00 元(上、下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作者简介 ·

托尼·朱特 (Tony Judt, 1948-)

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现执教于纽约大学。1995 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等撰稿。著有《责任的重负》(*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中译本为新星出版社 2007 年出版)、《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 年的法国知识分子》(*Past Imperfect: French Intellectuals, 1944-1956*) 等 12 部作品。

· 译者简介 ·

林骧华 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现任质量总监、外语学科总监、审读中心主任。译著有：《西方四大批评家》、《辩证理性批判》、《极权主义的起源》等。

唐敏 现任复旦大学出版社外语分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战后欧洲史
POST WAR

献给杰妮弗

不复存在的往昔放在今日面前，
岂非更深刻，更富于传奇性、更具有当代性？

—— 托马斯·曼 《魔山》

目 录

前言与鸣谢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战后欧洲:1945—1953

第1章 战争遗留的问题 3

第2章 惩罚 28

第3章 欧洲的复兴 47

第4章 难以安定 79

第5章 冷战来临 104

第6章 卷入漩涡 144

第7章 文化战争 173

尾声 旧欧洲的终结 200

第二部分 繁荣与不满:1953—1971

第8章 政治稳定 213

第9章 幻想破灭 246

第10章 繁华年代 287

附记:两种经济的故事 323

第11章 社会民主时期 328

第12章 革命的幽灵 354

第13章 尘埃落定 383

第三部分 衰退时期:1971—1989

第14章 降低期望 411

第15章 新基调中的政治 438

第16章 过渡时期 456

第17章 新现实主义 492

第18章 无权者的力量 515

第19章 旧秩序的终结 539

第四部分 失败之后:1989—2005

第20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585

第21章 清算 610

第22章 旧欧洲—新欧洲 643

第23章 欧洲的多样性 693

第24章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718

跋:来自死者之屋——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741

索引 768

第三部分

衰退时期：1971—1989

第 14 章

降低期望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 453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1971 年

杀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有的时候它是必要的。
——杰瑞·亚当斯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
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毛泽东

这是铅一般沉重的时刻——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
——艾米丽·狄更森

朋客可能是为文化理论家们发明的——事实的确部分如此。
——罗伯特·海威森

即使在 60 年代的喧嚣平静下来以前，造就这份喧嚣的独特环境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有史以来最昌盛的 10 年的最后 3 年里，战后的经济繁荣热潮结束了。西欧的“辉煌三十年”被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所替代，同时还伴随着大范围的工人失业

和社会不满。60年代的大部分激进分子,如同他们的追随者一样,放弃了“革命”,转而为自己的工作前景担忧。一些人选择用暴力对抗的方式;它们造成的损害和由这些行为导致的政府应对措施,引发了一些恐慌言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失控”。这种恐慌感被证明是夸大了的:西欧各国政府顶住了压力,显示出了超出旁观者想象的应变力。但是不可能再幻想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乐观主义时期了。

54 当两种外部打击使西欧经济几近停滞时,经济滑坡的影响才刚刚开始。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国废除固定汇率制度。自从布雷顿森林公约签订以来一直是国际货币比价标准的美元,从此以后将随着其他货币的汇率浮动。而促成这一决定的背景是美国因参与越南战争而背上的沉重军事负担,以及不断增长的美联储财政预算赤字。与美元挂钩的是金本位制,华盛顿政府越来越担心国外的美元持有者(包括欧洲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从而消耗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1〕

美元自由浮动的决策从经济方面来看是理性的。经历了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昂贵的拉锯战——为此付出了举借外债的代价——美国已经不可能期望继续维持固定而又不断被高估的汇率。但是美国的这一举措无疑是一枚炸弹。如果美元的汇率出现浮动,必将导致欧洲货币的汇率浮动,那么战后精心构建的货币和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就会出现问題。固定汇率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政府希望它能够控制国家的经济网络,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什么呢?

随着之后几个月的混乱、两次接踵而来的美元贬值,以及1972年英国的英镑“浮动”(推迟带来了英国银本位制度这个古老而又不堪重负的角色),1973年3月,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浮动汇率制。显而易见,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通货膨胀。由于1971年8月美国采取美元汇率自由浮动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元贬值),欧洲政府不得不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允许放宽信贷、放任国内物价上涨和国内货币贬值,以遏制必定出现的经济滑坡。

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受控制的“符合凯恩斯理论的”通货膨胀会是成功的——除了在西德,因为自古以来德国人对物价上涨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与排斥。但是美国退出固定汇率制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刺激了货币投机,而国际浮动汇率协定对此是无力限制的。这又破坏了各国政府为操纵本国利率和维持本国货币价值所做的努力。货币贬值了。随着货币的贬值,进口货物的成本相应增加:1971年到1973年期间,世界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了70%,食品价格上涨了100%。就是在这种已经很不稳定的状况下,国际经济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1〕 美国联邦财政预算赤字由1965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1968年的252亿美元。

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人日历上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进攻,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主要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在24小时内宣布削减石油开采量;因不满美国对以色列的庇护,10天后又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将石油价格提高70%。中东战争于10月25日以埃及和叙利亚的停火而告终,但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的不满并没有随之消除。12月23日,阿拉伯产油国联合起来再次提高油价,使其上升到1973年初的两倍多。 455

为了了解这些变故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回顾一下石油价格的变化尤其重要。与其他几乎所有现代工业经济依靠的初级商品不同,石油价格在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当中几乎保持不变。一桶沙特阿拉伯的轻原油在1955年的价格是1.93英镑,到1972年1月上涨到2.18英镑。去除那些年的货币通货膨胀因素,油价实际上是下降的。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并不限制其成员国将石油储备当作政治武器。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了依赖这一充足而又廉价的石油产品——它同时又是保持社会长期繁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石油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不断稳步增加。1950年,西欧能源消耗总量中的83%是固体燃料(绝大部分是煤和焦炭),只有8.5%是石油。到1970年,使用固体燃料和石油的比例分别是29%和60%。1973年,意大利能源需求的75%依赖进口石油;而葡萄牙则达到80%。〔2〕英国曾因在北海发现了油田而一度自给自足,但它的石油开采也只是于1971年才开始。50年代末至60年代,西欧出现了消费热潮,上百万辆新的汽车开上马路,它们的动力供应既不能依靠煤、也不能依靠电,尽管那时——特别是在法国——已经可以使用核能发电,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大陆对廉价石油的需求和依赖。

至此,进口燃料的价格是以美元的固定汇率来定价的。因此,变化浮动的汇率和石油价格上涨变成空前的不稳定因素。在此之前的20年时间里,物价和工资的上涨是稳定而温和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仍然可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现在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非欧共同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1961年到1969年期间稳定在3.1%,1969年到1973年期间是6.4%,1973年到1979年期间年均通货膨胀率是11.9%。这只是整体数据,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稍有不同:从1973年到1979年,西德的通货膨胀率仅为4.7%,而瑞典是西德的两倍。法国 456 在那些年当中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0.7%,意大利是16.1%,而西班牙则超过了18%。英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5.6%,但是在最糟糕的年份(1975年)却超过了24%。

此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在历史上并不是空前的,但是这对于经历过50年代和60年代

〔2〕 相比之下,美国的石油进口在1973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占到国内消费总额的36%。

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人民来说,的确是新的体验——对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更为糟糕的是,70年代的通货膨胀——伴随着1979年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伊朗革命推翻了国王统治,造成了石油市场的恐慌,石油价格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5月上涨了150%——使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辛而痛苦的生活。在过去,通货膨胀与增长相关联,通常是由于增长过快。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都伴随着通货紧缩:由于过于刚性的货币以及政府和人民长期的消费能力不够,导致物价和工资的下降。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人们在传统的模式中似乎找不到解释现实的答案。

相反,西欧国家开始经历所谓的“不景气状况下之物价上涨”:在出现经济滑坡的同时工资和物价出现膨胀。现在来回顾这种情况,不会像当时那样令人惊奇。到1970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工业生产行业的移民潮已经结束;不再能吸收到“闲散人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下降了。100%就业仍然是欧洲主要工业和服务行业的标准——到1971年,英国的失业率只有3.6%,法国只有2.6%;但是这意味着有组织的、习惯于以优势地位和雇主们讨价还价的工人们现在面对的是雇主们的利润率开始缩水。

自从1971年以来,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工人代表们要求提高工资并获得其他经济方面的补偿。即便在1973年经济危机之前,也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实际的工资增长已经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利润不断下降;不再有新的投资。战后经济复苏激发的投资热情一点点被通货膨胀或者失业所吞噬。由于中东危机,欧洲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问题同时并存。

对比过去的经济繁荣,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更显得糟糕。参照历史标准进行比较,该时期西欧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不是特别低,处于英国的1.5%和挪威的4.9%之间,实际上比法国、德国和英国在1913年到1950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1.3%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与不久前的过去相比,差别却很明显:从1950年到1970年,法国的年均增长率是5%,西德将近6%,即使是英国也维持了超过3%的年均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同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3〕

然而,痛苦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随着针对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竞争压力不断加剧、进口商品(不仅仅是石油)的价格不断提高,更是雪上加霜。失业率开始稳步而无情地上升。到70年代末期,法国的失业率占全部劳动力的7%;意大利为8%;英国为9%。有些国家——比利时、丹麦——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与30年代相似;法国和意大

〔3〕 平均值毕竟只是平均值。在最低迷的1976年,英国的失业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超过100万,而且年均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5%,各国的增长率都降到了低点——意大利的国民经济出现战后的首次负增长。

利的失业问题更严重。

经济衰退的一个即时后果就是对各种“外国”工人的冷遇。虽然对产成品的需求锐减,但是官方公布的西德失业率(在1970年接近为零)却没有达到8%,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失业的工人并不是德国人——因此不被官方统计在内。例如,当奥迪公司和宝马公司在1974年和1975年大裁员时,首先被解雇的便是“外来工人”;失业的宝马公司员工中五分之四的人都不是德国公民。1975年,联邦政府永久性关闭在北非、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征募劳工办事处。联邦委员会在1977年的一份报告中的“基本条款第1条”中指出:“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只是那些最终还会自愿回到自己国家的外国人的居住地”。6年后,联邦议会通过法案来“帮助外来工人做回国准备”。

很多外来工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确回到了自己的国家。1975年,29万名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离开了德国,去了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腊和意大利。同年,20万西班牙人回国找工作;而意大利的移入国内者人数首次超过移居外国者人数,很快在希腊和葡萄牙也出现这种情况。70年代中期,将近30多万移居外国的南斯拉夫人不得不回到巴尔干半岛,但是那里的就业状况并不比在德国或者法国乐观。北欧的就业危机转嫁到了地中海地区。同时,法国严格限制阿尔及利亚以及它以前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人民入境,英国也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排斥南亚次大陆的有移民倾向的人。

结构性失业、奇高的石油进口价格、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下降的出口,导致了席卷西欧的财政赤字和支付危机。即便作为欧洲大陆制造业和出口业领头羊的西德,也没能幸免。458
在1973年一年之内,它的贸易支付由94.8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变成了6.92亿的贸易逆差。英国国家财政连续出现赤字——到1976年12月,开始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以致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面为其作担保。其他国家也好不了多少。1974年,法国的财政收支出现逆差,而且此种状况持续了近10年。意大利和英国一样,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对于英国出现的这种状况,它的领导人将之归咎于“国际力量”实施的不受欢迎的国内政策。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预算不足和支付赤字——如同通货膨胀本身——并不是生来有害的。在30年代,它代表了“用自己的办法”摆脱经济不景气的一种似非而是的办法。但是在70年代,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已经被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压得不堪重负。正如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所言:“我们曾经认为自己可以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我坦率地告诉你,现在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他们也不能指望通过放松贸易政策来解救自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做过的那样:60年代中期最近一轮的“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已经将工业税率调到了历史低点。如果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必将面临不断增加的国内反对竞争保护的壓力。

20 世纪 70 年代的决策者们面临的选择具有更加复杂的因素。环境和时局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政府的软弱改良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西欧进行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几年前曾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浓烟工业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钢铁工人、矿工、汽车制造工人和纺织厂工人都开始失业了,这不仅是因为周期性的经济低迷,或者是石油危机的附带后果。这是因为古老的西欧制造业经济正在消失。

证据是无可争议的,尽管多年来决策者们一直试图忽视这些迹象。在 20 世纪 50 年代,西欧的采煤业达到最高产量以后,煤矿工人的人数一直稳定下降:在比利时南部桑布尔-默兹山谷矿区,1955 年的煤炭开采量为 2 050 万吨,1968 年下降到只有 600 万吨,而 10 年之后的开采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 1955 年到 1985 年期间,比利时有 10 万名矿工失业;与采矿业相关的各种相关贸易也相应受到影响。英国的采矿业损失更大,经历的时间也更长。在 1947 年,英国自称拥有 958 个煤矿;然而 45 年之后就只剩下 50 个了。
159 采矿业工人的人数从 71.8 万下降到 4.3 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流失在 1975 年到 1985 年的这 10 年期间。

作为欧洲工业另一主要行业的钢铁行业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因为钢铁不像煤炭那么容易被其他产品替代,所以对它的需求量并没有大幅度下降,但是随着更多的非欧洲国家进入工业生产的行列,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钢铁的价格不断下降,因而生产成本较高的欧洲钢铁产品市场受到冲击较大。从 1974 年到 1986 年期间,英国有 16.6 万名钢铁工人失业(尽管在 1986 年,英国的主要钢铁生产商——英国钢铁公司取得了近 10 年来的首次盈利)。造船业、汽车业和纺织业都因为类似的原因受到影响。在英国纺织品和化工行业都屈指可数的考陶尔兹公司在 1977 年到 1983 年期间裁员 50%。

7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几乎所有传统行业的失业率骤增。在 1973 年之前,煤炭、钢铁等行业开始进行改革;之后扩展到化工、纺织、造纸和消费品行业。欧洲所有国家都元气大伤:1973 年到 1981 年期间,在小工程公司和汽车制造企业集聚的英国西部内陆,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在法国西北部的洛林工业区,有 28% 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同年西德纽伦堡的产业工人失业率更高达 42%。意大利都灵的非亚特汽车公司自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转换为自动化生产后,3 年之内工作岗位减少了 6.5 万个(总共的工作岗位是 16.5 万个)。20 世纪 50 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产业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 40%,但是 25 年之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七分之一。

在过去,规模如此庞大、速度如此之快的经济转变必将导致极大的社会创伤以及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好在有政府的福利政策——也许还包括当时人民低迷的政治热情——没有太多的示威抗议、也没有激起太大的民怨。但这并非说它们是不存在的。1969 年到 1975 年期间,西欧的产业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静坐、罢工和向政府请愿等活动,活动遍

及西班牙(1973年到1975年西班牙产业工人的罢工达到159万个工作日)和英国,英国煤矿工人举行了两次大罢工——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迫使紧张的保守党政府推迟几年关闭主要煤矿,甚至同意给所有工人都提高津贴。

采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也许是当时最著名和最绝望的有组织的抗议者,但他们并不是最具有斗争精神的。传统行业的工人人数不断下降,抗议力量由工会运动转向服务行业联盟组织的运动,而且活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在意大利,随着共产党领导的传统行业的成员不断减少,教师和公务员组织的规模和战斗力量不断增强。老的联盟对工人失业缺乏足够的同情心:绝大部分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他们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尽可能避免公开的冲突。好斗的协会组织——法国的“工人力量”(FORCE OUVRIERE),英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全国协会”、“全国公务员联合会”和“科技与管理人员协会”——斗志昂扬地继承了青年人和失业者的事业。 460

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对就业和工资保障的强烈要求,欧洲领导人最初参照过去的经验。他们与英国和法国强势的工会代表们协商通货膨胀中工资的解决办法。在意大利,工资和物价与按照标定指数系统的相同比率挂钩,称之为工资指数等级系统,自1975年开始实施。不景气的行业——特别是钢铁行业——由国家接管,与战后首轮国有化的做法类似;在英国,通过1977年制定的“钢铁计划”,统一规定钢铁价格,取消了价格竞争,挽救了整个行业;在法国,洛林地区破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和国家的工业中心重新组合成为由政府给与保障的国有联合公司。在西德,联邦政府也参考类似形式,鼓励私人企业合并而不是国家控股,同样也达到了企业联盟的目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鲁尔煤矿控股公司的产煤量占到鲁尔地区产煤总量的95%。

通过直接的工资补贴(支付一定金额给雇主,使其不解雇富余的工人)以保留工人的工作岗位,以及制定限制第三世界国家产品输入本国的保护措施,法国和英国的国内纺织行业得以存活下来了。在联邦德国,波恩政府采取措施,工人们实行半日工作制,减少了80%的工资成本。瑞典政府则直接资助虽不赢利但是政治敏感性高的造船业。

各国对付经济萧条的对策各不相同。法国政府采取了微观经济干预措施,确定各行业的“国家龙头企业”,给与它们合同、资金和信用担保方面的支持;英国财政部继续宏观经济调控的老传统,采取调整税收、利率和再补贴等方面的措施。令人惊奇的是政策方面的变化很少。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意大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英国的各党派政治家们起初本能地听取了战后多数人的呼吁:尽可能消除失业、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为失业人员转换工作岗位,为不景气的私营和国有企业提供现金补贴等等。

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确信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程度已经大

161 于大规模的失业问题。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只有通过对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定一些国际协定,以代替美国政府抛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2年,欧共体原六国开始构筑“蛇洞浮动汇率制”,规定缩小欧共体成员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只允许波动1.125%,总波幅为2.25%。这个波动幅度比欧共体以外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少一半。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首先加入“蛇洞浮动汇率制”,但是仅仅维持了两年时间,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政府由于无力或者不愿顶住国内货币贬值的压力,都被迫宣布退出“蛇洞浮动汇率制”,让他们的货币自由浮动。法国也曾经两度加入和退出“蛇洞浮动汇率制”。很明显,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当时的状况。

1978年,西德总理施密特呼吁建立一种更严格的制度以取代“蛇洞汇率制”,这就是“欧洲货币体系”(EMS)。每一成员国的货币都以欧洲货币单位(ECU)[4]定出一个固定汇率,共同对美元浮动。由于马克既是欧洲货币体系中最强的货币,又是国际外汇市场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之一,人们便常常把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货币与马克汇率的波动,作为中央银行干预的标志。成员国要致力于控制国内经济以维持其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位置。这是德国首次在金融方面掌握主动权,事实上,德国马克至少在欧洲已经取代了美元。

有些国家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特别是英国,因为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正确地认识到,欧洲货币体系将阻碍英国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以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而加入的国家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加入。作为“必须的解决办法”,欧洲货币体系行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或者是欧盟委员会和几年之后的欧元的职能):它可能迫使政府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政府可把这归罪于外国人制定的条款和规矩。事实上,这是新安排的真正长远意义所在。他们在及时消除通货膨胀问题上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也做了一些),但是却成功地剥夺了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上的主动权。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所带来的影响在当时也许还不能完全看到。在过去,如果一个国家选择“硬钱”策略,坚守金本位制或者不愿意降低利率,那么它必须对它的选民们有所交代。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状况是,无论是英国政府、瑞典政府还是意大利政
162 府,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失业问题,或者持续下降的工业生产值问题,或者通货膨胀导致的工资增长,它们都只能无望地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例,或者事先协商好的欧洲内部汇率的威力,并逃避责任。此举在战术上的受益是明显的:但这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4] 这个缩写单词有明显的政治用意:通过重新使用18世纪法国银币的名字以减轻法国人对西德成为参与欧洲事务的领袖角色的不满。

如果欧洲国家不能解决就业、高工资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其成员国必将觉得遭到背叛而变得非常愤怒。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政府领导人的本能反应是缓和蓝领工人阶级及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害最深,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有先例证明他们最有可能成为激发全社会范围的抗议。但是,事实证明,真正的反对者却不是他们。赋税沉重的中产阶级——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白领雇员、小商人和个体户——在重压和忧虑之下,迅速转化为对政府的反抗者。

毕竟,现代福利社会的最大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当20世纪70年代的战后体系开始解体时,由于通货膨胀蔓延,由于以税收补贴衰退的工业,也由于因为预算和财政限制而减少甚至取消社会公共服务,他们觉得利益受到威胁,甚至感觉受骗上当。如同过去一样,对于现代福利国家的高税收而导致的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产阶级的感受最深刻。

中产阶级同时也被认为是最难“管理”的。20世纪70年代广泛流传着一种恐惧,那就是欧洲的民主党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首先,20世纪60年代破除旧习的革新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原先看起来是令人好奇的、甚至是兴奋的、充满信心的日子,现在却越来越像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的预兆。接踵而来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带来了更多的焦虑,然而政府对此似乎无计可施。

欧洲政府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对时局的失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大众担心的根源——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那些政治家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坚持自己的缺点带来的好处。80年代中期,时任倒霉的英国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哀叹着充斥在欧洲大陆的数以亿计的存于欧洲非美国银行的美金,“那些不愿露面的人不断地将自由资金像原子云一样积聚到欧洲市场,以规避国家政府的管制”。〔5〕这正是他们的杰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罗德的政党正是因为对手——保守党成员——无力消除公众的不满,而在1974年成为执政党,但是在紧接下来的一年即被指责为无能。

在英国,甚至有些传言涉及民主机构应对现代危机的能力低下,涉及媒体对冷漠的局外人或非政治专家与“社团主义者”合并给政府带来利益的推测。在那些年里,英国一部分高级政治人物就像戴高乐(在1968年5月)一样,认为同警察和军队领导人会见是一条谨慎的措施,以确保一旦发生公众骚乱时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在从来不怀疑议会制合法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低地国家,世界金融体系的混乱、战后经济明显的衰退以及传统选民的不满,都给战后容易自信的一代人带来困扰。

在这些模糊而活跃的疑虑和幻象背后,存在着非常真实而又在那时看来是一触即发

〔5〕 摘自哈罗德·詹姆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国际货币合作》,纽约,牛津,1996年。

的危险。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国家的国内冲突并不多,公开的暴力事件也很少。在东欧、欧洲的殖民地地区、整个亚洲、非洲和南美地区,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期间,斗争和谋杀不断升级,从朝鲜到刚果有上百万的士兵和平民被杀。美国本土也发生了3次政治暗杀和不止一次的暴力流血事件。但是相比之下,西欧各国却平和安定。

欧洲警察也殴打和枪杀平民,但是通常只是针对外国人,所谓的深肤色的人。〔6〕除了偶尔与共产党的示威者发生冲突,西欧的军队很少被政府召集起来镇压暴力反抗,即便是有暴力事件,也是他们自己内部所为。按照两次大战之间数十年的标准衡量,欧洲的城市是相当安全的——这一点经常被评论员用来强调和对比欧洲社会的井然有序和美国城市疯狂而冷漠的个人主义。至于60年代的学生暴动者,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样的:欧洲的青年人可能会参与革命,但大部分是出于展示或炫耀自我。“巷战者”的实际危害性很小。

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途突然一片黑暗。如同东欧在前苏联入侵布拉格之后,在苏联政党领导人兄弟般友爱的拥抱下几乎窒息,西欧也逐步失去了对公共秩序的控制。挑战并不是来自传统的左翼。可以确定的是,苏联政府对这许多年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优势非常高兴:水门事件和西贡“沦陷”决定性地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然而苏联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在中东危机中没有受到损害。但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出版英文版作品《古拉格群岛》而在1974年2月被强行驱逐出苏联,之后几年柬埔寨发生的大屠杀,以及所谓越南“船民”遭遇等等,都导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彻底破灭。

除了一些非常边缘化的例子,右翼复兴的可能性也不大。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社会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选举的得票率从来不曾超过6.8%,它在任何场合都不关心自己是否表现得像一个合法政党。西德的民族主义者不太注重外部形象,而与比利时、法国或者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一样,他们在选举方面的重要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简而言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政党的代表,他们在西欧都没有前途。国内和平的真正威胁来自其他方面。

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社会面临两个严峻的考验。一个是病态的,源自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但是它以很现代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区、在爱尔兰北部

〔6〕 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1961年10月17日,法国警察谋杀了大约200名阿尔及利亚人,还有许多人是在巴黎跟随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塞纳河时淹死的。当时的警察局长是莫里斯·帕彭(Maurice Papon),他后来因战时与德国纳粹合作、逮捕在法国的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而被指控犯有侵犯人权罪。

的信奉天主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科西嘉岛,等等,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转变成暴力反抗。这对欧洲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比利时佛兰德斯的民族主义者和意大利上阿迪杰(即以前的南蒂罗尔)的讲德语的“奥地利人”长期以来不满他们的被“征服”,他们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如胡写乱画、示威、袭击、投炸弹甚至损毁投票箱等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但是,到1970年,南蒂罗尔问题通过建立双语自治区的方式解决了,除了最偏激的批评家,大家皆大欢喜;尽管佛兰德斯的“弗兰芒人民联盟”和“弗兰芒团”的民族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从法语区的瓦龙独立出来的最终目标,然而佛兰德斯的前景和影响深远的使比利时联邦化的立法,使他们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要求:佛兰德斯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从被社会遗弃者的报复运动,转变为因讲荷兰语的纳税人不愿资助失业的瓦龙钢铁工人(见第22章)而导致的反抗。但是,巴斯克人和阿尔斯特天主教徒的问题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乡村地区总是令元首佛朗哥特别忿怒:一方面是因为在西班牙内战中它与共和党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巴斯克独树一帜,这与根深蒂固的国家集权意识和西班牙军队的自我约束观念背道而驰。在佛朗哥执政期间,一切具有巴斯克特色的东西都遭到压制:语言、习俗、政见,等等。和他自己的极权本能相悖的是,这个西班牙独裁者甚至赋予纳瓦拉(该地区要求独立自治的呼声远不如巴斯克或加泰罗尼亚强)权利、特权和独立的立法权,他的目的很简单,仅仅是为了向邻近的巴斯克证明他们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465

佛朗哥的统治激发了现代巴斯克人的恐怖行动,尽管他们的发言人和拥护者总是声称这缘于他们更深的、破灭的独立梦想。埃塔(ETA,即“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成立于1958年12月,旨在领导武装斗争,争取巴斯克的独立。它从早期的地下组织发展起来——后来提出一些华而不实的思想和理论——与国外类似的组织建立联络,那些组织为他们提供资金、武器、培训、避难所,以及出版物:德国的巴德迈因霍夫集团、爱尔兰共和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法国的秘密军队组织(OAS)等等都在其中。

埃塔——以及它的支持者、成立于1978年的独立政党“埃里·巴塔苏纳党”——的战略是直接的武装暴力行为:关于巴斯克归属西班牙的问题,它提出的条件高到政府无法忍受。但是,像爱尔兰共和军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埃塔也有统治整个国家的野心。天主教徒和恪守道德的——用佛朗哥自己很喜欢的方式——埃塔激进分子袭击的目标不仅仅是西班牙警察(第一个受害者于1968年9月被杀)和温和的巴斯克警察和名人,还包括本地“西班牙式的”颓废的标志:电影院、酒吧、迪斯科舞厅、毒品贩子,等等。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埃塔的活动遭到严厉的镇压,但是政府越是镇压,他们的活动越猖獗: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末期,驻扎在巴斯克的西班牙武装警察

达到全国警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埃塔组织于1973年12月20日在马德里暗杀西班牙首相、海军上将路易斯·卡里罗·布兰科,而且仅仅9个月之后,他们又在首都实施炸弹袭击,导致12名平民死亡。1975年9月,在佛朗哥去世前不久,5名埃塔成员被处死,但是这并没有威慑到该组织的恐怖活动。而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转机。

埃塔组织和它的支持者希望获得完全的独立。按照西班牙佛朗哥政府之后的宪法规定(参见第16章),通过1979年全体公民投票决议,巴斯克地区得到的只是自治区的地位。因为失去了满足于地区自治及语言和文化自我表达的温和同情者的支持,愤怒的埃塔组织加紧了炸弹袭击和暗杀等恐怖行动。在1970年到1980年期间,该组织杀害了181人;在接下来的10年间,平均每年都有34人被杀害。但是尽管这样,西班牙的民主政治根基还很脆弱,埃塔和它的政治同盟们也没能把他们的恐怖运动转变为政治优势:他们曾鼓动一小撮右翼军官以法律、秩序和国家统一的名义阻止1981年2月议会会议,结果以惨败收场。

埃塔的影响力之所以有限的原因是,除了其疯狂杀人造成了广泛而又非常恐怖的后66果外,还因为大部分的巴斯克人的身份。的确,很多“巴斯克人”并不是真正的巴斯克人。20世纪60年代的西班牙经济改革,以及国内外大量移民的涌入,所造成的巨大变化,是老一代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狂热的青年追随者们感受不到的。到80年代中期,在巴斯克地区,父辈是巴斯克人的不到人口总数的一半,祖辈是巴斯克人的就更少。许多人把埃塔和埃里·巴塔苏纳党当作是他们安全幸福生活的一个威胁。

由于埃塔的政治目标与社会现实脱节,使他们甚至变得更加极端——借用乔治·桑塔亚那对“狂热”一词的定义来说就是:忘记了目标,再加倍努力。埃塔组织通过犯罪和敲诈勒索获得有限资金,它的运作日益受到限制,只能在法国西南的巴斯克边境活动,偶尔去杀死一名政客或乡村警察,但是它毕竟生存了下来。然而它在煽动巴斯克人支持政治独立的情感和威胁西班牙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这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埃塔最大的“成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恐怖活动促使社会党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同意“反恐怖主义解放组织”非法进入法国,以铲除埃塔组织,在1983年—1987年期间,26名埃塔组织成员被杀。冈萨雷斯的这一决定,多年之后才被公诸于众(参见第22章),给西班牙佛朗哥之后的早期民主立宪制投下了阴影;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这算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有争议性的温和回应。

“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在方法和对外宣布的一些目标上与埃塔类似。正如埃塔寻求巴斯克地区摆脱政府统治从而脱离西班牙,爱尔兰共和军也寻求北爱尔兰地区不受政府统治从而独立于英国,并且统一北爱尔兰的6个省和爱尔兰其他地区。但是两者的区别

是很明显的。既然独立的爱尔兰是早已存在的,分裂者们可以提供——至少在原则上——给支持者们一个实际的国家目标。在另一方面,北爱尔兰的社群不止一个,两者之间的差别由来已久。

像法属阿尔及利亚一样,北爱尔兰——阿尔斯特——既是一个残留的殖民地,又是英国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2年,当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放弃爱尔兰地区,将它交还给爱尔兰人时,它有足够的理由把岛上的6个郡保留下来,这些郡的绝大多数新教徒对英国王室非常忠诚,也不愿意接受爱尔兰共和国的统治,也不愿意融入一个由主教支配的半神权政治的共和国。不管他们在公共场合说些什么,新组成的共和国政治领导人们并非总是不愿放弃巨大的、而且是团结的新教徒社区。但是对于爱尔兰的一小部分民族主义者而言,对他们的放弃就意味着是一种背叛,在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下,他们继续要求统一整个北爱尔兰群岛——如果需要的话,用暴力的形式。 467

这种状况大致维持了40年。到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都柏林政府的官方姿态和西德波恩政府的态度相似:愿意接受国家的重新统一,但同时希望统一的日子无限期地推迟。同时,继任的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选择尽可能对阿尔斯特的动荡局势视而不见,那儿占多数的新教徒通过不公正立宪、政治代言制、对雇主的宗派性施压,以及垄断例如公务员、法官、特别是警察等等重要职位的渠道,控制了当地的天主教徒。

如果说英国大陆的政治家宁愿不知道这些事情,这是因为保守党依靠“统一党”人士(可追溯到19世纪主张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运动)来争取至关重要的议会席位;因此这导致阿尔斯特成为英国领土完整的一部分。而工党与贝尔法斯特强大的造船业工会和联合行业工会组织一直关系密切,那里的新教徒长期以来享受着优厚待遇。

如同最新的观察资料显示:北爱尔兰派别林立,情况非常复杂。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差别是实实在在的,表现在公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生到死亡,贯穿在教育、居住、婚姻、就业和娱乐等各方面。古代——上溯到17世纪和18世纪——的战争和胜利对于毫无取胜希望的人来说也许是荒谬的仪式性的东西,然而这背后的历史都是真实的。但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绝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阶级区别,尽管爱尔兰共和军尽力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它的政治理论。双方都有工人和牧师——在更小范围内还包括地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专业人员。

而且,很多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对立即摆脱都柏林政府的统治并没有迫切的愿望。在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仍然是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家,北部的生活水平尽管比英国大部分地区要低,但还是要高出爱尔兰的平均水平。甚至对天主教徒来说,阿尔斯特有更好的经济状况。同时,新教徒坚定地与英国保持一致。这种情感并没有得到英国其他地区的回应,他们对北爱尔兰考虑甚少。20世纪60年代末期,像英国其他地区一样,

阿尔斯特的传统工业开始衰退,英国政府的决策者很清楚,广大新教徒蓝领工人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尽管如此,还远远不能认为几十年以来英国政府对阿尔斯特问题不予关注。

爱尔兰共和军变成了一个边缘化的政治派别,它公开指责爱尔兰共和国是非法的,因为它并没有彻底实现将爱尔兰变为一个特别的、激进和统一的国度的期望。然而爱尔兰共和军观念模糊的、不合时宜的理论对年轻一代士兵毫无吸引力(包括在贝尔法斯特出生的 17 岁的格雷·亚当斯,他于 1965 年入伍),他们对行动的兴趣大过空洞的理论说教,而且组成了自己的组织,即秘密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7〕“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大部分从德里和贝尔法斯特招募而来,加入到席卷北部的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示威游行的潮流中,向位于斯托蒙特城堡的阿尔斯特政府要求迟迟未到的天主教徒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他们的努力换来的是政府的不妥协和警察的暴力镇压。

接下来的 30 年里来笼罩北爱尔兰——某种程度上说是整个英国——的公众生活上的“阴影”是德里的街头战争,它伴随着 1969 年 7 月传统的“学徒游行”,高调纪念 281 年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和天主教的失败。面对不断升级的公开暴力和天主教领导人要求伦敦干预的呼吁,英国政府派出军队行使这 6 个郡的警察职能。派出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在英国本土招募的,他们没有严格的党派背景,因而不像当地警察那么残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出现也凸现了新成立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核心愿望:作为在爱尔兰的统治之下,重新统一整个爱尔兰岛的第一步,英国政府和它的部队必须撤离阿尔斯特。

英国军队没有撤离。他们该怎样离开也不清楚。20 世纪 70 年代建立社区间的相互信任、各省自主管理的各种尝试,最终的结果是双方的相互怀疑和对峙。天主教徒即使一点都不喜欢他们自己的极端武装分子,但他们早就怀疑阿尔斯特新教徒领导关于分享权力和公民平等的诺言。而后者总是不愿意对占少数的天主教徒做出实质性让步,他们现在真正开始害怕这些不妥协的新教徒武装分子。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军队的介入,这个地区的公开内战将更加严重。

英国政府因此被拖下水。起初,伦敦政府对来自天主教的改革压力持同情态度,但是 1971 年 2 月一名英国士兵被杀后,伦敦政府就出台了不经审判便可以拘禁的条令,形势迅速恶化。1972 年 1 月是一个“血腥星期天”,英国伞兵在德里大街上向人群开枪,打死了 13 人。同年,在阿尔斯特,146 名安全部队队员和 321 名平民被杀,将近 5 000 人受伤。

〔7〕“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名称来自 1916 年 4 月 24 日的《都柏林宣言》,当时的起义者宣布成立一个临时政府。

由于新一代的殉道者和对手的固执,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组织的活动持续了30年,在此期间,阿尔斯特和英国大陆大量的士兵和平民被枪杀、被炸死或致残。而且至少有一次试图暗杀英国首相的事件。当时即使英国政府希望与阿尔斯特划清界限(许多大陆选民都希望这样),他们也做不到。1973年3月的公民投票以及后来的民意测验显示,占压倒性多数的阿尔斯特人民希望继续保持与英国的联系。〔8〕

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并没有使爱尔兰得到统一。它没能将英国人赶出阿尔斯特,也没有动摇英国的政权,尽管谋杀政治家和社会名流的事件(特别是蒙巴顿勋爵,他是前印度总督,也是威尔士亲王的教父)改变了公众对爱尔兰海两岸局势的看法。但是爱尔兰人的“麻烦”进一步将英国人民的黑暗生活推进更加水深火热的地步,给当时“失控的政府”的论调火上浇油,同时也终结了20世纪60年代的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时代。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和开始觉醒的新教准军事部队——终于同意坐下来谈判,以确定合法解决方案,英国政府对此从一开始就乐意让步,然而到这个时候,已经有1800人在战争中丧生,20%的阿尔斯特家庭有人在战争中受伤或者被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欧洲其他“病态、反常”就算不上什么了,尽管它们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个自称“愤怒旅”的组织,代表没有议会席位的失业者,1971年在伦敦周围放置炸弹。瑞士的汝拉地区讲法语的分裂主义者模仿爱尔兰共和军的战略,在1974年因抗议被强制合并到(讲德语的)伯尔尼州而发生暴动。在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伦敦地区的布里克斯顿,暴动的人群纷纷与警察发生冲突,争夺“闲人免进的”城市贫民窟的控制权。

如同我所指出的,这样的抗议和行动是政治上的病态:不管它们的形式有多么极端,它们的目标是相似的,采取的策略也是功利性的。他们尝试要获得些什么,而且根据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如果达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停止行动。埃塔、爱尔兰共和军和他们的模仿者们是恐怖主义组织;但他们不是没有理性的。为了保住他们的目标,哪怕只是一部分,大部分组织都以在适当的时候与对手谈判而告终。但是这种思维对再一次发起暴力的领导者来说没有半点影响。

在西欧的大部分地方,20世纪60年代无处不在的激进理论并没有产生负面影响。但在比较特别的两个国家,可自圆其说的激进主义促成了一小部分以前的学生激进分子醉心于改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开始“揭示”西方民主政治中强制性宽容的“真实面目”。他们推断,如果大力施压于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议会政府,那么它将被剥掉合法的掩护,

〔8〕 据估计,当时英国为维持和北爱尔兰的联系,每年需要花费30亿英镑,这导致伦敦政府很难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170 露出真面目。面对压迫者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将在阶级斗争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尽管它迄今同自己的利益“异化”,成为对形势“错误认识”的牺牲品。

这样的结论给 20 世纪 70 年代的地下恐怖主义组织太多——同时也太少——理据。大部分青年男女投身到恐怖组织,不管他们多么熟悉暴力合法性的词汇,却很少有人做归纳和总结。他们是恐怖主义的实践者。另一方面,特别是在西德,投入到给他们灌输对联邦共和国仇恨情绪的情感能量,比投入到 19 世纪激进主义滥用的修辞里的更深、更阴暗。重建在父辈观念中已经垮掉的安全和稳定体系的呼吁,是更加广泛的怀疑论的极端表达。所以,“革命恐怖”在德国和意大利采用它最危险的形势绝不是偶然的。

议会外政治和直接的暴力之间的联系,早在 1968 年 4 月就在德国出现了,当时 4 名青年激进分子——包括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和古德龙·恩斯林——因涉嫌在法兰克福两个百货大楼纵火而被捕。两年后,巴德尔在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策划和领导的武装袭击的帮助下从监狱逃跑。迈因霍夫和巴德尔发表“城市游击队宣言”,宣布组建“红军旅”(缩写为 RAF),他们的目标是用武力推翻联邦共和国。这个首字母缩写词 RAF 是特意选择的:正如英国的皇家空军空袭德国纳粹分子,人们俗称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也将用炸弹和子弹迫使英国政府投降。

在 1970 年到 1978 年期间,红军旅及其分支机构采取或有意、或随机的恐怖行动策略,杀害士兵、警察和商人,抢银行,绑架主流政治家。在那些年里,在这类恐怖活动中,他们除了杀死 28 人、打伤 93 人,还绑架了 162 名人质,抢劫 30 多家银行——这一方面是为了补充活动经费,另一方面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在成立初期,他们还将驻扎在德国的美国陆军基地作为目标,杀死、打伤一些美国士兵,尤以 1972 年春末为甚。

在恐怖活动最猖獗的 1977 年,红军旅绑架并杀死了戴姆勒-奔驰公司董事长、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刺杀了西德联邦总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主席尤尔根·蓬托。不过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表演了。迈因霍夫于 1972 年被捕后,在斯图加特的监狱里自杀。尽管有传言说她是被政府处死的,但是很显然她是上吊身亡。1972 年,巴德尔在法兰克福的一次交战中被抓,并被判终身监禁,他于
71 1977 年 10 月 18 日在狱中自杀,同一天古德龙·恩斯林和另外一名恐怖分子也双双在狱中自杀。他们的地下组织一直维持到 80 年代,但是恐怖活动减少了很多:1981 年 8 月,他们对驻扎在西德拉姆施坦因的美国空军总部实施炸弹袭击;9 月里,他们又试图刺杀美国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结果却失败了。

由于德国的地下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它取得的成绩只能根据它破坏德国的公众生活和共和国机构的程度来衡量。从这方面来看显然是失败的。当时最著名的政府打击行为是 1972 年社会民主党政府总理维利·布兰特通过的《禁止从事公

共职业法令》。该法令规定所有从事危害国家的政治活动的人不得承担公共职务,它目的显然是将左、右翼极端分子的支持者排除在政府敏感职位之外。在一个早已与公众利益一致的文化背景下,它当然激起了对审查及其更恶劣后果的恐慌;但是这还不是那些批评家们所担心的——或者另一个极端——所希望的独裁统治的前奏。

左翼恐怖主义分子或复兴的新纳粹右翼分子——在198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制造炸弹袭击,造成13人死亡,伤220多人——都没有成功地造成联邦共和国时局的动荡不安,尽管他们确实煽动了保守派政治家限制公民自由和“加强”秩序。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其他方面都很守法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对“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的广泛的同情。〔9〕

当地人民同情他们的原因之一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对德国失去的往昔的怀旧之情不断增长。人们觉得德国似乎“被双重剥夺了”:被纳粹分子剥夺了值得尊敬的“有用的”过去;被联邦共和国剥夺了美国监管人强加给德国的虚假的自我形象。用电影导演汉斯·尤尔根·西贝尔伯格的话来说,这个国家已经在“精神上被剥夺和被放逐了……我们生活在没有家乡、没有‘故土’的国家。”明显带着德国极端左翼恐怖主义气息的民族主义者——它以美国占领军、多民族融合以及“国际性”资本主义秩序为目标——敲响了警钟,如同恐怖主义分子宣称的:德国人成了为其他国家的利益、被其他国家操纵的牺牲品。

同样是在这些年,大量探讨这个国家充满疑问的历史和身份的电影、演讲、著作、电视节目和公共评论蜂拥而出。正如红军旅——可以说是通过代理人——所宣称的“对法西斯主义开战”那样,西德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也为了掌控真正的德国传统而斗争。与西贝尔伯格同为电影导演的艾德加·赖兹导演了一部非常受欢迎的16小时的小型电视连续剧:《故土,一部德国编年史》。它讲述了居住在莱茵兰-巴拉丁州的亨斯吕克乡村的一家人的故事,通过一个家庭成员的叙述,回顾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当时德国的当代史。 472

在赖兹的电影里,战争之间的和平岁月是沐浴着浓浓晚霞的甜蜜回忆;即使纳粹猖獗时期也不能打破那段美好时光的回忆。另一方面,战后联邦共和国的美国化遭到了愤怒而冷漠的鄙弃:它的重物质利益而轻国家价值,它对历史传统的破坏,都被描述为对个人价值和社会的强烈腐蚀。如同在法斯宾德的电影《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中的女主角“玛丽亚”为成为牺牲品的德国履行义务,但是很显然,《故土》却相当怀旧,甚至蔑视和憎恨外国价值,渴望“深沉的德国人”迷失灵魂的回归。

〔9〕 无可挑剔的守法的法国社会党甚至在联邦德国成立了一个“人权保护委员会”,为那些被控实施恐怖行为的被告提供专业咨询和帮助。

赖兹如同西贝尔伯格和其他导演,对1979年首次在德国电视台播出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公开表示蔑视。如果要描写德国的过去,不论有多么痛苦,应该是由德国人自己来做。赖兹写道:“最极端的剥夺过程是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剥夺。美国人通过《大屠杀》偷走了我们的历史”。对德国的过去运用“商业审美”的方式,是控制德国历史的美国做派。德国导演和艺术家为反对美国的粗劣作品而进行的斗争,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赖兹和法斯宾德都是《德国之秋》的导演之一。它集纪录片、影片片段和人物专访为一体,拍摄于1978年,涵盖了1977年秋天发生的所有事件,特别是汉斯·马丁·施莱尔的被绑架和被谋杀,以及后来巴德尔和恩斯林的自杀。这部影片因对恐怖主义同情的语言而引人注目。通过细心的剪接,联邦共和国传承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家族特征。“资本主义”、“利润制”和国家社会主义都同样地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和无可辩解的,恐怖主义以现代反抗者的面貌出现:现代的安提戈涅们凭良知反抗政治压迫。

《德国之秋》运用了很多电影手法——像当代其他德国电影一样——把西德描述成一个像纳粹主义极权的国家,只是在镇压和暴力程度上(还没有揭露过)有所不同。一个当时仍然被关在监狱的、有点悔改之意的恐怖分子豪斯特·马勒对着镜头解释说,1967年发生的国会反对派的反抗,是本该在1945年发生而没有发生的“反法西斯革命”。地下青年激进分子进行着反抗德国纳粹恶魔的真正斗争——虽然采用的是引人注目的纳粹似的方式,这是马勒无法解释的一个矛盾。

《德国之秋》中对纳粹主义的暗示,在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恐怖行动的告白书中已经变成了明示。如同哲学家戴特勒夫·哈特曼在1985年所言:“我们可以从金钱、技术和纳粹帝国主义新秩序的消亡这三者明显的联系中了解……(怎样)揭开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新秩序’上的摧毁文明的技术的面纱”。就是这种很容易产生的思想变化——纳粹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联系比它们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而德国人是这两者的牺牲品的想法——有助于解释德国激进左翼分子对犹太人问题上明显的麻木不仁态度。

1972年9月5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袭击了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并且杀害了11名运动员和1名德国警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杀手得到了当地左翼激进分子的援助(虽然当时德国的极端派政治家们不明白为什么极右翼分子也很乐意提供援助)。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和欧洲恐怖主义集团早就建立了联系——安司林、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曾经同时与巴勒斯坦游击队、巴斯克人、意大利人以及爱尔兰共和军等一起接受过“培训”。但是只有德国人做得更过分:1976年6月,当4名持枪的歹徒(两名德国人,两名阿拉伯人)劫持一架法国航空公司飞往乌干达恩德培的班机时,只有德国人确定了乘客的身份,并且把犹太乘客与其他乘客分隔开来。

如果德国人歧视犹太人的行为并没有彻底使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在他们的同情者面前丢脸,那是因为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共鸣:受害者是德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罪犯是美国资本主义者而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美国人现在对——例如——越南人的所作所为是“战争犯罪”。在西德有一种“新爱国主义”,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德尔、迈因霍夫和他们同党最初的暴力反叛直指父辈的日耳曼优越感,但是发现他们自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受到指责。作为西德左翼恐怖主义创建者中少数幸存者之一的豪斯特·马勒,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在30年之后被极右翼分子处死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地说,当代意大利恐怖主义与德国的恐怖主义没有显著区别。它也是从60年代的仿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来,绝大部分领导人接受的政治教育来自当时大学里的抗议活动。自称“红色旅”的左翼恐怖主义地下组织在1970年10月首次进入公众视线,他们散发传单,宣扬与德国“红军旅”非常相似的政治纲领。像巴德尔、迈因霍夫等领导人一样,“红色旅”的领导者也非常年轻(最著名的是雷纳托·库尔奇奥在1970年时仅29岁),大部分都是学生出身,他们自愿投身于地下武装斗争。 474

但是意大利与德国的恐怖主义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从一开始起,意大利左翼恐怖主义分子就非常强调他们与所谓的“工人”的关系;确实在北部某些工业城市,特别是米兰,极端左翼分子的确有一小部分追随者。与以一小撮犯罪分子为中心而集聚起来的德国恐怖主义组织不同,构成意大利极端左翼组织的有:合法的政党,城市游击队组织,小规模武装政治匪徒,等等,它们在成员和目标方面都相互重叠。

这些团伙和派别是历史上欧洲主流左翼组织的微缩复制品。在20世纪70年代,每一次暴力行动之后,都有当时仍不出名的组织声称对其负责,通常是某个组织的分支派别或者该组织分离出来的派别。除了恐怖分子本身,还有一大堆松散的、半公开的恐怖活动和刊物,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说教式的“理论”声称要为恐怖战略提供舆论支持。这些各色各样团伙、网络组织、刊物等的名字都是对别人拙劣的模仿:除了“红色旅”,还有“持续斗争”、“工人力量”、“前线”和“工人自治”、“工人先锋派”、“无产阶级武装核心”和“革命武装核心”、“共产主义斗争兵团”、“共产主义斗争联盟”、“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说这份名单再现了数千名学生及其追随者在叛逆的工人运动中宣扬社会革命的欲望,那么他们为引起公众注意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其影响也自然不可低估。库尔奇奥、他的同伴玛拉·卡戈尔和朋友们过着浪漫的、传奇神话般的、革命强盗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著名的拉丁美洲革命游击队形象),但是他们的危害的确是罄竹难书。在1970年到1981年期间,意大利每年都会发生谋杀、致残、绑架、袭击和各式各样社会暴力

行为。在这 10 年当中,3 名政治家、9 名地方官员、65 名警察和大约 300 名其他人员被杀害。

在成立初期,红色旅和其他恐怖组织的行动大部分仅限于绑架和偶尔枪杀工厂经理和小商人——他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老板的仆从”,这反映了他们对工厂里的直接民主的最初兴趣。但是到 70 年代中期,他们开始进行政治暗杀——首先针对右翼政
475 治家,然后是警察、新闻记者和检察官——采取的策略是“揭开”资产阶级合法性的“面具”,迫使国家进行暴力镇压,从而使大众观点出现两极分化。

在最初几年里,虽然攻击的声势越来越强,但直到 1978 年,红色旅仍然未能成功地煽动起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于是在 1978 年 3 月 16 日,他们绑架了最有名的一名人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前任总理和外交部长阿尔多·莫罗。绑架事件持续了两个月。基督教民主党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在共产党人和他的本党党内大部分人的支持下,甚至拒绝考虑绑匪提出的以释放“政治犯”为条件来交换莫罗的生命。虽然面临意大利各党派上上下下的一致谴责,以及罗马教皇和联合国秘书长释放人质的呼吁,但是恐怖分子依然不留情面。5 月 10 日,在停放在罗马市中心的一辆汽车里,人们发现了莫罗的尸体。

莫罗事件显然暴露了意大利政府的无能——内务部长在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就提出辞职。尽管有长达 8 年的反恐立法和全国范围搜捕,警察对地下恐怖主义的打击却明显是失败的。〔10〕这同时反衬出红色旅在国家的心脏地区和大城市进行政治谋杀的成功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明白,现在意大利的政治秩序面临着真正的挑战:距离莫罗尸体被发现不到两周的时间,红色旅杀死了热那亚反恐部队的头目;1978 年 10 月,又暗杀了国家司法部刑事司的司长。两周之后,“共产主义斗争兵团”暗杀了一名高级检察官。

不过红色旅也开始为它对政府的挑战付出代价。意大利共产党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对红色旅重拳出击,他们公开表明态度现在家喻户晓,那就是不管恐怖分子在 60 年代领导的受人欢迎的运动扎根于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到 70 年代,他们已经超出了极端政治派别的范畴。他们就是犯罪分子,同样应该被绳之以法。那些给他们提供理论保护的人也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也许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1979 年 4 月,帕多瓦大学的讲师托尼·奈格里和“工人自治运动”组织的其他领导人被逮捕,并被指控犯密谋武装叛乱国家罪。奈格里和他的支持者们坚持(现在仍然如此)说,既非秘密的、也没有武力的激进“自治运动”不应该与非法的秘密组织相提并论,他们的政治主张刚好与红色旅预期和追

〔10〕 就像在德国一样,警察也曾一度真正发现了他们的领导人。雷纳托·库尔奇奥于 1974 年被捕,后于 1975 年 2 月从狱中逃走,11 个月后再度被捕。

求的“资产阶级秩序”背道而驰。不过,对于奈格里暴力袭击帕多瓦大学的教师和管理人 476
员的指控,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大规模非法”、“不断内战”和需要组织“武装”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等口号在受人尊敬的学术圈广泛传播——在奈格里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里亦是如此。在莫罗被绑架和谋杀一年之后,奈格里亲自写下文章,以庆祝“敌人的灭亡”：“敌人的痛苦对我没有影响：无产阶级的正义有着自我肯定的活力和合理的审判能力”〔11〕

政治暴力有“自我肯定的活力”的观点在意大利历史上并不陌生。当然,奈格里所肯定的和红色旅以及他们的同伴们所实践的思想,与法西斯主义者鼓吹的“暴力清除能力”并无区别。在德国是那样,在意大利也是那样：极左翼分子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仇恨让它重新回到反民主右翼的“无产阶级”暴力的轨道上。到1980年,意大利左翼恐怖分子和右翼恐怖分子在目标和方式上都开始变得无法区分。实际上,红色旅和他们的后代绝不能为意大利“沉重岁月”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负责。在那些年里,地下的反共和国的右翼分子重新露面(犯下了当时最严重的一个罪行,1980年8月,他们炸毁了博洛尼亚市的火车站,造成8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在意大利南部地区蒙佐乔诺,黑手党在与地方官员、警察和当地政治家的斗争中,也采取了更具有侵略性的恐怖主义战略。

但是新法西斯恐怖行动的重现和黑手党暴力活动的复苏显示和加剧了民主制度的弱点,他们的承诺——也许是正确的——被左翼恐怖分子解释为是他们自己成功的标志。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都是通过搅乱正常的公众生活秩序,使其出现令人无法忍受的危险,从而破坏国家稳定——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极端右翼分子可以从恰恰是他们想要颠覆的力量中寻求一些保护和协作。隐蔽的右翼阴谋组织网络已经渗透到了警察、银行团体和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民主党的高层,掌控着对法官、检察官和记者的谋杀。〔12〕

意大利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在那些年能保存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从1977年到1982年期间,国家受到极端右翼、极端左翼和犯罪分子为所欲为的暴力袭击——同样是在这些年里,黑手党和其他犯罪团伙谋杀警察局长、政治家、检察官、法官和 477
记者,有时候几乎根本不受任何惩罚。然而更严重的威胁来自极端右翼分子——他们更有组织性,而且离国家的首都更近——“红色”恐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像德国的红军旅一样,利用了群众对激进思想的广泛同情。正统的共产党人正

〔11〕 奈格里起初被释放过,但于1983年再次被捕。1984年4月,经审判被判监禁30年。

〔12〕 这类网络之一、臭名昭著的“P2共济会救难所”是一个神秘的、由右翼政治家、银行家、士兵和警察构成的组织,由利齐奥·盖利领导,他在1943年至1945年间曾是墨索里尼的“社会共和组织”骨干。在总共962名成员中有30名陆军将军、8名海军上将、43名议会代表、3名内阁部长,还有天主教会、实业界和私人银行业里级别最高的代表。

确地看到,这种盗用革命传统来作为恐怖分子主要资产、赢得主流左派信任的行为是一种很危险的征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当地共产党自己也不知道,“红色旅”和“红军旅”——如同动机相似、但效率低下的比利时“共产主义战斗”、法国的“直接行动”,甚至其他地方更小的组织——的部分资金资助是由苏联情报部门秘密提供的。这些资金并非用来部署某个统一的战略:出钱资助只是根据一种普遍原则——我们敌人的敌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无论它多么荒谬可笑和无足轻重,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此类承诺产生了意外的后果:这些年西欧左翼恐怖主义的一个无可争议的功绩是,它将一个国家的人民心中残留的对革命的幻想完全抹掉了。

所有左翼的主流政治团体,特别是共产党,被约束在主流地位,远离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一方面是对他们和其他人面临威胁的自然回应——传统工人运动中的工会活动家和其他代表人物是地下组织最轻视的目标之一。但是另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沉重岁月”让人们联想起自由民主制度是多么脆弱——这个教训在头脑发热的60年代经常被忽视。多年来在西欧的心脏地带发生了多次的所谓革命颠覆活动,它们的实际结果并不是像恐怖分子们计划和期望的那样,使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相反却使各党派的政治家们聚集到相对安全的中间立场中来。

20世纪70年代是人们精神上最沮丧的10年。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可能缘于本章所述及的社会环境:急速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大范围的政治暴力,引发人们感叹欧洲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也许要过很多年后才会回来。大多数年轻人关心的不是如何去改变社会现状,而是如何能找到一份工作:追求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吸引力已让步于个人物质需求的困扰。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怎样保全个人利益比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更显得重要。

毫无疑问,这种情绪变化也是对前10年社会令人如醉如痴地放纵生活的回应。才刚开始沉浸于空前的活力爆发和音乐、时尚、电影等艺术创新中的欧洲人,现在开始从容地思考享受这狂欢盛宴所付出的代价。6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会像当时的“头脑简单”那样很快就过时: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只要做到的就一定能拥有;犯罪——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审美的——本来就是有魅力和创造力的。如果说60年代的特征是天真、自以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新生事物——而所有新生事物都是意义重大的——那么70年代的特征就是愤世嫉俗、幻想破灭和期望下降。

阿尔贝·加缪在《堕落》中写道:庸俗的时代产生空虚的预言家。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人。这个时代绝望地意识到,在伟大的希望和抱负离去之后,只剩下令

人窒息而又难以置信的陈旧思想在老调重弹。很显然,这是一个“大势已去”的时代,前途一片黑暗。如同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那时所意识到的:“带有连字符号的前缀 post-(后-)的使用意味着(一种)生活在有裂缝的时代的感受。”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战后”、“后帝国”、最近的“后工业”——即使它意味着将来的不确定,这个前缀有其自己的用意。而当它用于思想范畴时——例如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以及最易懂的“后现代主义的”——就给本已困惑的时代增添了更多的疑虑。

60 年代的社会文化是理性的。虽然有少量的吸毒者和乌托邦式的狂欢,但是那个年代的社会思想,如同那个年代的音乐一样,是熟悉而又条理清楚的,只是有点“臃肿”。它也旗帜鲜明地提倡公有社会:学生应该和“工人”、“农民”、“黑人”及其他人一样,可以分享社会利益、分享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尽管这与其他社会成员是对立的。60 年代的社会事业,不管有多么荒谬,设定了个人和阶级、阶级和社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几个世纪前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说,在形式或内容上或多或少都有几分熟悉。

70 年代的文化传统由集体主义转变为个人主义。如同人类学取代哲学成为 60 年代的原始学科,现在心理学又取代了人类学。在 60 年代,“错误意识”的概念被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广泛用于解释工人和其他人将自己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解放出来的失败之原因。我们看到,这个想法通过歪曲和变形,就构成了左翼恐怖主义的核心前提。但是在政治性不那么强的团体里,它也信奉奇特的“后世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背景语言用于弗洛伊德的话题,即所谓的“后弗洛伊德”。它强调需要解放的是个人主体,而不是社会阶级。

如同在北美,西欧也出现了“解放论”的理论家,其目标是将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幻想而不是社会强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在性别问题上的体现形式——社会压迫和性别压迫互相关联的想法——早在 60 年代晚期,就已经是某种社会背景下的陈词滥调了。但是马尔库塞或者威廉·赖希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的继承者之间界限分明——后者的思想是通过解放个体寻求整体改革。另一方面,他们的追随者雅克·拉康,或者是当代女权运动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和安妮·莱克勒克都不是那么有野心。他们不太关心传统的社会革命事业(女权主义者将其正确地定义为由男人领导、并且主要是为了男人自己的政治运动)。相反,他们试图削弱曾经是其基础的人类主体概念。

这样的思考包含着两个广泛流传的假设,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里非常流行。第一个假设是,权力不是存在于——如同大部分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的社会思想家所认为的——对自然和人类资源的控制,而是存在于对知识的掌握,即: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关于人本身的知识;而且首要的是关于知识本身是如何产生和合法化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权力的掌握依赖于掌握的知识量,以及控制其他人对危险“知识”

的掌握,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在那个时候,对人类这种状况的描述与米歇尔·福柯的文章有广泛关联。福柯除了偶尔写点蒙昧主义和反开化的文章之外,他在内心里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的早期作品与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紧密,他认为要把工人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们首先要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和经济的自私自利性。简而言之,人们应该用主人翁的知识来替代革命的知识:或者用前些年很流行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人们应该反抗统治阶级的“霸权”。

第二个假设是,那些希望更强烈地抓住知识潮流的人会走得更远。这是一种诱人的做法,他坚持要颠覆的不仅仅是旧有的确定性,而且还可能是确定性的可能性本身。对于所有起源于社会而有助于政治的行为、观点和知识都应该持怀疑态度。判断和评价的理念应该独立于形成这些判断和评价的个人,而在某些领域里,它本身就应该被看作一个参与者(及其明显保守的)社会立场的表现和表达。

原则上,所有判断和信仰的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重新分析。即使批评型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这样“被定位”。用欧洲最有影响的新社会学知识的代表、法国社会学教授皮埃尔·布迪厄的话来说:“教授话语”只不过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一部分人”的表达。这种带欺骗性的、具有破坏作用的定位知识和观点的方法,并不能揭示如何判断一种“话语”比另一种更真实:一个需通过将“真理”看作社会定位范畴来解决的难题——一个很快就开始在很多地方流行的姿态。这种发展状况的结果自然是对一切理性的社会论点越来越怀疑。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1979年写了一篇题为《后现代状况》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时代气息”,文章中的观点很明确:“我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法国这些主流知识分子通常受到了德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在过去这几十年中经常发生。意大利作家厄利奥·维托里尼曾经观察到:从拿破仑时期以来,除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任何其他外国影响都不能渗透到法国——他在1957年这样写是有道理的,20年之后依然如此。然而,如果说是先辈的人道主义意识能力吸引了马克思和黑格尔,那么,缺少自信的70年代人却被更隐晦的德国思想所迷惑。米歇尔·福柯的极端怀疑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尼采思想的改写。其他有影响力的法国作家,特别是著名文学批评家雅克·德里达,他从马丁·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寻找对人类原动力及其解构性的批判,以及越来越引人关注的认知人类主体及其文本素材的问题。

对于研究海德格尔或者与他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他的历史实在论对国际事务专业的学生很有吸引力)的专家而言,这种兴趣形式颇有些奇怪。毕竟,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思想与纳粹主义是一致的——显然,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他接受了由纳粹党

人资助的学术场所。但是在批判盲目乐观的进步假设、在质疑启蒙的理性主义及其政治和认知副产品的基础等方面重新燃起的兴趣,在20世纪初海德格尔式对现代性和技术进步的批评和“后现代主义”时期醒悟的怀疑论者之间建立了某种密切关系——使海德格尔等人可以澄清他们早期的联系。

当德国哲学穿过巴黎的社会思想、进入英国的文化批评的时候——它们的形式对当时大部分读者来说都很熟悉——它本身的困难词汇使人们很难读懂和理解,因而对新一代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具有无法抵抗的吸引力。那时因大学扩招而招聘的年轻教师大部分都是60年代毕业的学生,是在那些年的时尚和辩论中培养起来的。但是尽管在此之前10年里欧洲的大学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重大理论——有关社会的、国家的、语言的、历史的、革命的——但流传到下一代的首先就是这些理论。“文化理论”或者“一般理论”的学术研讨会代替了几年前还控制着激进学术辩论的传统学科分界线。“难度”开始成为知识分子严肃性的衡量尺度。在对“1968年思想”传统的反省中,法国作家吕克·费里和阿尔兰·雷诺尖锐地总结道:“60年代思想家最伟大的成就是让他们的读者相信:凡是不可理解的,就是伟大的”。481

由于大学里现成的听众,像拉康和德里达这样新近被奉为名人的理论家们将语言的无规律性和悖论性提升为成熟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给文本和政治分析提供了无限灵活的模板。在一些学术机构,如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旧理论顺利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再是经济范畴和政治机构的尴尬附属品,而重生为“文化批评”。再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革命的无产阶级击败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如同那时的英国文化研究的首席发言人史都华·豪尔在1976年所说的:“‘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失’的观点被更复杂的现实所替代,因为一个阶级内不同的阶层在做出决定性的社会经济环境选择时,选择了不同道路”。

在后来的几年里,豪尔自己承认他的“中心”“一度被各种各样难度很高的理论主题所占据”。不过实际上,这种自恋的蒙昧主义在当时十分盛行,它远离现实生活,在无意识中也成了枯萎乏力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见证人。而且,它绝不是那些年文化损耗的唯一症状。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光彩夺目的创意,也退化成了不自然的艺术技巧。1974年,导演过《巴黎属于我们》(1960年)和《修女》(1966年)的聪明而富于创意的导演雅克·里维特导演了《塞丽娜和朱丽去船上》,这部193分钟片子是典型的法国新浪潮电演,缺乏情节,充斥着程式化的模仿(尽管不是有意如此),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艺术理论化代替了艺术本身。

如果说60年代的传统之一是高端文化主张,那么另一个与之相对的主张则是赤裸裸地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相对单纯的摇滚音乐逐渐被“媒体灵”流行乐队替代,后者的一

惯手段是将前辈形成的风格作延伸和降格处理。就像流行浪漫小说和通俗小报为了商业利益而投靠大众文化一样,70年代产生的“朋克”摇滚也是以争夺流行音乐的市场为目的。它以“反文化”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寄生于主流文化,通常因唯利是图而使用暴力形象和极端语言。

“朋克”摇滚乐队公然使用具有政治性的语言,同样,1976年“性手枪”乐队轰动一时的“英国的无政府状态”为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伤感情绪。不过朋克乐队的政治性如同他们的音乐一样,只是单向度的,他们的音乐通常都局限于三个和音和一个拍子之内,依靠音量来产生效果。像“红军旅”一样,“性枪手”乐队和其他朋克乐队首先期望的是引起震动。甚至他们惊世骇俗的外表和举止也充满了讽刺和低俗:“还记得‘60年代’吗?”他们似乎在说,“那么,不管喜不喜欢,我们没有被淘汰”。现在,音乐颠覆包括了谴责“霸权”的愤怒的歌曲,他们假冒的政治内容掩饰了音乐形式元气大伤的现实。〔13〕

无论他们的政治和音乐有多么虚伪,至少朋克时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是真实的,这是一段诚实的经历。他们那些不断发展的不敬态度以各种粗俗、伤感而又无能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目的:对过去的历史、对政府、对公众人物和公众事物都是如此。在体现巧智的时候,这种对浮华世界和传统的嘲笑,可以从20年前就出现的、醒悟的英国青年讽刺作家那里得到暗示:戏剧评论专栏“边缘之外”、英国广播公司的午夜节目“就是那样的一周”、周报《侦探》。随着电视观众的大幅增加和国家审查制度的弱化,《巨蟒之灾》及其追随者和模仿者创造了大量的闹剧,下流、世俗的解说词和讽刺性的政治笑话——最后在尖锐的政治卡通片《吉尔瑞和格鲁山克》中以混合形式达到极致。摇滚音乐和新兴滑稽表演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两部巨蟒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由“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和“齐柏林飞船”乐队资助的《巨蟒与圣杯》(1974年),以及由“披头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赞助的《布莱恩的一生》(1979年)。

贬低公众人物的地位的风格,给类似“模仿秀”或者法国的“稚拙秀”等等每周一次的电视节目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这些节目中,主要的政治领导人轮流地被拿来嘲笑和奚落(现在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还是这样),这种事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讽刺作家和政治喜剧演员替代作家和艺术家而成为那个年代的智慧英雄:80年代初,当法国学生被问到谁是他们最崇拜的社会名人时,年长的评论员震惊地得知,让-保尔·萨特已经被科吕

〔13〕 在东欧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衰落时期,西欧的朋克音乐在其中对鉴赏趣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在那里,虚无主义的地下乐队无聊地将它与政治和音乐传统挂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80年代匈牙利的朋克乐队“斯皮翁”将色情描写和政治错误混合,录制了《安妮·法兰克》:“在他们的高潮之前有一点被迫的交媾,让你消魂,安妮·法兰克!同我做爱吧,安妮·法兰克!哭吧你这婊子,安妮·法兰克!否则我将抛弃你!安妮·法兰克——男孩子们在等你”。

什所代替,科吕什是一个下流的、偶尔放肆的电视喜剧演员,他揶揄地承认自己是通过竞选总统而得到了现在的声望。

然而,播放通俗流行文化中尖酸刻薄的滑稽模仿作品的公共电视频道同时也给幽默作家和滑稽演员提供了原材料。得到最广泛赞扬的滑稽节目也许是始于1970年的每年一度的“欧洲之梦歌唱大赛”。这档节目用电视同步传送多个国家的新技术的商业行为,在70年代中期吸引了上亿观众。“欧洲之梦歌唱大赛”——整个欧洲大陆的拙劣的、不知名的歌手们的表演让观众过目即忘——在观念和制作方面极其陈旧,以致与滑稽模仿作品无异。它早该在15年之前就过时了。但正是出于那种原因,它预示着一些新东西的到来。 483

“欧洲之梦歌唱大赛”的狂热,提升和赞美了没有前途的陈旧表演形式和一群无能的表演者,这种狂热反映了一度沉静和内省的怀旧文化。如果说,朋克、后现代主义和滑稽模仿作品是幻灭时代迷茫的结果,那么“向后”则是另一个结果。法国的流行乐队“从前”夸耀地穿戴着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这也是一种从“奶奶裙”到“新浪漫主义”的新爱德华七世时代发式的短暂的服饰复兴——后者在30年间重复了两次。在服装和音乐(以及建筑)方面,旧风格复兴的诱惑——与不自信的心理混合和搭配在一起——替代了革新。70年代自我质疑的麻烦时代是向后看的,而不是朝前看的。“自由博爱新时代”在它身后留下了一个拼凑混搭的季节。

第 15 章

新基调中的政治

184

我堕过胎。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其他 342 名女性),1971 年 4 月 5 日

用不了一代人的时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要么
会与莫斯科决裂,要么萎缩到不值一提。

——丹尼斯·希利,1957 年

在此条约下,除了先前赌光的東西以外,毫无损失。
——维利·勃兰特总理,1970 年 8 月

当两国希望增进友好时,他们通常会寻求那些最为一致的陈词滥调。
——提摩西·加顿·阿什

1970 年代,西欧的政治图景开始呈现分裂。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坛主流一直分为两大政治“家族”:左翼和右翼;各自内部又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1945 年以来,两翼有所靠拢,但整体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1970 年的欧洲选民们所面临的政治选择,即便在他们的祖父辈看来,也是似曾相识的。

欧洲政党的长寿得益于选民生态的惊人连贯性。在英国,选择工党还是保守党,或者,在西德,选择社会民主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与其说体现了选民们在具体政策上的深

刻分歧,不如说是对各自政党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偏好使然。在大多数地方,这只是一种旷日持久、跨越几代的选举习惯的延续,起决定作用的是选民的社会阶级、宗教信仰或地域位置,而非政党的竞选纲要。人们像父辈那样投票,选择对象则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工作领域和收入状况。

然而,在表面的延续性之下,欧洲选民的政治社会状况正在经历一场结构上的转换。白人男性工人阶级这个投票群体——通常作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基石——正在萎缩和分裂。与之相仿,“理想-典型性”的保守派选民——老年女性教徒——也不再铁定成为基督教民主党或保守党的选民核心。就其坚持的程度而言,这些传统选民已不再是选举主体了。原因何在? 485

首先,战后几十年间,社会变迁和地理迁移已经冲淡了原先固有的社会阶级划分,甚至到了难以辨别的程度。法国西部乡村或意大利威尼托区小镇里的基督教选民团,比利时南部或英格兰北部的工业无产阶级大本营,如今都已分崩离析。人们不再像其父母一样定居一处,还频繁更换工作。因此,无需奇怪,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已大不相同;而这些变化也开始反映在他们的政治倾向上,尽管起初还很缓慢。

其次,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繁荣与社会改革,已经有效地耗尽了各传统政党的纲领和愿景。正是它们的成功,使得左翼温和派和右派都无法提出合理可信的议案,尤其经过60年代洪水泛滥般的自由改革之后。国家的制度本身无可争议,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亦如此。可做的就只剩下劳资关系的调谐、反住房歧视和雇佣歧视的立法、教育设施的扩展完备,诸如此类:都是严肃的公共事务,却几乎撇开了重大的政治辩论。

第三,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履行政治义务。外来种族的少数群体,在其迁居的欧洲当地,往往不受白人工人阶级社团的欢迎,也就无法一直受邀参与当地的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因此他们的政治主张反映了这种受排斥的生活状况。最后,一些旧日的政治文化全然陌生的话题,已由60年代政治家引入了公共讨论。“新左派”也许缺乏纲领,但从来不缺少主题。最重要的是,它吸引了新的选民。而对性和性活动的着迷,很自然地导向了性政治;在传统激进党派中居于次要位置的女性和隐形的同性恋群体,如今已作为合法的历史主体浮出了水面,拥有自己的权利和主张。特别是,随着不少地方法定选举年龄降至18岁,青年和他们的参政积极性都已移向了中心舞台。

这一时期的繁荣促使人们将注意力从生产转向消费,从生存必需品转向生活质量。在60年代的热潮中,极少有人费神思虑繁荣带来的道德困境——它的受惠者们正忙着享受那幸运的果实呢。可是数年后,许多青年,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欧和北欧青年,开始把50年代和60年代以来的商业至上和物质财富看成一笔沉重的遗产,只会带来庸俗

的商品和错误的价值观。现代性的代价,至少在其主要受益人眼里,开始显得过高了;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经历的那个“失落的世界”却魅力大增。

486 显然,对这种文化不满而造成的政治化是活动家们的典型成果,他们或许其家庭曾一度活跃于比较传统的政党,对于那套政治策略了然于胸。因而政治逻辑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其要旨依然是围绕一项立法纲领,动员那些观点相近的人们,来敦促国家使之生效。有所不同的是组织的前提。迄今为止,在欧洲,政治上的支持者是由大型选举团体在投票中的亲密关系形成的,这些团体由阶级或职业构成,通过一套共同的、遗传的、而且往往相当抽象的原则和目标扭结在一起。政策远不如忠诚来得重要。

不过,谋略在 70 年代走向了前台。“单议题”政党和运动出现了,其支持阵营取决于共同关注点的多种组合:这些关注点通常聚焦单一,偶尔也有异想天开的点子。在英国大获成功的“散装啤酒运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中产阶级压力集团成立于 1971 年,旨在反对当时倾向气态的、均质的“罐装”啤酒的趋势(以及这类啤酒的出售者——面目雷同的“现代化”酒吧)。他们依据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规模生产的垄断型企业吞并了手工酿造产业,出于大公司的利益目的而操纵着啤酒消费者——用俗不可耐的替代品诱使消费者异化了自己的味蕾。

“散装啤酒运动”巧妙地将经济分析、关爱环境、美学偏见和纯粹怀旧杂糅在一起,预示了其後很多单议题活动家的网络,还有不久后追随者甚众的布尔乔亚-波希米亚人群对昂贵的“本真”的追求风尚。〔1〕但是,这项独特的单议题运动的魅力有些过时,更别提参与者的投入之深与激情目标之浅之间产生的失衡,这些都使得它必定显得有点儿古怪好笑。

不过其他单议题政治党派就一点儿也不古怪了,其中大多数如同“散装啤酒运动”一样,是由中产阶级组织并为自身服务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70 年代初期出现了好几个抗议性政党,有名的如芬兰的农村党(即后来的真正芬兰人党);摩根斯·格里斯特鲁普的丹麦进步党和安德斯·朗格领导的挪威进步党。这些政党起初都只是积极致力于减税——1973 年成立的挪威进步党,最初就叫“安德斯·朗格的要求大力减税、减费和减少国家干预的政党”,党纲就是用一页纸重申名称里的要求。

87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情况也许比较特别——别处的税率都没它高,公共服务也没它

〔1〕 在英国,这种风尚可追溯至长期以来对素食、“本真”的建筑材料和布料等的热烈追求——通常与社会主义团体和步行者俱乐部的活动相重合,是左翼对于保守派热衷的狩猎、射击和钓鱼的回应。在欧洲大陆,左翼文化和右翼文化之间的对立则反映了另外一种历史。英国的《美食指南》是由费边派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alists)创立和编辑的,并且一开始就在烹饪界前沿引发了阶级之争;而法国的《米其林指南》却始终单纯的商业企业,尽管它们的读者群基本相同。

贵——当然,别处的单议题政党也没格里斯特鲁普的政党干得出色,它在1973年丹麦全国大选中赢得了15.9%的支持率。但是反税党并非新鲜事物。它模仿皮埃尔·布亚德的“商人手艺人保护联盟”,后者成立于1956年,旨在保护小商人小店主免遭税收和超级市场的冲击,并因在1956年的法国选举中获得12%的支持率而煊赫一时。但布亚德领导的运动也是个特例。1970年后出现的大多数抗议性政党都颇持久——挪威进步党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1997年,赢得了成立至今最高的支持率(15.3%)。

反税党像战争期间的那些农业反对党一样,基本上是被动的、消极的——它们反对令人讨厌的变化,对政府的最大要求是去掉那些它们认为不合理的财政负担。其他的单议题运动则会对政府、法律或制度提出更为积极的要求。其关注面相当广泛,从通过教育来改革监狱,精神病院的医疗服务,到食品安全、社区服务、城市环境的改进和文化设施的普及等等,不一而足。它们全都“反对一致通过”,不愿将自己的支持者局限在任何传统的政治选民团体之中,而且都乐意——必然如此——尝试以另类方式宣扬自己的主张。

其中有三大新政治团体——妇女运动,环境保护主义组织与和平运动——因其规模和持久的影响力而意义显著。显而易见,妇女运动是最具多样性和深远影响的。除了两性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以外,女性还有些问题特别要求给予关注:儿童保育、薪酬平等、离婚、堕胎、避孕、家庭暴力,这些议题此时刚刚开始进入欧洲的立法视野之中。

另外,还有激进派女性团体所强调的同性恋(女同性恋)权利问题,以及女性主义者日益关注的色情文艺问题。后者极好地说明了政治上的道德新格局:在老自由派和新左派人士共同努力下,文学和电影作品中的色情描写直到最近才被审查制度松了绑。可还不到十年,它又成了众矢之的,这回是妇女团体协同作战,而它们通常是由激进女性主义者和传统保守派就此结盟、共同领导的。

从一开始起,欧洲的妇女运动就是一个多重兴趣和目标交叉的混合体。1950年,西德有四分之一的已婚女性外出工作,到1970年这一比例已经升至二分之一;在意大利,1972—1980年的150万新增劳动力中,就有125万是女性。截至1990年代中期,除葡萄牙和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各国,女性占了总劳动力(官方统计)中的40%强。许多女性新劳力干的是兼职,或者从事初级文员工作,享受不到充分的福利。兼职工作的弹性特点很对打工母亲的胃口,但是在70年代的经济困境下,报酬较少、又很不稳定的兼职亦于事无补。因此,在各种要求当中,西方大多数女性雇员早先提出的同工同酬、工作场所应提供育儿设施,就一直居于首要位置。 488

上班(和不上班)的女性都日益希求在育儿方面得到更多帮助,然而她们却未必想生更多的孩子。事实上,随着经济的繁荣,她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出外工作,想少生些孩子——或者至少在生育上有更多话语权。自20世纪初就产生了获取避孕信息和避孕工

具的需求,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顶点之后的10年间,这种需求更是大增。法国的“母亲联盟”成立于1956年,迫切要求获得避孕权;4年后“法国家庭计划运动”继而起之,名称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心态的转变。

在解放的60年代对各种形式的性自由的吁求压力下,各国放松了对避孕的法律控制(东欧某些国家除外,如罗马尼亚的全国性“人口繁殖战略”仍然禁止避孕)。到了1970年代初,除去一些偏远农村和天主教对当地人口仍保有道德权威的地方,西欧国家已经普遍接受避孕。不过,即使在城镇,这一新自由造福最大的还是中产阶级妇女;对于很多工人阶级已婚妇女和绝大部分未婚女性来说,控制生育的主要方法还是沿袭已久的形式:堕胎。

因此,对堕胎法律约束的改革要求成为新女性政治的主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女性主义激进派的政治主张与不关心政治的普通女性的需要,在此构成了少有的交叉点。有目共睹的是,在英国,1967年开始免除堕胎刑事责任。但在其他不少地方,堕胎依然是一种犯罪:在意大利它意味着5年的牢狱之灾。不过,无论是否合法,堕胎已经成为千百万女性的一种生活经验——仅在1973年小拉脱维亚,3.4万例婴儿诞生的同时,就有6万例堕胎。在那些堕胎尚不合法的地区,堕胎宿命地背负了法律和医疗的双重风险,因而总能让女性跨越阶级、年龄和政治派别的界限,团结在一起。

1971年4月5日,法国的《新观察家》周刊刊登了一份由343名女性联名签署的请愿书,声明她们全都堕过胎,所以犯了法,由此呼吁修订刑法典。签名者都是名人,其中包括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弗朗索娃·萨冈,演员凯瑟琳·德纳芙、让娜·莫罗和玛丽-弗朗斯·皮希尔,律师和政治活动家伊维特·胡迪和吉赛拉·阿里米,真是名流荟萃。紧随着1968年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运动,一些不出名但斗志旺盛的活动家们也都加入了她们的活动。虽然在此前一年就有300多名女性因堕胎而获罪,法国政府还是谨慎地保持了克制,没有起诉公开信中的签名人。

这封请愿信是由成立于1970年的“女性解放运动”组织发起的;行动引起的政治轰动效应促使阿里米和德·波伏瓦一起成立了名为“选择”的政治组织,以致力于推翻堕胎禁令。1973年1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承认,法国法律已落后于公众观念的进步。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仅在1972—1973年,就有3.5万多名法国女性跑到英国去做合法的堕胎。蓬皮杜的继任者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指示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律修订案;1975年1月17日,国民议会宣布在法国堕胎(在怀孕10周期间)合法。

整个西欧妇女界都对法国的案例做了细致研究。在意大利,新成立的“意大利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与小规模的“激进党”联手发起了一份含有8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更改禁止堕胎的法律条文,并在1976年4月得到了5万名女性罗马大游行的声援。1975

年,一份姗姗来迟的新“家庭法规”才取代了原来的法西斯主义条款;3年后,意大利国会终于通过投票表决,宣布堕胎合法化——当天正是1978年5月29日,距离发现阿尔多·莫罗的尸体刚好3周。

在1981年5月的一次全民投票表决中,该决议间接地得到了认可。当时意大利人同时否决了两项提案:一项是要求进一步放宽现有的合法堕胎的条件,另一项则是由刚成立的“保护生命运动”组织提出的,希望重新将堕胎定罪。如果说意大利的改革步伐有些落后于英法,那不仅是因为它受到了天主教教会的反对,更主要的原因,是很多意大利女性主义者已在各种国会权力以外的“自治”左翼运动中初经历练(具有启示意味的是,1971年第一份“女权战斗宣言”的核心议题是要求家务有偿化——这是将现代社会视为一个巨大工厂的旧“工人社会观”在家庭领域的惯性延伸)。所以,在利用现有政治机构以达到目的方面,她们的动作有些迟缓。

在西班牙,法国式策略得到了更直接的借用,并且由于旧政权垮台而释放的能量而加速实行。1976年1月,佛朗哥死后不到两个月,西班牙出现了第一次女性主义示威活动。两年后,通奸行为被免罪,避孕合法化。1979年,1000名女性,其中包括许多社会名流,在公开声明上签字,宣布她们曾因堕胎而违法——这不禁让人想起,在佛朗哥统治下,西班牙曾经成为拥有欧洲最高的非法堕胎率的国家之一,堪比那些同样是威权主义的、鼓励生育、严禁任何形式的人口控制的东欧国家。不过即使在后佛朗哥时代,反对堕胎法律改革的文化压力依然强大;1985年5月,西班牙议会最终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提案,但仅限定适用于强奸、胎儿畸形和母体濒危三种情况。 490

争取堕胎权的成功战斗,与离婚权的取得一起,构成了近年来女性政治团体的主要成果。千百万女性的生存状况因之而获得极大的改善。自主堕胎和有效易行的避孕,不但大大降低了许多女性、特别是贫困女性的死亡危险,还使在工作的女性得以选择晚育,历史性地将生头胎的时间推迟到了育龄的后期。

新生人口因此持续下降。1960—1996年,西班牙女性的生育率下跌了将近60%;意大利、西德和荷兰紧随其后。在70年代改革后的数年里,除爱尔兰以外的西欧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不足以更新前一代。在1960年以来的30年间,英国每年的生育率从平均每位女性2.71个孩子下降到1.84个;法国从2.73个跌至1.73个。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只肯生一个孩子,甚至干脆不生——若没有非婚生人口,出生率还会更低:截至1980年代末,非婚生人口在每年新增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奥地利是24%,英国28%,法国29%,瑞典52%。

随着经济发展变缓、妇女解放运动放慢,欧洲的人口统计情况正在变化——这为福利国家的未来敲响了警钟。然而,女性运动带来的社会变革并没能完全体现在政治本身。

没有出现“女性的政党”，从而有效地指挥大批选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在国家的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女性依然是少数派。

事实证明，在推选女性候选人上，左翼通常比右翼更开明（但并非到处如此——在比利时和法国，多年来属于中右翼的基督教政党，就比它们的社会党对手更乐于向忠实的选民推荐女性候选人），不过，能对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未来前景作出最佳预言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理。1975—1990年，芬兰国会中的女性席位从23%升至39%；瑞典从21%升至38%；挪威从16%升至36%；丹麦从16%升至33%。而在南欧，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国会里，1990年女性议员只占了十二分之一。在英国下议院，女性比例不过7%；而在法国的国民议会里，这一数字仅为6%。

491 环境保护主义者不分男女，在转化情绪为选举政治方面更为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环境保护主义”（一个始自30年代的新词）的确称得上是个新起点：它集中表达了中产阶级对核电站和急速发展的城市化、高速公路以及污染的恐惧。欧洲的绿色运动之所以深入人心，和它在60年代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分不开的：衣着考究的周末“勒德分子”身穿石洗的自然纤维衣物，在本能与兴趣之间权衡。对一个更“自然”的世界的向往和对一种“本真”的个人政治的追求，都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而源自浪漫主义时期人们对早期工业化带来的破坏的惊骇，这是不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的。20世纪初，左翼和右翼都拥有自己的自行车俱乐部、素食餐馆、“漂鸟”运动和步行爱好者，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接纳了解放和回归的梦想。

德国人怀念独一无二的日耳曼风景，怀念舒尔茨山和法耳茨地区的山脉与河流，还有故乡；法国民族主义者梦想“法兰西深处”的和谐乡村，纯然未经城市和国际化的污染；英国人幻想永恒的和睦田园，布莱克诗中的失落的耶路撒冷。没有比这种感同身受更为人们所乐于承认的了。几十年来，左翼一直对共产党国家的工业产量超越了西欧而满怀钦佩，但是从70年代起，它也和右翼一样，开始对发展、对生产力和现代性的间接代价有些不安了〔2〕。

因此，现代的环境保护主义革命具备了双重好处：它打破了近来那种无情的万能灵药式方案；它还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历史，虽被人遗忘，但又古老得让人安心。环境保护主义（如同和平主义）的兴起往往也唤醒了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但是面目和善。西柏林的“另类派”，还有奥地利的反核能抗议者——后者在1978年赢得了公民投票，成

〔2〕 到1980年，苏联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几乎和美国相等——直到不久前，这一统计数据还让苏联的仰慕者感到骄傲而不是窘迫难堪。

功地阻止了政府实施温滕多夫核电站的计划——是决不会自命为民族主义者、甚至爱国者的。可是他们对于当地遭受的污染之愤怒(与之对其他地方经受类似破坏的相对冷漠)却表明了相反的态度。早期绿色运动表现出的“邻避”品格(别在我的后院),不禁让人想起先前的模式。

所以,当日趋年迈的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还有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的由“1968年后”激进分子组成的民主政府,都大力推行同一环境控制政策时,也并不显得矛盾。萨拉查对“物质主义”充满怀疑,决心牢牢守住20世纪,就此而言他堪称一名真正的生态主义爱好者——通过简单地把国民经济保持在惊人的停滞状态,他达到了保护生态的目的。假以天年,萨拉查一定会赞赏1971年法国示威者的成就——他们封锁了一处规划建设于法国中南部平原上拉尔扎克的军事基地。 492

拉尔扎克的象征意义——由一群环保主义者奋起保卫原始草原免受法国政府集合军队的侵扰——是巨大的,且不限于法国本土:这个感人的胜利,与其说是为了当地高地丘陵里的绵羊,不如说是为了那群显然来自外地的牧羊人——年轻的激进分子中有不少刚从巴黎或里昂赶来,体验在“法兰西深处”的蛮荒海岸当农夫的感觉。毫无疑问,战斗前线已经转移,至少在西欧是如此。

当然,在东欧,初级生产无限制的信念和政府补偿行为的缺失,使得环境任由官方污染滥用。当奥地利政府屈从于国内的反对,打算放弃核能利用时,她的共产党邻居正毫无悔意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大建核反应堆,计划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沿多瑙河下游筑造大坝,或者在波兰专门建设的钢铁城“新胡塔”区北部一带,稳步地提高产量,加重空气污染。但不管怎样,对于剧烈的工业污染所造成的道德和人文代价,以及环境的恶化,东欧集团还是有所察觉的。

因而,富于讽刺性的是,“1968年后”在布拉格上台的胡萨克政权的冷漠态度——为了满足国内发电的需要,它情愿把共有的多瑙河边境践踏个够——惹恼了政治上较为沉默的匈牙利人,对抗情绪大涨。尽管在先前看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加布奇科沃-纳吉马罗斯大坝”工程的合建计划,竟然成了匈牙利国内反对布达佩斯政府的导火索,也成为两个“兄弟般的”邻国之间关系的一大障碍。〔3〕

在捷克斯洛伐克,对科技现代性素来抱有的恶感,特别经由哲学家扬·帕托斯卡和瓦克拉夫·贝罗拉德斯基的作品,传递给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后者自1970年后流亡意大利

〔3〕 环境问题上的抗议由于它在表面上无关政治的特点,在控制严密的政权下能为其政治行动和发表言论提供安全的空间。至1983年,水质污染问题迫使10%的苏维埃立陶宛人加入了“立陶宛自然保护协会”。

时开始写作,他的新海德格尔式的冥思以地下印刷品的形式回流到祖国。那种人类要彻底征服自然的观念——启蒙主义运动的目标——也许是要付出过高代价的。对此,冷战双方通过阅读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都已熟知,尤其是西奥多·阿多诺和麦克斯·霍克海默合著、1944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根据海德格尔式的曲解——暗示着共产主义本身是西欧的非法进口物,为无穷的物质进步这一自大的幻觉所吸引——以这些思考为基础,形成了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并在70年代浮出水面。它把伦理学的异议和生态学的批评结合起来,领导者是帕托卡和剧作家瓦克拉夫·哈维尔。〔4〕后者是贝罗拉德斯基最狂热的读者之一。

如果时机适宜,相同的环保主义批评论是可以在东欧和西欧各种新式的抗议活动之间充当桥梁的。但在当时70年代初期的情况下,双方都没能意识到这一点——西欧方面也是如此——彼此更关心铁幕后的对手存在的状况或问题。西欧的环保主义者更是大力引导自己的选民关注国际政治,只要无碍于他们的核心目标即可。在这一点上,他们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

“生态学”候选人首次在英法的地区选举中亮相,是在1973年——同年西德的农夫代表大会成立,是为绿党的先驱。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刺激下,西德的环保运动迅速转向主流政治。在第一个10年里,绿党获得了农民、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城市无业者的支持,并通过静坐、示威游行和行使公民优先权等途径,终于在1979年突破性地为自己的代表在2个州议会赢得了席位。4年后,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警醒下,他们在1983年联邦选举中的得票数从56.8万张一路飙升到216.5万张(5.6%的支持率),首次在联邦议会获取了席位(27席)。至1985年,绿党已经进入主要的地方政府,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管理黑森州(当时由年轻的绿党政治家约斯卡·菲舍尔出任黑森州环境与能源部长)。

尽管在奥地利、尤其是法国,绿党纷纷起而效之,但德国绿党的成功还一时难以得到复制。西德人民似乎与众不同。近年来他们逐渐反对起那些自己在战后曾赖以复兴的东西:从1966年至1981年,对“科技”及其成就持乐观态度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急剧下降,从72%跌至30%。西德绿党还从本国实行的按比例分配议席制度中获益,该制度使得小党派也能进入州议会和联邦议会——不过,在议会制度差不多的意大利,环保主义者却经营惨淡:至1987年,意大利绿党获得的选票不到100万,只拿到630个议席中的13个。比利时的两个生态主义政党(一个说法语,一个说佛兰德语)都得到了稳步发展:自

〔4〕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开启了通往西方的另一条道路:法国哲学家埃曼纽尔·穆尼埃多年前就宣称,他在同代人(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看到了一种“主体性障碍”,是与他所批判的“客观物质主义”和“科技”相对立的。之后数十年间,《精神》杂志作者群中穆尼埃的私淑弟子们,最早在西欧出版和褒扬了哈维尔及其不同政见追随者的作品。

从1981年首次参选获得4.8%支持率后,这一数字逐步增长,1987年超过了7.1%。至于英国,选举制度本身就是不利于小党派或边缘地位政党的,选举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494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像环保主义这样的单议题政党(又如和平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的前景受到了现存政治势力宽泛范围的限制——既然社会民主党或者农业党都有类似的主张,那又何必在绿党身上“浪费”一张选票呢?例如,环保主义在挪威也赢得了在德国那样广泛的支持——早在1970年,工党政府打算开发位于北极圈马多拉的北欧最大瀑布,以利用水力发电时,就激起了全国性的普遍愤慨,环保政党应运而生。但是,无论是马多拉事件,还是后来的反核电抗议,都没有演变成独立的政治运动:抗议-妥协,都是在同现有政权主体的协商后完成的。

瑞典绿党干得稍微出色一些,他们总算在1988年进入了国会;芬兰呢,最初是1987年有一名环保主义者以个人身份赢得了选举,次年才成立环保政党“绿色联盟”(也许这不足为奇,相比略微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和北部,芬兰绿党在发达的、城市化的、“雅皮”风行的南部更得人心)。不过瑞典和芬兰都比较特别——和平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残障人士等单议题活动家们,都确信自己的主张能够引起文化大环境的同情和共鸣,因而不惜冒着分流支持者的风险脱离主流政治,且同时既不会危及政权主体,也无碍于自身的前途。

正如我们所见,一次危机事件、丑闻事件或不受欢迎的提案往往催生出单议题政党:围绕着1984年奥地利政府提出的在东部海恩堡的湿地建设水电厂的方案,环保主义者应声而起,与之进行了艰苦对峙,还在某种程度上发展成了一支全国性力量。在社会党人领导的联合政府与环保主义者的持续对峙中,绿党声势大涨:这次事件不仅以政府取消计划而告终,还为绿党争取到了一大批觉醒的社会党选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支持。

单议题政党和运动的繁衍及其逐步为主流公共生活所吸纳,对传统政党特别是左翼敲响了警钟。西欧的共产党,随着无产阶级选民的逐步流失而不断被削弱,并因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名誉大损,已变得极度脆弱。领导法国共产党的是一群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1956年匈牙利事件没能真正震动他们,使之与苏联保持距离,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更不用说了。先天的保守,加之不信任任何它所无法征服和控制的思想或个人,导致法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支持率一路走低:从1946年战后巅峰期的28%,到 495 1977年的18.6%,此后更是一蹶不振,到1980年代已跌至10%以下。

意大利共产党的表现就好多了。与法国共产党几乎平庸无才、毫无吸引力的高层(这一点法共也酷似其亦步亦趋的苏联典范)相比,意共幸运地拥有从帕米罗·陶里亚蒂到恩里科·贝林格(1972年至1984年任意共总书记,在任期间英年早逝)一系列才智超

群且极具魅力的领袖。和其他共产党组织一样,法共和意共都非常依赖苏联的资助:从1971年到1990年,从苏联代表处那里,法国共产党接受了5 000万美元,意大利共产党接受了4 700万美元。〔5〕但是,意大利人至少还是对苏联异乎寻常的行动——特别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举——公开表示了反对。

1973年,贝林格决定,将他领导的意共纳入意大利民主保卫阵营之中,这就是所谓“历史性的妥协”:一方面加强了意共的(相对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放弃它的彻底反基督教民主党的立场。1973年震惊世界的智利政变(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暗中支持下,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右翼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领导的政权。——译注)在这次转变上起了部分作用,贝林格等共产党知识分子由此相信,即使共产党赢得了国会的大部分席位,也会受到美国或其在意大利军事、商业和宗教领域中的同伙的阻挠,而无法建立自己的政府。不过,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这也是对右翼和左翼恐怖组织威胁到意大利民主的一种反应,后者将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政府一并视为仇敌。

这些变化在竞选结果上立竿见影。支持意共的选民稳步增长,从1958年的670万票到1972年的900万票,4年后更是达到顶峰——在1976年6月的选举中,意共赢得了1260万选票和228个国会议席。它的34.4%的支持率,仅落后于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4个百分点,也比后者少34个议席而已。这是西欧共产党取得的前所未有的佳绩。意共通过努力,切实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体制内”的政党,甚至(就像亨利·基辛格等外国观察者所担心的)可以成为备选政府。〔6〕

意大利共产党开创的新道路,以及法国共产党为效仿其成功(而非理念)所作出的不够有效的尝试,促成了“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该词是在1975年11月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三国共产党会议上发明的,并经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桑提亚哥·卡里约写于1977年的文章《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而正式传播开来。西班牙共产党当时刚刚结束几十年的地下状态,领袖们急切希望为其树立民主的声望。像意大利的同志一样,他们懂得,要实现这一目标,最佳途径是坚守自己的立场,不仅与当时的苏联保持距离,而且更重要的,与他们共同的昔日列宁时代划清界限。

历史证明“欧洲共产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它对知识分子和学院派的吸引力比对选民更大,前者误把这次理论衰竭的症状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复兴。如果西欧的共产党希望摆脱历史的负担,重新自我定义为左翼民主运动的一派,那么,它们还需要抛弃诸如

〔5〕 同期莫斯科甚至还共计拨出4 200万美元给实力极弱的美国共产党,显示出一视同仁、不加区别的慷慨。

〔6〕 1976年4月13日,就在意大利大选前的9周,基辛格公开表示不会欢迎一个共产党性质的意大利政府——恰好验证了贝林格的直觉。

“无产阶级专政”之类浮夸的教条,这些玩意儿早就葬身在1970年代意识形态幻灭的大火之中了。它们还应当公开鲜明地割断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而这一点即使贝林格与卡里约也未能做到。

无论各国共产党发言人如何努力,欧洲共产主义终究是一个矛盾体。正如列宁所想要的,臣服于莫斯科是任何共产党的第一个身份标签。西欧的共产党一直受到苏联的制约,直到后者自身解散——就算他们自己不这样认为,选民们可都是这么看的。在意大利,意共在某些地区成功地树立了独立自主的本土政党的形象,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拥护者,尽管再也没能达到1976年创下的辉煌。但是在其他国家,欧洲共产主义的支持率却在持续下滑。“欧洲共产主义”的发明者西班牙共产党在1982年的选举中得票率跌到了可怜的4%。

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坐镇莫斯科时,的确希望欧洲共产党能够在本土获取自己的地盘,为此他刻意保持了与西欧的距离。苏联的这一举动,作为其国际关系“先缓后取”策略的副产品,对于潜在的共产党改革家却效用甚微。此后,苏联领导人虽然以继续提供资金等多种形式表示支持,但他们对西欧共产党的兴趣越来越小,因为后者的政治影响力实在有限,而且似乎不可能在可预计的将来夺取到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尤其是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党,却另当别论。于是在国家分裂形势下面临严峻考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确实引起了苏联的极大兴趣。

1969年,西德社会民主党在维利·勃兰特的领导下,在联邦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持政。自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它首次将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挤到了在野党的位置。勃兰特此前已在基辛格的大联合政府中担任了3年的外交部长,从那时起,他就与自己的智囊团头目——埃贡·巴尔密切合作,开始构思德国外交政策的新路线,通过新的途径来建立德国与苏维埃集团——“东方政策”的联系。 497

当时,西德的外交政策完全受阿登纳的理念的支配。这种理念是:新的联邦政权应通过西欧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组织,与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应当坚定不移地拒绝承认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登纳宣称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了德国,同时拒绝承认与东德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苏联例外。他的继任者,路德维格·艾哈德,在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华沙和布达佩斯设立了贸易代表机构;但直到1967年,勃兰特促成西德与罗马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才第一次真正打破了阿登纳的原则;一年后西德又与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

阿登纳始终坚持认为,德国的分裂和它东部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应当在中欧形势缓和或军事撤离之前予以解决。但是,1961年美国反对西德参加柏林墙建造竞赛,表示宁

可敞开柏林边界而不愿担负战争风险;1966年10月,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确认,不再允许本国的外交政策因为未来德国统一的原则而受到制约。这一信息十分明确:若要实现目标,新一代德国外交官就不能再坚持把“德国问题”的解决作为缓和的前提,而应该把原来考虑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

维利·勃兰特之所以敢于承担打破西德政界惯例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担任过西柏林的市长。事实上,“东方政策”最热心的拥护者中有好些都是柏林前市长——勃兰特本人,后来的联邦总理夏德·冯·魏茨泽克,还有继勃兰特之后成为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汉斯-约申·沃格尔,而这并非巧合。对他们来说,显而易见,克服欧洲的分裂并不会给西欧盟国带来任何麻烦——西方对于华约条约国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极接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西德想打破中欧的政治僵局,那他们就只有自己亲自动手,直接与东方当局交涉。

由于这些思虑一直萦绕心间,于是勃兰特和巴尔设计出了自己接近东方的方式,以实现巴尔所称的“通过接触寻求改变”。目标是“越过雅尔塔(条约)”,途径是多重接触——外交的、公共机构的和个人的;在不引起国内外不安的情况下,达到东、西德之间和欧洲内部的关系“正常化”。借这种典型的修辞学发明,勃兰特不动声色地摒弃了西
498 德政府原本在东德的非法性和不通过谈判寻求统一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自此以后,西德政府一直肯定德国人民的基本团结,但东德的真实存在也应得到承认:“一个德国,两个政府”。〔7〕

在1970—1974年间,勃兰特与其外交部长、自由民主党的瓦尔特·谢尔,协商并签署了一系列主要的外交协议:1970年与莫斯科和华沙分别签订协议,承认战后两德之间及德国与波兰之间边界的事实存在和神圣不可侵犯(“现存的边界线……将成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西部边界”),并提出“在欧洲现存的政治条件的基础上”建立德国与其东部各邻国的新关系;1971年签订的关于柏林的四组协议,其中苏联同意不做任何单边性的改变,并为对方的越界活动提供便利,随后又与东德签订了《基本条约》,1973年经西德联邦议会批准,其中西德方面表示继续承认任何从东德移至西德的居民的完全公民身份,放弃长期以来西德作为全体德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声明;与布拉格签署的条约;1974年5月与东德互派“永久性代表”。

凭借这些成就,还有其后访问华沙时在犹太人街区殉难者纪念碑前满怀歉意的下跪

〔7〕 勃兰特在1969年上任时所作的第一个决定,是将“全德事务部”更名为“德国内部关系部”,以减少东德对于西德继续以全体德国人民代表自居的忧虑,这表明他已准备把东德视作一个特殊而持久的实体。

壮举,维利·勃兰特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国内他也大获全胜——在1972年选举中,他带领的社会民主党首次成为联邦议会的第一大党。尽管避开了西德政府长期坚持的“边界和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并未完成、雅尔塔条约划定的边界不合法理,必须保持关于1937年12月以来德国边界一贯性的合法构想”等主张,勃兰特在国内还是大受欢迎。〔8〕而且不仅是在西德:勃兰特于1970年作为西德领导人首次访问东德,来到埃尔福特市时,他受到了热烈的掌声欢迎。

在1974年勃兰特因间谍丑闻被迫下台后,其继任者们——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基督教民主党人赫尔穆特·科尔——从未偏离“东方政策”的总路线,不仅在公开外交上孜孜以求,还与东德开展了官方和非官方的多重联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便于个人来往,理顺关系,减轻对西德复仇主义的恐惧,并从整体上使西德与东部邻国的邦交“正常化”——应当承认,历史正如勃兰特在签署完承认战后德国边界的《莫斯科条约》499时说的:“在此条约下,除了不久前赌光的东西以外,毫无损失。”

“东方政策”的制订者必须考虑到,若要成功实行他们的宏图大计,一定要争取三方力量的支持。要向西欧保证德国并非投向了东方。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在获知《莫斯科条约》后的第一反应,是向英国发出鼓励性的提议——当下,为了牵制不太听话的德国人以维持平衡,英国在欧盟的地位越发重要了。最终法国得到了德国人的安抚,后者承诺西德与西欧的联系会比以往更加牢固(就像后来蓬皮杜的继任者也得到德国人的保证,许诺20年后统一的德国一定加入欧洲共同货币流通体系);不过,巴黎和华盛顿仍议论纷纷,正如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在1973年所言,在描述一个“变化的世界”时,“关于东西方问题的传统策略”正在失去效用,但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日。

“东方政策”的第二类拥护者是分裂后柏林墙两边的德国人。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给很多德国人带来了实惠。两德之间的接触和沟通发展迅速。1969年,双方仅通过50万次电话。20年后已变成约4000万次。东西柏林之间的电话次数,1970年的数字尚不得而知,到1988年已达到一年1000万次。事实上,到80年代中期,东德人已经可以自由地向西德打电话;东德政府甚至把电缆铺到了德累斯顿附近的“无影谷”(因当地的地形阻挡了西德的电视信号而得名),满以为只要东德人在家里看得到西德的电视节目,就不会打算移民去西德了。这些做法,还包括隔离家庭的重聚、向西德释放政治犯等措施,都有助于提高“东方政策”的声誉,也体现了共产党对西德的“稳定”和“无意外”政策的信心。

〔8〕 这种合法构想,以及围绕它产生的种种情感问题,正是基督教民主党为何在1973年拒绝签署标志与东德建交的《基本条约》的原因,该党也因此一直坚持东部边界问题应存而议,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为止。

在不断增长。

东德的领导人尤其乐于看到这些发展。1973年9月,联合国承认并接纳了东德和西德,视其为独立国家;此后一年内,东德获得了80个国家的外交承认,包括美国。与西德政府的变化形成反讽的是,东德自己的领导人不再提到“德国”,而是开始日益自信地自许为一个独特、正统的“德语”国家,独立自主,拥有自己的前途——他们强调,东德不仅根源于“好的”、反法西斯的德意志民族,同时还是普鲁士的土地和遗产的继承者。虽然在1968年的东德宪法中,提到了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但这句话在1974年的宪法修订版上却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永远坚定不移地拥护苏联”的誓言。

500 东德对“东方政策”感兴趣,还有更加直接的和利益上的因素。自从1963年起,东德一直把政治犯“贩卖”给西德政府去换钱,价钱视对象的“价值”和资格而定。到1977年,为了从东德监狱弄出一个犯人,西德需要支付将近9.6万西德马克。新政策的外交成果之一,就是隔离家庭团圆的制度化:为此柏林的潘科区政府额外收取4500西德马克/人(大便宜——1983年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要收8000西德马克/人才放境内的德国人出国)。有人估算,截至1989年,通过释放3.4万个犯人、允许2000名儿童回到父母身边,和“调节”25万个家庭的团聚,东德政府一共榨取了西德将近30亿西德马克。〔9〕

在事情发展进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统一”问题真的从德国的政治议程上消失了。固然,诚如勃兰特所言,分裂国家的重新统一依然是西德的“生活的谎言”,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意外实现统一的前几年,重新统一已不再是大众感兴趣的话题。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45%的西德人认为统一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自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数字再没超过1%。

西德政府新路线的第三方支持者,自然是苏联。从1970年勃兰特与勃列日涅夫的首次协商,到近20年后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西德围绕与东方关系“正常化”所作的一切规划,都通过了莫斯科,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用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话来说,“当然,德苏关系处于‘东方政策’的中心地位。”其实,一旦西德人和俄国人就波兰新边界的永久性达成共识(双方尊重长期形成的欧洲实际,但没人问过波兰人的意见),同时西德政府同意承认波兰人民共和国,西德人就和俄罗斯人就有很多共同语言。

1973年5月,当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为首位出访西德的苏共领导人来到波恩

〔9〕 从“东方政策”开始实施起,中东欧的德侨(Volksdeutscher)也同样享有特殊待遇,他们在德国东部和南部的边界线内外生活。按照家庭关系或种族血统,如果他们能够进入联邦德国,就能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上百万移民从乌克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涌入西德,突然间他们重新发掘出了自己的德国背景,而这正是在前半个世纪造成他们的极大痛苦的原因。

时,竟然与赫尔穆特·施密特一起,温情地回忆起二战中两人的共同经历——施密特很容易便想到前者曾“不分昼夜,为打败希特勒而战,为德国而战”。维利·勃兰特自始至终反对德意志第三帝国,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冷静地评述道:“要是把对战争的回忆交换一下,虚假和真实的谎言彼此非常接近。”回忆或许是虚幻的,而共同利益则足够真实。

多年来苏联一直迫切希望,自己的战后成果和欧洲的新边界能够得到西欧方面的官方承认,最好是通过正式的和平大会。西方同盟,尤其是美国,则始终宁愿维持现状,也不越雷池半步,特别是保持“德国问题”悬而不决。不过既然德国人自己在向东部邻国表示主动,西方的位置也必然随之改变;苏联领导人有望实现他们的愿望了。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在与莫斯科开展谈判方面,态度较之前任更加开放,可能对苏联政权的性质也没那么寝食不安:就像1974年9月19日基辛格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所解释的,不应等到苏联内部改革才去缓和国际关系。这正是他们制订的与苏联和中国缓和关系之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501

于是,1971年12月,北约组织的部长们相聚布鲁塞尔,原则上同意参加欧洲安全大会。不到一年,筹备会议已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1973年7月,还是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正式会议召开了。35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与会,只有阿尔巴尼亚拒绝参加。在其后的两年里,与会国提出协议,草拟条约,提议通过“建立信任”方式来改善东西关系等等。1975年8月,《赫尔辛基协定》获得了一致通过并得到签署。

从表面上看来,苏联是该协定的主要受益者。在最后的议定书中,“原则一”规定:“参与国将尊重彼此的独立自主以及主权固有和包含的一切权利,特别是各国的司法公正和领土完整的权利。”而且,在“原则六”中,参与国保证“对于各国内部事务,或本国权限以内的外部事务,无论与其关系如何,其他参与国应避免任何形式的干涉,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

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们理应心满意足了。现在,不但战后欧洲的政治分界线得到了正式的和公开的接受,而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附属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受到了官方的承认;西方集团更是第一次表示禁绝所有“针对任何其他参与国的武力干涉或胁迫”。当然,北约组织或美国实际入侵苏维埃集团的可能性一直微乎其微;事实上,1948年以来真正实施过武力干涉的唯一国家,就是苏联自己,而且还干了两次。

《赫尔辛基协定》中的这些条款,包括“原则四”中确认的“参与国将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所强调的,恰恰表现出莫斯科方面特有的不安全感。有了与西德签订的系列条约和《赫尔辛基协定》对《波茨坦公告》所作的回顾性重申,苏联终于如愿以偿、高枕无忧了。 502

反过来,会议的西方参与国似乎只得到了一些无可非议的形式上的条款: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合作与交流,同心协力去解决重大的和未来的分歧,等等,等等。

在有“第三个篮子”之称的赫尔辛基原则中,除了国家权利以外,还包含了对个人及种群权利的规定,集中体现在“原则七”(“尊重人权和包括思想、良知、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和“原则八”(“各民族权利平等,独立自主”)之中。绝大多数政治领袖在签署这些条款时都漫不经心——铁幕两边都把它们当作民主的“橱窗展示”,用来应对国内意见的标准操作流程,实际上根本行不通:依据“原则四”和“原则六”,外人无权干涉签署国的内部事务。正如一名捷克知识分子在当时愤愤不平地指出的,《赫尔辛基协定》其实只是重复了“*Cuius Regio, Eius Religio*”(拉丁语:统治者的宗教即国教)。在各自的辖区内,统治者再次达成一致,随心所欲处置各自的国民。

事情并没朝《协定》写的那样发展。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中的大多数原则和约定,只不过是把现存的国际格局包装得漂亮了些。但是,“原则七”不仅规定了签署国应“尊重人权和包括思想、良知、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还要求全部35国“提高和鼓励在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领域的权利和自由的有效履行”,并“承认和尊重个体依从内心意愿所表达和实践的宗教或信仰,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这份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看上去冗长而无甚效力的清单引发了“赫尔辛基权利”运动。就在此项等待甚久的国际协定签订后的一年间,苏联领导层便发现,国内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小集团、俱乐部、协会、机构和个人,就是要求政府严格遵守这一协定——就像最后议定书上写的——各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在本协定中提出的各项国际性声明和协议”,这一呼声日益高涨,最终几乎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本来,勃列日涅夫指望亨利·基辛格和他那些死心眼儿的接班人严守在赫尔辛基订立的“互不干涉”条款,那没错;可惜他从来没想到(其实基辛格也一样),对于其后那些乌托邦式的段落条文,别人竟然也会一样当真。〔10〕

503 从短期来看,苏联及其东欧盟国政府可以毫不费力地压制任何代表个人或集体权利的声音:1977年,乌克兰“赫尔辛基权利”集团的领导人们遭到逮捕,并被判处3到15年不等的徒刑。然而,当年在《赫尔辛基协定》中,共产党领导人为证明自身政权的国际合法性而强调的东西,如今又反过来让他们大伤脑筋了:通过援引莫斯科自己刚刚许下的承

〔10〕 1976年5月12日,第一个“赫尔辛基团体”(Helsinki Group)在莫斯科成立。其最初11个成员中包括尤利·奥尔诺夫(Yuri Orlov)、伊莲娜·波娜(Yelena Bonner)和安纳托利·夏兰斯基(Anatoly Sharansky)。两年后,庞大的国际性组织“赫尔辛基观察团”(Helsinki Watch)成立,专门监视各个《赫尔辛基协定》签署国的权利误用情况。

诺,(国内外的)批评者们就可以向苏联政权施加舆论压力了。政府对这种反对派的武装镇压,非但无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弄巧成拙地公开承认。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就这样疏忽大意地打开了自身防线的一道缺口。出乎所有人的意外,这竟是一道致命的缺口。

第 16 章

过渡时期

504

回顾往事,我们最大的一桩错误就是允许选举继续进行。我们的垮台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奥台罗·萨拉伊伐·德·卡尔伐罗将军

西班牙是问题的所在,而欧洲是解决的办法。

——奥特加·伽塞特

欧洲不光是各种物质结果,它还是精神。欧洲是一种精神状态。

——雅克·德罗斯

大国之间的这些交易长期存在,大陆东西分界也从未消失过,北欧各国国内与国际的风云变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各国,问题主要是在国内。70年代初以前,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一直处于欧洲的边缘,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尽管在冷战时期它们共同效忠于“西方”(葡萄牙与希腊均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这三个国家在其他方面却各有千秋。其经济严重依赖在国外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国内汇款以及增长中的旅游业,因而与欧洲南部边缘的其他国家如南斯拉夫或土耳其相似。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希腊的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准同东欧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相仿。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三个国家都由独裁者统治,这种情况在拉美比在西欧更加常见。战后几十年间的政治改革似乎忽略了这三个国家。葡萄牙于1932—1970年间由安东尼奥·萨拉查统治,在西班牙,1932年佛朗哥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并且从1939年开始直至1975年去世,他一直统治该国,期间无人敢挑战其地位。在这两个国家,来自另一时代的等级制度因此而固定下来。在希腊,一个军事小集团于1967年推翻了国王和议会,自此这个上校集团统治了该国。这段动荡的历史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在它的影响下,三个国家的前景一片黯淡。

希腊的近代史和西班牙一样,受到内战的严重影响。在战后的两年间,希腊共产党对其控制下的村庄实行恐怖统治,以致过后很久人们仍然心怀恐惧,并把左翼激进派与压制与暴行联系在一起。1949年10月共产党人放弃斗争后,轮到左翼分子遭受持久的压迫。505战时的游击队员(包括许多在战争初期参加抵抗德国入侵的战斗者)被迫流亡海外,长达几十年。那些仍留在国内的人则被禁止在公共部门就业,直至70年代,其子女甚至孙辈也不能幸免。在迈克罗尼索斯岛臭名昭著的监狱中,共产党人被长期囚禁,并受到虐待。〔1〕

但是不管这与冷战时期的情景多么相符,希腊国内的政治斗争一直有其明显的地方特点。1949年3月,在斯大林与铁托斗争的高潮时期,奴性十足的亲莫斯科派希腊共产党曾在布加勒斯特通过无线电台发表声明,赞成马其顿独立。这样做的本意是通过鼓励南斯拉夫领土分割来削弱铁托的力量,不料却并未奏效。相反,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希腊共产党的信任,因为此举暗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将导致北部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人聚居的马其顿地区实现自治,使希腊分崩离析。

希腊人之所以如此在乎这一点,是因为希腊的民族主义特别缺乏保障,即便以地区标准衡量也是如此。由于希腊战后的保守派政治家时时刻刻对先前土耳其帝国时期的统治者保持警惕,防范与其发生冲突,而且从1940年以来一直与阿尔巴尼亚处于交战状态(直至1985年情况才有所改观),甚至不愿承认在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接壤的地区存在着庞大的斯拉夫社区,因此他们选择了“秩序”与“稳定”,而不是“民主”或战后“妥协”。综合旧的国内因素与新的国际派别划分,希腊国王与其军队和大臣们选择了与西方站在一起,把西方国家看作是在一个动荡的地区里最可靠的同盟者。

他们的忠心得到了很好的补偿。〔2〕1947年2月,《巴黎条约》迫使意大利将多德卡

〔1〕 迈克罗尼索斯监狱的狱警迫使共产党人开口忏悔,并让他们说服那些拒绝忏悔的人。这一方法与同一时期罗马尼亚共产党在皮特什蒂监狱所使用的手段极其相似,尽管在残酷程度上略轻。

〔2〕 美国最初打算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希腊政坛的中左翼分子中寻找同盟者,但不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转而在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军队中找到了亲密持久的盟友。

尼斯群岛割让给雅典。在实施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以后,希腊成为美国援助的主要受惠国之一。它于1952年被批准加入北约组织,其军队也接受了从部署到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量援助。这些军队后来也确实起了关键性作用。英国本来打算赠与希腊一支非政治性的陆军和现代警察部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证明是不可能的。相反,希腊军队经过8年战争后,以永不妥协的反共主义者、保王主义者和非民主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对北约和美国同盟者的忠诚甚至远远超过了对本国政治制度或规约的认同。

事实上,希腊军官就像传统的西班牙军官一样,在他们看来,国家及其领土完整的守护神是他们自己,而不是那些他们曾宣誓捍卫的短命的宪法文件。在战后希腊的政治生活中,军队从一开始起就十分活跃:在50年代初的全国大选中,获胜的“希腊阵线党”就是由亚历山大·帕帕戈斯元帅领导的,他曾在内战中担任政府军的指挥官。直至1963年,军人还十分乐意地支持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卡拉曼利斯曾经领导更名后的希腊阵线党(现称“民族激进派联盟”)在1956年、1958年、1961年的大选中获胜,尽管他在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选举胜利后被怀疑有大规模舞弊行为。

卡拉曼利斯本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持反共态度,他甚至对军队也不显示出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他出生在希腊的马其顿地区,并且从内心深处是反斯拉夫的。他出身农民家庭,信仰东正教,本能地具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特点,很适合代表他的祖国。在美国外交官和本国官员等人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安全、可靠的人,他无意实施平民对军队的监督,也无意过于详细地调查愈传愈盛的高层人物中反议会的网络和阴谋。在卡拉曼利斯的领导下,希腊社会保持了稳定,但是经济停滞不前,腐败现象严重。

然而在1963年5月,左翼议员格里戈里斯·兰姆布拉基斯博士在泰萨洛尼基市的一次和平集会上演讲时遇袭,5天后身亡,这件事为左派造就了一位烈士,也催生了希腊的和平运动。而当局处事可疑,对这起暗杀事件的幕后主使者不想追查到底,这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怀疑。^{〔3〕}过了6个月,卡拉曼利斯在大选中以微弱之差输给了乔治·帕潘德里欧领导的、代表日益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益的中间派联盟。在下一年的新一轮选举中,帕潘德里欧的政党及其同盟者表现得更加出色,以绝对多数选票获胜,所占比例从42%上升到52.7%。

新的议会多数派要求调查1961年大选被人操纵的情况,议会与年轻的国王康斯坦丁之间的紧张局面逐渐升级。国王在政治上对保守派的同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右翼不断

〔3〕 导演科斯塔斯·盖维拉斯1969年拍摄的著名电影《Z》的故事就是取材于拉姆布拉基斯被暗杀事件。

对他施加压力,要求解除帕潘德里欧的职务。帕潘德里欧最终出于无奈,只好辞职,随后相继有几任临时首相上台,但是谁都未能得到稳定的议会大多数的支持。这时有一群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军官被指控与帕潘德里欧之子安德里亚斯密谋,使议会与王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1967年3月,他们中间有21人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507

到这个时候,希腊议会政府已经徒有其名了。保守派分子与军官们隐晦地警告人们,共产主义在全国的影响正在扩大。国王不愿与多数派的中间派联盟合作,说他们依靠极左派的选票,而反对派的民族激进派联盟拒绝支持成立临时代理政府。最后在1967年4月,民族激进派联盟组成了少数派政府,在这一长段时间里,国王解散了议会,号召举行新的选举。

公众对议会陷入的僵局感到失望,他们普遍感觉国王从中扮演了过分偏袒一方的角色,这一切都表明即将到来的选举将使左派的支持率会进一步发生变化。由于这个原因,加上自1949年以来“共产主义威胁”论不断地被提起,希腊的民主制不健全,以及执政者不称职,以此为借口,军队内部存在已久的右翼军官集团于4月21日夺取了政权。

在乔治·帕帕多普洛斯上校的领导下,雅典等城市的街道一时间布满了坦克和伞兵,军队逮捕了政治家、记者、工会运动积极分子等等公众人物,夺取了所有的要塞,并宣布自己为国家的拯救者。他们解释说,“民主将得以修复”。国王康斯坦丁尽管对这些阴谋家不感兴趣,不过还是被动地同意并命令他们宣誓就职。8个月后,国王试探性地组织了反政变,失败后携家人逃往罗马,他的离开并未让国人感到惋惜。这个军人集团任命了一位摄政者——帕帕多普洛斯被任命为首相。

上校的这次政变是一篇经典的政治宣言。帕帕多普洛斯及其同僚以暴力起家,惯于实行压制,他们上任后解雇了近一千名公务员,囚禁或驱逐了左翼和中间派的政治家。在他们执政的7年间,希腊与世隔绝,令人窒息。上校们反对现代性已经到了滑稽的地步,他们审查报刊,宣布罢工为非法,禁止现代音乐和迷你裙,还禁止研究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甚至连社会学、俄语、保加利亚语的研究也遭到禁止。他们虽然走的是平民主义路线,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家长式统治,对外表形象极为关注。在军政权统治下,留长发遭到禁止,宫廷侍卫和其他礼仪官员的制服也被换成了华丽俗气的“传统”服饰。尤其是首都雅典,更是给人以军管式的整齐划一的感觉。

军事政变对希腊经济的影响好坏参半。旅游业没有受到影响——即便有旅游者出于政治觉悟而对军人掌权的希腊进行抵制,还是会有人对它趋之若鹜,因为希腊旅游胜地虽然各种规章多得令人窒息,但毕竟价格低廉。政变之前10年才出现的国外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的稳步增长(自1964年以来年的平均增幅为6%)都未受到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 508
正如西班牙一样,低工资(依靠对工人反抗的镇压)和建立在“法律与秩序”基础之上的政

权,为国外资本提供了有利环境。这些大多出身农民的上校们最初甚至获得了农村地区的广泛支持,尤其在1968年他们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之后。〔4〕

但是上校们身上自给自足的农民本性,使他们更加倾向于恢复旧式的进口替代制度——低效的本地制造商生产的低质产品,在与国外厂商的竞争中受到保护。这种做法最终注定要使政权与本国城市中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虽然他们几年前看到争吵不休的政客们被赶下台时备感舒心,但现在他们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显然更为重要。而即便是以不苛刻的标准来衡量,上校们也只能算是平庸之辈,他们面对未来毫无准备:既没有计划如何让希腊融入正在兴起并日益扩大的“欧洲共同体”,也没有关于如何恢复平民统治的计划。〔5〕

再者,该政权虽然在国内还算稳固,在国外却日渐孤立。1969年12月,“欧洲委员会”以全票通过将希腊赶出该组织;两个月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终止了与军政权的一切谈判。更无耻的是,该政权的基础只有武力。因此,在解决塞浦路斯历史遗留问题时,它在境外使用武力而遭到灭亡也就十分正常了。

塞浦路斯岛自1571年以后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1878年后由英国控制,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英国单方面吞并。它位于地中海东部较远处,靠近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地方,它虽然远离希腊大陆和边远的希腊诸岛,但是岛上居民大多数都讲希腊语,信仰东正教,并且倾向于与希腊统一。占岛上人口18%左右的土耳其少数民族自然反对这种安排,并且得到了安卡拉当局的全力支持。就这样,塞浦路斯一方面有英国竭力要其摆脱帝国遗产,另一方面要面对由来已久的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对立,其命运在整个50年代期间都悬而未决,令人不安。

509 由于“合并”计划(即与希腊统一的计划)遭到否定,岛上大多数赞成统一的领导人勉强同意独立。1960年英国允许塞浦路斯独立,只保留了某些过境权和一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军基地。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和宪法由英国、土耳其和希腊共同保障,由希腊、土耳其两族组成联合政府,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任总统。大主教曾被伦敦以武装暴力恐怖分子的名义流放,而今受到尊敬,成为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雄心的“合理”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该岛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毗邻而居,气氛紧张,社区间暴力冲突时有发生。

〔4〕 这些军官大多数毕业于战前鲁尼斯·迈塔克萨斯独裁统治期间的军官学校。他们也许并不像国外批评家所宣称的那样不受欢迎,但他们确实得到过美国的同情(也许不仅是同情)。本来这实质上是希腊20世纪40年代的内战在时隔多年后的延续,但却被看成了欧洲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内战中最新的轰动性事件。至此,“希腊”代替“西班牙”成为两极化的政治舆情的探测器。

〔5〕 从1962年起,希腊成为欧共体“非正式”成员。

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均自称是塞浦路斯岛上各自同胞的保护者,而且偶尔会威胁说要干涉,但出于谨慎和国际压力,都没有这样做,即使在1963年塞浦路斯土耳其人遭到袭击,次年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时也没有出兵。尽管希腊人几乎垄断了塞浦路斯所有的公共部门岗位和有权力的职位(其情形大致相当于在乌尔斯特占人口大多数的清教徒把天主教徒排挤出有特权和权力的部门),或许正因如此,塞浦路斯看上去比较稳定。但是尽管塞浦路斯不再有危机,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问题”。

因此,在1973年,当雅典学生(起初是在法学院,后来在理工专科学校)首次公开反对上校们的统治,令他们尴尬不已时,希腊军政权的反应是转移公众视线,试图通过重提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来挽回公众支持。强硬派的鲁尼斯将军在理工院校学生示威游行后,取代帕帕多普洛斯成为军政权首领,他与乔治·格里瓦斯等等希腊-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合谋推翻马卡里奥斯,将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1974年7月15日,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与一批精心挑选的希腊军官袭击了总统府,驱逐了马卡里奥斯,设置了傀儡政府以期待雅典直接实行统治。马卡里奥斯逃往国外。

但是,就在这个关头,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入侵塞浦路斯,以保护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利益,并且很快地于7月20日付诸行动。一周之内,该岛五分之二领土就在土耳其的掌握之中了。希腊军政府面对比他们强大许多的土耳其军队,既无力阻止,又无法做出回应,显得相当无助:一会儿命令部队全体动员,一会儿又下令取消动员。由于这次行动使国家蒙羞,遂使国内群情激愤,希腊的独裁者们只得求助于日渐衰老的卡拉曼利斯,邀请他结束巴黎的流放生涯,回国归政。7月24日,这位前首相回到了雅典,开始带领希腊回归平民统治。

这次过渡完成得相当轻松。卡拉曼利斯的“新民主党”在1974年11月大选中一举获胜,并在3年后再次奏响凯歌。1975年6月通过了新宪法,尽管反对派各党在开始时反对加强共和国总统的权力(1980年后卡拉曼利斯一直位居总统)。希腊民主政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具有了与欧洲相似的特征,它的政治派别大致可以划分为中左翼(新民主党)和中右翼(由已故乔治·帕潘德里欧之子、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安德里亚斯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希腊能够平稳地向民主社会过渡,要部分地归功于卡拉曼利斯的技巧。他一方面能与自己的过去诀别,另一方面又能给公众以成熟老练、游刃有余、前后一致的印象。他没有重建已经失去民心的中间派联盟,而是组建了新的政党。对众叛亲离的君主制的去留,他号召在1974年12月进行了全民投票。当69.2%的投票者要求将其废除时,他监督建立了共和国。为了避免疏远军人,他拒绝了清洗军队的要求。相反,他让那些比较愿妥协

的高级军官提前退休,而对愿意效忠新政府的人予以奖励和提拔。〔6〕

在废除了君主制,军队也实现中立之后,卡拉曼利斯不得来处理尚未解决的塞浦路斯问题。无论他还是他的继任者都不愿再重提“合并”问题,但他们同时也不能公开忽视岛上土耳其人的存在,即使在1974年12月马卡里奥斯回国后他们也未做。卡拉曼利斯随后将希腊撤出了北约军事组织达6年,以抗议北约另一成员国(土耳其)的行径。尽管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它还是赢得了国内包括左翼和右翼都在内的广泛赞同。1975年2月,塞岛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尽管至今只有土耳其一个国家承认它——以此为标志,再加上北爱琴海地区领土问题外交争端时有发生,希—土关系进入冰封时期。

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联合国的外交家和律师们都曾试图解决塞岛的划分问题,但都毫无结果,该岛也因此成为国际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希腊政治家们也可以就此放下担子,暂时不管塞岛问题(尽管他们迫于国内政治因素,要对其命运继续表示关注),而去关心其他更有前途的事务。1975年6月,在上校们落马后不到一年,希腊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1981年1月1日,希腊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国,这令布鲁塞尔欧共体总部的许多人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这是“希望”战胜了“智慧”。

与希腊不同,葡萄牙在近代没有经历过哪怕是最初级的民主。萨拉查的独裁统治是倒退的,即使是以1932年他上台之初通行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事实上,吹毛求疵的
511 教权主义、混合的制度、落后的农村这三者汇合,使葡萄牙像极了1934年后的奥地利。难怪战后的葡萄牙得到了怀念维希政府的退休法国人的垂青——“法兰西行动党”颜面丢尽的党魁夏尔·莫拉斯深受萨拉查崇敬,并一直与他保持通信直至1952年去世。〔7〕

在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国民总体生活水平更像当今的非洲而不是欧洲大陆:1960年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60美元(土耳其是219美元,美国是1453美元)。富人的确富有,而婴儿死亡率为欧洲最高,32%人口是文盲。萨拉查这位曾在科英布拉大学任教数年的经济学家,不但不为葡萄牙的落后感到不安,反认为这是国家稳定的关键——当听说在葡

〔6〕 但是,军人集团并未逃脱应有的惩罚。1975年8月,集团的11个领导人受到审讯并被定罪。3人被判死刑,后来又减刑为终身监禁。帕帕多普洛斯1999年死于狱中,至死都未悔改。陆军准将洛安尼迪斯由于参与镇压理工院校学生造反而在后来的审讯中被定罪。截至本书写作时,他仍在狱中。

〔7〕 莫拉斯于1952年84岁时去世。萨拉查则是房地产经理之子,1889年4月28日出生于葡萄牙的维梅罗,仅比希特勒出生晚1周。萨拉查身处20世纪60年代晚期,而且统治的是一个欧洲国家,却固守着上个世纪的道德标准,这一点十分罕见——他的母亲出生于1846年。

属安哥拉境内发现石油时,他仅评论说这是一个“遗憾”。

萨拉查像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一样,着迷于避免债务,煞费苦心地平衡每年的预算。他是个狂热的商业主义者,建立起了数量惊人的黄金储备,并且注意避免把它用于投资或进口。结果使国家陷入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北方小型家庭农场和更靠近南部的大庄园中劳动。由于没有本地资本为国内工业提供资金,而国外投资者又明显不受欢迎,葡萄牙大多依靠出口或再出口初级商品,其中包括自己的国民。

直到1970年去世,萨拉查一直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不仅使葡萄牙免受本世纪毁灭性的国外战争之苦,还带领国家避开了掠夺性的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大灾祸。而事实上,他已让自己的臣民备受其苦:物质上的不平等和为盈利而进行的剥削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重,而且这个位于里斯本的独裁政府压制一切独立观点和首创精神。1969年,只有18%的成年人口有资格投票选举。

由于国内缺乏反对党,萨拉查的唯一阻力来自军队,这是全国唯一的独立机构。葡萄牙军人收入菲薄——萨拉查不是支付有限的军人工资,而是积极鼓励宦囊羞涩的军官们迎娶有钱的资产阶级家的小姐。军官们尽管不情愿,但是直至1961年,他们对这个政权至少还是忠诚的,虽然在1947年和1958年分别有过一次徒劳无功、轻而易举地被镇压的政变。陆军或海军中倾向于改革的低级军官虽然对军队的毫无生气感到厌烦,但是又缺乏同盟者或群众基础。

所有这一切在1961年得到了改变,这一年新德里强行吞并了葡萄牙在印度本土的领地果阿,非洲的殖民地安哥拉也爆发了武装叛乱。失去果阿固然是国家的耻辱,但相比之下非洲的叛乱更为严重。葡属的非洲各“省份”(他们自己这样称呼),较大的有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西非的佛得角群岛和东南非的莫桑比克。其中安哥拉不到600万人口中有近50万欧洲殖民者,其重要性远远大于其他几“省”。它境内尚未开发的丰富的物质资源,如铁、钻石和新发现的近海石油,使得萨拉查不愿意外商前来投资(典型的如美国“海湾石油公司”),在60年代的进程中,这块领土对葡萄牙本土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里也发生了公开的叛乱。为了摧毁风起云涌的安哥拉民族主义运动,1967年里斯本实施了“反叛乱”战略,将人口重新安置到可以控制的大村落中:截至1974年,100多万农民被搬迁。这一计划并未瓦解叛乱,尽管它对安哥拉社会和农村经济贻害无穷。不过此举确实离间了前去执行这一计划的士兵:既包括把参加殖民地军队作为提升社会地位手段的宦囊羞涩的军官,也包括不情愿被派去镇压叛军的普通士兵。

在安哥拉,叛乱者划分为不同派系,葡萄牙军队还至少可以暂时控制他们,而在别处,情况逐渐难以维持。在莫桑比克,6万名葡军士兵为保护仅1万名欧洲殖民者忙得不可

开交,在几内亚和佛得角,充满魅力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在游击战中以1万兵力牵制了葡军3万人,使他们徒劳无功。到20世纪70年代初,非洲战事每年消耗掉这个欧洲最穷国家的年国防预算的一半。每4个到入伍年龄的葡萄牙男性中就有1个要应征到非洲服役,并且在1976年之后,最低服役限度为4年。到1973年,他们中有1.1万人阵亡:按人口比例来说,死亡率比美军在越南战争最激烈时还要高出许多。

葡萄牙为保卫其殖民地付出了昂贵而又血腥的代价,而且希望越来越渺茫,对此军人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且他们还有别的理由感到沮丧。为了巩固权力,也为了把国人的视线从海外的不幸中转移开,马切罗·卡埃塔诺——萨拉查选定的接班人——放松了信贷限制,从国外大举借债而且鼓励进口。再加上在国外工作的葡萄牙人的汇款,1970至1973年间,葡萄牙经历了短暂的消费繁荣。但好景不长,石油危机引发了不断的通货膨胀,公共部门的工资开始被物价远远地抛在后面。

葡萄牙多年来首次遭遇了罢工。首都周围贫民区的居民中,有许多是刚刚从赤贫的阿连特霍地区(Alentejo)搬来,他们不但要忍受地方性的贫穷,还要眼看着附近里斯本炫耀性财富急剧增长。由于非选举产生的技术专家、官员指挥的政府不受欢迎,军队越来越痛恨代表它在遥远的土地上进行“肮脏的战争”,他们的不满而今在国内得到广泛响应。低级军官满腹苦水,通货膨胀使他们本来不高的收入缩水,家人生活难以为继。与他们同病相怜的是正在兴起的一代商人,统治者的无能让他们苦恼不堪,他们明白国家的希望在欧洲而不是非洲。〔8〕

1974年4月25日,军官和“武装部队运动”成员把卡埃塔诺和他的同事赶下台,宣布成立以民主化、非殖民地化和经济改革为目标的临时政府。这次政变(就像1926年年轻军官们发表檄文首次拥立萨拉查上台一样)没有遇到多大阻力,旧政权的领导者们被允许流亡——先是到马德拉群岛,然后到巴西。前葡萄牙军队副参谋长、1968至1972年几内亚总督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将军被同僚任命为军事集团首领。秘密警察被废除,所有政治犯被释放,新闻自由得以恢复,葡萄牙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领袖结束流亡回国,他们的组织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得到法律认可。

这次革命处处受到极大欢迎。〔9〕斯皮诺拉把中立派和社会主义者都纳入临时内阁中,7月,他公开宣布了给予非洲殖民地完全自决权的计划。一年之内,这些殖民地全部独立,印度尼西亚乘机控制了葡属东帝汶。非殖民地化的过程相当混乱——几内亚和莫

〔8〕 截至1973年,葡萄牙三分之二的进出口贸易是与西欧各国进行的。

〔9〕 但是,道德上极为拘谨的年轻军官及其左翼同盟者对解除了50年来的文化禁令后大量涌现的色情文学作品和电影感到不悦。他们甚至一度企图禁止演奏葡萄牙传统民歌“命运歌”:认为这些歌曲宣扬怨恨和宿命论,不利于实现启迪国民和社会进步的目标。

桑比克的游击队对斯皮诺拉让他们先放下武器的要求置之不理,安哥拉局势则恶化为内战——但是从葡萄牙的角度看,优点是前后过程相当迅速。它还加速了在葡军撤退、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发生暴力冲突后约75万名欧洲人返回葡萄牙。他们中许多人在相对保守的葡萄牙北部地区安顿下来,在未来数年中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这些飞快的变化令斯皮诺拉感到不安,他保守的本能与更为年轻的同事们越来越激进的做法产生抵触,于1974年9月他辞去职务。在接下来的14个月中,葡萄牙走向全面的社会变革。在军官和武装部队运动和阿尔瓦罗·肯哈尔领导的坚定的“列宁主义共产党”的热情支持下,银行和主要工业实现国有化,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进行:特别是在南部产粮区阿连特霍,那里的土地所有权大部分仍在大地主,尤其是不在当地的大地主手中。 514

国有化在城镇中受到欢迎,南部地区的土地改革——尤其是土地集体化——最初是由当地佃农和体力劳动者在共产党及其盟友的动员下“自发”进行的土地占有和夺取。共产党不愧为暗中反对旧政权的一支组织最严密,行动最有效的队伍。但同样的做法在中部和北部却显然不受欢迎,因为这些地区的土地已经被细分为若干小块,归家庭私有。以农村和小镇为主的北部盛行天主教(现在仍然如此),1972年平均每500人就有1名教士。中南部地区教士和平民的比例为1:4500,在南部更远一些的地方比例更低。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和农民领袖所倡导的反教权主义和集体化运动遭到了人口众多的北部地区的剧烈反对。

实质上,1974年葡萄牙革命者在重复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土地改革激进分子所犯的错误:他们试图将适合南部社会条件的集体主义土地改革强加于北部土地私有、效率更高的小农身上,最终把后者变成了敌人。在1975年4月立宪会议选举中,共产党只赢得了12.5%的选票。中间偏右的党派战绩稍好,但大赢家是“葡萄牙社会党”。该党两年前由马里奥·索瑞兹在流亡中建立,他以“要社会主义,不要独裁”为口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竞选,赢得了38%的选票。

“武装部队运动”和共产党对选举结果感到失望,肯哈尔公开承认,如果通过议会获得权利的道路走行不通,他们或许会采用其他办法——正如他在1975年6月对一位意大利记者说的那样,“我们不可能拥有你们西欧那样的民主……葡萄牙不会成为一个有民主、自由和垄断的国家。它不允许这些东西存在”。从4月到11月,局势越来越紧张。国外评论家警告说,共产党即将发动政变,而葡萄牙的北约盟国和西欧贸易伙伴也许诺,一旦发生马克思主义革命,他们将介入并提供援助。

事态在年末发展到了关键性阶段。11月8日,里斯本立宪会议被建筑工人包围,在两周的时间里,传言说即将成立“里斯本公社”,甚至将爆发南北内战。11月25日,有几

队激进士兵试图暴动。起初他们还有列宁主义共产党的支持,但后来当武装部队中大多数人、甚至一些左翼军官本身都反对起义时,就连肯哈尔也妥协了。正如“武装部队运动”有些领导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1975年4月的选举结果,已经提前使革命军官们的目标失去了民心:左派可以实现议会民主,或实现革命“过渡”,但不可能两者都实现。

1976年2月,葡萄牙军队正式把权力移交给平民当局,尽管在政变后两年他们仍然有效控制着全国。国家将按照1976年4月通过的宪法得到治理,这部宪法在措词和目标上仍然反映了1974年后的政治气氛,它使葡萄牙致力于“通过创造让工人阶级民主地行使权力的条件,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当月的立法选举中,社会主义者又一次领先,尽管选票数略有下降,马里奥·索瑞兹组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葡萄牙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葡萄牙民主的前景仍然堪忧——维利·勃兰特只是许多赞同这一观点的当代观察家之一,他们在索瑞兹身上看到了克伦斯基的影子,克伦斯基不自觉地充当了非民主势力的掩护,一旦机会适合,他们就会将他撤换掉。然而索瑞兹却幸存了下来,而且不止如此。军队仍然局限在军营中,其政治作用越来越不重要。共产党的得票数上升了——1976年上升到了14.6%,3年后又上升到19%,原因是经济发展状况恶化,而且索瑞兹的温和政策挫伤了党内的左派,他曾许诺他们会在社会主义的葡萄牙消灭资本主义——但前提是左派要放弃起义的企图。

1977年,议会通过了一部农业改革法,肯定了不久前进行的土地集体化,但是把这种做法局限在南部,而且限制了从当前所有者手中没收土地的数量。这一做法消灭了农村冲突的危险,也避免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但是短期内却不能改善民主葡萄牙所继承的一团糟的经济状况。由于没有了来自前殖民地的廉价原料(而且没有了殖民地提供的垄断市场,其出口产品在别处毫无竞争力),不能像过去一样向西欧输出非熟练工人,而且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限制,要平衡预算,厉行节约,葡萄牙遭遇了连续几年的失业和消费不足。

军队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根据1976年宪法规定,由非选举产生的军人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具有否决权,在1980年一年中,它否决了23项立法,其中包括由当年选举产生的中间偏右派政府所做的将国内银行非国有化的计划。但是,议会在随后的两年中修改宪法,削减行政权力(1982年把“革命委员会”也废除了),并悄悄去掉了宪法的原来文字中强调的反对资本主义,对此他们也并未表示反对。

在随后的20年中,社会党与其对手、由阿尼巴尔·卡瓦科·席尔瓦领导的中间派“社会民主党”将交换位置。早已放弃反资本主义言论的马里奥·索瑞兹本人在1986年升至总统,是年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以西欧的标准看葡萄牙,它仍然十分贫穷,这要感谢萨拉

查,是他留下的永久遗产泽被后世。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葡萄牙既避免了“白色恐怖”,也避免了“红色恐怖”。共产党虽然在南部农村和里斯本郊外工业区仍然受欢迎,在日渐老去、直至1992年才退位的肯哈尔领导下依然坚定地坚持着强硬路线,但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被永远地削弱了。被遣返的殖民者从未成功地组织过心怀怨愤的民族主义者的极右党。在这种环境中,民主葡萄牙的出现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对一个比方说在1970年从法国一路看到西班牙的游客来说,比利牛斯山脉两侧的差距似乎太大了。佛朗哥长达30年之久的统治,加重了西班牙近两个世纪以来经历的社会落后和文化孤立的痛苦,他的独裁政权似乎比当初更加与当代欧洲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第一眼看去,西班牙似乎与60年代擦肩而过了:苛刻的审查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来约束民众的着装和举止、无处不在的警察,还有对待政治批评者的严酷刑法,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这是一块时间停滞的土地,历史的时钟永远地停在了1939年。〔10〕

但是,如果就近看的话,你会发现西班牙——至少在北部地区和城市中——其实正在快速地发展。佛朗哥的确是一个严苛的、真正反革命的独裁者,但与邻居萨拉查不同的是,他还是一个经济现实主义者。1959年,西班牙放弃了20多年来的闭关自守,在一群教士的鼓动下,通过了“国家稳定计划”,旨在平抑地方性通货膨胀,开放西班牙,允许投资和贸易。这一计划最初对经济的冲击是严酷的:贬值货币、削减预算、冻结信用、限制工资——所有这些都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得到了执行——这些做法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同时也迫使数以万计的西班牙人到国外寻找就业机会。

但是私有部门自此受到了社团主义规章和长期进口替代政策的保护,拥有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关税得到削减,西班牙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成为了“经合组织”准成员(佛朗哥1962年甚至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没有成功)。佛朗哥推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机是合适的。在战后欧洲经济繁荣阶段的初期,西班牙对国内经济采取保护政策,规避竞争,而现在对国外贸易开放得正是时候。从1961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农业劳动力所占百分比(1950年是50%)急剧下降,并且从南部、西部移向北部,转向工业和迅速发展的旅游业。截至1971年,全国只有五分之一的517人口还在从事农业。到60年代中期,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西班牙已经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

佛朗哥的“经济奇迹”也不能被过分夸大。西班牙没有帝国的遗留影响,因此也不需

〔10〕 即便到了现代的1963年,这位西班牙元首仍会毫不犹豫地处决被捕的共产党人胡安·格里莫,以示对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的蔑视。

为非殖民地化付出经济的或社会的代价。60年代流入西班牙的外币,大多不是来自国产商品的出口,而是来自在国外务工的西班牙人往国内的汇款,或者北欧度假者的消费。总之,西班牙的经济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国家繁荣兴旺的副产品。除去巴塞罗那、布拉瓦海岸、巴斯克等部分地区和(现代化程度稍差一些的)马德里,该国的交通、教育、医疗与服务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即使在1973年,该国的总体人均收入仍然低于爱尔兰,不到欧共体国家的平均值的一半。

不过,即便是有限的经济现代化,其社会影响也十分重大。在有电视之前,西班牙人或许大都未受到其他国家60年代文化冲击的影响,但是由于实施“国家稳定计划”而产生的经济不平等和对经济产生的扰乱,引起了劳动者的广泛不满。从60年代晚期开始,一直到佛朗哥去世,工人罢工、资方停工、示威、集体谈判和工会抗议成为西班牙社会生活的一种固定特色。这个政权固执地反对一切政治让步,但是当有如此众多的外国游客到来时(1966年达1730万人次,到佛朗哥去世前一年,上升至3400万人次),它就不好在公众面前显得过于压制一切了。

西班牙当局也无法忽视日益壮大的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合作能力与技巧。因此,他们被迫承认了事实上已经出现的、主要集中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重工业区的工人运动。加上由公共部门的职员、银行工作人员和其他正在扩大中的白领阶层组成的非正式工会,截至佛朗哥去世,这个由工人和职员代表组成的半地下网络可能经过了近十年的组织和经验才得以建成。

但是,西班牙的工人反抗活动被严格限制在生活必需品问题上。在最后的几年里,佛朗哥政权——就像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政权一样——依靠的不是公开的暴力镇压,而是一种强制的被动接受,一种几十年来形成的文化去政治化。1956年以来,学生中的反抗者一直在谋求更大的校园自主权,以及对道德规范和其他限制的放宽,政府允许他们在极其严格的范围内组织反抗;他们甚至得到了政权集团内部一些批评家的同情——包括那些有意改革的天主教徒、受挫的“社会长枪党党员”等。但是政府严格禁止他们对别的阶级主动表示同情,或是与其他部门联合——比如说与罢工的矿工联合。^[11]这种做法也被用于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成年人。

事实上,一切纯粹的政治观点都受到严格限制,独立的政党也遭到禁止。1967年,这个国家甚至还没有一部宪法,已经存在的那些权利和程序也大都是做给西方伙伴看的。

[11]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佛朗哥在他的最后10年里给了大学里的激进主义分子们一些经过严格限制的自由,这样做的后果之一就是,60年代的西班牙学生在回忆往事时,通常会夸大他们后来在国家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作为被暂时取消的君主国的“摄政者”，佛朗哥选定年轻的胡安·卡洛斯——西班牙末代国王的孙子——在适当的时候接替他，但在大多数观察者看来，君主国问题在西班牙事务中不起什么作用。即便是教会，虽然在许多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一股重要力量，但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起的作用也很有限。

西班牙在传统上是基督教文明反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堡垒，这是小学课程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天主教本身（不像天主教社团中的现代化“秘密僧侣”那样）被排挤到了权力之外，这与政权创立之初10年间所提倡的新十字军“国家天主教教义”精神所受到的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12]1968年6月，佛朗哥屈服于当代现实，首次承认了宗教自由的原则，允许西班牙人在自己选择的教堂里公开做礼拜。但在那时，宗教本身却已经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期：一个在60年代初期有8000名神学院学生的国家，12年后只剩下不到2000名。1966年至1975年间，全国三分之一的耶稣会会士离开了修道会。

国家对军队也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佛朗哥本人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十分清楚疏远军队会有什么危险。这支军队继承了保卫国家、保卫传统价值观的过强的责任感。在战后的几年中，西班牙陆军受到了宠爱和奉承。它在内战中取得的胜利，每年都要在主要城市的街道上举行庆祝，而在内战中的失败也在1959年9月完工的、排场十足的阵亡将士谷里得到了纪念。军衔与勋章数量增加了：到这届政府灭亡时，共有300名将军，军官与其他军阶的比率为1:11，为欧洲之最。1967年，“国家公共机构法”正式规定军队负责保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卫“公共机构系统”。

但实际上，军队已经变得多余。佛朗哥几十年来都在保护自己的军队不参加国外战争和殖民地战争。与法国或葡萄牙军队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经历过耻辱的失败或被迫撤退。西班牙没有面临过军事威胁，国内安全由警察来负责，宪兵和特殊部队只用来对付恐怖分子——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而军队主要被用于仪式典礼，成为一种风险规避的惯例。军队的保守派传统日益表现为热情地希望君主国复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认同感在后来向民主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519

国家事务由有限的一群律师、信仰天主教的教授、公务员实行管理，他们中许多人对政策鼓励的公司表示出积极的兴趣。但是由于国家禁止提出正式的政治反对意见，所以是从这些统治阶层圈子内部——而不是其领导者仍在流亡的知识阶层——在地方政府效率低下、国外的批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榜样的刺激下，产生了改革的设想和变革的压力。

[12] 参见第7章。结果，在佛朗哥时期也保持一身正气的天主教领袖在向民主社会的过渡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桥梁”。

佛朗哥终于在1975年11月20日去世,时年82岁。他直到临终都不肯认真考虑自由化或移交权力的问题,这样做,即便对支持他的人来说,他也没有价值了。支持者中有很多人同情年初曾要求取消对新闻界和政治集会的限制的示威者。因此,向民主社会的过渡是由佛朗哥自己任命的官员和部长来操作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渡既迅速又成功。在告别佛朗哥主义、向民主过渡的最初阶段,西班牙赞成民主改革的传统力量——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会会员——扮演了配角。

佛朗哥死后两天,胡安·卡洛斯加冕为国王。最初,他在内阁中保留了佛朗哥的最后任总理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和他的同僚,以此向军队和其他人保证不会同过去突然决裂。但是在1976年4月,阿里亚斯取缔了刚刚成立的、尚未批准的左派政党的联盟——“民主协调组织”,逮捕了其领导人,从而受到国王冷遇。两个月之内,国王就撤掉了阿里亚斯,换上了自己的心腹、一名部长阿道夫·苏亚雷斯·冈萨雷斯。

44岁的苏亚雷斯是一个典型的佛朗哥时代后期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他曾担任过一年由元首佛朗哥创立的长枪党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事实证明选择苏亚雷斯是精明之举。他组建了新的政党“民主中间派联盟”,而且开始说服佛朗哥集团接受关于政治改革的全民复决投票——实际上就是说服他们批准引入普遍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佛朗哥的老近卫军被一个他们认为是自己人的人打乱了阵脚,同意进行全民复决投票——1976年12月15日,投票结果有94%的人赞成改革。

1977年2月,苏亚雷斯授权西班牙最古老的政治组织西班牙社会党回国。当时该党由来自塞维尔市的年轻的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奎斯领导,他从20岁出头时就开始积极从事地下活动。同时,工会也变得合法化,并且获得了罢工权。4月1日,苏亚雷斯禁止并解散了他曾经领导的民族运动组织;一周后,他又宣布桑提亚哥·卡里约领导的“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与他们的葡萄牙同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已经承诺在向议会民主过渡时期的种种限制下运行。〔13〕

为了制定新宪法,1977年6月进行了立宪会议代表选举。这次选举——自从1936年以来,在西班牙还是第一次——得票数最多的是苏亚雷斯领导的民主中间派联盟,赢得议会165个席位;处于第二位的是冈萨雷斯的社会党,占121个席位,其他角逐者仅合占67个席位。〔14〕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苏亚雷斯的胜利让保守派们(他们大多数投了他的票)放下心来,不会突然转向左派。由于没有取得明显的大多数席

〔13〕 在被宣布合法化之前1个月,西班牙共产党在马德里主办了西欧的“欧洲共产党”的公开会议。

〔14〕 1977年选举所产生的社会与地缘影响与1936年的选举不可思议地相似——国家的政治生活被冷藏达40年。

位,这就迫使他与左派代表合作。左派因此也就承担了起草新宪法的部分责任。

这部宪法(在1978年12月的第二次全民复决投票中得到了充分确认)总体来讲相当传统。西班牙将成为一个议会君主制国家;将没有官方宗教(尽管在仔细斟酌后向教会让步,承认天主教是一个“社会现实”);法定选民年龄下降到18岁;死刑被废除。但会议将历史上著名的地区(例如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等等)有权自治写进了新宪法,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与它的近期历史的重大决裂。

宪法第二条肯定了“全体西班牙人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栖息地西班牙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但接着又“承认并保证境内各民族和地区自治和各自团结一致的权利”。接下来的自治法承认了在迄今为止极端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存在古已有之的语言多样性和地域性情感;他们还承认了加泰罗尼亚在人口数字方面不成比例的重要性,以及在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都存在的强烈的自治情绪。但是一部分西班牙人被赋予的东西不可能不让其他人也拥有。在4年内,西班牙将被分成17个自主管理的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旗帜和首府。不只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会被承认是独立的,加利西亚人、安达卢西亚人、加那利人、瓦伦西亚人、纳瓦拉人等等也一样。〔15〕

但是,新宪法规定马德里继续负责国防、司法和外交,这是一个尤其对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而言让人难以接受的妥协。上文已经讲述过,“埃塔”组织在新宪法讨论阶段的几个月内,故意加强了针对政治家和士兵的暴力和暗杀活动,希望借此能引发他们的强烈反应,从而阻止使他们的状况每况愈下的民主进程。 521

在1981年,他们有可能取得成功。1月29日,对经济发展的不满达到最高峰(见下文),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和安达卢西亚都开始尝试分离主义的地方自治,苏亚雷斯在本党派的胁迫下辞职——他所在的党所痛恨的不是他的失败(1979年按照新宪法举行的大选中,民主中间派联盟又一次获胜),而是他的成就,还有他独断专行的作风。在另一位民主中间派联盟政治家卡尔沃·索特洛接替他之前,巴斯克地区各省爆发了大罢工。这样,在右翼批评家看来,民主西班牙不仅无人领导,而且到了崩溃边缘。

2月23日,国民卫队陆军中校安东尼奥·特赫罗·莫林·莫利纳用武力控制了议会。经过协调,巴伦西亚军区司令员哈伊梅·米兰斯·德·博斯克将军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号召国王解散议会,任命一个军事政府。尽管现在看来特赫罗和米兰斯·德·博斯克的做法显得颇有戏剧性而且笨手笨脚,却是有传统和先例可循的。而且议会本身,或

〔15〕 宪法第151条准许任何提出自治要求的地区实现“地方自治”。

各政党及其支持者,也对政变的发生束手无策。军队是否持同情态度还很难说。〔16〕

决定事态最终结果并塑造日后西班牙历史的,是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对阴谋者要求的断然拒绝和他的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坚决地捍卫宪法,并毫不含糊地宣布他和王权都与新兴的追求民主的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年轻的国王的勇气或许令事态双方都同样吃惊,因为此前他一直生活在阴影中,认为自己是被已故独裁者任命的国王;但是现在他的命运已和议会政治不可挽回地联系在了一起。由于缺乏一种凝聚力量的制度或符号,那些怀念旧政权的警察、士兵等等都避开了起义或恢复原状的想法,转而投身于支持曼纽尔·弗拉伽领导的“人民联盟”。这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致力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抗击“西班牙最危险的敌人:共产主义和分裂主义”。

特赫罗的做法让民众失去了对他的“事业”的信任,议会当初就应该趁机削减军队预算,并且通过一项早就应该通过的法案,将离婚合法化。但是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大多数人都被夹在教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右翼和刚刚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左翼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前者不满于变革速度之快,对区域自治也感到不安,而新西班牙公共道德的松懈也让他们感到愤懑。后者一方面对宪法事宜公开妥协,另一方面又针对难以控制的工人运动和日益严重的失业现象摆出一副激进面孔。

就像葡萄牙一样,这次政治过渡恰逢经济困难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追究佛朗哥时代最后几届政府的责任。在1970年至1976年间,这几届政府为了换取公众支持而增加公共开支和公共部门就业岗位,补贴能源消耗,抑制物价,同时增加工资,几乎不考虑这样做的长远影响。这种漠然态度的后果在1977年开始显现:大选时,通货膨胀率达到每年26%,国库(在佛朗哥政权的递减税政策下空虚已久)接近干涸,失业率长期呈上升趋势。1973年至1982年间,全国估计失去就业岗位180万个。〔17〕

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昙花一现的共和国时期一样,西班牙民主建设时期恰逢经济衰退,与生活指数挂钩的工资和经过政府补贴的物价恶化为过高的通货膨胀,因此很多人议论说,西班牙正在走阿根廷的路。如果这一点能够得以避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在1977年10月在《蒙科洛协议》上签字的人。该协议是经过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的第一个,在协议中,政治家、工人领袖和雇主都同意着手进行大范围的改革:贬值货币、制定收入政策、控制政府开支、对庞大而又浪费严重的公共部门实行结构性改革。

《蒙科洛协议》和后来的其他协议(最后一个签署于1984年)并没有创造奇迹。部分

〔16〕 1982年和1985年还各有一次针对国王和议会的阴谋,但是都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

〔17〕 到80年代中期,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显示,就业年龄的人口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失业。实际数字有可能接近四分之一。在一个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少有人拥有私人存款的国家,这些数字意味着普遍存在的生活艰难状况。

由于石油冲击的影响,国家的支付平衡危机持续恶化;许多较小的公司倒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一齐上涨,引发了罢工浪潮以及左翼工会和共产党内部的痛苦分裂——他们都不再愿意分担民主过渡的社会代价。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协议,这些分歧及其造成的社会后果肯定还会更加严重。

1982年10月的选举正值经济困难最高峰时期,社会党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大多数席位,费利佩·冈萨雷斯上台,出任首相,并且将要留在这个位置上14年。苏亚雷斯的中间派民主党——它曾经带领国家摆脱佛朗哥主义——几乎被从议会中排除,只赢得了2个席位。共产党只赢得了4个席位,这是一次蒙受耻辱的失败,导致了桑提亚哥·卡里约的辞职。从此以后,西班牙政治将按照西欧其他国家的模式进行,不断围绕中左翼和中右翼进行重组。在这里,中右翼是指弗拉伽领导的人民联盟(1989年更名为“人民党”),他们在选举中令人惊讶地获得了26.5%的选票。 523

社会党以平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为纲领参加竞选,承诺保护工人的工作和消费能力,使西班牙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但一旦掌权,冈萨雷斯坚持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开始对西班牙的工业和服务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后来又逐步实行私有化),并于1986年在西班牙是否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上的公民复决投票中击败了他的许多支持者。此刻他赞成西班牙继续留在北约。〔18〕

这种方向性的改变并没有为冈萨雷斯赢得守旧的社会主义者的好感,这个政党在他的带领下,离存在已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越来越远。〔19〕但是他的核心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对内战没有记忆的青年男女,并且公开宣称,他的目标是带领西班牙战胜落后(争论已久的“落后”问题自黄金时代结束以来,就一直折磨着这个半岛),对于这样一个政治家来说,旧的左倾意识形态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据冈萨雷斯判断,西班牙的未来不在于社会主义,而在于欧洲。1986年1月1日,西班牙与葡萄牙一起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国。

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和出人意料的发展,是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向民主的过渡。截至80年代初,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不仅实现了向议会民主的和平转变;而且这3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几年前还处于地下状态,并且大张旗鼓地反对资本主义——现在都是主要的政治力量,实质上以中间派的立场执政。萨拉查和佛朗哥政权不但从政治

〔18〕 1982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的竞选口号是“不进北约!”。4年后他们的竞选海报上写的是“要进北约!”

〔19〕 社会主义的传统纲领“国有化”在西班牙行不通,因为独裁的国家已经拥有了官方经济的相当一部分。

舞台上消失,而且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而新一代政治家们在努力争夺年轻的“摩登”选民的拥戴。

其中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其一是已经提到过的,尤其是在西班牙,远远落后的不是整个社会,而是它的政治状态。佛朗哥统治的最后 10 年间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社会和地理的流动性,意味着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和期望已经发生了太多变化,远非仍然透过 1936—1957 年间的状况去看待西班牙的外界观察者所认为的那样。地中海沿岸欧洲的年轻人并不觉得难以适应这种在离他们较远的北方欧洲国家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事实上,他们在政治革命以前就已经在学着适应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从上个时代的种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对左翼或右翼的政治说辞持明显的怀疑态度,也不为忠于过去的行为所感动。过渡完成以后去里斯本或马德里的游客往往对这里的年轻人感到惊讶不已:他们从不提起最近的过去,不管涉及的是政治还是文化。〔20〕

524 社会现实不容许 20 世纪 30 年代重现,导演阿伦·雷奈在 1966 年的电影《战争结束了》中未卜先知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叙述了悲伤的挽歌式故事,讲述的是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员迭戈(由杰出的演员伊夫·蒙当扮演)偷偷地从巴黎回到了马德里,勇敢地携带了“工人起义”所需的颠覆性文献和计划,虽然他知道起义永远不会发生。“你们难道不明白吗?”他试图告诉梦想复兴 1936 年希望的巴黎共产党领导人,“西班牙已经变成了浪漫左派的聚集点,成了一个用来欺骗过去战争中老兵的谎言。现在每年有 1400 万游客在那里度假。世界的现实在抗拒我们。”电影的编剧是约尔格·塞姆普朗,这也并非偶然,他本人几十年来都是西班牙共产党的秘密间谍,后来因为对该党不正视现实、一味怀念过去感到失望而离开。

到了 80 年代初,西班牙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愿停留在近期的历史上,这是不争的事实,尤其表现在对旧的公共行为准则大张旗鼓地拒绝:在语言上,着装上,尤其是性观念上。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脍炙人口的电影就是一种对 50 年来发霉的独裁统治的自觉反抗,是新的反主流文化的一种表现。这些电影运用独特的视角和存在主义的表现手法,刻画一群在充斥着性的环境中感到迷惘的年轻女子。在 1980 年的电影《佩芭、露琪、鲍莱和其他不出众的姑娘们》(出品于西班牙首次自由选举后仅 3 年)里,剧中人心照不宣地对“大选”和“正在吞噬我们的色情战争”大笑不已。

两年后,在《激情迷宫》中,训练营里出来的恐怖分子和女性色情狂互相说着淫秽笑话,还一度争论“他们快乐的小恋情”和“国家的未来”孰先孰后的问题。他的电影故事背

〔20〕 西班牙 1978 年新宪法的首要目标就是调和西班牙历史上对立的两极——左翼与右翼,教会与反教权主义,中心与边缘——它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对它所取代的政权保持沉默。

景一部比一部更浮华,城市外景地也越来越时尚。到1988年,以电影《精神濒临崩溃的女人》为标志,阿尔莫多瓦以电影的手法,令人信服地完成了一个拼命弥补失去的时光、忙乱而又自觉的现代社会的概括。〔21〕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文化或政治领域的激进分子和革新者的努力,而是多亏了来自旧政权的保守派政治家。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阿道夫·苏亚雷斯——就像几年后的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是他们帮助摧毁的那个体系的典型人物。卡拉曼利斯确实在军政权统治期间处于流亡中;但他也与任何人一样是无可指摘的民族主义者,并且思想偏执。而且,他对受到玷污的1961年希腊选举负直接责任,主要是那次选举使战后的政治体系名誉扫地、使军队执掌了大权。 525

但正是他们带给选民的这种信任感,使他们能够摧毁自己曾经忠诚服务过的独裁制度。接下来又都由社会主义者——索瑞兹、冈萨雷斯、帕潘德里欧——继任。这些继任者们也都曾令人信服地向自己的支持者保证过,说他们的激进主义信念不可动摇,但随后又为环境所迫,实行温和的、经常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这种过渡,用一位西班牙著名评论家的话说,是“要求佛朗哥主义者假装自己从来不是佛朗哥主义者,左翼妥协者假装自己仍然坚持左派原则”。〔22〕

所以,时代环境迫使很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放弃坚持已久的原则立场。这些年来,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公众生活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息,那就是审时度势地背叛诺言,出于实用主义考虑而忘却某些记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年轻一代会有那种怀疑的、不关心政治的态度。而那些忠诚地、无怨无悔地坚持过去的追求的人,从共产主义者到长枪党党员,都很快地被发生的事情甩在后面。如果不考虑现实,即便始终如一也没用。

最终,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毫不费力地加入或重新加入了“西方”,尽管它们对自己采取政治孤立的方针,但是它们的外交政策却始终能够与北约或欧共体国家兼容甚至联合。冷战的传统,加上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仇视,促进了多元民主国家和军事或教权独裁国家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北美人和西欧人在经过多年与独裁国家的伙伴共同开会、谈判、制定计划,或者仅仅是跟他们做生意之后,早已不会再动辄为马德里、雅典或里斯本的国内事务大动肝火。

〔21〕 他的电影——最近的一部是2004年的《不良教育》——同时还非常尖锐地反对教权主义;也许只有在这个方面,阿尔莫多瓦还保持着对文化多样化这一西班牙旧传统的忠诚。

〔22〕 维克多·佩雷兹-迪亚兹《十字路口的西班牙。文明社会、政治与法制》(坎布里奇大学出版社,马萨诸塞,1999)第65页。

因此,对大多数旁观者——包括许多它们本国的批评家——来说,令人不快的南欧政权与其说是在道德上破产了,倒不如说是在制度上落后于时代了。当然,它们的经济在本质上还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的,并且早已融入国际市场,以获取金钱、商品和劳动力。即使是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也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辨认的一部分——尽管是在错误的一端。新兴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在西班牙,不仅在衣着打扮上,而且连理想抱负
526 都在效仿法国、意大利或英国的经理人、商人、工程师、政治家和公务员。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的社会尽管还很落后,但也已经属于它们现在渴望以平等身份加入的那个世界,而从独裁统治的过渡,首先得益于给他们这样做的机会。他们中的那些曾经坚决地往后看的精英人物,现在已经在往北看。地理似乎战胜了历史。

在 1973 至 1986 年间,欧共体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行动和扩张,一位历史学家曾称之为“一系列不规则的大爆炸”。庇护者戴高乐去世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想法不必再因他的不赞成而被束之高阁,而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的战略意义使他烦恼不堪(上文已讲到),他明确表示欢迎英国加入欧共体。1972 年 1 月,在布鲁塞尔,欧共体正式批准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挪威加入,一年后生效。

英国申请成功,当归功于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唯一的一位毫不含糊地热情赞同把国家的命运同欧洲大陆邻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领袖。1974 年工党重新执政时,号召全国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共体进行复决投票,结果是 1 730 万票赞成,840 万票反对。但即便是希思也无法使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感觉”自己是欧洲人,左翼和右翼各有相当一部分投票者继续怀疑“加入欧洲”的好处。而挪威人则明确认为,如果他们不加入,生活反而会更好:在 1972 年 9 月的公民投票中,全国 54% 的人反对加入欧共体,相反,他们选择与欧共体签订有限自由贸易协定。这次投票结果在 22 年后以几乎相同的票数得到确认。〔23〕

英国的成员国身份在后来的几年中受到争议,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反对刚刚出现的与欧共体加强联合的计划,并且要求欧共体退还英国“过多支付”的公共预算。但在 70 年代,伦敦有自己的问题,而且尽管加入欧共体导致了通货膨胀,但是贸易区的交易在当时能为英国提供三分之一国内投资,伦敦为此感到宽慰。新的欧洲议会的第一次直接选

〔23〕 首都奥斯陆先后两次投票强烈支持加入欧共体。但是这项决定是由一个反欧洲联盟做出的,其成员包括激进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语言民族主义者”,以及来自沿海和北部各省的农民,还有激烈反对欧共体将排他性沿海捕鱼区限制在 12 英里之内的渔民。丹麦的加入也带动了格陵兰加入,当时格陵兰仍由哥本哈根派驻代表管辖。但在 1979 年取得自治后,格陵兰进行了一次全民投票,结果决定脱离欧共体,成为迄今唯一一个退出欧共体的国家。

举是在1979年——在此之前,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大会的成员是由各国立法机构选举产生的——但是没有引起人们多大兴趣。在英国,可以想见投票人数很少,只有31.6%; 527 但那时在别处也不是特别高——在法国,只有五分之三的选民愿意投票,在荷兰则人数更少。

“北方由北向南3个国家”对欧共体的追随,相对地显得问题较少,不管是新成员还是原有成员。爱尔兰贫穷但是面积小,而丹麦和英国富有,因此也就成为公共预算的纯粹贡献国。正如下一轮成功扩张一样,当1995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已改称“欧盟”的欧共体时,新成员的加入增加了扩张中的欧盟的财力和影响,却并未显著增加其费用,也不必在敏感领域与已有成员竞争。来自南方的新成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希腊像爱尔兰一样穷而且小,所以它的农业对法国农民构不成威胁。因此,尽管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东正教具有官方地位和影响力,例如,公证结婚直到1992年才得到允许——但并没有激烈的争论阻止它加入。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等人都支持它加入。但是对葡萄牙、尤其是西班牙的加入问题,法国提出强烈反对,因为葡萄酒、橄榄油、水果还有其他农产品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生产和销售成本要低得多;如果允许西班牙和葡萄牙与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地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农民会与法国生产者形成激烈竞争。

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用了9年时间才得以进入欧共体(而希腊的申请在不到6年就被通过),在此期间,法国历来的良好形象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一落千丈:到1983年,在一系列用词尖刻的谈判过程中,有三分之二的的时间里,只有39%的西班牙人对法国持“正面”看法——这是走向共同未来的一个不祥的开端。一部分问题在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到来,不仅意味着欧共体将向法国农民进一步增加支持性拨款,以作为对巴黎的赔偿;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为欧共体增加了5800万人,这些人多数很贫穷,因此也就有资格享受布鲁塞尔资助的各种计划和补贴。〔24〕

事实上,随着这3个贫穷农业国的加入,共同农业基金背上了新的沉重负担——法国已不再是该基金的主要受益国。因此需要经过仔细谈判,达成各种协定,来补偿法国的“损失”。新成员国的劣势也得到了应有的补偿,而且他们的出口产品被允许平等地进入欧洲市场之前,由法国强加给他们的漫长的“过渡时期”所带来的损失,欧共体也给予了补偿。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后享受的“地中海综合计划”——事实上是区域性补贴,尽管名称上不是——在1981年时就没有提供给希腊,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因此 528

〔24〕 但是,这种好处被在私有部门的新增投资机会抵消了:在1983至1992年间,西班牙的公司中,外商所持股份的比重上升了374%。

才要求将他的国家也包括进去,甚至以“如果遭拒绝,就退出欧共体”相威胁,终获批准。〔25〕

因此,正是在这几年时间里,欧共体才有了一种令人不敢恭维的形象,仿佛是一个制度化的牲畜交易市场,其成员国以政治上与之结盟换取物质上的回报。当然这些回报都是实实在在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欧洲”之外做得也不错(虽然不及法国),西班牙谈判家变得非常擅长摆出保卫本国财政优势的姿态。但真正发了大财的是雅典:尽管它在80年代初期落后于欧共体的其他国家(至1990年就取代葡萄牙,作为欧共体内最贫困的国家),但是以其成员身份而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事实上,正因为希腊如此贫穷——至1990年,欧共体内部最穷的地区有一半是在希腊——它才会有这样大的起色。对雅典来说,加入欧共体等于接受第二个马歇尔计划:仅在1985至1989年间,希腊接受了欧共体基金的79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其比例高于其他任何成员国。只要没有其他穷国在排队等候,如此慷慨的财富再分配——这是要希腊默许欧共体各种决策的代价——仍然是欧共体的缴费大国(主要是西德)可以承受的。但是由于德国统一花费高昂,又有一批东欧的穷国将要申请加入欧共体,因此我们将会看到,地中海沿岸诸国加入后几年间欧共体的慷慨做法证明是会造成负担而且备受争议的。

欧共体规模越大,就越难管理。政府间的部长委员会所要求的“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造成了无休无止的辩论。各种决策都要经过几年才能被同意——有一项关于矿泉水的定义和标准的指令,用了11年时间才被从委员会的会议室里送出来。必须采取措施了。长久以来的一项共识就是:欧洲的“计划”需要把目的和干劲融合起来——早在1969年在海牙召开的一次会议,就是一系列不定期举行的、旨在“重新启动欧洲”的会议中最早的一个——而法国总统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德国总理施密特在1975—1981年之间的私人友谊有利于这项日程。但是,消极的经济融合——消除关税和贸易限制,补贴处于劣势的地区和部门——要比达成积极的政治行动的标准来得容易。原因很简单。只要有足够的现金周转,经济合作只会给各方带来净利润;而任何以欧洲一体化或调整为目的的政治行动都会潜在地威胁国家自治,并且限制各国在国内政治方面的主动性。只有当强国的强势领导人出于自己的原因同意朝着某个共同目标合作时,变化才会发生。

因此是维利·勃兰特和乔治·蓬皮杜首先发起了货币体系的调整:即“蛇”计划;是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把它发展为欧洲货币体系(EMS);是赫尔穆特·

〔25〕 有不只一位有影响力的人在布鲁塞尔高声要求欧洲议会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

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们各自的继任者酝酿了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而导致了欧盟的诞生。同样还是德斯坦和施密特发明了“首脑外交”作为一种规避布鲁塞尔累赘的超国家官僚作风的方法——这进一步提示我们，与过去一样，法德合作是西欧统一的必要条件。

70年代法德联合行动的动力是经济焦虑。欧洲经济当时即使有增长，也是缓慢的，地方性通货膨胀流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带来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汇率反复无常、不可预测。考虑到对该问题的地区性而非国际性反应，“蛇”计划、欧洲货币体系和“欧元”（the ecu）成为退而求其次的解决办法，德国马克被用来逐步代替美元，成为欧洲银行家和市场的稳定参照货币。几年后，欧元代替了各国货币，成为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尽管从形式上来看，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了各国的货币体系。因此，统一的欧洲货币的最终出现，是对经济问题的实用性反应的结果，而非朝着既定的欧洲共同目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

但是，通过说服众多观察者——当时尤其是持怀疑态度的社会民主党人——经济复苏与繁荣不再可能仅靠一国之力实现，西欧国家成功的货币合作出人意料地成为通往其他形式的合作的台阶。在基本上没有重要选区反对的情况下，欧共体各国首脑和政府于1983年签订了《庄重宣言》，致力于进一步的欧洲联合。这种联合的具体轮廓是在协商《单一欧洲法案》的过程中敲定的，法案于1985年11月由欧洲议会批准，1987年7月生效。

《单一欧洲法案》是对原先《罗马条约》的第一次重要修改。法案第一条明确规定“欧共体和欧洲政治合作应以共同致力于脚踏实地迈向欧洲统一为目标”。仅仅通过把“欧共体”换成“欧盟”，12个成员国的首脑就在原则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法案的签字者却避免或推迟了一切真正有争议的问题，最明显的是欧盟农业预算负担越来越重的问题。他们还小心翼翼地绕过缺乏防务和外交方面的共同政策这一尴尬问题。20世纪80年代“新冷战”高峰时期，在几十英里开外的东部重大发展即将开始时，欧盟成员国却坚决地专注于内部事务，关心的是欧盟尽管有3亿多人口、却仍然主要是关于共同市场的问题。

然而，他们的确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要有目的地向着真正的、单一的内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这是将于1992年实施的目标）迈进，而且决定在欧盟的决策过程中实行“有效多数票”制——提出“有效”的问题，是因为较大成员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坚持保留阻止对它们的国家利益有害的建议的权力。这些是真正的变化，这些变化之所以能够被通过，是因为单一市场得到了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到“绿党”的赞同，尽管他们各有各的原因。这些变化促进了未来10年间真正的经济一体化。

13 年来,欧盟成员国数量已经增长了一倍,瑞典、奥地利等国家也即将申请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共同体要做出任何决定的话,就必须取消欧洲委员会的国家否决权制度。欧盟规模越大,对那些尚未加入的国家来说就越有吸引力,甚至让他们觉得无法规避。但是,对成员国公民来说,近年来欧盟最重要的特点不是它的管理方式(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是其领导人为进一步一体化所做的努力,而是出入金库的钱的数目,以及这笔钱是如何花出去的。

按原先的《罗马条约》,只有一个机构有特别权限认定各成员国有哪些地区需要帮助,然后将共同体现金分发过去,那就是在意大利倡议下成立的欧洲投资银行。但一代人之后,以现金补贴、直接援助、发放启动资金和采取其他投资鼓励形式进行的地区性开支,已成为布鲁塞尔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欧共体掌握下的最有影响力的杠杆。

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各成员国国内的地方主义政治和成员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欧洲各国仍然是统一的,由中央统一管理,很少考虑地区多样性或地方传统。只有 1948 年的意大利新宪法承认了地区权威,但即便如此,在它控制下的有限的地方政府,在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仍然形同虚设。但就是在地方要求自治成为整个欧洲的国内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以后,欧共体出于自身原因,设立了地区资金体系,以 1975 年“欧洲地区发展基金”的设立为第一步。

在布鲁塞尔官员看来,“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和其他所谓“结构性资金”有两个目的。

31 其一,是为了应对欧共体内部经济落后和不平衡的问题。正如《单一欧洲法案》明确指出的那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战后欧共体前进的方向。每批新成员国的加入都会带来新的不平衡,要实现经济一体化,就必须对这种不平衡给予关注和赔偿。意大利南部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唯一的贫困地区:爱尔兰大部分地区、英国部分地区(乌尔斯特、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西部)、希腊与葡萄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南部、中部与西北部:这些地区都很贫穷,要赶上其他地区,需要大量补贴和中央援助的再分配。

1982 年,欧共体成员国的年收入若以 100 计的话,丹麦(最富裕的成员国)是 126,而希腊只有 44。至 1989 年,丹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葡萄牙的两倍多(在美国,穷州和富州差距只有它们三分之二大)。而且这只是国家平均值的比较——地区之间的差距则更大。即便富国也有需要帮助的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瑞典和芬兰加入欧盟时,其靠近北极的地区就是。这些地区人口稀少,完全依赖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拨款维持生活,而它们现在也有了向布鲁塞尔申请援助的资格。为了纠正西班牙的加利西亚和瑞典的法斯特波顿在地理上的不便和市场的畸形状态,以便使其不再依赖援助,布鲁塞尔的机构分发给它们大量现金——这无疑给当地带来利益,但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开销巨大

的、臃肿的、有时腐败的地方官僚机构。〔26〕

欧洲开支巨大的地区资金援助项目的第二个动机——为了这两个目的,到本世纪末,各种“结构性”和“聚合性”基金要占到整个欧盟总开支的35%——是使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能够绕过成员国中不肯合作的中央政府,直接与地区合作。这一战略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各地区的地方主义情绪一直在增长(或复苏)。1968年的激进主义分子以加强地区之间的亲密联系为新的政治信条,试图恢复并使用法国西南部古老的奥克西坦语。与布列塔尼的激进分子一样,他们与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分裂主义分子、苏格兰和佛兰芒民族主义者、意大利北部分裂分子等等找到了共同的事业,共同反对马德里、巴黎、伦敦或罗马的“苛政”。

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政治分为许多互相交叉的亚文化类型——历史的、语言的、宗教的;寻求自主、自治、甚至是完全的民族独立——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痛恨被迫资助本国贫穷地区的富裕省份;另一类是历史上长期贫穷的,或刚刚被削减工业生产能力的、对反应冷淡的政治家感到愤怒的地区。前一类别的地区有加泰罗尼亚、伦巴第、比利时的弗兰德斯、西德的巴登-符腾堡州或巴伐利亚州、法国东南部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截至1990年,这个大区与巴黎大区合在一起,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0%)。第二类有安达卢西亚、苏格兰大部分地区、讲法语的瓦龙大区和其他许多地区。 532

这两类地区都将从欧洲地区政策中获益。加泰罗尼亚、巴登-符腾堡等富裕地区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事处,学会了如何代表本地区进行游说、争取投资、或是使欧共体政策有利于地区而不是国家机构。贫穷地区的政治代表也同样迅速地学会了操纵布鲁塞尔的拨款和援助,用以增加自己在当地的人气——并借此迫使无奈的都柏林或伦敦当局鼓励、甚至补充布鲁塞尔的慷慨援助。这样的安排于各方都适合:欧洲金库可能会损失几百万元的库存来补贴爱尔兰西部人口稀少地区的旅游业,或者同意税收优惠,以吸引投资者到洛林或格拉斯哥等人员长期失业地区;但即便是出于自我利益考虑,受惠者也正在成为忠诚的“欧洲人”。爱尔兰用这种方法,成功更新或改造了相当一部分破烂的运输及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不仅爱尔兰,其他较穷的边缘化成员国也受惠于此。〔27〕

《单一欧洲法案》把欧共体的权力延伸到了许多政策领域——环境、雇用方式、地方

〔26〕 当然,欧盟预算的另一主要消耗者——共同农业政策长久以来加剧了聚合性基金和其他基金本该帮助消除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27〕 比较富裕的国家则通常不会对布鲁塞尔如此感恩戴德,它们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要更紧一些。在法国,尽管“权力下放”已写入20世纪80年代通过的法律里,但是预算控制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巴黎手中。结果,法国的富裕地区跟得上国际潮流,并从与欧盟的联系中获益,而贫困地区仍然首先要靠国家援助度日。

的研发行为——这些领域是欧共体以前从未涉足过的,而一旦涉足,就意味着要把布鲁塞尔的资金分发到地方机构。欧洲这种逐渐的“地区化”助长了官僚主义,而且开销不菲。举一个有代表性的小小例子:处于与奥地利北部接壤处的意大利的阿尔托阿迪杰-南蒂罗尔地区,1975年被布鲁塞尔正式归入“山区”(一个没有争议的称呼)类;13年后,它正式宣布,超过90%的地区为“农村”(任何普通的旅行者都看不出来),或者——用布鲁塞尔的术语来说——是一个“5-b类目标地区”。这种双重身份使阿尔托阿迪杰省有资格申请的项目有:环境保护基金;支持农业的拨款;加强职业教育的拨款;鼓励传统手工艺品的拨款;改善生活条件以保持人口数量的拨款。

533 结果,在1993至1999年间,小小的阿尔托阿迪杰省就接受了总计达9600万埃居的拨款(价值大致相当于2005年同等数量的欧元)。在欧洲结构性资助的所谓“第三个时期”(计划从2000年至2006年间实施),又有5700万欧元被分发给这个省支配。按照“第二类目标”的规定,这些钱只能用于为居住在“完全”山区或“农村”地区的居民谋福利。1990年以来,该省首府布尔扎诺有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指导当地居民如何获益于“欧洲”和欧洲资源。1995年以来,该省还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事处(与邻省特兰提诺和奥地利的蒂罗尔区共用)。布尔扎诺所在省的官方网站(提供意大利语、德语、英语、法语、拉地诺语以及各种罗曼斯语的方言版本)满腔热情地表达对欧洲的好感,这也在情理之中。

结果,在南蒂罗尔省等地方,不管代价是否昂贵,“自下而上”的欧洲大陆一体化似乎确实行得通。当1985年发起成立“欧洲地区委员会”(后改称“大会”)时,该会已有107个成员,还有更多地区即将加入。在一定意义上的统一的欧洲已经开始明朗化了。地方主义——它曾经是积习难改的语言学家或怀旧的民俗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现在有了另外的“准国家”身份:它取代了国家,而且更加合法化,因为它得到了布鲁塞尔、甚至是本国首都(尽管明显缺乏热情)的正式许可。

欧共体的公民也许不像几十年前一样明显地分为“意大利人”、“英国人”或“西班牙人”,但他们未必就觉得自己更像“欧洲人”,尽管“欧洲”的标签、选举、公共机构呈扩散之势。像下层灌木一样繁茂的各种事务处、媒体、公共机构、代表和基金,虽然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却几乎没有赢得他们的喜爱。原因之一也许正是分配和监督赠款使用情况的欧盟官方分支机构的大量存在:本已很复杂的现代国家政府机器,及其各部门、委员会、理事会,现在又加了上层(布鲁塞尔)和下层(省或地区),机构规模增加了2到3倍。

这不仅会造成规模空前的官僚主义,而且大量可利用的资金还会诱发和助长腐败。在许多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申请资金而夸大甚至捏造当地的需求,因此而造成了地方滥用权力、贪赃枉法,这些行为虽然逃过了欧盟官员的眼睛,但这样做会使他们的事业

丧失信用,致使将来连受益者也不再相信他们。由于尽人皆知欧盟放手让遥远的、未经选举产生的公务员进行决策,而且有大量传言说各地区在政治上互开方便之门、投机倒把,所以最近几年“欧洲”虽然成就不小,但名声欠佳。

本以为在管理得较好的国家里已经克服了的、地方政治的常见弊端——任命制、腐败、操纵——如今又在整个大陆重现。偶尔出现“欧洲丑闻”时,公共责任就会被国内政客小心翼翼地转嫁到一群隐形的“欧洲官僚”身上,因为这些人不必为坏名声付出政治代价。534 同时欧共体日渐膨胀的预算得到受惠者和提倡者的鼎力维护,理由是这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和睦化”,或者这是应得的补偿(其预算由欧共体似乎取之不尽的资金来支撑)。

总之,“欧洲”逐渐代表一种严重的“道德危险”,正如挑剔的批评家(尤其是英国人)高兴地坚持认为的那样。几十年来,依靠纯技术手段来促进大陆统一的努力,现在明显具有了政治色彩,但这种努力又缺乏一种名分,不像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从事的传统政治事业一样名正言顺。只要“欧洲”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其经济战略就仍会以 50 年代的精心设计与雄心为基础。至于政治,欧洲委员会宣言中体现出的自信的、干涉主义的语调——以及欧盟专家莅临遥远地区时体现出的权威感和手中拿着的翻开的支票簿——都表明了一种牢牢扎根于 60 年代早期社会民主鼎盛时期的管理风格。

尽管 70 年代和 80 年代建设“欧洲”的男男女女们努力超越国家政治的种种弊端,精神可嘉,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仍然思想褊狭。他们在当代最伟大的跨国成就——1985 年 6 月签署的《申根协定》——中就暴露了这一缺陷。根据这一协定,法国、西德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国家同意废除共同边界,成立共同的护照控制体系。自此以后,从德国去法国就像长久以来来往于比利时跟荷兰之间一样轻而易举。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申根协定》的参与国要全力保证与非参与国之间最苛刻的签证、海关制度:比如说,法国要为自德国入境的人开放,那么他们必须首先确保德国人在过境者穿越他们边境时已经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在开放某些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内部边境的同时,该条约坚决强化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外部边界。文明的欧洲人之间可以互相跨越边界,但绝不能给外部的“野蛮人”这种自由。〔28〕

〔28〕 自条约签订以来,“申根区”已经扩大到了超过欧盟其他成员国,但英国没有参与,而法国和其他参与国出于安全考虑,保留了重设边境控制措施的权力。

[illegible]



1982 年，“埃塔”即“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成员。由于当富裕的当地人口（很多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不为“独立的巴斯克”的幻景所动，“埃塔”日益孤立，备感沮丧，在整个 80 年代，“埃塔”杀手平均每年杀害 34 人。



“…… 我找到了一块大石头往士兵身上扔……再长大一点我就会去弄一枝枪……”（贝尔法斯特儿歌，流行于 1976 年前后）。爱尔兰共和军、清教徒、英国军队之间长达 30 年的冲突使大约 2000 人丧生。

1970 年,葡萄牙工人到达法国。到 1973 年为止,外国人占法国劳动力的 11%。在西德有大约 300 万名“客籍工人”,他们大多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欧洲的“经济奇迹”极大地依靠了这些移民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寄回家的汇款。



1974 年,意大利妇女示威要求改革离婚法。战后西欧福利方面的立法主要惠及有工作的人和家庭。而妇女特别关心的问题——堕胎、避孕及离婚——北欧 60 年代才有立法,其他地方则要到 70 年代才出现。



1971 年 10 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他选定的接班人胡安·卡洛斯王子。佛朗哥（1975 年去世）如果活着的话，会对这个门生很失望：胡安·卡洛斯作为国王，挫败了 1981 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并成为民主西班牙的忠诚的、受欢迎的捍卫者。



1975 年 4 月，葡萄牙第一次议会选举。现在回想起来，地中海沿岸国家向议会民主的过渡似乎是顺利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当时，左翼和右翼各有许多人希望不是这样，他们对选举结果感到惊讶（和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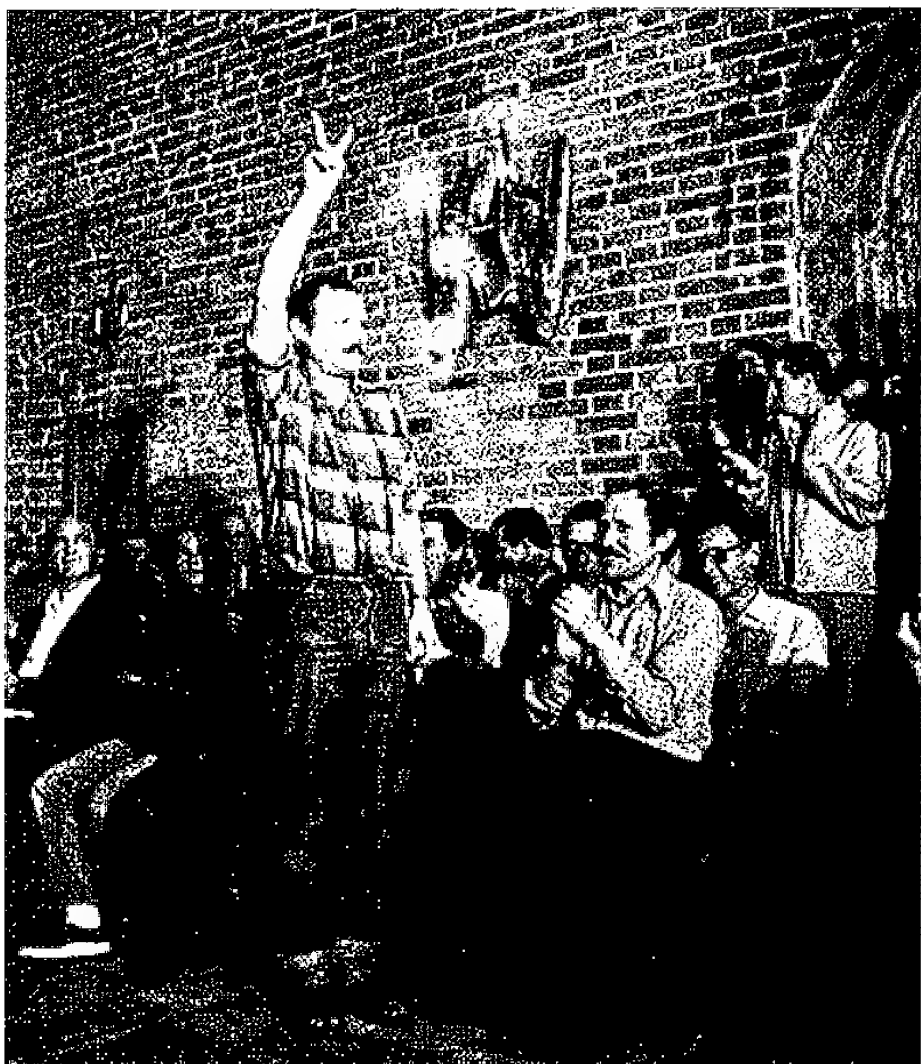
1970年3月，维利·勃兰特总理——和民主德国总理维利·斯多夫——在埃尔富特举行第一次两德谈话期间。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缓和了中欧紧张气氛，开启了交流——但在有些人看来，西德似乎是在将共产主义邻国合法化，甚至是在支持他们。



“卡利古拉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的嘴巴”。玛格丽特·撒切尔能够成功地迫使欧共体将巨额预算返还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不但会诱惑、恫吓英国选民，就连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老练的愤世嫉俗者也愿意俯首。



1979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作为教皇首访波兰。教皇并不是单枪匹马打倒了共产主义——尽管有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是这样——但是在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失去民心这件事情上,他的确功不可没。



1984年,亚当·米奇尼克在格但斯克市。米奇尼克是东欧最勇敢、最有独到见解的共产主义批评者之一。尤其有影响力的是,他强调非暴力,强调要从内部腐蚀共产主义政权,而不是试图与其正面冲突,或将其推翻。



1987年4月,布拉格,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陶醉在民众过分的敬仰中。这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在国内从来没有像在较远的西部国家那样受欢迎过;但是他在国外的成功感激励他在国内进行改革,这也许并不是他的初衷。

1989年11月,东德难民乘坐一列封闭列车,经布拉格驶向西方。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列宁乘坐封闭列车穿过德国开始,因此以这种方式把共产主义公民送往西方是完全合适的。



1989年11月,布拉格。即使是“天鹅绒革命”,序幕也是血腥的。但是除去罗马尼亚,其他国家1989年的过渡却少有严重暴力。



1989年11月24日,布拉格,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与瓦克拉夫·哈维尔。一项任命杜布切克为后共产主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计划很快就流产了:1989年的人们选择了哈维尔。





第 17 章

新现实主义

35

世上并无所谓“社会”之物，有的只是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和一户户人家。

——玛格丽特·撒切尔

法国人民开始渐渐明白，是商业创造了财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水平，并确立了法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弗朗索瓦·密特朗

在密特朗试验的尾声，法国左翼势力表现出空前的思想匮乏、灰心丧气、孤立无援。

——唐纳德·萨松

每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都是以政治观念的转变为序曲的。欧洲 20 世纪 80 年代的几场巨变也不例外。70 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将战后数十年以来西欧盛行的乐观主义态度渐渐蚕食，导致了传统保守政党的消亡，一些原本无人问津的问题反倒成了大众讨论的焦点。关于冷战的两大阵营的政治争论，摒弃了以前几十年来陈旧的思维定势，并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新的思维方式。无论前景如何，新现实主义悄然诞生了。

在这种观念巨变中，首当其冲的是一直笼罩整个战后时期直至今天的社会民主共识，以及它的重要的学术支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欧洲社会开始渐渐察觉到你国家福利体制成功的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的一代

人现已步入中年,政府的统计学家早已在提醒社会重视这一代人将来的退休金供给问题——由于退休年龄大范围提前,这一问题日益显现出它将对政府预算造成的压力。以 60—64 岁男性人群为例,在西德,在 1960 年时,他们当中有 72% 仍在从事全职工作;但是 20 年后,该年龄段的男性人群中只有 44% 在职。在荷兰,这一比例从以前的 81% 下降到 58%。

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乃是欧洲历史上有记载的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代人,用不了几年,他们便不再向国库缴纳税收,相反会开始消耗大量的财政支出——有的是以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方式直接占用财政支出,有的是通过增加对政府支持的医疗及社会服务的需要,间接对财政造成压力,这一压力与前者相比不相伯仲。此外,这一代人比前人的生活条件都更为优越,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寿命会更长。考虑到这一点,随之而来的便是失业救济支出造成的成本将日益增长——而截至 1980 年,在西欧各国,事业保障金支出一直是政府预算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536

以上种种担忧波及甚广,而且并非毫无事实根据。战后福利国家理论的成立有两个暗含的假设前提:一是经济的增长和工作岗位的增加(从而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增加)将持续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高水平发展;二是出生率将一直大大高于退休人员比例,从而为社会提供新一代纳税人做好准备,以确保他们缴纳的税收足以支付其父辈、甚至祖父辈的养老金。这两种假设现在都成了问题,但是这两者对人口的错误统计造成的错误更大。到 80 年代初,西欧的人口置换率(每个妇女生育 2.1 个孩子)只有在希腊和爱尔兰才符合或超过要求。在西德,这个数字只有 1.4。在意大利,不久还会进一步下降:1950 年,26.1% 的意大利人(每 4 个人中有一个多)在 14 岁以下;1980 年,这个数字降到 20%,即五分之一。到 1990 年,降到 15%,接近七分之一。〔1〕

在繁荣的西欧,似乎在 20 年里不会有足够的人来支付账单——而由于可靠的避孕手段和越来越多的妇女出门参加工作,使繁荣本身看来像是一场过错。〔2〕结果是使付钱的人面对更高的费用。某些地方(尤其是法国)养老金的成本和国民保险准备金早已成为就业者的沉重负担——这是在高就业率时代的认真思考。但是更直接关注的事情是国家银行的直接费用: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意大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政府债务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5%。1977 年,瑞典国民生产的三分之一用于社会性开支,这种预算性开支要么靠赤字、要么靠提高选民——就业的工人、公务员、专业

〔1〕 若不是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来的移民出生率明显上升,这个数字还会更低。

〔2〕 在东欧,正是匈牙利许多人靠“地下”经济(参见第 18 章)而比苏联集团其他地方生活水准更高,也正是在那几年里首次达到了低生育率。

人士——的赋税来平衡,而社会民主党至今还是靠这些人来达成共识的。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公共政策依赖的是已被普遍接受的“凯恩斯主义”共识。这一理论想当然地认为,经济计划、赤字财政和零失业率究其本质而言是理想的选择,而且三者互利共存,持续发展。相关评论提出了两点争议。第一点很简单,即西欧各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系列社会服务是不可持续的。第二点是,无论可持续与否,国家干预总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点在战后大多数时间内一直受到危机困扰、经济停滞不前的英国尤为紧迫。

这些批评家坚持认为,国家与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影响分离,其分离越远越好。国家不应占有生产资料,不应进行资源配置,不应实行或鼓励垄断,也不应控制价格和收入。根据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当前由国家支配的大多数服务行业——金融、住房、养老金、卫生和教育等行业——若改为私营部门,以上各项费用就不再(错误地)归为公共支出,而是由市民用其收入自行支付,那么这些行业的效率会更高。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即使运行最为完善的政府,也无法有效地处理数据,从而得出积极有效的政策:他们要做的本应是通过分析经济信息得出正确结论,而事实上他们却总是在扭曲信息。

这些观点并非首次提出。它们是“前凯恩斯”时期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的灵丹妙药,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提出。之后的经济专家们还会常常在哈耶克及其美国学生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中读到这些观点。然而,由于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 50 年代和 60 年代由需求带动的经济繁荣的影响,上述观点被普遍认为是政治上缺乏远见和经济的无政府主义而遭到废弃(至少在欧洲情况如此)。但是,自 1973 年以来,自由市场理论家又再次出现,他们十分自信,大张旗鼓地指责地方经济的衰退,抨击伴随“大政府”而来的不幸,指出税收这只手已失灵、税收带来的国家活力和动力已不复存在。在许多国家,这种雄辩的策略颇能迷惑那些年轻选民,因为他们在半个世纪前自由主义理论占统治地位时还未出生,未能亲身体会自由主义带来的不利后果。只有在英国,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得以控制政策制订,从而得以根本转变该国的政治文化。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国家中,是在英国发生了这种转变,因为尽管英国的经济受到高度控制,但在欧洲诸国中却算得上是“计划性”最少的一个。尽管英国政府不断操纵价格机制和财政“信号”;但在英国经济生活中,唯一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便是 1945 年后由工党政府首次出台的国有化政策。即使是在将“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控制分配和交换”并入政党的方针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党领导人也仅是说说而已,很少付诸行动。

英国作为福利型国家的关键并不是在于“集体主义”经济,而在于该国统一化的社会

公共机构,这些机构是在 20 世纪初由凯恩斯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进行的改革中而牢固确立的。大多数英国选民,无论他们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并不在意国家是否发展计划经济和推行国有化,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医疗免费、公共教育免费以及公共交通补贴。而这些设施在英国不尽完善——由于英国公共服务缺乏资金、公共抚恤金不足、住房条件差,这样建立起的福利国家,耗费的成本当然比别国低——但它们被视为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无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对这种社会产品的低效性抨击得多猛烈,它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仍不可动摇。

英国现代的保守党领导人,从温斯顿·丘吉尔到爱德华·希思,都积极拥护英国的“社会契约论”,就像工党中凯恩斯学派“社会主义者”一样满怀热情,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中间立场(毕竟是丘吉尔早在 1943 年 3 月时就说过,“对任何国家来说,没有比给婴儿喂牛奶更明智的投资了”)。1970 年,爱德华·希思曾在伦敦附近的塞尔斯登公园召集一帮自由市场主义拥护者,讨论下一届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自由市场主义者提出的建议都不温不火,希思坚信自己的信仰,尽管他的说法看似模棱两可,他仍果断地与他们辩论,结果博得的却是大家的嘲笑。他们指责希思寻求的是“尼安德特人的”原始主义丛林经济,于是“塞尔斯登人”希思匆忙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如果说英国这一政治共识在之后的 10 年中渐渐瓦解,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遇到障碍,而是由于历任政府均未能制定并实施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英国的经济悲剧源于长期投资不足、管理不当、地区性工人工资纠纷和分工纠纷,从这一点出发,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都努力消除英国工业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代之以与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相一致的计划经济——在英国被称为“价格和收入政策”,是别具特色的经验主义最低纲领。

他们都失败了。工党政府没能重新设置工业秩序,原因是工业联盟中的出资人们更喜欢 19 世纪风格的在工厂车间里的对抗——这样他们获胜的机会更大——他们不喜欢在唐宁街谈判后签订的契约在未来数年内对他们的约束。以 1970—1974 年的爱德华·希思政府为代表的保守党,由于英国某些部门的工人阶级中——主要是煤矿工人——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不愿与托利党政府做出任何妥协,更难以取得成绩。因此,当希思首相在 1973 年提出关闭部分亏损的煤矿,试图通过法律限制工会发动工人暴动的权利(这一权利首先由工党政府制定,几年前又由其废除)时,遭到了一连串罢工热潮,希思政府也遭到重创。希思提出由竞选来定夺,他自称“国家的经营者”,却以极微弱的劣势败给了哈罗德·威尔逊,一个行事谨慎、不轻言辩护的工党党人。

只有在 1976 至 1979 年由威尔逊首相的继承人、工党的詹姆斯·卡拉汉执政期间,新政策才开始出现。当时国内形势令人绝望,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的一项贷款又遇

到了苛刻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卡拉汉和当时的财政大臣(令人尊敬的丹尼斯·希利)决定放弃战后英国政府一直视为灵丹妙药的方针政策。他们开始着手进行一项改组计划,该计划承认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必然存在;通过在保护技术工人权益的同时,允许但不鼓励少数自发的、无组织的兼职雇员的存在,因为这种做法能减少社会转移支出和劳动成本;不惜以经济发展艰难、经济增长缓慢为代价,着手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支出。

然而工党政府从未公开承认执行过上述措施。工党政府在其执政期间,始终坚持其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的各种福利制度。甚至是在他们严密策划、试图秘密进行一系列前人无法通过立法公开进行的改革期间,他们的基本立场也没有动摇过。但是,他们的策略失败了:工党非但没能因其取得的成绩而受到好评,反而失去了许多支持者。到1977年8月,英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160万人,并且还在持续增长,部分原因是工党政府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第二年,也就是在英国历史上有名的1978年至1979年间的“不满的冬天”,英国各大工会出于愤怒、纷纷组织工人罢工,向他们“自己的”政党、政府抗议,罢工范围甚广,以至连垃圾和尸体都无人处理。〔3〕

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本人却显得无动于衷:在回应记者提出的关于工业部门日益严重的动荡局面的问题时,他轻松地宣布说,大家无须担心。于是就有一个著名的新闻标题诞生了——“危机? 什么危机?”——正是这一讽刺性的标题“帮助”他在来年春天的大选中败下阵来。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9年大选中,工党一直在声明,工党政府从未因为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而引起社会危机——事实恰恰相反——新任保守党女领导人则坚信,由于英国社会混乱不安,需要的正是这种激进的政策。

从表面上来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是她将扮演的这个革命性角色的合适人选。她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安静的乡间小镇格兰瑟姆。父母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经营一家杂货店。她向来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父亲作为保守党人而在当地的市政府里有一席之地。年轻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攻读化学专业,并且在读书期间担任过大学里的保守派社团主席。1950年,25岁的玛格丽特作为全国年龄最小的
40 候选人,代表保守党参加大选,但是未取得成功。她先是从事化学专业工作,后来成了一名职业税务律师。1959年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代表的是保守党盛行的芬奇莱选区,直至1992年进入上议院为止。

〔3〕 其中表现得最为愤怒的是公共服务部门,其中包括从清洁工到护士的一系列低收入政府雇员。主要的工业联盟对卡拉汉削减政府支出的政策是持积极态度的:只要工党政府保证保护产业技术工人的权益,保证他们的特权不被侵犯,工业部门的领导者们就乐意支持政府的政策改革。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撒切尔夫人不买他们的账。

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希思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担任教育部长,为缩减预算,她废除在学校免费供应牛奶的政策:正是这一决定(尽管是无奈之举)给她带来了“牛奶贼玛吉·撒切尔”的绰号,并首次预示了她未来政治生涯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个决定为撒切尔夫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阻碍她的发展——她努力挽回负面形象的精神,不仅没有招致同事的不满,反而成了她的魅力之一。因此在英国,她以教育部长而闻名,直到1975年她击败保守党内多位资深人物,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毫无疑问,她魅力十足。确实,在欧洲和美国,私下表示认为撒切尔夫人性感迷人的政治家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此有所了解,曾形容她有着“卡里古拉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的嘴唇”。她的强硬手腕比得上丘吉尔以来任何一位英国政治家,同时她也懂得使用温婉的说服策略。1979至1990年间,玛格丽特·撒切尔强硬攻势和温和战略并用,一次次说服广大英国选民和她一起进行政治革命。

“撒切尔主义”代表了多种概念:削减税收、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爱国主义、“个人至上”。其中那些经济政策是保守党和工党早已广泛讨论的经济提案的延伸。其余各项,尤其是与“道德”主题相关的,更多的是被保守党成员们所接受并坚决实行,而一般大众选民并不热衷。这些观念紧随着60年代的反自由主义热潮而出现,与工人阶级和中低阶级中的撒切尔夫人支持者的观念相一致,由于近年来在公共事务中知识分子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这些支持者从未真正地感到心里舒服过。

但最能代表撒切尔主义的实质的是“打破国家干预”。英国提出的“不可统治性”是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即政治阶层已失去控制能力,他们不但无力制定经济政策,甚至对工厂和社会秩序也束手无策,到70年代末,关于这个观念的讨论日益增多,担忧重重。工党一直被指责无力掌控经济,在“不满的冬天”之后,更被斥为毫无执政能力。他们在1979年的竞选中,在大力宣扬其发展经济的实力和合理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努力营造值得信任的领导人形象,以迎合社会的需要。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次竞选获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从来没有能够在事实上赢得很多选票。与其说是保守党赢得了选举,还不如说是由于工党的支持者要么改投自由党候选人,要么干脆弃权,致使工党输掉了大选。从这个角度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制定的激进计划以及努力实现这些计划的决心源自于她的民族使命,这是一项出人意料、甚至是风险重重的举动,亦即与英国一贯坚持的尽可能向政治中心靠拢的传统统治方式相背离。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这便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成功的关键。即使在货币政策失败的情况下,她仍坚持不动摇。(1980年10月,保守党成员们请求她改换战术,在政策上采取

180度转变,她的回应是:“你们若要转变,随你们的便,首相不变。”)她欣然接受了苏联人给她的“铁娘子”的称号;从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阿根廷军事集团,到英国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她挫败了一连串对手,得意洋洋;在欧共体诸位领导人面前,她挥舞着手提袋,愤怒地高呼“还我们钱来”。以上种种,表明她早期的政治资本正是她顽固的作风和永不妥协的处事方式,这也正是她的批评家对她表示愤怒的缘由。每一次民意测验都显示出,即使不关心撒切尔政治方针的人,也常常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是很欣赏撒切尔夫人本人的。英国又一次被“统治”了。

确实,玛格丽特·撒切尔宣扬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并亲自主持实现了英国社会的复苏,成绩斐然,但又有些令人泄气。在管理方面,她是一个典型的集权主义者。为确保她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执行,她不断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减地方政府的预算(1986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废除英国的大都市政府,将管理权力收归中央,而欧洲其他国家此时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则是地方分权)。教育政策和地方经济计划改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由于首相不再像往常一样依靠广大高级公务员,而主要依靠其少数几个亲信,所以政府部长们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直觉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她不能相信政府机构内部的高级公务员们(这一怀疑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同教育界和司法部门的公务员一样,都更倾向于传统的家长式统治。英国政治向来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玛格丽特·撒切尔出身于下层中产阶级,代表新富裕起来的一批商人,并未受到政府中贵族统治阶级的青睐,因此她用“利益”来对付“情感”。她对传统和旧惯例的无情批判令老一辈托利党人瞠目;在私有化热潮中,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曾指责她出卖“家产”。她的保守党前辈爱德华·希思曾愤怒地将一个腐败的英国商人的名气很响的几家企业称作“资本主义的难看的脸”,因为他本人十分反对撒切尔夫人及其政策。撒切尔夫人对此始终耿耿于怀。

这场撒切尔主义变革使国家得到了巩固,也改善了市场规划——同时又让国家和市场之间脱离了紧密联系。撒切尔通过立法限制工会领袖发动工人罢工的权利,并通过法庭切实地实施这些法律,从而永久性取缔了英国工会的社会影响力。在1984年至1985年间,由于撒切尔政府颁布政策,关闭非营利煤矿、停止对煤矿工业的政府补贴,遭到了全国矿业工会的激烈反抗,引起了一场颇具代表性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撒切尔态度坚决,彻底平息了这批穷途末路的工业无产者的抗议。

这些矿工缺乏正确领导,对他们的事业毫无信心,他们的罢工之所以得以持续,与其说是出于精心部署,不如说是出于绝望。爱德华·希思没能完成的使命(这是后来的工党政府领导人努力回避的难题),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做到了,凭这一点巩固了她的统治——正如这场罢工中,临时爱尔兰共和军企图暗杀撒切尔夫人未遂,反而增加了她的威

信。与所有成功的革命家一样,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对手相比是十分幸运的。她集各种功劳于一身:代表了被压迫、被过分管制的普通大众的利益,将他们从不劳而获、占尽既得利益的社会主导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毫无疑问,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除了初期的1979—1981年间的短期经济下滑,英国经济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淘汰了一批亏本企业,提高了产业竞争力,重组了工业联盟,企业的生产率大大提高,经济利润显著增长。出售国有资产的(一次性)收入补充了国库库存。这并未包括在撒切尔夫人制定的1979年计划之内,私有化本身原本也并没如此多地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毕竟是工党政府在1976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出售了英国石油公司的全部国有股份。但是到1983年,清算国有和国有资产所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促成了撒切尔夫人未来10年的政治资本:“解放”生产者,同时“解放”消费者。

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被划入了私有化的范围。首先是小企业、小团体(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私有化,政府对这些小企业、小团体的兴趣并不大。之后紧接着便是“国家”垄断行业,例如电信业、能源、航空业,它们的私有化以1984年出售英国电信集团公司为开端。政府还出售了大量国有的战后公共住房股份:起先是出售给现在的房屋居住者,后来又出售给所有的人。在1984年到1991年间,仅英国一个国家的私有化的资产金额(按价值计算)就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

尽管国有部分明显减少,而且撒切尔夫人也曾承诺“国家不再是人民的负担”,但与 543 10年前的数字(42.5%)相比,英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却基本没变(41.7%)。这是因为保守党政府不得不支付巨大数目的失业救济金,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1977年卡拉汉执政期间,失业人数曾达到160万,从而导致政府垮台,成为一时的“丑闻”,而到1985年,失业人数已达325万,这一数字在撒切尔的任期内一直是欧洲最高的。

许多生产率低下(而且以前大多接受政府补贴)行业的工人,例如钢铁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造船工人,他们失业后便再也找不到工作,只有终生靠政府救济生活。如果他们以前的雇主通过私有化将公司转变成盈利的私有企业而保留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在钢铁行业尤为常见),公司重新盈利与其说是私有化创造的奇迹,不如说是撒切尔政府通过失业救济将过剩劳动力的成本“社会化”,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关于公共产业和公共服务业的私有化的问题,多年来,公共部门占有许多重要的经济资产,但从不考虑加以投资利用、更新换代。这些行业自己紧缺资金,它们受到的来自竞

争和消费者的压力已被大大减轻,他们的管理者已被官僚主义和政治干预腐蚀。〔4〕在撒切尔夫人的努力下,英国的产品市场、服务市场、最终还有劳务市场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选择多了(尽管耗时较长,多样化的选择也不尽完善),价格竞争也更加激烈。当她的继承人约翰·梅杰将英国排除在欧盟条约的“社会章节”之外时,雅克·德洛尔指责他将英国变成了“外资的投资天堂”——对于这一“罪名”,撒切尔夫人更当之无愧,而且她还会欣然接受。

作为一个经济体,撒切尔夫人统治下的英国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国家。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英国遭受的是彻底垮台,造成了长期的灾难性后果。轻视国有资源,进而消除国有资源,宣扬个人主义,清除不良资产,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这些举措对英国的公共生活体制造成了严重伤害。市民变成了股东,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变成了资产和所有权的关系。从公交公司到电力公司,随着它们的私有化,公共生活的步伐市场化了。

如果真是像撒切尔夫人所断言的那样,根本没有“所谓‘社会’之物”,那么人们终有一天会不再重视社会产品。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铁娘子”一直很推崇美国模式,但之后撒切尔主义统治下的英国渐渐表现出的更多的是这种模式不良的一面。仍由国家掌控的服务部门资源紧缺,但在那些已经“被释放出来的”经济部门,财富却大量积聚——这一现象在伦敦金融城尤为明显。1986年,英国政府开始放开金融市场,并让其加入到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去,引发了一场金融“大爆炸”。在这场“大爆炸”中,伦敦金融城的投资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聚敛了大量财富,公共部门领域严重遭到忽视。随着贫困人口的日益增加,轻微违法犯罪现象日趋频繁。私人富裕的实现常常伴随着公众贫穷。〔5〕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威信也是有局限的。典型的“撒切尔主义”拥护者们曾被幽默地讽刺为是一批30岁左右、生活在伦敦东郊的房地产经纪入,他们受过的教育不多,却享受高额报酬,物质生活丰富(享有房子、汽车,还能出国旅游,持有公共基金,并制定了私人养老金计划),这些是他们父辈梦寐以求却从未享受过的,因此,他们的生活可算得上是进入了撒切尔特色的个人主义社会。但尽管是在所谓的个人主义社会,他们和家人仍要依赖国家为其提供许多重要服务:义务教育、免费医疗服务以及交通补贴。因此,当撒切尔夫人及其继承人约翰·梅杰暗示政府有意实行国民卫生保健服务私有化或是国家教

〔4〕 1996年(其存在的最后一年)英国的国有化铁路系统以在欧洲范围内接受最少政府补贴为“特色”。正是在那一年,法国在计划向铁路投资人均21英镑;意大利是人均33英镑;而英国只有人均9英镑。

〔5〕 以及私人的贫穷。撒切尔夫人打破了退休金与工资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广大市民退休后的收入大大减少。到1977年,英国的公共养老金只占平均工资的15%,这一比率在欧盟国家里属于最低。

育开始收费,公共支持便瞬间蒸发了——放弃支持的那些人正是新富裕起来的、但基础仍很薄弱的撒切尔主义的首批拥护者。

撒切尔夫人离任5年后,约翰·梅杰成功实现了铁路服务的私有化。保守党又一次受到鼓舞,对公共资产私有化的利润前景充满信心;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梅杰需要找出可以私有化的东西,让大众看到私有化的好处——私有化是保守党唯一的计划,而那时所有可供私有化的部分几乎都已被撒切尔夫人转化完毕。但是,私有化过程中的不规范、不合法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最大的灾难是一连串明显可以避免的火车车祸——不仅导致了两年后保守党政府的下台,而且结束了一轮又一轮的私有化进程,同时结束了对极端化了的撒切尔主义本身的批判。

玛格丽特·撒切尔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中就包括她自己所在的保守党。当这位铁娘子结束对保守党的领导时,保守党——近一个世纪来英国“天生”的执政党——已经没有了计划,没有了领袖,在大多数人眼中,保守党也失去了灵魂。对一位带领她的政党连续3次获得大选成功、执政长达近12年的女士来说,这个评价无疑是苛刻的。但这个评价确实指明了重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执政是独裁统治。用腓特烈大帝的话来说:“人民的声音代表的是他们的意愿,而我则是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在重大事件上,凡有人与她政见不同,便会遭到孤立,受到排挤。 545

不用说,保守党内的老一辈政治家都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撒切尔的势力一旦强大,他们便遭到了排挤。她的许多保守党同时代人也都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清楚地记得两次大战之间的政治分裂和阶级斗争的悄然兴起。撒切尔夫人是个激进主义者,一心进行改革和创新;她鄙视妥协。在她眼中,合乎时宜的阶级斗争正是政治的内容所在。与她的目标相比,她那些常常是突发奇想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是第二位的;而这些政策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她的行事风格。撒切尔主义主要是关于如何执政,而非具体做些什么。她之后的保守党领导人面对的是撒切尔主义之后的萧条的社会,他们没有政策、没有目标、没有自己的风格,十分不幸。〔6〕

也许我们可以谴责玛格丽特·撒切尔毁了保守党,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她挽救了工党,使工党获得新生。当然,从短期来看,她无情地打击了她的工党对手——其实,要不是工党领袖们如此无能,撒切尔夫人也不会取得她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在1979年时,尽管工党领袖深知他们面临的处境,但他们既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也无法争取到更多

〔6〕 在撒切尔夫人离任后的10年中,她的保守党继承人一代不如一代:从约翰·梅杰的死气沉沉、单调乏味,到威廉·海格盲目自大、毫无能力,再到伊安·邓肯·史密斯的彻底无能、愚蠢至极。在漫长的太阳女王统治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无能之辈的轮番统治。

的支持者。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工党的发展过程中动荡不断。工党好战、集中的党风使其在看待问题上和撒切尔夫人很相似,但是从不同的立场:英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选择保护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国家调控,要么选择开放性市场、自由竞争、私有资源以及最小限度的公有产品和服务。

工党中的传统分子向来态度温和,他们和保守党中的传统分子一样,满怀绝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前欧洲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为代表——退出了工党,自行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这个新成立的党派存在时间很短,后来与英国第三大政党自由党合并。但大多数人尽管忐忑不安,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他们怀有的悲观主义根深蒂固。工党领导人迈克尔·富特聪明睿智、魅力十足,但却缺乏政治头脑。在他的领导下,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厚颜无耻地推出一项与时代不符的竞选计划,不仅企图推翻撒切尔主义,还企图否定以前的工党政府曾做出的让步。英国可能会退出国际经济舞台(并且从此不再坚定不移地追随他的盟国美国)。不会再在私有化、开放市场,“欧洲”或其他盟国方面做交易。他们这些左翼英格兰小市民企图躲在封闭经济的围墙中,不顾别人的反对和指责,一意孤行,以最终建立起新耶路撒冷。

工党的国会议员都垂头丧气,其中一位议员将工党1983年的竞选宣言简洁地概括成“历史上最长的自杀遗书”,事实证明这一描述是很有预见性的。在福兰克群岛战争中,撒切尔夫人利用“爱国主义精神”统一全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再一次展示了她摆脱困境的超凡才能,[7]在这次胜利的鼓舞下,她以压倒性优势一举取得1983年大选胜利。工党失去了300多万选民,失掉了议会中的160个席位。在这次大选中,工党仅获得27.6%的选票,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工党取得的最差成绩。撒切尔夫人所宣扬的是否恰好是英国人民所需要的,这一点至今仍不明朗(保守党的得票率并未增长);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民不想要工党提出的计划。

工党历经14年,在3位不同的领袖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从1983年的失败中重新站了起来。在政治上,工党要努力摆脱托洛斯基的影响,在(以利物浦为代表的)工党的大本营地区消除“极”左激进主义分子的影响。在社会观念方面,工党需要改正以前的错误观点,努力在思想上与新中产阶级保持一致,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了解他们的需要,因为新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工党(和各社会民主党)一直依赖、现在却日益萎缩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公共部门的雇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工党是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的。在政策方面,工党领导人需要制定一系列全新的政策目标——并且对它们重新做出解释。

[7] 1982年5月14日,撒切尔夫人在苏格兰保守党大会上表示:“当你天天处理诸如环境等等的乏味问题,处理了大半个政治生涯,这时,一个巨大的危机突然降临到你身边,反而会让你兴奋不已。”

到90年代中期,上述目标已全部实现——至少表面工作做得很好。1996年,工党改名为“新”工党,一年后,它的未来领袖托尼·布莱尔说服党内其他领导人,废除了颇具争议的第四条党纲,解除了工党的国有化的义务。1997年,工党终于全面打败筋疲力尽的保守党,再次掌权,这时的工党已经不再提起关于反对撒切尔主义革命的话。新工党在竞选中努力争取“易动摇的”保守党支持者这一小部分人,猛烈抨击高税收、腐败和低效率——这些正是上一时代撒切尔夫人精选的攻击目标。

如果说托尼·布莱尔和他的同僚也都选择谨慎地对待撒切尔执政的时期,对其避而不谈,那绝不是巧合。前后3任工党领袖对撒切尔夫人(现在已经是女勋爵了)的精神的不断继承和发扬,这正是布莱尔成功的关键。第一,撒切尔夫人使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公共部分的激进政策改为“正常化”,并代之以“私有化”,使英国社会充满企业家精神,这些都是布莱尔所大力赞扬的。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撒切尔夫人彻底打败了老一代工党,为新一代工党成员改革工党创造了条件:布莱尔只不过是继承了前人改革的成果。第三,正如我们亲眼看到的,撒切尔夫人毫不容许反对意见,她冷酷无情,这一作风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使保守党失去了广大选民的信任。 547

托尼·布莱尔紧跟撒切尔的路线,也接过了她的许多偏见,但是不像她那样生硬粗暴。他像她一样,强烈地讨厌陈旧的政治语言。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要避免一切关于“阶级”的话题,使这种老式的社会范畴在新工党的语言里以“种族”或“性别”来取而代之。布莱尔像撒切尔夫人一样,几乎不能容忍非中央化的决策或者内部的反对意见。他也像她一样,宁可让身边都是私营业主。〔8〕而新工党虽然仍旧模糊地对“社会”负责,但是布莱尔的领导层就像撒切尔一派的核心原则一样,对“国家”始终本能地抱着深深的怀疑态度。

因此,这就是衡量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取得的成绩的尺度。她不仅摧毁了战后的共识,而且造就了一种新的共识。在她上台执政之前,英国公共政策中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国家是合法性和立法权的天然源头。而当她退出政治舞台时,这种观念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即使在英国国内与国家关系最深的工党的观念上也是如此。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国家的作用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讨论,但是越来越少听到为它辩护的声音,至少在主流政治圈子里是如此。当然,仍然有人继续认为,撒切尔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仍然希望回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直接管理(即便不是在生产公有制的条件下)。但是根据撒切尔夫人的观点,需要的是造成这样一种情况——除了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核心社会商品

〔8〕或许他们之间的差别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相信私有化属于道德的善;托尼·布莱尔只喜欢富人。

需要郑重考虑之外,其他方面就不再保证能听到同情的声音。

有时候会有人指出,撒切尔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环境情势总会推动英国走向“撒切尔式的”方向:战后的社会契约早已枯竭。或许是吧。但是即使回顾起来,也很难说有谁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扮演了掘墓人的角色。应该承认她操作这场变革的规模是很大的,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任何一个人,若他在1978年的英国睡着了,20年后醒来,他们的国家确实会变得很陌生了——完全不像它旧日的模样,而且与欧洲其他国家也相当不同。

在这些年里,法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着一些相同的结果。然而在英国,战后共
548 识的核心命题是由右派的革命粉碎的,而在法国,却是非共产主义的“左派”的复兴和转型打破了它的政治模型。多年来,法国政治一直因为左翼的共产党和右翼的戴高乐主义者的相互平行和对立而受到束缚。共产党和戴高乐主义者都与他们下级的伙伴们一起,忠实地具体化和扩展了一种奇特的法国式政治效忠的传统,这种政治效忠是由区域、职业和宗教决定的。

严谨而且刻板的法国政治社会观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未受到损坏,但是现在,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受60年代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影响而使它陷入重围。左翼再也不能依靠无产阶级的集体选举,右翼也不能指望戴高乐本人和他的光环了,戴高乐于1970年去世。法国的政治保守性的最基本措施——保守的投票者倾向于奉行天主教——正在受到破坏,公众信奉宗教的人数下降,因为村庄里和法国小城市的教堂里的教区居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都被吸引到大都市去了。

但是更加深刻的变化也正在它的进程之中。传统的法国社会和旧有的生活方式被饱含感情地描述成多种多样的说法——“源远流长的法国”、“甜美的法国”、“美好的老法国”、“永恒的法国”,等等。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在法国人看来,这种传统社会正在从眼前消失。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民们的儿女们迁徙到城市,不断地使法国农村变得日益干涸,人口越来越少。复兴的国民经济影响着工作、旅游方式、一个新的城市居民阶层休闲时光的转变。几十年来长满了野草、积满灰尘的道路和铁路经过重建,重新规划,或者完全被一种全新的全国交通网代替,长期以来由于缺少投资而逐渐变得陈旧的市镇和城市也在变得拥挤和充满活力。

法国人对这种变化速度并不总是感到舒服,于是出现了一些政治运动,抗议社会生活的加速化、都市化、城市的发展和乡村人口的减少。60年代的遗产之一,即人们重新对本地和区域的语言和文化感兴趣,似乎威胁着法国本身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在感到恐惧的同时代人看来,他们的国家似乎正在因为现代化而突然变得四分五裂。但是国家高居在

冲突之上。在英国,一个囊括一切的国家和一个低效率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对此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不屑一顾——在许多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法国,是国家政权本身掌握着这个国家经济复兴的关键。经理们是这个国家里知识分子的精英,规划者们把自己看成不受国家短暂的意识形态激情和社会腐败的影响的无私的公仆。法国政治在谁会掌权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社会目的等等问题上使国家令人不愉快地造成分裂,但是在如何使用手中权力的问题上却有着明显讲究实际的共识。 549

自1958年至1969年,法国由夏尔·戴高乐统治。这位总统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传统风格,以及他公开宣称不关心经济规划细节的态度,都没能阻碍变化的发生。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为适应这位具有领袖魅力的军事独裁者的需要而产生的半独裁式的宪法的伪装下,法国开始了现代化,而这样的现代化带来了一些混乱现象,于是引发了1968年的抗议——究其原因,是守旧的家长式权威与不稳定的社会变化的混合导致了这些抗议的发生。

戴高乐的反对者和批评者们过分夸大了这位将军获得和行使权力的“不民主的方式”——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65年发表的小册子里称之为“永远的政变”——但是这种实际上不受限制的总统权力的资源和诱惑,对来自各个政治领域的后继者来说同样具有吸引力。这种与众不同的直接选举总统的体制,给全国五年一度的议会选举投下了阴影,鼓励了候选人的个人政治技巧和性格,而政治党派必然是围绕这些候选人而重组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名不虚传的密特朗胜出了。

弗朗索瓦·密特朗像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对于他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来说,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候选人。他出生于法国西南部一个保守的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政治态度右倾的法律系学生,而且是那个年代里一些最激进的反民主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维希傀儡政府里担任低级雇员,后来又适时地改变了他的效忠对象,为的是以抵抗者的身份在战后取得人们的信任。他的议会生涯和内阁生涯是在中左派的许多小党派内部度过的,这些小党派没有一个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

在1965年的大选中,即使是在左派政党的支持下,他没有成功地当选为总统,而他也绝不是他们需要的候选人,他刻意跟他们保持距离。直到1968年,旧的社会党内部分裂,而且在1968年的大选中失利,密特朗才开始着手策划他在社会党复兴中的角色——他在1971年发起了接管运动,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密特朗为领导的新社会党,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被招募来为他服务。

密特朗和使法国社会主义自豪的残余遗产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利用。这个政党需要密特朗,他在1965年的总统选举中表现良好,保证了27%的注册投票者的支持(其中包括

东部和西部的许多保守派分子),迫使戴高乐进入最后一轮选举,这些情况都显示出他是个竞选的赢家——早在1967年的一次议会选举中,密特朗的竞选徽章和照片就卖得很好。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电视化政治、个人化政治的新时代——正像圣艾蒂安的市长米歇尔·杜拉弗在1971年沮丧地说的那样:“法国只生活在对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期望中。”密特朗将会是左翼的王牌。

反过来说,密特朗也需要社会党人。他曾经任职于第四共和国的政府,所以他的名声因其妥协和丑闻而受到很大影响,他缺少一个自己的组织,因此这位杰出的机会主义者既利用社会党把自己重新包装成忠实的左派分子,同时又能够避免接触旧左派所负担的那些沉重的教条包袱。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宗教信仰:“我生来是、毫无疑问到死也会是基督教徒,但是同时……”用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话来说,他也许想说他生来是、而且到死也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同时也能够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这种便利的结合,所起的作用要比任何一个党派原来想象的都好。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党进入最后的衰落时期,而法国的社会党却站在巨大成功的边缘。法国左翼多数党再次复兴有两个并存的障碍,其一是戴高乐个人的影响力,其二是许多投票者害怕左翼的政府将会被共产党人控制。到1970年的时候,戴高乐已经去世了,10年之内共产党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密特朗从前者得不到任何直接的好处,但后者毫无疑问是他的功劳。

密特朗承认这种必然逻辑,他缺乏真正的社会党人前辈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细态度。起初他使新生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结盟;1972年,在一个措词含糊的、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下,他与共产党人结成了一个选举联盟。到1977年选举的时候,共产党——自1945年以来一直主导左翼的政党——已经比密特朗的社会党落后了10%的票数,到那个时候,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才意识到,把共产党的命运与密特朗的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社会党联系在一起是个错误——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欧洲共产主义”普遍的乐观主义影响——但是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在1974年的总统选举中,密特朗的表现在1965年的基础上又有了改进。作为已经统一的左翼的候选人,他只以很少的票数之差输给了吉斯卡尔·德斯坦,在那个时候,密特朗已经筑成了一个极好的选举机器,把社会党的主张变成了一种全面的社会运动,吸引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天主教徒、妇女、农民和小店主,在这之前,所有这些人都在社会党怀有敌意。^{〔9〕}他的形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成熟:1981年的春天,在全法国范围内,巨大的竞选宣传牌以“软焦点”的形象展示密特朗的肖像,背景是永恒的乡村田园

〔9〕 根据1979年的民意测验显示,密特朗的社会党的竞选纪录非同寻常地反映出全国的民意,使其他政党都望尘莫及。

景色,向选民承诺“平静的力量”,这种背景曾在贝当时代的宣传牌上出现过并受到青睐。

与此同时,共产党变得软弱无力——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使法国共产党陷入极大的尴尬境地,他们的票数也一落千丈。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共产党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天空里固定不变的明星了:它的威望同它的票数一起瓦解了,甚至在巴黎工业区的“红色地带”——从20世纪中叶起,共产党就一直在那里占主导地位——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如此,马歇还是决定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一部分是出于习惯,一部分是出于自信,但更多的是由于愈来愈意识到有必要让共产党摆脱它的社会党伙伴的有毒的怀抱。

在1981年总统竞选的第一轮选举里,两位保守党的候选人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年轻的雅克·希拉克的票数都超过了密特朗和马歇(后者仅赢得了12.2%的选票)。但是在两个星期后的最后一轮选举中,这两位最有优势的选举人中的密特朗获得了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环境保护论者,甚至是平时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票数翻了一倍还多,击败了吉斯卡尔,成为欧洲第一位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社会党人国家元首。他立刻解散了议会,并且召集了立法的选举,他的政党痛击了共产党和右翼,在国民议会里为自己赢得了绝对多数。至此,社会党人已经完全控制了法国。

迎接社会党的胜利的自发庆祝是史无前例的。对于在街上手舞足蹈的成千上万名密特朗的支持者来说,这是“盛大的夜晚”,是革命的前夕,是与过去断然决裂的开端。仅以选举数据而论,可以说是个奇怪的现象。就像在过去的选举中的跌宕一样——密特朗的成就立即被与1936年4月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或者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选举作比较——1981年的法国大选并未经历彻底的力量重新配置,尽管事实上在1981年的最初一轮投票中,密特朗实际上遭遇过比他在早期1965年和1974年竞选总统时更糟的情况。

造成这种不同结果的是左翼选民在这一次表现出来的纪律性,他们在第二轮选举的时候,在密特朗身后联合起来,而不是固守宗派的偏执,与此同时,右翼却产生了意见分歧。在1981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给希拉克的人中,16%的人在第二轮中投给了密特朗,而不是重新选举性格外向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他是希拉克阵营里的戴高乐主义派的支持者们非常讨厌的人。如果右翼没有这样分离,就不会有密特朗总统,没有接下来立法选举中社会党的大获全胜——也没有了带着巨大期望的“盛大的夜晚”。

这一点很值得强调,因为似乎有太多的事情有赖于1981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在回顾选举过程的时候,密特朗自己也明白,他在1981年的成绩是为了使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权交替过程“正常化”,使社会党有可能被当作政府的正常组成部分来对待,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1981年密特朗的支持者来说,情况看起来非常不同。他们的目标不是为

了使将来的权力交替正常化,而是现在马上就抓住权力并且利用权力。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领袖很有希望进行巨大的变革,会努力扫除不仅仅是吉斯卡尔年代的腐败和厌倦,还有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被排除在法国政局之外这么长时间的法国社会党斗士一直做着革命的美梦。

左翼在法国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行使权力了;确实,它在行使权力时总是受到同盟伙伴、不合作的银行家、外汇兑换危机、国际紧急事件和一长串别的理由的阻碍,最终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失败。在1981年,这些因素似乎都不适用了,也没有了后退的理由,此外,控制国家政权与实现革命性的变革相结合是如此深深地印在法国激进的政治文化中,以致仅仅是赢得选举这个事实就被当作一场将要到来的社会对抗的象征。

像马克思本人一样,法国左翼把真正的变化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等同起来,有人曾充满热忱地将其与1871年、甚至是1791年作比较。密特朗在竞选中所说的话并没有让他的跟随者中比较忠心的那一部分人想到别的方面。为了“欺骗”共产党和他自己党派中的左翼,密特朗盗走了它们的革命外衣。他的竞选唤起了对他的期望,现在是他实现这种期望的时候了。

因此,密特朗的时代是以一个富有野心和激进的时间表开始的:道德的提升,迟到的社会改革(其中取消死刑的意义最为重大),混合着一个变幻不定的“反资本主义”立法的计划。工资有所提升,退休年龄降低,工作时间缩短了。但是这个计划的核心成分是史无前例的国有化进程表。在任职期间的最初几年中,总理皮埃尔·莫鲁瓦的新社会党政府把以下企业纳入国家的控制——有36家银行,2家大的贷款公司,5家法国最大的工业公司(包括汤姆逊-布朗特这家法国电器和电子产品的主要制造商),还有法国大型钢铁集团与齐诺尔公司和萨西洛尔公司。

在这些活动的背后,没有提前制订好的经济策略。曾经有过讨论,提出通过注入政府资金来激活正在放慢的法国经济,但这不是一个新主意,也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早在70年代中期,希拉克总理曾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同样搞过类似的计划,想以需求为导向来实现增长。1981—1982年的国有化以及相伴随的汇率控制的主要功能,就象征着这个新政权的反资本主义的目的,并且以此来证实1981年的选举是真正地改变了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变换了政府的人员。

53 实际上,关注这些事情的人从一开始起就明白,比如说,国有银行只有获准“完全自主的决策和行动”才可以发挥功能,因此就取消了调整的和社会再分配的目标,这些目标原本是用来证实他们一开始的接管就是正当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妥协阐释了密特朗改革面临的更广泛的阻力。一年来,这个新政府大胆地向法国和世界展示了它激进的一面。一开始时,这一点颇有说服力——根据密特朗的亲密顾问雅克·阿达利的记录,美国官员

们(他们总是关注着这种倒退现象)声称说,法国和苏联的经济政策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对法国来说,1982年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意味着强加了汇率控制,还强加了一整套规则,把这个国家与它的商业伙伴们断绝开来,把经济放在自给自足的基本点上。把法国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脱离出来或许本来不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1977年,仅美国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市场资本化就相当于整个“巴黎证券交易所”交易额的两倍。意义更重大的事实是,这样的动向可以导致法国同欧共体产生隔阂,甚至从欧共体中分裂出来,由于它们之间在关税、市场、流通货币联盟方面都是达成过共识的——更不用提实施一个统一市场的计划——那么法国的状况已经严重地限制了对会员国开放的特权。

这些考虑好像引起了密特朗的重视——毫无疑问,铁证如山,商业领域日益增长的恐慌,还有迹象表明货币、贵重物品还有人们正越来越急切地移往国外,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在眼前。1982年6月12日,这位总统决定进行180度的大转弯。密特朗拒绝了更加激进的议员的建议,他授权他的政府冻结价格和工资达4个月之久;减少公众支出(在前些年总体有所增加);增加税收;优先对付通货膨胀(而不是印刷纸币,尽管他被催促这样做)——这实际上是采纳了保守经济学家雷蒙·巴尔的经济策略,根据他的从没实施过的1977年“计划”,本可以提前给法国引进一剂撒切尔主义药方,而且毫不犹豫地抛弃“通往社会主义的法国道路”的一切可能。

这位总统的共产党盟友和他的一些社会党同事都非常震惊,但是他们原本是不应该感到惊奇的。密特朗这位实用主义至上的人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东西,如果法国考虑到底是选择继续呆在西方经济(和政治)的轨道上,还是把自己抛到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并不一定能持续发展的中间道路上,那对法国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他总是把过去必须做的事情装成出于好心做的,又适时地把自己塑造成一名主要的“欧洲主义者”。法国通过欧洲的统一,而不是去和它对抗,就能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不与资本主义对抗,会创建一个出众的国家。

到1984年的时候,密特朗已经撤掉了他政府内的4位共产党部长;他公开声称“混合”经济的优点;他任命一位年轻的技术官僚洛朗·法比尤斯担任总理;他把经济事务、金融、预算的管理权交给雅克·德洛尔,并且指示他要稳定法国经济;〔10〕甚至在那一年的4月份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密特朗号召实现“美国式”的法国现代化。

〔10〕 德洛尔原先是银行家,一度担任过戴高乐派总理雅克·夏邦-戴勒玛的顾问,他将会在1985—1995年继续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

密特朗让法国站到了他这一边——1983年,他自己的社会党里只有23%的人为他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而感到惋惜。他们是否想让他带着这么大的热情去“现代化”倒不一定,不过他确实是搞过现代化。密特朗没有明确地放弃那些争议比较少的早期改革——分散行政权力,监督社会保障,保证妇女的工作权利,实行期待已久的司法改革——他在很长的任期(他在两个7年的总统任期后于1995年退休,次年于80岁时去世)的其余时间里都致力于在审美观和实际效用都很成问题的、代价昂贵的公众工作,重建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能力,^[11]……并且监督将他最近刚刚纳入公共控制的许多服务业和产业重新回到私人手中。

最先推动法国庞大的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是在1986年选举中获胜的、在议会里成为多数派的保守分子。但是后继的几届政府的各个部门也都追求同样的目标——确实,密特朗执政晚期的社会党政府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活力的私有化倡导者。仿照着英国公开销售证券的模式,第一批卖到私人手中的资产是一些大银行和法国电视台一台(即法国三大国家电视频道之一),接下来是公有控股公司、保险行业、化学和药业大公司,以及石油工业巨头道达尔和埃尔夫。

但是与撒切尔夫人和她的继承者们不同,法国对卖掉公共事业(或者像雷诺汽车公司这样的“战略性”公司)是非常谨慎的(1985年,国家的一大笔拨款刚把雷诺公司从破产中拯救出来)。在市场上就像在花园里一样,法国人对没有计划的增长持怀疑态度。他们宁愿保留一定的干预能力,主要是通过把一部分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仍然保留在国家掌握之中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在法国,私有化本身很显然就是一种受到管理和调节的事情——控股的做法被很小心地引导到国家依赖的企业和商业上,而国际投资者多年来一直被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以法国的标准看来,这些变化是非常重大的,使这个国家重新和欧洲与国际社会的发展保持了一致。

现在或许是适当的时机可以谈谈私有化浪潮了,这股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冲破了
555 西欧海岸,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席卷了整个大陆。这些情况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从1977年起,英国石油公司就逐渐地卖掉了;西德政府早在1959年就通过发行公共股份来与普罗伊萨格化学联合公司分离,几年之后它卖掉了在大众汽车的股份;甚至连奥地利也在20世纪60年代卖掉了它在两个国有银行中的40%股份,1979年它又放弃了在西门子公司的可观的资产。

但是这些还只是零星的情况,而且本身都是注重实效的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发

[11] 即使在民众对政府的政策最不满的时候,即经济情况最糟糕的80年代中期,也有57%的选民宣称自己,对密特朗的外交政策表示满意。

生的事情却非常不相同,政府面临的压力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第一种压力来自技术方面,尤其是电信和金融市场方面的加速发展正在破坏旧的“天然”的垄断。如果政府不能让无线电波或货币的运转供它专用的话,“拥有”它们也就没多大的意义了。另外还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和社会需要,使政府保留了某些部门——比如说一个公共电视频道,或是邮局;但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种压力是,政府出于短期的经济需要,被迫卖掉公共资产。通货膨胀、1979—1980 年的石油危机、巨大的年度赤字和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给政府带来了各方面的压力,财政部长把卖掉公有资产看作是双重有利的事情。国家将会甩掉亏损的工业和服务业;筹集的钱又可以帮助平衡预算,尽管是一次性的。即使某一项工业或服务继续保留部分国有制(国家一般会保留私有买者不想要的无利可图的部分),从出售股份得来的国库现金也会被应用于将来的投资。就是出于这一原因,许多公有部门的经理甚至也成了这次部分出售的热心分子。他们对于把他们的利润拿出去帮助改善国家预算短缺的做法一直心怀怨恨。

欧洲各国在公有制和公有控制权的形式和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荷兰、丹麦和瑞典的公有工业部门最少,而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最多。除了卫生和社会服务业,各国在 80 年代初期由国家直接雇用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各有不同,西德是 15%,意大利是 28%,奥地利是接近三分之一。在一些国家——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公有的部分被组建成大型工业控股公司,其中意大利的“工业重建银行”是最大的。〔12〕

在其他方面,国家的利益经由“国家投资银行”和“工业保障基金”的过滤——在荷兰或比利时则是性质相同的“国家投资协会”。仅钢铁工业就有多种支持方式:在英国,财 556
政部通常将国有企业债务一笔勾销;法国政府提供低利率贷款,并通过政治干涉手段,为国内生产商提供同国外生产商竞争的优势。西德私营钢铁企业的生产商得到的是直接的现金资助。

不同国家的悬殊情况,导致欧洲的私有化形式自然相差迥异。然而无论怎样,它们都导致撤销国家的管理制度,市场自由主义化,引入新的金融手段促进部分或全部私营化企业的股份销售或再销售。在西德,阻碍已经被私人占有的主要出口部门(汽车,机械工程,化工,电子公司)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的不是国家控制,而是昂贵的固定成本和劳动力市场规则。德国的私有化中负主要责任的是托伊汉德公司,这是一家为处理前东德国有

〔12〕 1982 年,工业重建银行实行控股,主要控股的有:意大利的全部铸铁生产,集团公司三分之二的特种钢产量,四分之一的冰淇淋生产,18% 的削皮马铃薯。

企业而建于 1990 年的国有公司。〔13〕

在意大利,私有化道路的绊脚石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政党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利用国家企业和公有控股公司,以公共合同、吸收进政府部门或自己掌控的权力机构的方法,来奖励同伙,贿赂支持者。但是,尽管有如此强大的障碍,意大利的私有企业在这一时期依然稳定增长,尤其是员工在 100 人以下的制造业公司,这种公司在意大利比在英国、法国、德国要多得多。

1976 年,宪法法庭已经结束了国有电台电视台网的垄断。几年后,仍在一家公有控股公司庇护下的“阿尔发罗密欧公司”被“移交”给了菲亚特汽车公司。在 6 年内,主要的控股公司(包括 IRI, INA, ENI 和 ENEL〔14〕)自身都被改造成为合资的公有企业。它们本身没有价值——而相反,工业重建银行在 1984 年为其 50 万名员工每人每年损失 450 万里拉。但是它们可以在自己掌握并列入私有化日程的公司内部发行可转化为股份的债权。

但是在刚从独裁统治下浮现的国家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以佛朗哥下台后的西班牙为例,它的公共部门实际上反而扩大了。国民生产总值之组成部分的公共开支在逐渐上升,因为自 1976 到 1982 年,政府部门里的中间派沿用旧政府的策略,仅仅通过将经营不善的私人企业转移到国有部门来,以避免社会冲突。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出于各种原因,这种形式的私有化也备受工人、业主、国家政客和地方当局的喜爱。在任何情况下,在削减公有部门问题上的主要争论是,它所体现的福利社会耗资过大,难以维持,但是削减公共部门的做法在西班牙、葡萄牙或希腊都行不通。那里没有什么要拆除的福利国家。

然而,即使在欧洲级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不存在的时候,公共部门——承担着被西班牙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并备受宠幸的青春期所抛弃的负担——由于不能盈利和超负荷的负担而毫无好转的希望。1976 年,仅国家工业部门就负责对 747 家工业公司(大多数无盈利)的投资和对另外 379 家公司的控制。若西班牙有偿还能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私有化和撤销管理的办法。正如在法国,发起这一进程、在 1987 年引入个人退休基金、并于两年后废除国家电视垄断的,都是社会党政府。

在后革命时代的葡萄牙,宪法第 85 条和 1977 年后续的法律都明确禁止私营企业经营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邮政电讯业、电力生产和分配、石油精炼和军事工业等产业。1983 年,马里奥·索瑞兹的社会党政府寻找途径,采取灵活方针,允许私有部门同国有部

〔13〕 托伊汉德公司的原初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改造 9000 家东德的公司(男女雇员总数达 700 万人)成为真正的企业,然后将剩下的淘汰掉。但是在政治压力下,它采取了重建或加强许多不盈利的公司的方法,于是讽刺性地造就了一个新的、依靠公共资金资助的、半公共的部门。参见第 21 章。

〔14〕 即“工业重建银行”、“国家保险银行”、“国营水务公司”、“国营电力公司”。

门在银行业和保险业竞争,并批准钢铁、石油、化工和武器产业成立股份合资企业。但要使其余受保护的部门开放到有限竞争的程度,也还有待时日。

地中海地区就像几年后的“后共产主义”中欧一样,若不是欧共体和欧盟的影响,放弃国家控制的速度可能会更慢。1979年后,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货币汇率过早地产生了约束——密特朗政府开始出售公共资产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货币市场,因此将法郎维持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协商一致的水平上。但布鲁塞尔的主要平衡手段是它的种种法规,而起草这些法规的目的是为了运作一个单一的欧洲市场。单一的欧洲市场要求所有的公私企业一律遵守国内的、最终遵守国际的公开竞争的准则。这样便不会有对哪个“冠军”国家的偏爱,也不会在竞争合同或顾客时,对公有或公共控股企业私下里提供补贴或其他好处。

无论在实施时这些规章如何被回避,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便迫使国有公司在市场上的行为要与私有公司毫无异处,这就没有理由维持国家在处理双方事务中的干预。在欧共体所有成员国中,意大利的反应最典型:1990年意大利采用新规章,与单一欧洲法案的相关条款相符合,要求(除对国家实施任务时执行国家垄断必不可少的公司或企业外)一切国有企业在一切交易中实行公开、公平的竞争,这一条款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使得各国政府既能适应欧洲的规范,又能对地方压力保持敏感。 558

尽管在布鲁塞尔(和伦敦)都兴奋地讨论日益增加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欧洲的“私有化热”带来的变化或许并没有比它的支持者许诺或期待的多。批评者们曾经警告说,结果并不会是更多的竞争,而仅仅是从公有的集中型经济到私有领域的转化,而事实正是如此发生的。法国许多大型的私有公司得益于复杂的跨股权安排,模仿以前公有企业的做法,例如,它们垄断整个部门,对它们的小“股票拥有者”的要求不作任何反应,就像以前在公有行政部门管理下对纳税人或消费者的态度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有化和增加的竞争对国有部门本身的规模几乎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已经在撒切尔统制下的英国看到,国家的范围实际上扩大了。在其他地方也一样。1974—1990年间,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就业者享受的份额增加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性私有企业的失业状况):德国从13%增加到15.1%,意大利从13.4%增加到15.5%,丹麦从22.2%增加到30.5%。然而,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大多从事第三产业而不是制造业,即供应服务和管理服务(包括金融、教育、医学和运输业),而不是制造物品。

经济的自由化并不标志着福利社会的垮台,更不是其第三产业的衰退,尽管这不是理论家们的期望。但是,它确实表明了从公有到私有企业在资源及主动性分配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已远远超过谁拥有工厂、或在任何特定的行业该有多少规则这样的技术

性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在观察它们的国家,而政府当局在他们的事务上起着不容置疑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已变得如此普通,以至于它背后的前提——即最积极的国家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已经大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若没有对这一假设的积累不断的阐明,那么无论是撒切尔主义还是密特朗“铁面”都将不会成为可能。

第 18 章

无权者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它是历史哲学的全部，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 559

就是在历史中将理性葬入了坟墓。

——莫里斯·梅洛-庞蒂

我谈论权利，是因为只要有了权利，我们就可以离开这种神灯表演。

——卡兹米尔兹·布兰迪斯

极权主义社会是整个现代文明扭曲的反映。

——瓦克拉夫·哈维尔

和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给人的压力相比，国家机器给人的压力

实在算不得什么。

——切斯拉夫·米沃什

“社会民主政治时期”在西欧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其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人们出于实用考虑而相信公有制，以及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原则，还包括对整个时代面貌的感知。那个时代影响了众多潜在的批评者，压制他们达几十年之久。对于刚刚逝去的欧洲历史，这种共识里夹杂着对大萧条的记忆、民主世界与法西斯的斗争、福利国家道德上的合法性以及铁幕两边许多人对社会进步的期待。它是 20 世纪的主宰叙事。当它的核心观念开

始腐蚀和崩溃时,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一批公有制公司,还有整个政治文化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如果要找出这一变化完成的时间标志,找出战后欧洲了解自己的时间节点,这一时间就是1973年12月28日。这一天在巴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首次在西方出版。W. L. 韦伯在《卫报》上评论了此书的英译版。他写道:“活在现世而不知道此书,就是缺乏时代认知的关键部分,就是对历史愚昧无知。”正如索尔仁尼琴自己所承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所传达的信息并无新意,那就是“苏联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场野蛮的骗局,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劳役和大屠杀基础上的极权主义专制。

50 索尔仁尼琴自己在以前就写过这个主题,许多受害者、幸存者、旁观者、学者也写过。《古拉格群岛》在已有的证据上又添加了几百页的细节和数据,不过就道德思想的热烈程度和感情上的影响来说,作为一部见证作品,该书并不比其他一些作品具有明显的高明之处。那些作品包括:叶芙盖妮娅金斯伯格1967年出版的《旋风之旅》;玛格丽特·布伯-纽曼关于自己在苏联和纳粹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录(1957年以德语首次出版);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对自己不当信仰的纠错式叙述(1955年问世);甚至还包括较早揭穿苏联神话的维克托·谢尔盖和鲍里斯·苏瓦林的作品。〔1〕

可是扣准时机非常重要。批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历来不少,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的影响遭到了削弱,这是因为在西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东欧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也是如此),普遍的愿望是想找到国家社会主义暴风乌云的一线亮色,无论这道亮色是多么暗淡。国家社会主义自1917年于俄国滥觞以来,已席卷了大部分欧洲。“反对共产主义”,无论其真实的或可能的动机是什么,都置人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使人看上去是在质疑历史进步的形态,是未看到“大局”,是在否认将民主福利国家(无论福利如何不足)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不济)的必然连贯性。

正因为此,与战后大众意见相左的人士遭到了极大的边缘化。像哈耶克等人那样,如果认为,为了大众利益而限制市场的计划用意虽好,但不仅毫无经济效率,而且最重要的,是迈向奴隶制度的第一步,那就是撕碎了20世纪的路线图。反对共产主义专政的人士,如阿瑟·科斯特勒、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和以赛亚·伯林都坚持认为,为了大众利益的社会民主改革和以集体主义神话的名义建立起来的一党专政之间是有区别的。可是在批评他们的许多“进步”人士看来,他们甚至也是在政治上随声附和 in 冷战中所效忠的

〔1〕 伊夫吉尼亚·金斯伯格《旋风之旅》(哈尔考特出版公司,1967);玛格丽特·布勃-纽曼《从波茨坦到莫斯科:一个走向歧路的阶段》(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社,1957);沃尔夫冈·莱昂哈德《革命的孩子》(英文版,拓荒者出版社,1979,德文版首次出版于1955年,科隆);维克托·谢尔盖《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巴黎,1951);鲍里斯·苏瓦林《斯大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研究》(初版为英文版,1939)。

政党,并为之服务。

因此,这些人与不愿意放弃激进教义的大众(特别是60年代的大众)意见相冲突。知道真相之后,讥笑去世已久并且遭到其接班人谴责的斯大林是一回事,而承认错误不在其人而在体制,又是另一回事。更进一步说,把列宁主义的错误归咎于激进的乌托邦主义制度,就是在削弱现代政治的基础。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可以说是年轻一代的“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崇拜的偶像。他在写给勒塞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信中就严词批评道:你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失望威胁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在此之前,科拉科夫斯基针对1968年事件而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

但是,到了1973年,这种社会主义信仰不仅受到批评者的严厉抨击,单单一些事件本身就给了其沉重的打击。当《古拉格群岛》以法语出版时,法国共产党的日报《人道报》对其不屑一顾,提醒读者说,既然“每个人”都知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任何人翻炒此事的动机都只能是“反对苏维埃”。然而“反对苏维埃”的指责逐渐变得软弱无力。在苏联入侵布拉格以及随后的镇压事件之后,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慢慢流出中国之后,索尔仁尼琴对整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全面指责听起来就是真的了,甚至对于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可能特别对于他们来说是如此。

越来越清楚的是,共产主义败坏了其激进的传统,而且还在继续这样做。不久,柬埔寨的种族屠杀、越南逃难“船民”〔2〕受到的广为人知的创伤就证明了这一点。西欧有一些人(这些人为数不少)认为美国应对越南和柬埔寨发生的灾难负主要责任。离《古拉格群岛》出版只有3个月的时候,美国策划杀害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使得这些人的反美情绪更加高涨。现在,连这些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像过去那样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在道德上有着优越性。他们认为美帝国主义确实很坏,但另一边更坏,或许还要坏得多。

这时候,过去坚持认为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是对所有社会改善目标(也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国有化、集中计划以及进步的社会工程都是同一个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言而喻的威胁的传统“进步”人士开始否定自己的观点了。他们认为,如果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在社会公平这口井里下了毒,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了伤害。就20世纪历史而言,不仅由于经济原因,甚或是主要由于经济原因,国家开始看上去更像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开始是集中计划,结果却是集中屠杀。

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当“知识分子气”的结论,但是后来,知识分子立刻感受到了逃避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相当正常,因为正是知识分子首先热衷于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正如捷克作家叶尔基·格鲁沙在1984年所写的:“是我们(作家)美化了现代

〔2〕 从1975年至1981年,法国就接收了8万名来自印度支那的难民。

国家。”也正如伊格纳齐奥·西洛内所指出的,从本质上说,现代专制统治的实施需要知
562 识分子的协作配合。因此,正是欧洲知识分子对进步这一宏大叙事的疏远,才导致了随后的
雪崩性后果,这是非常正常的;这种疏远在巴黎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也是比较正常的。
200 年前在巴黎的知识界和政界,这一宏大叙事就已首次出现了。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巴黎不再是阿瑟·科斯特勒所称的“西方文明闪光的
明镜”了,但是法国思想家们仍然特别喜欢研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西班牙、西德和意大利
的作家、评论家们在那些年里则是穷于应付本国问题,尽管令他们牵肠挂肚的恐怖威胁
本身就会让人不再相信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英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曾受到共产主义的深刻
影响,对共产主义的衰落也不大关心,因此也就没有欧洲大陆新近产生的那种情绪。与此
相反,法国国内对共产主义制度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同情。在法国,共产党所得选票日渐减
少,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使得反共产主义的公开讨论越来越多。因此本国的往事和事例使
人们对共产主义产生同情。法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急于放弃自己以前的信仰,异常迅
速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么匆忙,有时候倒是不太合适的。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巴黎年轻的“新哲学家”们,比如安德烈·格鲁克思曼和伯纳
德-昂利·利维抨击遭到扭曲的激进的乌托邦主义,但在绝大多数方面并无新意。格鲁克
思曼广受好评的文章《论大思想家》出版于 1977 年 3 月,文中大部分内容并不如雷蒙·阿
隆在 22 年前出版的作品《知识分子的鸦片》。利维的《有人脸的野蛮人》比格鲁克思曼的
文章晚了两个月问世,但文中所写,法国读者无不可以见于阿尔贝·加缪的《起义者》。
但是,尽管加缪的文章于 1951 年问世时,让-保尔·萨特对其评价非常尖刻,认为不值一
提,利维和格鲁克思曼的文章却是很有影响的畅销品。时代变了。

法国国内知识界的这场大地震具有明显的犯上性质。表面上它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在
西方思想界走了严重的弯路,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战后法国等国知识界的统领人物的。
这些人物越过历史的边线走到一起,朝着胜利者欢呼,同时礼貌地把目光从其受害者身上
移开。萨特是这些人物里最著名的,这些年来却受到了冷遇,甚至在他 1980 年去世之前,
还因为曾经先后为苏联共产主义和毛主义辩护而使自己的创造性遗产背负了污名。〔3〕

巴黎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代牵涉其中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报复了。
563 1978 年,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首次以法语出版,由此开始,法国主流社
会不断地吸收了“盎格鲁-美利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部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法国
知识界几十年来几乎一无所知。同年,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海具有开创性的《思考法国

〔3〕 1963 年,《肮脏的手》一书的作者对法国本国共产主义者失去兴趣已经很久,可人们仍然能够
听到他在布拉格,对着一群困惑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大谈特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大革命》一书出版,在书中,他系统地解析了“革命问答手册”。几十年来,法国人就是通过“革命问答手册”来学习理解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过去的。

据福海分析,在这种“问答手册”里面,法国革命成了现代性的最早契机。这种冲突使法国分裂为左右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属于哪一派别,表面上看是由对立者的阶级出身决定的。这一理论建立在19世纪早期的自由乐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进的社会改造观点这两大支柱之上。按福海的话说,这一理论现在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尤其是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已经溯及既往地污染了其整个传统。在有目的地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造这一道德剧里面,苏联是推定的革命继承者。按福海的话说,法国革命“死”了。

福海的作品含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点作者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政治学未获得成功是一回事,这总是可以解释为时运不济或时过境迁之类。可是,假如人们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宏大叙事”,假如理性、必然性在历史中都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斯大林的行为,依照国家命令改造社会时所牺牲的性命、浪费的资源,以及20世纪强制命令进行乌托邦式的激进的试验所犯的 error 和所引起的失败,就不能辩证地解释为是沿着正确的道路迈出的错误的步伐。相反,这些就都成了批评者所一直指责的:损失,浪费,失败,罪行。

福海和年龄比他小一些的同代人都反对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活动。福海等人坚持认为,不存在制约人类行为进程的“主宰叙事”,因而也就没法证明一些公共政策和行为是合理的,这些公共政策和行为打着将来可能会给人带来好处的旗号,却造成了现实的苦难。鸡蛋碎了,还可以做出可口的蛋卷,但人心碎了,就无法借其改进社会。事后看来,以此来总结几十年激烈的理论和政治争执可能显得相当苍白无力,但正因为此,才清楚地显出了变化的程度之剧。

帕斯卡坚信上帝,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历史。在埃里克·侯麦1969年拍摄的“道德故事”剧《我在莫德的一夜》中,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哲学家和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哲学家对此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辩论。回想起来,令人瞩目的不是辩论本身(年纪稍长、还记得欧洲大陆60年代往事的人,会觉得这场辩论的内容非常熟悉),而是人们对待这场辩论的认真程度,这些人不仅包括银幕上的主角,还包括当代观众。10年之后,即使这部电影还在,这个话题却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求助于历史来为令人不快的政治选择进行辩护,从道德角度来看就开始显得非常幼稚乃至无情了。加缪在许多年前就指出:“对历史负责就可以使人不用对人类负责。”

自从这种不相信历史(以及历史学)的新情绪产生以来,西欧的知识分子度过了非常不愉快的10年。他们惴惴不安,心里清楚伟大的历史方案和主宰叙事的分崩离析预示

着,那些喋喋不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将来不会很妙。过去提出那些历史方案和主宰叙事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他们自己现在也遭到了漠视。这令他们颇为难堪。1986年9月,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私下对一名法国记者袒露心迹时就曾哀叹,孜孜不倦地为大众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很差。他说:“对我来说,我认为要说现在还有什么伟大事业的话,那就是保卫知识分子。”〔4〕

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时,选择自我否定。以赛亚·伯林曾经把这称作“以可怕的德国方式来摆脱道德抉择的重压。”这种说法对德国人来说有些苛刻,虽然这一想法根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在历史必然性的圣殿上贬低自己的欧洲人绝不只有德国人。这种说法指向了欧洲政治学说正在出现的真空:假如没有剩下伟大的事业;假如进步传统已走到穷途末路;假如历史或必然性不再能够令人信服地引起对行为、政策和制度的保护;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那些宏大的时代难题呢?

对于撒切尔式的激进人士来说,这不构成问题。他们认为公共政策是私人利益的延伸,市场对于他们而言是判定价值与结果的必要的、充分的标准。对于欧洲传统的保守派人士而言,那个时代也并不特别令其感到厌烦。对于这些人而言,处理人事的善恶标准仍然是宗教准则和社会习俗。60年代的文化大地震只是略微地给这些准则和习俗造成了危害,但并没有消除他们。进步的左派仍然在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正是他们急于需要一种新的理论。

让左派集体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了一门全新的政治语言,确切地说,是一门重新发现的非常古老的语言。右派(亦即自由派)的语言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每一部欧洲宪法,尤其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但是几十年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讨论权利”一点也不时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权利,特别是自决权,在有关战后安排的辩论中起了关键作用。参加“凡尔赛和会”的有关各方在迫使几大国接受自己的方案时,绝大多数都大张旗鼓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但是那些都是集体权利,即国家权利,民族权利,少数派权利。

况且,集体决定的权利并没有令人高兴的记载。只要民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利发生冲突(通常是领土争端),很明显,最终获得优势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武力而不是法律。这很令人沮丧。在一国内部,少数派的权利得不到保护,面对力量强大得多的邻国的要求,弱国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回顾业已落空了的“凡尔赛和会”所带来的希望,1945年战争的战胜国得出结论认为,重新划分地理板块(后来被称作为种族清洗)是一个尽管痛苦但很有效的解决方法,可以更好地为集体利益服务。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至于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在一个由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世界里,在司法管辖上将不再被特殊对待,而

〔4〕 参见《伟大的事业还会再次存在吗?》(载《新观察家》1986年9月号)。

是被看作迫害或不公正行为的个体受害者。

因此,战后关于权利的讨论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也是战争带来的教训。即使人们是因为共同身份(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而遭受到迫害,那么受害的也只是个人。新成立的联合国也就是寻求把人们当作有个体权利的个人来保护的。已经并入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各种有关人权、种族灭绝以及社会经济权利的公约对大众情绪的影响越来越深:他们把18世纪盎格鲁-美利坚对个人自由的关注和20世纪中期对国家义务的强调结合了起来。强调国家义务是为了使更多的要求,无论大小,都能得到满足:从生命权到广告真相的知情权以及其他更多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的低潮以及“国际安全和合作会议”在欧洲召开(于《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的那一年在赫尔辛基召开),共同推动了用法律语言把个人权利写入现实政治。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有关权利的议论在偏左派的欧洲知识分子中受到冷遇。他们附和马克思著名的论断,认为“所谓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将其加以摈弃。在进步圈子里,表达“自由”、“权利”以及其他与“一般意义的人”有关的抽象概念的词汇,只有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形容词修饰时,才会被认真对待。

正因为此,1969年属于“法国社会主义联合党”左翼的一群知识分子(当时由米歇尔·罗卡尔和皮埃尔·孟德斯-弗朗士领导)批评自己的政党支持布拉格的改革派。他们宣称,后者“自愿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人道主义,自由,正义,进步,普遍无记名投票权,等等)的牺牲品”。这样的例子绝非仅有。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许多偏左翼的评论家尽管政治信仰相当温和,可是避免提到“权利”、“自由”,以免显得天真幼稚。在东欧, 566 共产党改革派人士以及它们的支持者也避免使用这样的语言:在他们那种情况下,那些词汇在官方的语言里已含有贬义。

但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人权”和“个人自由”越来越多地见于西欧政坛各类人士的演讲和作品中,使用起来毫无限制。一位意大利观察家1977年说道,这是左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公开讨论“未打折扣”的自由这一理念和理想,而“没有将它神秘化或者丑化”。〔5〕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一定马上就会转化为政治现实,因为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的工党和社会党都在苦苦地挣扎,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将对手的方案非法据为己有来掩盖自己的贫乏。但是他们开始向权利和自由这样的词汇敞开大门,这使得西欧学者和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东欧正在发生变化的有关政治对立的语言,能够跨过界线进行交流,而且正当及时,因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重大变化现在就在“铁幕”的东边

〔5〕 安托尼诺·布鲁诺《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与理想主义》(1977),第99—100页。

发生着。

1975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派人士姆莱纳尔写了一封《致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公开信》,其中主要是写给欧洲共产党人的,呼吁支持不同政见,反对压制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不同政见。然而对共产主义改革的幻想一时还很难根除。可是姆莱纳尔已经属于少数派,他既相信社会主义,又相信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西方人士,这让苏维埃阵营内部的大多数批评者感到困惑不解。

那些批评者当时还没有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一般来说,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是不认同这个词的),但他们多数已经脱离了政权,摒弃了政权所支持的“社会主义”术语。在1968年事件之后,这种术语以及那些机械地包含于其中的词,例如“和平”、“平等”、“兄弟般友好”,听起来就特别地虚假,在那些曾经将此类话当真的60年代的活跃分子听来尤其如此。他们绝大多数是学生、学者、记者、剧作家和作家,他们曾是镇压的主要受害者,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古斯塔夫·胡萨克的领导下,正确地算出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改善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意意见,同时大力压制不同的意见,禁止谈论近期刚刚发生的事情。

政权的反对者被迫转入地下(在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失业的教授和作家去做锅炉工,567 的确如此),几乎不能再和压迫者进行政治辩论了。相反,他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终止了早年的修正主义辩论,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环境,有意支持那些“非政治”的主题。由于《赫尔辛基协定》的签订,“权利”成为其中可以经常谈论的主题。

在形式上,所有苏维埃阵营的宪法都很关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赫尔辛基达成了包括相当具体的补充权利的一揽子协议,这些协议给共产主义制度内部的批评者提供了战略机会。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学家彼得·皮特哈尔特指出,意义不在于要求不曾有的一些权利,这只能招致进一步镇压,意义在于要求得到业经政府承认、并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权利,这样在迫使共产党进行招架的时候,就使得“反对”带上了一层温和、而且几乎保守的面貌。

认真看待“社会主义”法律的文字表述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不仅仅是一种让共产党领导人感到难堪的手段。在封闭社会里,一切都是政治,因此前述的策略和手段遭到了杜绝。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权利”在“沉默的70年代”笼罩于东欧的厚重的悲观气氛中打开了第一道缺口,“权利”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对话语权的垄断。而且,个人的宪法权利就其本质而言,正式见证了拥有权利的个人的存在。人们彼此互相拥有权利,个人对集体也拥有权利。宪法权利规定了无助的个人和全能的国家之间应保持的距离。

正如匈牙利年轻的理论家米克洛斯·哈拉扎梯所承认的,权利运动(“人权运动”)说

明了,纠正共产主义的缺陷需要的不是一种更理想的共产主义,而是公民(亦即中产阶级)社会的宪法立法或者宪法修订。颠倒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安排,寻求用中产阶级社会代替社会主义国家,这让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们觉得很具有讽刺意味。不过,正如哈拉扎梯的匈牙利同事米哈利·瓦依达解释的,和他们国家过去令人不能忍受的对公民的专制统治比较起来,中产阶级社会具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地位。

重新修订公民社会的宪法这一说法含义模糊,只是道出了一个不确定的目标,但是自7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东欧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这一努力的意义在于,承认在1968年之后,尝试改革“党国一体”是不可能的。很少有人真切地希望(苏联人就更不会这样想了),布拉格的胡萨克或柏林的昂纳克承认“谈论权利”是合理的,会认真对待宪法。在理论上谈论权利恰好说明了实际上没有权利,恰好提醒了国内外的观察家,这些社会实际上是多么没有自由。新的反对派并没有与共产党当局纠缠,而是故意越过了他们进行讨论。

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例如哈拉兹梯和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来说,这是以一种剧烈的方式脱离年轻时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亚当·米奇尼克出版于1976年的论文《新进化论》为波兰反对派设计了未来的战略。对于那些从来不曾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感兴趣的人,比如瓦克拉夫·哈维尔来说,这种转变就轻松得多。哈维尔是布拉格一个富商的儿子,他的家庭财产1948年后被共产党政府剥夺。哈维尔没有表现出同时代人的那种蓬勃的革命热情,在1968年之后的改革运动中也不积极。哈维尔和共产党当局一直有一种敌对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出身,从来不是因为政治见解。 568

在70年代和80年代,哈维尔由于自己的活动而受到骚扰、逮捕,并最终被投进了监狱,由此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政治人物。但是他传达的信息还是绝对与政治无关的。他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派争论,甚至也不是说出真相,尽管在一个靠着撒谎执政的政权里,说出真相非常重要。他写道,当时那种情形,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中”,否则就只有妥协。“成立政治组织行为本身并不是把真实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反而是使人开始了一项政治游戏。”

哈维尔1984年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探讨了捷克斯洛伐克脆弱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目标和策略。他说,目标应该是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于你的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着,“假装”你真的很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解决方法几乎没有什么用,哈维尔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在当今世界,这些方法可能不现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难运用,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哈维尔所处的境遇不是没有先例,即使在不久以前也是如此。鲁德维克·瓦楚里克1967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甚至就曾向他的同事们

推荐过类似的“假装”策略。他说,“装装公民的样子吧……假装我们已经成人,法律上已经能够独立,讲话要像那个样子。”不过,在60年代乐观一些的气氛中,瓦楚里克还可以希望当权者能够做出一些调整和变通。到米奇尼克和哈维尔提出类似的观点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时重要的不再是建议政府如何执政,而是通过实例建议国民如何生活。

在70年代那种环境下,认为东欧的知识分子可以“建议国民”如何行事这一看法可能显得很有些野心。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能够提什么建议,甚至彼此之间也不能提,更不用说对全国同胞提什么建议了。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工业中心的情况和民意,与农民的隔绝就更加严重了。用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伊万·泽兰尼和乔治·康拉德的话说,共产主义这一政治制度使“知识分子走上了争取权力的道路”。实际上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过去中欧将人们划分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法(这种分类更适于匈牙利、波兰这样的贵族社会,而不大适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平民社会,但是1948年以后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人为地做了这样的划分)又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出现了。

首先弥合这条鸿沟的是波兰人。1976年,波兰发生了一系列罢工,抗议食品价格飞涨。当局予以严厉地回击,在工业城市乌尔苏斯和拉多姆,许多工人遭到了痛打和逮捕。几年前,工人和知识分子互不关心对方的抗议运动,此时,库伦与几个同事特意对此做出反应,于1976年9月宣布成立KOR(“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首字母缩写)。KOR以及几个月后成立的“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ROPCiO)的目标就是揭露对工人公民自由的侵犯,在法律上帮助他们进行自卫,组成一条统一战线。3年后的1979年12月,作为KOR领导人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些是犹太人,有一些是天主教徒,有一些是前共产党人,还有一些什么都不是)后来负责起草公布了《工人权利宪章》。

因此,社会冲突导致产生了波兰公民自治群体(更确切地说,确认了这一群体的存在)。在与波兰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环境更加令人沮丧,公民自治群体的产生源于一个法律上的机缘。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在一份文件上签名。该文件最初以宣言的形式刊载于一家西德的报纸上,批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能实施捷克斯洛伐克宪法、《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最终法案》以及联合国的政治、民事、经济及文化公约中有关人权的条款。上述法律布拉格业已签署,并且还将赫尔辛基120法令正式纳入《捷克法典》。〔6〕

在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称自己为“松散、非正式、开放的群众团体……希望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以求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对人权和民权的尊

〔6〕 令人颇感奇怪的是,正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1976年决定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系第35个批准公约的国家),才使得公约成为有效力的国际法。

重,出于此愿望而联合起来”。他们特别强调《七七宪章》不是一个组织,没有章程,也没有常设机构,“并不构成任何政治上敌对行动的基础”。做出这种约定,意图是将他们的行为控制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律规定范围之内。

《七七宪章》永远是一小群勇敢的人缔造的,他们不代表别人,只代表自己:在原始文件上签名的有243人,在后来10年里仅有1621人(全国人口是1500万)加入进来。宪章的首批发言人有哈维尔、伊利·哈耶克(杜布契克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顶尖的哲学家、年老的扬·帕托斯卡。这些人都是独立的个人,在大众眼里,既没有权势,也没有影响力。但这并不妨碍当局对他们的宣言做出狂怒的反应,认为它是“一部反政府、反社会主义、蛊惑人心、恶语伤人的作品”。对每个在宪章上签名的人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逐字不差地用50年代盛行的3种说法来描述就是:“叛徒败类”,“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和代表”,“破落的政治家、国际冒险家”。对签名人的报复和恐吓随即展开,包括将他们解雇、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入学、吊销驾驶执照、剥夺公民身份、迫使他们流亡、遭逮捕、审判以及监禁。 570

在《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遭到了严厉处罚,新一代年轻的音乐人(著名的摇滚乐组合“宇宙塑胶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报复迫害,这促使支持他们的“保卫遭受不公正迫害者委员会”(VONS)于1978年4月成立,该委员会的目标与KOR大致相同。对这一新成立的组织,布拉格当局的反应是将该委员会领导人中的6人(包括哈维尔)予以逮捕,并在第二年以颠覆政府罪对他们进行审判。1979年10月,这些人被判监禁,刑期不等,多者5年。

1968年之后,各共产党政权(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马尼亚是例外)在实践中都采取了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的做法。他们甚至不再假装寻求真正得到国民的忠心,他们只要求人民表面上装出顺从的样子。和VONS和KOR一样,《七七宪章》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本国公民中因此而存在的对公共事务玩世不恭的漠然态度。哈维尔特别强调,需要让政府不再满足于看到民众为了不引起注意而随意地贬低自己的这种现状。他写道,如不这样,当局可以料想每个公民的外表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一主题在哈维尔的经典名篇《无权者的力量》中已得到阐释,书中以一位蔬菜水果店的店主为例,写他习惯性地商店的橱窗里挂上了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关心的事务中,有些较好地适应了消除公众的冷漠和恐惧情绪这一努力。本书第15章里提到的正在出现的环境灾难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当局自己的统计,1982年在斯洛伐克,总长3500英里的河流中,45%已遭到污染,达到危险的程度。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80%的井水已不能供人饮用。这主要是由于在东部的集体农场过度使用化肥,导致土壤含毒,庄稼歉收,就像苏联黑土区曾经历过的那样。

到了 80 年代早期,由于在工业和能源生产方面使用褐煤(因其价格很便宜),波希米亚北部遭受了欧洲最严重的空气污染。这个地区发电量为 735 亿千瓦,其中 640 亿千瓦产自燃烧这种含硫量高的燃料的电厂。结果,到了 1983 年,捷克地区大约 35% 的树林死亡或濒于死亡,三分之一的水源遭到严重污染,甚至不能用作工业用水。在布拉格本地,政府不得不设立一所专门医院,医治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儿童。在一篇名叫《圣诞节的阴谋》的短篇小说里,伊凡·克里玛描写了从这家捷克医院走出来到街上的情景:“阴暗、冰冷的雾气里充满了煤烟、硫磺的味道和易怒的情绪。”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污染的是国家,受害的却是整个社会,因此污染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隐含着政治含义:难以保护环境的原因是没有人对采取预防措施感兴趣。只有一贯施行有效的行政制裁,才有可能取得一些改善,而这又得来自于首先鼓励浪费的同一行政当局。如果有工厂的经理、农场的场长不够明智,甘愿冒完不成“定额”的风险,自发地采取控制污染的措施,那他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对环境就是有偏见的,这一点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7〕

作家和学者们关心的是作品审查制度,这是合情合理的。阻止出版或表演的条件在不同的共产党国家有很大的差别。1969 年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满不在乎地推行压制政策:不仅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被禁止出版作品,禁止在公开场合露面,而且有大量的主题、人物和事件甚至不准提及。相反,在波兰,天主教会及其所属的机构、报纸提供了半保护的空間,只要谨慎行事,在文学界和知识界就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

在波兰,像在匈牙利一样,问题在于往往需要做自我审查。为了保证能够让观众、读者见到作品,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学者们预计有些地方可能会遭到官方的反对,因此就总想着要改编作品,修饰或回避某个观点。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文化艺术的社会里,做出这些调整所取得的职业上乃至物质上的益处是不容小觑的,但道德上的代价可能是昂贵的,可能会伤到自尊。海涅在 150 年前就已写道:“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们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海涅的这席话肯定会立刻得到东欧许多知识分子的认可。

这是部分共谋的一种。另一种是沉默。沉默就是把事情放在心里,而不是在嘴上,奉行的是切斯拉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心灵》中所写的“阳奉阴违”。真正大胆表达出自己想法的那些人,将自己作品的原始复写本在私下里非法地流传。这些真正的作品面临着

〔7〕 不过,环境保护者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斯洛伐克作家米兰·塞姆卡(Milan Simecka)就曾警告过自己的同事(其中包括哈维尔)不要低估现代性的好处:“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使工业繁荣要伴随着污染,也好过于遍及社会的混乱与粗野,而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有乌托邦的世界或没有乌托邦的世界》,载《跨文化思潮》1984 年第 3 期,第 26 页。

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惨淡前景,他们的观点和艺术只能限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他们的遭际至多也就是某捷克知识分子所称的“自慰”。后者曾闷闷不乐地将在同一群两千个知识分子中流传禁书称为自慰,因为那些人写的也是禁书。

而且,勇气本身并不能保证质量。地下作品表现出来的叛逆和对立情绪经常是危险的,所以也给它罩上了一层浪漫的、其重要性有时候被夸大的光环(尤其是在西方的崇拜者中)。原创的激进思想在苏维埃阵营这一渐渐腐烂的混合肥料堆里真的可能会鲜花怒放,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的作品是共产主义“恶之花”最好的例子,但绝不是唯一的例子。〔8〕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作品过去未能出版,并不保证它就是质量好。世上不存在“审查女神”(乔治·斯坦纳语)。并不会因为政府当局不喜欢你,就意味着你很有才。

因此,一旦进入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社会,即使曾经是知名度最高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名声都得大打折扣。1989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匈牙利的乔治·康拉德就是其中之一。康拉德在80年代写了几篇文章,谈论“反政治”,非常张狂,因此而广受膜拜。另外一些人,比如东德小说家克丽丝塔·沃尔夫心里就很明白,正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做一名作家非常困难,这才给他们提供了题材,也提供了一些力量(还有社会声望)。也正因为此,许多共产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甘愿放弃移民和流亡的机会。他们认为,受到迫害但却具有重要的影响,这要比享受自由但却变得无关紧要更好。

近些年来,害怕变得无关紧要的想法导致产生了另一种顾虑,即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尽快“回归”欧洲。就像对待审查制度一样,关心这个问题的只有知识分子,事实上主要是来自前哈布斯堡帝国西部省份的一些作家。过去苏联的政令导致这些省份非常落后,经济非常不发达,令人痛心。怀有这种情绪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捷克小说家和剧作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流亡巴黎,在巴黎写作。在他看来,中欧(一个地理名词,为了清楚地证明昆德拉的观点而重新启用)的悲剧就在于受到了外来的、属于亚洲的独裁者统治。

在昆德拉的祖国,欣赏他的人不多。他选择流亡国外,他又获得成功,这令他的许多同辈感到憎恶。那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选择放弃流亡,也选择放弃了成功的机会。不过他的写作主题和大多数人还是一致的,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写给西方读者的作品。他们批

〔8〕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个例外:“南斯拉夫从未建立过一种官方文化(但这并不妨碍官员在文化生活中存在),因此就不可能有天然对立的、地下的、替代性的、平行的文化,后者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厚待。”参见杜勃拉夫卡·乌吉西克(Dubravka Ugesic)《谎言文化》(1998),第37页。

573 评西方的读者忽略并且无视在自己的东面还有一个“另类”西方存在。早在 1950 年代，米沃什就约略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假设就战后波兰诗歌写一本书，其中一章在写到西欧特别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时，得好好讽刺戏谑他们一番”。

昆德拉对国民采取类似于《七七宪章》这样的主动行为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的捷克面临的处境只是一个老问题的延伸，这个问题就是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国家的身份和命运究竟如何？在这个区域，弱小的国家和民族时刻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他认为，这个区域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外从事反对派活动的重点，应该在于使这个问题引起国际关注，而不是浪费时间，试图去改变莫斯科“拜占庭”式的帝国。更何况中欧还是“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反映了西方的命运”。哈维尔对此深表赞同：“共产主义是历史举起给西方看的一面阴暗的镜子。”

像米奇尼克这样的波兰人不使用“中欧”这样的词汇，也不大谈论“重返欧洲”，部分原因是波兰人不像捷克人，波兰人追求的是实现更切近、更可及的目标。这不是说波兰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就不想有朝一日能分享新成立的欧共体所带来的好处，也不是说他们就不想把社会主义失败的神话换成欧洲成功的神话，只不过是他们有着更为切近的目标。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再谈论。

东德也有自己需要关注的事情。勃兰特及其继任者奉行的“东方政策”的悖论之一，就是通过把大笔的硬通货转入东欧，以及不断地对民主德国表示承认、关注和支持，西德领导人在不经意之间就排除了东德内部变革的可能性，包括改革污染严重而且早已过时的工业。通过“架设沟通桥梁”、缔结姊妹城市、向对方表示好感以及与批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意见保持距离，波恩的政治家们使民主德国的领导人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政权非常稳固和安全。

而且，西德“赎买”出东德的政治对立分子和政治犯，使东德的反对派失去了一些最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像东德一样，在西方有一个孪生姊妹，使用同一种语言。因此对于民主德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来说，离开东德的诱惑就一直存在。在这些人关心的权利中，“迁移权”非常典型地位列名单之首。但是东德当局的许多“圈内”批评者既不愿抛弃自己的国家，也不愿抛弃旧有的观念。事实上，到 70 年代末，民主德国是唯一继续允许有非正式对立派、乃至党内对立派存在的欧洲共产党国家。民主德国最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从左派的立场攻击共产党当局。捷克作家伊利·佩里康曾辛辣地写道，这些人所采取的姿态使得他们在东欧的其他地方默默无闻，毫不相干。

正因为此，鲁道夫·巴赫罗以《另一种选择》这篇文章而名声大振。该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开批评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巴霍本人在经受多年的迫害之后，于 1979 年被驱逐到了西德。比巴霍年长的共产党人罗伯特·哈沃曼在那些年里由于代理民歌手

沃尔夫·比尔曼(1976年被驱逐出境)的事务而遭到审判和罚款。哈沃曼严厉地批评了 574
执政党,不是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而是指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指责他们鼓励大众消费和私人拥有消费品。民主德国哲学界领袖沃尔夫冈·哈里希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政府当局“官僚”作风日炽。他同样大力反对“消费主义虚幻的东西”。他认为让人民接受再教育,反对这些虚幻的东西,是执政党的任务。

在民主德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教会,即新教的德国基督教会联盟。波兰也是这样。权利、自由等新的提法是与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由于与唯一幸存的先于社会主义产生的机构有关而得到了加强(在波兰也是如此)。由于教会的影响,在东欧的反对派中“和平”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在东欧其他国家,西方的“反战分子”和要求核裁军的积极分子受到了相当的怀疑。人们认为他们无非是因为天真无知,没有头脑,所以成为苏联操纵下的工具。〔9〕例如,瓦克拉夫·哈维尔就认为,1980年代早期西欧不断高涨的反战运动是吸引西方知识分子、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并使他们保持中立的最好方式:他说,在国家政权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国度,“和平”不可以选择。在现有条件下,和平和裁军会让西欧获得自由和独立,但却会让东欧受到苏联的统治。把“和平”问题和要求拥有权利、自由分开是错误的。或者像亚当·米奇尼克说的:“减少战争危险的唯一条件就是充分尊重人权。”

但是在东德国内,和平运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与西德的联系是其部分原因,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也有其他原因。民主德国既没有历史、又没有民族同一性,它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可以说和平(至少是“和平共处”)是它“存在的原因”,这似乎有些道理。然而,民主德国同时又是军事化程度最高、最穷兵黩武的社会主义国家:东德学校1977年就有了“国防学”课程,东德的青年运动组织准军事化程度非常高,即使按照苏联的标准也是如此。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导致了反对派运动的爆发。反对派运动以和平和裁军问题为焦点,在对它的支持力量中,大部分即来源于此。

1962年,东德当局规定,年龄在18岁到50岁之间的男子都必须服18个月的兵役,不过两年后,又增加了一条免除条款:由于道德原因,希望能够免除兵役的人员可以加入名为预备役的另类劳动营。虽然加入后者被证明可能会在后半生造成残疾,但是它的存在就说明民主德国承认了出于良知反对服兵役的事实及其合法性。到了1980年,从预备役劳动营中走出的东德人数以千计,这些人组成了潜在的庞大的和平主义者网络。 575

因此,当1980年路德教会牧师向早期的和平主义者提供支持和庇护时,就能够比较

〔9〕 这样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就我们所知,苏联和东德情报人员就彻底渗透进了那时在英国和西德爆发的和平运动。

大胆地去做,而没有招致政府的反对。然后,初生的和平运动就从教堂扩展到了大学,人们不仅呼吁裁军,而且还要求拥有不受阻碍地发出这些呼吁的权利,这是必然的。东德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后来终于能够与本阵营里其他国家的反对派进行对话(并赶上他们的步伐)。

罗马尼亚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七七宪章》一出现,罗马尼亚作家保尔·戈马以及另外七位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就写信勇敢地表示支持。他们立即遭到了镇压。但是除此以外,罗马尼亚就像过去一样悄无声息,时间长达30年。戈马被迫流亡他乡,他做过的事情也没人再做。对此西方应该负一定责任——即使《七七宪章》或类似于波兰的“团结工会”(参见第19章)这样的组织在罗马尼亚出现,也不大可能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要求过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让罗马尼亚自由发展”。

即使在苏联,也允许某些知识分子享有严格限制的自由。这些人主要是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一直享有一些特权。生物学家若列斯·梅德维杰夫在1960年代揭露李森科的著作,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读者中长期流传。梅德维杰夫先是受到了干扰,后来被剥夺了公民权。1973年他在英国定居。但是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对当局持批评态度)却还能保持自由身,只是后来他公开反对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才令当局不能忍受。萨哈罗夫令当局尴尬,不得不管,但他又极为重要,不能将其驱逐出境。于是他和妻子叶琳娜·波纳尔被内部放逐到了十分闭塞的高尔基市。

不过萨哈罗夫一直坚持说,他向来是在呼吁苏联说清楚自己所犯的错误,说清楚对批评者的迫害,而不是在寻求推翻苏联。这种态度使他的立场介于老一代的共产党改革派和中欧新兴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之间。其他不太突出、并且公开宣称反对苏联的人士受到的处置就要严厉得多。诗人娜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与其他几百人一起被诊断患有“呆滞型精神分裂症”,在一所监狱精神病院呆了3年。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在年轻一代的激进分子中最为出名,他在苏联监狱、劳动营和精神病院度过了12个春秋。此后,由于国际社会强烈要求给他治疗,他才于1976年被用来交换智利共产党人路易斯·戈瓦兰。

除了类似的偶尔为某个人表示抗议,以及为了苏联犹太人有移民的权利而统一行动之外,西方对苏联国内事务的关注少得可怜,在1980年代初以前,比对诸如波兰乃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反对派运动的关注要少得多。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终于开始批评苏联对人滥加诊断(这种缓慢拖拉的作风让人感到可耻)。直到此时苏联才从世界精神病学协会退出。

要不是由于外界因素的推动,苏联知识分子中占压倒性的绝大多数绝不会照着东欧别国知识分子的样子去做,无论后者是多么小心谨慎。斯大林进行镇压所引起的恐惧就

像阴沉的棺罩,在他死后,笼罩着人们的精神世界长达30年。即使没有人实际提到这种恐惧,除了那些最大胆最直率的批评者之外,大家都刻意不去超越苏联划定的合法的主题和语言的范围。大家都认为苏联还是会存在下去的,这是很合情理的。像安德烈·阿玛里克这样的作家有预见性,但是不典型。阿玛里克的作品《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于1970年首次在西方出版,10年后以增订版的形式再版。与其设立在周边的几个傀儡政权相反,到1983年的时候,苏联存在的时间已经超出了大多数苏联国民的记忆,并且看起来还相当稳固。

中欧知识分子反对派运动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很小。大家对此并不吃惊: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新产生的现实主义,不仅包括业已纠正了的对社会主义失败的理解,还包括对权力运作的事实的清楚认识。而且,要求于人们的也有限: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在《论勇敢》一文中就颇令人信服地写道,对于那些辛苦度日的普通大众来说,要求于他们的只能有这么多。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地反对当局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为看起来没必要(又是对普通大众来说)。人们大多会说自己那样做“不够英雄,但很现实”。

知识分子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在圈内,而不是广大的大众:在有些情况下,他们是在暗暗地校正自己以前的狂热言行。况且,他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地就是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特权在他们中相当高效地代代相传,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这并不总是能让人民群众喜欢他们。就像在过去他们为现在所反对的政权辩护一样,那时他们只是一小撮,只代表自己。

乔治·康拉德略带说教地写道:“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应该想着将其他人从政治权力的高位赶下来,以便自己能取而代之。”当他如此说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在当时、当地能够做成那样的事情。以此来理解严峻的生活现实就构成了反对派运动坚持非暴力的背景: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甚至在波兰也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面对政府当局时采取消极态度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在民主德国,路德派教会在反对派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波兰,对于米奇尼克等人来说,这种态度防止了危险而无谓的冒险,既实用又合乎道德。 577

新的反对运动的成就在其他方面。欧洲东部和西部一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愤世嫉俗的时代,60年代的精力已经耗尽,60年代的政治理想从道德方面来看已经没有了可信度,为公共利益而忙碌让位于为私利而斤斤计较。哈维尔等人讨论权利,关注“公民社会”这一相当模糊的概念,不断谈论中欧在过去和现在保持沉默,可以说是在公

众场合进行毫无羞耻的说教。他们通过这些手段,逐渐建立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以代替被共产主义损毁的公共空间。

经济是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不大谈论的,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自从斯大林时期以来,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工业增长,既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又是衡量社会主义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尺。正如我们在第13章所看到的,经济曾是老一代改革派知识分子重点关注的:这向共产党当局反映了其本身所关注的问题,印证了所有的政治最终都是围绕着经济展开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持有这种观点。1956年至1968年是修正主义的10年,在这期间,有些反对派运动得到允许。对于这些反对派运动来说,批评意见以对经济改革的推荐意见的面目出现也是新近才有的。

但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苏联阵营里见多识广的观察家们要认真看待从内部进行经济改革的前景就很难了,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言体系经过几十年不恰当的滥用,已经瓦解。1973年以来,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远远落后于已经有所下降的西欧各国。此后,由于能源价格上涨,石油产量丰富的苏联经济曾有过短暂的反弹。除此以外,由于70年代的通货膨胀以及80年代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经济陷入难以逾越的不利境地。1963年,经互会成员国的国际贸易量占世界总量的12%,到了1979年底,这一比例下降到了9%,并且还在迅速下滑。〔10〕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商品质量上无法与西方各工业国竞争。除了苏联之外,它们销往西方的原材料也不能有持续供应,因此它们甚至连与不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都没有。578 经互会的封闭体系阻碍了其成员国加入西欧和关贸总协定等新的贸易网络。经济既不与国际物价水平接轨,又不冒激怒国内消费者的风险,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国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1976年波兰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到了此时,导致共产党国家经济大幅衰退的问题是它们身上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低效率。由于顽固坚持第一产业产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国家错过了从粗放型生产转向集约高效型生产的机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使西方各国的经济得到了改造。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依赖于相对过时的经济活动模式,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的底特律、鲁尔,或者19世纪晚期的曼彻斯特。

捷克斯洛伐克铁矿资源极为有限,然而到了1981年,捷克斯洛伐克却成了世界第三大(人均)钢铁出口国。糟糕到底的是,民主德国还在计划不断扩大落后的重工业产品的

〔10〕 在20世纪80年代,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经济陷入了负增长,经济总量实际上在缩减。苏联经济可能自1979年始就已经开始衰退。

生产。如果有别的选择,没有人愿意买捷克的钢铁、东德的机械,除非有很高的价格补贴:因此,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亏损的。实际上,苏联式的国家在减损物品的价值:他们进口的或从地下挖出的原料比用这些原料生产出来的成品更值钱。

甚至在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苏联式的经济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经互会内部选择匈牙利生产拖拉机和大客车,同样,在 1980 年指派民主德国生产电脑。但是东德生产的电脑不仅不可靠、而且也已过时,集中的经济体制也使产能不足。到了 1989 年,东德(人口 1600 万)电脑产量只有奥地利(人口 750 万)的五分之一,而作为电脑生产国,奥地利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优势”严格来说只是相对的:民主德国在花费数百万马克生产没有人要的商品,相对质优价廉的同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可以买到。

所有这些问题的责任都主要应该归于集中计划的内在缺陷。到 1970 年代末,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有 40 个部门负责经济的不同分支领域,另外还有 27 个各自独立的经济部门。对数字指标的关注恶名昭著,以致达到了自嘲的地步:蒂莫西·加顿·阿什举了“(东德)普伦茨劳堡区人民经济计划”为例。据该计划称,“图书馆的藏书量要从 35 万册增加到 45 万册,借阅量要增加 108.2%”。〔11〕

固定价格体系不能弄清商品的实际成本,不能对需求做出反应,也不能适应资源条件的限制。各级官员都害怕冒险和革新,唯恐短期内会减少总产量。这些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缺乏上进心:众所周知,由于勃列日涅夫喜欢保持“干部的稳定”(1971 年之后所使用的口号),因此不管干部多么无能,职位都非常稳固。同时,为了确保能够完成上级制订的目标,工厂的干部和经理们花费大量精力向上级隐瞒原材料和劳动储备。浪费和短缺因此而相互支持,相互依赖。

这种体制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不仅助长了生产停滞和低效之风,而且还导致了贪污腐败之风不断。没有财产往往导致更多的腐败现象产生,而不是更少,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似非而是的现象之一。权力、职位和特权不是直接可以买来的,相反是以提供庇护和接受庇护这一互相强化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权利被阿谀奉承所代替,阿谀奉承相应地又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升迁作为报偿。为了实现哪怕是一般的合法目标,人们都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细微或腐败的方式徇私枉法。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些年里,愤世嫉俗的人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增长。有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许多问题:拖拉机厂和生产卡车的汽车厂不愿意生产足够的零配件,因为制造大型机器更容易达到“标准”,结果一旦这些机器坏了,就找不到替换的零配件。

〔11〕 蒂莫西·加顿·阿什《苦难的用处》(纽约,1989 年)第 9 页。

官方数据只公布某个领域生产的各种机器总量,而不公布还有多少台机器仍然能够工作。工人们知道的当然清楚得多。

可以用一句很流行的笑话来总结社会主义的社会契约:“你们假装工作,我们假装付你们工资。”这样的安排对许多工人、特别是对那些非熟练工人有利。它为人们提供了社会保障,而给人们带来的工作压力却很小。作为回报,工人们就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东德官方的《政治小辞典》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工作与自由时间之间的矛盾消失了。”这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讽刺意味。

到1980年的时候,典型的共产主义经济中相对高效的只有高科技国防工业以及所谓的“第二经济”——商品和服务黑市。这种第二经济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承认,它的存在证明了官方经济是如何的糟糕,这是它的重要性所在。到了80年代早期,据估计,在匈牙利有8.4万个私下开展业务的从业人员,满足了国内几乎60%的服务需求,业务范围从修理管道业到娼妓业。

除此以外,农民在私下也从事一些生产活动,一些公共资源(例如砖头、铜线、印刷模板,等等)也“挪给”私营企业里的工人使用。由此可见,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就像意大利的资本主义一样,依赖于两种并存的经济。^[12]这两种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生性质的:只有把那些既不能否认、又不能肯定的活动和需求导入私有领域,共产党国家才能维持其在公共领域的垄断地位,而第二经济又要依赖于官方经济的资源,最主要的是要依赖于公共领域的低效率。这保证了第二经济能够获得市场,并且可以人为地提高价值和利润。

经济停滞本身就有力地反驳了共产主义所宣称的它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经济停滞假使没有使人们产生反对意见,可以肯定的是,它使人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自60年代末直到80年代初期,对于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恐怖和镇压都不再影响生活了,但生活却是灰暗乏味的。成年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喝的酒越来越多,在那些年里,苏联每年人均烈性酒消费量翻了两番。因此他们的寿命也短了。共产党国家里的公共建筑不仅没有艺术吸引力,而且品质低劣,令人不适,忠实地反映了这种专制制度的不堪。一位布达佩斯的出租车司机曾经指着一排排肮脏灰暗的住宅楼对笔者说:“我们就住在那些楼房里,冬冷夏热,典型的共产主义式建筑。”

此处就像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大多数国家一样,住房很便宜(在苏联,房租平均只占一般家庭预算的4%),因为经济不是由价格调整的,而是由稀缺性调整的。这对政府来说是有好处的,将稀缺商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分配,可以使人们继续忠于政府。但共产党

[12] 在农业方面,苏联、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非常像19世纪的大庄园:农民们收入很低,工具粗劣。他们消极怠工,以便节省体力回去种自己家的地。

领导人大都十分清楚,这样做也有重大风险。到了60年代末,事情已很清楚,光靠“社会主义”的远大前景不再能够使人们依附于政府当局,自此以后,执政的共产党人选择将国民当作消费者,选择用物资丰裕的现在代替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未来。

他们是有意识地做出这一选择。捷克的强硬路线者瓦西克·比拉克曾经在1968年协助苏联军队进入自己的国家。1970年10月,他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委员会”里曾说:“(1948年)我们在商店橱窗里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人们尚能接受。那时候的历史时代不同,人们的兴奋心情也不同。如今,我们不能再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了。如今商店的橱窗里必须摆满商品。这样我们才能够用文
581
献记载:我们在朝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13〕

那时,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而受到鼓励。这和赫鲁晓夫1959年与尼克松展开的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不同。当时,赫鲁晓夫向美国副总统保证,在可见的将来,共产主义就将超过资本主义。比拉克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一样,对此不抱幻想。只要提供的商品能够让消费者高兴,哪怕共产主义只是在简单地模仿资本主义,他也就满足了。1971年,东德的埃里希·昂纳克接替无人哀悼的沃尔特·乌布利希,担任共产党领导人。同样,他也希望能为民主德国公民带来某些经济成就,只要稍稍类似于西德1950年代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就行。

这种策略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一些成功。在整个19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至少以消费品零售额来看是如此。汽车和电视机是那个时代具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销售数量都有了稳定的增长。在波兰,1975年至1989年之间,人均拥有私家车的数量增长了4倍。到了80年代末,匈牙利每10人就拥有4台电视机,捷克斯洛伐克也差不多是这一水平。如果顾客不在意质量和款式的优劣,也不在意选择余地有限,他们通常都能在国有商店或“私营”市场找到心仪的商品。但是在苏联,这种“可选的”商品就很难找到,而且相对要贵一些。

生活基本必需品也是如此。1979年3月,华盛顿特区的一位消费者必须工作12.5小时,才能买得起普通一篮子的基本食品(香肠、牛奶、鸡蛋、土豆、蔬菜、茶、啤酒,等等);购买同样一篮子食品,在伦敦需要工作21.4小时,而在莫斯科尽管有高额补贴,购买同样一篮子食品却需要工作42.3小时。〔14〕如果不以卢布、克朗或福林计算,而以付出的时间和工夫计算,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不仅代价高昂,而且累人。

〔13〕 感谢鲍林娜·布伦博士提供了此条材料。

〔14〕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产1磅牛肉要3.5卢布,但商店里只卖2卢布。欧共体也对农民进行补贴,补贴比例也大致相同。区别当然就在于西欧能够制订共同的农业政策,而苏联却不能。

要是以能否满足个人消费者的需要来界定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整个经济都是以大量生产工业机械和原材料为目标的,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除了食品之外,共产党国家不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这些国家生产食品的效率也不高。苏联很早以前就是纯粮食进口国,单从1970至1982年间,其食品进口就增加了两倍。)。绕过这道障碍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国外进口消费品,但这需要支付硬通货,而硬通货又只能通过出口获得。然而,除了苏联的石油之外,世界市场几乎不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除非大幅打折销售,而且许多情况下,即使大幅打折,也销售不掉。

西方当然乐于帮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私人银行家都乐意贷款给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因为苏联红军是稳定的可靠保障,也因为共产党官员虚报产量和资源到了令人信服的地步。^[15]仅在19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硬通货债务就增加了12倍。由于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盖莱克及其同僚大量引进得到补贴的西方商品,为农民提供代价高昂的新的社会保险,将食品价格固定在1965年的水平,波兰的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000%。

一旦如此高额的借贷启动,就很难得到控制。1976年,盖莱克政府给食品涨价,引发了愤怒和暴乱,于是又迅速取消了涨价。波兰当局转而选择继续借贷:从1977年至1980年,波兰外借贷款限额的三分之一被用于补贴国内消费。布拉格的共产党经济学家建议逐步停止补贴,引入实际价格,但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害怕这种倒退所导致的社会后果。相反,领导人们宁愿增加债务。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一样,脆弱的东欧小国又开始向西方借钱,以支撑其封闭的经济,同时又不需要选择艰难的方法。

匈牙利共产党的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纳密斯在几年以后对这种情况大多予以承认。匈牙利向波恩借10亿德国马克的贷款,1987年10月得到了批准。西德政治家形容此贷款致力于推进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但实际上贷款是如此分配的:“我们将贷款的三分之二用于偿还利息,剩下三分之一用于进口消费品,以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到了1986年,匈牙利官方的经常账户赤字每年达到14亿美元。从1971年至1980年,波兰硬通货债务从10亿美元上升到205亿美元,后来情况更糟。根据其自身的计算,民主德国在最后几年将60%以上的年出口所得用于偿还西方债务的利息(西方已经非常慷慨地将利息打折)。南斯拉夫一直是受到青睐的客户(从1950年直到1964年底,美国支付了贝尔格莱德年度赤字的五分之三),根据其提供的官方数据,获得了大量的贷款以及备用贷款安排,而那些数据和现实却没有一点关系。

[15] 匈牙利于1982年5月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使双方都颇为自得。只是到了1989年,匈牙利政府严重少报了其上一个10年的国内外债务,问题才浮出水面。

整体来看,东欧各国的硬通货债务 1971 年为 61 亿美元,1980 年就增长到了 661 亿美元。到 1988 年,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 956 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将负担转嫁到长期受苦的国民身上,从而付清了外债。要不是匈牙利在 70 年代允许一定范围自由定价,前述数字可能会更高。但是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仅依靠贷款,而且是在拖延时日。它迟早是要做出痛苦而且导致社会分裂的经济调整的。

此后不到几年,东德间谍组织头目马尔库斯·沃尔夫曾宣称,到 1970 年代末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民主德国“不行”。这样认为的当然不止他一人。匈牙利经济学家塔马斯·鲍尔和同时代的波兰人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就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已经像纸牌搭造的房子,非常地脆弱。然而,只要资本家愿意为共产主义提供资金,共产主义就能存在下去。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政的“经济停滞时期”(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语)使许多人产生了幻觉,这还不仅仅限于苏联国内。1978 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就当真认定民主德国的生活水平比英国高。这时,波将金大公一定是在遥远的墓地里微笑。

不过,有些东西是西方银行家忽略了的,共产党人却对此十分明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不仅被推迟,而且毫无可能。正如阿玛里克在《苏联会生存到 1984 年吗?》一书中所预言的,共产党的精英们“认为与变革政局的痛苦历程比较起来,现行政权的弊端要轻一些。”即使对完全局域性的、效率低下的经济成分进行改革,也会立即产生政治上的后果。社会主义的经济部署并不是用自治区方式,而是构成了这一政治体制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东欧的卫星国全都由日益衰老、保守的随波逐流者统治着,这不是偶然的。在现实主义的新时期,华沙的爱德华·盖莱克(生于 1913 年)、布拉格的古斯塔夫·胡萨克(生于 1913 年)、柏林的埃里希·昂纳克(生于 1912 年)、布达佩斯的雅努什·卡达尔(生于 1912 年)以及索菲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生于 1911 年)都是最讲现实的。地拉那的恩维尔·霍查(生于 1908 年)和贝尔格莱德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于 1892 年)就更不用提了。这些人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样,都很守旧,也都已经衰老。他们不愿意放弃职位,他们一心只想终老于位子上。〔16〕勃列日涅夫生于 1906 年,7 次获得“列宁勋章”,4 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曾获“列宁和平奖”,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自从 1977 年以来,还担任了国家元首。

〔16〕而且,这些人还像勃列日涅夫一样,属于那个时代最大的消费者之列。当时苏联有个笑话,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带母亲去看自己的郊外别墅、汽车和狩猎时住的别墅,他母亲说:“真好啊,列昂尼德,可是,要是共产党又回来了,那该怎么办呐?”

“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存在着功能性的障碍,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决定它的命运。索尔仁尼琴 1971 年在接受诺贝尔奖的致辞中(本人缺席,由他人代读)就令人鼓舞地断言,“一旦谎言散去,令人厌恶的暴力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然后,业已衰退的暴力就会崩溃。”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苏联的暴行很久以前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其 1979 年给阿富汗带来灾难的侵略暴行也会暴露在人们面前,在 1968 年之后的那些年里,共产主义的谎言也逐渐被驱散了。

然而这一制度还没有崩溃。列宁为欧洲历史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在于绑架了欧洲激进主义的离心的政治传统,通过革新的垄断控制系统将其纳入政权,并且毫不迟疑地将它聚拢在一处,有力地将其保留在一处。共产主义制度可能会在外围无限期地腐蚀下去,但是,导致其最终崩溃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其中心区域。在共产主义消亡的整个过程中,一种新的反对派运动在布拉格和华沙蓬勃发展开来,而这只是开始阶段的结尾。然而,一种新的领导阶层在莫斯科本地出现,这才是结尾阶段的开始。

第 19 章

旧秩序的终结

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585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妻子赖莎说),1985 年 3 月

对糟糕的政府而言,它开始改革自身之日,就是最为危险之时。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们没有伤害或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动荡的意图。

——海因里希·温德伦(西德的两德关系部部长)

历史经验表明,共产党有时也会迫于形势而采取理性措施,并同意妥协。

——亚当·米奇尼克

国民们,你们的政府已经回归你们了。

——瓦克拉夫·哈维尔总统就职演说,1990 年 1 月 1 日

通常认为,苏东易帜的故事始于波兰。1978 年 10 月 16 日,克拉科夫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蒂瓦被选为教皇,成为第一位当选教皇的波兰人,是为约翰·保罗二世。他的当选在教众中引起的热望,在现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部分天主教徒认为他会是个比较激进的教皇,因为他虽然年轻(1978 年当选教皇时仅 58 岁,而在被任命为克拉科夫大主教

时,则仅 30 多岁),但早已是梵蒂冈二次会议的元老级人物。他精力充沛、魅力非凡,是完成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遗愿的合适人选,能够将教会带入新时代。而且,他更像一位真正的牧师,并且是元老院官僚。

同时,沃依蒂瓦在神学原则上有着毫不妥协的坚定性,以及因为有在共产党国家做牧师和高级教士的经验,而且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绝对忠诚,这些都让天主教徒中的保守人士颇感安慰。他这个人尽管素来背负“有思想的教皇”的声名,尽管对于知识与学术方面的交流和争论持开放态度,但对于教会的敌人是绝不会妥协的。与信仰教义部权威的负责人、红衣主教约瑟夫·拉辛格尔一样,他早年对改革一度热情高涨,但在看到约翰二十三世因改革造成的极端后果后,惊悚之下不禁也有所收敛。在成为教皇之时,早已身为主管领导的他在教义上也更趋于稳重了。

沃依蒂瓦非比寻常的坚定信仰和卓尔不群的教皇风格,也可以从他的波兰人身份和早年不幸生活中找到部分答案。他 8 岁丧母(3 年后又失去了唯一的哥哥埃德蒙;他没有姐妹,父亲作为他唯一幸存的近亲在他 19 岁时于战争中丧生)后,父亲将他带到了卡尔瓦利亚·泽布日多夫斯卡的圣玛利亚教堂,他也在日后的岁月中多次前往朝拜。该教堂与琴斯托霍瓦一样,是现代波兰重要的圣母玛利亚朝拜中心之一。15 岁时,沃依蒂瓦就已经成了家乡瓦多维采圣母玛利亚联谊会主席。这是他对圣母玛利亚崇拜的一种早期体现,而这种崇拜则坚定了他对婚姻和堕胎的看法。

这位新教皇对基督教的想法,从波兰天主教那种独特的救世主风格中可以找到根源。在他的眼中,现代波兰就是真正宗教真理的东线前沿,它不仅饱受战火的洗礼,而且这块土地及其人民正是上帝选中的一面旗帜和一柄利剑,向东可以对抗无神论,向西则可以同唯物质论斗争。〔1〕这种观念,再加上他的长期履职地克拉科夫与西方神学和政治主流相互隔绝的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倾向于采取教区观念、有时候还采取令人不安的波兰式基督教观念。〔2〕

但这也同样解释了他对祖国具有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热情。他的几位前任都来自罗马,是大都市人,因而默许现代性、世俗宗教观和妥协,但他从一开始起就与这种观念决裂了。他的一系列国际亮相,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大型露天广场演出设计上用心良苦,而且在声光和时机的捏拿上也很有火候。这一切都表明,这位教皇是一位强势教皇,是要将

〔1〕 抨击物质崇拜和自大的罪恶当然是天主教会的事,但沃依蒂瓦的行为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1975 年,也就是在他成为教皇的 3 年前,在梵蒂冈举行的大斋期间,他明确指出在教会面临的消费主义和宗教迫害这两大威胁中,从当时形势上看,前者的危险程度更大,因此也是教会更大的敌人。

〔2〕 需要注意的是,一开始时,他支持奥斯维辛卡迈尔教派女修道院,因遭国际抗议,后来撤回支持。他也曾未加思索就把戒严状态下的波兰称为“广阔的集中营”,这一点也反映出他的类似局限性。

自己的信仰推行到全世界的,要推行到巴西、墨西哥和菲律宾,要推行到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而最重要的,是要推行到波兰。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抛弃了前任奉行的谨慎的“东方政策”,于1979年6月2日来到了波兰首都华沙,这便是他三次戏剧性“朝拜”共产主义波兰中的第一次。在华沙,他享受到了热爱他的教众人山人海的欢迎。而他的到来,也更加巩固和增强了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但仅仅让基督教寄存于共产主义的屋檐下苟且,决非教皇的兴趣所在。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他已经开始用明白无误的语言鼓励人们决不要与马克思主义妥协,并且通过基督教廷向人们不仅提供一种无声的庇护,更提供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标杆。这种做法,甚至让他的主教们也不时地感到一丝不快。 587

波兰共产党非常清楚,天主教这种从妥协到反抗的转变,会对波兰本国的稳定产生影响,从而挑战党对权力的垄断。这一方面是因为占波兰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天主教徒,非常虔诚。而更大的原因,则在于教皇这个人本身。但他们却束手无策,若禁止教皇造访波兰并发表讲话,只能适得其反,徒增其魅力,让其数百万信徒更加远离自己。即使在1983年6月已经实行戒严以后,教皇重返波兰,并在华沙的圣约翰大教堂中对自己的“同胞们”就他们的“失望与耻辱、他们的苦难与被剥夺的自由”发表讲话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们也只能站在一旁洗耳恭听。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讲话中,他对如坐针毡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说:“波兰必须在欧洲国家之间、必须在东西方之间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斯大林曾有言,教皇手上并无一兵一卒。但是,上帝并不总是在兵多将广的一边:教皇虽手上无兵,却占有人和——以及天时。1978年的波兰已经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自从1970年和1976年两次因物价暴涨引发的工人暴动以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就一直在竭力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但他的方法,如前所述,主要是通过大借外债来对食品和消费品进行补贴。到了这个时候,这一策略已显露出失败迹象。

由于库伦领导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的出现,反对派知识界人士和工人领袖们展开了远比过去更为广泛的合作。作为对谨慎出现的“自由”(即合法)工会组织的回应,“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领袖们于1979年12月起草了《工人权力宪章》。在《宪章》的众多要求中,有的要求成立自治的、无党派的工会组织,有的要求罢工的权力。官方的反应是不难预料的,那就是逮捕知识界活跃分子和开除犯事的工人。而在这些被开除的工人中,就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电工列赫·瓦文萨和其他14名格但斯克电机厂的员工。

半隐蔽的工人权力运动能否延续下去,形势变得模糊了起来。但教皇最近的一次到访却给他们壮了胆,使他们觉得当局因为害怕国际上的反对,所以不太愿意使用暴力措施,只是他们现在的活跃分子网络规模还很小,也极为危险。但是,导致民众对他们大规

模支持的原因,却是共产党于1980年7月1日宣布立即提高肉价,试图以此来解决经济困难。这已经是10年中的第3次了。

在此决定宣布后第二天,保卫工人委员会宣布自己为“罢工信息机构”。在随后的3周时间内,抗议罢工从1976年爆发抗议活动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扩展到了全国各主要工业城市,并于8月2日抵达位于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该厂工人占领造船厂,组织了一个非官方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领导人为瓦文萨。瓦文萨于1980年8月14日登上造船厂墙头,也登上了全国罢工运动的领导位置。

当局的本能反应是逮捕主犯,孤立罢工工人。此举失败后,又选择了争取时间、离间反对派人士的办法。政治局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派出代表到格但斯克与“有理性的”工人领袖谈判。甚至连库伦、米奇尼克和其他保卫工人委员会领袖也被短时间拘押问话。但是历史学家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和天主教律师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等学者赶到格但斯克,帮助工人谈判,而工人们也要求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言人作为代表:这当然主要是指声望日隆的瓦文萨。

当局被迫采取温和态度。9月1日,警方释放了所有在押人员。两周后,波兰国务委员会正式让步,同意了罢工者们的主要要求,即组织和注册自由的工人联合会。在8周时间内,遍布波兰境内的所有非正式的罢工网络和特别的联合会组织都组织成了一个单一的组织。对于这一组织的存在,当局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1980年11月10日,团结工会成为共产党国家第一个得到官方注册的独立工会,估计拥有一千万会员。在次年9月举行的全国团结工会成立代表大会上,瓦文萨当选为主席。

从1980年11月到1981年12月的波兰,到处是激动、不安和拘禁。那些对历史记忆犹新的顾问们,非常担心会对蒙羞受辱的共产党领导人造成刺激,给后者造成报复的机会,他们时刻提醒瓦文萨要谨慎。这是一次“需要自我克制的革命”。由于不能忘却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先例,库伦不断坚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时刻念叨要团结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地位”。任何人都不想给华沙和莫斯科当局派出坦克进行干预的借口。

自我克制的努力没有白费,但也并非一劳永逸。裁军和对外政策这些显而易见的政治问题,是不可能由团结工会公开讨论的。后者讨论的内容,集中在保卫工人委员会业已确立的策略,即“实践社会”:与天主教会建立联系(米奇尼克对此特别感兴趣,决心打破波兰左派人士传统的反教权主义情绪,与重新焕发出活力的天主教领导层形成同盟)、组织地方工会及工厂委员会、致力于在工作场所实现自我管理和社会权利(后一概念是从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劳工组织”借来的词汇)。

但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即使是谨慎到如此地步的“非政治性”策略,也注定会与不愿

真正放权的党发生冲突。另外,经济形势在继续恶化:由于新组成工会的工人们举行集会、抗议和罢工来表达自己的要求,整个1981年的工业生产都在下滑。在华沙,特别是在莫斯科看来,国家在漂泊,方向难以确定,政权也在逐渐失控。对邻国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妙的先例。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们尽管已经竭尽谨慎之能事,但它注定要勾起人们心中那个匈牙利事件和布达佩斯之春的梦魇。 589

1981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取代失势的盖莱克,由国防部长升任总理。后又于同年10月接替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他得到了军方的坚定支持,苏联领导人也鼓励他对逐渐出轨的波兰采取强有力措施。于是,他便迅速出手,以终止双方都知道无法永久维持下去的局面。1981年12月13日,也就是美苏核裁军谈判正在日内瓦举行的当口,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在波兰实行戒严。此举明显有预阻苏联干涉的意图。团结工会领导人和智囊们悉数被捕入狱(虽然团结工会本身直到次年才被取缔,并从此转入“地下”)。〔3〕

1989年以后,回头审视当时的情形,团结工会的崛起就仿佛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斗争中射出的一阵排枪。但1980—1981年的波兰“革命”还可以有一种更好的理解方式:它是自1970年以来,工人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压制工人运动和经济管理无能而掀起的一系列抗议浪潮的最后一组日益高亢的强音。玩世不恭、管理无方、论资排辈、草菅人命、物价高涨、抗议罢工,以及随之引发的镇压、地方工会的自发涌现、知识界持不同政见者的积极参与、天主教会的同情与支持,这一切,像极了民权社会重生过程中那一幕幕场景,也像极了安杰伊·瓦依达的两部电影《石人》(1977)和《铁人》(1981)。这两部作品以电影的笔法,动人而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的波兰那种被出卖的错觉和重生的希望。

但除此之外,这两部电影也没有更多的东西了,它们没有预测到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米奇尼克、库伦等人坚持认为,在实行戒严之前、之后,尽管共产主义日渐从内部、并自下而上地受到侵蚀,但却也不会被推翻。公开的对抗只能导致灾难的后果。这一点,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过。的确,戒严令(直到1983年7月才撤销)以及随后宣布的“战争状态”,等于承认了当局方面的某种失败——还没有任何其他共产党国家被逼到这步田地,连米奇尼克本人也将其称为“极权国家的一场灾难”(他同时也承认这是“独立社会的一次严重倒退”)。但共产主义就是关于权力,权力不在华沙,而在莫斯科。在共产主义解体这 590 出大戏中,波兰事件尽管可称为令人激动的序曲,却远不是主戏。真正的演出并不在

〔3〕 在梵蒂冈鼓励下,美国后来对处于地下的团结工会给予了极大的财政援助。有人估计,援助总额达5000万美元之多。

这里。

在波兰的镇压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关系日渐冷却的过程。这在后来被称为“第二场冷战”,但其作用却不应被夸大。尽管勃列日涅夫和里根都曾一度指责对方搞阴谋、甚至计划发动核战争,但苏美双方都不曾有此企图。〔4〕在达成《赫尔辛基协议》后,似乎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认识到冷战的终结对双方都有好处。当时的情形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都很适合,而美国现在的角色,与 1815 年击败拿破仑后数十年中沙皇俄国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即有这样一个大陆警察的存在,就可以保证不会有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国家敢来场革命,从而打破现状。

然而东西方关系却在不断恶化中。为恢复其敏感的南部边境的稳定,在该地区恢复一个听话的政府,苏联在外长安德烈依·葛罗米柯的鼓动下,于 1979 年 12 月入侵阿富汗,导致美国抵制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1984 年,苏联集团同样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对美国还以颜色),并导致卡特总统公开修正“我对苏联最终目的的个人意见”(1980 年 1 月 1 日《纽约时报》)的看法。这一入侵也促使西方领导人在两周后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欧洲增加部署 108 枚潘兴 II 式导弹和 464 枚巡航导弹。这一部署同时也是对苏联在乌克兰部署新一代 SS20 中程导弹的回应。新一轮军备竞赛似乎已在提速。

对于核弹的威力,任何人都不会有错觉,尤其是那些自己的国家在核战中首当其冲的西欧国家领导人们。其实作为作战工具,这样的武器与长矛形成了鲜明对比,恐怕是唯一的一种没有实际用途的武器。它们的作用,正是用来摆着不用的。但是,作为阻止战争的装置,核武库还是有其用途的,前提是对手相信你有可能最终使用核武器。不管怎么说,面对当时拥有 50 个陆军装甲师、1.6 万辆坦克、2.6 万辆战车和 4 000 架战机的华沙条约集团,除了核武器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西欧。

91 这就是为什么卡拉汉和撒切尔夫人两任英国首相、历任西德总理以及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领导人都欢迎部署新式战场导弹,并下令在本国部署。新近对西方联盟倍感兴趣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对此更是特别热心。1983 年 1 月,他在德国国会大厦做过一次颇具戏剧性的演讲,让西德人深深地感觉到他想抓住最新式的美国导弹的那种强烈意愿,这让在座之人稍感意外。〔5〕

〔4〕 尽管在 1981 年 11 月里根上台初期曾失口透露出,欧洲若发生核战,不见得会导致战略武器交锋,但华盛顿的西欧盟友们极为震惊,它们的强烈抗议,其程度丝毫不亚于莫斯科。

〔5〕 当然了,在法国本土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任何疑问。

在一切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或者说是出于大多数参与国的意愿,“新”的冷战开启了一种恐怖前景。在西欧,它引起了一场反对核武器的和平运动,新一代“绿党”活动家的加盟壮大了和平运动的力量。在英国,热情洋溢的、行动果断的女权主义者们,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无政府主义者们集合了朋友的力量,动用了各种关系,发起了一场持久的对格林汉康曼巡航导弹基地的包围和抗议,此举颇令长期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队感到迷惑。

阻力最大的是西德。在社会民主党左翼对新型导弹投了反对票之后,该党总理施密特被迫下台。而在基督教民主党的科尔继任总理时,这一提案又被批准了,导弹也部署了。〔6〕在中欧建立一个去核化中立区的想法,在很多德国人中还有着巨大的市场,加之西德绿党及社会民主党中的显赫人士也在为东德抵制核武器的呼吁推波助澜。在1983年10月波恩举行的一次示威集会上,前总理勃兰特敦促30万同情的群众要求西德政府单方面解除新型导弹。那场反对在联邦德国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所谓《克雷菲尔德呼吁书》总共收集到270万个签名。

但即使在政界圈内,入侵阿富汗和波兰“战争状态”都没有在西欧引起与此相似的反应。不错,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实行戒严后,施密特的第一反应是于1982年2月向华沙派出一位高规格的个人代表,以帮助波兰摆脱“孤立”境地。〔7〕而对于“反战分子”来说,让他们头疼的不是华沙的镇压,反而是来自华盛顿的好战论调。尽管北约在决定部署新型导弹的同时,也提出进行谈判以削减此类武器(即实行所谓的“双轨制”),但换了新总统的美国正在采取一种新的、更具有攻击性的策略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但好战的论调终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当里根要求“让波兰自主自决”的时候,当他 592
于1983年3月宣称莫斯科为“邪恶帝国”的时候,他面对的只是国内听众。毕竟,启动核裁军谈判的是这位总统,提出只要苏联拆除自己的导弹美国也将撤回中程导弹的也是这位总统。但此时的美国,确实在启动一项新的重大军备计划。1981年8月,里根宣布美国将储备中子弹。MX导弹由于违反《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于1982年11月被宣布放弃,但五个月后即被战略防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所取代。对此苏联表示抗议,抗议的理由很可信,即该计划违反了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对阿富汗和中美洲官方的军事援助和暗中的支持,都一直在稳步加强。1985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上升了6%。

〔6〕 到1990年人们才知道,至少25位国会议员当年曾是从民主德国领取薪水的间谍。

〔7〕 1981年12月13日,即波兰宣布实行戒严的那一天,施密特正在东德与民主德国总理昂纳克举行“峰会”。听到戒严的消息,施密特很愤慨,既是因为听说数以万计的波兰持不同政见者被监禁,更是因为波兰局势对正在改善中的两德关系而言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在和平时期,这一涨幅是史无前例的。〔8〕

早在1981年9月,里根就警告说,如果没有可靠的核武器协议,就会有一场军备竞赛;而如果有军备竞赛,美国一定会赢得这场军备竞赛。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从现在回头审视那段历史,美国的防务军备在事后被看作是导致苏联破产并最终解体的妙手。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准确。苏联早在1974年即已开始军备竞赛,这是它的经济无力承担的。但仅仅一个经济的原因,并不足以让共产主义俯首认输。

第二次冷战以及美国公开的战争叫嚣,无疑加剧了苏联这个早已年久失修、机能失调的体系。苏联曾建立过一个军事机器,这个军事机器击败了希特勒,占领了半个欧洲,并在与西方武器的一一比拼中不落下风。但这一切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其高峰时期,苏联30-40%的资源被用于军事开支,这一数字是美国的4到5倍。众多的苏联专家早已看出,这样的负担国家是不可能无期限承受下去的。时间一长,这个由几代人付出的军备欠账单的收款时间就要到了。

但至少从短期来看,外交关系的紧张在帮助支撑着这个政权。苏联也许就是个面积有整整一个大陆那么大的“波将金”村,用德国总理施密特那灰暗的笔调来描述,就是“有导弹的伏尔加河上游”。但它的确有导弹,而且这些导弹给了他的主人地位与尊严。再者,垂垂老矣的苏联领导人们,尤其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都没把美国的威胁当儿戏。593 他们与华盛顿同行一样,都认为对方阴谋率先发动核战争。里根的强硬态度,尤其是他的战略防御计划,使得老迈的苏联领导层更加不可能考虑妥协。

但苏联领导人面临的真正的军事两难困境既不在欧洲,也不在华盛顿,而是在喀布尔。这场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在时间上正好与卡特总统在任后期体现出的对苏联战备野心的暗合,却并没有为共产主义开辟出一条与自由世界作斗争的新战线。其实,将它的起因说成是国内忧虑情绪的体现才更为合理。1979年苏联人口普查显示,苏联中亚地区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人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在哈萨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几个毗邻阿富汗的加盟共和国,197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25%以上。在此后的10年中,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增长了几近一倍,而同期乌克兰只增长了4%。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俄罗斯这个欧洲国家,在人口问题上正在受到来自内部少数民族的威胁。正如健康状况不佳的勃列日涅夫于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大上所承认的那样,国家仍有“民族问题”需要处理。

〔8〕 由于GDP持续增长,从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1979年,国防开支在美国财政支出中占有的相对比例一直在下降,即使在越战期间也不例外。此后,这一数字激增,按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看,1987年的水平比1980年上升了24%。

要是占领阿富汗后,能够在喀布尔成功地建立一个稳定、友好的政府,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也算得上是一次双重的成功。它一方面可能重新确立莫斯科在中东日见衰落的存在,另一方面可以向梦想独立的新一代苏联穆斯林们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当然,苏联在阿富汗遭到了失败。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他们的将军们不仅忽视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重复了很多美国犯下的错误,甚至还忘掉了沙皇俄国 80 年前自己在同一地区犯下的错误。苏联在一片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是灾难性的,只起到了相反的结果,激起了由外国人武装起来的游击队和宗教激进分子永不妥协的强烈反抗。帝国自身的民族问题非但没有“处理”好,反而有火上浇油之嫌:喀布尔由苏联扶持的马克思主义当局对莫斯科在穆斯林世界及国内外的地位作用甚微。

一言以蔽之,阿富汗是苏联的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对整整一代苏军士兵的创伤,要在以后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至 90 年代初,每 5 名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中,据估计有 1 人确认患有酗酒的问题。而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很多士兵由于找不到稳定工作,滑向了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组织。但早在此之前,苏联领导人就已经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严重到了什么程度。除了人员和物资的损失以外,在阿富汗山区长达 10 年的摩擦式战争成了苏联长久的国际性耻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红军要在境外部署兵力已经不可能了。后来,政治局成员伊戈尔·利加乔夫对美国记者瑞姆里克承认道,自阿富汗战争之后,在东欧用兵的问题就想都不用再想了。

这个事实的背后,无疑显示出苏联已经脆弱到了什么程度,就连一次新殖民主义战争的冲击都已经承受不起,尽管这次战争失败得令人叹为观止。但就像 80 年代初期日益加速的军备竞赛一样,一场战争的失利也不足以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因为恐惧、惯性和统治国家那批老人的个人利益,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也许还会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这个因素不是因为有对冲力量,也不是因为有持不同政见运动。无论在苏联本身还是在其附庸国,这些因素都是没有的。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做到这一点的,也正是一位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事业的指导性前提,是其对历史规律及集团利益的信仰,用这种信仰来抑制个人的动机和行为。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恰恰是,其最终的命运也将由人的命运来决定。1982 年 11 月 10 日,年纪 76 岁、重病已久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最终离开了这个已如幽灵一样的国家。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也已经 68 岁了,健康状况也不好。仅仅 1 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他就死去了,总书记职位由 72 岁的契尔年科接过。契尔年科身体更糟,在 1984 年 2 月举行的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甚至连悼词都无法念完。13 个月之后,他也死了。

三位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老共产党人接二连三地死去,是具有一定象征意

义的：那些对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起源有着第一手记忆的、不仅身体、而且事业都遭受过斯大林打击的老一辈党的领导人正在逐渐逝去。他们继承了一个集权专制的官僚主义老人政治体制，并监督着这个体制。这个体制的首要目的，就是关注其自身的存亡：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年龄幼小的那个时代，不死于非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从此以后，领导国家的将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也并不是一定会远离专制主义，但却别无选择地必须去解决腐败、停滞以及从头到脚渗透到苏联体系中的效率低下的问题。

契尔年科的继任者，就是于1985年3月11日正式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于1931年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41岁时入选苏共中央。而仅仅13年后，他已经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仅比前任苏共总书记年轻20岁，甚至比除了克林顿之外的所有美国总统都年轻。他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安德罗波夫的鼓励和提携，而且被广泛地看作是一位改革者。

是改革者，但绝不是激进分子。他是一位十足的政党官员，在党内一路攀升，从1956年起任斯塔夫罗波尔共青团第一书记，到担任地区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再到1970年入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他体现出了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很多思想情结：从来不公开批评党或党的政策，深受1956年匈牙利事件意义的影响并为之激动，在赫鲁晓夫时代被打倒，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压制和惯性力量深感失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古典型改革派共产党人。因此50年代初他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时与姆莱纳尔成为好友就不仅仅是巧合了，后者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但就像他那一代人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一样，戈尔巴乔夫首先是一位共产党人，然后才是一位改革家。正如他1986年2月在接受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采访时解释的那样，列宁式共产主义对他来说一直是一种纯粹的、没有被污染过的理想。那斯大林主义呢？“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对手拼凑起来、用以大规模对苏联和社会主义从整体上进行污损的概念而已。”〔9〕

毫无疑问，作为苏共总书记，是应该这样说话的，即使是在1986年。但是戈尔巴乔夫肯定也是相信这句话的，而且他发动的改革从意愿上说也是有意识地在走列宁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路线。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许在意识形态上比他的几位前任更加严肃。赫鲁晓夫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若是英国人，一定投托利党一票。戈尔巴乔夫最喜欢的外国政治家是西班牙的菲利普·冈萨雷斯，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发觉冈萨雷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与自己的想法最为接近。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偶

〔9〕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家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受尽了苦难。在大清洗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双双被监禁和放逐。但这位新任的苏联领导人直至1990年才承认这一点。

然的。

戈尔巴乔夫所怀有的希望的强烈程度,最确切地反映了在苏联国内反对力量的缺失。党造成的混乱,只有党自己才能清理。幸运的是,党现在选出的这位领导人既有精力,更有足够的从政经验来做出这种努力。对于一位高级苏联官僚来说,戈尔巴乔夫受教育的程度好得出奇,而且阅读也十分广泛。除此之外,他还本能地体现出列宁所拥有的一种素质:为了达到目的,愿意对自己的理想做出妥协。

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继承下来的困难是尽人皆知的。在70年代时,他曾周游西欧,那一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起,这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就有意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死气沉沉的苏联经济、繁冗的高层机构盘根错节的低效率和腐败进行大修。外债在稳步上升。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到1986年时,苏联最大的出口商品石油收入已经从70年代最高的307亿美元回落。到1989年时,外债达到了540亿美元。整个70年代,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增长,现在更是处于萎缩状态。过去,苏联的经济产出还只是质量上的落后,而现在,则连数量上也不够了。专断的计划经济目标、各种地方反复出现的物资短缺、供给瓶颈,以及物价和市场指标的缺失,使人们丧失了所有的主动性。 596

正如匈牙利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倡导的那样,在这样的体制下进行“改革”的出发点,是在定价和决策上的非中央化。但这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苏联几乎没有任何人有独立从事农业和推行市场经济的第一手经验,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制造商品,该如何定价,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找买主。即使在1986年颁了《个体劳动活动法》允许进行有限的(即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后,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办企业,这实在令人吃惊。3年后,整个苏联2.9亿人口中,也才只有区区30万商人。

此外,所有即将进行改革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如果经济改革从决策的非中央化开始,或者首先给当地企业以自主权,不再听命于远在天边的中央,那么生产者、经营者和商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功能呢?从短期来说,物资短缺情况和供应瓶颈只会加剧,而不是缓减,因为每个人都会退回到过去的区域自足型经济,甚至就在当地从事以物易物的经济。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是一声令下就会有的。而且在一个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已经被批透批臭的社会,“市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风险(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本人都一直避免提及市场经济,甚至在此之后也仅仅使用“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

改革的本能就是妥协,即试着从上至下创建几家有特权的企业,解除它们的官僚主义束缚,并为它们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及熟练工人。有人提出理由说,这是为了向其他那些相似的企业树立一种成功的、可以赢利的榜样。这样做的目标,是实行可以控制的现代化,逐渐过渡到按供需关系定价和生产。但因为运作前提有问题,即当局通过行政命令创

建高效企业,这种方法已经先天注定是无法成功的。

通过将紧缺资源提供给少数农场、作坊、工厂或企业,确实可以打造出几家可行的、可以赢利的单位,但这只是暂时的和抽象意义上的,而且还必须提供大量的补贴,并付出让其他不受宠的企业饿死的代价。其结果是更为严重的扭曲现象和更大的挫折。另外,农场经营者和各地厂长们也不知道风向会如何变化,总是担心中央计划的成规还会再度回头,因此无论有什么物资都会囤积起来,以免中央计划经济的控制再度套紧。

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来说,这一套他们早就见识过了。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自从1921年以来,苏联的每次改革都有着相同的开始,也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最终熄火。严肃的经济改革意味着放松或放弃管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却不仅从一开始起就加剧了问题,而且还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失控了。但是共产主义就是依赖于管控的。的确,共产主义就是管控,对经济的管控,对知识的管控,对运动、意见以及对人的
597 管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辩证法,而辩证法——正如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布痕瓦尔德对年轻的约尔格·塞姆朗所说的那样——“就是永远双脚先落地的艺术和技巧”。〔10〕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要在与苏联经济角力的过程中双脚先落地,就必须接受苏联的经济之谜无法孤立地解决的事实。但这只是症状之一,真正的问题还广泛得多。在指令性经济中,通过政治和机构进行控制,正是苏联这个国家那些有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在,那些如疾病般出现在某地的可笑情况,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腐败,也正是他们权力的源泉。要让党来改革经济,它首先就必须改革自己。

这,同样也算不上什么新鲜观点。列宁及其继任者统治时间那些周期性的清洗,正是这种似曾相识的阻力的典型性表现。但时代已经变了。此时的苏联,无论如何进行压制,也无论如何落后,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嗜杀成性的极权暴政国家。得益于赫鲁晓夫里程碑般的住房改革,大多数苏联家庭现在都拥有了自己的公寓房。尽管这些租金低廉的房屋外观难看,效用也很差,但毕竟给普通人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私密性和安全感。这是他们的前辈们享受不到的,他们也不再暴露在告密者的注视之下,再也不用被自己的亲人和邻居出卖给当局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怖时代已经结束。而且至少对于戈尔巴乔夫这代人来说,回到过去那种大规模逮捕和党内清洗的时代也已经不可想象了。

为了打破党组织的壁垒,推进经济改革计划,这位总书记以“公开性”为突破口:即官方鼓励对一些精心限制的话题进行公开讨论。通过让人民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改革,提高人民的期望值,戈尔巴乔夫将制造一种杠杆,这样他自己和支持者们就可以化解官

〔10〕 约尔格·塞姆朗《美好的节日》,巴黎,格拉赛出版社,1980年,第100页。

员们对自己计划的反对。这也是一种极好的计划,也是进行改革的专制者们常用的。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官方公开性的紧迫需求来自于1986年4月26日的那次灾难性事件。

那一天凌晨1点23分,位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电厂四台石墨反应堆中的一台爆炸了,1.2亿居里的放射性物质被排入大气。这一数字比广岛和长崎加在一起还要高一百多倍。原子辐射尘埃向西北方向进入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远到达威尔士和瑞典,共有500万人暴露在其危害之下。除了造成30名抢险工人当场死亡外,另有3万人日后死于切尔诺贝利核辐射造成的各种并发症,包括邻近地区居民中的2000例以上的甲状腺癌。 598

切尔诺贝利并不是苏联的第一次环境灾难。1957年,乌拉尔山中叶卡捷琳堡附近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处的一处秘密研究基地的核废料库爆炸,对一片8公里宽、100公里长的区域造成污染。另有7600万立方米的核废料被倒入乌拉尔河系统,造成长达数十年的污染,先后共有1万人被撤离,23个村庄被清除。车里雅宾斯克的反应堆是1948—1951年间使用苦力建造的,属于苏联的第一代核设施。〔11〕

其他相同级别规模的人为环境灾难,还有贝加尔湖的污染,咸海的毁灭,向北冰洋和巴伦支海倾倒和丢弃数十万吨废弃的海军舰船及其核物质,以及在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地区形成的面积相当于意大利那么大的、因生产镍制品而形成的二氧化硫污染区。以上事例和其他一些生态灾难,既是漠不关心、管理不善以及苏联实行的对自然资源野蛮的“砍烧耕作法”的直接后果,也是那种保密文化的产物。即使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初爆炸地点几公里外就有一座大城市,官方竟也数十年秘而不宣。也就在这座城市,1979年曾因市中心一座生物武器工厂泄漏而造成数百人染上炭疽热死亡。

对内部人士而言,苏联核反应堆的问题是广为人知的。1982和1984年的两份克格勃报告曾警告过设备(由南斯拉夫提供)“质量低劣”,切尔诺贝利的第三和第四两台核反应堆也存在着问题(1986年爆炸的正是后者)。正像上述情报一直被隐匿不报、也不采取任何措施一样,苏联领导人对4·26爆炸的第一本能反应仍然是装聋作哑。毕竟,当时整个国家还有14座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电厂在运行。莫斯科第一次承认有不幸事件发生时,已经过去整整4天了,而且也仅仅是两句话的官方公告。

但切尔诺贝利事件想再保守秘密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苏联自己无力处理灾难造成的损毁,戈尔巴乔夫于两周后被迫首次发表公开声明,部分地承认了这一事件,并呼吁国外援助,特别是专业人员。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的同胞们第一次公开意识

〔11〕 这件事是梅德维杰夫在流亡期间于1979年发表的《乌拉尔山脉核灾难》的主题。

到官员的无能和对生命和健康的冷漠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同样,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被迫承认国家的问题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对这次灾难和随后的掩盖企图需要负责的那些人所体现出来的愚蠢、欺骗和玩世不恭是不能被当作对苏联价值观的曲解而加以原谅的。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正是苏联的价值观。

从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手法。在这年12月,世界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结束了在下诺夫格勒的高尔基市的软禁生活,这预示着次年将有大量苏联政治犯被释放。出版审查也松绑了。1987年,瓦西里·格罗斯曼久久不能出版的《生命与命运》面世了。而仅仅在26年前,党的意识形态主管苏斯洛夫还曾预言说该书“两三个世纪”都不可能出版。警察也接到命令,停止对国外电台的干扰。这位苏共总书记还借用1987年1月在苏共中央举行电视采访时讲话的机会,使这一事件成为更具有包容性的民主。他就这样当着党内保守分子的面,对全体国民讲话。

到1987年时,每10个苏联家庭中已经有9个以上拥有电视机,而戈尔巴乔夫的手法一开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通过开辟公开渠道,对国家的弊病进行半公开的讨论,通过打破领导阶层对信息的垄断,迫使整个党跟着他出牌,也使得体系内部至今保持沉默的改革者们站出来说话,并给他们以支持。在1987—1988年间,这位苏共总书记创造了一种需要变革的民意基础,几乎到了连他自己都无法左右的地步。

大量非正式组织也涌现了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87年于莫斯科数学研究所创立的“改革俱乐部”。该俱乐部又成立了一个名为“纪念”的组织,其成员致力于“让人们记住斯大林时代的死难者”。一开始,他们都惊奇于自己居然没给处死,毕竟,苏联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随后,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组织迅速扩大。到1988年时,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开始主要来自党外,来自这个国家新近出现的公众舆论。

真实的情况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目标的逻辑性,以及他在实践中呼吁全国民众反对他在党内的对手的决定,已经改变了改革的方向。他一开始是一位党内的改革者,现在已经渐渐成了一位要对党进行改革的人,至少是试图绕过党内阻碍改革的力量。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首次在公开讲话中说到了斯大林的罪行,并警告说,如果党不支持改革,就将失去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1988年6月在党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了进行改革和给出版审查松绑的承诺,并呼吁准备在次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也就是有竞争性的)选举。1988年10月,他将几个主要的持反对意见的人降了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利加乔夫这位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他的人。同时,他还自己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即国家元首),取代了最后一位老资格人物葛罗米柯。在党内,他的身后还有一股反对力量。但在全中国,他的声望已经达到了顶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继续前进的原因,而且实际上除了继续向前,他已经别无

选择。〔12〕

1989年5月和6月间的选举,多少算得上是苏联自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这不是一次多党派选举(多党派选举要到1993年才出现,那时苏联早已不再存在),结果是预定好的,很多席位保留给了党内候选人,而且不允许党内竞争,但是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包括了很多独立的和批评的声音。选举进程对大约1亿观众转播,萨哈罗夫等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已日益失去公众信任的党的特权)也没有被置之不理,虽然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乐意。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正在流失。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励下,人民代表大会将于次年2月正式进行投票,从苏联宪法中删除关键性的第六条,即赋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13〕

对1985到1989年苏联国内形势剧变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戈尔巴乔夫及其新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主导的重大外交政策变革。从一开始起,戈尔巴乔夫就决心给苏联减负,尤其是繁重的军备累赘。上台还不满1个月,他就停止了导弹部署,并提出举行无条件的核武器谈判。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将核武库减少一半。1986年5月,在与里根于日内瓦进行了一次意外成功的“峰会”(这是史无前例的5次会谈中的第一次)之后,戈尔巴乔夫同意只要有助于谈判,可以将美国的“前沿武器系统”从战略武器谈判中排出。

第二次峰会于1986年10月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就核裁军达成协议,但却为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1987年末,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起草了一份《中程核武器条约》,并于次年签字认可。这份条约全盘接受了里根早些时候提出的“零选择”提议,等于让苏联承认了欧洲的核战争是无法打赢的。而且,这份条约还成了1990年签订的另一份更为重要的条约的前奏:对欧洲大陆上常规军力的存在和运转都作了严格的限制。

从华盛顿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的让步自然成了里根的胜利。因此,对于主张“零和游戏”的冷战专家们来说,这也是莫斯科的失败。但对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的戈尔巴乔夫来说,巩固住稳定的国际环境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为他赢得了在国内进行改革的时间和支持。而这一连串会谈和协议的重要意义在于,苏联承认在国外搞军事对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作用甚微。就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访问法国时被表述为“意识形态”并非制定外交政策的恰当依据。

〔12〕 数月后,1990年1月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在公众推崇度上,戈尔巴乔夫仅排在彼得大帝之后,远超马克思和列宁。

〔13〕 正是萨哈罗夫在电视直播上要求废除第六条,将自1918年来被共产党“窃取”的权力还给人民代表,这个问题才公开化了。戈尔巴乔夫最终亲自关掉了萨哈罗夫的麦克风,但已经来不及了。

这些观点反映出,他正在接受新一代苏联外交事务专家们的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同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认识到,通过精心计算的让步,苏联同样可以对外交关系进行控制,而不是搞毫无结果的对抗。相对于国内面对的无法处理的问题而言,外交政策是戈尔巴乔夫可以直接施加控制的一个领域,因此,他也希望最先在这一方面取得效果。况且,苏联对外关系中严格的超级大国纲领是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他对西欧关系的重视并不比对美国少。他经常访问西欧国家,并与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德国总理科尔和英国首相撒切尔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撒切尔对戈氏“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的评价,一时成为名言)。^[14]

确实,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欧洲政治家,欧洲问题具有优先性。他对结束军备竞赛和停止囤积核武器的强调,与其将苏联定位为角色鲜明的欧洲国家的新思路是密不可分的。他在1987年宣称:“军备应该削减到足以应付严格防御目的即可的水平。华约和北约都应该修订一下自己的战略概念了,要更多地转向防御目的。‘欧洲家庭’内的任何一间屋子都有权保护自己不受盗贼侵犯,但前提是不能毁坏邻居的财产。”

本着同样的精神,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位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从阿富汗抽身的紧迫性。他在1986年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将阿富汗称为苏联“流血的伤口”。5个月之后,他宣布撤出6000名苏军士兵,并于同年11月完成重新部署。按照于日内瓦在两个超级大国保证下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签订的协议,苏军从1988年5月开始撤离阿富汗:最后一名红军士兵于1989年5月15日撤出。^[15]

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富汗战争非但没有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如果苏联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民族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它自己造成的:发明出臣民“国”这一概念,并由自己来为它们加封为地区或者加盟共和国的,正是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莫斯科曾经鼓励在各个民族的城区或“首都”建立一些机构和知识界团体,也就是在那些50年前从未听说过何为民族、何为国家的地方。在高加索地区和其他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们基本上是从该地区占主导的民族中挑选的。为了牢牢掌握自己的封地,不难理解这些人会去认同“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在中央机关出现裂痕的时候。因各地管理者保护自身利益的急迫心情造成的离心力的作用,使党正在造成分裂。

[14]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当时迎接了莫斯科向来不喜欢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德罗·纳塔。

[15]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阿富汗的情况与美国在越南的情况如出一辙。喀布尔的傀儡政权在失去外国武器援助后举步维艰,终于在1992年被塔利班武装推翻,国际保证形同虚设。

对于这一进程,戈尔巴乔夫似乎还没有完全看明白。他在1987年对全党说:“同志们,我们可以真的说一声,对我国来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也许,对于自己的话,他也不完全相信。但是,他肯定觉得中央的控制稍稍放松一点,长期的怨忿稍稍缓和一点(比如说在被放逐亚洲数十年后,克里米亚鞑靼人终于被允许重返家园),就足够了。苏联地域广大,西起波罗的海、东达鄂霍次克海,拥有100多个民族,相互间不满已久。过去不敢出声,现在由于鼓励公开性,怨忿之声四起。对于这样一个大陆帝国,戈尔巴乔夫此举严重失算了。

对于苏联帝国广阔疆域的边缘地区发出的自治要求,戈尔巴乔夫反应不足并不令人奇怪。我们早已看到,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改革派共产党人”,尽管是一个很不一般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他对变革和更新的要求抱有同情心,却不愿意去进攻这个体系的核心原则,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就像很多在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一样,他真的相信进步的唯一道路就是回归列宁主义“原则”。也许列宁的事业本身就有错误这样的念头一直离他很遥远。直到1990年,他才最终批准在国内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公开批评列宁的作家的作品。

在新近发现的材料中有一种官方容忍流行音乐的声音,其中的那种无法模仿的论调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早期目标精髓的最好例证。1986年10月的《真理报》这样表述道:“摇滚乐也有其存在的权利,但它必须有优美的曲调、有意义、而且演奏也要有水平。”戈尔巴乔夫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曲调优美的、有意义的而且演奏也有水平的共产主义。必要的改革可以进行,适当的自由也可以允许,但并不是可以毫无节制地颁发许可证。一直到1988年2月之前,对于独立出版商和印刷业,政府一直在进行坚决的打压。

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最令人不解的一点,就是他们总是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目的,以为可以改革体制的某些方面,而不触及其他方面,包括引进市场激励机制却保持中央计划控制,允许更大的言论自由却保持党对真理的垄断等。但是部分改革,或是对某一方面孤立地进行改革,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控制下的多元化”或“社会主义市场”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至于共产党可以一方面维持“领导地位”、一方面摘除七十余载绝对权力产生的病理赘生物的想法,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某种天真。在专政体制下,权力是不可分享的——放弃部分就终将失去全部。将近四百年前,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一世对此的理解要比戈尔巴乔夫好得多。当苏格兰长老们对主教们的既定权力提出抗议时,他干脆地回绝道:“无主教,便无国王。”

最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控制型革命被其自身引发的大规模矛盾扫荡得干干净净。事后,他不无遗憾地说道:“自然,未能成功地将整个改革进程置于我初衷的框架内让我感到很不安。”但初衷与框架并不是兼容的。一旦那些起维持作用的支撑物,如新闻审

查、控制和镇压等等都被撤除掉了,那么,苏联体制下所有由此而衍生的东西,如计划经济、公众舆论以及党的垄断权,就将轰然倒下。

戈尔巴乔夫没有实现他那个高效率、而且没有功能性障碍的改革型共产主义的目标。的确,他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但是他的成就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苏联,批评者和改革者们没有独立的、甚至没有半自主的机构可以代表自己来发起行动。因此苏联这个体系只有从内部加以拆除,或者自上而下主动进行解体。通过今天引入一项改革、明天又引入另一项的方法,戈尔巴乔夫演进式地腐蚀掉了那个支撑自己崛起的体系。他用党的总书记这一职位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从内部摘除了党的专政。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没有先例的成就。1984年契尔年科去世时,没有人预测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一点。用他的一位亲密顾问的话来说,戈氏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创造性的错误”。〔16〕回顾那段历史,人们禁不住会想,他崛起的时机真是巧不可言——正当苏联整个体系开始动摇之际,出现了一位洞察到这一点的领导人,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走出帝国的战略。难道真的是“时间一到,主角也到”?也许吧。而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决不像其前任们那样仅仅是一个党务干部。

但他对自己在干些什么却根本没有什么洞察力。要是有的话,他自己一定会被吓得不轻。但是他的批评者们却比他看得清楚。一方面可以理解,党内的强硬派都痛恨戈尔巴乔夫,都热烈赞成1988年3月13日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人》报上那篇著名的书信。信中,列
604 宁格勒一名中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愤怒地(事后证明,她完全有理由愤怒)警告说,新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把国家引向倒退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有给予过激进的改革者无条件的支持,反倒是后者对前者明显的优柔寡断越来越感到沮丧。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弱点,为了使事件处于控制状态下,他总是感觉到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占据中央位置。对新观点他给予鼓励,但当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等激进改革派敦促他走得更远一点时,他又溜回党内保守派的怀抱之中。他的这种摇摆不定,不愿按设计的改革逻辑推进的迹象,以及坚持认为改革不能走得太远、也不能走得太快的态度,都让他早期的崇拜者们有一种被涮了的感觉。

麻烦在于,由于放弃了党的权力垄断和主导性,戈尔巴乔夫也同样等量地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于是,他被迫缔结战术同盟,并在他人的各种极端立场之中寻找平衡。对于民主派政治人物来说,这种做法虽不舒服,却也并不陌生。但在已经习惯了70年专政统治的国民眼中,这种伎俩只会让戈尔巴乔夫显得很软弱。从1989年开初几个月起,这位苏联总统在民意调查中一路下滑。到1990年秋,戈尔巴乔夫的民众支持率只剩区区21个

〔16〕 安德烈·格拉切夫的话。引自阿奇·布朗《戈尔巴乔夫因素》(牛津,1997),第88页。

百分点了。

于是,他还没有从权力的位置上下来,就早已决定性地从荣誉的位置上下来了。但这只是在国内。在其他地方,“戈尔巴乔夫热”却正在掀起高潮。他更加频繁地出访,所到之地,都受到西欧政治家们的热情迎接,受到热情人群的欢呼。1988年末,戈氏热烈的追捧者之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冷战“结束了”。从东欧看,下此断言似乎还让人觉得有点为时过早。但就算在东欧,戈尔巴乔夫同样也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在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国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的痛苦虽然也被人们注意到,但与他发出的那些外交声明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其中最为报道的,就是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戈尔巴乔夫先是宣布单方面裁减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军力,接着又向听众建议说“自由选择是一条普遍的原则,不应该有任何例外”。这已不仅仅是对“勃列日涅夫原则”的抛弃,而是莫斯科再也不会用武力将自己版本的“社会主义”强加在东欧兄弟国家之上的承诺。戈尔巴乔夫正在承认的、而且立即被理解为已经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卫星国的人民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走自己的路了,无论是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其他什么道路。东欧即将重新走进历史。

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自1985年起即已逐渐摆脱了对它的附庸国的直接监督,但这种日渐远离的情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这些人民民主国家仍然被一些专制政 605
党集团统治着,他们的权力建立在大规模镇压机器上。警察和情报机关仍牢牢地处于掌控之中,紧盯着苏联自己的安全机关,在行动上也半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当布拉格、华沙或是东柏林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莫斯科的无条件支持再也靠不住时,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自己的臣民都没有认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不确定因素让波兰局势都给占全了。一方面,宣布实行戒严重申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镇压团结工会并让其领导人噤声非但解决不了国家的任何根本问题,反而使情况更糟。债务没有丝毫改善,而且由于镇压行动导致的国际谴责,波兰领导人再也无法通过继续借债来让自己摆脱困境了。事实上,他们面临的正是在70年代里曾试图解决的问题,只不过现在的选择更少了。

另外,反对力量虽然被定了罪,却并没有蒸发。秘密出版仍在进行中,演讲、讨论及舞台表演也没有停止。团结工会本身虽被禁止,却维持了事实上的存在,尤其是当其最著名的代言人瓦文萨于1982年11月结束拘禁获释(并于次年缺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当局也不敢冒险拒绝教皇于1983年6月的回访。自此之后,教会更加活跃地参加到地下及半官方活动之中。

政治警察倾向于进行镇压,并且干下了一件臭名昭著的事。1984年,为杀一儆百,他

们策划逮捕并杀害了一名很受欢迎的牧师泽西·波皮鲁兹科,罪名是“破坏民心”。但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早已知道,这种挑衅和对抗行为已经不起作用了。波皮鲁兹科的葬礼吸引了多达 35 万名群众。这一事件非但没有吓倒反对力量,反而彰显了民众对教会和团结工会的支持程度,不管它是不是合法组织。社会是决不会顺从的,而国家也因日益绝望而孤注一掷。80 年代的波兰正在快速进入这两者的对抗状态。

党的领导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提议“进行改革”(在华沙如是,在莫斯科亦如是)。1986 年已经担任国家总统的雅鲁泽尔斯基释放了米奇尼克和团结工会的其他领导人,并通过新设立的“经济改革部”制定了一份温和的经济改革方案。方案的目的之一,就是重新吸引外资,以填补此时已经接近 400 亿美元的国债。^[17] 1987 年,政府竟问波兰民众喜欢哪种类型的经济“改革”,此举算得上是对民主的一种奇怪默许。摆在波兰人民面前的问题是:“你们愿意面包涨价 50%、汽油涨价 100% 呢,还是汽油涨价 60%、面包涨价 100%?”不出意料,公众的答复大体上是“都不愿意。”

这个问题本身,以及做出提这个问题的决定,都很好地说明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经破产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波兰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部分地是因为团结工会的同意,这多少说明当局的公信力正在崩溃。尽管已经被禁,团结工会在国外的组织却保存了下来。于 1985 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建议接受波兰加入的,正是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分部。在提出建议的同时,团结工会还坚持认为,雅鲁泽尔斯基的不彻底改革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一揽子彻底的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18]

到 1987 年时,波兰局势最引人注意的方面,就是波兰党及其各部门完全无助的情况。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是采取实际行动处理自己的权力垄断面临的可见威胁,而是滑落到了去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的境地。米奇尼克等人 10 年前提出的“反社会”理论正在成为实际上的权威,并且掌握了主导权。1986 年以后,反对派内部争论得更多的,已经不再是如何教育社会争取自由,而是与政府的交锋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目的是什么。

以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为首的华沙计划与统计学院的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们,早已着手在为摆脱中央计划之后的自主私营经济(即市场经济)制订计划。在一些“非官方”波兰人中间、在海外,人们广泛地讨论着这些计划和其他一些建议。但政治“现实主义”和 1980—1981 年间的“自我克制”的目标仍然在起作用,因为对抗和暴力正是党内强

[17] 1986 年美国取消了阻止波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否决票。作为条件,波兰释放了所有剩余的政治犯并实行大赦。

[18] 参见哈罗德·詹姆斯《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第 567 页。

硬派的拿手好戏,因而被小心而且成功地避免了。对话是一回事,但是“冒险”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不难预料的是,波兰党最后垮台的契机,是另一次经济“改革”的企图。或者说得客气点,是削减国家再也无力承受的债务的企图。1987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约25%,1988年又上涨了60%。在1970年、1976年和后来的1980年出现过的景象,现在又再次出现了:暴涨的物价激起了一轮罢工浪潮,在1988年春夏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形成了大规模的堵塞交通和占领工厂的情况。在过去,由于没有什么杠杆可以撬动工人的力量,共产党当局要么放弃涨价,要么只能诉诸武力,或者双管齐下。现在,他们有了第三种选择——请工人们自己的领袖来帮忙。1988年8月,内务部长切斯拉夫·基斯沙克催促瓦文萨(一位未得到承认的组织的未得到承认的领袖,不过一介白丁而已)与自己会谈,以结束这个国家的工人抗议活动。瓦文萨一开始不愿意,但最终同意了。

瓦文萨对罢工者的号召力是不成问题的(毕竟1981年以来,这几年团结工会的道德权威增长了不少),但引发罢工的原因却不会消失:通货膨胀已经接近每年1000%的水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团结工会与政府进行了一些零星的非正式接触,激起了更加响亮的呼吁“改革”的声音。当局在无助地摇摆,时而做出姿态,时而进行威胁:撤换部长、拒绝谈判计划、承诺经济改革以及威胁关闭格但斯克造船厂。就这样,公众对国家的信心崩溃了。

1988年12月18日——不知是巧合还是具有某种征兆,这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做的那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演讲的一周之后——华沙成立了“市民委员会”,计划与政府进行全面谈判。雅鲁泽尔斯基看上去已经别无选择,最终只好默认客观存在,并强迫仍然心有不甘的中央委员会同意谈判。1989年2月6日,共产党终于正式承认团结工会为谈判伙伴,并与其代表召开了“圆桌”会谈。谈判持续到4月5日(巧的是,这一天正好又是苏联一次重大事件后的一周,即公开进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后的一周),各方同意独立工会合法化、进行广泛的经济立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新的国会。

事后回顾这一事件,可以说圆桌会议以谈判的方式终结了波兰的共产主义。至少对于部分谈判者来说,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但谁也料不到的是,结局竟来得这么快。计划于6月4日举行的选举虽说会允许前所未有的真正选择,但其本意还是为了确立共产党的多数派地位:国家参议会的选举是真正而开放的,但在议会选举中,半数席位已经预留给了共产党官员候选人。而且,政府把选举日期定得这么早,也是希望能够因对手缺乏组织与经验而占点便宜。

结果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在米奇尼克的临时《选举日报》的支持下,团结工会获得了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席,以及议会中所有允许公开竞选的席位。同时,在“预留”

给共产党候选人的席位中,仅有两人得到要求的 50% 以上的选票,有资格当选。在这种全面溃败和史无前例的公开耻辱面前,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可以选择不承认投票、再次实行戒严,或者接受失败,放弃权力。

然而,选择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私下跟雅鲁泽尔斯基说得很明白,选举必须有效。雅鲁泽尔斯基的第一个想法是邀请团结工会与自己组成联合政府,好有个体面的妥协,但却遭到回绝。相反,经过数周进一步谈判和共产党屡次提名自己的总理候选人而失败后,共产党领导层不得不向时势低头。1989 年 9 月 12 日,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被批准为波兰战后第一位非共产党籍总理(尽管共产党仍然保留了对几个关键部长职位的控制)。

接着,团结工会又下出了一手精明的政治妙棋。他们在议会内的成员同时投票,选举雅鲁泽尔斯基担任国家元首,有效地将共产党温和派纳入了随之而来的过渡进程,并缓解了他们的尴尬。第二个月,马佐维耶茨基政府宣布了实行“市场经济”的计划。这一计划是放在稳定计划中提出的,即所谓的“马佐维耶茨基计划”,于 12 月 28 日被议会批准。第二天,波共的“领导地位”的条款终于从宪法中删除了。还不到 4 周,即 1990 年 1 月 27 日,波兰共产党连自己也解散了。

我们不能被波兰共产党垮台前最后几个月的狼狈而蒙蔽了眼睛,而应该看到在此之前漫长而缓慢的积累过程。1989 年这台大戏的大多数演员,雅鲁泽尔斯基、基斯查克、瓦文萨、米奇尼克和马佐维耶茨基等,都已经在舞台上活跃了很多年了。波兰在 1981 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和相对自由,之后是戒严,然后迎来了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压抑和半容忍带来的痛苦,最后,又经历了一次 10 年前经历过的经济危机。相对于天主教会的大力量、团结工会在全国上下获得的广泛支持和长期以来波兰人民对共产党统治者的不满,共产党能够抓牢政权,维持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甚至当它最终垮台时都让人觉得有点意外。这真是一次漫长的谢幕。

波兰实行戒严引发的后果,表明了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也有不足的地方。镇压手段使得反对力量在变得更团结的同时,也变得更加谨慎。而在匈牙利,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却产生了一种相似的谨慎。当局连续 20 年实行的容忍政策,已经模糊了官方对不同政见给予宽恕的准确界限。毕竟,匈牙利是希尔顿于 1976 年 12 月掀开铁幕开办酒店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是葛培理在 80 年代曾三次而不仅是一次公开访问过的国家,也是在同一个 10 年中有两位美国国务卿和一位副总统老布什访问过、并暗示过很喜欢的国家。到 1988 年为止的 10 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匈牙利无疑有着美好的形象。

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反对党的力量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走向公开。伪装与计谋

似乎压倒了勇气,特别是对于那些还记得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而且,在卡达尔治下的匈牙利,生活虽然单调了点,却也还是可以忍受的。实际上,正如前一章所述,官方经济在试验过多种改革方式与实行“新经济机制”后,与波兰相比也只是半斤八两。可以肯定的是,“黑”经济(或称“平等经济”)的存在,使得很多人可以过上比邻国更高水准的生活。但是匈牙利社会统计学家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国家正经历着收入、健康和住房条件方面的严重不公平现象,社会流动性和福利水平实际上也落后于西方。此外, 609 超长的工作时间(很多人不得不做两到三份工作)、过高的酗酒比例、精神障碍等,再加上东欧最高的自杀率,都长时间折磨着匈牙利人。

这些,都是不满的充足理由。但是,却没有产生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虽然在80年代,一些独立的组织浮出了水面,但基本上都限于环境问题和抗议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虐待。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默默同情的政策是可靠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官方对1987年成立的、带有明显民族主义性质的匈牙利民主论坛持容忍态度。匈牙利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也是1972年版宪法的正式定义。虽说1985年的选举第一次允许不同的多党派参加,而且也有几个官方同意的独立人士当选,但不同政见和批评基本上还都控制在执政党内部。但到1988年时,重大变化出现了。

变化的催化剂,是年轻的一代“改革派”共产党员们对垂垂老矣的党的领导层的顽固感到失望,并对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进行的改革公开表示出热情。在1988年5月专门为此问题举行的一次党的特别会议上,他们成功地搬开了76岁的卡达尔,并以总理卡罗伊·格罗斯取而代之。这次党内政变在严格意义上的实际后果仅限于一项旨在加强市场力量的经济节俭运动,但它却有着重大的象征力量。

自1956年起,卡达尔就一直统治匈牙利,而且他在那次镇压中起过主要作用。尽管他的国际形象很不错,但是对匈牙利人来说,他只不过是“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这一官方谎言的化身:即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反革命”。而且,他还是30年前那场围绕伊姆雷·纳吉进行的无声阴谋的活化身,最终导致了纳吉被绑架,并被秘密审判、处决和埋葬。^[19]因此,卡达尔的靠边站,似乎暗示着匈牙利公众生活中出现了某种根本的变化。后来,当卡达尔的继任者不仅允许一群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共产党员和其他人组成青年民主党,而且于1988年11月正式允许独立政党出现时,这种印象便得到了印证。

1989年的前几个月中,共产党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一系列文件,承认自由集会的权利,

[19] 按正式官方说法,纳吉的墓址30年来无人所知。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墓址其实就在布达佩斯市公墓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未作任何标记。

正式批准向多党制“过渡”，并于4月份正式抛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更重要的时刻还在后面。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们心照不宣地承认，如果不对历史进行清算，就没有继续控制这个国家的希望。于是，他们宣布有意发掘出令人不得安生的纳吉的遗体，重新安葬。同时，伊姆雷·波茨盖依等政治局中的改革派也说服了同事们，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1956年事件，并给事件重新正式定性：即官方的定性不再是“反革命事件”，而成了一次“反抗有辱民族的寡头统治的民众起义”。

1989年6月16日，即在纳吉逝世31周年纪念日，他和他的4位同志的遗骸得以按照民族英雄的身份重新隆重安葬。据估计，有30万名匈牙利人肃立在街道两旁，更有数百万人观看了葬礼的电视直播。在众多到墓地致辞的人中，有青年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奥尔班。他控制不住地说道，今天重新安葬纳吉、并对纳吉大唱赞歌的某些共产党人，正是几年前还在声嘶力竭地污蔑这次革命的人。

这是事实。匈牙利脱离共产主义的进程正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主导的，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们刚刚在6月份模仿波兰的先例，与反对派召开了圆桌会议。这在反共产主义的匈牙利人中引起了某种怀疑。对于他们来说，此次纳吉的复活就像他先前的遇害一样，只不过是一次党内事件，与众多被害死的人没有多大关系。但如果低估了重新安葬纳吉的象征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对失败的承认，承认了党及其领导人编造了一个谎言、宣传了这个谎言，并将它强加给了人们。

3个星期后，卡达尔去世了。同一天，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给纳吉全面平反。这一天，匈牙利的共产主义也随着卡达尔一道死去了。剩下的，只不过是给它办个死亡手续而已。党的“领导地位”废除了，多党选举已定于次年3月举行，10月7日，共产党（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经过再一次洗礼，改组为匈牙利社会党。10月23日，仍由原共产党执政时当选的共产党代表占压倒多数的议会再次投票更名。这次，他们是给国家更名，更改为简单的匈牙利共和国。

1989年的匈牙利“革命”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正如前文所述，这是唯一的一个完全由内部发动的、向真正的多党制过渡的共产党政权。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和早些时候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1989年的事件都是以自己为参照的，但匈牙利的演变却在另一个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个国家就是东德。

如果从外部观察的话，民主德国似乎是共产党政权中最不容易击破的一个，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任何苏联领导人会让它倒下。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尽管东德的物质环境，尤其是城市，有些俗气和过时，但是它的安全警察无所不在也是有名的，而且柏林墙也是一种道德和美学上的耻辱，但人们普遍相信东德经济要比其社会主义邻国们好得

多。当1989年10月东德建国40周年庆祝大会上,第一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自豪地宣称东德是世界上经济状况最好的10个国家之一时,有人听到贵宾戈尔巴乔夫发出了一声重重的鼻音。别的不说,东德政权在生产和出口的虚假数据上,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多观察家都相信昂纳克的话。

民主德国最狂热的崇拜者在联邦德国。西欧国家的“东方政策”在消除紧张和促进两德人员和经济交流方面的明显成功,使得几乎整个政治集团都将希望寄托在东德能够永远延续下去。西德要员们不仅鼓励东德领导人们产生幻觉,甚至鼓励自己也产生幻觉。只要不停地说“东方政策”具有缓和与东方关系的效果,他们就会笃信不疑。

满脑子“和平”、“稳定”和“秩序”概念的西德人最终都赞同了与之做生意的东德政治家的观点。1982年1月,一位显赫的社会民主党员埃贡·巴尔在听到波兰宣布实行戒严的消息后,立即解释道,为了和平,德国人已经放弃了民族统一的要求,波兰人也应该以同样的“最最重要的名义”放弃争取自由的权利。5年后,著名作家彼得·本德尔在一次关于“欧洲中部”的社会民主党论坛上颇为自豪地断言:“在对缓和关系的欲望上,我们与贝尔格莱德、斯德哥尔摩以及与华沙和东柏林的共同点,要比与巴黎和伦敦的共同点更多。”

若干年后,人们渐渐得知,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国家领导人们不止一次对来访的东德高层人士做过秘密但却明显的妥协性表态。1987年,布容·英格霍姆称赞东德的政策为“历史性的”。次年,他的同事奥斯卡·拉封丹许诺将尽一切努力打压西德支持东德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他向对方说:“社会民主党人会避免一切可能导致那些持不同政见力量得到增强的事件。”正如1984年苏联给东德政治局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很多此前我们传达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观点都已经被他们接受了。”〔20〕

也许,西德的社会民主党的幻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也以几乎同样的热情相信这些幻觉。自1982年起任西德总理的科尔在发展东德的良好关系方面,与他的对手一样热心。1984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他与昂纳克举行了会谈。第二年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两人再次举行了会谈,并就文化交流和边界排雷问题达成了协议。1987年9月,昂纳克成了第一位访问联邦德国的东德领导人。同时,西德对东德的援助持续增加(但却从来没有对东德内部的反对派提供过任何援助。) 612

东德有西德的资助,可以感到激动;有莫斯科的支持,可以充满信心;还有西方可以转嫁持不同政见者,这样的东德政权本可以永远维持下去的。而且,它也确实显示出对变革

〔20〕 蒂莫西·卡尔顿·艾什教授提供这条资料,我在此谨致谢意。

的免疫力:1987年6月,东德有示威者反对柏林墙,并为遥远的戈尔巴乔夫唱赞歌,但是很快就被驱散了。1988年,有示威者纪念1919年被杀害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并打着卢森堡自己的话作标语:“自由也是那些有不同观点的人的自由”。政府毫不犹豫地逮捕并驱散了一百多人。1988年9月,昂纳克在访问莫斯科时,当众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只不过一直努力回避回家后也实施改革的问题。〔21〕

东德共产党人无视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正在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局势变化,仍然在按50年代以来所熟悉的方式,在选票上作假。1989年东德市镇选举的官方结果是98.85%支持政府候选人,操纵的结果太过明显,因而激起了全国牧师、环保组织甚至执政党内批评人士的抗议。对此,政治局刻意置若罔闻。但现在,东德人民有了一种选择。他们不必再接受现状,也不必冒被捕或逃亡到西方的危险。1989年5月2日,在给匈牙利自己对运动和表达思想实行松绑的过程中,布达佩斯当局拆除了该国西部的电网,虽然边界本身仍然处于正常的关闭状态。

东德人开始蜂拥进入匈牙利。到1989年7月1日,已有约2.5万人到那边去“度假”了。数以千计的人也跟了出来,很多人到西德驻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大使馆寻求暂时避难。少数人则越过仍处于关闭中的奥匈边境,边境警卫也不加阻拦,但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匈牙利。到9月初,进入匈牙利等待的东德公民已经达到6万人。9月10日,当匈牙利外长居拉·霍恩在一档匈牙利电视新闻节目上被问及,如果这些人启程向西,政府会如何应对时,他回答说:“我们将让他们穿过,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猜想奥地利人会让他们进入。”通往西方之门就这样正式开启了:在72小时内,大约2.2万名东德人就已越境而过。

东德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因为匈方的举动违反了一条各国共产党政府间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识,即不能让自己的国家成为兄弟国家人民的逃亡通道。但布达佩斯当局只是简单地坚持说,受《赫尔辛基最终协定书》约束,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话。在接下来的3周中,东德当局面临着一场公关灾难,因为数以万计的同胞们通过新的出口弃国他去。

为控制事态,东德统治者向在东德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中避难的人们提出,给他们开辟一条通过自己的国家回国的安全通道,然后可以乘坐密封的火车前往西德。但此举无疑是给丢尽颜面的政府再添一道新的耻辱:当火车在德国境内穿行时,数以千计的当地人夹道欢呼,报以羡慕的目光。据估计,当火车在德累斯顿短暂停留时,有5000人爬了上去,在警察殴打他们时发生了暴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全世界媒体的眼皮底下。

当局的狼狈相使批评者的胆子大了起来。匈牙利开放边界后的第二天,一群东德持

〔21〕 似乎昂纳克有充足的理由算计到戈尔巴乔夫难以长久,因而对他可以忽略不计。

不同政见者在东柏林成立了“新论坛”。几天后,另一个公民运动“今日民主”也成立了。两个组织都敦促民主德国实行民主改革。10月2日,星期一,1万余人在莱比锡举行示威,表达对昂纳克拒绝改革的不满,这是自不幸的1953年柏林起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集会。77岁的昂纳克不为所动。9月份,他宣称“试图移民的东德人民是受到了诱惑、许诺和威胁的讹诈,想要放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基本价值观。”对于那些再也不能无视面临的大规模挑战的年轻同行们,领导层显得是那么的无助:就像被冻住了一样。10月7日,为纪念东德建国40周年,戈尔巴乔夫来访并发表了讲话。他向面无表情的主人指出:“生活总是惩罚那些拖拖拉拉的人。”他的这句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昂纳克表示对目前的现状感到满意。

在苏联领导人来访的鼓励下——还不用说国外局势的发展的鼓励——莱比锡的示威者们开始定期举行示威和“守夜”,要求进行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到来后的第二周,时间已经固定为星期一的莱比锡集会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9万人。集会的人群宣称:“我们就是人民!”并呼吁戈尔巴乔夫帮助他们。到了下一周,人数又增加了。昂纳克越来越生气,开始提议用武力镇压任何反对的迹象。 614

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似乎最后占据了昂纳克在党内的批评者的思维。10月18日,在埃贡·克伦茨的领导下,昂纳克的一些同事发动政变,将这位执政18年的老人赶下了台。〔22〕克伦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飞往莫斯科,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支持,同时也寻求戈氏的支持,并返回柏林准备进行谨慎的东德改革。但已经太晚了。在莱比锡最近一次集会上,参加者估计已达到30万人,要求实行改革。11月4日,50万名东德人聚集柏林,要求立即实施改革。同一天,捷克斯洛伐克开放边界,仅仅48小时之内,就有3万人逃亡。

这时,当局才真的慌了。11月5日,东德政府犹犹豫豫地提出了一部稍稍自由一些的有关旅行的法案,但立即被批评者们拒绝了,他们认为这种法案极其可怜、根本不够。于是,东德内阁戏剧性地提出辞职,随后政治局也辞职了。次日晚间,即11月9日,也就是凯泽绑架案和克里斯托纳赫周年纪念日,克伦茨提出了一项新的旅行法,以图阻止目前的逃亡现象。在由德国电视台和电台现场直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君特·沙博夫斯基解释说新的条款立即生效,允许到国外旅游可以不提前通知,并允许穿过边境进入西德。换言之,柏林墙打开了。

广播还没有结束,人们就已经涌上大街,向边境进发。几小时内,就有数千人涌入西柏林:有的人一去不返,有的人只是过去看看。第二天早晨,世界变了。每个人都看到,柏

〔22〕 戈尔巴乔夫来访三天后,昂纳克接待了一位来访的中国要员,将东德的动荡说成是“反革命运动”。而这也是他的同事们要推翻他的原因。

林墙永远地打破了,一去不复返了。4 周后,横跨东西德边境的勃兰登堡门打开了。1989 年圣诞节假期间,240 万人东德人(相当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访问了西德。这肯定不是东德领导人的初衷。沙博夫斯基日后解释道,当局丝毫想不到打开柏林墙会导致东德的垮台。相反,他们把此举视作“稳定”的开始。

东德领导人们犹犹豫豫打开边界的决定,只不过是希望打开一个安全阀门,也许还会
615 获得一点民众好感。而最重要的,是为了争取时间提出“改革”计划。毕竟,打开柏林墙的原因与一代人之前修建并关闭柏林墙的原因大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阻止人口失血。1961 年,这一孤注一掷的策略成功了。而 1989 年,也多少起了点作用。因为,一旦相信返回后不会面临牢狱之灾,永远留在西柏林或移民到西德的人少得令人称奇。但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一点的代价,并不是东德政权垮台的全部原因。

柏林墙倒塌后,还要办理最后一个手续,一个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手续。12 月 1 日,东德议会以 420 票对 0 票(5 票弃权)决定从东德宪法中删除那条宣称国家“由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条款。4 天后,政治局再次辞职,格雷戈尔·居希当选为新的领导人,党的名称也正式变更为民主社会党。老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昂纳克和克伦茨,都被逐出党外。与“新论坛”(这是一般人公认的、最明显的反对派组织)代表之间的圆桌(又是圆桌)会谈也开始了,并制定了自由选举的时间表。

但在由德累斯顿的党的首领汉斯·莫德罗领导的最新的(也是最后一个)东德政府开始起草“党的行动计划”之前,并非它所有的行动和意图都与事态无关。毕竟,东德有一个其他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选择:没有“西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西波兰”,所以它们就无法起到榜样作用。革命目标正在发生变化:1989 年 10 月,莱比锡的示威者们呼喊的口号是“我们就是人民”(We are the people)。到了 1990 年,人群呼喊的口号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We are one people)。

因为德国共产主义的终结,会带来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终结。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再叙述。到 1990 年 1 月时,问题已经不再是要走出社会主义(更不用提“改革”社会主义了),而是变成了走进西德。1989 年秋那些推翻东德的人心中的希望究竟是什么,时过境迁,我们已经无从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共产党(如匈牙利)还是反对党(如波兰)都不能完全左右事件的进程。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在认识自己所处的不利势态时是多么的迟缓。但是,那些聪明智慧的批评者们也快不到哪儿去。

11 月 28 日,史蒂芬·海姆、克里丝塔·沃尔夫等等东德知识分子发出了一道呼吁“为了我们这片土地”,试图拯救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并抵制被海姆称之为西方的“闪闪发光的垃圾”的东西。“新论坛”的领导者巴贝尔·保利甚至把柏林墙的开放说成是“不幸的”,因为这样“改革”提前上演,各政党和选民都还没做好准备,就要面对匆匆而至的

选举。像众多东德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样(更不用说他们在西德的崇拜者了),保利及其同事们仍然一心设想一种改革式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中,没有秘密警察,也没有执政党,但同时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吃人成性、唯利是图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616 后来的事件表明,这种想法是极不现实的,它与昂纳克回归前斯大林时代那种一切服从上级的幻想一脉相承。于是“新论坛”批评它在政治上离题太远,而“新论坛”的领导人们更是整天抱怨群众的鼠目寸光。〔23〕

如此看来,1989年德国的剧变或许是那一年里唯一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众运动,而且确实是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的群众暴动。〔24〕共产主义在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终结,虽说也和东德的转变出现在同一时间,但走的却是一条极其不同的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两国,党的领导都是强硬和压制型的,而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在布拉格和东柏林都不受欢迎。但除了这一点相同以外,其他的就都不一样了。

与匈牙利一样,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也建立在一个被偷窃的历史的沉默记忆之上,不是那么十分踏实。但匈牙利的卡达尔及其领导下的党却部分成功地与斯大林的遗产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去这么做。1968年华沙条约国入侵以及随后的“正常化”,是1969年上台的古斯塔夫·胡萨克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即使在现年75岁的胡萨克于1987年辞去党总书记的职务(但继续留任总统一职)后,接替他的也只不过是米洛什·雅克什而已。后者的确要年轻一些,但他扮演过的最重要角色,却是70年代的几次大规模清洗。

在把全面控制维持到最后一刻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确实是做得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天主教会(即使不说斯洛伐克,至少在捷克,天主教永远都只是一个角色)还是知识界反对派,都没有在社会上赢得过什么支持。由于几次残酷而有效的成功清洗,该国从剧作家到历史学家,再到60年代的共产党改革派,不仅已经从工作职务上被撤除了,而且从公众视线中也被抹掉了。1989年以前,国内最敢于说话的那些对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自瓦克拉夫·哈维尔开始,全都是境内开花境外香。在上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就连《七七宪章》这个哈维尔自己创办的公民组织,从1500万人口中也仅仅收集到不足2000个签名。

〔23〕 公平地说,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们确实将1989年11月群众体现出来的那种勇气误读为更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误读的根源,在于他们的盲目和对“社会主义”为何物的误解——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复兴问题上的努力。

〔24〕 从某些方面说,波兰的剧变始于1980—1981年间,而10年后的政治转变从总体上来说,不过是在进行计算和谈判而已。

当然了,人们总是担心公开批评政权会有危险。但必须指出的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对自己的命运如何不满。像东欧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70年代初以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已经被特意转轨到生产基本消费品方面,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还不只是基本消费品。虽然不太明显,但共产党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确实在某些方面模仿西方消费型社会,如在电视节目和大众休闲娱乐方面。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是单调的,环境是在日益恶化的,年轻人对无处不在而又吹毛求疵的当局也是相当反感的。但只要不与政权直接对抗,只要口头上对政府的宣传口头上表示赞同,人们还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对任何迹象的不同政见,政府的盖子都是捂得很紧的,手腕也很残酷。在布拉格等地,1988年8月上街抗议被入侵20周年的人都被捕了。一些非官方人士想在布拉格举办一次“东方—西方”研讨会,也被取消了。1989年1月,在扬·帕拉赫于温切斯拉斯广场自杀20周年纪念日当天,哈维尔和其他13名《七七宪章》活跃分子被捕入狱(但与前些年哈维尔所受的虐待不同,5月份他就被释放了。因为此时的哈维尔已经是一名国际知名人士,对其虐待只能让监禁他的人难堪)。

整个1989年春、夏两季,非正式的网络和组织在全国各地涌现,希望模仿邻国局势:先是1988年12月成立的“约翰·列侬和平俱乐部”,随后是1989年5月的“布拉格母亲”抗议活动,然后是6月份于布拉迪斯拉法出现的环保抗议活动。这些民众活动的规模都很小,很容易控制,翻不起什么大浪,不会对警察和政权构成任何威胁。但到了8月,也就是马佐维耶茨基正在华沙敲定政府计划、匈牙利边界马上就要门户洞开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突然到处都是示威者,人们再一次走了出来,纪念对布拉格之春的颠覆。

但是这一次,捷克警察采取了坚决的克制态度。雅克什政府已经决定稍微变一变,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认可了莫斯科的转变态度,但在其统治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种算计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一次重大群众示威时,即10月28日纪念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集会上(自1948年后,官方历来不纪念这一日子),当局为什么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但是,公众对共产党政府仍然没有施加太大的压力。即使是11月15日宣布到西方旅行不再需要办理出境签证之举,也只不过是其他国家局势变化的战略性仿效而已,并不是被迫做出的让步。

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人身上明显缺乏真正的改革意愿,以及外部有效反对势力的缺失(夏季的示威活动没有共同认可的目标,也没有出现任何领导者来将人们的不满转变为某种计划),才使得后来发生的事件乃是一桩策划好的阴谋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具有了某种可信性:这是一次政府及警察内部潜在的改革派人物把衰落的党向着捷克改革方向推动的企图。

这听上去真是奇谈怪论,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1月17日,警察批准学生队伍穿过内城,去纪念另一个黑色的日子,即纳粹杀害学生扬·奥普莱塔尔50周年。但当游行的学生开始呼喊反共口号时,警察出手了,他们驱散人群,并且暴打那些被分离开来的人。后来,警察甚至鼓励关于有一名学生被害(就像奥普莱塔尔被害事件的重演)的传言。这在事后被证明纯属谎言,但却不难预料,这样的谣言有在学生中激起愤怒的效果。此后48小时内,数以万计的学生动员了起来,他们占领了学校,大量人群聚集到街上示威。但在这时,警察却只是站在一旁观望。

如果这是阴谋的话,那肯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1月17日的事件及后来发生的情况,确实搞倒了共产党的新斯大林领导班子:不到一周,雅克什就带领整个常委会辞职了。但继任者们根本得不到群众的信任,而且被事态的发展过快搞晕了头。11月19日,一直处于实际软禁状态的哈维尔从北部波希米亚农村回到了动乱中的首都。那里,共产党正飞快地丧失权力,但却没有人去从他们手中把它接过来。

哈维尔自己先在布拉格剧院中安顿好(这一举动很恰当),随后与《七七宪章》的朋友们组成了“民众论坛”。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而且流动性很强的网络,它在几天内就从一个供人论辩的协会发展成了一个民众运动,然后再演变为影子政府。这个“民众论坛”讨论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它的一些著名成员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但大部分是外面大街上正在加快发展的事态进程。“论坛”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要那些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其后果负责的人辞职。

11月25日,在党的领导人总辞职后第二天,布拉格的莱特纳体育场外聚集了50万人。他们不是为了提出什么特别的改革要求,而是在经过20年高压下的沉默后,想让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让自己知道,也让别人知道。当晚,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对哈维尔做了史无前例的采访。第二天,他在温切斯拉斯广场对25万群众发表了演讲。这个广场,也正是共产党总理拉迪斯拉夫·艾达梅克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年的讲坛。

到了这个地步,刚刚浮出水面的“民众论坛”领导人们已经清楚,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在发动一场革命。为了指明方向,同时也为了找点什么话来对外面聚集的群众说一说,一个由历史学家彼得·皮特哈尔特领导的小组起草了《民众论坛行动原则》。《原则》简述了论坛的总目标,它成了1989年男男女女们的情绪指南和首先该做什么事的行动指南。“我们需要什么?”原则问道。一、一个法治国家。二、自由选举。三、社会公平。四、洁净的环境。五、受教育的人民。六、繁荣。七、回归欧洲。

这些各种政治诉求的杂合物,以及文化和环境理念,特别是对“欧洲”的渴求,都是具有典型的捷克特色的,也是《七七宪章》对此前数十年来各种要求的体现。但在11月那些个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原则》很好地把握了群众的那种很实际、很理想化、而又同时野

心勃勃的情绪。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的演变之中,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情绪被公认是最乐观的。这就是加速度的效果。〔25〕

对示威的学生进行镇压后不到一个星期,党的领导成员辞职了。一周后,“民众论坛”和“公共反暴力组织”合法化,并开始与政府谈判。在“民众讲坛”的温和要求下,联邦议会于11月29日从捷克斯洛伐克宪法中删除了那条作为一切根源的保证的捷共“领导地位”的条款。此时,作为妥协,艾达梅克政府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在已经长久占领大街的、规模庞大的、意志坚强的群众的支持下,“民众论坛”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

到了这个时候,共产党想再忽视国外的情况已经不可能了。不仅他们在东德领导层的同事们已于12月3日被驱逐,戈尔巴乔夫已经在马耳他与布什总统共进晚餐,就连华沙条约各国也准备公开谴责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人侵了。由于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因而也丧失了领导资格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胡萨克集团的其他成员,包括总理艾达梅克在内,也辞职了。

经过两天“圆桌”会议(这是那一年最短的一次圆桌会议)的商谈,“民众讲坛”的领导人终于同意入阁。总理仍是一位党员,即斯洛伐克人马里安·卡尔法,但大多数部长都不是共产党员了,这是自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来自《七七宪章》派、5周前还是司炉工的伊利·丁斯特贝尔出任外长,来自“公共反暴力组织”的天主教律师扬·恰尔诺古尔斯基出任新闻部长,此前默默无闻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瓦茨拉夫·克劳斯入主财政部。新政府于12月10日对胡萨克总统宣誓就职,尔后胡萨克立即辞职了。

620 沉沦20年的杜布切克重新出山,使得他当选并接替胡萨克出任总统成为可能。这样,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象征,以延续1968年被中断的梦想;另一方面,可以抚慰共产党人受伤的情感,同时也可以平息警察和其他组织内部的强硬派。但是,他一开口对公民讲话,就立刻让人觉得他是那么尴尬,那么与时代不合拍。他的用词,他的风格,甚至他的手势,都属于完完全全的60年代的共产党改革派。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学到,满口讲的是要重建一种更加善良、更加温和的捷克斯洛伐克式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法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说,他一开始是一件老古董,后来干脆变成了一件让人看着心烦的不相干的东西。〔26〕

〔25〕 本书作者当时就在布拉格,他可以保证那时有一种创造历史的令人陶醉的感觉。

〔26〕 1989年12月,一份短命的布拉格学生报上曾登过一幅漫画,很好地体现了两者之间的代沟。画中是一位穿着汗衫、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直愣愣地盯着梳妆镜中站在门口的一位蓬乱不洁的肥胖女人,一脸嫌恶的表情。那女子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睡袍,头发上还带着烫发滚筒,嘴上叼着香烟。“不认得我了?”她嘲笑地说:“我就是你1968年的梦中情人啊。”

作为平衡,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即议长),总统的职位则落到了哈维尔头上。仅仅5周前,这样的想法还曾是那么不可理喻,以致当布拉格街头欢呼的人群首次提议让他当总统时,他还委婉地拒绝了。但到12月7日时,这位剧作家才恍然大悟,意识到由他来接受这一职位,才是帮助国家走出共产主义的最佳途径。1989年12月28日,过去只不过在立法程序中充当橡皮图章角色的、同时也曾把哈维尔等人判处若干年监禁的共产党议会,把他选举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0年元旦,这位新总统宣布对1.6万名政治犯实行大赦。第二天,就连政治警察也被解散了。

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惊险地、但成功地以和平方式退出共产主义,完成所谓的“天鹅绒革命”,是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就像在波兰一样,把知识界的反对力量团结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对过去失败的记忆和避免直接对抗的决心。同理,斯洛伐克起领导作用的民众组织把自己命名为“公共反暴力组织”是有其原因的。就像东德一样,执政党已经完全破产的暴露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进行武装自救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考虑之外了。

但同样重要的是哈维尔的作用。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出现过有如此威望的公众人物。尽管大多数可行的意见、甚至“民众论坛”的政治策略,都在他不在时就已经出台了,但能够掌握并引导公众情绪、推动同事前进、而同时又能够把群众的期望保持在可控范围内的人,正是哈维尔。他本人以及他向公众发出的呼吁的影响力,是再怎么大书特书都不过分的,他后来甚至渐渐被人们等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独立的奠基人托马斯·马萨里克。哈维尔也像后者一样,有着不可思议的个人魅力,现在已被广泛看作是民族的拯救者。1989年12月的一幅布拉格学生海报,用近乎宗教的语言把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描绘为“他把自己给了我们”。也许这种解释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却是非常合适的。 621

把哈维尔摆上这一神坛的,决不仅仅是因为他多次遭受牢狱之灾却矢志不改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履历,更有他显著的非政治化人格。同胞们对哈维尔的推崇,其中有他专注于戏剧艺术的原因,而且这是一种重要的原因。一位意大利评论家对哈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崛起评论说,他那独树一帜的声音,使得他能够把一个被噤声的民族的情感清晰地表达出来:“一个民族如果从来没有开过口,那么他们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诗。”(费迪南·卡蒙的诗句,1989年12月16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只有哈维尔才能架起一座桥梁,引导人们走过横亘在诱人的平等谎言和自由市场令人不安的事实之间的千沟万壑。(人们怀疑过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诱惑。但哈维尔与财长克劳斯是不同的,后者才会受这种诱惑。)

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座桥梁十分重要。除了它是东欧各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很多

方面最具有西方特点这个原因之外,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唯一的一个具有显著平等主义和左倾政治文化的国家。毕竟,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远在 1946 年的自由选举中几乎每 5 人中间就有 2 个人选择共产党的国家。尽管实行了 40 年“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外加 20 年让人感到死亡的“正常化”,上述政治文化中的某些东西仍然没有泯灭:1990 年 6 月举行的首次后共产党选举中,百分之十四的选民选择了共产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规模可观的核心共产党支持者的存在,加上规模更大的对现状不满、但并没有达到需要抗议的程度的非政治化公民的存在,才使得瓦楚里克等持不同政见者敢于质疑立即进行重大变革的合理性。历史似乎总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过不去:从 1938 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就从来没有收回过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权。

于是,当 1989 年 11 月人们自己终于抓住一次可以主动做点什么的契机时,随之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似乎就让人觉得结果太过理想,因而是不可信的。这就是那种警察搞阴谋和人为地制造危机的论调的根源,就好像捷克斯洛伐克人连起码的信心都没有,以致倒共运动必定得来自共产党人自己似的。这种怀疑一切的思想肯定是放错地方了——到目前为止浮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11 月 17 日捷克警察只不过是行为过头而已,并没有什么“阴谋”要逼迫执政集团出手。1989 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真的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522

在罗马尼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似乎很清楚在 1989 年 12 月时,执政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内确有一小部分人认识到,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以武力将齐奥塞斯库周围的统治核心赶下台。当然,罗马尼亚并不是典型的共产党国家。如果说捷克斯洛伐克是共产主义卫星国中最具有西方特色的国家的话,那么罗马尼亚就是最具有“东方特色”的国家。在齐奥塞斯库的领导下,共产主义已经从全面的列宁主义退化成了新斯大林式的总督领地。这里,触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着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

与 50 年代的乔治乌-德治的独裁相比,齐奥塞斯库的统治外表上似乎看不出有多少暴政的迹象。但是,罕见的几次公开抗议的蛛丝马迹,都被强烈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如 1977 年 8 月的丘河矿山罢工,以及 10 年后的布拉索夫红星拖拉机厂罢工。此外,齐奥塞斯库之所以能够维持,不仅是靠恐吓人民,更是因为国际上没有人批评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将丘河矿山罢工的领头人物投入监狱(并将主要领导人杀害)8 个月后,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作为卡特总统的客人访问了美国。通过与莫斯科保持距离这种手段(我们已经看过他如何回避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了),齐奥塞斯库给自己争取到了极大的腾挪空间和国际声望,尤其是在“新”冷战初期的 80 年代。由于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乐于批评苏联人(并派体操运动员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保持

缄默。〔27〕

但是为了齐奥塞斯库这种特殊的地位,罗马尼亚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66年,为了增加人口以满足这种传统的罗马尼亚式梦想,他禁止年龄40岁以下、子女不足4人的妇女堕胎。1986年时,更把这一年龄限制提高到了45岁。1984年,妇女的结婚年龄下限降低到了15岁。为防止堕胎,每月对育龄妇女进行强制体检。即使是少之又少的获批准堕胎,也只能在有党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某位医生所在地区出生率下降,他的工资也将被降低。

人口没有增长,但因堕胎造成的死亡率却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非法堕胎作为唯一的节育手段得到广泛采用,但条件之危险令人震惊。在1966年法律实施后的23年中,至少造成1万名妇女死亡。婴儿死亡率如此之高,以致1985年以后的新生儿都必须等到存活4周以后才上报官方登记:共产党对知情权的控制在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齐奥塞斯库被推翻时,新生儿死亡率达到25%,另有10万名以上的儿童被教养院收养。 623

如此的国家悲剧的背景,使人为造成的落后经济已从温饱型下滑到贫困型。80年代初,为提高国际地位,齐奥塞斯库决定偿还罗马尼亚的巨额外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各个国际资本机构十分高兴,对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极尽赞美之能事,并给布加勒斯特开出了完整的偿还外债时间表。为偿清向西方债主的债款,齐奥塞斯库对国内消费施加了无情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别国的共产主义统治者都毫无节制地向外借贷,丰富国内货架,以讨好本国人民。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却大大地不同,将所有能够生产的商品通通出口。在家里,罗马尼亚人只能使用40瓦的灯泡(如果有电的话),这样,能源就可以出口到意大利和德国。肉、糖、面粉、黄油、鸡蛋等很多商品都定量配给。为提高生产,甚至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向公共劳力分派强制性生产指标。

汽油的使用更是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在1986年,甚至还实施了一个养马计划,以代替机动车。马车成了主要交通工具,而收割庄稼时则用镰刀。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现象: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对系统地造成的短缺物质的集中控制之上的,而在罗马尼亚,建立在对不需要的工业硬件进行过度投资基础上的经济,成功地转变成了建立在工业时代以前那种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经济。

齐奥塞斯库的政策有着某种残忍的逻辑。罗马尼亚确实偿清了外债,但代价是自己的人民过着穷困的生活。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除了这种疯狂的经济措施之外,

〔27〕 至少在戈尔巴乔夫出现前是如此。此后,这位反苏的另类人物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他的统治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为了加强对农村人口的控制,也为了给农民增加压力,以增产出口食品,政府提出并施行了一项农村“系统化”计划。全国的1.3万个村庄中的一半(是从少数民族区域中按非正常比例选出的)被强制夷为平地,其居民被迁入558个“农业镇”之中。要是齐奥塞斯库还有时间把这一计划执行下去,那么这个国家所剩无几的社会组织也将被破坏殆尽。

624 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日益严重的夸大狂心理推动着这一农业“体系化”计划的执行。在他的统治下,列宁时代那种控制、中央化以及对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计划的冲动已经不过瘾了,已经发展成了要与斯大林的野心一较高下、甚至要超过他的迷恋。这种偏执狂的冲动,它的永恒的实际体现,乃是这个国家的首都。一个规模上超越尼禄帝国的庞大计划连时间表都已经定好了,只是后来因为1989年12月政变,这个“改造”布加勒斯特的计划才流产了。但已经进行的部分,已经足够把齐奥塞斯库的野心刻进这座城市当前的布局之中,再也抹不掉了。在该市中心,一块面积相当于威尼斯那样大的古城区已经完全夷为平地。为腾出空间修建“人民宫”和一条5公里长、150米宽的社会主义胜利大道,共有4万多幢建筑物以及几十座教堂和纪念碑已经被拆除。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个门面。在白光闪闪的大道正门后面,映入眼帘的仍然是熟悉的景象,是肮脏、冷酷和用预制砖建成的街区。而且那个门面本身,也是那么整齐划一,让人觉得压抑、羞辱和无情,正好做了极权统治最直观最完整的化身。那座由25岁的建筑师佩特莱斯库作为齐奥塞斯库个人宫殿设计的“人民宫”,即使按其同类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丑陋,丑陋得难以言述,丑陋得独一无二。怪诞、残酷而又品位低俗,唯一的特点就是大(达凡尔赛宫规模的3倍……)。其正前方是一片半圆形空地,可以容纳50万人。而它的接待处,则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这座齐奥塞斯库的宫殿曾经是(而且今天仍然是)那种不受节制的暴政的魔鬼般地准确的体现。这宫殿,就是罗马尼亚对极权政府都市化运动做出的贡献。

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年是在残暴和滑稽的交错中不安地度过的。到处都是这位党的领导人和他的妻子的像,对他的赞美被写成诗歌传唱,其语言足以令斯大林都感到脸红。从齐奥塞斯库正式批准用于表彰其丰功伟绩的词语中稍稍挑出几个,应该有下面这些:设计师、信条塑造师、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胜利的光环、目光远大、大神泰坦、太阳之子、思想的多瑙河、喀尔巴阡山脉的天才。

齐奥塞斯库那些马屁精同僚们对此是何等想法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在1989年11月,当他在67次起立欢呼中再次当选为党总书记,并傲慢地宣布不会进行改革时,其中一些人开始清楚地觉得他是多么可靠了:他遥远得就不可触及,不仅已经高高凌驾于时代情感之上,而且已经凌驾于臣民们那种绝望的情绪之上了。但是,只要他有秘密警察的支

持,他就刀枪不入。

因此,由秘密警察来加速这一政权的崩溃就再合适不过了。1989年12月,秘密警察想搞掉西部城市蒂米索瓦拉的一位广受群众爱戴的匈牙利族新教牧师拉兹洛·托克斯。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饱受歧视和压制的匈牙利族人,既受到邻国匈牙利局势的鼓舞,更因在国内不断受到屈辱而对齐奥塞斯库恨之入骨。于是,当罗马尼亚政府把托克斯当成迫害目标时,托克斯就成了他们的象征和愤怒的焦点。12月15日,教众围在他藏身的教堂周围,日夜守护他,给他支持。 625

第二天,守夜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反政府的示威。政府出动警察向人群开枪。夸大其词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播出了所谓“大屠杀”的报道,传遍了整个国家,抗议活动也从蒂米索瓦拉扩散到了布加勒斯特。为了平息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正在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的齐奥塞斯库返回国内。12月21日,他出现在党的总部大楼的一处阳台上,想发表讲话谴责“一小撮”“动乱分子”,但立刻在质问面前被震惊得陷入沉默。第二天,他再次试图对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但仍然没有成功。于是,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乘直升机逃离了党的总部大楼。

此时此际,权力的天平已经飞快地远离了现政权。一开始,军队似乎是支持这位独裁者的,他们占领首都的街道,并向试图夺取国家电视台的示威者开枪。但从12月22日起,在夺取了电视大楼的“全国解放阵线”的指挥下,军队掉转枪口,与装备精良的秘密警察对峙。与此同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获、逮捕并草草审判。在被判定犯有“危害国家罪”后,二人于1989年圣诞节被匆匆处决。〔28〕

“全国解放阵线”改组为临时执政委员会,将国家更名为简单的“罗马尼亚”,并指定自己的领导人伊昂·伊利埃斯库为总统。伊利埃斯库像阵线内的其他同事一样,也曾是共产党员,几年前与齐奥塞斯库决裂。他曾于学生时代与戈尔巴乔夫认识,因此勉强算得上是一名“改革派”。但他领导“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的真正资格,是他能够控制武装力量,特别是最后几个顽固分子、于12月27日放弃抵抗的秘密警察。的确,除了于1990年1月3日下令重建政党外,这位新总统基本没有撤除原政权的任何机构。

后来的事件显示,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国家机器令人惊异地没有做任何变动,只是剔除了齐奥塞斯库家人及其被控有罪的死党。那些宣称在抗议活动和12月的战斗中有数千人死亡的说法被证明太夸张了,真正的死亡人数接近100人。而且后来证实,尽管在蒂米索瓦拉、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都有大量勇敢而热情的群众,真正的战斗只是在伊利埃斯

〔28〕 对齐奥塞斯库的审判和枪决的情况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两天后播出。

库周围的“现实主义者”和齐奥塞斯库周围的原卫兵之间进行的。前者的胜利保证了罗马尼亚能够顺利地走出共产主义——而且确实顺利得令人有点怀疑。

- 26 齐奥塞斯库晚期的荒诞行为被一扫而光,但警察、官僚机构和党基本保留完好。很多机构名称改了(其中秘密警察被取消了),但不改的是它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和行为:3月19日,在特尔古穆列什,有人策划对当地匈牙利少数民族发动攻击,造成8人死亡,约300人受伤,伊利埃斯库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暴乱。此外,在1990年5月,他领导的“全国解放阵线”在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已经事先许诺不与他们竞争)、他本人也正式连任总统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用大巴运来大量矿工,殴打抗议学生,造成21名抗议者死亡,约650人受伤。罗马尼亚的路还很漫长。

罗马尼亚式的“宫廷政变”的本质,在其南面显得更为突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隆重地将78岁高龄的托多尔·日夫科夫请下了权力宝座。他于1954年起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共产党集团里任期最长的领导人。他已经以具有保加利亚特色的风格,为追随着俄国的榜样而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80年代初,他推出了“新经济机制”以提高生产力;1987年3月,他又在莫斯科的带领下,承诺终止官僚主义对经济的控制,向全世界证明保加利亚能够走上自己的改革之路。

但由于保加利亚经济接二连三地失败,而且因为莫斯科局势的日渐明朗化造成的共产党领导的日益不稳定性,迫使日夫科夫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来寻找其合法性:民族主义。保加利亚境内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土耳其人(在900万稍多点的总人口中占到了约90万)于是就成了一个诱人的目标:因为土耳其人民族特色鲜明,信奉不同的宗教,而且不幸的是,他们是记忆犹新的、遭人痛恨的奥斯曼统治的后人和象征。于是,在邻国南斯拉夫发生过的一幕,现在又在保加利亚重演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党的独裁政府,将民族偏见的怒火发泄到了无助的国内牺牲品身上。

1984年,官方宣布,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其实根本不是土耳其人,而是被迫转变之后的保加利亚人,现在应该恢复他们的固有身份了。穆斯林习俗(如割礼)将被限制,并视同犯罪;在广播、出版和教育中禁止使用土耳其语;而其他最犯忌讳(也最让人痛恨)的举措,是要求所有使用土耳其语姓名的保加利亚人从此以后必须使用地道的“保加利亚”姓名。这些规定的后果是一场灾难。土耳其人进行了强烈抵抗,并且继而在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反对。国际社会强烈抗议,保加利亚在联合国和欧洲法院受到谴责。

- 27 同时,日夫科夫在国外的共产党寡头伙伴们也与他拉开了距离。198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孤立状况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而且,邻国南斯拉夫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正在失控的情况,也让他们稍有些感到不安。1989年夏,约30万土耳其人逃往

土耳其,使得这一问题严重到了不能不解决的程度。这是保加利亚政权在公共关系方面的一场灾难,同时还是一场经济灾难,因为国家开始感到劳动力不足。〔29〕当10月26日警察对聚集在索菲亚公园的一群环保人士做出过激举动——由于来自《生态公报》的分子传阅请愿书而加以逮捕和殴打——的时候,以外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为首的改革派决定行动了。11月10日(正巧是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他们将倒霉的日夫科夫赶下了台。

下面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十分熟悉了:释放政治犯;政党开禁;删除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举行圆桌会议计划自由选举;原共产党更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然后就像在罗马尼亚一样,原来的共产党轻松赢得选举(其中有关选举作弊的指责流传甚广)。

在保加利亚,政治上的反对派是先见其形,再闻其声。与罗马尼亚一样,也有传言说,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共产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为达到目的而捏造的。但是,产生的变化却是实实在在的。至少,保加利亚成功地避免了南斯拉夫即将遭遇的悲剧:12月29日,在愤怒的民族主义抗议者的压力下,穆斯林和土耳其人被给予了同等权利。到1991年为止,一个主要由土耳其人组成的政党“权利与自由运动”得到了足够的选举支持,在全国议会中形成了平衡局面。

欧洲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在1989年轰然倒下?我们不能沉浸在事后的聪明中沾沾自喜,不管其诱惑力有多大。尽管欧洲共产主义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弊病,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却没几个人能够预测到它崩溃的时间和方式。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共产主义泡沫破灭的容易程度揭示出,这些政权原本就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脆弱。这一点,使人们在看待其早期历史时会有新的感悟。但无论是不是错觉,欧洲共产主义都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为什么就不能再延续几年呢?

答案之一是“多米诺理论”。一旦某个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倒台,其他地方共产党领导人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相信,部分是因为它宣称自己代表了某种需要,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是政治生活的一种事实,是现代画卷上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一旦这一切让人觉得不再真实——比如说在波兰团结工会就明显把历史倒转了过来——那么在匈牙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怎么还会继续有人相信呢?别人的事例在某种平衡中占有多重的分量,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

但是,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时最令人注目的一面实际上并不是其传染性:所有的革命都是这样传播的,即以事例累积的方式腐蚀掉已建政权的合法性。1848年、1919年以及

〔29〕 当然了,按官方的说法,土耳其人原本就不存在:“保加利亚没有土耳其人”(内务部长语)。

1968年所发生的,正是这么回事。不同的,只不过是1968年的事件调子低一些。1989年的新奇之处纯粹就在于整个进程的速度。甚至在1989年10月的时候,匈牙利的波茨盖依和东德的克伦茨都还曾兴高采烈地猜想可以控制住局面,可以把各自版本的改革搞成。对此,他们的对手们也都倾向于同意,并继续在其中寻找某种妥协。上溯到1980年时,米奇尼克曾写道:“混合型社会是有可能的,即国家组织的集权形式与社会机构的民主形式将会共存。”而到了1989年仲夏之际,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期望别的什么了。

传媒的作用是一个新的因素。尤其是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德国人,他们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自己的革命。对布拉格民众来说,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重播11月17日的事件,已经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即时政治教育,向千家万户传送着这样两条信息:“他们已无能为力”和“我们做到了”。于是,对新闻的控制和垄断这一共产主义的致命财产,就这样丧失了。对于孤独的恐惧——即无法知道别人是否跟自己有同样的感觉——就这样永远地烟消云散了。甚至在罗马尼亚,占领国家电视台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将齐奥塞斯库的可怕命运拍摄下来向全国观众播放,决不会是没有效果的。当然,这种模式并不新鲜。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电台和邮局都是首先要夺取的目标,从都柏林到巴塞罗纳无一例外。但最快的是电视。

1989年诸多事件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平静。当然,罗马尼亚是个例外。但考虑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性质,这应该不是个意外。但意外的是,无论是在蒂米什瓦拉,还是在布加勒斯特,流血的规模都要比每个人担心的小得多。这一点,电视同样也起着部分作用。当全国民众——还不用说国际社会很多人——都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共产党政权下不了手了。如此这般处于注视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权威的丧失,也极大地限制了可供做出的选择。〔30〕

对暴力的厌恶是1989年的众多参与者的一个共同点。即使按最近的几次暴乱来衡量,他们也是成分五花八门的一群人。也许各地成分相互之间稍有不同,但这些“人民”的典型构成,包括共产党人中的改革派、社会民主党人、自由知识分子、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天主教活跃分子、工会人员、和平主义者、顽固守旧的托派分子,等等,等等。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他们力量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恰恰形成了一种由市民和政治组织构成的非正式组合,因而是对一党制国家尤其憎恨的。

至少有一条明显的断裂线(一条将自由民主人士和民粹派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断裂线)应该早就已经发现了,可以将一些人区别开来。比如说,将马佐维耶茨基和瓦文萨

〔30〕 这种想法不适用于偏远的乡下社区和小地方的城镇。在那些地方,摄像机镜头或公众的反对都不会阻止警察将任务执行到底。

区别开来,或者将以雅诺什·基什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匈牙利的左倾自由民主人士和“民主论坛”中的顽固派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我们还可以看到,1989年的这些民众在年龄上也有一个明显的断代特点。知识分子反对派中那些老成的领导者,与党内那些对政权的批评者往往有着一段共同的历史。但对于学生和青年人来说,他们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段不能、也不该复活的过去。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从其创始理念来说,是一个仅对30岁以下的人开放的政党,因为它是按照自己年仅26岁的领袖维克多·奥尔班的形象来设计的。〔31〕

杜布切克那一代人的记忆和愿景并没有被他们的子孙所分享,后者对回忆1968年或者拯救民主德国“好的”方面并没有多大兴趣。年轻一代对与统治者辩论并不感兴趣,给他们提供一种不同的激进的统治方法也不感兴趣。他们只对自下而上地出头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的革命会像一些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观察家评论的那样,在某些方面像是一场嘉年华。同样,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用暴力进行惩罚不感兴趣。因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障碍,它早就成了一个离题万里的枝节问题。

在人们普遍用来表达1989年的目标的用词中,这一点体现得最清楚。“回归欧洲”这一主题并不新鲜。远在共产主义之前,这块大陆的东边一半就一直在寻求欧洲的认可与承认;“西”欧才是那个认识自己的欧洲,所谓承认就是要热切地获得西欧的认可。〔32〕自从来了苏联集团,这一部分欧洲的已被连根切断的意识,就成了知识界持不同政见人士和整个地区反对派人士的主调。

近年来,东欧人那种失去欧洲身份的哀痛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西欧出了一些新事物:这就是体现某种制度性身份的“欧洲共同市场”和“欧洲联盟”。这种身份是建立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欧洲”价值观念之上的,也是东欧人极力认同的:个人权利、公民义务、表达和迁徙的自由,等等。谈论起“欧洲”时,已经少了以往的空洞论调,因而成了年轻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它已经不再是对古老的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失去的文化的哀痛,而是已经代表着一种具体的和可以达成的政治目标。共产主义的反义词已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已经变成了“欧洲”。

这决不只是玩弄辞藻。老一辈共产党干部们虽然可以令人信服地(而且确实做到了)把“资本主义”抽取出来破坏掉,但他们却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代替“欧洲”——因为这一概念代表的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规范。有的时候,这一思想反映在“市

〔31〕 60年代留下的唯一间接地被接受的思想是,年轻是一种天生的优越条件——按照杰瑞·鲁宾的话来说是:“决不要相信超过30岁的人。”

〔32〕 这种推理思路主要源自伏尔泰,但在拉里·沃尔夫的《发明东欧》(斯坦福,1944)一书中表达得最为优雅。

场经济”这一概念中,有的时候则反映在“公民社会”中。但无论用什么词,“欧洲”都代表着常态及现代生活方式,公公正正而又简简单单。共产主义已经不再代表未来——这是它坚持不懈打了 60 年的王牌——而是代表过去了。

自然,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想法的。大量在 1989 年很活跃、也很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保守人士,也许考虑的就是“波兰”或“匈牙利”,而不是什么欧洲。而且与别人相比,他们有些人对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兴趣会小一些。群众各自首要考虑的东西也是各不相同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挑动群众情感时,“回归欧洲”这一概念在捷克斯洛伐克就要比在罗马尼亚管用,因为在罗马尼亚,人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打倒独裁者并把食物摆到餐桌上。1989 年时,某些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1989 年 9 月马佐维耶茨基组建第一届政府时,就发表过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宣称要“寻找自己的路德维希·艾哈德”),但是,其他人则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的民众基础之上。后一类人以哈维尔为代表。

这些细微差别的重要性,要再过一些时间才会体现出来。但此时,似乎该探讨一下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了。东欧人,特别是东柏林人,对美国牵制苏联的作用非常了解。同样,他们也明白西欧政治家与里根等美国政治家的细微差别。前者只要共产主义不来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而后者,则将共产主义描述为“邪恶帝国”。团结工会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而且一旦美国看清柏林等地方的抗议者有可能胜利,那么给予的官方支持最多的也是美国。

但却不能据此就得出结论说(有时人们确有这种想法),东欧被奴役的人们渴望变成……美国的奴隶;更不能说是美国的鼓励和支持加速或促成了这一解放。^[33]在 1989 年这场大戏中,美国的角色小得令人惊奇,至少是在既成事实之前作用甚微。而且,美国的“自由市场”这一社会模式本身,也只是偶尔出现在群众和发言人的口中,成为羡慕和仿效的对象。对大多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里的人而言,所谓“解放”决不意味着向往那种毫无约束的经济竞争,更不意味着要失去免费的社会公益服务、有保障的就业形势、低房价或任何其他共产主义的附带福利。按照东方的想象,这些正是“欧洲”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即它那种富足而又同时安全、自由而又不失保护的前景。你完全可以拿上一块社会主义的蛋糕,在自由中去吃。

这样的欧洲之梦预示着未来是会有人要失望的,但当时基本没什么人看到这一点。在另一种模式的市场方面,美国的生活方式只有少数人喜欢。而且美国尽管在全球都有

[33] 即使是里根,对波兰宣布实行戒严的最初反应也只不过是一次明显温和的警告。只是在公众对此提出强烈批评(来自基辛格等人)后,华盛顿才正式采取了它后来广为人所知的强硬路线。

影响,但毕竟远在天边,而另一个超级大国却近在眼前。东欧的卫星国全都是那个设在莫斯科的帝国的殖民地,因此,1989年的大变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归因于各国本土社会和政治力量,无论是斯洛伐克的天主教组织、波兰的摇滚乐团或是其他地方的自由知识分子,都不会超过上面所说的程度。而最后的分析,应该来谈谈莫斯科了。

在“解放”那诱人的余晖下,很多东欧人贬低了莫斯科的作用,以便突出自己的成就。632
1992年1月,“民主论坛”的姚哲夫·安塔尔,现任匈牙利外交部长,提及西方对中欧人民在欧洲共产主义垮台时的英雄作用缺乏认可时,大倒苦水说:“这种有爱却得不到回报的状况必须停止了,因为我们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我们自己完成了战斗而没有放一枪,而且我们为他们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安塔尔这番苦痛的言辞固然让听众很受用,但却忽略了1989年的一个根本的事实:如果真是东欧人民以及知识分子、还有工会领导人们“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原因很简单,是戈尔巴乔夫让他们赢得的。

1989年7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对与会人员说,苏联不会阻挡东欧的改革之路:那“完全是人民自己的事”。1989年7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一次东方集团领导人会议上,这位苏联领导人保证,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而不受外来干涉。5个月之后,在离马耳他海岸不远处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战舰特等舱中,他向布什总统保证说,不会使用武力来帮助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维持政权。这种立场是毫不含糊的。正如1988年米奇尼克指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是“自己外交政策成功的囚徒”。一旦一位帝国元首如此这般公开表示不会、也不能牢牢抓住外围殖民国家,而且还因此受到了天下人的赞扬,那么它的殖民地就失去了,同时失去的,还有自己固有的合作者。剩下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崩溃的方式和方向而已。

这些合作者们自己当然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从1988年7月到1989年7月间,匈牙利共产党中的主要改革派成员格罗斯和纳密斯共分别4次造访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他们的同事雷兹索·尼尔斯也曾于1989年7月7日,即卡达尔死后的第二天,在布加勒斯特与戈尔巴乔夫会谈过。从这个日期来看,前两人的使命明显是失败的。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过任何主动行为加速或鼓励1989年的变化:他只是站在一旁观望。1849年时,俄国的干预曾决定过当年匈牙利和其他国家革命的命运;而1989年时俄国的退席则帮助这些国家取得成功。

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还不仅是放手让这些殖民地国家离去。他表示的不干预,决定性地打击了这些卫星国的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真实根源:莫斯科武力干涉的承诺(或威胁)。没有了这种威胁,这些政权在政治上就变得一丝不挂了。从经济上说,他们也许还可以再勉强支撑上几年。但即使是经济上,苏联撤出的后果也是一种决定性的打击:一旦

莫斯科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对出口给经互会成员国的商品要价(就像 1990 年所做的那样),那么这些对帝国的补贴有着沉重依赖性的国家的崩溃也就不可避免了。

正如最后一个例子揭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让共产主义在东欧垮台,是为了拯救俄国自己的共产主义,就像斯大林建立这些卫星国,不是为了这些国家本身,而是为了自己的西部边境,是同一个道理。从战术上说,戈尔巴乔夫严重失算了。还不到两年,东欧的教训就在他自己的国家降临到了这位东欧地区的解放者身上。但是从战略上说,他取得了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成功。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地域帝国如此迅速地、体面地、而且以这么少的流血代价而放弃过自己的领地。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对 1989 年事件直接负责——这不是他规划的,他只不过朦朦胧胧地领悟了它的长远意义。但是,他却是这一切发生和加速的原因。这是一场戈尔巴乔夫的革命。

第四部分

失败之后：1989—2005

第 20 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我不需要亲自阻止这件事,苏联人会替我做到的。他们不会让
愈加强大的德国站在自己对立的阵营里。

——法朗索瓦·密特朗,1989 年 11 月 28 日

事情起初之时,我们并不清楚面临的问题之难度。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0 年

我们的国家一直饱受诘难。施行马克思主义试验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

最后证明,马克思主义无立足之地——这一理论使我们偏离了成为
世界文明国家的道路。

——鲍里斯·叶利钦,1991 年

捷克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偶然的,正是这一偶然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米兰·昆德拉

东欧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束缚之后,又经历了一次更加激烈的变革。20 世纪 90 年代,已建立的 4 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大陆的版图中消失了,14 个国家由此诞生或复辟。这包括(前)苏联西部的 6 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以及俄罗斯,分别成为独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了斯洛伐克和捷克两

个国家。南斯拉夫也分裂成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黑和马其顿几个独立的国家。

这种分裂与统一,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的影响,并且更具悲剧性。经过了漫长的过渡期,在凡尔赛签约之后,民族国家的诞生达到了顶峰,而其根源却在 19 世纪中叶或更早时期。这个顶峰时刻的到来丝毫没有任何的惊心动魄,但类似现象发生在 20 世纪末期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这当然是指在 20 世纪 90 年代解体的 3 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 1918 年后期成立的苏联。

然而,这一地区的几个多民族联邦能维持到最后,也绝非偶然。上世纪 90 年代欧洲 538 的分裂是从最后四个欧洲内陆帝国之一的苏联解体开始的。实际上,这个国家的解体是继奥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奥地利和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之后的一系列帝国分裂后又一迟来的尾声。帝国分裂的逻辑本身并不会引发东欧国家的重组,但却在历史上故伎重演,这一地区的命运受到德国事件的左右。

对赫尔穆特·科尔来说,坚信德国的重新统一才是他的当务之急。这是经历了 10 年的分裂之后的特殊使命。西德总理最初也像他人一样,对统一犹豫不决。1989 年 11 月,他向联邦议院发布了使德国迈向统一的五年方案。但科尔倾听了东德人民的呼声(并自信以后会得到来自华盛顿的支持)之后,他预测一个统一的德国不仅是可能出现的,而且也必定如此。西德领导人很清楚,阻止东德人口涌入的唯一办法就是兼并东德。

20 世纪德国的统一,首先是由货币的统一引发的,然后才是政治统一。“联邦”这个当初西德赞成、汉斯·莫德罗的民主德国内阁热切拥护的话题被“冷藏”起来。1990 年 3 月,在匆忙中举行的东德竞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坚持统一的主张,他们打出“德国联盟”的口号,使自己获得了 48% 的选票,而社会民主人士则表现出对“统一”的犹豫和矛盾,他们获得了 22% 的支持〔1〕;前共产主义者即现在的民主社会党巩固了原有的 16% 的选票;“联盟 90”即前联盟中的不满分子,包括巴贝尔·保利的“中立论坛”在内,只获得了 2.8%〔2〕的选票。

在东德的人民议会中,掌握权力的是洛塔尔·德·梅齐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基督

〔1〕 1989 年 8 月,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批评了科尔政府,指责它为欢迎东德难民而开放了匈牙利边界“加重”了危机。但是在柏林(传统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堡垒)德国大联合政府在 1990 年的竞选中表现尚佳,赢得了 35% 的选票支持。

〔2〕 保利本人的回应就是闷闷不乐地看到:“我们想要正义的法律,并且我们拥有了法制国家(拥有宪法的国家)。”

教民主党—自由党联盟。他们推出的第一个法案是把他们的国家推向统一〔3〕。1990年5月18日,两德之间签订在“货币、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联合”。其中的关键条款——有关东德货币兑换德国马克的部分——于7月1日生效。现在东德人可以按1:1的比例,把他们手中贬值的东德货币兑换成德国马克了——每人最多可兑换4万马克。留在东德工作的人可以得到用德国马克支付的薪水,这就给东德的就业和西德的预算都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639

8月23日,在与波恩签署协议前,东德人投票通过成立联邦共和国。一个星期后,统一的条约签订了。据此条约,民主德国加入了联邦德国。这与3月份投票的结果一致,并依照了1949年基本法的第23款。10月3日条约正式生效:这意味着民主德国同意加入联邦德国,原民主德国解体。

德国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果实。1990年的再次统一,也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国的支持和努力。东德一直依附于苏联,直到1989年,36万苏联士兵仍然驻扎在那里。其实西德独立后,由于驻军问题,他们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主。柏林的命运一直受制于占领过它的宗主国——英、法、美和苏联。

英、法两国并没有特意关注德国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欧人甚至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东欧经历了漫长的变革之后,最初无法实现的统一,最后也能实现。道格拉斯·赫德(英国的外交大臣)对冷战得出结论:“这是一个……体系。我们已经在这个体系下,愉快地生活了40年。”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隐瞒自己的忧虑。她回忆了一次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简单会晤:“我从手袋里拿出一张标明德国过去地形的地图,显示了对未来的担忧……(密特朗)说,过去法国处于危机四伏之时总会与英国联谊。他觉得这样的时刻又来了……对我而言,虽然我们好像还没有具体的办法,但至少我们两个国家有验证一下德国的重型卡车的愿望。这便是一个开端。”

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并非只有撒切尔夫人对此担忧。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也不无忧虑,德国的统一会导致苏联的衰落(类似赫鲁晓夫的古巴之辱)。但英国在没有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法之前,对德国问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默认。而密特朗却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和他人相比,法国人对曾经非常稳定的德国以及社会主义的解体表现出了更多的惊讶〔4〕。

〔3〕 德·梅兹雷的第二步行动是承认了东德对大屠杀和620万德国马克的赔偿负有的责任。

〔4〕 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密特朗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第二年发生在莫斯科的旨在推翻戈尔巴乔夫的失败的政变。他是这样做的西欧唯一重要的政治人物。

640 巴黎的第一反应就是阻止其统一。密特朗甚至在 1989 年 12 月远赴东德,以表示对他们主权的支持。他拒绝了科尔庆祝勃兰登堡门重新开放仪式的邀请,并且试图说服苏联领导人作为其传统盟友,法国和俄国有着相同的兴趣:那就是阻止德国的野心。实际上,法国人正指望戈尔巴乔夫去阻止德国的统一。1989 年 11 月 28 日,密特朗向他的智囊团解释道:我不需要亲自去阻止这件事情,苏联人会替我做到的,他们不会允许更强大的德国站在与自己对立的阵营里。

但是,人们一旦清楚地意识到:形式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科尔执掌的东德竞选成功了。法国总统又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德国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统一,但需付出代价。毫无疑问,德国完全可以走上独立之路,而不是恢复它在旧日中欧的特权。科尔必须致力于追求德法共管的欧洲模式,并且德国将会加入一个“比以往更紧密”的联盟。这是一桩普通的欧洲式交易。其加入的期限将庄严地载入一个新的条约(待次年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市的谈判)[5]。

根据早期的回顾:德国人同意随时满足法国人的要求(虽然法国人不灵活的外交手腕曾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波恩同意 1955 年之后,把“欧洲”的范围限制在最初的 6 个国家之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顾及法国在德国获得完全主权这个问题上紧绷着的神经。科尔甚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做了一系列微小的让步,旨在回报法国的忍耐[6]。德国的统一很好地安抚了其邻邦紧张的神经。科尔出生于德维希港,同莱恩兰德·阿登纳一样本能地向西关注——对德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欧洲共同体之内并无反感。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总理有着强大的后援。任何一张当时的照片都可以印证这一点:德国的统一依仗着美国的支持。最初,如果老布什总统像其他人一样认同其盟国的想法:德国的统一只能发生在苏联和东欧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变革之后,最后还得征得苏联的同意,但华盛顿更快地捕捉到了德国的民意,特别是 1990 年 2 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8% 的西
541 德人更青睐于一个统一而中立的德国。这个结果让美国(以及许多西德政治家)极其不安。他们惧怕德国疆域的扩大会使其中立并脱离中欧,从而导致其两边的邻国动荡不安。

于是,美国便不遗余力地支持科尔的计划,以确保德国不需要在自身统一和同西方联

[5] 这真是有点讽刺。密特朗的后继者们现在还得埋头应付那个条约和预算的限制。还有它产生的社会影响。

[6] 尤其是密特朗的老友雅各·阿塔利,他被任命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首脑。这是一家受委托以投资的方式来重建东欧的银行。但他没有把钱花在受益对象的身上,而是花巨资为自己装修了一座气派的大厦。阿塔利因可耻的行径被解雇了。这段经历没给他的自尊心造成可见的伤害。

盟之间做出选择。迫于华盛顿的压力,法、英双方同意坐下来,与苏联代表就两德问题深入地探讨了新德国诞生所需的条件。这就是所谓的“4+2”会谈,即1990年2月至9月外长会晤。最后本着对德国的尊重,他们于9月12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条约。

这一条约正式承认了未来德国的边界,即现在的两德边界。四国对柏林的牵制终于在1990年10月2日的午夜宣告结束。苏联同意让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并达成了撤出在德红军的协议。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柏林(预期4年,其后将只有一小股北约部队保留在德国境内)。

为什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这么轻易让德国的统一向前迈进呢?几十年以来,苏联的主要战略目标一直是维持中欧的现状。莫斯科就像伦敦、巴黎、华盛顿一样已习惯于德国长久的分裂。他们早已放弃了斯大林的战后目标:把柏林从西方联盟中疏离出来。但不同于英、法两国的是:苏联领导人仍固执地企想阻止统一的进程,并且原则上也是这样一直坚持着。

1990年的戈尔巴乔夫一直处于茫然中。东方或西方都没有一个国家对东德解体有所准备,德国的统一也没有蓝本可循。但是和西方同僚不同,苏联还没有做出尚好的选择。戈尔巴乔夫不能幻想阻止德国的统一,除非放弃多年来树立的温和的形象,并不惜损害自己的公众信誉。他最初反对吸纳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即使后来做出了让步,在原则〔7〕上他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北约部队不得向东挪动到300公里以外的波兰边境——这其实是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0年2月对苏联的承诺。但是后来美国不遵守诺言,戈尔巴乔夫也束手无策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尔巴乔夫为这一次让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正如西德总理先前预见的那样,苏联对财政问题从不对外遮掩。戈尔巴乔夫最初提出统一问题的谈判的担保金为200亿美元。最后商定为大约80亿美元,另外附加20亿美元的无息信用贷款。总之,从1990年至1994年由波恩转账到苏联(后来的俄罗斯)达到将近710亿美元(另外还有360亿美元给了前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科尔还兑现了缓和苏联(和波兰)紧张关系的承诺。正如人们所见,他接受了国内的东部边界线,并将其载入第二年与波兰之间签署的条约之中。

获得了对其有利的条款后,莫斯科同意了东德的解体。从悉尼的格林街到华盛顿的博加特,演技低劣的苏联只做了很小的让步。其愤愤的东德伙伴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但没有流露出任何的遗憾之意。苏联明白:同友好而蓬勃发展的新德国建立良好的战略关

〔7〕 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疏忽地承认了这关键的一点。在1990年5月,他同意了布什总统的提议:德国自己的决定权,应该包括“选择盟友”的自由。

系,和与他为敌相比更有利可图。而且从苏联方面看来,统一的德国会更紧密地团结在西方的怀抱。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

东德人虽没有得到更多优待,但也没有因此完全陷入悲伤。西德的知识分子们喜欢君特·格拉斯和尤尔根·哈贝马斯,这两位属于害怕团结的“大”德国〔8〕的人物。那些东德人意识到:他们已丧失家园,“德国”已经消失了。由此他们产生了复杂的情感。两代德国人生长在东德,他们既不愿面对愈来愈强烈的迷失感,也不能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装聋作哑。在1989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东德读书的孩子们仍然坚信:是东德的军队和苏联的援助才把他们的国家从希特勒手里解放出来。

通过反复的灌输,人们产生了以东德为中心的错觉。这种错觉对缓解人们由“前公民”转换到“后来人”所产生出的迷茫感是毫无裨益的。特别是他们的“德国体系”已从政府的记载中删除。这包括:城镇、街道、大型建筑物以及国家名称。这些都变成了1933年以前的称谓。一些古老的仪式和纪念活动又恢复了原貌。这些做法并不是在弥补历史,却更像是在抹去东德曾经存在的历史事实。恩利希·米尔克作为政治谋杀犯而非“斯塔西”(Stasi,即安全部门)的头目受到指控。指控他所采用的证据,居然是30年代纳粹的审讯记录。

与其说是人们不愿提及东德混乱的历史,还不如说是政府驱使人们忘却那段过去。
543 这真是一幕再现西德50年代历史的讽刺剧!1989年之后,联邦共和国却用最初的繁荣回答了过去的一切疑惑。德国人用钱买断了历史。其后东德人决定接受适当的调整,因为不仅他们的国家机关瘫痪了,而且大多数的基础设施也破旧不堪。五分之二的建筑物建于1914年以前(而在西德这种情况还不到五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房屋缺乏浴室,三分之一的房屋只有室外卫生间,超过60%的房屋缺少中央供暖系统。

正如在与莫斯科的交易中,波恩花大笔的钱来解决问题一样,在接下来的3年里,“统一”让西德把1.2万亿欧元调入了东德。截至2003年年底,前东德共接受来自联邦共和国1.2兆欧元的资助。东德人的工作、退休金、交通、教育、住房这些庞大的开销都由政府来买单。在短期内,事实证明东德人的信仰就像西德国库里的不明资产一样,并没有像自由市场那么多。但再度统一的光环,使许多“东德人”对他们西部兄弟那盛气凌人的态度很反感,但却以此换来了未来竞选中的胜利。

同时,为了避免使西德选民们惊惶失措,为了使他们对统一抱有热情,科尔没有提高

〔8〕 根据格拉斯的看法,现代德国历史包括:永远追求不断膨胀和扩张的性格,随后是在欧洲大陆其余国家对它的限制中绝望地挣扎。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每隔几年,因为整个德国都便秘了,我们就不得不接受欧洲对我们的灌肠治疗。”

税收。反之,为了兑现巨额的承诺,联邦政府还不惜花光账户中的余款。他们因此注定会陷入财政危机之中。德意志联邦银行对政府的政策感到惶恐不安。1991年,利率开始上涨,联邦银行因此对计划性的欧洲货币紧锁起大门。经济的萧条影响了利率,并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由此使经济增长更加迟缓。这些情况不仅影响了德国,也波及了整个欧洲。实际上,不仅是科尔在为统一买单,他的欧洲合作伙伴们在经济上也有损失。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在德国问题上的让步,使他在国内的威信大打折扣。事实上他曾警告詹姆斯·贝克:一个团结的德国加入到北约,可能就是“体制改革的结束”。丧失对东欧一些国家的支配权是不幸的,放弃德国更似一种粗心大意的做法。戈尔巴乔夫说服了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阿赫洛梅耶夫,说只要及时地关注这个问题,他们就能从西方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再说他也不是孤军奋战。但这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注意力一直被来自国内的问题羁绊,以致他对苏联的“亲西方”问题的反应就是顺其自然。

但当我们注意到苏联国境内发生的争端时,“善意忽略”这个观点就站不稳脚跟了。644
俄罗斯帝国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侵略和扩张,愈来愈强大,大部分先前属于外国的疆土已经紧密地融合在自己家园的土地上。现在他们意识到波兰和匈牙利已经被“解放”了,而我们却发现,近期苏联对其占领的土地也只“消化”了一半,它对外的影响也只包括在中亚的高加索和远在帝国西部边缘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波罗的海沿岸联邦共和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有着3个明显特点。首先,它们比苏联任何地区都更接近西方。特别是爱沙尼亚人,一直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在观看芬兰的电视节目。自然他们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富足的邻国作比较。而立陶宛人的早期历史和他们的居住地都与近邻波兰密不可分。他们无法回避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波兰人比他们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这一事实。

第二,虽然不用带着一丝谄媚的态度同邻国相比,然而若以苏联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无疑也很繁荣。他们为苏联生产大量的工业产品,其中包括:有轨电车、收音机、纸张,还有鱼、乳制品和棉花等农副产品。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爱沙尼亚的港口实现。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是其他苏联人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第三个特点也尤为显著:他们拥有过真正独立的近代史。1919年随着沙俄的垮台,他们赢得了最初的自由。而20年后根据1939年8月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这个国家受到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现代继承人苏联的再次强占。对于

1940 年的侵略,他们仍然记忆犹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其他地区也急需解决民生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这些需求促进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再度公开地追求独立。这一地区的地下文学也一直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基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俄语”问题。1945 年同属于波罗的海沿岸联邦共和国的 3 个国家的多数居民,虽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但他们仍操当地的母语。但是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强制驱逐,以及在战后一年内,苏联军队、管理人员、工人的不断涌入,造成当地人口十分混杂。尤其在共和国的北部,情况更为严重。在立陶宛共和国,80% 的居民仍是立陶宛人。但在爱沙尼亚,本族人估计只占人口的 64%,他们讲爱沙尼亚语;在拉脱维亚,1980 年的人口调查显示,人口总数虽然达到了 250 万,而当地人只占 135 万,占人口总数的 54%。而且乡村人口主要以波罗的海的人为主,城市的俄国化程度却不断加剧:这是一次充满着怨恨的变革。

这个地区愤愤不平的人们提出的第一场抗议是语言和国籍的问题,他们更难以忘怀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当地“移民”。1987 年 8 月 23 日在维尔纽斯、塔林和里加同时举行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纪念活动,而里加人在纪念拉脱维亚 1918 独立周年的仪式上公开宣布独立。由于受到里加人成功的启示,更准确地说,这是受当局对公开反对意见的容忍态度的激励,各地的独立组织和聚会开始不断涌现。

1988 年 3 月 25 日,里加举行了几百人参加的聚会,追忆 1949 年拉脱维亚人遭到的驱逐。紧接着 6 月份又举行了游行活动,以纪念 1940 年遭到的驱逐。恬淡的拉脱维亚作家联盟还发表了题为“拉脱维亚人民战线”的讲话。几个星期后,一个以“环境保护俱乐部”为掩护的拉脱维亚独立运动组织诞生了。爱沙尼亚整个事态的发展也是如此,随着 1987 年的纪念活动和一系列环境保护者的抗议,诞生出了第一个“爱沙尼亚语保护协会”组织。他们致力于保护和恢复当地的文化遗产。1988 年 4 月“爱沙尼亚人民战线”产生,9 月份爆发了爱沙尼亚独立运动。

发生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政治运动本身、富有颠覆作用的名称,都颇具戏剧性。但是立陶宛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该地区地处中央政府无法顾及的偏远地区,他们与苏联政权的斗争趋于明朗化。1988 年 7 月 9 日维尔纽斯爆发了一次示威游行,人们要求保护环境。尔后争取民主和更大的自主权的斗争,则吸引了 10 万人参加支持改革运动的组织。新近发起的“立陶宛改革运动”公开批判了立陶宛共产党对莫斯科的“屈从”。人们在横幅上公开写上了“红军回家去”的字样。到 1989 年 2 月,改革运动组织已经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政党,在 3 月的苏维埃国会中,他们赢得了立陶宛 42 个席位中的 36 个席位。

这 3 个共和国的竞选成功的标志是:拥有了独立的候选人,同时也激发了大众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关心。1989 年 8 月 23 日,人们手拉着手,制造一条人链(“手拉手横跨波罗的

海”),全程达650公里,从维尔纽斯出发经过里加到达塔林,纪念《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50周年,这是对蒙受外国奴役的历史的追忆。大约有180万人参加了此项活动,占整个地区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随着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独立运动的不断涌现,立陶宛公开宣布国家独立是自己的目标。他们与莫斯科的对抗势不可挡。 646

来势虽然缓慢,但终究还是来了。1989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运动开始于反抗边境的开放。立陶宛的最高苏维埃首先产生了独立的想法,之后拉脱维亚试图效仿爱沙尼亚。1988年11月,他们颁布了的一条法律:准许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莫斯科却否认了这条法令,在这之前,他们还否认了爱沙尼亚的自主权。另外,政府还制止了所有类似的行动。在1989年10月8日(就在戈尔巴乔夫公开警告东柏林“生活惩罚迟疑的人”之后的一天)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宣告采取行动,争取完全独立。由于苏维埃当局对不断升级的危机过于疏忽,竟然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12月18日,立陶宛共产党分裂,绝大多数人宣布立刻独立。当时戈尔巴乔夫不能继续保持缄默了。在1990年1月11日出访维尔纽斯时,他提出劝告,反对脱离联邦,并敦促“缓和”。然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自食其果了。立陶宛人受到改革运动组织在选举中获胜的激励,由苏联总统本人通过“4+2”谈判,成功地使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角色”〔9〕。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于3月11日投票,以124票赞成,0票反对,恢复了立陶宛的独立。他们象征性地恢复了1938年的“立陶宛国立宪法”,并且认定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无效。

据说1990年的局势很不明确——当时甚至连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都在宣布自己的“主权”,并且声称俄国的法律高于“全苏联”——发生了许多骚动。苏维埃的统治者向维尔纽斯人表示,要对其施行最具威慑性的经济制裁,但这样的举措也无法阻止立陶宛的独立。尽管制裁行动在6月份已经停止,而且立陶宛同意“暂停”独立宣言的全面实施,但当时戈尔巴乔夫仍有能力阻止他那些强硬派的同事们提出的用武力干涉的要求。

在这个忙碌的6月份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其余各共和国纷纷宣布它们的“主权”,使得戈尔巴乔夫的位置变得更加摇摇欲坠。他企图阻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自主、主权与独立,但是,失败的结果使他的同事们纷纷埋怨,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他作为改革者的形象。更糟糕的是来自军队和安全部队的骚动。1990年12月20日,他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辞职,并且警告他说,危机已迫在眉睫。 647

1991年1月10日,由于海湾战争的爆发,美国和它的盟国完全分心于伊拉克时,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人发出了最后通牒,凭着他的总统权力,要求对方遵守苏联的宪法。第二

〔9〕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8周之前,戈尔巴乔夫还坚持拒绝考虑任何这类变革。

天,来自克格勃精锐部队的士兵和苏联内务部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的公务大楼,并成立了“国家救援委员会”。24小时以后,他们攻陷了城市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并向聚集在那里的示威人群开枪,导致14个平民死亡,700人受伤。一周之后,他们又以同样暴力的方式进入了拉脱维亚在里加的内务部,并杀了4个人。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生的流血冲突,拉开了苏联走向解体的序幕。仅一周之内,莫斯科就有15万人聚会,对枪击事件表示抗议。这时鲍里斯·叶利钦已从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变成了苏维埃主席。他在1990年5月到塔林访问时,在不受苏联当局制约下,签署了相互承认“主权”的协议。1991年3月,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民投票表决,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完全独立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却不能全身心地平息不服从的加盟共和国,于是他又恢复了先前的态度。他试图寻找权宜之计来解决眼前的危机。

但此时的苏联总统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他不愿控制波罗的海人的行动,使得他的军方盟友疏远了他(两位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发动袭击的将军计划在莫斯科发起突然袭击),而且他的朋友和先前的支持者们对他已经失去了信任。叶利钦于1991年3月公开谴责了戈尔巴乔夫的“谎言和欺骗”,并要求他辞职。戈尔巴乔夫以沉默来抵抗来自官方的压力和弹劾。这一事件同时也使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成了其他共和国效仿的对象。

只要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统治者们限制自己的“改革”,谨慎地仿效戈尔巴乔夫,就能使苏联的权力框架保存下来。但接下来发生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惨败同样警示他们:要改革,自己的国家就要面对劫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十分清楚,自己在某些方面还要受制于苏联总统——这个受人关注的人物。因此,只要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新政治反映出真正的、广泛的民族复兴,并像其他许多共和国一样,朝着争取“主权”的方向发展下去,就会使民族情感和自我保存的意图更加复杂地混合在一起。但他们的恐惧心理也与日俱增,而且担心改革进行到高潮时会遭到安全部门和当局的破坏。更糟的是,戈尔巴乔夫会因此有理由视他们为敌人,然后以蚕食的方式限制当地人手中的权力。到
648 末了,那些警觉的苏联领导者还会因为害怕中央权力分散,来掠夺他们宝贵的公共资产:党的资产、开矿权、农场、工厂,还有税收,等等。

乌克兰^[10]也开始宣称:他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将是“主权”问题。乌克兰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同样拥有过争取“独立”的历史(尽管饱经了沧桑),这些努力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宣告失败。这与俄国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许多俄罗斯民族

[10] 五个中亚共和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斯坦。它们的广袤土地(占苏联疆土的18%)比除了俄罗斯之外的任一个共和国都大。虽然在1991年9月,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合起来只占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9.9%,但它们的故事不在本书涉及的范围之内。

主义者眼里,基辅“罗斯”——13 世纪的王国——是以乌克兰首都为中心,由喀尔巴阡山脉到伏尔加河,构成了帝国的核心地带。但更现实的问题则是这一地区的物质资源。

乌克兰地处俄罗斯通往黑海(和地中海)和中欧的通道上,它是苏联经济的支柱。乌克兰的领土面积只占全苏联的 2.7%,却拥有全国 18% 的人口。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苏联的 17%,仅次于俄罗斯。苏联的 60% 的煤炭储藏在这里,钛的储量也很丰富(对现代的钢铁生产至关重要),异常丰富的土壤使它的农业产量占苏联农业的 40%。

在俄国和苏联的历史上,乌克兰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领导层方面。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来自东欧的乌克兰。赫鲁晓夫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回到乌克兰时,曾任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是乌克兰一个“富农”的儿子,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此时尤里·安德罗波夫已经升到高层,最后坐上了乌克兰克格勃总部首脑的位置。但乌克兰共和国与苏联领导者如此密切的关系,并没有给它的人民带来任何的益处。

情况恰恰相反。乌克兰作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它在很长一段历史上被当作内部的殖民地:它的自然资源被大量开发,它的人民遭受到严密的监控(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它的压迫几乎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乌克兰生产的产品,尤其是食品和有色金属,赔上很大的补贴价后运到苏联的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了最后一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波兰东部的加利西亚和西部的沃里尼亚的兼并,使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面积大大地扩展了。众所周知,当地的波兰人被迫离开家园西迁,与乌克兰人进行人口交换。

这些人口的互换(包括战时大部分犹太人的灭绝)使得该地区人口标准与苏联的标准相符合。因此,虽然到 1990 年时,俄罗斯的 100 多个少数民族中有 31 个民族居住在自治区,但是在乌克兰,84% 人口仍是乌克兰人,其余占大多数的是俄罗斯人(占 11%),还包括少量的摩尔多瓦人、波兰人、马扎尔人、保加利亚人、在这个国家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也许需要提醒的是,最重要的少数民族——俄罗斯人主要集中在东部工业区和首都基辅。

在乌克兰中部和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它的第二大城市利沃夫一带,人们所操的语言主要是乌克兰语,主要的宗教派别是东正教或希腊天主教。由于哈布斯堡人的宽容,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幸运地保存了自己的母语。但是不同地区的情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4 年,78%—91% 的当地居民讲乌克兰语,而在曾受沙皇统治过的地区里,居民虽自称为乌克兰人,却更倾向于讲俄语。

正如人们所见,苏联宪法把各个共和国按民族来界定它的公民种族类别。与其他地区一样,乌克兰人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尤其是遭兼并的乌克兰西部,情况更为突出。

早些时候,乌克兰语主要局限在偏远地区使用,城市居民则以讲俄语为主,并受苏联当局管辖。理论上的“去中心化”和苏联的性质只是学者们和为苏联辩护的人的事情。但随着讲乌克兰语的城市居民、乌克兰语媒体数量的增长,一个具有“乌克兰人”利益的自我意识的政治精英团体的形成,乌克兰民族主义也预示了苏联的分裂〔11〕。

1988年11月,一个非党派的运动组织——“鲁克”(“人民改革运动”)——在基辅成立了,这是许多年来乌克兰第一个自主的政治组织,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其中以生活在大城市里的60年代改革派共产党人居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与乌克兰明显不同,他们以“独立运动”为主线,既没有强大的后盾,也没有基础良好的民族情感的支援。1990年3月,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共产党以明显的优势获得了多数席位,而改革派只赢得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席位。

由此看来,掌握主动权的并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是共产党人。乌克兰苏维埃里的共产党人于1990年7月16日投票通过了乌克兰的“主权”独立。他们声称共和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制定法律。这是在列昂尼德·克拉夫楚克(乌克兰的党内改革派,原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的指导下进行的。乌克兰人在1991年3月参加了全苏联公民投票,他们表示将继续支持联盟制度。虽然此时的联盟制度(在戈尔巴乔夫的任期内)被篡改了,但是只有乌克兰西部的选民被问及,是否更喜欢高于联盟的主权完全独立。这表明乌克兰共产党人正在试图与莫斯科彻底决裂。88%的选民同意了此项决定。克拉夫丘克及其追随者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也在静观其他地方事态的发展状况。

这种模式也在苏联西部一些较小的共和国里出现,但是根据不同的地方情况也有所不同。位于乌克兰北部的白俄罗斯就没有类似的关于民族身份和传统的争执。虽然“白俄罗斯共和国”经历过1918年的短暂的独立,但却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认可。并且它的多数居民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相比,更乐于亲近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同波兰东部的区域合并之后,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多了俄罗斯人、波兰人、乌克兰人这些重要的少数民族。白俄罗斯共和国内部虽然有最大的母语人群,却没有要求和期盼任何主权的迹象。由于过多地依赖俄罗斯,所以白俄罗斯也无法期盼维持真正的独立。

战争摧毁了土地贫瘠、四处沼泽的白俄罗斯,这一地区仅适合家畜饲养,而不适宜大规模农业生产。它对战后苏联经济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化学制品和亚麻的生产,及其重要

〔11〕 但是大多数情况都是不可预测的。为了加深印象起见,可参见罗曼·史波鲁克写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论文集《俄罗斯,乌克兰,以及苏联的解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00年)

的战略地位：白俄罗斯是莫斯科通往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和通讯线路主干的必经之路。1989年发生了一次以首都明斯克为中心、以“再生”为名的独立运动。这次运动简直就是乌克兰“鲁克”运动的翻版，这使得白俄罗斯的情形同乌克兰的情形如出一辙。人们看到共产党人在1990年的苏维埃选举中恢复了明显的多数席位。就在乌克兰苏维埃在1990年7月宣称“主权”的两周之后，它的北邻也紧随其后。明斯克和基辅一样，当地的“改革派”谨慎行事，观望莫斯科事态的发展。

苏维埃摩尔达维亚被挤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并且相当有意思的案例〔12〕。这片有争议的土地在沙皇统治时代曾被称为“比萨拉比亚”，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下，俄国和罗马尼亚交替占领这片土地。它的450万居民中包括摩尔达维亚人、为数众多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大量的保加利亚人、犹太人和加告兹人（住在黑海附近的讲土耳其语的正教徒）。在这片典型的多民族混杂的土地上，讲罗马尼亚语的居民占了人口的多数。但是在苏维埃的统治下，他们最好还是同邻国罗马尼亚人分开为妙。摩尔达维亚的居民曾被迫只能用西里尔语书写，并且也不能称自己为罗马尼亚人，而只能说自己是摩尔多瓦人。 651

因此，这里的民族问题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说来，在摩尔达维亚，特别是首都基什尼奥夫的居民都能讲流利的俄语。他们也认同自己是苏维埃公民；另一方面，同罗马尼亚的关系（在历史上和语言上）搭建了一座通往欧洲的桥梁，也提供了一种越来越要求自治权的基础。1989年出现的“人民战线”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罗马尼亚语成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同一年，当地的共产党当局做出了让步。另外还出现了煽动性很强的言论，大多来自布加勒斯特，处心积虑地、积极地劝阻摩尔达维亚“重归”罗马尼亚。

在接下来的1990年选举中，“人民战线”赢得了大多数的选票。新政府首先把“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简称为即摩尔多瓦共和国），并在6月宣布了主权的独立。这些大多属于象征性的举动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焦虑，在说俄语的人中间和小小的加告兹地区引起关于抢先分离的话题。1990年的秋天，在关于自治的全民投票之后，蒂拉斯波——摩尔多瓦东部德涅斯特河对岸的一个大城市，人口以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居多——的共产党领导层宣布成立“外尼斯特里安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与东南面一样“自治”的加告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互呼应。

加告兹人口最多只有16万，“外尼斯特里安”人口不到50万，地形像一块香蕉，面积

〔12〕 但是历史上的摩尔达维亚不应该与普鲁特河对岸的罗马尼亚相混淆。

也只有4 000平方公里,出现了这样的“自治共和国”似乎很荒唐,俨然是“发明传统”和“想象民族”的归谬。但是加告兹共和国只不过是宣布了自己的存在(未来的摩尔多瓦国若根据分离的权利“重新加入”罗马尼亚,就能实现和平合并),而外尼斯特里安的“独立”却是在苏联(后来的俄罗斯)第14军的支持下实现的,这支军队的出现阻止了摩尔多瓦恢复疆域的企图。

随着时代的情绪越来越不安稳,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当局并非不愿意庇护一个必然忠诚于莫斯科的微型国家,它的生存全仗着苏联的好意,它的统治者是当地的共产党“总督”,他们控制了这片土地,想立即把它变成走私和洗钱的天堂。外尼斯特里安为摩尔多瓦提供90%的电力资源,它的新统治者们甚至有各种合法的经济资源,如果基希讷乌拒绝合作,他们就可以用它们来威胁并实施控制。

外尼斯特里安的独立没有得到摩尔多瓦和其他任何人的承认,甚至连莫斯科也不可能允许赋予脱离的地区以正式的合法性。弹丸之地摩尔多瓦发生的分裂事件却预示了东面几百公里以外的高加索地区更加棘手的麻烦: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持久的对抗。亚美尼亚地区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情况尤为复杂,1988年,两边的冲突以及他们和苏联军队之间的冲突已导致上百人伤亡〔13〕。1989年1月,发生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冲突进一步升级。

1989年4月,在它的邻国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爆发的民族主义者和军队的冲突中,有20名示威者遭到枪击。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要求脱离苏联,但是政府却决定维持现状。在地理位置上,苏维埃格鲁吉亚和它的邻国苏维埃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共和国一样,它们的地理位置很难防御,民族问题过于复杂,极易受到攻击。而这些都预示着它必将随着苏联解体而瓦解。当地政府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而相应地加快了动作。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层都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是“民族独立运动”,而各地区的党的领袖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格鲁吉亚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政权即将失去时,紧紧把它握在手中。

1991年的春天,周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拭目以待中心的风云变化。当然问题的关键是,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苏联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国——拥有全国一半的人口总量,五分之三的国民生产总值,四分之三的领土面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存在——无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愿望,它作为一个帝国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地域横跨十一个时区,囊括了几十个不同的民族。“俄罗斯”太大了,所以不会沦

〔13〕 阿塞拜疆人起源于土耳其,造成他们之间紧张关系的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

为单一的身份或者一致的目的〔14〕。

在伟大的爱国战争期间及其后的岁月里,苏联当局确实打出了俄罗斯民族这张牌——表现民族自豪感,并张扬“俄罗斯人的胜利”。但是俄罗斯人从来不曾标志自己的“民族性”,因为按照苏联的说法,哈萨克人、乌克兰人或亚美尼亚人都是正式的“民族”。甚至也没有独自の“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人就是苏联人,这两者存在着天然的互补关系:在后帝国时代,苏联掩盖着俄罗斯帝国,而“俄罗斯”也使苏联的出现在历史上和领土上合法化。“俄罗斯”和“苏联”之间的界限就这样被(故意地)混淆了〔15〕。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越来越强调“俄罗斯性”。基于相同原因,东德公然赞扬腓特烈大帝的伟大,并适时地宣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日耳曼精神。在人民共和国的衰落岁月里,爱国主义被再次用来替代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爱国主义又成了最便当、最没有威胁性的政治对抗形式。在俄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像在匈牙利一样,知识分子中间的批评者往往会遭到迫害,而默然表现的民族主义却不会受到压制或阻挠——他们可能对当局有利。于是,在苏联的出版物和媒体里出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复兴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还有另一方面的焦虑,这就是他们那些不起眼的少数民族。

这就是鲍里斯·叶利钦出人意料地崛起的背景。他在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前,一直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名传统官员,负责工业建筑。叶利钦在党内的职位一步步地上升——一直到1987年曾因为超越权限批评上级而遭到降级。在这个紧要关头,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观察党和国家官僚体制是如何阻止真正的变革的。他凭着自己的政治本能,把自身重新设计成为一个特殊的“俄罗斯”政治家。在1990年3月的选举之后,他先是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名代表的身份浮出水面,然后便坐上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即俄罗斯议会)主席的位置。

从登上这个明显有影响力的宝座的那一刻开始,鲍里斯·叶利钦就摇身一变成了改革派的领袖,并于1990年7月宣布退党。他以“俄罗斯的莫斯科”为权力基础,把目标瞄准了“苏联的莫斯科”的同志们。现在他的主要目标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尽管在事实上,叶利钦曾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坚强后盾,他在戈尔巴乔夫的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14〕 典型的俄国自画像:一个缺乏安全感、过分傲慢、不稳定的组合民族。这一点恰好被自由派的哲学家彼得·恰达耶夫捕捉到。他1836年的论著《哲学信札》里评论道:“我们的民族似乎不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的存在仅是为给世界一些警示。对于我们注定要接受的指示,我们不会放弃。但天知道,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又未能完成历史使命之前,会有多少苦难在等着我们。”

〔15〕 那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也是许多俄国人感到遗憾的真正缘由。“独立”对于别人意味着获得什么,而对俄国本身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失。

地区工作了十多年)。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他的声望在迅速下降,这一点叶利钦早就注意到了。

654 戈尔巴乔夫在处理国内政务上出现的策略性失误,促成国家立法中出现了明显可见的民族性、实际权力、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叶利钦和他的俄罗斯支持者们比戈尔巴乔夫更快地懂得,这种新的公开选举苏维埃的方式很自然地变成了人们表达各种不满的论坛,而叶利钦尤其善于巧妙地把俄罗斯的利益同各民族和各共和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机警地发现这种结盟对苏联本身的威胁。但是此刻的情况对他而言,一切为时晚矣。现在的戈尔巴乔夫惟有艰难地、不太容易令人信服地调整自己,联合那些怀念旧的共产党专政时期的岁月的苏维埃各部门官员——而这种专政也是他一向努力要打破的。

当戈尔巴乔夫仍然在“渴望”和“可能”之间为一个“控制下的联邦”(具有戈尔巴乔夫特色的折中方案)而摇摆不定时,叶利钦却公开而热情地为保卫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而奋斗着。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勉强地在一部新的苏联宪法中承认了分离的权利,而这样做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权力,使那些保守的政敌相信,如果恢复秩序,戈尔巴乔夫就将面临免职。与此同时,在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在全国的民意测验中威信已超过了戈尔巴乔夫,并且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民选的总统〔16〕。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投票赞成新联盟:它是“非中央集权的”、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有一定的自主权。公然反对共产主义的叶利钦赢得大选,最终倾斜了天平。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日趋绝望,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首脑弗拉基米尔·克留奇可夫——开始准备政变。于是在莫斯科酝酿的政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早在6月20日,美国大使就警告戈尔巴乔夫说有这样的阴谋,但已经没用了。

政变的时间就定在了戈尔巴乔夫一年一度的克里米亚的假期之行——和当年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时的情形一样,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南方疗养,他的同事们在莫斯科搞突然袭击,赶他出局。发生在1991年的政变的策划者们试图恢复苏联的统治。8月17日,“紧急委员会”要求戈尔巴乔夫交出总统的权力。戈尔巴乔夫拒绝之后,“紧急委员会”于8月19日声明,总统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行使权力,由“紧急委员会”代为执行。苏联副总统根纳迪·雅纳耶夫签署了旨在弹劾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并声明进入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

55 戈尔巴乔夫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导演克里米亚南部黑海别墅的那场戏。他们不得不通过宣布紧急状态和戒严令来使一个共产党领导者下台。这件事也标志

〔16〕 在74%的出席者中,叶利钦在表决中得到57%票数的支持。

着苏联传统的国家机构的解体。而策划者们也缺少一致认可的领导者——关键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不支持克留奇可夫。政变策划者反对什么是无疑的,他们却没有能够清楚地表明支持谁。

另外,策划者们的所为,无意间为苏联以往所犯的错误勾勒出一幅讽刺画: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人们言辞缓慢、木讷,无法与时俱进,他们的时钟俨然定格在了30年前。这些人过去就隐藏在克里姆林宫里,避开了公众的视野,他们只远远地出现在公开的仪式上。现在他们受到限制,只能出现在电视上,对记者们解释,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而公众也有了充足的机会来观察他们。

就在此时,鲍里斯·叶利钦抓住了机会。他利用3周之前美国总统出访苏联之机,和乔治·布什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这使他的地位又一次得到提升。8月19日,他公开谴责克里姆林宫的接管只是非法的军事政变,并且冲到了抵抗的最前沿,在俄罗斯的总部指挥着人们包围克里姆林宫、捍卫民主、抵挡坦克。与此同时,在国际媒体的关注下,叶利钦参加了各国首脑的会谈,其中一位首脑公开表示全力支持他,使他从孤立的阴谋家〔17〕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抵抗不仅是形式上的:在8月20日晚上到8月21日的凌晨,与军队的冲突导致了3名示威者的死亡。政变的领导者失去了主动权——此刻也丧失了勇气。他们没有军队的广泛支援,就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站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他们时时刻刻在失去关键的法宝:恐惧。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没有被克里姆林宫事态的发展吓倒,反而更加大胆了。还在形势不明朗的时候,8月2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第二天,拉脱维亚紧跟着宣布独立。8月21日,政变的领导人之一鲍里斯·普戈(内务部部长,前拉脱维亚克格勃首脑)自杀;叶利钦下令拘捕普戈的同事。同一天,疲惫不堪的戈尔巴乔夫心急如焚地飞回莫斯科。

从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恢复了权力;但实际上一切都已经不同了。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信任。直到8月21日,共产党的发言人才公开谴责他们的同事的叛变行为,而这时政变的策划者已经被捕入狱。叶利钦就是利用了共产党致命的犹豫,在俄罗斯联邦禁止共产党活动。戈尔巴乔夫在公开露面时看上去晕头转向,很明显地在把握事态发展方面行动迟缓。他不愿意称赞叶利钦、俄罗斯议会、俄罗斯人的胜利,他向公众谈论改革,并且强调共产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共产党会继续革新和推动改革,等等。

这种方法在西方仍然很有效,人们普遍假设(而且希望)在政变流产之后,一切都会

〔17〕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个例外。他对东欧发生的不稳定状况耿耿于怀,而对于阴谋策划者们成功地恢复现状的认可又略显仓促。

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但是在苏联却揭示了戈尔巴乔夫的失败的目标是在重复时代的错误,而且对拯救了他的人也不知感恩。他跟不上历史的步伐,却又懵懂无知。对许多俄罗斯人而言,8月事件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次受欢迎的起义——并非支持改革者和共产党——而是反对他们。正当戈尔巴乔夫迟迟来到俄罗斯议会时,示威者们向他大喊说,苏联共产党是一个“犯罪企业”。他们制定的宪法,甚至连自己的政府部长们都企图推翻掉。戈尔巴乔夫明白了这一点,他毁了苏联共产党,而且自己也在8月24日辞去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但这已经太晚了。共产主义现在同苏联不相干了,也同戈尔巴乔夫不相干了。

当然,前总书记仍然还是苏联的总统。然而联盟的问题却直接成了问题。失败的政变成了苏联解体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推动力。在8月24日至9月21日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继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之后相继宣布独立。它们多数是在戈尔巴乔夫归来〔18〕后陷入迷惘和疑惑的时候宣布独立的。紧随着克拉夫丘克担任了乌克兰总统,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们——哈萨克斯坦的努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阿塞拜疆的盖达尔·阿利夫,白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舒斯凯维奇,等等——都狡猾地脱离了他们长期从属的共产党,他们在新国家中给自己重新谋得首脑地位,使当地共产党的资产迅速地国有化。

557 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最高苏维埃只能面对现实,承认新诞生的国家,并提出了另一部旨在用某种联合体的形式来归拢各个独立共和国的“新宪法”。与此同时,就在几百码以外,鲍里斯·叶利钦和俄罗斯议会建立了独立的俄罗斯。到了11月,叶利钦已经在俄罗斯的疆土上控制了全俄罗斯的财政及经济活动。苏联现在只是一个空壳,没有了权力,也没有了资源。

至此,苏联的核心机构或者落到了独立国家的手中,或者已经不复存在。10月24日,克格勃本身也被正式废除。而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的《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时,多数独立共和国都拒绝签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0月举行的会议中,西部各共和国缺席了。最后,在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总统和总理们——苏维埃帝国的核心斯拉夫国家——在明斯克附近会晤,并谴责1922年的联盟条约,实施解散苏联。为了取代苏联,在他们的提议下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18〕 即使在乌克兰,许多讲俄语的人一直在谨慎地谈论民族独立。8月政变对公众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就独立问题表决,根据投票结果,以346票对1票通过表决。在12月1日举行公民复决投票时,84%选民参加投票,其中90.3%的人投票脱离苏联。

听到这些消息,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愤怒地谴责道,这是“非法的”,“危险的”。但是人们不再关心苏联总统的意见了。戈尔巴乔夫终于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什么也管不了了。9天之后的12月17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叶利钦,他们同意(或者毋宁说是戈尔巴乔夫让步了)正式废除苏联:苏联的各个部、使馆、军队都交由俄罗斯控制,其领土根据国际法由俄罗斯共和国继承。

24个小时之后,戈尔巴乔夫声明他将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1991年圣诞节那天,飘荡在克里姆林宫上方的苏联国旗变成了俄罗斯国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卸下了他的职务。48小时之内,戈尔巴乔夫搬出了他的办公室,叶利钦搬入。1991年12月31日子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联的消失在现代史上是引人注目的空前事件。这里既没有发生外国的侵略,没有血淋淋的革命,也不存在自然灾害。一个工业大国——军事超级大国——就这样垮台了:它的权威消失了,它的机构都蒸发了。苏联的解体并未完全免除了暴力,我们在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区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些独立的共和国发生了更多的战事。但是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在离开舞台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抗议。更准确地说,苏联的解体是帝国不流血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整个过程出人意料地显得很容易。

那么,为什么它会全然没有痛苦?为什么经历了几十年的内乱和外国侵略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经过丝毫的挣扎就消失了?一种答案当然就是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存在过:引用历史学家马丁·马利亚的话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是苏联把它建立起来的”。但是如果原因在卫星国的共产党执政者身上,那么他们的地位只不过是依靠了红军的庇护,但是这也无法解释在帝国本土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算共产主义宣称要建立的社会不真实,可是列宁的国家毕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它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一种产物。 658

一部分答案在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意中成功地使苏维埃国家所依靠的行政机构和国家机器丧失了元气。一旦共产党失去了控制权,一旦军队和国家安全局明显地不愿意被利用来冷酷地粉碎反对派和惩罚不同政见者——这种情况到1991年才显露——于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庞大帝国就自然地产生了离心倾向。直到这时事情才变得明显——70年来精力充沛的主张到最后走向了反面——实际上不存在共产主义:存在的只是一个衰退的国家和焦虑的公民。

但是——而这就是第二方面的解释——苏维埃国家事实上并没有消失。与其说苏联解体,不如说它只是变成了多元化的后继小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仍掌握在老练的共产

党官员手中,他们的第一本能就是复制和实施他们迄今作为苏维埃管理者而铸就的制度和权威。在后继的各个共和国里大多数并没有“向民主过渡”;那种过渡——即使真的来了——也为时晚矣。苏维埃帝国国内大多数公民唯一熟悉的一种专制国家政权并没有完全废黜,也没有萎缩。从外部看来貌似一场剧烈的变革,其实内部却并非如此。

再者,那些顺利蜕变为民族国家总统的各国共产党总书记们有理由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领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领导者们没有领地需要保护,他们只能回到破旧的机关里。而那些地方曾是戈尔巴乔夫急于裁减的。他们缺乏继续战斗的意志,[19]这一点毫不奇怪。在莫斯科,具有实际权力基础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只剩下鲍里斯·叶利钦一人了。正如上文所述,他倒是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但代表的却是新生的“俄罗斯”。

我们也不能用那些加盟共和国后来的繁荣来解释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解体是各个加盟共和国里的民族主义复苏造成的。波罗的海各国是个特例,它们的发展轨迹更像它们的西面的邻居。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自己设计的产物——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复合体。659 在新成立的独立国家里,有很多需要保护的少数民族(特别是无处不在的俄罗斯人)——前苏联公民有理由懊悔,因为他们失去了“帝国”的保护,从而在新环境中显得很矛盾。

它们也不是孤独军奋战,布什总统在 1991 年 8 月 1 日访问基辅时,曾公开向乌克兰人建议让乌克兰留在苏联里面。他说“有一些人敦促美国在支持戈尔巴乔夫总统或支持那些有独立思想的领导人之间做出选择。我认为这是一个无谓的选择。戈尔巴乔夫总统已经做出了让人惊讶不已的事情……我们将维护与戈尔巴乔夫总统领导下的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在苏联总统处于岌岌可危之时的支持,并不等于是对苏联制度的认可……这个国家气数已尽。

美国总统的公开表态进一步提醒人们美国在这些事态发展中的局限性。原谅美国那些载入历史的沾沾自喜的记载吧!华盛顿并没有“推倒”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它是自己将自己搞垮的。与此同时,如果说乌克兰的听众们无视布什的忠告,而在几个月以后以压倒多数票的结果永远退出苏联,那不是突发的爱国热情所致。乌克兰或摩尔多瓦,甚至格鲁吉亚,它们的独立也不完全是为了民族自决和自我保存——那是建国的坚实基础——而是一种追求民主的脆弱基础。

苏联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同样如此真实发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1993 年 1 月 1 日,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之间的“平静离婚”波澜不兴。初看起来,这将是教科书

[19] 他们有意愿,但是没有办法。戈尔巴乔夫——或者 8 月里的策划者们——如果选择动用军队击碎所有反对派,那么他们就不一定失败。

上出现的由于共产主义留下的空隙而让种族情感得以自然宣泄的例子,是以民族复兴形式出现的“历史回归”。当地的许多主角也是这么宣传的。但若仔细观察的话,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不同的国家——“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这一事实再次说明,这样的解释对于一些地区以及对于欧洲的心脏地带来说还存在着局限性。

这里当然不缺少可供回忆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区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确实很难,但他们各自拥有明显不同的历史。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构成捷克国土的历史疆域——不仅明显地拥有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心地带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历史,而且在中欧的工业化时期也有重要的地位。在哈布斯堡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里,捷克人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治权,而且相当繁荣。重要的城市布拉格是欧洲大陆辉煌的美学胜地之一,在1914年的时候,那里是视觉艺术和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 660

相比之下,斯洛伐克人可以用来炫耀的东西却少得可怜。由于布达佩斯对它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使它缺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历史——在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那一半里,他们不是被看作“斯洛伐克人”,而只是匈牙利北部农村的讲斯拉夫语的农民。而斯洛伐克地区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或者犹太人。说起来不是偶然现象——这座在本地区里的最大城市,沿多瑙河离开维也纳只有东面几公里的地方,一直不被世人关注,而且人们对这里的称呼方式也不一样,讲德语的奥地利人称它为“普莱斯堡”,匈牙利人称它为“坡佐尼”。一直到了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时,斯洛伐克人或多或少地带着勉强态度附着其内,它才以布拉迪斯拉发的名称成为新国家的第二大城市。

以一般的区域性标准来衡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民主的、自由的。但是它的中央机构强烈偏向捷克人,捷克人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权力和有影响的要职。斯洛伐克只是一个不受关注的贫穷省份。这个国家里300万讲德语的公民听从拥护纳粹的分离主义分子,而相同的冲动也使捷克斯洛伐克的250万斯洛伐克人同情斯洛伐克民粹党的自治甚至是独立的要求。1939年3月,希特勒把捷克地区纳入“受保护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建立起一个由约瑟夫·蒂索神甫领导的独裁的、教权主义的斯洛伐克傀儡政权。这样,有史以来第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在希特勒的羽翼下,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尸身”中诞生了。

根据这样的事实,你要了解曾经如此有名的斯洛伐克战时“独立”史却不容易。战后,斯洛伐克记载的那段历史使自己名誉扫地。包括斯洛伐克将战前人口为14万的犹太人全部驱逐进死亡集中营,以及它对纳粹恩主的直接依赖关系。解放之后,捷克斯洛伐克重新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对此深表不满。的确,在斯大林时代的初期,“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是人们当时在准备的公审中对那些清洗对象的指控之一,因此古斯塔夫·胡萨克被关进监狱达6年之久。

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看到了鼓励温和的民族情绪所带来的好处。1986年的改革派身上反映出越来越滋长的布拉迪斯拉发情绪(他们中间有许多是斯洛伐克人),他们提出一种新的联邦体制,包含两个明确区分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布拉格之春”中谈论和实施的一切重大创新中,这是在接下来的“正常化”里唯一幸存下来的名堂。此前一直将斯洛伐克当作天主教农村性质的敌对地区来对待的共产党当局,现在对斯洛伐克有点偏爱了。(参见第13章)

661 斯洛伐克的落后状态——或者毋宁说,那里缺少大量集中的、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现在有了它的优势。同先进的西部省份相比,那里汽车和电视机比较少,通信设施也更差。斯洛伐克人比那些有外国媒体支持的、以布拉格为根基的激进分子和反对派更坚强。相应的,他们在70年代的压迫和清洗中也较少受难。现在该轮到捷克人面对官方不喜欢的结果了〔20〕。

记住了这段历史,就可以想见1989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如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少也是因为他们之间已存在几十年的相互的不适感造成的逻辑结果:人们无法忘却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压制和剥削。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从他们历时3年的分裂直到最后共产主义的结束,每一次的民意测试都显示,大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喜欢某种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形式。这并非说明政治等级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从一开始起,广泛一致的意见是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是一个联邦。分开的各方都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新总统瓦克拉夫·哈维尔就坚定地、非常公开地相信应该让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留在同一个国家里。

从1990年6月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的结果中,就可以看出最初的“民族”问题并不突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哈维尔的“公民论坛”党保证了一半的选票,剩下的选票在共产党和基督徒民主党之间瓜分。斯洛伐克的局面比较复杂:“公民论坛”的姐妹党——“公众反暴力党”虽然以最大的组织的面目出现,但是可以抓得住的选票都在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匈牙利基督教民主党和绿党〔21〕手中。新出现的“斯洛伐克民族党”在斯洛伐克国民议会的议员选举中只获得13.9%的选票,在联邦大会(议会的议员选举中只获得11%的选票。只有不到七分之一的选民选择了唯一的一个主张按种族分割国家的政

〔20〕 这在捷克人中间造成了不愉快。在1985年的布拉格之行中,本书作者受到捷克自由派人士的款待,他们讲起政府对斯洛伐克少数民族的特权政策。从斯洛伐克来的教师们——他们被招募到布拉格的小学里教书,却被孩子们的父母视为来自落后省份、不能胜任教学任务的人——成了发泄怨气的特殊目标。

〔21〕 这个分离出来的匈牙利党派的出现,反映出在斯洛伐克疆土上生活着大约50万匈牙利人,占斯洛伐克人口的10%。

党。

在1991年间,公民论坛开始瓦解。一个建立在以共产主义为共同敌人的基础之上、在颇受欢迎的领导人哈维尔带领下的联盟已不复存在,它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共产主义消失了;哈维尔去做了共和国的总统,明显地超越了政治冲突。同僚之间政治立场的不同也凸显出来,由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他自称撒切尔信徒)带领下的自由市场派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1991年4月,随着国会批准了一项开明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法律,“公民论坛”分裂了,而克劳斯领导的(主导性的)一派变成了“公民民主党”。 662

克劳斯决心使国家快速走向“资本主义”。在捷克确实有一批拥护这一目标的支持者,但是在斯洛伐克,情况却大不相同。大多数斯洛伐克人对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削减国有部门几乎没有兴趣。和捷克人相比,他们更需要依靠那些效益低下、落后的国有工厂和矿山来谋生——这些“企业”的产品不再受市场的保护,也不可能吸引外资或私人来投资。在布拉格某些商界与政界人士的眼里,斯洛伐克是一个继承来的沉重负担。

同时,由于相似的原因,“公众反暴力党”也分裂了。这个派别中此时最有实权的公众人物是弗拉基米尔·麦恰尔。他曾是一名拳击手,在1989年的事件中虽充当了一个小角色,但是自此之后他却比别人更适应地度过了民主政治面对的险境。在6月份的竞选之后,他在斯洛伐克全国议会中组阁,但他那令人讨厌的个人风格却导致了他的阵营的分裂。麦恰尔被一个天主教的政治家扬·恰尔诺古尔斯基取代。麦恰尔离开了公众反暴力党,组织了自己的“斯洛伐克民主运动党”。

从1991年的秋天开始到1992年的夏天,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政府机构的代表们举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希望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一部非中央集中化的联邦宪法——这是双方大多数政治家们和选民们的选择。但为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与其政党的选区,麦恰尔诉诸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而他在此之前对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从未表现过如此大的兴趣。他对听众们说:斯洛伐克人受到了一切威胁——从捷克的私有化计划、匈牙利的分离主义到进入欧洲的前景。他们的民族生存(更不用说他们的生计)正处于危难关头。

由于麦恰尔的这些言论,也由于他虽然媚俗、却颇具公众领袖的风格,他领导的新党在1992年6月的联邦选举中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获得了斯洛伐克将近40%的选票。与此同时,在捷克地区,瓦茨拉夫·克劳斯的新“公民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联盟,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克劳斯现在出任捷克地区的总理,联邦共和国的两个自治地区掌握在那些目的不同却可以互相利用的人之手,而他们看到国家分裂并不会悲伤难过。现在只有联邦总统一个人坚持宪法规定的形式,代表着一个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理想。

但是,瓦克拉夫·哈维尔不再如从前那般受拥戴了——所以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有影

响力了。第一次作为总统正式出访时,他没有去布拉迪斯拉发,而是去了德国。从化解两国之间长久的积怨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他的国家需要和西欧交朋友。但是从斯洛伐克人的感受来看,这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误。哈维尔的部下对他也并非忠心耿耿:1991
563 年3月,他的发言人米哈依尔·赞托夫斯基宣称:斯洛伐克的政治正逐步回到前共产主义者和“那些怀念斯洛伐克国家的民族黄金时代的人们”〔22〕手中。

赞托夫斯基的说法并非全错,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的心愿。哈维尔及他的同仁们就像其他的前捷克不同政见者一样,往往并不是为斯洛伐克的前途着想。他们宁可将自己看作爱国的沙文主义者:说得好听点是追求至高无上的民族主权,说得难听点是怀念战时的傀儡政权。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劳斯既没有表现出对自由的偏爱,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关心斯洛伐克的历史。他像麦恰尔一样,是个实利主义者。从表面上看来,这两个在各自地区最有权力的政治家,确实花了几周的时间,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国家条约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然而,他们是否能达成一致却是另外一回事。麦恰尔要求真正拥有主权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应该有发行货币和借贷的权力,推迟私有化,恢复共产主义时代的补贴制,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措施——所有这些都令克劳斯感到厌烦。他正竭力完成强行开放自由市场的计划。因此,在1992年6月到7月间举行的会议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谈判。克劳斯对麦恰尔的要求感到惊讶和苦恼,但这些都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麦恰尔就这个问题做过许多演讲。实际上,正是克劳斯操纵着斯洛伐克的领导人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而并非其他道路。

结果,即使斯洛伐克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大多数代表们满足于批准一部国家条约,给这个国家的每一半都有完全的自主权和在联邦里的平等地位,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既成的事实。随着谈判的拖延,克劳斯事实上在告诉斯洛伐克的会谈者们:既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最好停止这些无谓的努力,而各走各的路。斯洛伐克人一方面心满意足,但在另一方面却陷入了困境——许多情况不符合他们的判断。

1992年7月17日,斯洛伐克全国议会投票,相应地产生了一面新的国旗、一部新宪法和一个新国名——斯洛伐克共和国。一周过后,克劳斯和麦恰尔同意于1993年1月1日正式分解他们的国家,后者仍然有点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就在那一天,捷克斯洛伐克消失了,它的两个共和国以分立的形式再现,由克劳斯和麦恰尔分别担任各自的总理。瓦克拉夫·哈维尔努力想把国家合在一起的做法越来越孤立无援——在最后的几个

〔22〕 引述自《今日青年阵线》1991年3月12日。参见艾比·英尼斯《捷克斯洛伐克:简短的告别》(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2001),第97页。

月里完全无人理睬——他不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但却在短期内做了更名后的捷克共和国〔23〕的总统。

这两个伙伴的分离是好事还是坏事,暂时还不能妄下定论。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在后共产主义初期的10年里都没有繁荣起来。克劳斯的“休克疗法”和麦恰尔的“民族共产主义”的方法都失败了,尽管他们方法不同。但是,斯洛伐克人尽管开始后悔他们与弗拉基米尔·麦恰尔之间的调情关系。而由于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怀念明显也淡薄了,所以克劳斯的星光在布拉格也黯淡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是一种操纵过程,捷克右翼带来的是它宣布不会追求的东西,而斯洛伐克的民粹党人捞到了比他们的期望中更多的好处;没有多少人会喜欢这样的结果,但他们的悔意也未持续多久。如同苏联的解体一样,因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而生出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机器并没有受到威胁:它们只不过是复制了一遍。

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是机缘和环境情势的产物。它也是人为的。若是由别人来操纵——1990年和1992年的竞选结果就会截然不同——就会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传染性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苏联的先例——以及巴尔干诸国展示的事件——使得这个中欧小国的两个“民族共和国”之间由于分歧而解体显得似乎没有实际上那么荒谬。1992年之前如果有一份双方共同认可的联邦国家协议的话——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再多维持几年的话——那么,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前景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发生在临近的波斯尼亚血淋淋的大屠杀也会集中他们的思想,这就会使生活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人不大可能斤斤计较于他们之间的争吵了。

〔23〕 事实证明,政治分裂比经济问题容易处理,直到1999年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财产分割协议才最后达成了。

第 21 章

清算

165

如果欧洲再次出现战争，一定会是巴尔干某个该死愚蠢的东西引发的。
——奥托·冯·俾斯麦

看来这些充满仇恨的农民好像迫不及待希望别人入侵他们的国家，
这样他们就可以抓住对方互相残杀。
——米洛万·吉拉斯《战争年代》，1977 年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991 年 6 月

真理总是具体的。
——G. W. 黑格尔

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解体 and 同年代南斯拉夫解体时的大灾难相比有天壤之别。1991 年到 1999 年间，成千上万的波斯尼亚族人、克罗地亚族人、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惨遭种族杀戮、强暴或荼毒，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四处飘零。1945 年以来，在一个西方激进者认为是模范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从没见过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和内战。追根溯源，外国评论家已经提供了两个对比鲜明的典型解释。

一种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流传、并为欧美政治家在公开陈述中采用的观点认为，巴尔干是一

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是一口充满神秘争吵和宿仇的大锅。南斯拉夫受到了“诅咒”。用一句广为引用的妙语来说,它由6个共和国,5个民族,4种语言,3种宗教,2个字母表组成,这些都由单一政党掌控。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很简单:盖子打开了,大锅爆炸了。

根据这个说法,“多年的”冲突,正如德·萨勒伯里侯爵在1791年描述的那样,是欧洲“未经修饰的极端行径”,像过去数百年以来那样一直层出不穷。危险的深仇大恨被不公和复仇的记忆驱使,占据了整个民族。正如美国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1992年9月所言:“除非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决定停止互相残杀,否则外人对此一筹莫展。” 6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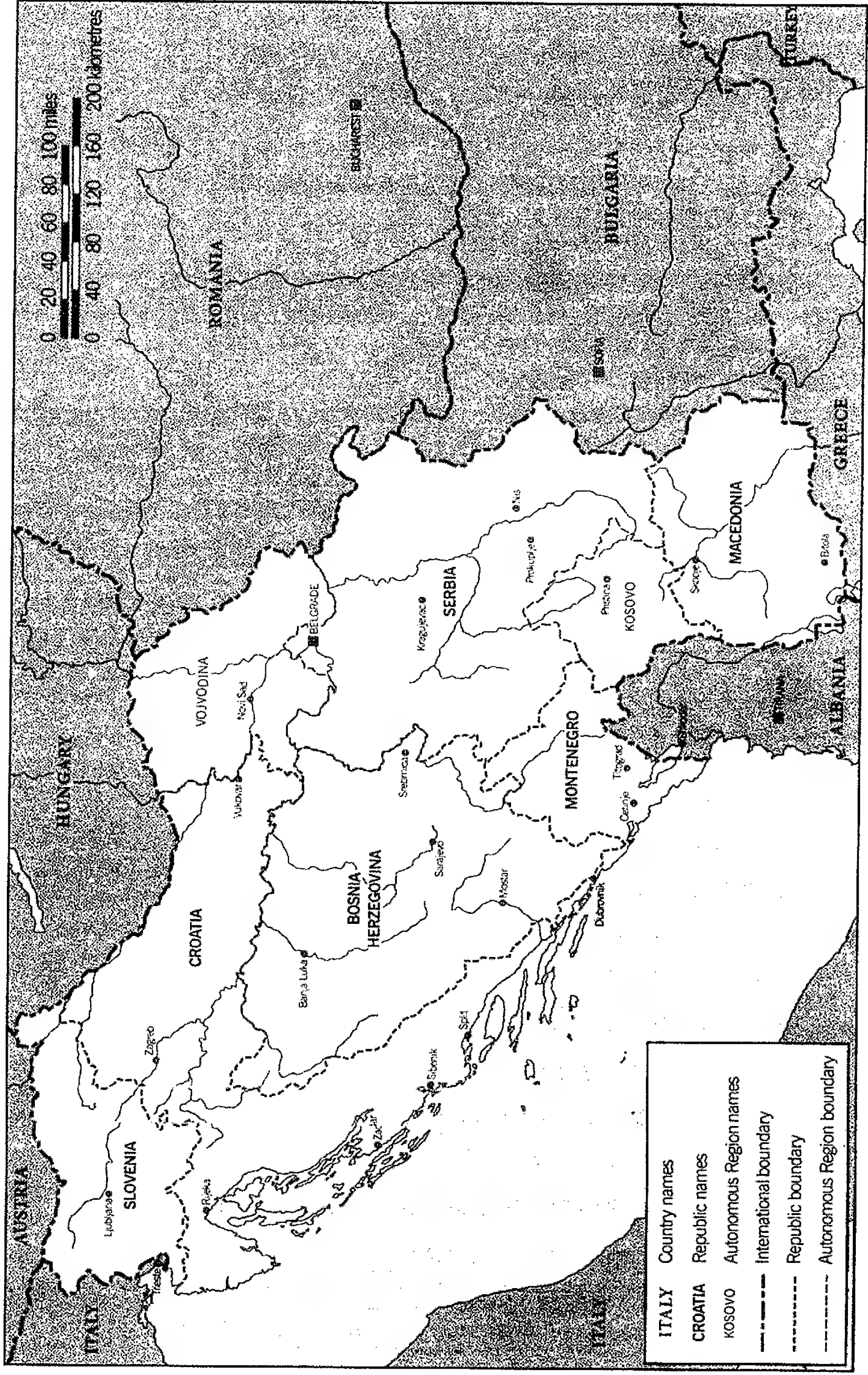
在相反的另一解释中,一些历史学家和外国观察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巴尔干悲剧的始作俑者是外人。由于外部干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前南斯拉夫领土在过去200多年里被人利用,受人占领、分割、盘剥。分到这杯羹的国家有土耳其,英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和德国。这个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根源不在于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而在于帝国主义的控制。所以说,正是外国强权的不负责任的干涉,才加剧了当地的困境:例如,若不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在1991年“超前地”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波斯尼亚人就不会步其后尘,贝尔格莱德也就不会入侵,而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灾难也许就不会发生。

不管怎么看待对巴尔干历史的两种解读,尽管这两种看法明显水火不容,它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令人印象深刻:两者都弱化或忽视南斯拉夫人自己扮演的角色,要么简单认为他们是命运的牺牲品,或是任人操纵的牺牲品,或是别人错误的牺牲品。当然,在前南斯拉夫的山脉下埋葬了许多历史,还有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局外人的确对这个国家的悲剧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当地罪恶横行不负责任的默许形成的。然而,南斯拉夫的分裂——正如其他前共产党国家的解体——是人为,而非天命。对南斯拉夫悲剧最该负责任的人并不在波恩或是别国的首都,而是生活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客们。

当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980年87岁去世的时候,他重新集结的南斯拉夫有了真实的存在。它的加盟共和国存在于一个联邦制国家中,总统职权由全部6个共和国和2个在塞尔维亚中间的自治区(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代表组成。不同地区的历史迥异。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天主教为主,一度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波斯尼亚也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但是时间要短一些。这个国家的南部(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和波斯尼亚)好几个世纪都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除了占主导地位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人之外,还有大量的穆斯林。

但这些历史差异,尽管足够真实,并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更进一步加剧,却在随后几十年里淡化。经济变化把到目前为止还与世隔绝的农村人口带到了像武科瓦和莫斯

Yugoslavia 1945-91



1945—1991年的南斯拉夫

塔尔这样的城镇里,这样的接触有时让人感到不安;但同样的变化也加速了跨越陈旧社会和种族界限的融合。

这样,尽管共产主义博爱团结的神话要求对战时的记忆和分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历史教科书小心翼翼地对这个国家过去的共同历史上充斥的血腥内战避而不谈——这样的官方沉默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战后崛起的一代受到鼓励,把自己当作“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克罗地亚人”或“马其顿人”;而许多人,尤其是受到更好教育的、越来越多的城市中的年轻人,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1〕在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的年轻知识分子不再对他们族中先人或是英雄的或是受困扰的历史感兴趣。到1981年为止,在波斯尼亚充满大都市气息的首都萨拉热窝,20%的人口称自己为“南斯拉夫人”。

波斯尼亚一直是南斯拉夫种族成分最为混杂的区域,因此也许还不是最典型的。但是在整个国家的版图上,种族交织混杂。1991年居住在克罗地亚的58万塞族人大约占那个共和国人口的12%。波斯尼亚的当年人口中44%为穆斯林,31%为塞族人,17%为克罗地亚人。即便是小小的黑山共和国,也是黑山人、塞族人、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混居,就更不用说那些选择告诉普查人员他们是“南斯拉夫人”的人了。在种族混居地区的居民,对他们朋友或邻居的国籍或宗教信仰知之甚少。跨族婚姻越来越普遍。

的确,南斯拉夫境内“种族的”错误界限从来就没被很好界定过。语言上的差别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语言大不相同。马其顿人说马其顿语(其实就是保加利亚语,只不过略有不同)。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塞族人和克族人所说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之间差别的确很小。塞族人使用西里尔字母表,而克族人(和波斯尼亚人)是用拉丁字母表;但除了一些文学和学术术语不同,还有偶尔出现的拼写不同和字母e的发音(克罗地亚语在“Iékvian”中发“ye”,在塞尔维亚语“Ekavian”中发“e”)不同外,这两种“语言”是一致的。还有,黑山人书写(像塞族人那样)用西里尔字母表,但口语却类似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用的是“Iékvian”方式,波斯尼亚的塞族居民也是这样。只有塞尔维亚当地原住民使用“Ekavian”这种变体——波斯尼亚塞族民族主义领导人1992年后,在从波斯尼亚划出来的地区中试图向他们的波斯尼亚塞族同胞强制推行官方的“塞尔维亚语”(即“Ekavian”)的时候,遭遇了压倒性的对抗。

于是1974年被认定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官方语言的“克罗地亚”语——这是应一群萨格勒布知识分子起草的《语言宣言》的要求而宣布的——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作为身份的

〔1〕 1910到1990年间,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斯科普里(马其顿首府)是中欧发展最快的城市中的几个。

69 标签:让克罗地亚人可以抗议铁托对一切在他的联邦内的民族主义言论的压制。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迷恋于保护和重申“纯正”塞尔维亚语的某些塞尔维亚作家身上。可以看似公平地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单一全国性语言的方言之间的区别形成反差,方言的用法千差万别,然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倾向于使用一个共同的“正确”形式——在前南斯拉夫,事实上正是人口中的大多数使用的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单一语言,然而少数的民族主义者寻求通过强调自恋主义的细小差别来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被大做文章的宗教差异也一样有误导作用。比如说,天主教克族人和东正教塞族人之间的差异在早先几个世纪中,或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克罗地亚的法西斯分子舞动天主教作为反对塞族人和犹太人的武器时〔2〕,这种差异的作用明显地重要得多。到20世纪90年代,在南斯拉夫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宗教日渐式微,只有在乡村,宗教和对应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一定地位。许多表面上是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和阿尔巴尼亚族的穆斯林人(绝对不是所有的阿族人都是穆斯林,尽管这一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敌人并不在意)鲜有相似之处。这样,尽管毫无疑问,旧日的奥斯曼习惯于通过宗教来确定民族,主要通过在南部的斯拉夫人中夸大东正教地位的做法留下了它的印迹,但是这样的证据也已经越来越削弱了。

尽管南斯拉夫的老一辈人继续持有早先时候的偏见——未来的克族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是出了名的偏向基督教而厌恶穆斯林,塞族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都不喜欢——也许这是近年唯一普遍性的针对生活在南部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的歧视,这种歧视遭到许多斯洛文尼亚人、克族人、塞族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的谴责,认为这种歧视可耻、无能。这些情绪在塞尔维亚最为强烈。〔3〕

所以如此,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阿尔巴尼亚人是这个国家人口增长最快的一族。尽管在1931年,阿族人在南斯拉夫人口中仅占3.6%,到了1948年,由于战后邻近的阿尔巴尼亚移民的加入,已经达到7.9%。到1991年,172.8万人的数字,代表了塞尔维亚(包括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总人口(但不是南斯拉夫联邦的总人口)的将近16.6%。大多数南
70 斯拉夫的阿族公民居住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自治区,他们占到当地人口的82%,大大超过了19.4万塞族人的数量,尽管如此,还是塞族人享受了更好的工作、住房和其他社会特权。

〔2〕“我们应该杀死一些塞族人,将另一些驱逐出境,然后让剩下的信奉天主教。”——克罗地亚法西斯在萨格勒布的宗教部长1941年7月22日如是说。

〔3〕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本文作者前往斯科普里搜集事实,马其顿首相“秘密”告诉笔者,阿族人(包括他自己的刚刚离开房间的内阁同事)不值得信任:“你不能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东西——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基督徒。”

科索沃作为中世纪塞尔维亚最后一个抵抗土耳其人进犯的战场,对塞族民族主义者来说有其历史意义。1389年,塞尔维亚人在这个战场上历史性地战败。于是一些塞族知识分子和政治人士认为当地阿族人的主导地位从人口统计学上说是棘手的,从历史渊源上说是具有挑衅意味的。而且,由于塞族人被穆斯林取而代之,不再是在邻近的波斯尼亚共和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相比之下这一点就尤为突出。看起来塞族人输给了迄今为止都对铁托的联邦里平等地严格推行政策的做法表现出顺从态度的少数民族。〔4〕科索沃于是成为一个潜在爆发的问题,原因只是隐隐地与“古老的”巴尔干宿仇相关:正如在60年代安德烈·马尔罗精明地向一位去法国的南斯拉夫访客指出的:“科索沃是你们在奥尔良地区的阿尔及利亚。”

尽管塞族对阿族的嫌恶建立在相邻性和不安全感上,在南斯拉夫远方的北部,对软弱无能的南方人越来越讨厌,而且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这种情绪不是建立在民族问题上,而是建立在经济问题上。就像在意大利那样,在南斯拉夫也一样,更繁荣的北部越来越憎恨贫穷的南方人,似乎南方人的生活是靠他们更有生产力的同胞的接济才能维持的。南斯拉夫的贫富反差变得极为显著:而且和地缘相关,这就带上了挑衅意味。

这样,尽管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科索沃都在全国人口中比重相当,各占8个百分点,1990年,小小的斯洛文尼亚负担了南斯拉夫产品总出口量的29%,而马其顿仅占4%,科索沃占1%。充其量从南斯拉夫的官方数据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倍于塞尔维亚,3倍于波斯尼亚,8倍于科索沃。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斯洛文尼亚,1988年文盲率低于1%,马其顿和塞尔维亚是11%,科索沃则是18%。到80年代末,斯洛文尼亚婴儿出生死亡率为11‰,波斯尼亚是16‰。但在塞尔维亚是22‰,马其顿是45‰,科索沃是52‰。

这些数字说明斯洛文尼亚以及(程度更次一等的)克罗地亚已经接近于欧洲较不发达国家之列,而科索沃、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农村地区更接近部分亚洲地区或拉丁美洲。倘若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他们共同的南斯拉夫家园内变得越来越不安分,那么这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宗教或语言情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或是种族独立发展自身利益原则的重现;而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如果可以不用考虑住在他们南面生活水平不好的南斯拉夫人的需要和利益,而自主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们就能过得好得多。

铁托的个人权威和他对严肃批评的猛烈压制,使许多非常不同的见解远离公众视线。

〔4〕当然,在克族人和其他人看起来,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们会指出塞族控制了全国的军队(截至1984年,60%的军官团队是塞族人,这一点公正地反映了塞族在总人口中的存在状况,但也仅仅如此而已),而且他们会指出贝尔格莱德当局不成比例的投资和联邦财政的支出。

但他死后情况迅速恶化。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西欧蓬勃发展,吸走了南斯拉夫的劳力,送回了大量硬通货的汇款,那时南方人口过多而就业不足就不那么成问题。然而从70年代末开始,南斯拉夫经济开始放开。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南斯拉夫大大受惠于西方;但是在华沙或布达佩斯的反应是不停借来国外资金,而在贝尔格莱德,他们是不停地印刷自己的钞票。在整个80年代,这个国家进入持续高通胀。到1989年,年通胀率高达1240%,而且不断上升。

政府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犯下经济错误,而其后果被人感觉到、并且最遭人嫉恨却是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许多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相信撇开联邦首都当权者的腐败和裙带主义,他们自主发展经济,就会过上更好的日子。然而,在其本族的塞尔维亚共产党联盟迄今为止默默无闻的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周围有一小群共产党官员,通过鼓动并操纵塞族民族情感,努力在铁托死后的政治真空中谋求权力。对这些人的做法,与日俱增的恐惧加重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上述那种想法。

米洛舍维奇的行为在那些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天生不足为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共产党人通过调用18世纪普鲁士的荣耀来求得好感;而在邻邦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民族共产主义”被四处展示已达数年之久。1986年,米洛舍维奇炫耀性地欢迎来自塞尔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的爱国备忘录,或在次年访问科索沃,对塞族、对阿族的“民族主义”的抱怨表示同情,他的算盘和当时其他东欧领导人并没多大不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执政党迅速衰败时,爱国主义提供了保住权力的另一种选择。

在东欧的其他地方,这种求助于民族主义、唤起民族记忆的做法还只是冒着在外国人中间引发焦虑的危险,但是在南斯拉夫,代价会在国内偿付。1988年,米洛舍维奇想进一步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内巩固他的地位,开始公开鼓励民族主义集会,并且在集会时公开展示战时的契特尼游击队徽章。这在40年来还是第一次,这些徽章提醒人们回忆曾经遭受铁托压制的过去。这种精心策划的行动,目的尤其是要在克罗地亚人中间制造真正的忧虑。

72 民族主义是米洛舍维奇确保自己控制塞尔维亚的方法——这在1989年5月他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时得到了证明。但是,为了保持并加强塞尔维亚对整个南斯拉夫的影响,他需要对联邦制本身进行改革。这种精心安排的不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影响力的平衡,先是由铁托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力、后来是由轮换担任总统职务的办法来培养的。

通过强制推行对塞尔维亚自己宪法的修正案,他将到那时为止还保持自治的科索沃和普里什蒂纳省“吸收”进塞尔维亚——同时允许他们在联邦内部各共和国总统职位中

保持两个席位。此后,塞尔维亚能保证在任何争端中得到联邦投票的 8 票中的 4 票(塞尔维亚,科索沃,伏伊伏丁那,顺从的、亲塞尔维亚的黑山共和国)支持。既然米洛舍维奇的目标是缔造一个塞族领导下的、更加一元化的国家,这自然会遭到另外 4 个共和国的反对,联邦政府制度在事实上陷入了僵局。尤其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视角出发,事情的发展导致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既然他们不再能指望通过一个功能紊乱的联邦政府来推进或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的唯一希望只能是远离贝尔格莱德,在必要时宣布完全的独立。

为什么到了 1989 年底,事情就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别的地方,共产主义的出路是“民主”:从俄罗斯到捷克共和国的政党官员和官僚,在几个月内就把自己从原先唯唯诺诺的人转变成油腔滑调的多元政党政治的从业者。生存取决于调整个人的忠诚外表,使传统政党同自由政治的文化一致起来。不管这种转变在许多个人身上多么难办,但是它的确是有效果的。这是因为别无选择。在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若再打出“阶级”这张牌便不会再有权威性,内部也没有几个民族可以成为猎物:根据一套新的公众分类——“私有化”或“公民社会”或“民主化”(或者囊括了这三者的“欧洲”概念)占据了政治新地形的主要部分。

但是南斯拉夫不一样。正因为它的多种族人口如此交相混杂(并且没经历过类似几十年前使波兰和匈牙利改头换面的种族屠杀和人口变迁),这个国家为擅长煽动民心的政治家(比如米洛舍维奇,或他的克族对等人物弗拉尼奥·图季曼)提供了大量机会。在围绕着新的政治体制退出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可以打出一张在欧洲其他地方再也得不到的种族牌——用这张牌取代对民主的关注。

在波罗的海国家或者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政客们可以求助于国家独立,作为走出共产主义过往岁月的出路——同时建立一个新国家和一个新民主政体——而不用过度担心民族主义少数派的存在。但在南斯拉夫,联邦瓦解成各个加盟共和国,会使一个或几个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在别人的国家里处于孤立的地位,只有斯洛文尼亚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其他的就觉得不得不亦步亦趋。简言之,南斯拉夫现在面临的棘手问题有如 70 年前伍德罗·威尔逊及其同僚在凡尔赛未能解决的问题一样。

正如很多人预见到的,催化剂正是科索沃。贯穿整个 80 年代,阿尔巴尼亚人反对政府虐待他们的示威和抗议总是零零星星地出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纳发生的抗议行动。他们的机构被关闭,领导人被驱散,尤其是在 1989 年 3 月实施宵禁以来,他们的日常生活由于被严格管制而受到抑制。塞族宪法修正案有效地剥夺了已经沦为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底层的阿族人任何自治权和参政权——通过米洛舍维奇

1989年6月为庆祝“科索沃战役”600周年而访问这个省份,一系列事件被大大地强调了。

米洛舍维奇对大约100万名听众发表演讲,向当地塞族人保证他们会再一次“重新获得他们的国家,重获民族和精神的完整……到目前为止,由于他们的领导人、政治家们和他们的奴性心理,(塞族人)面对自己和他人都问心有愧。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在这里,我们在科索沃的土地上,我们要说这一切不能再是这样了。”几个月后,在警方和示威者造成大量伤亡的血腥冲突后,贝尔格莱德关闭了科索沃省议会,把这个地区置于政府直辖之下。

在这个国家最南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接影响到北部共和国的决策。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对阿族人的困境最多只是同情,而他们更直接地关心的是塞族独裁主义的抬头。1990年4月,在斯洛文尼亚的选举中,尽管选民的多数仍然喜欢留在南斯拉夫联邦,但是他们支持对联邦现状持公开批评意见的非共产党的反对党候选人。5月,在相邻的克罗地亚,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压倒性多数票,政党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接手成为共和国的总统。

发人深省的是,“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1990年12月——在米洛舍维奇授意下,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领导层未经授权,就攫取了南斯拉夫联盟用于支付联邦雇员和国企工人欠薪和奖金的全部提款权中的一半。占全部人口8%却贡献四分之一联邦收入的斯洛文尼亚人对此尤为愤慨。1991年1月,斯洛文尼亚议会宣布,他们要退出联邦财政系统,并宣布共和国独立,不过尽管他们做出声明,实际上并未开始采取任何分裂的行动。一个月之内,克罗地亚议会也做出类似举动(在斯科普里的马其顿议会也照办不误)。

74 这些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开初并不明朗。在克罗地亚东南部,尤其是在克拉伊纳这个长期存在的塞族边疆定居地,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已经和克族警方发生冲突,他们向贝尔格莱德的政府求救,反抗他们的“乌斯达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名称)压迫者。但是由于斯洛文尼亚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距离,以及塞族人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中人数不足5万,使人感到有希望策划一个和平的退出。外国的看法各异:华盛顿尽管由于塞族在科索沃采取的行动,而延缓一切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但还是公开反对任何分裂行动。

几周后,正在基辅等待布什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1年6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他向南斯拉夫政府领导人保证美国会支持“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南斯拉夫”。但到那时为止,“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字眼。贝克发表讲话5天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控制了他们的边界,在公民压倒性的支持下和几位欧洲重要领导人的默许和赞同下,开始单方面退出联邦。作为回应,联邦军队向新的斯洛文尼亚边界进发。南斯拉夫内战一触即发。

或许,我们可以说南斯拉夫的系列战争一触即发,因为后来一共打了5场。1991年,南斯拉夫对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持续了仅仅几个星期,随后军队撤退,允许分裂分子在和平中离开。紧随其后的是一场血腥得多的战争,交战双方是克罗地亚和叛变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叛变者得到“南斯拉夫”(实际上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军队的支持。战争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年初,在联合国调停下达成了不稳定的停火协议。1992年3月,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投票争取独立,波斯尼亚塞族人对新国家宣战,开始构建一个塞族共和国,并且再次得到南斯拉夫军队的支持,他们包围了几个波斯尼亚城镇,尤其是首都萨拉热窝。

与此同时,1993年1月,波斯尼亚的克族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另一场内战爆发,一部分克族人试图在克族占统治地位的黑塞哥维纳中建立一个暂时的小国家。最后,这些冲突刚告结束(尽管由于萨格勒布再次成功夺下3年前输给塞族军队的克拉伊纳,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火于1995年重燃,此时这些冲突并未结束),科索沃境内缘起科索沃问题的战争又爆发了:米洛舍维奇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结结实实地吃了败仗之后,1999年春天,他重新把注意力转向科索沃,而北约军队对塞尔维亚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进攻,阻止了米洛舍维奇毁灭或驱逐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企图。

在这一切冲突中,既有内在动因,也有外因作用。正如我们所见,促成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国内因素。但正是仓促而至的德国以及随后而来的欧洲国家对这两个新生国家的承认促成了他们的正式存在,对他们的友人也好,敌人也好,这个事实不容动摇。由于独立的克罗地亚现在存在了,贝尔格莱德广播电视歇斯底里的宣传开始利用新国家内塞族人的恐慌情绪,激发战时大屠杀的记忆,催促塞族人拿起武器对抗他们的“乌斯达莎”邻居。 675

在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数量多得多,一个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占多数的、独立的波斯尼亚的前途引发了类似的焦虑。波斯尼亚独立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在战前的各个共和国中,波斯尼亚是最为完整的,而它星罗棋布于领土各处的各个社区一旦因为武力而分裂,将会带来巨大损失;在米洛舍维奇崛起之前,它的少数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派从来没有实质性地表述过政体分立的愿望。然而一旦它的北方邻国分而治之,这个问题又有了讨论的余地。

1991年以后,在米洛舍维奇的剩下的南斯拉夫当中,相比身处少数民族地位,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更喜欢主权独立,于是他们在1992年2月底的全民公决中表达了这一意愿。然而,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已经连续数月听到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说教,这些宣传攻势不仅有关于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大屠杀的,还有关于即将到来的伊斯兰圣战,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与其在由萨拉热窝统治的穆斯林-克罗地亚国家中处于少数民族地位,宁愿和塞尔维亚保持统一或至少拥有自己的自治区。一旦波斯尼亚(或不如说是

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或克族领导人——因为塞族人同时抵制了全民公决和议会投票)在1992年3月宣布独立,它的命运就尘埃落定。4月,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宣布成立塞族共和国,南斯拉夫军队开拔进来,帮助他们保卫领土和“清场”。

塞族对克族、塞族对波斯尼亚的战争,使人民深陷苦难。尽管早先在正规和不那么正规的军队之间有一些公开的战事,尤其是在类似萨拉热窝和伏科瓦这样的战略性城市中,大多数战事是由非正规军进行的,尤其是塞族的非正规军。这些人只不过是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一帮由贝尔格莱德武装起来、由类似于“阿尔坎”(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这样的职业蛇头领导的暴徒凶犯,他们的“塞族志愿卫兵”(“猛虎”)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东部地区屠杀了成百上千民众;或是由类似于拉特克·姆拉迪奇中校(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形容他为“富有个人魅力的谋杀者”)这样的前南斯拉夫军官领导,这位前中校从1992年开始领导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帮助组织了第一次针对居住在克拉伊纳的塞族占多数社区的克罗地亚村民的进攻。

基本的战略目标与其说是打败反对派部队,不如说是将非塞族公民从他们自己的位于被宣布为塞族领土的家园、土地、谋生之地驱逐出去〔5〕。这种“种族清洗”——对一个古老做法的新名词——由各方共同参与,但塞族军队是最残忍的凶手。除了那些被杀害的人(到波斯尼亚战争收尾时,估计有30万人遇害),几百万人被迫四处流亡。1988至1992年间,申请向欧洲国家避难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多,共计25.6万位难民提出申请避难。在战争的头一年,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共有300万人(占战前人口的八分之一)寻求海外避难。

于是国际社会就几乎不会不知道南斯拉夫的悲剧——无论如何,在实播时间里展示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在悲惨的画面,在塞族监狱营地里,穆斯林在忍饥挨饿,还有其他更悲惨的事。欧洲人是最先努力干涉的,1991年6月,派遣了欧共体部长级团队前往南斯拉夫——正是在这个场合,卢森堡外交部长雅克·普斯沉痛地说出了一句不朽名言——“欧洲时刻”已经出现。但是,尽管建立了高级别的委员会进行问讯、仲裁和建议,欧洲社会及其各类机构却被证实非常无助——原因至少是它的成员意见不一:比如,德国和奥地利支持分裂的共和国,其他以法国为首的国家想要保留原有的边界和国家,还有一些国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并不完全对塞尔维亚采取不同情的态度。

由于美国(因此也是北约)打定主意超然于冲突之外,那么顶用的只有联合国了。但

〔5〕 由于南斯拉夫的种族身份不能通过体貌特征或语言来确认,游荡的军人依赖于村民“指认”他们的邻居——他们与这些家庭在和平时期曾经多年甚至几十年友好地比邻而居。

是除了制裁贝尔格莱德,看来联合国也做不了什么。在历史上,联合国指挥的士兵能够进入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和地区,确保和维持和平:但在南斯拉夫尚无和平可维护,而且既无意愿又无手段带来和平。在具有可比性的西班牙内战中,表面中立的国际姿态事实上倾向于内战冲突中的侵犯他人的一方:国际上对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对抑制塞族人于事无补,塞族人可以依赖于旧日南联盟坚实的武器工业,但是禁运严重阻碍了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他们在 1992 到 1995 年间惨重的军事失利。

1995 年之前,国际社会取得的唯一实用成绩是在战火逐渐熄灭后,向克罗地亚派驻超过 1.4 万名士兵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来分隔开克族人和塞族人,然后有选择地向波斯尼亚某些被划为“安全区”的城镇派驻几百位穿制服的联合国维和士兵,以保护数目日增的、蜂拥而至的难民(主要是穆斯林)。日后又出现了联合国授权的、在波斯尼亚部分地区的“禁飞区”,目的是限制南斯拉夫自由地威胁平民(或是它打破联合国实行的制裁)。

也许从长远来说,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是 1993 年 5 月在海牙设立的国际仲裁法庭。仅仅是这样一个法庭的存在,就证明了在那时不言而喻的道理——有人在维也纳以南几十英里的地方犯下了战争罪行,甚至做出比这更糟糕的事。但由于多数假定的罪犯,包括姆拉迪奇和他的波斯尼亚塞族同胞、拉多万·卡拉季奇(塞族共和国总统),对他们犯下的 677 罪行乐此不疲,而且逍遥法外,这个法庭还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

这种情况只是到了 1995 年才发生变化。到那时为止,在联合国军队内外的英、法军官非常积极地宣称,波斯尼亚塞族人力量强大,意志坚决,装备精良。于是一切关于外国干涉的言论都被堵塞了。这些军官还说,千万别惹波斯尼亚塞族人:任何违背他们意愿或利益的、要在波斯尼亚达成和平解决的、郑重其事的企图,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会使情况雪上加霜……这种推理方法来自于贝尔格莱德的米洛舍维奇,他仍然有点不实事求是地说,他在波斯尼亚的塞族同胞所作的决定中没起什么作用。

波斯尼亚塞族人拥有事实上的自由〔6〕,他们仍然进一步过度使用这样的权力。尽管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包括一群外国外交家组成的“联络组”不知疲倦地寻求一项协议)“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1994 年 3 月建立于华盛顿的一次结束克罗地亚-穆斯林战争的庆典上)应该在一个新的联邦制中,波斯尼亚人占 51%,而塞族人占 49%,以佩尔镇为基地的塞族领导人无视这个建议,反而继续他们的进攻。1994 年 2 月,他们的军队往萨拉热窝的市场投掷了一枚迫击炮弹,杀害了 68 人,使几百人受伤。随后,北

〔6〕 1992 至 1994 年间,联合国在巴尔干的机构几乎和波斯尼亚塞族人一鼻孔出气——比如说,允许他们享有有效的否决权,可以决定何人、何物可以出入被包围的城市萨拉热窝。

约在联合国支持下,威胁说,如果有进一步的进攻,他们将实行空中打击,于是有了暂时的平静。

然而在1995年5月,由于波斯尼亚的军事拓展和克罗地亚成功夺回克拉伊纳(这样就证明关于塞族军事威力的说法荒诞不经),塞族对萨拉热窝的轰炸再度开始。当北约飞机作为回应而轰炸波斯尼亚的塞族目标时,塞族人将350位联合国维和人员挟为人质。西方各国政府担心自己的士兵,恐遭不测,强求联合国和北约中止他们的行动。国际力量的存在远不能够抑制塞族人,现在反而给了他们额外的保护。

有此西方人胆怯之明证壮胆,7月11日,姆拉迪奇领导下的波斯尼亚塞族大胆地阔步进入所谓的一个联合国“安全区”——波斯尼亚东部城镇斯雷布雷尼察,到那时为止,那里已满是在心惊胆战的穆斯林难民。斯雷布雷尼察不仅正式由联合国法令“保护”,而且守军是超过400位荷兰士兵组成的联合国维和分遣队。但当姆拉迪奇的手下到来时,荷兰军队放下武器,不做丝毫抵抗;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军队梳理了穆斯林社区,将男人和男孩同其他人分开。第二天,姆拉迪奇说“以他军官的名誉担保”,这些男性不会受到伤害,678 他的士兵将这些穆斯林男性,包括年仅13岁的男孩,带到斯雷布雷尼察周围的田地里。在随后的四天里,他们当中几乎所有的人(一共是7400人)全部被杀害。荷兰士兵毫发无损地回归故里。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是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恐怖的集体谋杀:这一战争犯罪的级别达到了欧哈杜村惨案、利迪泽村惨案或卡廷惨案的规模,而且在国际观察员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几天之内,关于在斯雷布雷尼察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新闻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然而唯一的快速反应是北约对塞族人的官方警告:如果其他“安全区”再遭袭击,空中打击将卷土重来。直到8月28日,整整过了7个星期,国际社会终于发出回应——这仅仅是因为波斯尼亚塞族人非常有理由地假设自己拥有发动大屠杀的自由权利,再次错误地向萨拉热窝的市场投掷炸弹:又杀害了38位平民,其中有许多儿童。

现在,北约终于行动了。克林顿总统战胜了联合国领导层、某些欧洲领导人、甚至他自己的美国军队里始终存在的不情愿的情绪,授权进行严厉的、持续的大型轰炸行动,意在减少并最终消除塞族人造成进一步伤害的能力。行动来得晚了些,但的确有效。塞族人自己大肆吹嘘的战斗机器烟消云散。面对着对他们的阵地持久而结果未定的攻击,而没有米洛舍维奇的支持(此人此时可以强调他和来自佩尔镇的人保持着距离),波斯尼亚塞族人偃旗息鼓了。

塞族人现在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而美国却大显身手,证明要在巴尔干引入和平是多么令人吃惊地轻而易举——或者至少让那里没有战争。10月5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停火,宣布各方同意在美国进行和平会谈。11月1日,会谈在俄亥俄州的戴顿的美国空军基地

开幕。3个星期后,会谈结束,1995年12月14日,在巴黎签署了协议〔7〕。图季曼代表克罗地亚,阿利扎·伊泽特贝戈维奇代表波斯尼亚穆斯林发言,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同时代表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塞族签署协议。

从美国的观点看,戴顿会议的目标是寻求南斯拉夫战争的解决,而不引起波斯尼亚的分裂。若分裂,就代表塞族人的胜利(塞族人到那时候就会寻求加入他们在塞尔维亚的中心地区的部分,建立符合民族主义梦想的大塞尔维亚);而且分裂就等于将种族清洗作为建国的一部分内容而获得国际认可。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复杂的三方统治系统,波斯尼亚的塞族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均享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和领土权,但他们并存于唯一的波斯尼亚国家中,整个国家的对外边界将保持不变。

于是,从形式上看,波斯尼亚从内战中幸存下来。但恐怖和驱逐的后果却无法被消除。大多数被逐出家园的人(首当其冲的是穆斯林)再也没有回来,尽管他们得到当地和 679 国际当局的保证和鼓励。千真万确,进一步的“清洗”即将发生——这回轮到塞族人了,他们被萨格勒布当局从刚被获取的克拉伊纳系统性地驱逐出去,要不就是被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施压,要他们离开在萨拉热窝或别处的家园,然后在主要是塞族的地区“重新定居”。但从总体而言,和平持续了下来,波斯尼亚金瓯无缺——这要归功于超过6万名士兵的北约军队作为执行部队(而后又作为稳定部队)和一位平民高级代表,他被授权管理国家,直到这个国家能够承担责任,管理自己的事务。

这位高级代表和国际部队还一直留在波斯尼亚,持续监管它的事务,直至本书撰写之时(戴顿协议签署后已经10年了)——这表明这个国家在战后多灾多难,3个民族之间仍然彼此不怀好意,缺乏合作〔8〕。波斯尼亚接待了大量的国际机构:政府机构,政府间机构,还有非政府机构。的确,1995年后的波斯尼亚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些机构的存在和开销。1996年1月,世界银行估计,使波斯尼亚复苏的3年之内需要51亿美元。这被证明还是极度乐观的估计。

一旦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各式各样的国际机构都到位,来确保和平,国际上的关注就退潮了。和往常一样,欧盟为自己机构的事情所折磨;而克林顿则首先忙于本国选举的问题,其次是北约扩张,还有叶利钦的不稳定的俄罗斯,于是全世界就不再聚焦于巴尔干危机。但尽管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表面上现在是独立国家,但是南斯拉夫问题还没得到解决。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还掌控着他的国家残存的部分,而问题是他赖以

〔7〕 在法国坚持下,签署协议在巴黎举行——这个做法本意是要在形式上好好补偿一下,但这样一来,反而更加突出早先法国对反对塞族人的行动是不情愿的。

〔8〕 北约领导的维和部队2004年12月2日被欧盟驻波黑的多国维和部队所取代。

掌权的首要问题一触即发。

塞尔维亚的阿尔巴尼亚人一直遭受歧视和压迫——的确,国际社会的关注转向更北部地区的危机了,所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戴顿协议签署后,米洛舍维奇的国际地位决定性地提高了:尽管他并没有成功地使所有的制裁都取消(这是他如此配合美国人在波斯尼亚和平行动的主要目的),南斯拉夫不再是过去那种低三下四的下等人。于是,由于他的一系列失败,并且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治家批评他和塞尔维亚的“敌人”妥协时,米洛舍维奇重提科索沃问题。

到1997年春,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人伊丽莎白·雷恩已经开始发出警告,说科索沃省的灾难即将到来,因为贝尔格莱德当局压迫那里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拒绝一切要求当地自治权的要求,甚至剥夺了当地人哪怕最少量的机构代表席位。武装起来的年轻一代的阿族人从阿尔巴尼亚那里得到鼓励,越过孤立无助的、忍辱负重的易卜拉欣·鲁戈瓦的温和派领导,放弃了非暴力抵抗,越来越接近科索沃解放军。

科索沃解放军最早在1992年出现在马其顿,致力于通过武装斗争来夺取科索沃独立(也许也希望和阿尔巴尼亚联合)。它的策略主要是对孤立的警察局进行游击战式的进攻,这给米洛舍维奇一个机会来谴责所有的阿族抵抗为“恐怖主义”,并授权发动越来越暴力的行动。1998年3月,武装有迫击炮和战斗直升机的塞族军队在德雷尼卡和其他阿尔巴尼亚村庄发动屠杀,杀害杀伤几十人。尔后,国际社会最终对鲁戈瓦的呼吁发出回应,开始密切关注。但是当美国和欧盟表示他们“对科索沃警方的暴力极度震惊”,米洛舍维奇却发出好战的警告,说“意在将问题国际化的恐怖主义将对那些求助于这种方式的人最为有害”。

到此时为止,科索沃所有的阿族领导人——其中多数人或四处漂泊,或东躲西藏——认为只有完全脱离塞尔维亚,才能拯救他们的部族。与此同时,美国和正在进行的“联络组”国家继续努力,在米洛舍维奇和阿族人之间斡旋——部分原因是为了从中促成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而另一部分原因是阻止在巴尔干南部地区爆发一场范围更广的战争。这并不是无端的恐惧:如果南斯拉夫不能被调教到体面地对待它的阿族公民——而阿族人是选择分裂的——这会给邻近的马其顿带来严重后果,马其顿本身就有一大群不开心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

刚独立的马其顿,在希腊人的坚持下,被称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简称为“前南马其顿”)[9],从历史上来看一直是个敏感地区。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它与保加利

[9] 日渐迟暮的希腊首相安德烈·帕潘德里欧为获得竞选优势而操纵民族情绪,宣称“马其顿”的说法是他的国家的古老遗产的一部分,仅适用于希腊自己的最北部地区。如果源自南斯拉夫南部的斯拉夫国家自称为马其顿,它必有民族统一之志。帕潘德里欧不能承认的是,许多希腊马其顿地区的“希腊人”本身就是斯拉夫人的后裔——尽管最后由于爱国的目的而希腊化了。

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接壤的地区都一直充满争议。它的所有邻国总用充满疑虑的眼光对待它——这个完全处于内陆的国家必须全部依赖邻国,才能获得外贸和通向外面世界的通道。而且在它脱离南斯拉夫后,能否生存下去绝不是一件十拿九稳的事。但是一旦马其顿崩溃,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甚至土耳其都有可能卷入纷争。

于是米洛舍维奇持续地对科索沃阿族人的虐待甚至屠杀,必定会给他带来西方列强的不满,直至最终干涉。奇怪的是,他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领会这一点,尽管美国国务卿玛 681 德琳·奥尔布赖特、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在1998年整个夏天都对他发出系列警告,比如奥尔布赖特就说,她认为米洛舍维奇“个人应该负责”。正如几年后的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米洛舍维奇与西方的意见绝缘,并对自己长袖善舞、操控外国政治家的能力过分自信。

这并不全是米洛舍维奇的错。某些美国外交官虚荣心强,过度自信他们的谈判威力,他们频繁造访米洛舍维奇,让他高兴地很有理由相信,他不被西方当作不妥协的敌人,而是一位有特权的对话者。〔10〕这位南斯拉夫独裁者很清楚,国际社会首要关心的问题是防止任何进一步重新划定国界的可能。一直拖到1998年7月,尽管有明确证据证明科索沃局势已经令人绝望,外国“联络组”国家的部长们仍然公开排除将独立作为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米洛舍维奇很不理解的是波斯尼亚浩劫对国际舆论所产生的转折性的影响。人权——尤其是种族清洗——在每个人的日程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只是因为当初整个世界没有及时行动,结果让所有的人都为此自责不已。1998年6月,设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宣布,对在科索沃犯下的罪行拥有执法权——检察长路易斯·阿博尔宣布,在科索沃省发生的战斗的规模和性质,决定其为应受国际法管辖的武装冲突。7月19日,美国参议院敦促海牙官员,指控米洛舍维奇犯下“与人类为敌和种族仇杀的战争罪行”。

这样指控的可行性在快速增加。当时不仅成百上千阿族“恐怖分子”被从塞尔维亚抽调来的特警部队杀害,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冲突的掩护下,贝尔格莱德当局计划“鼓励”阿族人离开,强迫他们为了逃命背井离乡,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生计。1998年至1999年冬天,一直有关于塞族警方行动的报告——有时是他们回应科索沃解放军的进攻,尤为典型地是塞族警方攻击一个或多个有几代人的大家庭——目的在于使整个社区胆战心惊,从而放弃他们的乡村,落荒而逃,直到穿越边境进入阿尔巴尼亚或马其顿。

〔10〕 1996年冬,在当地的选举明显带有欺骗性的结果产生后,塞族学生在贝尔格莱德的街道上示威,时间长达3个月之久,他们抗议米洛舍维奇的独裁,要求变革。他们没有得到西方列强的任何支持,因为西方国家将米洛舍维奇当作戴顿协议签署后的稳定因素,于是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削弱米洛舍维奇地位的行动。

国际反应日显分歧。美国及其多数北约盟友公开赞成代表被困阿族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军事干涉,这些行动早在1998年10月就开始了。但在联合国(它对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表面上必须经过授权),中国和俄罗斯强烈反对,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决议,将北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定性为“非法入侵”。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希腊出于自身原因,反对对南斯拉夫事务的任何干涉。与此同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向他们在塞尔维亚的斯拉夫同胞提供“无条件团结”和“道义上的支持”。

贝尔格莱德当局在1999年年初增加赌注,进行一系列残忍的大屠杀,首先,1月15日在科索沃南部的农村下手,继而在3月里扩大到科索沃全省。要不是他们这样做,这明显的僵局也许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拉恰克屠杀造成45名阿族人丧生(其中23人明显是被处死的),这次暴行最终就像萨拉热窝市场的刺杀案那样,刺激国际社会采取行动。^[11]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一个南斯拉夫代表团在朗布依埃举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贝尔格莱德当局拒绝从科索沃撤军,也拒绝接受国际军事力量在科索沃的存在。谈判陷入如此结局,已是意料之中。干涉已不可避免。3月24日,尽管没有联合国正式许可,北约战舰、飞机和导弹在南斯拉夫开始行动,事实上向贝尔格莱德政权宣战。

最后的南斯拉夫只持续了3个月,其间北约军队对塞尔维亚本身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是对于制止正在进行的将阿族人从科索沃驱逐出去的行动,成效却很有限:在战争期间,大约86.5万名难民(其中一半是科索沃的阿族人)逃往黑山、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西部阿族地区边境的临时营地。克林顿总统轻率地公开坚持认为北约地面部队不应该介入其中,迫使北约联盟从空中发动战争,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灾祸,而被南斯拉夫宣传攻势利用,也被塞族抓住,以受害者的身份大做文章——这个结果是可以预见的。6月9日,贝尔格莱德当局同意从科索沃撤出全部军队和警力,北约的进攻暂时延缓,联合国适时下令由北约领导的科索沃军队对科索沃进行“临时”占领。

攻占科索沃,标志着长达10年之久的南斯拉夫战争终结,也标志着米洛舍维奇自身终结的开始。他的信誉遭到了破坏,原因是他自己给塞族人的民族主义计划带来了最近的、也是最坏的挫折;2000年9月,他在南斯拉夫总统选举中被反对党候选人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击败。米洛舍维奇玩世不恭地承认科什图尼察得票更多,却宣称两人差距甚微,应该再进行一次决定性选举。此举终于引发长期遭受苦难的塞族人的普遍抗议。成千上万抗议者涌向贝尔格莱德街头,10月5日,米洛舍维奇最终承认失败,认输下台。6个月以后,对西方经济援助越来越不抱希望的塞尔维亚政府同意速

[11] 至于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暴行,贝尔格莱德当局及其支持者要么坚持说暴行从未发生过,要么等到他们无法自圆其说时,就说这是受害者自己刻意安排的“挑衅行为”。

捕米洛舍维奇,并将其移交给指控他犯下种族屠杀和战争罪行的海牙法庭。

该怪谁造成了南斯拉夫的悲剧?当然各个方面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起初,联合国对此几乎无动于衷,它的秘书长布特罗斯·波特罗斯-加利行动不力,对此漠不关心,他把波斯尼亚形容为“有钱人的战争”。当联合国代表确实抵达巴尔干后,他们把大多数时间用来阻挠对最可恶的侵略者采取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欧洲人也好不了多少。尤其是法国明显地不情愿将事态进程归罪于塞尔维亚——而且法国人的确根本不愿意和巴尔干事务沾边。

这样,当1990年9月华盛顿当局在法国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峰会上,试图将南斯拉夫提上议事日程时,弗朗索瓦·密特朗指责美国人“过度夸大”(事态的严重性)而拒绝这项提议。4个月后,当南斯拉夫问题再度上升,法国外交部声称外国干涉“为时已晚”……之后即使国际力量不得不投身该地区的行动,巴黎当局依然保持不合作,联合国派驻在波斯尼亚的维和部队司令、法国将军伯纳德·让维埃个人禁止在斯雷布雷尼察展开打击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空中袭击。^[12]至于荷兰政府,更是否决了北约针对波斯尼亚塞族要塞的一切打击行动,直至所有的荷兰士兵安全离开波斯尼亚。

其他国家的表现略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伦敦当局最后支持美国施压干涉,但在南斯拉夫冲突发生后的关键的前几年,英国当局阻碍欧共体和北约进行任何直接干涉。英国对待南斯拉夫难民的行为很是可耻:1992年11月,当无家可归的、绝望的波斯尼亚人的数量达到高峰时,英国宣布波斯尼亚人没有签证不能入境。这真是“不讲信义的英格兰”最无心肠的表现。由于萨拉热窝没有英国大使馆可以发放这样的签证,波斯尼亚家庭唯有借道第三国才能到达英国大使馆,这样英国人就说,既然他们已经在其他地方找到避难所,英国就不需要让他们入境。就这样,尽管在1992到1995年间,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慷慨大方地接纳了成千上万南斯拉夫难民,英国实际上在同期减少了向它寻求庇护的人员的数量。

尽管华盛顿当局过了特别长的时间才关注于巴尔干事务,但是一旦开始关注,美国在那里的表现就好多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的动议,才推动了每一阶段的国际干预,这是西方国家中欧洲盟国一系列屈辱的源头。然而美国也踟躇不前——主要原因是其国防部

684

[12] 让维埃的行为引起了法国还有其他地方的人们要求将他作为随后发生的大屠杀的共犯。

尼亚战争达到高潮时说的,“这是来自地狱的问题。”

至于南斯拉夫人自己,没有人以光荣的姿态出现。南斯拉夫联邦制度的失败是贝尔格莱德当局猝然造成的,但是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当局并不为联邦制度的消失而感到难过。诚然,波斯尼亚穆斯林只是束缚自己不要犯下战争罪行——在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别人进犯的对象。他们的损失是最让人难过的——萨拉热窝的毁灭尤其令人悲伤。以它受到限制的规模而言,波斯尼亚首府是个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它也许是最后的多种族、多语种、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中心城市之一,一度代表了中欧和地中海中部的荣光。它可以被重建,但它永远不可能恢复元气。

另一方面,武装的克罗地亚人要对无数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负责——这些暴力行为,或者是在萨格勒布当局的授意下,或者是他们自发的。在波斯尼亚西部城镇莫斯塔尔,这里有超出寻常比例的跨宗教信仰的婚姻关系,克族极端分子有意开始将穆斯林或多信仰的家庭逐出城市西部。然后他们将克族农民驱赶进城市,取代上述家庭,这些农民由于在自己村庄里发生的种族清洗的经历,已经变得激进了。克族极端分子还包围了穆斯林的东部地区。与此同时,在1993年11月,他们有计划地摧毁了内雷特瓦河上一座16世纪的奥斯曼大桥,这座桥象征着这座城镇融合宜居的过去。

于是克族人便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在碎石瓦砾中崛起的所有“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领导人中,弗拉尼奥·图季曼是更惊人地缺乏吸引力的一位。他想把南斯拉夫的去从同胞们的记忆中抹去,他比任何人都重视这一点,并且把这当作一项个人计划:截至1993年3月,在克罗地亚新出版的课本、读物、百科全书、书本标题和地图中,“南斯拉夫”一词已经杳无踪迹。只有在图季曼死后,他建立的克罗地亚国家才能可信地重新定位自己,申请国际社会的成员身份。

但是说到底,是塞尔维亚人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应该为南斯拉夫的灾难负主要责任。正是因为米洛舍维奇追求权力,导致了其他共和国的分离。正是米洛舍维奇随后鼓励他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同胞划出领土地界,并使用自己的军队支持他们。还是米洛舍维奇,授权并指引了针对南斯拉夫的阿族人的持续进攻,导致了科索沃战争。

685 贝尔格莱德当局的行动所到之处,都给塞族人带来灾难。他们在克罗地亚的克拉伊纳地区失去了土地;他们被迫接受一个独立的波斯尼亚,放弃了从中划出一个拥有主权的塞族国家;他们在科索沃被打败,从那时起,许多塞族人有理由害怕遭到阿族的报复,满怀恐惧地从那里出逃;在南斯拉夫的残余部分中(黑山共和国也试图从中分裂出来),他们的生活水平降至历史最低点。事态发展已经进一步加剧塞族人由来已久的、因为遭受历史不公待遇而形成的整体自怜倾向。的确如此,从更长远看来,塞族人极有可能成为南斯

拉夫战争最大的输家。这和他们国家的状况有关,今天即便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当前的生活水平和未来前景也比塞尔维亚排名靠前。

但是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不应该让我们无视塞族的责任。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战争可怕的暴行和病态的残忍——那一系列的虐待、侮辱、折磨、强奸,以及对成千上万自己同胞的谋杀——是塞族男性(大多是年轻人)干的好事,引发了意外的仇恨,以及媒体和当地的部族领袖对苦难的漠视,这些部族领袖的最高指令和权力来自贝尔格莱德当局。随后而来的就不是那么不寻常的事了:这在欧洲短短几十年前就发生过——当时整个欧洲在战争的旗帜下,平常人犯下了非同寻常的罪行。

毫无疑问,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塞族的宣传力量可以依赖的历史,一段以往的苦难历史,深埋在战后南斯拉夫貌似平静的生活底下,这种平静很有误导性。但是,恰恰是人们,尤其是某一个人,决定要唤醒这段记忆,从而操纵它,利用它来达到政治目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戴顿会谈期间言不由衷地向一位记者承认,他从来没想到在他的国家,战争持续时间会这么长。这无疑是真的。但那些战争并不是由于种族原因自发点燃的。南斯拉夫不是坠落:它是被推的。它不是自己死的:它被杀害了。

南斯拉夫的情况最糟,但是各处的“后共产主义国家”都举步维艰。葡萄牙和西班牙从独裁到民主的道路,伴随着从落后农业经济到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西欧其他地方从自己的历史上就一直熟悉的混合过程。但是从共产主义倒退却没有先例。从贝尔格莱德到伯克莱,在学术界、大学和咖啡馆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十分令人期待的道路被理论化了;但是没有人想过要给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提供蓝图。

在共产主义的许多沉重的遗产里,最看得见的是经济问题。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或西利西亚落后陈旧的工厂不光经济上运作不良,还带来环保问题。二者联系密切:贝加尔湖的毒化,咸海的死亡,波希米亚北部森林四处飘落的酸雨,不仅代表着生态的浩劫,还代表着对未来的严重抵押。在对新工业能有任何投资以前,旧工业需要被拆除,并且也应该有人为他们造成的破坏做出补偿。 686

在德国东部各州,联邦政府开始采用对共产主义造成的破坏进行修复的议案。国家投资银行(参见第 17 章)在随后 4 年里花费几十亿德国马克,收购或变卖陈旧的工厂,向冗员清付工资,尽力补偿他们的活动造成的后果。结果尽管参差不一,并且几乎使联邦财政破产,前东德人还是幸运的:他们摆脱共产主义的过渡由西欧最强大的经济体买单。其他地方重新投资经济生活的代价却必须由受害者自己付出。

“后共产主义”的政府面临的基本选择,要么用“大刀阔斧”模式尝试一次性地、一夜之间从接受补助的社会主义经济到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的变形,要么谨慎地去除或变卖

“计划经济”中运作特别不良的部门,与此同时尽可能长久地保留对当地人来说最重要的方面:便宜的租金,有保障的工作,免费的社会服务。第一种策略与新崛起的一代“后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和生意人钟爱的自由市场法则最为吻合;第二种从政治上来说比较谨慎。问题在于任何一个策略在短时期内(也许在不那么短的时期内)引起严重的痛苦和损失:在鲍里斯·叶利钦的俄国,两种策略都应用了,它的经济在8年里剧烈萎缩——这在现代史上对一个主要经济大国而言,在和平年代是最重大的挫折。

波兰在莱舍克·巴尔来洛维茨(他先是财政部长,后来是国家中央银行行长)斩钉截铁的监督下,首开先河,运用“大刀阔斧”模式,也是最持久使用这一模式的国家。巴尔舍诺维奇争辩道,很显然,他的国家除了名称外已经破产,如果没有国际援助,一定无法恢复元气。然而除非波兰的信用建构是那种让西方银行家和借贷机构放心的类型,否则国际援助就来不了。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波兰强加严厉举措;相反,只要波兰预先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格规矩,就可以名至实归地得到它需要的帮助。要想这样,唯一的方法是“要快”:应该抢在“后共产主义”的蜜月期,抢在人们认识到这个过程有多痛苦之前。

于是在1990年元旦,波兰的第一个“后共产主义”政府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建立外汇储备,停止价格控制,紧缩信贷,削减补助(换言之就是允许企业破产)——这些措施都以国内的实际工资为代价,工资立刻降低了大约40%。除了不可避免地明确承认187 失业(支持和帮助那些失业者再培训的基金的建立,使情况得到缓和),这和70年代两度改革不成功的尝试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政治气候变了。

在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在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后来担任了总理)领导下,国家奉行一套同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只不过他们额外强调货币可兑换性,开放外贸和私有化,一切都符合克劳斯公开宣传的“撒切尔主义”。和巴尔舍诺维奇以及克里姆林宫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一样,克劳斯喜欢“休克疗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他找不到什么值得保留的,他发现推迟转向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好处。

站在另一个极端的是斯洛伐克的麦恰尔、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和乌克兰总理(后来担任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等人。为了不使他们的选民不安,他们尽可能推迟实行任何变革——乌克兰的第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在1994年10月宣布——事实还证明他们非常不愿意放开国内市场,或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所占份额。1995年9月,库奇马警告说,不要“盲目抄袭外国经验”,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立场——这种说法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学家来说早已耳熟能详。

90年代初,第一批前共产主义国家在艰难地走出经济泥潭后,在比较安全的基础上重新崛起,它们能够吸引西方投资者,并且看到自己最终可以进入欧盟的前景。波兰或爱

沙尼亚相对于罗马尼亚或乌克兰而言,在经济策略方面比较成功,这对于任何来访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就小型商业活动或者从公众的乐观主义的层面上来说;这些更成功的东欧国家比前东德都要做得好,尽管后者拥有明显优势。

我们不妨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更“先进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像波兰——或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也许还有匈牙利——可以用这种方式,在经过几年的艰辛之后,缩短了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距离,尽管这是以他们老一辈更穷苦的公民付出一定代价来达到的;与此同时,剩下的第二批巴尔干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自己挣扎,它们的前进步伐受制于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考虑必要的变革的、腐败的统治集团精英们。

从总体上来看的确如此。但即便没有克劳斯、或巴尔舍诺维奇、或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的同级别领导人,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也一直要比别人在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做得更好:要么是因为他们在1989年以前就出发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要么因为他们在苏维埃时代的扭曲现象并不像那些不那么走运的邻国那样病态(在这一方面,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比较即为明证)。当然,在某些国家首都可以找到的经济转型的奇迹——比如说,在布拉格,或者华沙,或者布达佩斯——并不是在它们的偏远省份里可以复制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中欧和东欧真正的界限不是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繁

688

华的都市地区和被人遗忘的穷乡僻壤之间。

比这些国家在后共产主义阶段经历的差异更发人深思的,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毕竟在每个国家,新的管理精英面对同样的策略选择。正如俄罗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在1994年1月鄙夷地说过的:“市场经济的浪漫故事”在到处都一样。^[13]所以,总体的经济目标也是普遍地一样的:经济自由化,转型到某种形式的自有市场,加入欧盟——欧盟会保证带来诱人的外国顾客,他们会投资,提供地区性的援助资金,来缓解指令性经济的解体带来的痛苦。这些都是几乎每个人梦寐以求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在有见识的人看来,这件事情别无选择。

如果说“后共产主义”各国的公共政策有深刻差异的话,那么不是因为对这些国家何去何从——或者如何到达目的地——有任何广泛的见解分歧。真正问题是如何处理资源。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也许已经扭曲,效率低下,但它们拥有大量的、潜在性的、有利可图的资产——能源,矿产,武器,房地产,通讯媒体,交通网络,还有其他不可胜数的资产。

[13] 在以商业为导向、迫不及待想要逃离桎梏重重的过去的年轻一代中,“市场经济的浪漫故事传奇”甚至带来了新的因循守旧,来代替共产主义刻板的公众语言: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顶礼膜拜,认为这种经济学带来的是阳光明媚和欢欣鼓舞,却从来不懂它的社会代价。

而且,在后苏维埃社会中,唯一知道如何管理一个实验室、一座农场或工厂的人——拥有国际贸易或管理大型机构经验的人——知道如何办事的人,是共产党的自己人:知识分子,官僚,政要显贵。

这些人就是要在 1989 年后负责管理自己国家的人,正如他们在 1989 年以前也一样——他们要管到至少到“后共产主义”新一代可以出现以后。但现在他们要在新的姿态下工作:他们不再为党服务,他们要在各个争权夺利的政党中工作;他们不再受雇于国家,相反却成为技能、商品和资本的竞争性市场中的独立工作者。当国家出卖自己的一切利益(从采掘权到公寓街区)时,这些人(主要是男人,而乌克兰未来的总理尤丽娅·季莫申科是个明显的例外)就是会做出卖生意的人——也是会做买入生意的人。

在传遍福音的整个“后共产主义”欧洲,资本主义就是同市场相关。市场意味着私有化。在 1989 年后的东欧,出售公有商品就像火灾受损物品大拍卖一样史无前例。西欧对私有化的顶礼膜拜从 70 年代末(参见第 16 章)加快速度以来,为东欧从国有制狼狈撤退 689 提供了一个模板;但除此之外两者几无相似之处。与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世界和西欧在 4 个世纪中的崛起相伴随的,是法律,制度,规章和实践——这些是它赖以生存、保持合法性的奠基石。在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法律和制度鲜为人知——而且自由市场的新信徒们低估了它们的重要性,这是很危险的。

这样的结果造成了私有化下的盗贼当道,贪污腐化。最寡廉鲜耻的是叶利钦和他的朋友们当政时期的俄罗斯,过渡时期之后的经济落入一小撮人的手中,这些人变得富可敌国——到 2004 年为止,36 名俄罗斯亿万富翁(“寡头”)聚敛了估计 1 100 亿美元财富,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私有化、贪污勒索和直截了当的偷窃之间的区别简直荡然无存:有那么多东西可供窃取——石油,天然气,矿产,贵金属,输送管道——然而却没有人、没有什么措施可以防止这种偷盗。公共资产和公共机构分崩离析,被重新配置,官员们将事实上可以移动的或可以合法重新分配的东西占为己有,或转移到私人名下。

俄罗斯的情况最糟,乌克兰紧随其后。库奇马和其他政要都来自“商人”的巨额现金支持,当然这些钱也将为这些商人带来未来的收入;在后苏维埃的乌克兰,正如这些人心知肚明的那样,权力带来富贵,没有权力就没有富贵。公共财物、国家贷款或补贴从政府手中直接流入几大家族的腰包,当中的许多转移到了海外的私人账户上。这些国家里的新“资本家”没有真正创造任何东西;他们仅仅通过洗钱方式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

裙带关系泛滥成灾,正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况一样,但是有人变本加厉地中饱私囊:乌克兰拥有世界最大的钢厂之一——克里沃罗格钢铁厂,这家工厂拥有 4.2 万名雇

员,每年(在一个人均月薪只有95美元的国家)税前利润高达3亿美元。2004年6月,这个厂终于被出售。在基辅,当人们得知成功“拍得”这个厂的人叫维克多·平丘克,无人会感到惊讶。此人是这个国家最有钱的商人之一,也是乌克兰总统的女婿。

在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国有资产即使没有全部卖光,也遭受了类似命运。当地政治首脑们安然度过最初的私有化谈判,他们更愿意按原有方式保持自己的权利和影响。正像阿尔巴尼亚人在差不多也是这段时间里所做的那样,追求快速从市场得到满足的罗马尼亚人却被提供了一种金字塔计划,能保证在短期内带来巨额的无风险暴利。在高峰时期,一个号称“博爱”却实为欺骗性的商业阴谋活动,在1992年4月到1994年8月风行一时,参与者可能有400万——几乎占到罗马尼亚人口的五分之一。

就像“合法”的私有化一样,这些金字塔计划(这些计划在俄罗斯也大兴其道)主要使私有现金流入以旧的政党网络和安全机构为基础的黑手党手中。与此同时,在齐奥塞斯库倒台14年后,66%的罗马尼亚工业仍然保留在国有制中,然而一些更加有利可图的、有吸引力的企业已经易手。许多年来,国外投资者对冒风险将资本投入这样的国家顾虑重重,这也是情有可原的:由于长期缺乏法制保障,充裕回报的前景被抵消了。 690

在中欧其他地方,风险的平衡对外国投资者有利,原因是欧盟成员国的地位必将加速必要的制度改革和立法。即使这样,在匈牙利和波兰最初的私有化过程中,很多是将共产主义时代的黑市交易转化为合法的活动,或是将国有企业中明显有望成功的部分快速出售给有境外资金支持的当地企业家。变革3年之后,波兰国有企业中仅有16%出售给私人。在捷克共和国,有一个有独创性的担保计划,向人们提供机会购买国有企业中的股份。这个计划原本想要使公民人人成为资本家:但它在后来几年的主要效果却是为未来的丑闻种下祸根,并且造成了针对猖獗的“牟取暴利”的政治反击。

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私有化被扭曲的一个原因是西方介入的实质性缺席。的确,在莫斯科或华沙,一开始时有许多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主动要求教给接待他们的主人如何建设资本主义,而且特别是德国公司对相对比较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司(例如捷克的“斯柯达汽车制造公司”)很早就表示了兴趣。^[14]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外国政府的参与,没有马歇尔计划,或者任何和马歇尔计划有一点相似的东西:除了在俄罗斯,来自华盛顿当局的大量拨款和贷款源源不断地涌入,以支持叶利钦的政府——而这些钱却又流出了,进入了叶利钦及其盟友和支持者的腰包里。

[14] 由于对布拉格被大德国共荣圈重新吸收的前景,在民族主义者之间出现了不安情绪,有一个流行的笑话:“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后共产主义远景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德国人来了!”“坏消息是什么?”“德国人来了!”

外国投资不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西欧那样持续不断,相反,却像凡尔赛协议后那样,只有零零星星的私人投入,而且在情况良好的时机投入,在形势严峻时撤出。〔15〕于是像过去那样,东欧人只好和西方的对手在明显不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他们既无当地资本,也无海外市场,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食品和原材料,或其他低廉的工业品或消费品。这些商品保持低廉的原因是低工资和公共补贴。

因此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许多“后共产主义”政府都动心了,就像他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前任那样,他们保护自己避免因为这样的局势而付出政治代价,他们的做法就是建立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建立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和公司的法律。这些较早地试图自给自足的努力,被外国评论家不甚公正地指责为“民族主义”,可以预想,这些做法成效甚微:通过限制外来投资而扭曲本地市场,他们只不过将私有化进程进一步推向腐败。〔16〕

于是每个不老实的俄罗斯寡头都在伦敦或戛纳有第二个家,每个兴高采烈的年轻波兰生意人都有一辆宝马和一部移动电话,每有一个这样的人,与之对应的是几百万愤愤不平的、靠微薄养老金度日的老人和下岗工人。对这些老人和工人而言,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充其量是模糊不清的,更别提成百上千万个既不能被重新安排、又不能在经济上自谋生活的农民了:在波兰,到了20世纪末,农业只贡献3%的国内生产总值,但还占劳动力的五分之一。失业一直在许多地方泛滥——但失去工作却带来便宜设施和其他福利,过去这些好处在这些国家是和工作相伴的。物价持续上涨,不管是因为通胀〔17〕也好,或是因为预期加入欧盟,任何有固定收入或国家年金收入的人(这就意味着大多数教师、医生和工程师过去曾是社会主义的骄傲)很有理由越来越怀念过去。

东欧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年过四十的人——沉痛地抱怨他们失去的物质上的安全感、便宜的食宿和各种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渴望回到共产主义。一位50岁的俄罗斯退休军事工程师和她拿着养老金的丈夫每月依靠448美元度日,她在2003年对外国记者解释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像苏联时代那样好过,确保有个美好稳定的未来,物价便宜——但与此同时,我们能拥有过去没有的自由。”

对拉脱维亚人来说,回到俄罗斯的统治之下是非常可怕的,但他们的民意测验仍然表

〔15〕 例外的是爱沙尼亚。它事实上被斯堪的纳维亚邻居收养了,因此获益颇丰。1992年,当它离开卢布区时,它的92%的贸易都是和前苏联进行的。5年后,75%的外贸都是和西方进行的,其中多数跨越波罗的海。

〔16〕 除了腐败,还有效率低下。形式上的私有化造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一旦集体农场分割为小块地皮,它们就不能再用拖拉机耕种,而恢复到手工耕种的形式。

〔17〕 据估计,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1993年,乌克兰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5371%之高。

明,尤其是农民坚信他们的日子在苏维埃时期更好些。他们也许是对的,不光因为他们是农民。在革命前的80年代末,东欧人非常喜欢看电影。到1997年,拉脱维亚人看电影的比例下降了90%。到处的情况都如此——保加利亚下降了93%,罗马尼亚下降了94%,俄罗斯下降了96%。有意思的是,同期波兰只下降了77%,捷克共和国只下降了71%,匈牙利只下降了51%。斯洛文尼亚几乎没有下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富裕程度和看电影的直接关系,证实了一项保加利亚对当地电影院上座率下降调查得出的解释:自从共产主义衰落以来,有更多的好电影可以选择……然而人们不再买得起电影票。 692

在此情况下,东欧艰难的、不彻底的经济转型促成了约翰逊的观察评论,即认为尽管经济转型没完成好,能看到他们在努力实现转型,就已经够让人吃惊了。同样适用于这个评论的是向民主过渡的进程。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例外,在维也纳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前共产主义社会有任何关于真正的政治自由的记忆,各国的许多批评家都对未来实行多元政治的可能表示悲观。如果资本主义没有法律限制,直接堕落成偷窃行为,那么,如果没有公认的、能被理解的公众言辞和政治竞争的界限——恐怕民主将冒着沦为竞争性煽情的风险。

这种恐惧不是没有缘由的。通过将权力、信息、主动性和责任集中在政党国家手中,共产主义造成了一个不仅个人互相猜忌、对任何官方声明或承诺将信将疑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缺乏个人或集体主动意识,缺乏任何可供做出知情的公众选择的基础。在后苏维埃国家中,最重要的新闻导向来自提供确凿信息的报纸——莫斯科的《事实与争鸣》,基辅的《事实》,这绝非偶然。

年纪大一些的人对转换到一个开放社会是最难应付的。年轻一代有获得信息的较好渠道——从外国电视广播、或越来越多地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但尽管这使这些国家的许多年轻选民越来越有国际化,甚至越来越老于世故,这也使他们和父母或祖父母之间有了分歧。在国家独立10年后对年轻斯洛伐克人的调查,证明了年轻人和长辈之间分明的鸿沟。年轻人对1989年前发生的往事知之甚少,也概无联系;相反,他们抱怨在“后共产主义”的斯洛伐克的美丽新世界里,他们的父母飘忽不定,而且十分无助: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既不能提供帮助,也不能提供建议。

代沟在任何地方都会造成政治后果,事实证明,凡是年纪大一些或者比较穷困的选民,往往都容易被对新的自由共识提供怀旧的、或是极端民族主义选择的政党打动。可以预料的是,这个问题在前苏联的某些地方最为糟糕,那里分裂和混乱的状态最严重,民主是闻所未闻的东西。由于贫困潦倒,缺乏安全感,痛恨一小撮招摇的新贵富豪,俄罗斯和乌克兰上了年纪的——还有没那么上年纪的——选民们尤其容易受独裁政治家的吸引。因此,尽管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里很容易创建模范宪法和民主政党,但要锻造一个有甄

别力的选民群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各处的初期选举倾向于自由派或中间偏右的联盟,因为他们作为中间人促成了旧政体的倒台;但经济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失望情绪带来的反
693 冲力往往对前共产党人有利,现在他们以民族主义者的面貌重新出现。

旧日的政要显贵的转型不像外界的观察者眼里那么古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比起它们其中任何一个与民主的共同之处要多:可以说,二者有共同的政治“句法”——而自由主义则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姑且不论其他,苏维埃共产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者有一个公敌——资本主义,或“西方”——而他们的继承人会擅长操控广为人知、令人羡慕的人人平等主义(“至少在过去那时我们人人都很穷苦”),进而将“后共产主义”的悲哀归罪于外来干涉。

于是,像科尔内留·瓦迪姆·图多尔的崛起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此人是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手下有名的擅长溜须拍马的文人,早在从民族共产主义转型到极端民族主义之前,他就致力于撰写对“近卫团”的荣光歌功颂德的赞美诗。1991年,在移民们的金钱支持下,他创立了“大罗马尼亚党”,其政治纲领包括了民族主义怀旧情绪,攻击匈牙利少数民族,还有得到公开支持的反犹太主义。在2000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三分之一罗马尼亚选民选择支持图多尔,票数超过唯一的另一位候选人、前共产党官员伊昂·伊利埃斯库。〔18〕

即使当民族主义政客开始成为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者——正如俄罗斯名为“Pamyat”(意为“记忆”)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运动——他们舒舒服服地滑进对苏维埃过去共生互惠的同情中,将一种无法公开表达的民族主义的愤懑之情和对苏维埃遗产和它的丰碑的怀旧之情融合在一起。类似的还有将爱国的漂亮话和对苏维埃式的独裁主义失去的世界表示遗憾结合在一起,这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的新民族主义者受到欢迎的原因——在波兰90年代末兴起的各式农民政党和“民粹派”政党中也有类似人物,著名的有安捷依·莱佩尔的广受支持的“自卫党”。

尽管循环再生的共产党员们到处与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结盟,〔19〕彻底的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在俄罗斯是最强大、最持久的。不足为奇的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一位在不肯改悔的旧式俄罗斯仇外基础上建立个人竞选魅力的、新的火爆公众人物,用他的话说,“俄罗斯人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受屈辱的民族。”不管这句话有多少局限性,苏联

〔18〕 但罗马尼亚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在布加勒斯特1998年市长选举中,罗马尼亚工人党在整个城市中到处张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海报。海报上这样写着:“他们枪杀了我,但你们有没有过得更好?记住我为罗马尼亚人民所做的一切。”

〔19〕 他们甚至有时还和顽固守旧、怀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好时光的法西斯分子结盟——尤其是在克罗地亚。

也曾是世界上的泱泱大国：幅员辽阔，文化璀璨，是俄罗斯帝国合法的继承人和延伸。它的解体对老一辈俄罗斯人来说是奇耻大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痛恨苏联军方，由于北约将俄罗斯“远东”吞并了，而国家无力阻止。重获国际“尊重”的愿望驱动了莫斯科当局许多后苏维埃的外交政策，这既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总统职权的性质使然，也是因为普京可以获得的广泛支持，尽管（或因为）他的国内政策越来越狭隘偏执。 694

出于明显原因，中欧的俄罗斯前帝国的公民并不喜欢这种形式的怀旧。但即使是共产主义失去的世界在东德也有些吸引力，到了90年代中期，那里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旅游、电子媒体和言论自由，生活比1989年前更好。在其他国家，甚至连旧日共产主义时代的媒体节目都引起了某种喜爱之情——2004年，捷克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是《泽曼少校》的重播，这是70年代初的侦探系列节目，它的剧本几乎就是1968年后“正常化”的宣传。

只有在捷克共和国（还有法国和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还公开保留它的名字。但在每一个中欧“后共产主义”国家，大概只找得到五分之一选民支持有同比性的“反某某”的政党：反美，反欧盟，反西方，反私有化……或更常见的是反对上述一切。尤其在巴尔干人中间，“反美主义”或“反欧主义”就是典型的反资本主义的代号，这给不能公开对旧日表达怀念的前共产党员以外衣，但这些人还是一样在他们的公开声明中利用它来做掩饰。

这些抗议的选票，间接地说明不可避免的共识约束了政治主流：这个地区只有唯一的将来，那就是在西方，在欧盟，在全球市场，不管它以什么方式出现。就这些目标而言，相互竞争的各主要政党之间差别很小，他们全部通过批评他们政敌的“失败了的”政策，然后自己又接着实施一个惊人相似的计划。中欧和东欧的结果都是一种新的公共政策的“生硬”语言——“民主”，“市场”，“预算赤字”，“增长”，“竞争”——对许多公民而言，这些概念都没有意义，也无关紧要。

想要表达抗议或痛苦的选民就这样被拖向边缘。90年代初，观察者们在“后共产主义”欧洲见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边缘政党及其擅长煽动情绪的领导人的崛起，认为他们是反民主的危险的力量，是一个落后的、被时间扭曲和束缚了半个世纪的地区里的倒退现象。然而在最近几年，奥地利的尤尔格·海德尔、法国的让-玛丽·勒庞，还有和他们非常接近的从挪威到瑞士的领导人的成功，已经倾向于稀释西欧评论俨然以恩人自居的语气。复旧现象是不管边界的。

政治民主的成功，在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奋力使之实现的知识分子看来，它的结果是模糊不清的。其中某些人（像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一直通过新闻界保持有影响的话语。另外一些人（像匈牙利的雅诺斯·基斯）从原本知识分子出身转向议会政治（基斯 695

是作为自由民主党的领袖),最后还是公众的视线中度过喧嚣的几年后,回到了学术生活。但大多数早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并没有成功变身为“后共产主义”政治家或公众人物,除了做过渡性质的有名无实的领导,还有许多人努力过,但也令人悲哀地证明是不合适的。瓦克拉夫·哈维尔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即使是他,也不是特别成功。

正如埃德蒙·伯克很不屑地评论早一代的革命者:“他们中间最好的也只是纸上谈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未来几十年混乱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全无准备。他们对一般知识分子的公共地位剧烈地下降也一样全无准备。地位下降的原因是阅读习惯的改变,年轻一代离开了传统观点的指引。到了90年代中期,一些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间一度很有影响的期刊已经令人悲哀地边缘化了。

芭芭拉·托鲁尼茨耶克的《文学评论》是在巴黎由68年一代的波兰流放者出版的、广受崇敬的文学期刊,它在1989年前,在维护波兰文化的争论中起了主要作用。现在,在它被解放的祖国的首都成功地创办后,挣扎着保有1万名读者。《新文学》是历时最久、最有影响的捷克文化周刊,也一样困难重重,到了1994年,发行量不到1.5万份。这些数字如果按比例摊派到人口上,对多数西方国家的文学杂志和期刊的出版商而言,并不是那么不值一提;但在中欧,它们日益边缘化的地位代表着“文化优先”的地位早已严重地不复存在。

这些知识分子的式微,原因之一是他们大受好评的、强调反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他们认为需要建立重视道德的文明社会,来填补个人和国家之间缺乏方向的空间;然而他们的看法被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实务压倒。在短短几年间,中欧的“文明社会”成为一个古旧的观念,只有几个外国社会学家对此感兴趣。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发生了十分相似的情况(参见第3章),战时抵抗力量的道德高调被驱散,首先被战后重建事业、随后被冷战取代。然而,虽然法国和意大利作家在那些年里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这要部分地归功于他们大张旗鼓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的匈牙利和波兰同行就不那么走运了。

那些的确成功地跃入公众民主生活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技术官僚”——律师或经济学家——这些人在1989年之前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默默无闻。到当时为止,他们没做过惊天动地的英雄伟绩,他们现在向芸芸众生的同胞提供了一个更让人放心的模式。瓦茨拉夫·克劳斯于2003年接替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他在总统演讲中很直率地表明了这一点:“我有一点像你们。我过去既不是个共产党员,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既不是某党派的追随者,也不是个道学先生。如果这些人出现在这里,就是在提醒你:你缺乏勇气,你问心有愧。”

这里所指的“问心有愧”,提出的是关于报应这个麻烦的问题——人们在过去共产主

义时代里如果做过什么事,那么他们现在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有的话)。这就证明了,几乎任何一个后共产党政权都会带来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不仅在道德化的知识分子中间,而且在其他人中间都一致认为,在苏维埃时代犯下的政治罪行应该昭告天下,而罪人应该被惩罚。除非关于共产主义的过去得到公开承认,已是困难重重的、向自由的过渡就会难上加难:旧政权的辩护者们会洗刷罪行,人们就会忘记1989年究竟意义何在。

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执政都超过40年——在波罗的海国家50年,在苏联本身是70年。政党国家对权力实行垄断。它的法律、它的机构、它的警察成为国家中唯一的当权派。回顾过去,谁能说共产党员不是合法的统治者?他们当然被外国政府当作合法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国际法庭或审判庭宣布共产主义是非法政体。那么,怎能因为某人过去遵守共产主义的法律或为共产主义国家工作而惩罚他呢?

何况,最早呼吁对共产主义暴政还以颜色的人当中,一些非常显眼的人自己的出处就让人怀疑——在90年代初混乱的情绪中,反共和某种对被共产主义者们取代的政体的怀旧混杂交织。要将对共产主义的谴责与它之前的法西斯统治者分开来,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有理智的人承认,应该区别对待斯大林时代:要惩罚50年代那些参与政变、(为宣传目的而举行的对政治反对派等的)公审(通常判决已在审讯前决定)和迫害的人为时已晚,而且他们的很多受害者已经去世了。

人们觉得这样的事最好留给历史学家,他们可以翻阅档案,可以出于后代的利益而考虑把事情处理好。然而,关于后斯大林的几十年,已有广泛共识:对最惊人的罪行和罪犯应有一些公开反思,例如:共谋推翻“布拉格之春”的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对刺杀波比鲁兹科神父负有责任的波兰警察(参见第19章);下令射杀任何企图翻越柏林墙之人的东德当局,等等。

但是仍然有两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处理前共产党党员和警官?如果他们没受到明确指控,他们应为自己过去的行动遭受任何惩罚吗?应该允许他们作为警察、政治家、甚至总理参与公众活动么?为什么 not 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毕竟积极参与了推翻自己政权的活动。但如果不允许他们参与,如果要对这些人的公民权或政治权利加以限制,那么限制的有效期是多长?所应牵涉到的政要显贵应该包括哪些人?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和在战后占领德国的、想要实施“去纳粹化”计划的盟军所面临的问题相比——除了一点不同:1989年后,做决定的不是占领军,而是直接相关的各方。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在某些方面更加复杂,仅仅随着时间流逝而出现。共产党政权不仅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不情愿接受领导的公民;他们还鼓励人们加入对自己的压迫——通过同安全机关合作,报告自己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和其他有关系的

人的活动和想法。这种地下特工和线人网络的规模,各国之间互不相同,但它到处都有。

结果是整个社会都被怀疑——谁在某个时间不会为警方或政府工作,哪怕在不经意间?出于同样原因,很难区分仅仅由于懦弱、或甚至是保护自己家人的目的,做出贪图金钱或别的利益而同警方或政府合作的事。如果拒绝向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报告的话,要付出的代价也许是你孩子的将来。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灰色面纱就这样落在很多孤立无助的个人的私人选择上。〔20〕回头看,谁——除了几个英勇的、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外——能够安然通过评判?而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是在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之间,许多人——其中有名的有亚当·米奇尼克——最积极地反对以任何方式惩罚他们的同胞。

尽管这些困难在每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里都很普遍,但是每个国家都有各自处理的方式。在没有真正转变的国家——共产党人及其朋友仍然当权,只不过换了新名称,而且有了新近洗过(像洗钱一样)的“西方化”日程——过去尘封如故。在俄罗斯,正如在乌克兰、摩尔多瓦、南斯拉夫的剩余部分,惩罚的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提出过,旧政权的高级官员静悄悄地又官复原职: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统治下,共产主义时代的“强力部门”(包括检察官,警察,军队或安全部人员)占据了超过半数的总统非正式内阁。

另一方面,在德国发现的国家安全部门的规模和范围令举国震惊。除了 8.5 万名全职人员外,全国还有大约 6 万名“非正式合作者”,11 万名固定线人,还有超过 50 万的“兼
598 职”线人,许多人甚至无从知道自己被归入这一类人。〔21〕丈夫监视妻子,教授告发学生,教士检举教徒。前东德有 600 万份居民档案,占人口三分之一。整个社会实际上被渗透,被分裂,被污染,这些都是它自己任命的保卫者惹的祸。

为了使互相恐惧、互相猜忌的沸腾情绪缓和,1991 年 12 月,联邦政府任命由前路德教会教士约阿西姆·高克领导下的委员会监管政党的档案,防止对其滥用。个人可以确认他们是否有这么一个“档案”,然后,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过来阅读这个档案。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有时是带来了破坏性的家庭后果——是谁告发了他们;但这材料并不是对全部公众开放的。这是一种笨拙的妥协,但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非常成功:截至 1996 年,一共有 114.5 万民众申请阅读他们的档案。覆水难收,没有办法复原人类造成的破坏,但由于信任高克委员会不会滥用职权,它控制的信息几乎从来没有被用来提升政治优势。

正是由于担心利用这样的信息,在东欧其他地方禁止了类似的程序。在波兰,使政敌蒙羞的常用做法就是指责他们过去(和旧政权)的合作——在 2000 年,甚至是列赫·瓦

〔20〕 尽管这个面纱没有落在某些为自己服务的著名作家身上——他们如果拒绝提供服务的话。比如:克里斯蒂·沃尔夫,她那些很引以为自豪的文学成就,若从后来发现的她和安全部之间的合作上来看,就显得有点不那么令人欣赏了。

〔21〕 作为比较,1941 年,盖世太保人数不到 1.5 万名,却管辖了整个大德国。

文萨也被指控和前特务机关合作,尽管这个指控从来没有生效。一位“后共产主义”的内政部长甚至威胁要将他所有和前政体合作过、而因此褪去光环的政敌名单全部公之于众;正是由于担忧出现如此的行为,米奇尼克等人倾向于将共产主义的过去一笔勾销,向前看。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米奇尼克在2001年甚至反对审讯前共产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当时78岁)。时间回到70年代,那时这位总统下令向罢工的工人开枪。1989年,最近记忆中的军事法及其余波,使旧事重提并评估罪责显得不明智;到了可以安全地这么做的时候,机会已经溜走,大众的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于是,迟到的、回顾性的伸张正义看起来更像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拉脱维亚规定,任何和克格勃有瓜葛记录的人将被禁止从事公职长达10年之久。从1994年开始,拉脱维亚公民重获自由,他们学习德国的榜样,可以阅读自己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档案;但内容只有在一个人寻求司法职位时才公之于众。在保加利亚,新政府学习维希政府之后的法国,建立法庭,拥有权威,对那些做下和前政府相关的坏事的人施以“公民权降级”的处罚。

在匈牙利,共产党在交出权力的过渡阶段的和善作用,使人觉得很难清算或惩处它早先的罪行——尤其因为在卡达尔之后的匈牙利,争论的主要焦点当然是1956年,一个对 699
大多数人很快就成为古老历史的时期。在邻近的罗马尼亚,那里最近真的有很多理由要实行报复,要建立一个当地版的高克委员会的努力,几年来一直遭到失败,因为受到“后共产主义”政治精英的坚决反对:他们中间的那些知情人(从总统伊利埃斯库开始)肯定会被任何与齐奥塞斯库政权活动有关的严肃盘问牵连其中。最后,一所“国家‘安全’档案研究学院”创立,但它永远比不上德国原创的权威性。

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解决和共产主义的过去达成妥协的问题能使人人都满意,或达到完全的公平。但在捷克斯洛伐克,采用的解决方式引发了超越国界的争议。在这里,斯大林主义比别的地方来得迟,持续得也更长久些,而对“正常化”的丑恶记忆还很鲜活。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在捷克地区也比别的东欧地区更加扎实。最后,举国对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1948年和1968年后一系列抵抗暴政的明显失败感到不舒服。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整个国家——在它最不妥协的国内批评家看来——问心有愧。瓦茨拉夫·克劳斯知道他自己说的是什么。

1990年制订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项“后共产主义”立法旨在抚慰1948至1989年之间被非法审判的每个人的法律,最后付出1亿欧元作为补偿——几乎没有引发争议。但紧接而来的是一部“清洗”〔22〕法(1996年该法重新获得5年有效期,并且在21世纪初

〔22〕这个词源于捷克语 *lustrace*,意思是“带向光明”,尽管英文译语也带有“清洗”的内涵。

到期时,再度获得有效时间),它的目的是审查一切公务官员和即将成为公务官员的人,看他们是否与旧制度的安全机构有关。但是,这个貌似有理的目标造成广泛的滥用机会。后来得知,许多在旧时秘密警察线人名单上的名字只不过是“候选人”罢了:旧政权想要强迫就范的男男女女。它们包括几个最有名的捷克作家,有些人甚至并不住在国内。

秘密警察的名单很快进入报界,由政客们和议员候选人发布,并且借此大做文章,希望借此羞辱他们的政敌。在这场诽谤政敌的硝烟中,甚至哈维尔也被指为一度要被警方搜罗到间谍网中的候选人。然而,正如某些评论家警告的那样,这份警方秘密名单虽然极大扩展了他们想要招募的人员的数据,但却对那些从事征召工作的警员的身份几乎保持
700 缄默。在每日出版的《人民报》上刊登的一幅卡通,描绘了两个男人在布拉格议会大厦前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不担心遭到清算,我不是告密者,我只是指挥员。”〔23〕

清算并不是刑事诉讼程序,但是也确实给它的许多受害者带来尴尬,他们被不公正地“点名和羞辱”。更严重的是,也许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种公开使用的政治工具。它也造成了旧的“公民论坛”联盟的分裂——长期坚持立场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哈维尔)反对新法律,而克劳斯则热情地支持这个法律,认为这是一种“澄清谁的立场是什么”的方法(而且让以前批评他的人——有些是改革派共产党员——感到难堪)。值得关注的是斯洛伐克的弗拉基米尔·麦恰尔同样反对关于“清算”的法律,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被广为流传的谣言说成是同前秘密警察有瓜葛——尽管从前他为了将自己的国家引向独立,曾经充分利用警方档案的信息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相对地说来,《清算法》在生效的头12年里基本上没有造成直接破坏。这项法律运用于申请证明自己清白的30万人:其中大约9000人没有通过,这个数字和1968年后50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失去工作或被从党内清算出去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这项立法更持久的影响是它遗留的苦涩滋味,它普遍地造成了捷克社会对“天鹅绒革命”如此结束的方式的愤世嫉俗情绪。看来,捷克共和国中的“清算”与其说是关于如何诚实地对待逐渐淡出的过去,还不如说是关于如何使逐渐登堂入室的精英合法化。

1993年7月,捷克议会采纳了《关于共产党政权的非法性以及反共产党政权的法案》,事实上宣布共产党为犯罪组织。这样就从理论上把千百万前共产党成员变成了犯人,但是它的实际影响是纯理论上的,并未采取实质行动。这项法案并不是要羞辱共产主义,并使推翻共产党的行为合法化,而只是用来将一种超然的怀疑强加给民众。在这项法案通过的10年后,民意测验显示五分之一选民拥护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完全合法的)共产党,这个党一直是国内最大的政党,党员有16万名。

〔23〕 感谢雅克·拉普尼克博士提供这条资料。

第 22 章

旧欧洲—新欧洲

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欧洲在自己的舞台上似乎很难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701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假如重新开始,我会从文化入手。

——让·莫内

用爱把很多人凝聚在一起总是可能的,只要仍然有人接受他们的
各种咄咄逼人的表现形式。

——西格蒙·弗洛伊德

绝大多数人的相对富裕和 11% 的永久性人口失业率,该如何解释
这种奇怪的组合现象呢?

——比阿特丽斯·韦布,1925 年

90 年代的政治分裂情绪不仅限于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国家同样具有摆脱中央统治的强烈要求——或者说是为了摆脱承担偏远省份贫困人口的责任。从西班牙到英国,西欧已确立的各国领土遭受大范围的行政分权,虽然这些区域在表面上仍然维持民族国家的形式。

我们在第 16 章里看到,西欧某些地区的离心倾向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浮出水面。加泰

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一直要求自治,西班牙在新宪法中已经给予承认。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就已经成为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语言、公共机构和统治机构。1983 年颁布的《语言标准化法》使加泰罗尼亚语迅速成为具“支配地位的授课语言”;10 年后,加泰罗尼亚议会规定幼稚园和学前班内只允许使用加泰罗尼亚语。所以毫不奇怪,即使卡斯蒂亚西班牙语仍然在各地使用,很多年轻人还是习惯于说自己的加泰罗尼亚语。

02 西班牙其他地区都未达到民族独立的程度;但若是按实力,其他地区的确也望尘莫及。1993 年,作为西班牙 7 个行政区域之一的加泰罗尼亚,其国民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五分之一。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外资直奔加泰罗尼亚,大部分又投资在其富庶的省会城市巴塞罗那;该省的人均收入高出国内平均水平 20%。如果加泰罗尼亚获得独立,毫无疑问它将迈入欧洲大陆富庶国之列。

导致加泰罗尼亚人萌生独立意识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反感对国家财政部的巨额资助。这项资助主要是指 1985 年西班牙政府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地区性补偿基金。但是和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省、纳瓦拉省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自治省一样,加泰罗尼亚也同样从“西班牙”这个大整体概念中受益。佛朗哥对传统意义上民族名义的利用已经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无论是帝国的光辉、军队的荣耀、还是西班牙国教),等他一下台,很多西班牙人对传统和天赋权力等豪言壮语已经没有兴趣了。

事实上,和前几代“后独裁时期”的德国人一样,西班牙人是严厉禁止“谈论民族”的。另一方面,地区性或是省份的定位没有受到极权组织的玷污和否定:相反,地区性身份曾经是旧政权最钟爱的目标,它被认为是向民主过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巴斯克这个例子中,自治、分裂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差别就不是很明显,巴斯克的“埃塔”组织由此走上一条危险之路(他们甚至还策划了 1995 年刺杀国王和首相的行动)。此外,600 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时,巴斯克地区的老工业区却日渐衰弱。巴斯克地区普遍存在失业问题,收入水平比加泰罗尼亚地区低,只在国家平均水平上下波动。

如果巴斯克民族主义者没能利用上述条件,那么多半是由于该地区 200 万居民中有很多新居民(到 1998 年,只有四分之一的居民会说巴斯克本地语)。所以居民们对分裂活动毫无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 18% 的巴斯克人支持独立,更多人选择已受法律保护的地区性自治。即使是在巴斯克民族党内部,大部分成员也持相同看法,选择地区自治。对于“埃里·巴塔苏纳党”这个“埃塔”组织的政治分支而言,试图缓和自治论者和主流西班牙政党之间矛盾的做法正使该政党失去选民。到本世纪末,埃塔已经成为包括对政府当局不满的绿党人士、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全球化论者的多元在野党。

如果说,推动西班牙单一民族分裂的是对过去的记忆,那么在意大利,分裂更多是由

对现状不满引起的。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意大利持不同政见的地区位于北部偏远地方:该地区的人们对自己被迫接受意大利人这个身份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往往因为战争原因,而非自愿认可意大利人身份)。和意大利语相比,当地人更喜欢说法语、德语或者斯洛文尼亚语。所幸的是,一系列新的自治区协议的颁布使这些地区的不满情绪得到缓和:瓦莱达奥斯塔自治区位于阿尔卑斯西北部的意大利、法国和瑞典的交界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自治区位于邻近奥地利的蒂罗尔地区;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区则在种族模糊的南斯拉夫(之后成为斯洛文尼亚)边界地区。这些地区(正如我们在上阿迪杰地区这个例子中看到的)也从来自欧盟布鲁塞尔的地区性补助和其他帮助中获益。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阿尔卑斯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意大利北部边境地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政治视线:它们成为这个区域化大陆里的区域性地区。

但是,取而代之的地区分裂主义却更具威胁性。1970 年之后,按照战后宪法的规定,意大利在原有 5 个自治省(3 个边境地区、撒丁岛、西西里)的基础上被细分为 15 个区。这样做,当然有充分的先例:比如皮埃蒙特区、翁布里亚地区或者艾米利亚,这些地区都和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一样,因为历史特殊性而产生强烈的独立愿望,虽然几十年前这些地区非常明显的语言差异已经慢慢减弱,但是这样的差异性并没有完全消失。

与西班牙相比,意大利的新自治区大部分只是行政上的虚构单元。虽然这些地区吹捧自己选出来的议会和领导人,并且招募了很多官员,但是这些地区单位既不能克服他们的意大利人身份,也无法与中央政府切断政治上、首先是财政上的联系。不过这些自治区的存在,倒是提醒意大利人:富庶的北部与靠救济的南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和持续的差别,同时也为南北部地区之间的仇恨提供了一种政治上的解释。

这种结果至少在意大利导致一些新情况的出现:富裕地区出现分裂主义。几十年来,意大利北部地区(特别是皮埃蒙特区和伦巴第区的工业化城镇、博洛尼亚省及其腹地的富裕农场和小型企业)明显比意大利其他地区富裕,与别的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米兰周边的伦巴第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是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132%;而位于意大利“靴子”地形的“脚尖”部位的卡拉布里亚区,其人均生产总值是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56%。80 年代梅索兹阿诺的贫穷率是意大利北部的 3 倍。一方面,意大利北部和中北部在富裕程度和公益设施方面已经可以和法国或者英国相比,另一方面,意大利南部地区远远落在后面,巨大的差距只好部分地通过巨额财政汇款来弥补。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伦巴第联盟(之后改称“北方联盟”)开始崛起。它正是利用了人们认为意大利“南部地区”依靠北部财富占了太多便宜的共识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根据北方联盟党创始人和主席翁贝托·博西的意见,解决方式是剥夺罗

马的财政权力,将北方地区从其余地区中分离开来,最终保证伦巴第及其周边地区的独立,同时让那些贫穷的“寄生”地区自食其力。这与加泰罗尼亚(或者斯洛文尼亚,或者是瓦茨拉夫·克劳斯领导下的捷克共和国)何其相似。

在 90 年代的大选中,北方联盟在伦巴第区和威尼托区获得了足够多的选票,使其能在保守的政府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联盟党在政府中的席位靠的是与西里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以及前法西斯主义者詹弗兰科·菲尼的国家联盟党的联合获得的。这两个政党(尤其是后者)主要依靠受政府资助的贫穷的意大利南部人民,而这些人正是北方联盟党非常鄙视的。虽然两党相互敌视,联盟党领导人博西的支持者们仍心存幻想,但是意大利不存在严重的分裂问题,也没有哪个省会独立。

法国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在密特朗担任总统期间,实行了有限的非中央化治理,并且漫不经心地着手将某些机构和资源分给各省。在法国新建立的各个地区单位中,不光是阿尔萨斯或者法国的巴斯克各地区有兴趣切断它们同巴黎的联系,而不管它们之间的历史同一性。只有科西嘉岛基于真正意义的语言独特性和历史独特性而掀起了一场民族脱离运动,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科西嘉岛只要独立与大陆,就能繁荣。但是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对暴力(和解决家族之间的宿怨)感兴趣,就像“埃塔”组织一样,所以始终只限于吸引少数人。

法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当其他欧洲国家都在大肆谈论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优点时,在法国即使是最轻微的骚动,也会在巴黎政治界掀起对新雅各宾派的突然涌现出来的普遍敌视。此外,法国那些特征最为迥异的省份(例如布列塔尼和人口稀少的郎格多克高山地区)几十年来一直是法国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从高速铁路干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内部投资的税收优惠,都来自法国政府。支持布列塔尼和欧克希坦分裂分子的人寥寥无几,这部分支持者大多数是 60 年代那个时代的狂热退潮之后仍然于心不甘的、上了年纪的好斗之士。相反,里昂和格勒诺布尔周围的罗纳-阿尔卑斯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在发展:但是他们关于独立的记忆却尘封已久,并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有政治野心想要恢复这种记忆。

但是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凯尔特人虽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伦敦政府,但是他们仍然希望民族复兴。在威尔士,这种复兴意识体现在文化形式上,威尔士人在教育和媒体方面加强了语言的使用。正如民族主义政党“威尔士民族党”领导人所说的,只有在山区和人口稀少的北威尔士,人们才要求完全独立,实际上也只有在那里,要求独立的呼声才找得到共鸣。威尔士的南部城市与英格兰有更加便利的交通联系,与全国工会组织、工党、自由党都有完善的政治联系,所以他们对主张建立小国家的威尔士民族独立分子一直

非常地警惕。

所以,虽然威尔士民族党候选人在1974年的全国大选中首次实现突破,并且之后一直存在并保持其微弱地位,但该党从来没能使民族独立的提案获得通过。1979年3月参与投票的一小部分威尔士人中,只有小部分人同意成立地方议会,大部分人投了反对票。当独立的议案在20年后真正在威尔士实施时,当地的民族独立分子并不满意,因为这只是第一届新工党政府托尼·布莱尔的一项行政检查,精明的布莱尔早已胸有成竹,因为他赋予加的夫新威尔士议会的有限权利同样会落入威斯敏斯特的议员手里。

结果,威尔士国民大会虽然拥有大量象征性权力,但是几乎没有实权,它们只是在表面上满足了民族分裂者们对于威尔士公国的需求。毕竟,威尔士从1536年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起就处于英格兰统治之下,而亨利八世本人也是威尔士王室的后裔。在语言和历史方面,威尔士的复兴已经足够,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威尔士全面民族意识的复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威尔士公众生活表面之下的愤怒和仇恨出于经济上的苦恼,而非民族独立的野心。假如有两个选择,一是威尔士独立,二是必须处在英格兰的统治下,但恢复受工业化破坏的矿区、城镇、港口以及解决失业问题,那么很少会有威尔士人犹豫不决。

苏格兰的情况则另当别论,苏格兰同样因为老工业的衰落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成立于70年代的“苏格兰民族党”在当地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比他们的威尔士同行高出4倍。20年之后,苏格兰民族党作为“单一目标”党在1974年的大选中实现了突破——该党在议会中重新获得11个席位——此成绩已超过保守党,并对传统的工党大本营造成严重的压力。和威尔士人不同,苏格兰公民真正赞成权力下放;虽然他们在1997年才真正享受到这种权力,并且无可置疑地在为一个国家说话。如果苏格兰不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在为自己说话,那么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无疑是以一个独特和分离的民族的身份在说话。

苏格兰民族主义从两处受益,一是幸运地发现北海油田和天然气(它为阿伯丁和东北部地区带来财富);二是从欧盟委员会的地区政策中受益,这使苏格兰行政官员和商人能够绕开伦敦,与布鲁塞尔总部建立直接联系。苏格兰虽然在1707年的《统一法》中加入了英国,但是它一直是一片离群索居之地。语言或者宗教上的特殊性导致的自我意识已经变得淡薄和模糊,虽然两者仍然存在,但是对于大部分苏格兰人来说,自我意识更多地来自优越感和怨怒的奇怪结合。 706

很多现代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出自爱尔兰人之手,一些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来自同样使用英语的苏格兰人,从大卫·休谟到亚当·斯密,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到后来的一些名人,其实都是苏格兰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仅爱丁堡是英国早期工业化时代的知识中心,格拉斯哥是20世纪早期英国工党运动的激进中

心;而且苏格兰的商人、经理和移民都担负着建设、安居和管理苏格兰的任务。此外,苏格兰一直坚称并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即使在伦敦的集权统治下,它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教育和法律系统。

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苏格兰似乎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建议,特别是在欧盟这个大集体中,苏格兰绝对不会是最小、最贫穷的民族国家。当然,是否大部分苏格兰人在确保形式上以及某些方面的实质性独立后还希望走得更远,不得而知。地理、人口和资源方面的限制都使得苏格兰仍然依赖英格兰;所以到 90 年代末,似乎有理由相信苏格兰和其他一些地区一样,它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引擎会很快失去动力。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穿越爱尔兰的苏格兰移民的后代是否属实,那就说不清楚了。虽然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仅仅隔着 50 英里不到的海峡,但是两个民族在意识和感受上仍然存在鸿沟。苏格兰民族主义首先来自抵抗和排斥英格兰人的那种欲望,而北爱尔兰新教的民族爱国精神则来自强烈留在“联盟”内部的决心。爱尔兰“问题”的悲剧在于双方极端分子的截然不同的、但事实上却是相同的目标: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希望将不列颠当局从北爱尔兰赶出去,同时联合独立的省份,即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而新教统一党成员以及他们的准军事志愿者则将目标定在压制“天主教徒”并且继续保持与伦敦历时 300 年之久的联系。(参见第 14 章)

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临时共和军和统一党能够最终达成妥协,这不是由于双方阵营中的极端主义者不够有决心,而是双方都受到压力。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大屠杀中,外国势力纷纷介入,所以,看来似乎无休无止的北爱尔兰暴行和反暴行,不仅使当地的人们失去对号称是他们的代表的军事武装力量的同情,而且迫使伦敦、都柏林、华盛顿都以'07 比以前所能召集的更多力量,介入和迫使双方至少能达成暂时的停战协议。

但是,1998 年 4 月签订的《耶稣受难日协议》是否能解决爱尔兰民族问题,仍然不是很明朗。双方勉强签订的停战协议在很多方面都没有解决问题。这个协议是在多方努力下达成的——爱尔兰和英国的两国首相以及克林顿总统的努力;爱尔兰自治政府议会对当地天主教少数派的担保;结束新教秘密机构和其他组织的活动;双方建立自信的措施以及长期的政府间会议,用以监督这些措施的实行。所有可以想到的措施都在实施,多方力量的善意举措早在 20 年前就开始了。但是作为爱尔兰百年战争的停战协议似乎支撑不了多久。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领导起义的年长激进分子似乎很有可能执政。

此外,爱尔兰共和国自身在 90 年代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所以现在和“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形象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充满活力的都柏林已经扮演了新的角色,在繁荣的欧洲融入“后民族”的多元文化,率先实行低税收政策,伦敦开始将临时

爱尔兰共和军的分裂主义观点和“奥兰基教会”的帝国时代统一梦想看作同一类东西——另一个时代的怪异遗物。

对于熟悉西欧大国早期历史的人而言,在西欧的大国里实施“准民族特殊论”的新政治,似乎是对上一个世纪的中央集权模式的颠覆。即使在与众不同的现代欧洲,这一模式的例外之处还是证实了以下规则:德国作为苏联的最大的欧洲西邻,其分裂势力并未苏醒。这不是因为其历史特殊性,而是因为纳粹德国战后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了。

无论德国是直接模仿古代国家(例如巴伐利亚),还是将曾经独立的公国和共和国重新组成地域联合(例如巴登-符腾堡,或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现代德国的国土在很多方面都实行相当程度的财政和行政自治,直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如教育,文化,环境,旅游和当地公共电台和电视台。在有限范围内,以地区身份为特点的政治对德国人也许比较有吸引力(德国历史的特殊性也许的确起到抑制作用),所以地区发挥了代理作用。

事实上,民族分裂主义最集中的政治形式并没有出现在西欧最大的国家,而是出现在欧洲最小国家比利时。它的国土面积与威尔士差不多,人口密度只超过邻国荷兰,但是这个西欧国家的党派林立状况却能与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发展状况相比。比利时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晚期分裂主义浪潮消退后,西欧的民族国家仍然完好无损。 708

到20世纪90年代,瓦龙尼亚的城镇和其他区域都陷入后工业时代的经济衰退中。采煤、炼钢、石板制造、冶金业、纺织生产这些传统的比利时工业财富的摇篮实际上已经消失:比利时的煤产量从1961年的每年2100万吨下降到1998年的年产量少于200万吨。欧洲曾经利润最高的工业区,只剩下位于列日省北部默兹河流域的旧煤矿区,此外还有在蒙斯和沙勒罗瓦的一些设备落后陈旧的煤矿。该地区先前大部分的采煤工、炼钢工和他们的家庭,现在都靠双语首都的政府福利制度、由就业收入较高的北方人的税收来支付(在佛兰德民族分裂分子看来是如此)。

佛兰德经济繁荣。1947年,佛兰德有20%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但是50年之后,操荷兰语的佛兰德人中,靠土地为生的占总人口的3%不到。从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间,佛兰德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5.3%;即使是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的经济低谷,佛兰德的经济仍在继续发展,其速度是瓦龙尼亚的两倍。由于没有老工业和工人失业问题的羁绊,像安特卫普和根特这样的省份随着服务业、科技和商业的发展而实现了经济繁荣,它们的发展还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即位于从米兰到北海的“金色香蕉”地带。在比利时,说荷兰语的人比说法语的人多(比例为三分之二),前者比后者的人均收入高。与南部地区相比,北部地区更具优越性,占绝对支配地位——这种变化导致北方佛兰德人强烈要求与其新的经济实力相符的政治地位。



2005年的比利时

简言之,比利时具有欧洲一切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运动的构成要素:古老的地域区分〔1〕,同样是历史悠久、而且似乎无法克服的语言鸿沟(虽然很多说荷兰语的居民至少会一点法语,但是大部分瓦龙尼亚人不说荷兰语),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又使情况加剧。更为复杂的是:在比利时短暂的历史中,生活在贫穷的居住区的佛兰德农民一直受到实现工业化的、说法语的瓦龙尼亚城市同胞们的控制。佛兰德斯民族主义一直是在多方面的因素下形成的——对强制使用法语的憎恨,说法语者在权力和影响力上的明显垄断,说法语的上层阶级精英在文化和政治权威等各个层次的霸权。 710

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者在传统上一直将自己视作与之前未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人的角色类似(为此甚至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处于渺茫希望时同占领者合作,希望能从纳粹的版图上求得分裂自治)。但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角色逆转:佛兰德人现在看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不再是贫困的斯洛伐克人的那种形象,而是斯洛文尼亚形象(或者是他们自己更喜欢的称呼——伦巴第):一个落伍的、体制运转不灵的、充满变数的现代化国家。

这两个自我归属的身份认同——受压制的按语言划分的少数民族;受挫折的经济地区——此时都已交织成佛兰德斯的分裂的政治势力,其程度之深,即使旧有的不公正能够一扫而空,并且北方荷兰语省份能赢得盼望已久的、在公共事务中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力,然而记忆中的憎恨和受蔑视也会很容易地变成新的担忧,这种担忧不仅会加剧比利时公共政策争论的激烈程度,还会产生新的仇恨,而那些公共事务本身也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其中在“语言战争”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在 60 年代——当时距离荷兰语正式被官方承认,被允许在佛兰德斯的学校、法庭和当地政府中使用已经整整 50 年,同时从荷兰语成为官方语言开始,也已经过去 40 年了——当时讲荷兰语的学生在位于荷兰语区的佛兰德斯-布拉班德省的勒芬大学反对说法语的教授出现在校园里。学生们喊着“瓦龙人滚出去!”的口号,在学校游行。最后,学生们达到了目的,学校被一分为二,那些说法语的教师只好跑到南部说法语的布拉班德-瓦龙地区,并在那里建立新勒芬大学(不久后,图书馆也被一分为二,其图书馆资源也重新分配,这对双方都不利)。

发生在勒芬大学的戏剧性事件(以及之后在其他地区发生的同一时期学生相互呼应的盲目而狭隘的爱国运动)导致政府下台,并直接导致之后 30 年一系列宪法条款的修改(共计 7 条)。虽然温和的政治家们希望以此能满足分裂主义者的要求,但是比利时的机

〔1〕 朱利乌斯·凯撒曾在高卢罗马地区和弗兰克斯之间设置界线,以此为界将主要说拉丁语和法语的欧洲地区与北部说德语的地区相区分。

构重组在后者看来只是他们实现最终决裂的台阶。最后,双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在解除比利时单一国家体制的问题上却越走越近了。

其结果就是导致拜占庭式的复杂局面。比利时被划分为三个“地区”:佛兰德斯,瓦龙尼亚和“布鲁塞尔-首都”,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议会(除了全国议会以外)。然后是 3 个正式的“社群”机构:荷兰语区、法语区和德语区(德语区大致包括 6.5 万居住在瓦龙尼亚靠近德国边境地区说德语的居民)。这些聚居区同样也有自己的议会机构。

这 3 个地区和语言社区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在瓦龙尼亚也有说德语的居民,在佛兰德斯同样也有一些说法语的小城镇(或者城镇的部分地区是说法语的)。这些地区存在的特权、让步政策和保护措施都成为各方仇恨的源泉。其中的佛兰德斯和瓦龙尼亚这两个地区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况外,实际上只使用一种语言。虽然布鲁塞尔至少有 85% 的人口是说法语的,但是它的官方语言是双语。

除了地区和语言社区之外,比利时又分为 10 个省(佛兰德斯和瓦龙尼亚各 5 个)。这些省份同样行使行政和管理职能。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宪法修正案中,真正的权威越来越多地出现一边倒倾向:或者是倒向地区(比如在城市化、环境、经济、公共建设、交通和对外贸易方面),或者就是倒向语言社群(比如教育、语言、文化和一些社会服务方面)。

由此带来的麻烦颇为滑稽。比如,语言的正确性(也是宪法的)现在要求所有的国家政府机构,无论它们的政治色彩如何,都必须在部长人选上实现荷兰语和法语的平衡,同时,总理必须能使用双语(因此总理人选非常典型地就来自佛兰德斯地区)。在宪法法院人事任命上也同样要求语言上的平等,每年按照不同语种轮流更换任期。在布鲁塞尔首都地区,由 4 名行政官员一起(可以自己选择语言)决定公共大事;但如果是处理佛兰德斯区或者说法语地区的事务,他们会两两分开坐。

由此造成的结果,使比利时不再是一个(甚至也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不平衡的、互相重叠和复制的一个政权。组建比利时政府是困难的:它需要地区内部和地区间的多党协商,需要在民族、地区、语言社群、省份和当地的政党联盟之间实现“平衡”,需要主要的和同等的语言群体在政治和行政层面上实现合作。当政府形成时,它是缺乏主动权的:即使是外交上的权力(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国民政府仅剩的职责之一)实际上也掌握在地区手里,因为对于当代比利时来说,大部分外交即外贸协定,都是掌握在地区手里的特权。

宪法本身的巨大变革和机构改革一样是复杂的政治。佛兰德斯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分裂分子施加压力,想从他们制造的变革的新机会中获取利益。当弗兰芒集团成为战时民主主义激进分子的精神领袖,成为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北部某些荷兰语区的重要

政党时,那些相对比较传统的荷兰语政党为赢得竞争,决定接受分裂立场。

同样,在瓦龙尼亚和布鲁塞尔,操法语的主流政党的政客们采用强硬的“共产主义”路线,以迎合那些憎恨在政治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佛兰德斯人的瓦龙尼亚选民。结果迫使所有的主要政党都按语言和社群两条线划出分水岭:在比利时,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于1968年)、自由党(成立于1972年)和社会党(始于1978年)都带有重复性质,每个党派对应一个语言社群。这种做法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由于政客们都只忙于自己的政党〔2〕,各社群之间的不和状况就加剧了。

比利时为平息语言和地区分裂分子之间的矛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是经济代价。到20世纪末,比利时在西欧的公共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是最高的,这一现象并不偶然,要知道,重复每一种服务、每一笔贷款、每一笔经济补助、签署每一份协议的代价都是非常昂贵的。按比例分配公共财产的惯例(包括欧盟地方资助)现在也应用到语言社群中,原先公共财产只按比例奖励给各种社群里的“骨干”,现在却用于各个语言社群的政界——部长、州长、他们的行政人员、他们的预算,他们有广泛的朋友,但也只有在比利时,每个部分都从属于一种语言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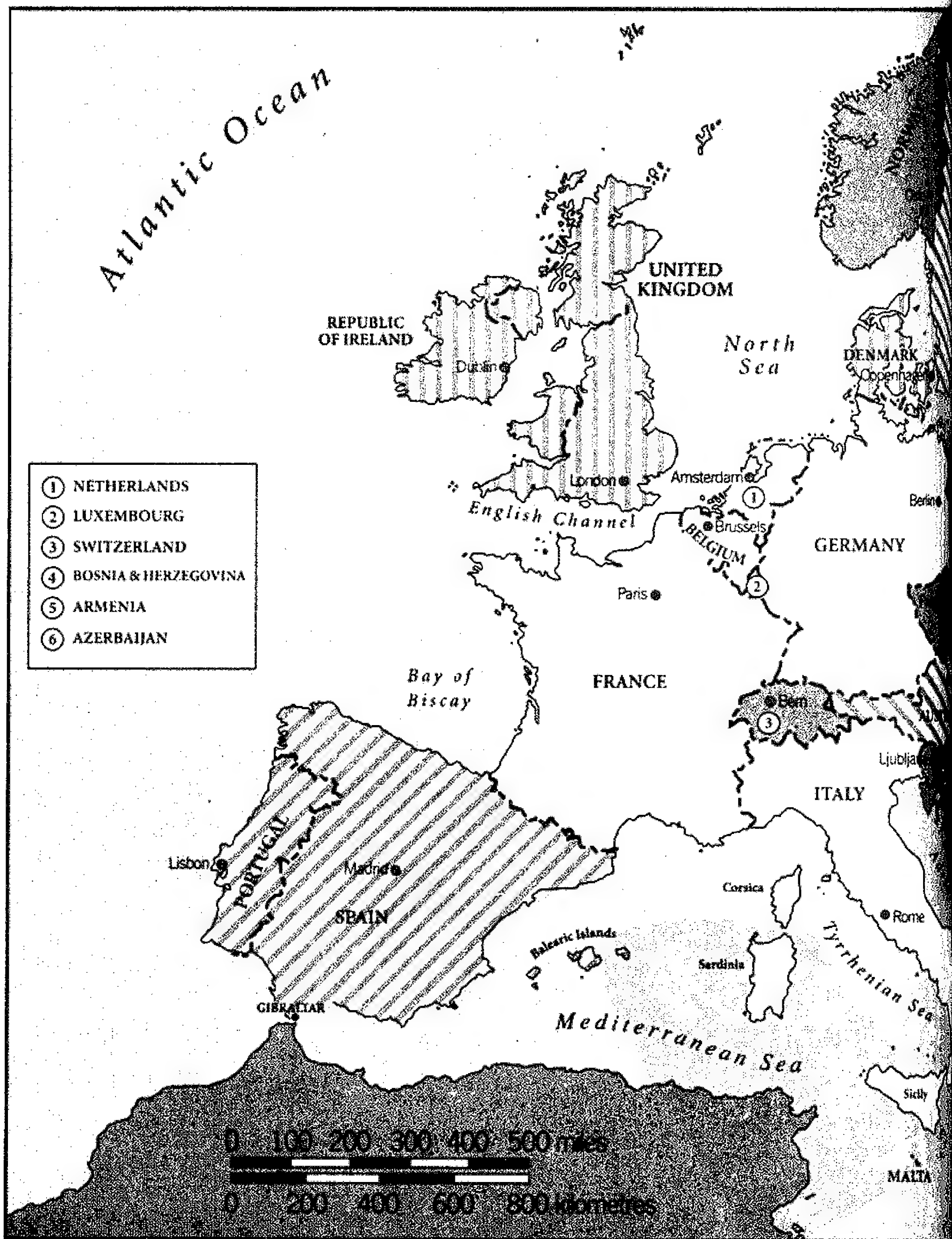
到这个世纪末,“比利时”在外形上已经发生改变。走在乡间路上,旅行者若是没有留意用法语刻着“比利时”一词的不显眼路标,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绝不能错过彩色的标语牌告诉他们所进省份的信息(比如,列日省或者西佛兰德斯省),这与信息栏(用荷兰语或者法语写的,但不是两种语言皆有)上告诉游客在佛兰德斯或者是在瓦龙尼亚的信息一样重要。传统的做法似乎已经颠倒了:比利时的国际边界只是一种形式,但其内部边界的区分确是真实存在、并让人印象深刻的。那为什么比利时没有分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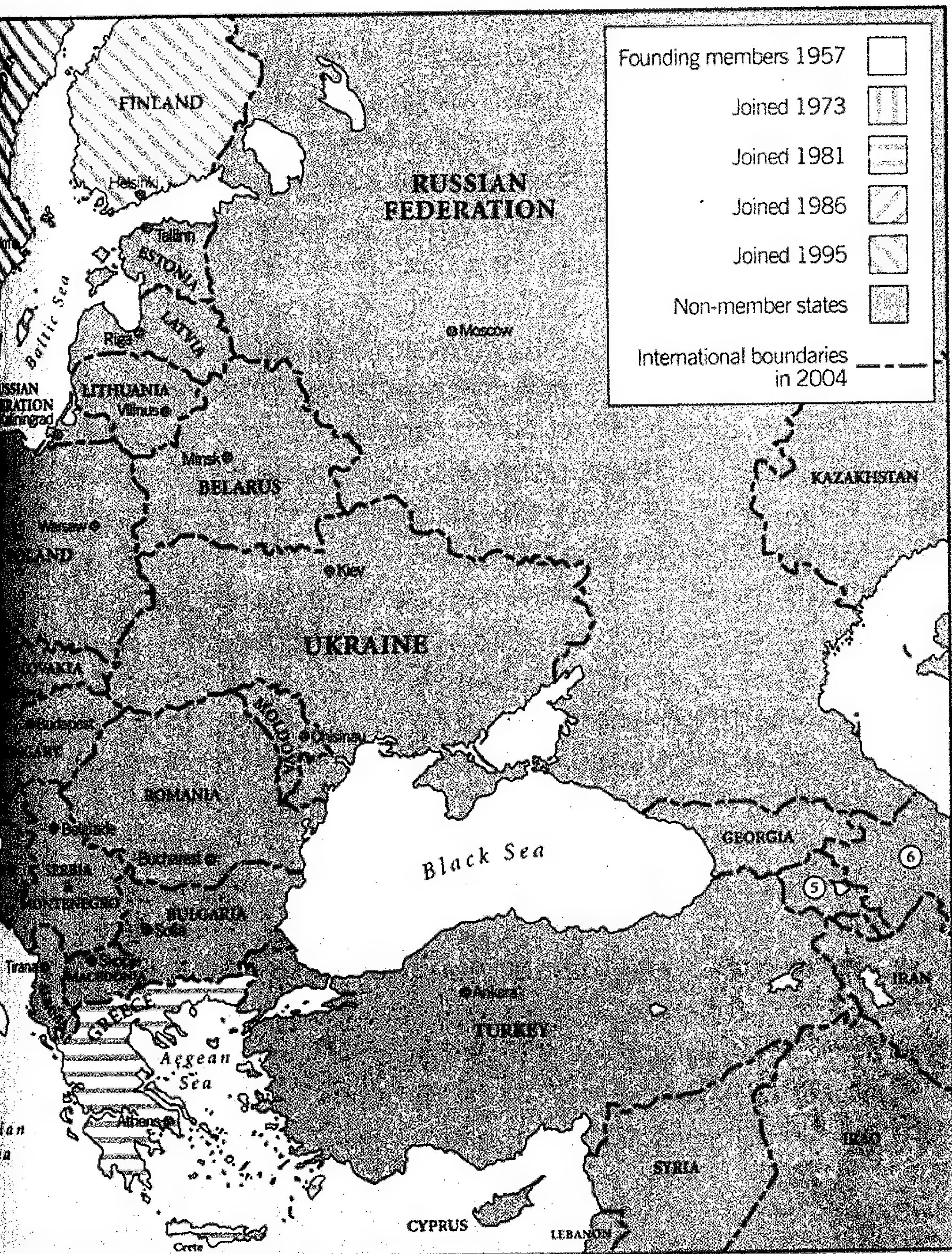
比利时仍然没有分裂的原因有三点,从广义上讲,这三个因素同样适合所有西欧国家坚持统一的解释。首先,随着宪法改革方案的实施,以及几代人时间的流逝,分裂主义者慢慢失去了追求独立的迫切性。老一代共产主义“精英分子”(他们希望建立等级社会和政治网络,用以代替民族国家)已在走下坡路;而比利时的年轻一代不容易受到党派亲密性的感染,即使是老一辈的政治家们,对这样的事实也还需要慢慢接受。 713

常规宗教活动的减少、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使得传统政党影响减弱。很明显对新“比利时人”来说尤其如此:成百上千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从意大利、南斯拉夫、土耳其、摩洛哥或者阿尔及利亚来到比利时。和新巴斯克人一样,这些人对

〔2〕 两大主要报纸《大晚报》和《标准报》分别面向法语区和荷兰语区人群。所以,任何一方都可以轻易地从另一方获得消息,当有人在瓦龙尼亚电视上说荷兰语时(或者相反),电视上就会提供字幕。即使是区间火车,也会在到达地区边界时,在自动信息板上自动切换荷兰语和法语(如果在布鲁塞尔,就会提供两种语言)。所以,说英语是比利时的共同语只是戏谑而已。

From Community to Union: The EU 1957–2003





老掉牙的分裂主义者的议事日程毫无兴趣。9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佛兰德斯,大部分人也不再把地区或者语言的问题放在心上。

其次,比利时很富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可以成功地利用那些并不富裕的国家中人们希望共有财产的想法来从事分裂活动,而比利时比较幸运,人们生活平静安逸,物质条件优越。比利时国泰民安(即使国内不是那么太平,至少可以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梦想有朝一日另外的“佛兰德斯奇迹”创造同样的财富,减少了政治上由于语言问题产生的仇恨。这种结论同样适用加泰罗尼亚甚至苏格兰的一些地区,当地的极端民族独立分子发现,他们的论点会因为异乎寻常的富裕所带来的破坏性力量而慢慢变得毫无说服力。

比利时和其他内部搞分裂的西欧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第三个原因是人口因素,它比经济因素更重要,虽然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佛兰德斯或者苏格兰如果最后还能惬意地留在比利时或者英联邦,不是因为以前出现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民族情绪在这些国家不够强烈,恰恰相反:加泰罗尼亚比其他地区(例如波希米亚)的自治愿望更强烈;佛兰德斯人与瓦龙尼亚人之间的鸿沟远比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甚至比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的鸿沟要深。但是,与它们不同的是,西欧各国不再是靠独揽大权就可以对公民进行统治的、自立自足的民族团体,它们已经而且越来越成为另外一种机构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向完整的欧盟迈进的正式机制由1987年的《欧洲一体化法案》开始启动;但是真正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却是冷战的结束。1992年签署《欧洲一体化法案》的12个成员国在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流动上实现了全面自由流通。不过这还不能算是一项突破,类似目标在几十年前已在原则上得到通过。外部环境的巨变直接导致同一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颁布,它和5年之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都使欧盟成员之间建立了真正新型的机构和财政框架。

- 15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吸引公众注意的一项条约是建立欧洲的单一货币。出于德国统一后的顾虑,法国希望通过让德国同意放弃德国马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而将联邦德国紧紧捆绑在“西方世界”,同时还希望通过欧盟网罗密布的各项法律,将一系列的限制扩大到德国的法律、规章以及各种协议之中;而德国则坚持要求欧元必须是德国马克的翻版:和德国马克一样,欧元必须有一个由中央银行家们组成的自治监管会,必须服从德国中央银行的财政政策:低通胀,紧缩银根,赤字最小化。德国欧盟谈判专家们对“地中海俱乐部”成员中具有铺张浪费倾向的国家(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非常谨慎,因此对新货币的成员资格设置苛刻条件,同时要求欧盟委员会对那些缺乏道德观念的政府行

为实行处罚。

在德国政府的要求下,欧洲的财政部长们像出征的奥德修斯一样,团结在欧元这面大旗下:置选民和政治家们关于银根松动和公共开支增加的警告于不顾。但旨在保证新欧元与德国马克一样低通胀的条款,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一些相对贫穷的成员国普遍担心这会影响它们的公共政策,甚至还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为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条件更合乎人意,在那些持反对态度的政府中进行现金奖励:法国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贿赂”了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的财政部长们,允诺如果他们在条约上签字,可以保证在欧盟内部大大增加结构性基金。

同时,英国和丹麦仅仅就条约主体部分签了字,但没有在单一货币的文件上签字,这部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限制;另外的原因则是象征性反应,这些国家在放弃主权、转而进入跨国体制的过程中显得很勉强;英国和以前一样,认为向欧盟迈进就是向欧洲超级大国更进一步,为此英国非常担心〔3〕。

当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辅助条文”上做了很多文章:它对欧盟官员实行“奥卡姆剃刀定律”,指出“欧盟不得采取行动(除非属于垄断性竞争)”,除非此行动比当地、地区或者该国本身采取的行动更有效。但即使是这样的条款,不同国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法国认为,此条款会使超国家的权力摆脱巴黎的控制;对德国而言,该条款可以让地区性政府拥有特权;而英国则认为可以通过该条款阻止机构融合。

716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具有 3 种重大的附带影响。其中之一是未能预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急剧膨胀。在条约的限制性条款下,显而易见(至少是法国的意图),刚摆脱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不可能立即加入该条约(这些国家的法律和金融机构很脆弱,经济仍处于恢复期,很难按照条例在严格的财政制度和其他规章制度下进行操作,而这类规章是欧盟现有各成员国以及新成员必须强制执行的)。

相反,作为一种弥补,布鲁塞尔总部建议波兰、匈牙利和它们的邻国尽早取得北约成员国地位:作为对它们的过渡性奖赏。北约的这种扩张方式具有很多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方式立刻受到新申请国欢迎的原因。当然其实际意义要模糊得多(这不像对莫斯科的关系那样造成真实而直接的伤害)。但是,因为美国支持北大西洋防御共同体的扩张,因此第一批重要的欧洲国家在几年后都正式加入了北约〔4〕。

其次是对欧洲的公共意识产生了影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激起各国对欧盟模棱

〔3〕 这或许会让人想到历史上的事情。拿破仑的副官拉斯卡斯撰写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流放中的拿破仑·波拿巴曾经设想过在未来建立一个“欧洲联盟”:用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宫廷,同一种货币。

〔4〕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在 1999 年加入欧盟,适时(有些勉强地)介入北约的科索沃战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在 2004 年加入欧盟。

两可的工作机制和匿名官僚机构的前所未有的兴趣。虽然这个条约在每个国家都举行全民投票,并获得通过(虽然在法国只有 50.1% 的得票率),但是将国内议事日程置于欧盟框架之下,在一开始仍然激起一片反对声。在过去的 40 年里,新的大陆体系的制度和规则一直在偏僻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几个小城镇静静地制定并签署,既没有征求公众意愿,也缺乏任何民主程序。这种日子现在似乎要结束了。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产生的第三种影响,是它至少在西欧为即将来临的一体化扫清了道路,当然还没有为整个欧洲扫清道路。冷战结束,欧盟通过了建立共同市场的决议,为旧的欧洲自由贸易区〔5〕剩下的成员清除了障碍。瑞典、芬兰、奥地利不再受中立立场的制约(对芬兰而言,原本是为了保持和苏联良好的关系),提出正式申请,它们对被排除在欧洲之外日益感到紧张。

717 由于新提出申请的 3 个国家不仅政局稳定,国土面积狭小(三国人口之和,只有德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并且非常富裕,入盟谈判在 3 个月内便告完成。其余两个申请国挪威和瑞士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与两国商界精英对入盟兴致盎然相比,挪威和瑞士两国公民仍对加入欧盟投了反对票,他们担心在超国家联盟中失去自治权和主动权,同时对于加入欧元区是否能带来益处仍然持怀疑态度。

1994 年,瑞典在是否加入欧盟问题上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表明瑞典人心里存在着相同的疑虑。只有 52.3% 的人投了赞成票,即使是这样的结果,还是建立在瑞典不加入统一货币的前提下实现的(10 年后,当瑞典政府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公投,建议最终放弃克朗、加入欧元时,遭到惨败,与此相类似的是,丹麦政府也曾在 2000 年 9 月举行的公投上提出相同议题,也遭到同样结果)。佩尔·加尔顿——瑞士的绿党领导人、加入欧盟的强烈反对者——指出瑞典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加入欧盟的那天,就是瑞典议会决定将这个独立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超级大国集团内某个省的日子,这个过程即是将瑞典从一个立法机关变成比顾问团稍好一点的机构。”

很多北欧人和加尔顿有同感,包括那些在公投时投赞成票的公民。即使是瑞士,或者是为了不错过共同市场带来的利益而希望加入欧盟的斯堪的纳维亚政治和商界精英们,他们也认识到这样的选择是要付出经济的和政治的代价的:在私下里他们承认,如果决议没有通过,对国家而言不会是个彻底的灾难。在瑞典、挪威,甚至丹麦和英国,加入欧盟(不涉及新的货币一体化议程)只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必需。

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国家,成为“欧洲”成员国却是唯一的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

〔5〕 90 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同样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它促使瑞典形成共识,即没有欧洲共同市场,国家的出口商是无法生存的。

理由——实现经济现代化,还是保障新市场,或是获得外国援助,稳定国内政局,同“西方”欧洲国家捆绑在一起,或者仅仅是为了防止退回到民族共产主义——爱沙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新上台的领导人都在指望着布鲁塞尔。加入欧盟后实现富裕和保障安全的前景,对那些刚获解放的“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领导人是一种诱惑。他们被警告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旧体制优于新体制,千万不能误以为真,而转变的代价是值得的:欧洲就是你的未来〔6〕。

但是从布鲁塞尔的角度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一开始,欧洲计划就是极其分裂的。一方面,它的文化是包容性的,向所有的欧洲民族都开放。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加入欧共体,最终加入欧盟,是任何“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的政府体制”并同意成员国条款的欧洲国家的权利。 718

但是另一方面,欧盟在职能上又是排外的。作为融入“欧洲大家庭”的交换条件,每一项强加于新成员国的新协议和条约都使欧盟的准入条件复杂化;这些规章制度无异于筑起越来越高的篱笆,将那些不能通过测试的国家和人民关在门外。所以《申根条约》的颁布(1985年)对所有申请国的公民而言是个福音,现在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得越过主权国家的界限,申请加入欧盟。但是被《申根条约》排除在外的那些国家的公民就不得不排队等候,实际上的确是在排队,等待获得成员国资格。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下的欧洲是个极其排外的政治区域,它严格实行单一货币,坚持所有成员国融合在统一体制的管理之下,迅速形成欧洲行动惯例的萌芽形式。条约不会阻碍北欧和奥地利等国加入欧盟,但对东欧国家而言是令人敬畏的障碍。让新成员国忠于欧盟的宪章条款才能把它们迎进大本营,这说明欧盟实际上希望将这些国家尽可能拒在门外。

欧盟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即使是申请国中最富裕的国家斯洛文尼亚,或者是捷克共和国,它们也比任何一个欧盟老成员国贫穷,事实上大部分申请国的确都非常贫穷。无论用哪一种方式来衡量,东欧与西欧国家之间都存在巨大差距:1996年,波罗的海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其他欧盟15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匈牙利男性的平均寿命比欧盟成员国的平均寿命少8岁;而拉脱维亚则少11岁。

如果匈牙利、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情况稍好一些,它有3800万居民——以现在的成员国一样的条款加入欧盟,那么欧盟在补贴、地区性援助、基础设施资金和转账等方面肯定会超过预算。1994年12月,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中

〔6〕 见第21章。变革的痛苦极为深刻。1989年之后,东欧国家损失了30%至40%的国家收入。波兰在1997年最先恢复到1989年的经济水平;其他国家则在2000年才恢复,甚至更晚。



鲍里斯·叶利钦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莫斯科,1991年。叶利钦在总统任职期间的丑闻无法掩盖他的成功。他在理解时局和适应时局方面,特别是在俄罗斯帝国苏醒时让民族国家重新屹立方面比戈尔巴乔夫更敏锐。



莫斯科第一个“麦当劳”配送中心,1990年1月1日。西方商品和现金大量涌入“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真空地带。但是缺乏管理的经济很快就被极少数寡头政治集团成员控制,他们很快变得非常富有,这是盗贼统治的资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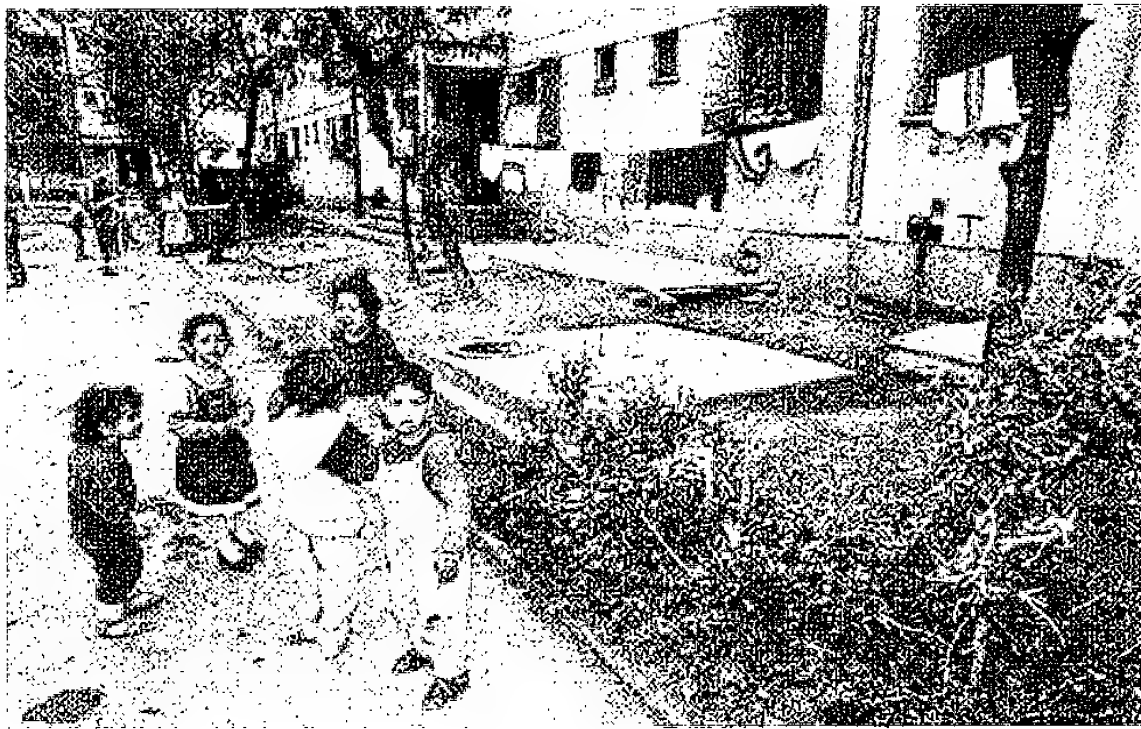
白俄罗斯的明斯克,1999年:
儿童肿瘤医院。在1986年的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中,3
万人死亡,1/4 的白俄罗斯人
受感染。切尔诺贝利事故不
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核灾难,
但却是最严重的一次。



乌兹别克斯坦的咸海,1997年10月。苏联的工业政策加剧了经济造成环境恶
化的负面功能,和贝加尔湖污染事件一样,咸海的消失不仅是生态灾难,而且
是对未来欠下了巨债。



1991年9月(乌克兰独立一周
后),示威者在基辅举着内务
人民委员会的受害者照片。
乌克兰人尤其牢记苏联的镇
压,由斯大林造成的群体性饥
荒无异于种族灭绝。



在布加勒斯特的吉普赛人，1996 年。大约有 500 万吉普赛人居住在欧洲，而在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至少有 200 万，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歧视和虐待（或者是像英国那样，根本不允许入境）。



布加勒斯特，2002 年 12 月。这个罗马尼亚妇女标价 800 美元，东欧色情交易达到相当高的比例。犯罪组织从罗马尼亚和前苏联地区诱拐或绑架女孩到西欧和巴尔干从事卖淫活动。



在等待加入欧盟时，匈牙利先加入北约，并很快参与了科索沃战争（虽然是不情愿的）。1997 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次国际博览会上，北约的摊位上赫然挂着这样的标语，“在北约大门口”。



1989年6月,塞尔维亚人纪念“科索沃战争”600周年:这是中世纪的塞尔维亚人反对土耳其入侵的最后据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执意煽动人民的历史仇恨情绪,允诺塞尔维亚人捍卫“民族和精神的完整性”。



1995年6月,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牺牲者。武装的荷兰维和部队人员站在旁边,塞族不法分子仍然在拉特科·姆拉季奇的领导下,将7400名波斯尼亚男人和男孩赶出村庄,开枪扫射。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1999年3月21日。作为南斯拉夫战争的最后一步棋,米洛舍维奇希望通过武力阻止阿族分裂。但这一公然的种族清洗政策遭到北约武装力量的干涉,这是北约历史上第一次军事干预。




土耳其——小亚细亚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度过了一个决定性意义的欧洲“节日”。图中,加入欧盟的支持者挥动土耳其和欧盟旗帜,迎接埃而多安总理。他在确定了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开始日期后,于2004年12月返回安卡拉。

CONSTITUTION EUROPÉENNE

les capitalistes disent oui

NOUS RÉPONDONS

NON



Alternative libertaire, BP 295, 75921 PARIS Cedex 19

www.alternativelibertaire.org

Imprimé aux Éditions Libertaire - Ne pas utiliser pour des fins commerciales, reproduction interdite sans autorisation

法国作为欧盟的创始国,在2005年5月的全民公投中否决了“欧洲宪法”提案。一部分法国人担心欧洲对法国的约束力不够;而另一部分人则担心欧洲对法国的制约过多。很多国家担心自己变得太欧洲化,特别是土耳其。



约尔格·海德尔,奥地利右翼自由党领导人。尽管遭受了几次失败,海德尔还是成功地将自己和奥地利纳粹党的历史区别开来,同时攻击其余政党和“外来暴民”。图中标题的意思是,“他没有欺骗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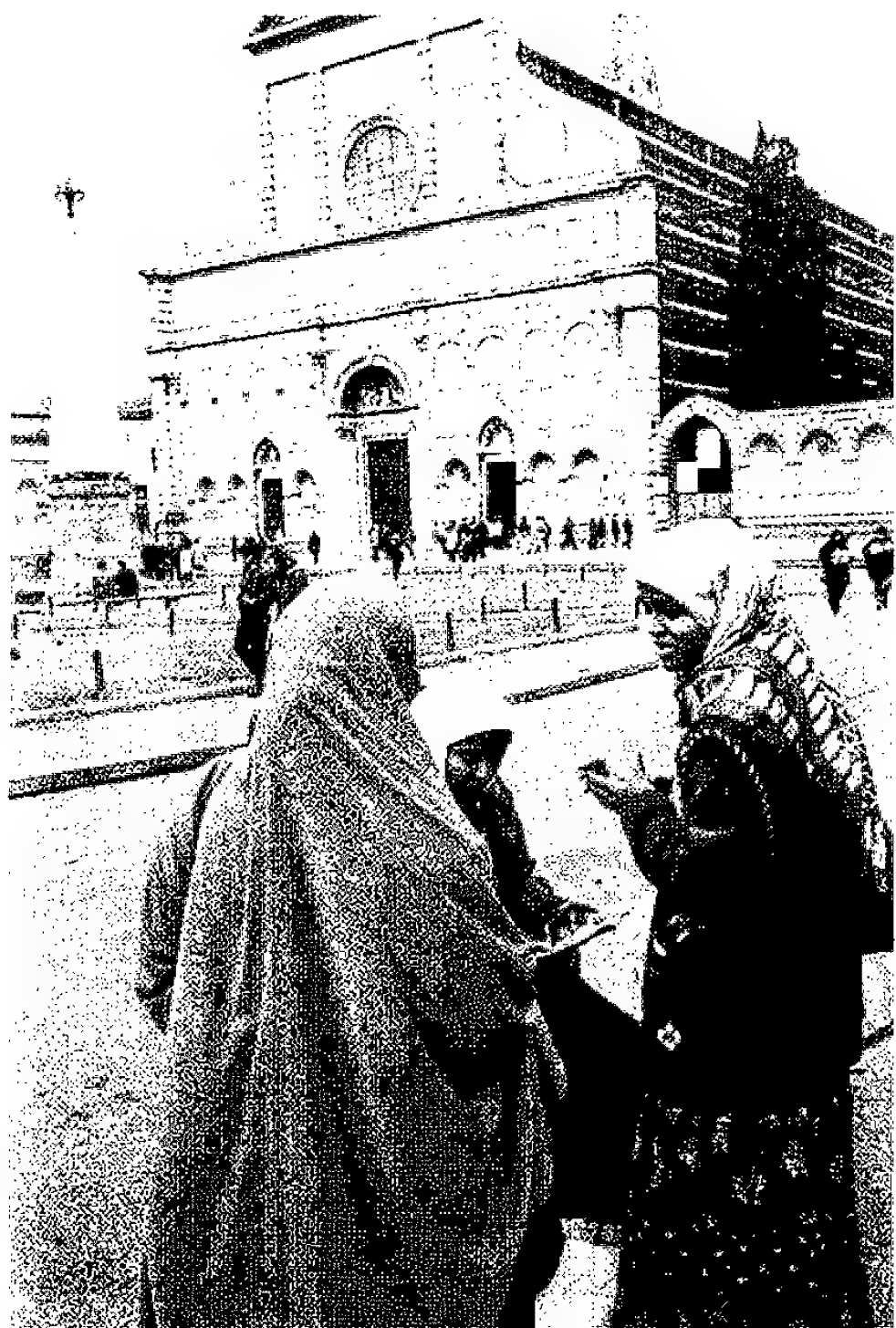
“投丹麦人民党一票!”皮娅·克亚斯伽尔德和她的“丹麦人民党”在2001年的大选中获得了12%的选票。即使是在斯堪的纳维亚,新的民粹主义也使主流政党通过限制避难权和外国人的权力来体现政党的“强硬”态度。



托尼·布莱尔介于欧洲“模式”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这和他努力在欧盟、伦敦和(与英国关系特殊的)美国之间处理三角关系一样。如果有机会,很多英国人更愿意选择欧洲大陆的医疗保障制度。



2000 年 2 月，摩洛哥人在阿尔梅里亚的安达卢西亚城抗议西班牙的种族主义。当西欧大部分国家越来越具有多元文化的特性时，种族偏见和紧张局势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欧盟边境的一些地中海国家。



佛罗伦萨，1997 年，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前的索马里人。到 2000 年，欧盟大约有 1500 万穆斯林。伊斯兰教是欧盟发展最快的宗教——这是基督教欧洲帝国历史的一项具有讽刺意义的遗产。



雅克·希拉克在纪念 1942 年巴黎屠杀 1.3 万名犹太人的仪式上。值得称道的是，希拉克是第一位承认法国在种族大屠杀的最终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总统；他宣布该周年纪念日为“法国人悲痛和永怀羞耻日”。



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 60 周年日上讲话。战后初期从公众的意识中消失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已经在德国等地方成为欧洲的正式纪念日。

欧的6个国家(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和老成员国一样的条件入盟,那么每年仅在结构性基金上的开支就将超过300亿马克。

人们普遍担心,中欧国家的人盟会激起欧盟会费中贡献最多的那些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且欧盟还不得不期待它们做出更多捐助:这些国家里面有荷兰和英国,但最突出的是德国。无论如何,东欧的那些受援国都无法执行现存的欧盟制度下哪怕是最少的基金标准。“后共产主义”国家真正需要的是“马歇尔计划”,但是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计划。

719 除了昂贵的人盟代价,新的申请国还会带来麻烦。它们的法律制度或者腐败,或者功能不健全,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未经审查,货币不稳定,边境漏洞百出。人们担心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会在西欧寻找工作和福利,或者呆在家中接受微薄的工资,这种状况会诱使国外投资者将目光从欧盟旧成员国转移到这些国家。无论哪一种状况,他们都会对西欧国家造成威胁。有一种说法是:西欧将会“人口超限”。这正好印证了很久以前赫尔德认为东欧“野蛮民族”将遍及西欧的担心。没有人会怀疑欧盟可以为东欧国家带来奇迹。但是东欧又可以为欧盟做些什么呢?

带着这些顾虑,西欧人犹豫了。1989年后,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首次提出欧盟应该尽快吸纳所有东欧国家,作为反对民族主义的预防性措施。但是他很快就下台了;虽然玛格丽特·撒切尔继续热烈支持欧盟早日扩大(考虑到扩大的欧盟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为英国梦寐以求的泛欧洲自由贸易区),而真正开始支配欧盟的是法国的策略。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第一反应是建立一个松散的“欧洲联邦”:一种无条件向所有国家开放、极少涉及物质利益的、形式上的成员联盟。之后几年,法国外交官发现这项建议缺少支持,为失去“和平协作”迈向欧盟的机会而惋惜。但这种策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透明策略,即可以将新获得解放的东欧各国圈进虚假的“欧洲共同体”内,而实际上却将它们排除在真正的欧盟阵营之外。捷克总统瓦克拉夫·哈维尔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拒绝加入的原因(瓦克拉夫·哈维尔在一段时期内是爱丽舍宫不受欢迎的人)。

相反,东欧和西欧国家在之后几年中关系一直停留在双边交换和贸易协定上,比如匈牙利和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而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仅仅停留在严格遵守“联合”地位,再无别的深入联系。但是,1991年莫斯科政变和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不久,西方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到放任共产主义国家带来的风险上;1993年,在西欧国家于哥本哈根召开的欧盟峰会上,在原则上同意(日期待定)“那些愿意加入欧盟的东欧和中欧各国将成为欧盟成员国”。

不过这一点丝毫没有让那些与布鲁塞尔总部和西方各成员国打交道的准成员国减轻挫折感,用波兰总理汉纳·苏霍茨卡轻描淡写的话来说是“失望”。事实上,东欧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在之后 10 年中一直耐心等待,虽然屡遭挫折,仍然希望从态度勉强的西欧合作者那里寻求坚定的承诺。它们允诺按照欧盟成员国标准制定国内宪法的事情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抓住机会让欧盟的外交谈判官员们感觉到让它们加入欧盟的迫切性。 720

但是西欧关注的是其他方面。西欧各国专注于推行新的单一货币和旨在实现机构整合的马斯特里赫特计划的实施。德国对为合并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付出的代价和困难越来越感到焦虑,同时,南斯拉夫剧变(从一开始起就提醒西方政治家们,不可低估“后共产主义”问题带来的风险性)也让政治家们全心关注这些问题了。

杰出的知识分子们曾经是时事政治的精确气压计,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几年前,“中欧”被西方评论员们重新发现,像哈维尔、昆德拉、米奇尼克和他们的同伴们,在巴黎、纽约等城市都是社论版和高雅杂志的宠儿。但是历史匆匆而过: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奇迹般摆脱专制的历史已经成为褪色的记忆,只有游客和商人还留有记忆。人们更容易在萨拉热窝找到伯纳德-亨利·莱维和苏珊·桑塔格。中欧短暂的名声已烟消云散,带着这样的名声,它们开始加速融入西欧的进程。在公共场合,布鲁塞尔的政治家和经理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欧盟在条件“成熟”时向东部扩张,而在非正式场合,他们则比较坦率。一位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在 90 年代中期评论说,“这里没有人真正地认真对待欧盟的扩大”。

但是扩大还是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规定,欧盟没有剥夺任何国家申请加入欧盟的权力。欧盟委员会不得不接受东欧国家的申请:1994 年匈牙利和波兰,1995 年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保加利亚,1996 年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在 1989 年就递交了申请,还有土耳其(它的申请从 1987 年以来就一直被搁置)。就这样,10 个前共产主义国家也加入马耳他、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申请之列。所有的申请国现在都在拥挤的候见厅等待欧盟的关注。

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在原先的《罗马条约》上增加了一系列专门的辅助性条款,以完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制定的目标,强制执行欧盟在发展公民权利上的纲领,以及在就业、健康、环境和共同的外交政策方面完成欧洲范围内的机构建设,加强统一的外交政策。在这些方面,统一货币于 1999 年正式生效;欧盟吸收其所有政府机构的力量后,完成为期 10 年的内部整合。“欧盟扩大”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已经不再有任何推迟的借口。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欧盟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曾希望限制入盟谈判,以便“简化”事务:像斯洛文尼亚或者匈牙利这些小国,与欧盟边界邻近,同时经济相对现代化,这对欧盟的机构组织和预算带来的挑战并不算大。但是欧盟很快发现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轻率 721

的：将波兰或者罗马尼亚晾在一边，会让这些国家陷入非民主化的危险境地。所以从1998年开始，和塞浦路斯一起，欧盟正式开始审批这10个国家的申请流程。马耳他很快也加入了申请之列。但是土耳其却被搁置了下来。

从这一点来看，扩大是一个自我的动态过程，虽然老欧盟成员国仍然顾虑重重，而且从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也缺乏普遍兴趣。但是扩大欧盟的双边谈判已经开始，首先是那些被认为是核心申请国的成员：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一年后考虑剩下的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和马耳他。虽然波兰经济不发达，但出于其面积和重要性的考虑，它仍然排在优先位置。相反，斯洛伐克则降到第二考虑行列，主要是对该国由梅恰尔领导的独裁政权造成的经济停滞和贿赂丑闻的回应，作为对其他国家发出的警告的例子。

之后是为期5年激烈的、有时非常尖刻的谈判。为使各申请国的公共机构、法律规章、行为规范和公共服务设施符合欧盟的最低标准，“布鲁塞尔”总部官员会突然访问所有的申请国首都，安排大量顾问，提供各类咨询意见、建议、先例、各种纲领和指导性意见。而申请国则尽力抵制，确保本国能在自由出入欧盟市场的前提下，保护国内市场，使其不被西方极具竞争力的商品和高效的服务吞没。

这种努力的确是不平等的。长久以来，欧盟一直是东欧国家公开承认的渴求的目标，而这些准成员国除了能承诺良好的表现外，做不出任何贡献。鉴于这种情况，欧盟和各新成员国达成一些限制性特权协议——其中就涉及敏感问题，例如购买国外土地的临时性限制协议——虽然允许新成员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是它们不得不接受欧盟对它们在货物出口、尤其是人口输出上的大量限制。

针对可能的人口流动的夸张性预测（欧盟在2000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如果西欧国家的边境完全开放，10个东欧国家每年将有33.5万人次涌入西欧各国），大部分西欧成员国坚持在东欧向西欧的移民问题上采取配额限制，对10年来欧盟的各项宣言和条约的精神视若无物。德国、奥地利和芬兰强行将上述严格限制延长两年，并保留延长至5'22年的权力。比利时、意大利、希腊也紧跟效仿。只有英国和爱尔兰宣布它们遵守欧盟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声明给予东欧各国打工者的福利补助将实行最低标准。

东欧国家的农业补助和其他福利也受严格限制。根据欧盟2003年的过渡性报告，这一方面是担心“受援国能否吸纳和高效利用欧盟凝聚基金和结构基金给予的后期拨款能力上的问题”。但最主要还是为了控制欧盟扩大的开支，使西欧各生产国面临的竞争最小化。东欧各国农民要到2013年才能得到与西欧农民相同的农业补助（到那时候，大部分农民肯定已经退休或者都不再从事农业）。

谈判结束后，适时地公布了已经通过的条款和9.7万页欧盟关于申请国的管理条例

和法规,而真正的“扩大”颇有虎头蛇尾的味道。在 15 年漫长的等待后,大部分新申请国缺乏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假如 10 年前它们能获准加入欧盟,这些国家或许会很激动。无论怎样,融入西欧后,很多实际利益已经大打折扣,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前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拥有廉价的、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大众、雷诺、标致-雪铁龙在 90 年代投入巨资。从 1989 年到 2003 年,在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累计达 1 170 亿美元。

到 21 世纪初,外国在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投资实际上已经减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盟扩张即将到来。一旦这些国家加入欧盟,那么与波兰或者爱沙尼亚做生意或是在境内投资自然变得容易。而反过来,东欧国家也可以向西方国家销售更多产品:波兰希望在加入欧盟 3 年内,对欧盟的食品出口可以翻一番。但这种结果是一种相对的退步。一旦进入欧盟,东欧国家的工资和其他费用将开始向西欧各国看齐,同印度、墨西哥等国相比较的成本优势就会失去。至少在制造业,利润率将开始下降。

同时,由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耗费了巨大的成本,使东欧国家在即将加入欧盟的时候,仍然与其他欧盟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即使是在最富裕的新成员国,人均 GDP 也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斯洛文尼亚是欧盟平均水平的 69%;捷克共和国是欧盟的 59%;匈牙利是 54%。波兰的人均 GDP 是欧盟的 41%,而在拉脱维亚这个最贫穷的新成员国,其人均 GDP 仅及 33%。即使新成员国以每年 2% 的增长速度,即以比现在的成员国〔7〕更快的速度发展,斯洛文尼亚也需要整整 21 年才能赶上法国。而拉脱维亚赶上其他成员国 723 的时间就需要 75 年。当然,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没有这些数据。但是大部分人对面临的困难不抱什么幻想。当捷克人在 2000 年的一系列民意调查中,被问及他们认为需要多久才可以“改善”现状时,30% 的被调查者认为“5 年之内”;30% 的人回答“10 年之内”;另外 30% 的人回答“15 年或者更久”;还有 10% 的人回答“永远不会”。

虽然在受惠国里存在着各种怀疑理由,但是欧盟大爆炸似的扩大是真实存在的。当 2003 年 4 月在雅典正式签署入盟协议,并于 2004 年 5 月正式生效后,欧盟这一次使它的成员国从 15 个增加到 25 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被搁置,它们有望于 2007 年加入欧盟)。欧盟人口增加了 1/5(但是经济增长减少了 5%);土地几乎集中连成一片。之前的“欧洲”边境在最近的 1989 年也只不过到达意大利城市的里雅斯特,但是现在它已经延伸到前苏联领地。

〔7〕 这是一种高度乐观的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西班牙和葡萄牙于 1986 年加入欧盟委员会,它们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 1.5% 到 2% 之间,高于欧盟其他成员国。

在 21 世纪的黎明,欧盟面临一系列令人畏惧的问题:一些是旧问题,一些是新问题,还有一些是欧盟本身的问题。经济问题也许最常见,却是众多问题中最不严重的。无论是否有新成员国加入,欧盟仍然对农民进行大量倾斜性投资。欧盟 40% 的财政预算(在 2004 年是 520 亿美元)继续作为政治意图的“农业支持补偿”,很多投向根本不需要帮助的、高度机械化的法国或者西班牙。

即使在降低农业补助和减少共同农业项目上已经达成协议,估计农业价格补助在新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会占欧盟总共开支的三分之一,这对欧盟的预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问题不是欧盟贫穷,正相反,欧盟成员国的财富和资源总和可以与美国匹敌,但是欧盟的财政预算如果用 2003 年布鲁塞尔单独报告中的话说,是“历史遗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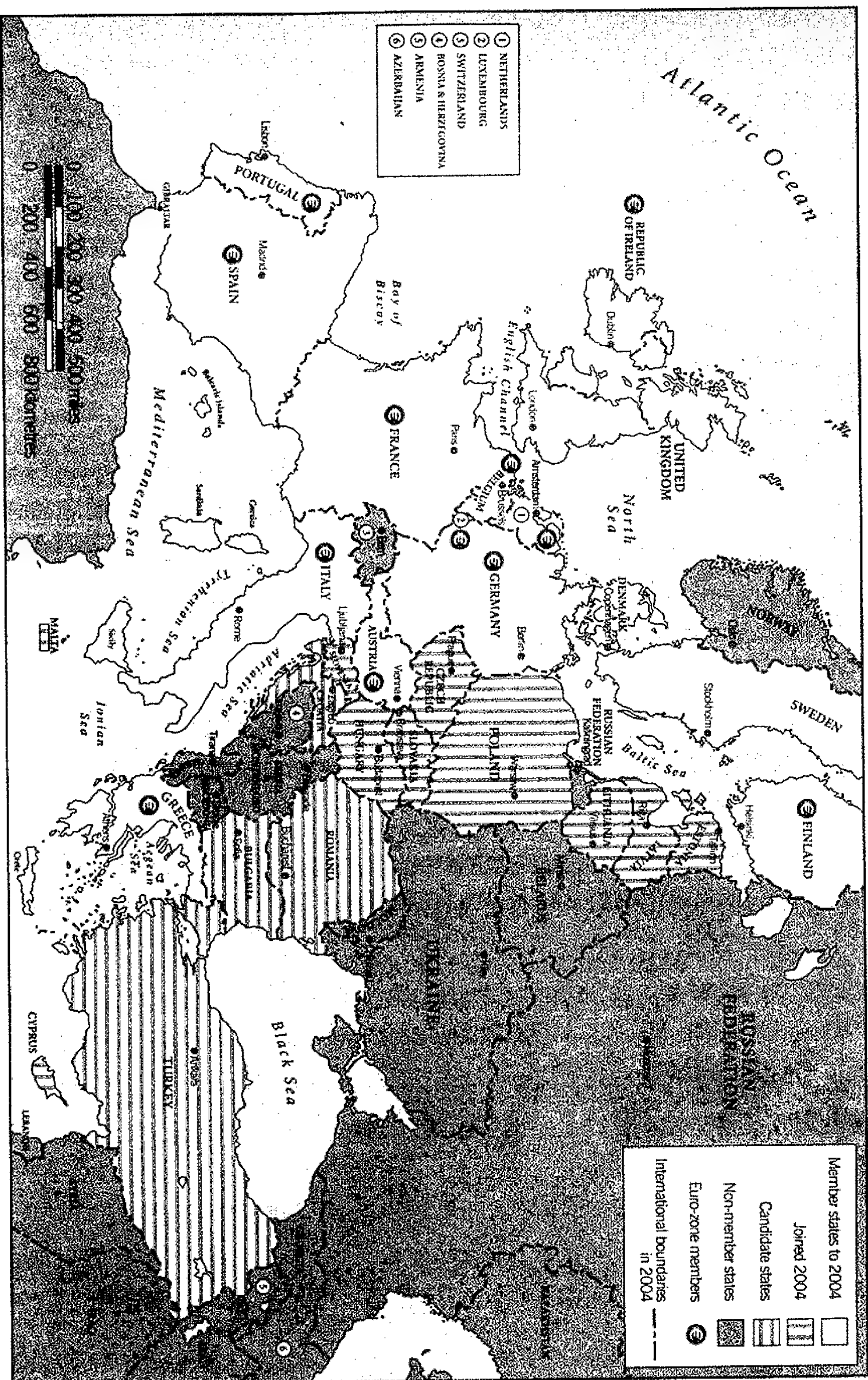
25 半个世纪之前,欧盟作为海关联盟——可算一个“共同市场”——只是统一外部关税。它的开支形式是由关税谈判协议、价格、补贴和支持来推动并实行限制的。多年来,它的雄心已经扩展到文化、法律、政府、政治领域,在布鲁塞尔等地方,它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政府有很多相似之处。

传统的政府在募集资金、满足预期开支上非常自由,但是欧盟本身却没有税收的募集能力。它的收入主要来自关税、农业税、欧盟范围内的非直接增值税(VAT),而主要是每个成员国交纳国民生产总值的 1.24%。所以欧盟的收入几乎没有多少是由自己直接控制的,并且由于每个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压力的不同而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大部分后来的成员国是欧盟的财政预算的受援国,而不是捐助国。2004 年欧盟东扩后,19 个欧盟成员国从布鲁塞尔得到的资助要高于它们所交的欧盟会费。欧盟日常开支的维持实际上出自 6 个捐助国:英国、法国、瑞典、奥地利、荷兰和德国。但是,这 6 个国家在 2003 年都提出减少对欧盟财政预算的贡献,由原来的 1.24% 下降到 1%。

即使与最小的成员国的预算相比,欧盟的预算也是小的,而且大部分花在结构性基金、价格补贴和欧盟自身的高额管理费用上,所以无论对捐助国、还是对受惠国的利益来讲,都是一种永久性的制约。欧盟的经济杠杆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所有成员国的一致性。在所有成员基本赞成的大原则和既定政策的利益下——例如开放内部边境,或者是货物和服务市场的非限制政策——欧盟已经取得很大进步。而在少数成员国无法真正达成一致意见时(或者仅仅是一国不同意,特别是某个主要的捐助国),政策就会中断:数十年来,统一关税和减少农业补贴一样,一直搁在议事日程上。

有时候,欧盟也会走回头路。20 年来,布鲁塞尔致力于推动取消对特惠产品国的国家补助,而欧盟的单一市场委员(荷兰人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在 2004 年 6 月表达了他的惊讶之情——法、德两国为了保护本国农场,开始恢复 20 世纪 70 年代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是和布鲁塞尔那些没有被选上的委员们不同,法、德两国无法忽视本国的纳税选民。



26 欧盟的这些矛盾在推行欧元时遇到的困难中可见一斑。单一货币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上的,需要用一种单一货币代替各国的不同货币,这种过程在取消法郎、里拉、或者德拉克马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事实上这个过程惊人地顺利,并且没有造成痛苦〔8〕——当然这是以协调国内经济政策为前提的。为了避免道德上的冒险和实际运行中的风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国坚持那项有名的《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

希望加入欧元的国家,必须将它们的公共债务降低到不小于国民生产总值 60% 的水平,财政预算不小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3%。任何未能通过此类考验的国家将受制裁,其中就有欧盟强制执行的巨额罚款。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确保欧元区的各国政府不放宽财政保护政策,不任意超出财政预算而使欧元区其他成员国为维持单一货币的稳定性而承受巨大压力。

让人惊讶的是,曾经被认为会挥霍浪费的南部国家相当自律。一名驻西班牙的观察家指出,西班牙有“资格”成为欧元成员国,不仅是因为幸运,还因为西班牙自身的优点:经济增长使西班牙能在 1999 年欧元引入时,及时降低国家的公共债务。连意大利也通过了德国人的测试(很多意大利人怀疑这项规定是为了把他们拦在欧元区外),当然意大利在数字上做了手脚,而且曾出让国家财产。到 2003 年,欧元区包括了爱尔兰和希腊,共有 12 个国家。

但是,正如很多怀疑论者预测的,根据“通用规则”制定的单一货币很快就显露弊端。在法兰克福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从一开始就保持相对的高利率,以支持新货币,防止通货膨胀。但是欧元区国家在各自的经济水平和发展周期方面都是不同的。一些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经济在发展;而其他国家,特别是匈牙利,经济落在后面,它们可以发展本国的经济活动和贸易出口,而这些活动在传统上是通过降低利率和“软通货”来实现的。

因为葡萄牙政府无力执行这些措施,所以必须根据《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就面临巨额罚款。此时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应当通过这种方式摆脱经济衰退。这项政策并未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是至少政府可以说在加入新货币的条款上没有违约:到 2003 年,里斯本已经成功地将政府债务降到 GDP 的 59.4%,年赤字率降为 2.8%,勉强符合官方规定。

27 但是第二年,法国的财政赤字就几乎达到 4.1%,而德国疲软的经济最终为合并付出了代价——赤字高达 3.9%,负债率达到近 65%。考虑到德、法各自的经济实力,两国未能遵守自身的规章制度,这对整个欧盟协议来说是一种挑战。但当欧盟委员会启动处罚

〔8〕 2002 年 1 月 1 日,总计 6000 亿欧元现金严密配送到欧元区各国,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成就。

议程时,法国和德国都发表声明,认为“临时性”赤字在经济上不可避免,它们无意支付赔款,甚至也不能承诺在下一年有更好的表现。

欧盟的小成员国(如希腊和匈牙利)是通过一些牺牲,经过努力,才符合公约条款的规定的,而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则担心新货币的稳定性,这些国家都高呼法、德违反规定,但也从中得到教训。《增长和稳定公约》颁布不到 10 年就已经失效。如果欧元国在本国财政预算上能享有更多自由,欧元将会遭受多大损失还不清楚。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各国政府,而在于体制僵硬的、似乎不负责任的中央银行,它坚持完全独立,仍然在从事 70 年代的那种反通货膨胀的战斗。

欧元面临的困难,显示出了欧洲一体化的更大的缺点:极其庞大而笨拙的政府系统。问题主要在于原先的观念。让·莫奈和他的继承者故意避开实践,更多地去构想民主或者联邦体制。因此,他们自上而下地推动了欧盟现代化的方案建设:传承圣西门主义的构想,实施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发展经济的策略,并且由专家和官员们去具体实施该策略,同时极少考虑受惠者的意愿。这一方案的提议和倡导者们大部分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复杂的技术性方面,而出现的其他问题都被推延到以后再解决。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出于管理上的便利,欧盟仍然在数十年前的线路上行进。布鲁塞尔的委员会并非经由选举产生,其下管理一支庞大的官僚机构,制定各项政策,实施各国部长制定的日程和决议。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于 1979 年由直接选举产生,慢慢扩大了其监管职责(在最初的《罗马条约》中,它的功能被严格限制在咨询上),但是没有主动权。

在布鲁塞尔,存有争议的议案通常由专家和公务员决定。可能对宪法或者国家利益产生极大影响的政策,是由欧盟各部长经过仔细研究制定的,往往出现复杂的妥协性结果或者高价交易。无法达成一致的协议(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则被简单地搁置一边。几个核心成员国(例如英国,德国,尤其是法国)并不总是得偿所愿;但是它们真正不想看到的事情也绝对不可能通过。 728

这是一种独特的协商方式。它与 1776 年北美各个独立的州的情况不同,独立州就像卫星一样围绕在英国的周围,其语言、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与英国相同。这种方式也不同于瑞士联邦,虽然人们经常在两者之间做比较:瑞士的多重主权,行政飞地和各地方权利和特权已经形成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政治网络,瑞士的这种情形更像法国 1789 年前(假如没有国王时)的情况〔9〕。

〔9〕 这种体制仍然可以和以前一样流畅运作,部分是因为联邦制本身的完善,而不仅仅因为瑞士资金充足:20 世纪 90 年代,经过大部分指标测量,表明瑞士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相反,欧盟各成员国仍然保持完全独立,它们在过去一直自愿联合在一起,通过让步和妥协逐渐积累了一套权力和立法议案,它们既没有说明这些协议背后有哪些原则,也没有说明这些共同的承诺可以坚持多久。“布鲁塞尔”是个模糊的行政实体的匿名总部,它既不贯彻民主,也不实施极权——它通过所有成员国政府的一致同意来实行管理。从一开始起,它就作为一项积极的事业,以正面进步的形象示人——欧共体或者欧盟致力于为各成员国创造福祉,同时又不减损其独立的重要性。但是这个目标能否继续还是个未知数。

让人担心的不是欧盟制度体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而是它不可能将 25 个成员国结合在一起。至今,欧盟部长会议主席的任期每 6 个月轮流一次,每个国家轮流主持两年一次的欧洲会议——这种制度一直不受专任部长们的欢迎。以这种方式从里斯本到卢布尔雅那等 25 个不同的国家首都之间轮流,显然是很荒唐的。此外,在出现 50 名欧盟委员(每个成员国两名)后,或者说出现欧洲理事会后,六国决策机制就渐渐地停止运行了,这种体制对 12 个国家来说已经很麻烦了,更不用说是 15 个国家了,欧洲理事会代表 25 个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

2000 年 12 月的尼斯会议充分暴露了欧洲一体化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困难。会议表面上是为欧盟扩大打好基础,并为欧盟委员会部长们设计一套新的投票制度——该制度以成员国的人口为重要指标,同时仍然希望确保大部分决议能够通过——但会议在既激烈又尴尬的讨价还价中结束。法国坚持与德国势均力敌(尽管人口相差 200 万),而西班牙和波兰被授予观察员地位,两国希望通过向欧盟中权力最大国出让支持票,以期在将来的欧盟中获得更多的投票影响力。

为了在欧洲这个大家庭里争取地位和影响力,欧洲各国领导人托尼·布莱尔,雅克·希拉克和葛哈德·施罗德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讨价还价,唇枪舌剑,尼斯会议上的混乱场面证明先前忽视宪法精确性的做法是要付出代价的。欧盟通过引进新体制,尼斯会议直接产生了“欧盟制宪大会”:这是一种未经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授权为扩大后的“欧洲”建立一种实际的管理制度,同时人们希望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可信的解释。经过法国人的大量游说(这种方式现在人们已经很熟悉),由年迈自负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担任欧盟制宪大会主席一职。

经过两年的筹备后,欧盟制宪大会提交了一份高于草案、但远不及宪法的提案。略去吉斯卡尔洋洋洒洒的序言部分(与杰斐逊一类的前辈的简洁文风形成鲜明对比),议会通过的传统方式宪法提案的文件也几乎没有说明什么(既没有对各国的自由做出完整的定义,也没有对权力分配做出声明,等等)。正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从这方面来讲,欧盟宪法草案是令人失望的。

但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文本内容经过讨论后,被采纳为 2004 年的《罗马宪法条

约》，的确为欧盟事务的实际性操作提供了工作蓝图：改善共同防御和移民问题上的合作体系；简化和统一欧盟法律；制定旨在进一步加强欧洲议会权威的欧盟公民《基本权利宪章》；对欧盟的正式权力作了清晰的、甚至可以说是雄心勃勃的说明。

首先，宪法提案应该本着在一段时间内改变欧盟委员会内部各成员国头重脚轻状态的目的，并且能够设计出一种欧洲理事会内部运行的投票制度，经过一定程度的协商后，能让所有的成员国以及各国人民接受。但是新提案在一些难题上是否能达成一致还很不确定：但是在税收和防御等等这些真正有争议的问题上，毕竟还是一致同意了保留以往戴高乐主义的国民否决机制（虽然英国实施否决权表示反对，但其他国家还是松了口气）。毫无疑问，在所有认真的、有分量的投票中，真正的权柄仍然掌握在大国手中——正如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伽塞特在1930年早已得出的结论那样，“欧洲”是为满足“法国、英国和德国三位一体”的实际目的而准备的。我们可以一直在假定欧洲宪法需要经过每个成员国的认可，这曾经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但现在欧盟至少已经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了。

时间到了2004年，让许多观察者惊奇的是，欧盟似乎克服了、或者至少减轻了管理 730 25个很难处理的成员国的实际困难。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它仍然没有站在欧洲公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欧盟制宪大会和形形色色的条约，还是欧盟委员会及其各类报告和规章，以及已经开始运作的、旨在教育欧洲公众认识欧盟及其工作方式的昂贵出版物和网页都没有做到。

如果说建立新“欧洲”公共机构的技术官僚们傲慢无礼地忽视欧洲民意，那么现在这种态度则是有过之无不及。在反思其工党同事执迷于政党政治管理的技巧和规则方面，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曾经对“根本性谬论”的假设——即认为“机构扩大可以让政党不再依靠人民”——提出反对意见。^{〔10〕}但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各项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的，它造成的后果现在终于变得明朗了：欧盟正遭受着严重的“民主缺失”。

欧洲议会的每次直选，选民人数都在下降；唯一的例外是当国家大选和欧洲大选刚好碰到一起的时候，动员参加当地和全国大选的选民刚好也参加欧洲大选。否则，选民人数下降的趋势将一直持续——法国的投票率从1979年的60%下降到2004年的43%；德国的投票率从66%下降到43%；而荷兰的投票率则从58%的投票率下降到39%。^{〔11〕}

〔10〕 引自肯尼斯·哈里斯《艾德礼传》（伦敦，1984）第63页。

〔11〕 荷兰投票率的下降是个不祥的预兆。它曾是“欧洲”核心国，是欧共体和欧盟基金的慷慨捐助国，但是荷兰在近几年开始退缩回到国内事务方面——在皮姆·福图因的崛起和遇刺之后，加速了这种变化。

选民们对本国政治表现出的兴趣程度,对比他们日益对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选举的漠不关心,两者差别之大尤其令人深思。在2004年6月的欧洲大选(也就是欧盟扩大后的第一次大选)上,英国的投票率比最近一次的全国性大选下降了20个百分点,西班牙下降了23个百分点,葡萄牙下降了24个百分点,芬兰下降了39个百分点,奥地利下降了42个百分点,瑞典下降了43个百分点(瑞典本国大选的投票率为80%,而欧洲议会的投票率只有37%)。

31 欧盟的运作模式的不可靠性导致它对成员国的助益不多。此外,这种情况很快发生在与欧盟未来紧密相关的东欧各新成员国,虽然这是它们等待很久后,第一次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在2004年6月的欧洲大选中,匈牙利的投票率与上一次相比下降了32个百分点;在爱沙尼亚下降了31个百分点;斯洛文尼亚最近的一次国家大选的投票率是70%,而选民们费心去参加欧洲选举的投票率只有17%。在波兰,20%的欧洲大选投票率比2001年国家大选的投票率减少了26%,这是共产主义政权下台后最低的一次投票率。

那么为什么“新欧洲人”和“旧欧洲人”一样,对欧洲事务的态度非常冷漠呢?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欧洲事务对他们没有多少影响。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在是否需要加入欧盟或者欧元区问题上举行过全民投票(有些国家虽然将议案列入全民公投,但是遭到否定,或者即使是通过了,也是以极微弱多数通过)。所以,欧盟不是所有的欧洲公民“拥有”的,它与一般的民主机制不同。

此外,在欧洲公众中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欧盟机构中所有的732位欧盟议员是最不重要的。实质权力掌握在各国政府任命的欧洲理事会和由政府代表组成的欧洲部长会议手里,简而言之,国家大选才是做出重要选择的时刻。为什么当你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街头手风琴师身上时,你还浪费时间在表演杂技的猴子身上呢?

另一方面,即使是最漠不关心的欧洲公民也非常清楚,那些在布鲁塞尔不“露面”的男女政治家们现在拥有实权。从黄瓜的形状到颜色,从人们所持护照上的用词等等,任何事务都由布鲁塞尔总部决定。它可以给予(从牛奶补助到学生的奖学金),也可以拿走(你的现金,解雇员工的权力,甚至是奶酪上贴的标签)。在过去的20年里,欧盟的各国民政府发现,将不得人心的法律、税收、政府不愿意承担责任但又默认的经济政策归咎于欧盟是非常方便的。

在这些情况下,欧盟的民主缺失就很容易从冷淡变成敌意,变成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的决定都是由“那里”制定的,其结果对我们“这里”的人不利,但“我们”都没有决定权——这种偏见大部分都是由不负责任的政客添油加醋,再由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造成的。在2004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选民的兴趣急剧下降,很多人的确不辞辛苦地赶

来投票——但是他们的票却是投给反对欧盟的竞选者的。

在西欧,“欧盟扩大”本身触发了反冲力。在英国,憎恶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和信奉白人至上的“英国民族党”获得了 21% 的投票率,它们保证要使英国与“欧洲”分开,预防移民和寻求避难者涌进英国。比利时的弗兰芒集团、丹麦的人民党和意大利的北部联盟 732 的表现也都和过去的行为类似,只不过现在要成功得多。

在法国,让-玛丽·勒庞的“民族阵线党”也持类似立场;但是法国在欧盟扩大上的很多疑虑并不局限于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法国政界一直反对欧盟扩大,以防止法国的影响力下降,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密特朗、希拉克和他们的外交代表都尽力将这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往后拖延。公众也对这种情绪予以回应:在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前 4 个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70% 的法国民众对新成员国的到来表示“未准备好”,而有 55% 的人则反对和新成员国融为一体(与整个欧盟 35% 的反对率形成对比)。^[12]

但是对欧盟的反感同样也在东欧出现。在捷克共和国,人民民主党——它与瓦茨拉夫·克劳斯的立场相同,对欧盟及其“过于强大”的权力持怀疑态度——显然是 2004 年大选的赢家,赢得捷克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的 38%。在邻国波兰,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政党事实上比执政的中左联盟表现得更好(如果考虑几个月前的欧洲大选中只有刚超过一半的波兰选民认为加入欧盟是“一件好事”,这样的情况也许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总而言之,加入欧盟的确是一件好事。从共同市场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即使是那些对欧盟持强烈怀疑态度的英国人也开始承认这一点,特别是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任职期间“和谐”欧洲的热情劲过去之后。加入欧盟后,可以在欧盟任何国家自由旅行、工作和学习,这对年轻人而言是真正的福祉。另外还有不少好处。相对而言,所谓的“社会”因素在欧盟的预算中只占极小的比例,还不到欧洲地区 GNP 的 1%。但是从 80 年代晚期以来,欧洲共同体和欧盟却明显地重新分配预算,将资源从富裕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并稳步减少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实际差距——这在实际上取代了前几代人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的计划。^[13]

近年来,欧洲公民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法庭。“欧洲司法法院”建于 1952 年,与“欧洲煤钢共同体”一样是在《巴黎条约》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刚开始时,它只实施立宪任务, 733 确保欧共体立法(“共同体法律”)阐释清晰,能同时在各成员国以一致方式实施。但是在

[12]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 2004 年 1 月,每 50 个法国成年人中只有 1 人能说出 10 个新欧盟成员国的名字。

[13] 但也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英国和美国一样,从 70 年代晚期开始,富人和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世纪末,欧洲法院的法官(主要来自各个成员国)授权解决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法律纠纷,同时审理来自下一级法庭决定或者是反对成员国政府的决议。欧洲法院事实上已经具有泛欧洲上诉法院的许多特点和权力〔14〕。

欧洲法院的这个例子说明,欧盟的机构如果以间接的、非刻意的方式出现,会有不少优点。即使是在原先欧洲最“核心”的国家中,也很少有律师或者立法者会在一开始就愿意放弃他们本国法律的权威性。同样,如果将一个“欧洲议案”清晰化,仔细描述欧盟的目标和机构,并将此方案在西欧各国分别投票,那么很显然这种方案是会被否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欧洲的理念的优点恰恰在于其含糊性。比如“增长”和“和平”——这两个词都与欧洲一体化支持者心中的想法紧密相连——“欧洲”的概念非常亲切,不会招致反对。〔15〕早在70年代,当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最先开始轻描淡写地谈论“欧盟”时,外交部长米歇尔·若贝尔曾经问他的同事爱德华·巴拉迪尔(后来的法国总理)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巴拉迪尔回答道,“没什么意味。不过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蓬皮杜本人则放弃使用这个词,认为它是“一个含糊的概念……用来避免原则上的争议”。〔16〕

当然,正是这种概念上的含糊性和欧盟立法方针的精确性,导致了欧盟的民主缺失:对欧洲人来说,关心一个定义模糊、但同时似乎还影响到他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欧盟,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而,欧盟作为一种间接的政府体制,在它的所有缺陷中,毕竟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原创性的特点。决议和法律也许可以在跨政府的层面上通过,但是必须通过国家政府才能真正落实。因为没有强迫机制,所以每件事都必须通过公约执行——欧盟没有税收官,也没有警察。所以,欧盟代表一种非同寻常的妥协方式——由国家政府承担的国际政府。

134 最后一点,因为欧盟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机制能够阻止各成员国之间互相攻击,所以它的存在从某种方式上来说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种通过战争才能赢得政治上和领土上优势的方式,已经让战胜国接受了惨痛的教训,当然,战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这个教训。若是欧洲内部再打第三次战争,就会是末日的灾难,就会彻底毁灭欧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至少在欧盟初期还不能保证。

不过到了世纪末,欧盟的精英们和各种机构互相交织和相互依赖的现状,使武装冲突

〔14〕 不能将“欧洲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相混淆,后者是在欧洲理事会的支持下,为强制实行1953年的《欧洲人权及基本自由保障公约》而建立的。

〔15〕 出自吉斯卡尔的《欧盟宪法条约》,第3条第1款对欧盟的目标作了定义,即“促进和平及其价值观和人民福祉”。

〔16〕 被安德鲁·摩拉夫西克在《欧洲的选择》(纽约,1998)引用。第265页。

尽管绝不是不可能的,但也多少变得不可思议。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成为拉脱维亚和波兰等等国家向往的目标——这是它们摆脱历史的一条逃离路线,也是对未来政策的一种保证。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什么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们在面临巴尔干战争时,会显得那么愚蠢而且无用。

南斯拉夫事件上的耻辱^[17]提醒我们,欧盟的优点不能掩盖其缺点。欧盟虽然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可以将 4.5 亿人口组成一个单一的、松散的组织的、但是较少意见分歧的共同体。然而,它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公民们仍对自己的国家保持最基本的忠诚,他们遵守本国法律,说本国语言,在本国纳税,而欧盟却没有决定权或强制保障自己安全利益的机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共同的外交政策。相反,在几十年来,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在国际论坛上提高和维护自身利益、与别国展开竞争方面非常有效。但是这些利益绝大部分是经济上的,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一些经济保护主义条款。在美国出口商减税或者美国限制欧洲产品进口等等事情上,欧洲的经济部长们和贸易代表们是同美国对抗的。

更具争议的是,为了保护受到农业补贴的农民的利益,欧盟也在同高关税作斗争。比如欧盟对像糖类这样的商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从而损害了非洲和中美洲农民的利益。^[18]但是当欧盟的各成员国——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 735 地方发生经济纠纷时,就会乐于把责任推给欧盟,而自己却保持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有的那种重大特点。欧盟没有军队。

部分地说来,这是一种历史偶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很多人认为西欧将来可以、而且应该组织集体军事力量(在 1950 年 8 月的欧洲理事会咨询大会上,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甚至提出设立欧洲军事部长一说)。但是建立欧洲共同防御的提议的破产(参见第八章),以及西德并入北约,结束了一代人的这种想法——西欧舒适地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帝国时代结束,西欧各国都减少了防御开支。随着欧洲共产主义下台,军事开支就进入了新低。在 80 年代晚期,北约各成员国在军事上的平均预算已经下降到 GNP 的 3.4%;到 2003 年,丹麦在国防上的开支只有 GNP 的 1.6%;意大利是

[17] 美国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曾尖锐地预言欧洲人“会把事情搞砸,并且会由此得到教训”。

[18] 欧盟并不是唯一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对欧盟区内的农民实施补贴的机构,并且也不是最严重的——挪威、瑞士、日本和美国在人均补贴上都要高得多。但是欧盟的政策似乎比较虚伪,一方面,它承诺对各国采取一致措施,另一方面,它对各国的政策又经常是区别对待的。东欧被告知要采取统一的欧盟条款,但它们不会不注意到西欧政府经常违背同样的条约。

1.5%；西班牙只有 1.4%。只有法国和英国的军事开支庞大，但它们的开支也没有超过 5%（从历史标准来看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 2000 年已经宣布了“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但是欧洲没有哪一支武装力量在“欧洲”的控制之下，或者将来有可能在其控制之下。尽管“欧盟对外关系委员”存在好几年了，但是在《阿姆斯特丹条约》签订之后，它的职能被“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复制（所以其权威性就下降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只对欧盟委员会部长会议负责。无论是对外关系委员还是高级代表，都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而派遣武装力量、谈论外交政策或者替各国部长发言都需要事先指示。亨利·基辛格在几十年前问过一個讽刺性的问题——“如果我想打电话给欧洲，该拨哪个号呢？”——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过时。

但是这些限制（比如欧盟虽然面积大，又富裕，但它仍然不是个国家，更不是一个大国）反而提升了它在国际和国内的形象。在这一方面，至少欧盟确实与瑞士相像，成为国际合作和中介的地方，在解决问题和社会融合方面提供了“后国家”策略的模板：与其说这是一个机构网络或者一种法律体系，它更像是一套价值观，即“欧洲价值观”，体现在新的《欧盟基本权力宪章》中。

736 如果这个新欧洲的价值观和标准在 20 世纪末处于压力之下，这不是因为已有的民族国家对欧洲的观念历来是错误的。欧盟及其成员国现在面临着超出它们掌控之外的力量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其中大部分将成为全球化的惯例。

全球化毫无神秘之处。它并不算史无前例，至少 19 世纪末新兴的、迅捷交通和通信网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一个世纪后因特网给世界带来的巨变、解除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带来的改变一样剧烈。在全球范围内，20 世纪末在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进行不平等分配方面，比起 1914 年之前来，也没有什么新意——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制度一贯以符合强权者和富人的利益为标准的时候。

但是从欧洲的来看，世界经济中的新转型在以下重要领域所起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19 世纪末，欧洲国家开始扩大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当时很多国家拥有、运作或调控大型经济部门。不断增加的新税收为政府开支提供了保障，而急剧增加的政府开支部分用于支付战争开支，而更多的则用于满足已经成为政府职责的社会和福利事业的需要。

但 19 世纪的经济国际化是紧随欧洲私营化的第一次浪潮之后出现的，也为以后的国际化浪潮提供了动力（参见第 17 章）。欧洲国家现在正在“倒退”——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大部分西欧国家，最后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这种过程继续受到 1987 年《单一欧洲条约》的支持，它为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公开竞争做了准备。通过合并、占有和生产国际

化等操作,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经常跨出国门,公司和企业开始实现全球化运作。

货币的成倍增加和转移方式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所有的国际性银行每年借贷的总和是3240亿美元;到199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7.5亿,在10年中增加了20倍。而这仅仅是个开始。80年代初,大部分欧洲国家对资金流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在此时看来,对资金流动进行控制的手段与实行食物配给一样陈旧。而1992年9月的“金融风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先是英国、然后是意大利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由于无法阻止私人投机商和机构投资者的经济行为,英镑被迫贬值。

这场全球经济中的变革,其优点是不言自明的。投资资金不再受到国与国边境、汇率制度或者本地货币的制约,只要有需要,资金就可以自由流动(并且可以预见其利润),到1990年,外国人已拥有德国34%的债务。但是这场变革也有弊端:在德国、法国和瑞典,制造商们的利润率受到高工资和管理高技能劳动力的成本的限制,现在,这些欧洲制造商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而且还在国外寻找适应性更强、更廉价的劳动力。 737

德国、英国和法国发现,直接将工厂设在海外,在巴西、尼日利亚或者罗马尼亚进行产品安装,然后将成品直接销往全球市场,比以前从贫穷的国家进口廉价劳动力要高效得多。这进一步加速了西欧的反现代化,加剧了许多地区的长期性失业问题,增加了失业补助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费用。

当位于法国摩泽尔的克勒兹瓦尔镇的最后一个煤矿在2004年关闭时,没有人认为矿工们可以找到固定工作。摩泽尔省的失业率一直在10%的工作人口中上下波动;再往北,与比利时交界的采矿小镇,其失业率是15%。整个法国在过去的30年里,特别是1980年以来,失去了150万份工业岗位工作。西班牙很快失去了以较落后国家的身份加入西欧而增加的相对优势,在向民主制转变的过程中,西班牙在20年内失去了60万份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处于经济衰退的高峰期,全国有44%低于25岁的劳动力失业。

失业问题不是个新问题。即使是拥有完善的福利网络的大部分欧盟国家,失业对个人和社区的经济影响不能和内战的破坏力相比(它们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另外一回事),但它与战争相比有其特殊之处,20世纪最后几年的经济混乱发生在物质富足时期,其社会代价是极其巨大的。私有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创造了大量财富(虽然相对而言不是很多);在某些地方,比如说伦敦或者巴塞罗那,其后果非常显著。因为距离缩短,电脑和电子媒体实现了交流速度的增加,关于他人生活的信息可以很快并且大量地向所有人传输。

正是这种贫穷和富裕、风险和繁荣、大众贫穷与私人富有之间的显著差异,才使得欧洲人对无法规范的自由市场和全球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虽然很多欧洲人是自己哀叹的这些变化的间接受益者)。过去,这种感情(加上来自工会和利己主义政客的压力)

也许会让人们选择后退到某种程度的有限保护主义。

138 但是现在政府的手被捆住了,而传统意义上的工会也不再存在。只有在法国,统一工会在公众舆论的帮助下,暂时阻止了国有公司对外出售。即便如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阻止公司私营,比如战后实行国有的电力巨头“法国电力公司”,其雇员就属于为数不多的大工会“法国总工会”成员。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即使欧洲能源市场都摆脱了政府管制,但法国电力公司仍然是国有企业。

但是法国总工会这个曾经的蓝领协会龙头,与它的前身相比,实力也大不如以前,整个法国工会运动从 1980 年以来就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会员,并且它代表的工人已经不再是法国或者其他地区典型的工人了。工作本身已经改变。在很多地区出现的是一种新型的“四等级”体系。它的上层是新职业阶层——大都市居民,世界公民,富裕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者——他们经常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联系,是新全球经济的受益者。然后是第二等级,也就是传统雇员的核心层级,他们分布在工厂、服务业或者是公众部门,工作有良好保障,仍然能享受许多传统利益和其他物质保证。

第三等级由小型企业和服务业组成,包括零售店店主,旅行社从业人员,裁缝,电器修理人员和类似人员,大部分由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充当(在法国是阿拉伯人,在德国是土耳其人或者库尔德人,在英国则是南亚人)。以上这 3 个等级的后面还必须加上数量庞大的、典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南欧灰色经济”。在意大利,从制鞋到纺织及其零部件制造经常是在政府的监督下生产和分配的,据估算,在 1997 年,“非正式”部门所做的贡献只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在葡萄牙,正式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 22%;但是在一些地区,如偏北地区的布拉加镇,“非正式”工人占当地劳动力的 45%。

接着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第四等级:雇用工人,他们无法既享受传统熟练工种的长期安全性,也不能享受 50 年代和 60 年代经济繁荣期的利益标准。的确,在一些地区(例如英国和荷兰),失业人数最终降到很低的水平:很多人认为这证明了自由市场的运作令人满意。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再把失业人员算在内,特别是女人和年轻人,因为他们工资低,从事没有奖金的兼职;或者是签订受国家政策支持 and 保护的固定合同。

39 很多无法靠低工资维持自身及其家庭开支的工人,仍然可以求助于国家的福利保障,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在英国,撒切尔主义对国家和社会影响最大的地区,1.4 亿人生活在贫困区,其中包括 400 万名儿童。^[19]六分之一的人依靠收入补助和家庭信贷计划而维持在贫困线之上。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在北欧曾彻底消失的无家可归者的数目又

[19] 1995 年,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英国五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德国是十分之一,而在丹麦是二十分之一。

一次上升:仅在伦敦地区,撒切尔时代的无家可归者就增长了 10 倍。到 90 年代中期,人数已经达到 8 万。英国首都离一些最昂贵的房地产相隔不远的几英里处,已经开始与维多利亚时期臭名昭著的“弃儿的伦敦”相似起来。〔20〕

过去,经济高涨可以让很多人摆脱贫困,包括拥有较高的收入,以及更有保障的工作,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欧洲是在富裕时期发展了下层阶级。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高兹在 20 世纪 60 年代预言的那样,在工业时代末,将出现临时的新工人阶级,他们属于“非工人的非阶级”,在现代生活中属于边缘,然而在本质上却属于现代生活的核心层。

和美国一样,欧洲的下层阶级不仅仅是由贫困和失业(或者是待业)决定的,而越来越多的的是由种族决定的:在 90 年代中期,伦敦年轻黑人的失业率是 51%。如果考虑到很多黑皮肤的荷兰人、德国人或者英国人都是当地出生的孩子,甚至是原先摩洛哥、土耳其或者巴基斯坦〔21〕移民的后代,那么世纪末的欧洲的穷人就是跨种族或者是“跨文化”的(现在已经习惯于这样描述)。相隔短短 20 年再回到像鹿特丹和莱塞斯特区这样使用双语的多种族小镇,很多人会惊讶不已。1998 年,在伦敦市区的公立中学里,白人孩子只占了一小部分。

欧洲的大城市(例如伦敦)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国际化都市了。如果说城市的高收入工作仍然由欧洲白种人(和北美洲人)完成,那么几乎所有的低收入工作,从街道清洁工到儿童保育员,现在不是由来自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传统“第二等级”的欧洲人完成,而是由那些“少数民族”——经常是黑人或者棕色人种——来做的,其中有很多人没有工作许可证。根据官方数据,住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的外国人在 1992 年至 2002 年的净增长了 740 70 万人;但是实际的数字还要高。

移民虽然在西欧一再受到阻止和严厉控制,但它仍然是个主要的人口因素:1998 年在伦敦市区生活的孩子中,有三分之一第一语言不是英语。通常这些孩子是难民和“寻求避难者”,南斯拉夫战争使这样的避难者人数激增;不过也有来自东亚和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很多地区的民工,他们中很多人是非法移民,所以也没有正式记录。

德国的避难设施是(并且仍然是)欧洲最慷慨的〔22〕,但是一般来说,移民要拿到公

〔20〕 持类似观点、但标准略有不同的剑桥政治学家约翰·道恩将富裕国家的劳动力作了区分——“一部分是在市场上完全可以照顾自己的人……一部分属于在联合行动中生存的单个成员,还有一些属于下层,因为没有人能支付他们的劳动力。”道恩《无理性的狡诈弄清政治的意义》(伦敦,2000)第 333 页。

〔21〕 作为政论家和时代人物,高兹认为,这个新的等级反过来会促使新一轮激进社会运动的爆发。但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什么迹象。

〔22〕 仅 1992 年,联邦德国就向将近 25 万南斯拉夫难民敞开了大门,英国吸纳了 4000 难民,而法国是 1000 人。

民资格仍然是很困难的,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只有500万移民(算上他们的家庭人口)取得了公民资格。在新世纪,大部分申请德国难民的人来自伊拉克、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国家,但是从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等国来的难民人数也越来越多。

因为担心西欧将会被“经济难民”(比如非法移民)、寻求避难者和类似人员“淹没”,人们对“欧盟扩大”缺少积极性。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德国的建筑业中存在大量无证波兰工人。但问题不在波兰、匈牙利或者其他中欧国家,而是它们东面的国家。1992年,波兰本国有29万“非正规”移民,大部分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苏联国家;只有1000万人口的匈牙利是10多万寻求避难者的家。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的生活是艰辛的,但还不是难以忍受,这些国家与他们的西方邻国之间的差距已经在缩短,但是速度很慢。中欧和其他“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差距则越来越大了。

于是,到90年代末,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平均月工资早已接近400美元,而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则徘徊在80美元左右;在保加利亚低于70美元;在摩尔多瓦只有30美元——这个平均数字还是有误导性质的,因为在它的首都基希讷乌之外,其他地方的收入更低,占人口48%的民众仍然靠土地生活。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状况不像波兰,甚至还不如保加利亚,没有多大改变:到2000年,每两个摩尔多瓦人中就有一个的年收入不到220美元——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9美元。

741 在这种情况下,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或者很多处于大都市圈之外的俄罗斯人的唯一选择就是在西欧寻找工作。结果,大量的移民,首先是年轻妇女,最后落入犯罪辛迪加的手里,他们由船只经罗马尼亚和巴尔干运送到西欧,情况最好的也就是在工厂和餐馆做契约工人,而最糟糕的,并且也是大多数,妇女移民通常沦为妓女;在德国、意大利甚至是波斯尼亚,高薪的西欧士兵、行政官员和“援助人员”都是她们的客户。这些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客籍工人”由此加入了罗马吉普赛人的行列,处于多文化阶层的最底端〔23〕。

性交易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很难发现的,和早些年从欧洲边缘地区过来的白人移民一样,她们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这也是警察和社会服务机构很难找到她们的原因。但是大多数法国社会学家和评论家们所描述的“被排除在外者”(即,被排挤的外来移民)是很容易发现的。这个新下层阶级不是被工作、而是被他们的“生存机会”排挤出来的:他们被排除在主流经济之外,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家安在城市边缘的简陋棚屋里,没有商店、社会服务和交通设施。2004年,由法国内政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23〕 20世纪末,欧洲的吉普赛人大约有500万——波兰5万,阿尔巴尼亚6万,匈牙利50万,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和捷克共和国大约各60万,罗马尼亚至少200万。在任何有吉普赛人居住的国家,偏见和虐待是很常见的(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入境)。

大约有 200 万这样的外来移民生活在大都市边缘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由于社会排挤、种族歧视和严重的家庭暴力而日益沦落为贫民窟。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区里,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 50%;受害最深的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人的后代年轻人。

通常这些下层阶级不是由肤色、而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来区分的。除了多元文化,在现在的欧盟里,宗教类别越来越多。基督教徒仍然占绝对多数,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做礼拜仪式。犹太教徒的人数较少,只在俄罗斯和法国较多,英国和匈牙利的人数就相对少得多。但是印度教徒,还有特别是穆斯林教徒,在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大城市、意大利和中欧等地方广为散布。在欧洲众多的世界性宗教中,伊斯兰教徒的人数在迅速上升。

直到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法国(大部分来自北非)和德国(主要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背景的人口)的穆斯林人口大约达到 600 万。再加上英国约有 200 万的穆斯林(大部分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意大利的众多穆斯林,使欧盟的穆斯林总共达到 1500 万人。

在穆斯林区有着很多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公共学校里应该如何规定宗教特色的着装和标志?政府在鼓励(或阻止)独立文化组织方面该起怎样的作用?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多元文化组织的发展(以利于各种文化独立发展)?或者说当局是否应该推动文化融合的进程?法国政府在政策上鼓励文化融合,但是禁止在学校里展示各种宗教标志。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英国和荷兰,对于文化差异和强烈的宗教自我意识则要包容得多。但是各国的人们对这一点持不同意见(详见第 23 章)。

随着新一代排外主义政党的发展,整个欧洲大陆可能会陷入愈来愈严重的紧张气氛中,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此类问题将被认为是政治议程上的首要问题,而且频频出现在就移民和收容问题引发的争论中。在这些排外主义团体中,一部分扎根于此前就存在的宗派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其他的,例如非常成功的丹麦人民党或荷兰的“皮姆·富图因特别党”,则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这些政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特别擅长激发“反移民”情绪。

无论是像“英国民族党”那样攻击“少数民族”,或是像法兰西“民族阵线党”的让-玛丽·勒庞那样抨击“移民者”(在德国,移民更多地被称为“外国人”或者“异族”),近年来,那些极右翼党派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大量批评。一方面,经济缓慢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给很多工薪阶层带来了终身难忘的经济危机感;另一方面,老牌左翼政治机构已无法通过各种阶级旗号来控制这种不安全感了。在原本法国共产党势力极强的地区,法兰西民族阵线能屡战告捷,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移民中外来文化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外国人同

国民一起分享社会福利,在对东方劳工敞开大门后,本土的工作机会竞争也将更加激烈)使新右翼党派如虎添翼。民粹党的蛊惑家们指责说“船已满载”(或者说,他们的政府已经放弃了对自己国境的控制,即对所谓的“世界利益”和“布鲁塞尔官僚”彻底让步),他们承诺将禁止移民,遣返那些“外国人”,让白人公民恢复原来地位,让外来者待在自己的国家。

与早期的法西斯主义相比,现在的仇视外族运动可算是相对温和的了。但是在 90 年代初,德国仍然出现了一系列因仇视外族和少数民族而引发的犯罪事件,这在当时引起了批评者们的广泛关注。君特·格拉斯就严厉指责西德在政治文化上表现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和冷漠无情,以及对“不合时宜”的统一的盲目热情,他认为那些得意而健忘的政治精英们该对种族主义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在原民主德国那些颓败的工业小镇,因为那里的人民仇视外国人的情绪最为强烈)负责。

但是,即便这些暴力事件得到控制,公众对新右翼势力的支持仍然值得注意。在年轻有为的领导人尤尔格·海德尔的带领下,邻国的奥地利自由党(其前身是战后出现的“独立者联盟”,所不同的是,在表面上它已消除了前者的纳粹成分)在民意测验中脱颖而出。该党派宣传自己代表着广大未能从两大党派双赢合作中受益、而且受到那些入侵本国的“罪犯”、“瘾君子”和其他“外国暴民”威胁的本国民众的利益。

为了防止触犯法律,海德尔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带上纳粹主义爱国色彩的行为。在大部分奥地利人(和让-玛丽·勒庞一样)眼里,海德尔表达偏见的方式非常隐晦,比如他会给在公众生活中冒犯他的人取绰号,而那个人只是碰巧是个犹太人。海德尔及其追随者对于战胜欧盟等新对手充满了信心,他曾说“奥地利人应该对欧盟、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任何国际意见充耳不闻,我们只需对自己的祖国效忠。”

在 1986 年的奥地利国会选举中,海德尔的自由党赢得了 9.7% 的选票。4 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 17%。在 1994 年 10 月的大选中,它获得的选票高达 23%,仅仅落后人民党 4 个百分点,而后者在战后执政长达 25 年,而且在当时仍然控制着奥地利的多个农业大省。更糟糕的是,海德尔在原本忠于社会党的工人阶级中也已深入人心。如果考虑到(根据 1995 年的民意调查)三分之一的奥地利人都认同海德尔的观点,认为“外籍劳工”和其他外来者在奥地利享受了太多的福利和特权,这样的结果是一点也不会让人惊讶的。

在 20 世纪末期,海德尔的影响达到顶峰。在 1999 年的大选中,自由党获得了 27% 的选票,成功地把人民党挤到第三大党的位置,与第一大党社会党的选票差距也缩小到 29 万张。2000 年 2 月,为了缓解奥地利的欧洲盟友们的担忧,人民党组建了一个与自由党合作(不包括海德尔自己)的联合政府。奥地利新总理沃尔夫冈·舒瑟尔做了一个精确的估算:自由党发起的是一场抗议运动,是一个反“特定社会群体”的政党,惯于“偷窃和

对普通民众撒谎”(援引自皮埃尔·蒲甲德,民粹派人士)。一旦进入对国家事务的实质性管理,自由党就会忙于处理各种公务杂事,还得对不得人心的政策承担责任,很快就会失去它的吸引力。在2002年的大选中,自由党只获得了10.1%的选票(而人民的得票率则上升到了43%)。在2004年的欧洲大选中,海德尔的自由党仅仅获得了6.4%的选票。

奥地利南部卡林西亚州州长尤尔格·海德尔从崭露头角到势力衰微,显示出排外政党的发展轨迹。在荷兰,2002年,“富图因特别党”因为领袖的遇刺,赢得了17%的支持率,跻身荷兰执政党之列,结果在之后的选举中,仅得到5%的微弱支持,国会席位也从42席锐减至8席。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支持率猛然陷入下跌状态,北方联盟趁机入主政府。 744

在丹麦,1995年还默默无闻的丹麦人民党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在2001年前已成为国会第三大党派。人民党从未执政,而且始终将焦点放在移民问题上,主席皮娅·克亚斯伽尔德以此集结影响力,渐成气候。丹麦两大党派——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在关于政治避难和对外国居民的法律的强硬度上打压对方。皮娅·克亚斯伽尔德在2001年的选举中获得12%的选票后曾这样宣称:“现在政府是我们的”。〔24〕

在某种角度来看,她的说法没有错。因为几乎没有主流的左翼或右翼政党敢在这些问题上“手软”,即便是势力较小的、但对政策能施加影响的英国民族党,也能在新工党政府的政策制定方面有一定的影子。这个以往处于边缘的小党,近期最好的表现仅仅是在伦敦东部的一个地区争取到7%的选民。在那里,孟加拉人取代了犹太人,成为当地主要的少数民族。4年后,该党在奥尔德姆的两个区获得11 643张选票(占14%)。奥尔德姆从前是兰开夏郡的磨房小镇,在选举前不久还爆发过种族动乱。

以上的数据跟欧洲大陆的发展比起来是无足轻重的,英国民族党距离赢得国会的一个席位的目标还很遥远,但民意测验表明了全国上下普遍焦虑不安的情绪。极右翼能够向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施压,使他进一步收紧英国原本就不宽松的移民和难民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之前2001年大选的民愿:一个在国会中占据压倒性席位的新工党和近1100万选民,本就该对一个新纳粹主义小党做此回应。该党在全国范围内只吸引了4.8万选民,是总票数的千分之二,只比“魔怪狂欢发疯党”多了4万张选票。

在法国又是另一番景象。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有两大优势,一是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排外移民政策,在1986年大选中有270万选民支持;二是具备善于将公众的不满情绪转化为集中愤怒和政治歧视的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实际上,在当年密特朗总统将政党

〔24〕 丹麦人民党由丹麦进步党分裂而来,是70年代反对税收运动的产物(参见第14章)但是它被新一代激进主义者认为是在欧盟和反移民问题上太“手软”。

- 45 名单比例代表制引入国民阵线前,极右势力从未如此风光过。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旨在带领国民阵线取得国会的成功,从而分裂并削弱法国主流的保守党派。

450 万选民在 1995 年的大选中支持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丽·勒庞,当他取得空前成功后,2002 年 4 月,这个数字攀升到了 480 万,以 17%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将时运不济的左翼法国社会党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淘汰出局。法国主流政客们得出结论,认为应该平息让-玛丽·勒庞的担忧,并承诺在“安全”和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来压制他的魅力,但同时容忍他的语言或者计划(“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其余人都应当遣送回国)。

勒庞同旧传统的极右翼政治关系密切,在青年时代就支持布亚德主义(主张用减税来保护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就参加过带有极右色彩的组织,出语谨慎地为维希政权和贝当政权辩护,他的行动如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同党们,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法西斯的念旧那么简单。当然,皮姆·福图因和克亚斯伽尔德也不属此列,因为两者都强调了保持国家传统上政治宽容的意愿,尽管面临着宗教狂热和新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文化的双重威胁。

奥地利的自由党不是纳粹运动,尤尔格·海德尔也不是希特勒。恰恰相反,他近乎卖弄地强调对战后社会的信任。他出生于 1950 年,反复提醒民众关于战后出生一代的天时地利。克里斯托夫·布洛克领导的瑞士人民党在 2003 年的一项反移民、反欧盟的投票中,夺得 28% 的支持率,与他类似的是,尤尔格·海德尔的部分成功归因于其先锋姿态,在全国以传播自由信念的形象出现,掩盖了其民族主义者之实。这一招对年轻的选民异常奏效,一时间,自由党成为奥地利最受 30 岁以下选民青睐的政党。[25]

- 奥地利和法国对移民(法国的移民来自南方,奥地利的移民则来自东面,那两个地区都曾经是这两个帝国的占领地)的恐惧和仇恨已经取代了反犹主义,成为维系右翼派别的纽带。但新的反对党也从别处获利:一身清白。他们没有上台执过政,未受到 90 年代
- 16 初困扰欧洲政坛的腐败问题的毒害。腐败问题不仅出现在罗马尼亚、波兰或者(首先是)俄国(在这些国家里,尚可以认为腐败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间接代价),还出现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腹地。

在意大利,据传基督教民主党与银行家、承包商、城市老板、政府雇员相处甚好,也获得了可观利益,而且根据广泛的流言,意大利黑手党新一代头目开始勇敢地打破在公众生活中几十年来的沉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2 年的米兰丑闻案让意大利社会党先倒台了。社会党名声扫地,前任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被迫穿越地中海,逃亡突尼斯。

[25] 在瑞士的德语行政区,普遍存在反移民偏见,而且这种种族主义不一定总是埋在地底下:有一张竞选海报上画的是一排黑皮肤的面孔,下面赫然写着这样的标题“瑞士人将成为黑人”。

但是,社会党的丑闻同他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基督教民主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丑闻事件后的逮捕浪潮和指控行动,更是让两个政党声名狼藉,他们在两代人40多年时间里建立的整个政治网络被颠覆。1994年的总统大选中,除了意大利前共产党和前法西斯党,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土崩瓦解——但是在这次政治风波中,最终得益的只有前歌唱家、品行不端的媒体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他步入政界更多地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业务不受影响,而不是继续深化意大利国内的政治清扫运动。

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政治生涯的结束则是因为另一类型的丑闻。9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世界日报》和《十六日报》上刊登了年轻记者的调查报告,指出冈萨雷斯政府参与1983年至1987年镇压巴斯克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政府允许和鼓励敢死队在“埃塔”活动范围内的西班牙境内和西班牙—法国边境的巴斯克地区实行绑架、拷问和暗杀行动(参见第14章)。

考虑到“埃塔”是个声名狼藉的恐怖组织,对该组织的镇压活动还不至于使魅力非凡的冈萨雷斯失去民心(由于佛朗哥政权晚期公众普遍愤世嫉俗的情绪,冈萨雷斯的很多同辈对国家和法律的看法都明显地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假如没有揭发渎职和有权势人物的话(他的社会党同事一直在宣扬,在这之后的意大利还出现很多例子),公众对不成熟的西班牙民主的道德状况就不会如此担忧。

在法国(或者在德国,或者在比利时),90年代频繁的丑闻丑化了政府形象,表明公共机构和道德的脆弱,但更显示出在现代社会实行民主的成本在不断上升。政治——包括职员,广告,顾问——的成本都很昂贵。在欧洲,政党的公共经费受到严格限制,经常只有在大选期间才有常务开支。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经费,在过去,政治家们就会求助于他们的赞助人——政党成员,工会(左翼)和私人企业家、私人企业。但是这些资源快穷尽了: 747
党员人数减少,工会影响力下降,越来越多的政党政策关注经济事务,所以那些公司和私人都觉得不必要向任何一个政党慷慨捐助。

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欧政党普遍开始或多或少地找寻吸引资金的出路。废除控制和商业全球化,使政治家们发现周围有更多的资金。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和英国的新工党一样,法国的戴高乐党和社会党在过去的20年里用一系列不正当手段募集资金,或者是通过出让利益,或者仅仅是在政策上向原先的赞助人倾斜。

在比利时,事态走得更远。在众多丑闻中,只需一件,即所谓的“达索—奥古斯塔事件”就可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比利时政府从意大利奥古斯塔公司订购了46架直升机,并让法国达索公司改装16架F-16战斗机。其他的竞标者都空手而回,这事件本身并不罕见,关键是三个国家的卷入使该事件带有泛欧洲的色彩。

后来就披露出比利时(当时执政的)社会党在两宗交易中拿到大量回扣的事件。很

快,得知太多内幕的社会党领导人安德烈·科尔斯于1991年在列日市的一个停车场被杀;另外一位叫艾蒂安·芒热的在1995被逮捕;第三位是比利时前总理威利·克拉斯,1994年至1995年任北约秘书长,在交易当时任外交部长,在1998年因替自己的政党收受贿赂遭逮捕。第四名嫌疑人雅克·勒菲伏尔是一名军官,也深陷其中,于1995年神秘死亡。

如果这是个典型的比利时故事(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比利时人没有生活,但并不是没有腐败”),也许是因为宪法权威的重复和力量削弱不仅导致政府监管失力,而且还使包括刑事司法体制在内的政府机关近乎瘫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在其他国家,鲜有个人贿赂的证据(大部分犯罪行为的实施实际上出于维护政党利益)[26],但是这也导致一些政府显要被迫结束任期,离开政治舞台。

这些人中不仅包括冈萨雷斯,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和基督教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些
748 领导人,还包括德国前总理、两德统一英雄赫尔穆特·科尔,他因拒绝透露自己政党基金的秘密捐助人而使自己名誉受损。如果没有公职的保护伞,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当时出任巴黎市长期间,其政党卷入渎职和任人唯亲的政治风波中)肯定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这些变化最显著的特点,也许就是它对整个政治体系带来的耻辱是微乎其微的。在大选中,选民人数的减少当然预示人们对公众事务普遍失去兴趣;但是在几十年前不断上升的弃权票和政治辩论的减少现象里,早就可以看出类似倾向。真正令人惊讶的不是新右翼的民粹党力量的崛起,而是他们从1989年以来利用了分裂,利用了人民的不满,却没有能力改变过去的欠佳政绩。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欧洲人也许已经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失去信心,但是在整个欧洲政府体系的核心中,有一点是大多数激进的反对派不敢攻击、而且可以让所有的人民保持普遍忠诚的。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欧盟,尽管它有很多方面的优点;也不是民主,因为民主太抽象,太朦胧,而且往往只是一种向往的目标;也不是自由或者法规(几十年来在西方一直没有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在欧盟各成员国的年轻一代中都被理所当然地认可)。真正把欧洲人凝聚在一起的(虽然他们可能对具体操作的某个方面深表怀疑),是与“美国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欧洲社会模式”。

[26] 只有艾迪特·克勒松(前法国社会党总理和前欧盟委员)是个例外,1999年,她被揭露滥用布鲁塞尔的特权,将自己以前的牙医作为私人高薪顾问,此举导致整个欧盟委员会名誉受损,集体辞职。

第 23 章

欧洲的多样性

我们的确智慧过人,所以能洞悉我们的时代;因为知道它的不足之处和 749
优势所在,因为聪慧,我们调整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我们不要毫无目的地
一味凝视渺茫的前方,要保持头脑冷静,稍稍环顾四周,
看看我们所处的复杂形势。
——托马斯·卡莱尔

造物主造出面积不大的欧洲,甚至又把她分成更小的部分,让我们高兴的
不是她的面积大小而是她的多样性。
——卡雷尔·恰佩克

在欧洲,我们是亚洲人;在亚洲,我们是欧洲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共产主义在欧洲下台了,苏联分崩离析,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还有整个大陆的政治体制和地理形态。45 年来——大多数欧洲人已经没有印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令人心神不安的阴霾挥之不去,欧洲的意外分裂和随之而来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这些影响已被一扫而空。回顾战后的几十年,欧洲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把战后这几十年看成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长期两极化)开端的话,战后这几十年其实就是:延续始于 1914 年欧洲内战的尾声,从阿尔道夫·希特勒战

败,到最后裁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未尽事宜之间的40年空白期。

随着1945—1989年这段历史的逝去,人们的期待也越来越美好。战后西欧“经济奇迹”令人欢欣鼓舞,它让该地区重返其曾在1914—1945年期间失去的世界贸易和生产的舞台。其经济增长率堪比19世纪末期。这的确是不小的成就,但也绝不是当代人所幻想的突飞猛进,一片欣欣向荣。

750 冷战是战后复苏的原因而非障碍。就像当年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一样,苏联帝国的阴影在震慑欧洲的同时,也让幸存的欧洲残余力量团结起来。当东欧国家解体时,西欧繁荣起来:西欧免于承担帮助曾经是古老大陆帝国的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义务;并且有美国军事大伞的保护,可以防止有人在政治上卷土重来。不过,在东欧国家看来,这向来都是井蛙之见。随着欧洲共产主义下台和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不复存在。

与此相反,作茧自缚却又洋洋得意的战后西欧——有经济区和自由贸易区,有可靠的外部联盟和众多的内部盟国——突然显得脆弱起来,一方面需要回应它东边的未来“欧洲居民”的受挫的期待,而同西边大洋彼岸的超级大国之间也不再是那种不言自明的依附关系。在描绘欧洲共同的未来时,西欧人不得不再一次承认欧洲大陆的大步向东迈进,他们必然会回归到欧洲共同的过去。

1945—1989年这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300年来,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都是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特征在1913—1945年间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20世纪上半叶,大约有6000万欧洲人死于战争和国家发动的杀戮。而在1945年到1989年,欧洲大陆没有爆发过国家之间的战争。〔1〕两代欧洲人至今都难以想象,和平是这么自然的事情,他们就是在这种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作为政治的延伸,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外包”给了所谓的第三世界。

值得回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邻国和平共处的同时,在国内却开展了一场形式独特、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严厉的检查制度,强加的匮乏和强行管制,但偶尔也会爆发公开冲突——值得一提的有:1953年的柏林冲突,1956年的布达佩斯冲突,1968年的布拉格冲突,1968年到1981年在波兰零零散散发生的冲突以及在随后的军事管制下发生的一些冲突。因而战后几十年的东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不过还是有说明作用的)。与过去相比,东欧也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平静时期,尽管是无意而为的。

随着新世界秩序(或混乱)的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很快成了人们的回忆。

〔1〕 即使把发生在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考虑在内,20世纪下半叶死于战争的欧洲人也不超过100万。

这个时代能否让人怀旧,能否让人感到遗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生于何时何地。铁幕两边生于60年代的孩子——他们是1946年到1951年间出生的婴儿潮那一代人的主要后继者——肯定会饱含感情地回顾“他们”那10年的美好记忆,并认为它意义非同一般,尽管这有点夸张。在西方,与以前的恐怖相比,至少他们的父辈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稳定和物质保障心怀感激。 751

60年代的人对那些年迈的传记作者们的自我膨胀是很反感的,而太年轻的人对此则没有什么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过的更年长的人们记忆中的场景,不仅仅是铁饭碗工作、低廉的租金和安全的街道,人才的浪费和希望的破灭更让他们记忆犹新。铁幕两侧的双方要从20世纪的瓦砾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和平、繁荣和安全是有的,但是人们先前乐观的信念却永远的消失了。

维也纳小说家、文艺批评家斯蒂芬·茨威格在1942年自杀前,曾写到对已经逝去的1914年前的欧洲的渴望,并表达了对“在信心时代尾声已不再年轻的人们”的同情。60年后,即20世纪末,几乎一切都已恢复或重建,但唯独茨威格那一代欧洲人带到本世纪的信心永远无法完全重建: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经历战争的欧洲人在想起巴黎“美丽时代”时,或许会低声抱怨“要是……该多好”;人们每每想起欧洲所经历的持续30年的灾难,绝大多数人的感觉就是“永远不要再有战争了”。〔2〕

简而言之,开弓没有回头箭。东欧的社会主义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错误答案。西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这场战争灾难。西欧是这样做的:把近代历史全然抛在一边,扼要概括了19世纪下半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比如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生产率逐步增长、对外贸易稳步扩大,然后冠以“欧洲”之名。然而,1989年后,繁荣的“后政治”的西欧又一次面对它的孪生兄弟东欧,“欧洲”不得不重新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并不一致赞成放弃“茧壳”。1993年,雅契克·库伦在为波兰杂志《政治》撰文时推测说“某些西方政治人物对旧世界秩序和苏联还是很怀旧的”,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但“旧世界秩序”——人们熟悉的过去40年的停滞不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人现在面临的不仅是未卜的前途,还有变幻莫测的历史。近来曾经简单明了的事情现在又一次变得复杂难懂了。到了20世纪末期,在欧亚大陆西部海角的5亿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集体质问他们的身份。谁是欧洲人?做欧洲人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欧洲?欧洲人想让欧洲成为什么样? 752

〔2〕 雷蒙·阿隆(生于1905年)和茨威格有总值相同的愁闷的记忆——如果算不上绝望的话:“从此中产阶级欧洲在7月进入了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纪,人类对历史发展的方向已失去控制。”

分析“欧洲”的本质不会有多大收获。“欧洲概念”这一本身就颇具争议的话题历史久远,有些概念还颇负盛名。在各种会议和条约中反复重申的某一欧洲“概念”虽然能让已吸纳多数欧洲国家为成员的欧盟信息灵通,但是通过欧盟还只能了解到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如今这样一个人口变迁、调整和移民时期,欧洲人口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更具多样性。也只有在承认这种多样性、并绘制出他们共同的轮廓、划定他们是否具有欧洲身份和欧洲经历的分界线之后,才能去描述 21 世纪初期欧洲人的共同特点。

“绘制”一词需谨慎用,因为欧洲毕竟是一个国家间的边界一直都处于轻微变动中的地方。罗马和拜占庭,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欧洲这些古代帝国的边界和后来的政治分界线密切吻合,这表明了真实的连续性:日耳曼民族统治下的欧洲和斯拉夫民族统治下的欧洲相通的地方,对此我们和诸如 11 世纪不来梅的作家亚当一样地熟悉;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统治下的边界从波兰延伸至塞尔维亚,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景况并无二致;易北河把欧洲一分为二,分成东西两部分,如果 9 世纪加洛林王朝的行政官员按照这种方法思考的话,他们对这一概念也不会陌生。

这些设定已久的边界线是否能够引导我们去探寻欧洲,总是取决于你站在何处。18 世纪前,数百年里大多数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都信奉天主教,其中很多人讲德语。但对于开明的奥地利人,“亚洲”一词在向东驶出维也纳的联邦公路上就出现了。1787 年,当莫扎特从维也纳行进,通往布拉格的时候,他在描述说,他正跨越东方边界。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这一堵墙就像地图上的分界线一样,在我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

欧洲的大部分区域是到了近代才被分裂成不同国家的,之前是统一在不同的帝国之下。知道这一点,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欧洲大陆的外部标志并不标明边界,而是表示不确定的边界区域——有争议的边界地区(marches, 英语),罗马帝国的长城(limes, 法语),军事边界(militärgrenze, 德语),地区(krajina, 捷克语):皇家征服区和殖民地,虽然在地形测量上并非总是毫厘不爽,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却界限森严。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这些地区是既脆弱又敏感的区域,其居民数百年来一直都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前哨阵地保卫者。在这里,熟悉的世界到此为止,未开化的人被拒之门外。

这些边境地区经常随时间和环境而变迁:地理标志也具有迷惑性。波兰人、立陶宛人
153 和乌克兰人在历史文献和政治神话中都是以欧洲(或者基督教)保卫者的身份出现的。〔3〕稍微看看地图就知道他们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都是对的。无独有偶,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相互竞争的故事也是如此。同样,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坚持

〔3〕 应该注意的是,很多波兰人也坚持认为波兰是欧洲的中心——这显然颇具争议。

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南部边界构成文明欧洲的外部防御线。

这种争执不下的状况,恰恰表明了欧洲的外部边界在几个世纪以来对于感兴趣的政党意义非凡,在他们的竞选宣言中都表示了要把这部分边界归于本国的紧急性。身处欧洲有一种安全感:它是一种避难和包容的保证,至少是一种承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越来越成为一种集体身份。作为一个边界国家,作为一个欧洲文明核心价值观的榜样和保卫者,它既脆弱又让人感到自豪:这就是为什么被欧洲排斥和遗忘的感觉,加上苏联的统治,对中东欧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奇耻大辱的原因。

与其说欧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绝对版图,还不如说它是相对的,因为他们都相互关联。20世纪末期,来自摩尔多瓦、乌克兰或者亚美尼亚的作家和政治家们都宣称自己有“欧洲属性”,这并非基于历史或版图的考虑(似乎有道理,也许没道理),准确地来讲是基于对历史和版图的保卫。总之,摆脱了莫斯科帝国的统治,这些像后帝国孤儿一样的国家在寻找另一个“帝国”首都:布鲁塞尔〔4〕。

这些外围国家渴望从新欧洲的包容中得到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果被欧洲排斥在外,他们能承担起多少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在新世纪初的几年,甚至连最普通的游客都已很清楚地感受到了被欧洲排斥的种种迹象。在纳粹和苏联统治下,欧洲一些像乌克兰的塞尔诺维茨和摩尔多瓦的基希讷乌一样的城市里,曾是国际和欧洲共有的一切早已消失殆尽。周围的乡村呈现出一片进入现代化之前的社会状态——路是土路,车是马车,饮水来自户外水井,脚上穿的是毡靴,四周一片寂静,夜空一片漆黑。〔5〕认同欧洲,不是认同那一段早已被完全破坏掉了的历史,而是认同欧洲共同的未来,不管它的希望多么渺茫。

担心被欧洲遗弃的不限于欧洲大陆外围国家,从讲罗马尼亚语的摩尔多瓦人的角度看,他们罗马尼亚西部的邻居算是受到了历史的眷顾。不像摩尔多瓦,如果它们不是加入 754 欧盟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西方会认为他们是合法的,因而确保了成为欧洲一员的希望。但在布加勒斯特看来却不是这样的:处于被欧洲遗弃的危险之中的是罗马尼亚自己。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同事们终于开始反对他,他们写信控诉领袖试图把他们的国家从欧洲分裂出去:“罗马尼亚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欧洲国家……你已经开始改变乡村地区,但是你没有能力把罗马尼亚搬到非洲去。”同年,罗马尼亚年迈的剧作家尤金·尤奈斯库这样

〔4〕 阿尔巴尼亚族的科索沃人也是如此。由北约组织帮助从塞尔维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之后,他们渴望独立的国家状态,虽不奢望民族的雄心壮志,但至少保证不再受塞尔维亚压迫,也不被欧洲排斥在外。

〔5〕 安娜·里德《边疆·乌克兰历史之旅》(2000),第20页。由此使“欧洲”这个地方成了2004年12月乌克兰革命中的语言和希望。

描写他所出生的国家——“即将永远离开欧洲,这意味着远离历史”。这种担心并不是现在才有的:1972年,齐奥兰在回顾本国令人忧郁的历史时,对罗马尼亚普遍的缺乏安全感的回应是:“让我最沮丧的是土耳其帝国的地图。看着它我就想到了我们的过去和其他的一切。”〔6〕

和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及其他人一样,罗马尼亚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核心”欧洲把他们看作局外人(当从整体上看时);一边保护性地声称自己有原本欧洲的特点(在文学、建筑、地貌等方面);一边又承认他们的事业没有希望,会逃往西方。在东欧共产主义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两种反应都很明显。2001年7月,当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纳斯塔塞在为法国《世界报》的读者描述罗马尼亚人带给欧洲的“附加价值”的时候,因非法穿越波兰—德国边界而被捕的外国人中,超过一半都是罗马尼亚人。新世纪初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52%的保加利亚人说(绝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从保加利亚移民出去——最好去“欧洲”。

这种成为别人中心的边缘的感觉,成为二流欧洲国家的感觉,大多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他们几乎都在托马斯·马萨里克所预见要形成的小国家区域内,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角到马塔潘角。但这种情况并非向来如此。在近代,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至少在经济上、语言上、文化上也曾处于边缘化。诗人爱德温·缪尔童年时期,于1901年从奥克尼郡迁到格拉斯哥,他这样描述这次搬迁:150年的历史在两天的旅程中一掠而过。这种情愫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不过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欧洲边缘上一些包括西西里岛、爱尔兰岛、北苏格兰岛和拉普兰在内的高地和岛屿之间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多,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它们与欧洲中心繁荣的大都会地区之间的共同点。

甚至现在——尤其是现在——错误的边界作为划分国家的边境是靠不住的。波罗的海国家议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波罗的海国家议会成立于1992年,它涵盖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成员有: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3个波罗的海的前苏联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德国、波兰、俄罗斯(从1995年起,以暴力对待地理划分,但受到位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冰岛的对峙)。这种具有象征性地重申古代密切贸易关系的做法,受到曾经是汉萨同盟(商业同业公会的)成员的城市(例如汉堡市和吕贝克市)的欣赏,甚至更受塔林和格但斯克的市政首长们的欢迎,因为他们都急于把自己置于重建的(这是西方的口吻)波罗的海社区的中心位置,并远离欧洲大陆腹地和近代历史。

对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和波兰的其他地区——来说,波罗的海的意义微不足道。相反,例如近些年来,从旅游业挣外汇的前景诱使克拉科夫不得不重视南部的定位:

〔6〕 参见托尼·朱特的“罗马尼亚:底层”,《纽约周刊》,2001年11月1日。

将自己视为哈布斯堡王朝首都“加利西亚”的化身,并以此在旅游市场推广。慕尼黑和维也纳虽然都在为跨界工业投资而竞争,但它们却发现了一份共同的阿尔卑斯山遗产,这得益于南巴伐利亚和萨尔茨堡、蒂罗尔之间边界的消失。

很显然,地区文化差异很重要,但是经济差距更重要。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所共有的不只是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和阿尔卑斯山的风景:近几十年来,二者依靠科技而非劳动,转变为高工资收入的经济模式,在生产力和经济繁荣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更北方的老工业区。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或卡塔罗尼亚)、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埃米利亚-罗曼尼亚、法国的罗讷-阿尔卑斯山地区和法兰西岛、德国南部、奥地利、瑞士、卢森堡、比利时的佛兰德斯的部分地区共同构成了欧洲经济特区。

尽管东欧集团的绝对贫困水平和经济劣势仍是最高的,但最鲜明的对比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家之间。这种情况就像在西班牙的南部一样,意大利的西西里以及南意大利,他们和过去几十年一样,仍旧远远落后于蓬勃发展的北方:20 世纪 90 年代末,意大利南部的失业率是佛罗伦萨北部的 3 倍,而南、北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事实上比 20 世纪 50 年代还要大。

英国同样如此,富裕的东南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正在逐步扩大。当然,伦敦是迅速发展了。虽然不属于欧元区,但英国首都仍是欧洲大陆无可挑战的金融中心,并呈现出一副光鲜耀人、高科技的景象;相比之下,其他欧洲城市显得寒酸邋遢而且像中世纪一样破旧不堪。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相比,伦敦到处都是年轻的职业人士,对国际文化和语言的变化更加开放。20 世纪末的伦敦似乎有重返 60 年代多姿多彩光辉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布莱尔政府把英国重新打造成“酷不列颠”。

但是光鲜如薄纸。在这个欧洲最拥挤不堪的大都市里,房地产市场充满泡沫,公交车司机、护士、清洁工、中小学教师、警察,这些曾经为大都市新英国人提供服务的人再也买不起他们附近的房子了,只能去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找安居之所,这些人充其量也就是能沿着欧洲最拥挤的道路上下班,或是去乘坐既昂贵又破旧的轨道交通。在大伦敦区外围以外,它的触角已延伸到偏远的东南部乡村地区,这里出现了英国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地区差异。

20 世纪末,英格兰 10 个行政区中只有 3 个(伦敦、东南区、东英吉利亚)达到或超过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全国其他地区更贫穷,有的更是穷得厉害。英格兰东北区曾经是英国矿业和航运业的心脏地带,该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伦敦的 60%。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乡村地区、意大利南部、德国前社会主义地区之后,英国是 2000 年欧盟结构基金的最大受益者——也就是说,英国的部分地区也在欧盟最贫困的地区之列。英国的中等失业率是撒切尔和布莱尔政府大肆宣扬的值得骄傲的地方,但繁荣的首都发展不

成比例,英格兰北部的失业率几乎接近欧洲大陆的最高水平,这使得让人骄傲的地方顿然失色。

公共政策方面的考虑不周,使英国本来就明显的地区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但这也是工业时代末期可以预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德国,类似的差距是政治决策的直接结果,即便不是有意为之的。吸收东德加入统一的德国,从1991年到2004年,花去了联邦德国1万亿欧元的迁移和经济援助费用。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德国东部地区远远没有能够企及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事实上比西方国家更加落后。

当德国私有公司在斯洛伐克或波兰能找到更好的、工资更低的工人时(还有更好的交通设施和地方服务),他们是不想落户东部的萨克逊州和梅克伦堡州的。老龄化的人口、糟糕的教育、低下的购买力、熟练工人的西飞,遗留下来的那些人又对外国人充满难以改变的敌意,这一切都意味着东部德国对于国外投资者没有吸引力,更何况这些投资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以选择。2004年,前西德的失业率是8.5%,而东部超过了19%。同年9月,新纳粹国家民主党赢得了9%的选票,并把12个代表席位归还给萨克逊的议会。

57 在德国把西德人和东德人分开的、相互憎恨的鸿沟不仅仅是有无工作或者穷与富,但是在东部人眼里,这是最明显的、也是最痛苦的症状。和新欧洲的其他人一样,德国人越来越被一些新奇的差异区分开来,这些差异打乱了传统上的地界和经济划分。站在分界线一侧的是老练的欧洲精英:主要是年轻人,不分男女,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可能在欧洲的2个甚至3个不同的大学学习过。他们的素质和专业能够让他们在欧盟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从哥本哈根到都灵,从巴塞罗那到法兰克福。高收入、低飞机票价、开放的边界和综合性轨道交通网络(参见下文)使得流动变得容易而频繁。为了消费、休闲、娱乐和就业,这些欧洲新人类在欧洲大陆四处游走,轻松自在,信心十足,就像游走于波洛尼亚、萨拉曼卡和牛津的中世纪教士一样,他们用一种国际通用语交流:在当时用拉丁语,现在用英语。

在分界线的另一侧,绝大多数人仍旧是那些不能成为勇敢的新大陆成员的人们,或许他们不想加入(或者还没有决定加入?)——千百万欧洲人因缺乏技能、教育、训练、机遇和方法,而只能固守原地。这些男男女女就像是新的中世纪式的农奴一样,无法轻松地从欧盟市场提供的商品、服务和劳动中受益。相反地,他们只能停留在本国或当地的社区;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熟悉,又不懂外语,这些情况都对他们造成了条件限制。他们通常比那些国际大都市的同胞们对欧洲怀有更多的敌意。

这种新的国际阶级界限使得旧的国家差距开始模糊起来,而这种新界限有两个明显

的例外。对于来自东欧做零活的工匠和劳工们来说,伦敦或汉堡或巴塞罗那的新工作机会和早已形成的使用流动工人和季节性海外雇佣的传统密切相连。向来都是男人(主要是男人)到遥远的国家去找工作:不懂外语,雇主对他们充满敌意,抱有怀疑,无论如何也要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钱带回家。这并非欧洲所独有的特点,就像土耳其的汽车工人或塞内加尔的小商小贩一样,斯洛伐克的油漆工也不大可能在布鲁塞尔外出就餐、在意大利度假,或在伦敦购物。即使如此,这显然也是一种欧洲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例外是英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反对欧盟整合、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臭名昭著的英格兰人。由于国内生活状况不好而被迫到国外,加上后撒切尔时代费用低廉的航空公司能把他们运送到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其费用之低,有时候还不及小酒馆的一顿午餐,他们所受的教育虽然比不上父辈,但是新一代的英国人迈进了21世纪,在欧洲人当中,他们如果称不上跑遍全世界,也算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了。英国人普遍蔑视、不信任欧洲的公共机构和理想,而英国人又想在欧洲的这些地方欢度时光、购物消费,这两种现象并存所形成的种种讽刺,在观察家们看来并没有消失,而且依然是复杂难懂、奇异古怪的。 758

但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用不着学习外语,因为他们讲的就是英语。欧洲其他地方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如上面提到的),这很快成了欧洲的首要身份标签、个人社会地位和集体文化力的衡量标准。在丹麦或者荷兰这样的小国家,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几乎没有外国人讲的单一语言,成了该国发展的最大障碍。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生正在用英语学习,而丹麦地方小镇上银行的大多数年轻职员还达不到用英语顺畅处理事务的水平。和很多欧洲小国家一样,在丹麦和荷兰,如果学生和银行职员看的英语电视节目没有配音的话,他们早就能流利地使用英语了,至少是能被动地使用。

在瑞士,凡是达到初中学历的,通常都会掌握三四种地方语言。但是当他们和来自本国其他地方的人进行交流时,还是用英语(非母语)更容易,也更熟练。同样,在比利时,很少看到瓦龙人或佛兰芒人能用对方的语言很舒畅地进行交流,双方都会很自然的把英语作为通用的交流媒介。

有些国家,政府出面要求学习地方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或巴斯克语。在这样的国家,年轻人(在欧洲,都知道他们是“E一代”)出于责任去学习地方语言,但是在自由时间里仍讲英语,以显示青少年的叛逆、愤世嫉俗和文明的个人兴趣。失败、落寞的是本国的民族语言,而不是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虽然它们在历史上没有什么记载,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未来。当英语成为交流媒介的默认选择时,主要语言只好退居二线了。和葡萄牙语或意大利语一样,西班牙语作为欧洲独特的语言,已不再广泛地被西班牙人以外的人们所学;西班牙语能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外的地方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得以保留,还多亏了西班牙

牙语作为欧盟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7〕。

159 德语在欧洲语言联盟中也很快失去了地位。曾几何时,凡是参加国际科学或学术团体的人都必须能用德语阅读。德语和法语一起,曾是文明欧洲的通用语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时,在日常生活中,从斯特拉斯堡到里加,德语的使用一直都比法语更广泛〔8〕。然而随着对犹太人的迫害,德国人被驱逐出去,然后苏联人来了,中欧和东欧突然也不再使用德语。城市里老一代人虽然还继续阅读德文、说德语,但只是偶尔使用。在特兰西瓦尼亚偏僻的德语社区和别的地方,德语已经沦为边缘语言,实际使用频率非常有限,因为其他人都在学习俄语,或在教授俄语。

一旦把俄语和苏联入侵联系起来,俄语的吸引力就会被大大降低,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的语言和俄语很相近,他们学习俄语还是很容易的。作为苏联附属国的居民,学习俄语纯属被迫,大多数人并未努力去掌握这种语言,而用俄语口头交流的更少,除非是不得不说。〔9〕在社会主义大厦倒塌后的几年里,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所造成的一个似非而是的后果日渐清晰:曾被侵占过的国家都不再学习德语和俄语。在这些被苏联和德国长期侵占的地方,现在只有一种外语最重要。在1989年后的东欧,要想成为“欧洲人”,必须讲英语,对于年轻人尤其如此。

即使在以德语为母语的奥地利、瑞士或者德国,德语的地位也正在逐步降低,被逐步地方化。即使是从德语派生出来的其他语言,比如荷兰语,也因此受到牵连,而不再被人们广泛地学习和使用。这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为此悲伤毫无意义。在90年代,像西门子这样的德国大公司,也不得不将英语作为公司的工作语言。对于德国的政治家和企业老总而言,能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交圈中应对自如的人即可成为知名人士。

法语的衰落则另有原因。作为最普通的日常语言,自从王家贵族统治结束后,法语在欧洲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在法国本土以外,只有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瑞士人,再加上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和西班牙比利牛斯山的一些袖珍型社区的居民——区区几百万人口——把法语当作母语,况且他们多数是以方言的形式讲法语。这种方言受到了法兰西学院官方人士的鄙视。按照严格的统计数据,和德语或俄语相比,法语早已沦落在欧洲语言圈的边缘了。

60 自从拉丁语衰落之后,法语就成了国际都市精英的语言,因此也是欧洲最纯正的语言。然而在20世纪初,当第一次有人提出把法语教学作为牛津大学现代语言教学大纲

〔7〕 西班牙语作为从圣地亚哥到旧金山的几千万美洲人的通用语言,它的国际地位还是安全的。葡萄牙语也是如此,至少是独特的巴西式的葡萄牙语。

〔8〕 罗马尼亚是个例外,在那里,情况正好相反,法语的支持者要多得多。

〔9〕 保加利亚是例外,在那里,俄罗斯和它的语言总是比在其他地方更受欢迎。

的一部分时,不止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反对这一想法。他们反对的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凡是能进这所大学的学生,其法语都已经很流利了。到了20世纪的中期,在研究院和大使馆,很多人仍旧广泛地提出类似设想——如果算不上大胆提出的话。而笔者也曾在1970年建议,法语有必要、也有能力作为从巴塞罗那到伊斯坦布尔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媒介。

不到30年时间,这一切都变了。到2000年,法语不再是确定的国际交流的媒介,甚至在精英们之间也是如此。只有在英国、爱尔兰、罗马尼亚,法语才作为第一外语被推荐给中小学生,其他人则都在学习英语。在前欧洲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些地方学校,法语甚至连第二外语都排不上,取而代之的是德语。在存在多种通用语言的国度里讲法语的人——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讲法语的团体,他们大多来自以前的殖民地——在世界舞台上还使用法语;但是在法语的故乡——欧洲,法语的衰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能也是无可挽救的。

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早期曾将法语定为它的官方语言,在该委员会中,母语是法语的人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心理优势和实际应用的优势,但是如今这里的情形也不同了。这一改变的原因,与其说是英国的加入——这些来自伦敦的、临时调任的公务员都能流利地讲法语——还不如说是能流利地讲英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到来、讲德语的团体的扩张(多亏了德国统一和奥地利的人盟),他们打破了战后的沉默;再有就是来自东欧的未来的新成员。尽管有同声传译(覆盖25个成员国之间420种可能的语言组合),但是对于希望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的成员国来说,在欧盟3种核心语言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必不可少的。而法语现在正处于次要地位。

然而法国人不像德国人,法国政府不会为了确保自己在商业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转而使用英语。虽然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学习英语,并且为使用英语还去国外旅游,法国官方的立场是毅然决然地防御。毫无疑问,部分程度上是由于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而导致该国语言的衰落;而英国却免遭此难,因为美国人讲的也是英语。这是一种令法国人尴尬的巧合。

面对法语地位降低的种种迹象,法国人最初的反应是,坚持认为其他人还继续讲法语:正如总统乔治·蓬皮杜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说的:“如果法语不再是欧洲的主要工作语言,那么欧洲本身将不再是完整的欧洲。”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选择了“围困精神”:如果在法国以外没有人再讲法语的话,那法语至少 761
至少在法国本土应该有绝对的垄断。1992年7月,包括作家雷吉斯·德布雷、阿兰·芬克尔克罗、让·杜图尔、马克斯·加洛、菲利普·索莱尔斯在内的250位知名人士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法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在法国本土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上使用

法语,由法国投资拍摄的电影要用法语,等等。他们还告诫说,若不这样做的话,“英国佬们”就要让我们都说英语或者“美语”了。

如果只是为了面子,任何有说服力的法国政府都不会通过立法来强制使用法语。社会党文化部部长凯瑟琳·塔斯卡曾断言:“在国际组织中,在科学领域,甚至在我们城市的墙上,一场为法语进行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两年后,一位保守的文化部长雅克·杜邦继承了这一主张,并把塔斯卡留下的、未被提出的主张明确无误地提了出来:让人焦虑的不仅仅是法语的衰落,而且还有英语的霸权,而后者最为重要。如果法国人学习英语之外的别的语言,哪怕是任何一种,都可能会好些:“当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去深入理解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或者俄语时,他们为什么要去学习在任何年龄都能学会的贫乏的英语呢?”杜邦曾这样质问。

杜邦把英语轻蔑地称为“商业英语”,而正是这“商业英语”正在取代法语的地位(法语是“最重要的资本,是法国人民尊严的象征”)。但是当杜邦瞄准他的靶子——英语时,英语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之外了。像米歇尔·塞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预见性地抱怨,巴黎在被德国占领时期,其街头的德语名称还不及现如今英语名称多,但是在电影、各种电视秀、电视电脑游戏、互联网和国际流行音乐的影响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对法语的关心少得不能再少了,他们即使用法国俚语进行手机通话,其中也充斥着舶来语或改编过的词汇。

法律试图强制法国人之间相互讲法语,这或许是可以的——虽然大多是在被违反时才被重视。但当外国学者、商人、智囊团成员、律师、建筑师和其他人聚集在法国时,也要求他们用法语表达他们的想法或者去理解别人用法语表达的想法,只会产生一种结果:他们会把生意和自己的想法带到别的地方去。在新旧世纪之交时,现实才被了解,而大多数(当然绝对不可能是所有的)公众人物和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接受21世纪欧洲的残酷现实:新欧洲的精英们,无论他们是谁,过去未讲法语,将来也不会讲法语了——“欧洲”不再受法国的掌控。

在第二个千禧年的末尾,为了弄清欧洲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和以前一样,很容易被诱惑去追溯它的内部分割、不和、决裂——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欧洲大陆分裂较深的现代历史和相互重叠的团体、身份、历史的多样性。欧洲人对自己身份和生活的看法取决于让他们团结的事情,也同样取决于让他们分裂的事情——而且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凭借这种“长期亲密联盟”,欧洲人把自己捆绑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开明的领导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这种联盟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结成联盟以后产生的、比以往更

密集的交通网络。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包括桥梁、隧道、公路、火车和渡口在内的欧洲内部交通基础设施被新建或扩建。其变化之大让人难以辨认。现在欧洲人拥有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最安全的铁路系统(饱受诟病的英国铁路系统除外)。

欧洲大陆比较拥挤,城市间距相对较短,与空中交通相比,地面交通更受欢迎,所以铁路成为无可争议的持续的公共投资目标。就是曾经聚集在申根的那些国家,现在正在欧盟的强力支持下,合作铺设一条延长的、改良的高速铁路,从马德里到罗马,再到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计划向北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向东横穿中欧。即使在永远不会赞成法国高速列车、德国城际快车和意大利欧洲之星列车^[10]的地区和国家,欧洲人现在也可以通行全欧洲大陆了——不一定比以前快,但是障碍比以前少多了。

和在19世纪时一样,欧洲铁路改革是以享受不到铁路服务的城镇和地区为代价的,这是冒着失去市场和人口的危险、也冒着落后于比他们更幸运的竞争对手的危险而进行的改革。但现在也有一个广阔的高速公路网——除了前苏联、南巴尔干、波兰和罗马尼亚最穷困的省份,大部分欧洲人都可以使用小汽车。加上水翼船渡口和解除管制的航空公司,这些变化让人们在一个城市居住,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在别的地方购物、娱乐的远景不远了——费用并不总是很低廉,但效率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欧洲的年轻家庭想在马尔默(瑞典)居住、在哥本哈根(丹麦)工作;或者往返于弗莱堡(德国)和斯特拉斯堡(法国),或者甚至跨越大海,往返于伦敦和鹿特丹;或者从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到维也纳(奥地利),让曾经平淡无奇的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复苏了,一个真正完整的欧洲正在形成。

由于移动性越来越强,现在欧洲人比过去更加了解对方。他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旅游、交流,但是有些欧洲人比其他人更平等。两个半世纪以前,伏尔泰曾经把欧洲人分为“主动去了解”和“等着被了解”两类,这种区别延续至今。权力、繁荣和各种机构在欧洲大陆最西部的角落里聚集。心理上的欧洲版图——欧洲人头脑里的版图——有一个由“真正”的欧洲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地处边缘,如瑞典)形成的核心,这些国家的宪法的、法律的和文化的价值观被视为次要的、但是有抱负的欧洲国家的典范:找回过去的、真正的自我。^[11]

人们期待着东欧人去了解西欧。而事实正好相反,是西欧人去了解东欧了,但是了解的方式并不总是受人欢迎。并不只是贫穷的东欧和南欧人一路向北、向西去出卖他们的劳动或者身体。本世纪末,某些东欧城市作为重新被发现的、迷失的中欧前哨的吸

[10] 分别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王牌高速列车。

[11] 2004年6月,笔者收到在位于萨格勒布的外交部采访的一位记者的好消息:“这里情况良好。克罗地亚已经收到加入欧盟的邀请。这将改变很多人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s)。”

引力已经消失殆尽之后,它们又重新投身于有利可图的、瞄准机会的市场,如廉价而花哨的度假胜地,接待来自西欧的低档次的旅游团。塔林和布拉格是英国“全男人航班”的聚集地,只需带简单行李去度周末,花费不大,英国人可以在此饮酒作乐,花天酒地,享受廉价的性服务。塔林和布拉格这样的名声并不值得羡慕。

旅行社和旅游组织机构报告说,曾经满足于旅游景点黑泽或者更近些时候的旅游热点本迪铎的游客们,现在对于东欧异国情调的款待可谓是兴高采烈,热情高涨。同样,英国人也已上路了——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很多国家仍有异国情调。1991年,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一家名为《文化报》的周报对保加利亚人对于哪国的文化感到最亲近这一问题进行问卷调查:18%的人回答“法国的”,11%的人回答“德国的”(15%的人回答“美国的”)。只有1.3%的人承认对“英国文化”有亲近感。

764 因为统一后的悲伤,无可争议的欧洲中心仍旧是德国:在人口和产量上德国都是欧盟最大的国家,它才是“核心欧洲”的核心,从阿登纳到施罗德的每一位总理都坚持这样认为。德国还是唯一的一个对以前的分割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多亏了两德统一、移民和联邦政府的形成,大柏林地区的面积目前是巴黎面积的3倍——这是欧盟两个领袖成员国相对常设的标志。德国主导欧洲经济,它是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有三分之二的净收入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尽管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德国人是欧盟中最忠诚的居民。德国的政治家们周期性地建议建造国家间的“快速通道”,用于欧洲完全一体化,实现联邦欧洲,但对它的合作者们的一再拖延也只能表示出毫不掩饰的沮丧。

如果德国——更早一点,延续伏尔泰所说的比喻的话——是最“了解”欧洲的国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另外两个前帝国主义国家最应该一直坚持被“了解”,这也没什么不合适。和德国一样,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欧洲事务中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然而,现在却有很多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生活在德国社区,这让他们很不舒服:被取代的独裁政权的继承人现在沦为受人憎恨的、脆弱的少数者,而且还生活在别的国家,重返帝国的要求遭到了普遍拒绝。据估计,在90年代末期,有1亿多俄罗斯人生活在境外,生活在东欧的独立国家里〔12〕。

但是类似情况并未延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亚欧帝国,而不是欧洲国家。先前

〔12〕 生活在21世纪的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西伯利亚的匈牙利人是另外一总值更少的后帝国的少数民族成员:曾经主宰一切,现在软弱无比。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伏伊伏丁那地区,匈牙利人曾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不断地受到攻击,塞尔维亚的年轻人故意破坏他们的财产。贝尔格莱德当局似乎没有从90年代的灾难中吸取任何教训,而且什么也都不曾忘记。当局对此事的回应让人沮丧,也是可以预料到的:攻击不是“很严重”,而且是“他们”先挑起来的。

的苏联只顾忙于发生在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叛乱,又疏远了欧洲的其他国家,俄罗斯得以为继,全靠一些新的缓冲国,例如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以及越来越不自由的国内政治。俄罗斯加入欧盟是不可能的:欧盟新成员必须在法律规则、公民权利和自由、公共机构透明度上和“欧洲价值观”保持一致,而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莫斯科根本不承认这些价值观,也更少执行它们^[13]。不管怎样,与加入欧盟相比,俄罗斯当局更感兴趣的是铺设管道,向欧盟出售天然气。很多俄罗斯人,包括西部城市的居民,并不是本能地认为他们是欧洲人:当他们去西方国家旅游时,(和英国人一样)他们说“去欧洲”。

不过,300 年来俄罗斯一直都是一个喜欢“插手”的欧洲国家,这一遗产被继承下来了。拉脱维亚银行是俄罗斯商人接管的目标。2003 年,立陶宛一位名叫罗兰达斯·帕克萨斯的总统因被怀疑与俄罗斯黑手党关系密切而被迫下台。莫斯科保留了加里宁格勒周围的波罗的海的领土,继续要求俄罗斯货物和军需运输可以从立陶宛无条件地通行,并且俄罗斯居民可以免签证去欧盟旅游。由俄罗斯寡头政治执政者的商业企业洗出来的黑钱,从伦敦和法国里维埃拉的地产市场流出去。 765

从短时间来看,俄罗斯居于欧洲边缘无疑是令人不舒服的,但它并不是威胁。俄罗斯军队虽在其他方面有所参与,但不管怎么说,俄军已破旧不堪。只有俄罗斯人的健康才是他们最关心的——尤其是男性寿命急剧减少,国际机构有一段时间一直警告说,肺结核正在俄罗斯复苏,俄罗斯处于艾滋病蔓延的边缘——但这主要是俄罗斯人自己担心的地方。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肯定会只忙于自己的事务。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与欧洲比邻,它幅员辽阔,石化燃料储存无人可及,就这一件事实,就不可避免地给能源匮乏的欧洲大陆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波兰在 2004 年就已经有一半的天然气和 95% 的石油是来自俄罗斯了。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当局和个体俄罗斯人期望从欧洲得到的是“尊重”。莫斯科希望能以一种更加亲密的方式参与欧洲内部事务,不管是在北约还是巴尔干地区的管理,或者是贸易协议的制定(包括双边协议和由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协议):这并不是因为俄罗斯不在场时做出的决定就一定会有损俄罗斯的利益,这是原则问题。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欧洲历史完全是循环发生的。21 世纪如同 18 世纪:俄罗斯既在欧洲之内,又在欧洲之外,孟德斯鸠所说的“欧洲民族”,吉朋所描述的“锡西厄的蛮荒”。对于俄罗斯人而言,欧洲西方和几个世纪以来一样,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既魅力无穷又极

[13] 恰恰相反。在 2004 年春夏的一系列措施中,当局大大削减了新闻媒体和本已受限制的公众示威的权利。俄罗斯短暂的自由之窗很快就关闭了——实际上是混乱和没有限制,而非真正地受宪法保护的自由。2004 年,俄罗斯观察家估计,由苏联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训练的官员在国家的公务员行政职位上占了四分之一。

度反感；既赞叹不已又无名怨恨。俄罗斯统治者和人民对外界的评论始终极度敏感，而同时又表明对所有国外的批评和干涉都持怀疑态度。俄罗斯是历史和地理遗留给欧洲的一个邻居，欧洲既不能忽视它，也不能容纳它。

这一情况对于土耳其也是如此。有将近 700 年历史的土耳其人是欧洲的“另外一半”，之前这一地区被阿拉伯人占据 500 年。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从土耳其人结束的地方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罗马尼亚长期在土耳其帝国统治之下，齐奥兰就沮丧不已）；人们经常说起基督欧洲被间歇地从土耳其伊斯兰的虎口中“拯救”下来——不管是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的大门口，还是在 1571 年的“勒庞多战役”中。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东方问题”——即如何处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怎样解决从几个世纪土耳其统治下衍生出来的领土问题——是对欧洲外交官们最紧迫的挑战。

76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战败，土耳其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凯末尔·阿塔土尔克的爱夸耀的、非宗教的、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这一切都把东方问题从欧洲的日程表中取消了。在安卡拉政府的统治下，土耳其人自己的麻烦就够多了；土耳其从巴尔干和阿拉伯人的中东脱了身，这却遗留下了一张复杂的冲突网，同时也留下了能对欧洲和世界产生长期重大影响的抉择；不管怎样，土耳其人不再深陷其中了。土耳其横跨苏联通往地中海的海上航道，要不是这一战略位置，这个国家很可能就从西方人的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与此相反，在冷战期间，安卡拉成了西方联盟的调解员，成了北约一支很重要的分遣队。美国在土耳其建立导弹和军事基地，形成了封闭线的一部分，来包围苏联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边境。西方各国政府不仅向土耳其提供丰富的援助资金，而且对其不稳定的独裁政权（经常是军事政变的结果）和颜悦色、不加指责，对其滥用少数民族权利的态度也是如此（主要是该国在远东的库尔德人，占它的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就像地中海盆地的剩余乡村人口一样，土耳其“外籍劳工”为了寻找工作而大批移居到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会重新在新欧洲弥漫。随着冷战结束，土耳其独特的位置呈现出了不同的重要意义。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对抗中，土耳其不再是边防前哨和屏障国家了。相反，它现在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管道，同两方都有密切关系。虽然土耳其在形式上不是宗教共和国，7 000 万居民中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很多年长的土耳其人不是特别正统，但是随着激进的伊斯兰教的兴起，新一代土耳其人反抗他们已经还俗的父母，他们从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遗产中寻根问祖。人们越来越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阿塔土尔克那样无情地强制实行的非宗教国家，也会变得异常脆弱。

但是，土耳其大批受过教育的商务精英们生活在面积不大的欧洲城市伊斯坦布尔，他

们很认同西方的服装、文化和习惯。和其他有理想的东欧人一样,他们把欧洲——包括欧洲的价值观、欧洲的机构、欧洲的市场和职业生涯——看作是自己唯一可能的未来,也看作是他们立场摇摆不定的国家的唯一可能的未来。他们的目标很清楚:逃脱历史,进入“欧洲”。而且,有着传统影响的军官团也有这一目标,他们全心全意地认同阿塔土尔克的非宗教国家的梦想,并且对土耳其公众生活中悄然发生的伊斯兰化也曾公开表示过愤怒。

然而,欧洲——或至少是布鲁塞尔——还是很犹豫不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申请多年悬而未决。有充足的理由对此小心谨慎:土耳其的监狱、对待国内批评者的态度、不充分的民法典和经济法典只是有待解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才能有希望去打破与欧洲伙伴之间的严格的贸易关系。欧盟高级委员如奥地利的弗朗茨·费什勒曾公开对该国的长期民主信心表示怀疑。然后还有现实困难:作为成员国,土耳其将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欧盟成员国,也是最穷的——繁荣的西部边缘和广袤的、贫穷的东部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即使加入欧盟,众多的土耳其人也有可能向西涌向欧洲,寻求一份最低生活工资。国家移民政策和欧盟的预算几乎是不能忽视的。 767

但真正的障碍还在别的地方〔14〕。如果土耳其加入了欧盟,那欧盟将会有外部边界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相比邻。从地理上讲,它把“欧洲”延伸到了离摩苏尔 100 英里以内的地方,不管这是不是一个合法的问题,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无疑具有安全隐患。并且,欧洲边界延伸得越远,包括 2004 年宪法文件的起草者在内的很多人就越会觉得欧盟应该明确声明,是什么界定他们共同的家园。这反过来会引诱波兰、立陶宛、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们——更不用提罗马的波兰教皇了——在新欧洲宪法文本的序言中提醒人们,欧洲曾经是基督教的欧洲,尽管这样做并不成功。捷克前总统瓦克拉夫·哈维尔于 1994 年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不是曾经提醒他的观众们吗?——“欧盟是建立在一大套价值基础之上的,它根植于古代的风俗习惯、制度和基督教。”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土耳其人绝对不是基督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不能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基督徒)——属于“准欧洲人”的土耳其人甚至比其他欧洲人更有可能去强调自己欧洲身份的非宗教、宽容和自由的特点〔15〕。他们还越来越急于把欧洲价值和标准作为杠杆,来对抗土耳其公众生活中的反动

〔14〕 希腊的政治家们同时出于国内的政策考虑,他们多年来一直利用手中在布鲁塞尔的投票,来阻止和妨碍土耳其为获加入欧盟的资格所做的任何努力。

〔15〕 此外,他们一贯把“欧洲”看作理想的自由市场,这与土耳其自己的经济活动中的贪污贿赂和任人唯亲形成了鲜明对比。

影响——这一目标也是很多欧洲成员国一直在鼓励它的。

2003年,尽管在欧盟的吩咐下,土耳其议会最终取消了对库尔德文化生活以及人们发表政治意见的长期限制,布鲁塞尔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表演的漫长的、犹豫不决的华尔兹舞步也开始强行加价了。对加入欧盟持反对态度的土耳其国内的批评家们坚持认为,这是对曾经是帝国的土耳其的羞辱,它现在已降至在欧洲大门口恳求,纠缠那些曾是土耳其的附属国的国家来支持土耳其入盟的地步了。此外,土耳其稳步增长的宗教情绪不仅能够促使本国温和的伊斯兰教政党获得选举胜利,而且还鼓励国家议会又一次就“通奸作为犯罪”的提议进行辩论。

768 布鲁塞尔直率地警告它:这绝对会危害到安卡拉加入欧盟的申请。作为对该警告的回应,上述提议被放弃,而欧盟最终也于2004年12月同意增开与安卡拉的谈判之门。然而,危害还是出现了。土耳其入盟的反对者——其中很多是来自德国^[16]、法国以及地处希腊或保加利亚周边的国家——能够再次指出土耳其入盟的不适当性。2004年即将离职的荷兰籍欧盟委员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告诫说:要警惕欧洲的“伊斯兰化”倾向。继续顺利谈判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欧盟扩展事务委员君特·弗尔休根承认,他并不指望土耳其能在“2015年前”成为欧盟成员国。同时,将来拒绝土耳其入盟或将其进一步搁置的代价,是对土耳其的自尊以及作为欧洲脆弱边缘的该国政治稳定的一大伤害。东方问题又回来了。

鉴于历史对当代欧洲人的影响都已经微乎其微,要是再期待它能对21世纪之初的欧洲事务产生重大影响,无疑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与其说这是教育的问题——当然,东南欧部分地方的历史教育,或者是错误的历史教育,也是让人担心的地方——还不如说是因为历史在现在被用于公共事务。当然,这在独裁社会里并不新鲜,但欧洲自称是“后独裁”社会,政府对知识不再实行垄断,历史也不再因为政治而被轻易篡改。

绝大部分历史并没有被篡改。在欧洲,对历史的威胁不在于为了不真实的目的而故意歪曲历史,而在于怀旧——这个历史知识的天然属性。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公众对历史日益升温的迷恋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工制品,它封存在内部的并非最近的记忆,而是失去的记忆:历史不再是启迪、教化现实的镜子,而成了展示一个与当今有区别的注解。电视上的历史——无论是以讲述的形式,还是表演的形式;主题公园里的历史;博物馆里的历史:所有这些强调的都不是人们与历史的密切联系,而是把人们与历史隔离。“现在”已被描绘成一个“历史”的孤儿,而不是它的继承人,这就切断了与事物本质的联系,

[16] 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曾公开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

也切断了与我们失去的世界的联系。

在东欧,虽然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已不复存在,但怀旧还是直接引起了对逝去的社会主义的遗憾。2003 年,布拉格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前革命时装”展,展品包括靴子、内衣、礼服等等,这些虽然属于结束只有 14 年的那个世界,但是已经让人流连忘返。展览吸引了很多老人,这些劣等的千篇一律的灰色展品勾起了他们最近的回忆。而参观者们的反响却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喜爱,甚至遗憾,这让馆长大为吃惊。 769

东德人的怀旧病在德国家喻户晓,也同样是忘却的记忆。借用米拉波对德国霍亨索伦王室治下的普鲁士的描述,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仅是为另一个国家的安全服务。回首过去,它在激发人们的感情甚至是渴望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当捷克斯洛伐克人对他们的旧服饰赞美不已时,德国人却对电影《再见,列宁》趋之若鹜,该电影对埃里希·昂纳克时代生活的物质匮乏、教条主义和普遍的荒谬性进行明显的嘲讽,它对观众的某种同情心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补偿,而不只是对那个时代的突然失去的一种矛盾心理。

同其他中欧人一样,德国人和捷克人都有很多对满目疮痍的家园进行重建的经历。为挽救遗失的历史碎片而产生的有选择性的怀旧颇具意义。1984 年,艾德加·赖兹的《故乡三部曲》在电视台播出时,平均每集有 900 万西德人观看,这绝非偶然。这种对怀旧的着迷在 20 世纪最后几年同样席卷了西欧的其他国家,它进而导致了遗物行业、纪念馆、重建、重新立法以及改革的兴起,而人们却很难解释这种对怀旧着迷的现象。

历史学家埃利克·霍布斯鲍姆 1995 年所描绘的“历史神话的伟大时代”并非史无前例。在民族时代之初,霍布斯鲍姆自己曾就 19 世纪欧洲的“传统的创造”写过精彩的文章:爱德温·缪尔(1941 年在苏格兰著有《彭斯与司各特》)把这种人造文化解释为“虚假民族的虚假诗人”。但是在 20 世纪末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对民族历史创造性的再想象则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秩序。

“历史即怀旧”在这两个国家尤其发出最强音,并非偶然。法国和英国以高傲帝国的身份进入 20 世纪后,两国都在战争和非殖民化进程中逐渐丢失了领土和资源。昔日作为全球帝国的自信 and 安全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不堪回首的记忆和未卜的前途。法国人或英国人虽然曾风光无限,但是风光不再。是否要成为热情的“欧洲人”,对于比利时和葡萄牙这样的小国家或者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在近代史上有巨大阴影的国家倒容易得多。^[17]但对沐浴在伟大和光荣的记忆里的国家而言,“欧洲”总是一种不愉快的转换:它是一种妥协,而非选择。

[17] 民主的西班牙的确开发出了官方的“遗产”行业,受其“民族遗产”的培育,但后者更注重该国久远的黄金时代,而不是近代史。

770 从社会公共机构的角度来看,英国几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开始怀旧了。为获得“美与历史”的场地和建筑,劳工部长休·达尔登设立了“国家土地基金”,并由国民信托银行管理。一大批由国民信托银行管理的财产——公园、城堡、宫殿和“杰出的自然美的地方”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其中有些仍由原主人拥有,他们将这些祖传遗产赠与国家,以此换得巨额财政减免。

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让人重获信心的近代史版本以战争题材的电影、古装戏、服饰的形式得到再现。从男阿飞到多毛的面部装饰,爱德华王朝时代的风尚再度流行,就是这股潮流的特点。它在 1977 年达到顶峰,人们举办街头舞会和摄影展,举国上下都在祈祷重回昔日美好时光,人们就是以这种自觉的“回忆”和怀旧的方式来庆祝女王登基 25 周年。但是,80 年代的撒切尔改革之后,这种元素的连续性就中断了。在那 10 年间,回首 40 年代、甚至回首 1913 年,大不列颠——更准确地说是英格兰——能从别人的赞誉中感受到一丝温暖,但是这种感觉现在一扫而空。

在那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国家,它让人无法回顾它的近代史,除非是无意地讽刺它对历史的否认,或是作为一种被清洗干净的、无实质内容的“遗产”。这种对历史的否认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样古老的教育机构的不安全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坚持“反优越感”,这两所大学在布莱尔新政府的平等机会主义的氛围中受到极大压抑,这对他们可谓奇耻大辱。这种否认还体现在一些文化机构的奇异的自我否定上,例如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它们已经沦落到了要不断讨好、招揽客人才有生意,可算是“配有上等博物馆的一流咖啡馆”了。

民族遗产已经公然演变成了一个商业计划,即“遗产行业”,由“民族遗产部”这个新政府部门负责筹划和经营。这个新部门于 1992 年由保守党政府设立,这与原本工党起草的计划是一致的,后来被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合并成“文化、传媒、体育部”。这在全球背景下的意义是重大的——遗产不是政党工程。历史不再被滥用或用以自肥,她已被净化并被赋予了愉悦的面孔。

地处已被废弃的南约克郡的煤田中心位置的巴恩斯利就是最好的例证。巴恩斯利曾是重要的矿业中心,但在“后撒切尔”时代,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让人难以辨认。镇中心的精华部分已不复存在,市民中心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被混凝土停车库包围的华丽的商业步行街。残存下来的仅有镇礼堂和几幢相邻的建筑,他们是代表 19 世纪巴恩斯利荣誉的建筑遗产,是指引游客的伪古代、“老式”的地标性建筑。同时,当地书店现在专门把
771 介绍本地历史的书籍销售给本地居民(巴恩斯利当时不在已开发的任何旅游路线上),这包括深褐色照片和出版物,以及像《巴恩斯利黄金时代》或《古唐开斯特的回忆》一类的书籍,这些出版物能让人勾起对刚刚逝去的、几乎被遗忘的世界的回忆。

2001 年,距巴恩斯利仅几英里之遥,靠近欧格里夫村,“欧格里夫战争”在电视上重播。1984 年 6 月,在此地,罢工矿工与警察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它是暴力程度最高、最猛烈的一次冲突,也是当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全国矿工联合会之间冲突的标志。此后,大量矿工失业,有些失业矿工(为挣钱)穿着“特定时期”的服装重新演出了这场冲突。这种对著名战斗的演出是英国既定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本该一直享有“遗产”待遇的欧格里夫是正在进行的加速历史化的例证。毕竟,在距南部仅两三个小时车程的内斯比发生的内战,过了 300 年以后英国人才考虑重新演绎;而欧格里夫冲突发生之后仅 17 年即被搬上荧屏。

巴恩斯利镇在《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非常出名,在该书中,乔治·奥威尔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战争中失业的悲剧,令人难以忘怀。威根码头自身历经 70 年的变迁,现在不仅是一个码头(奥威尔曾对它未能列入遗产名单而发表过著名的评论),而且在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还树有路标,以鼓励人们来此地参观。清澈的运河旁,已建成名为“历史之路”的博物馆,以及名为“奥威尔在威根码头”的很普通的现代酒馆,出售汉堡和薯条。奥威尔笔下可怕的北部贫民窟的确是不复存在了——不仅从地面上消失了,而且还被本地人遗忘了。《1930 年—1970 年的威根记忆》是一本博物馆在打折出售的指南书,书中印有漂亮的深褐色图片,有端庄的女售货员和精巧的、但已被遗忘的商店。矿工工人的状况曾吸引奥威尔来到威根,并给这个地方带来了颇有争议的声誉,因为对这些矿井和工人,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所能表述的。

享受遗产待遇的不仅仅是北部地区。在英国中西部制陶地区,游客和当地的小学生都被鼓励去学习 18 世纪陶器制作商约书亚·威治伍德是如何制作他那些著名的陶器作品的。他们寻找有关制陶工人是如何生活的、这个地区为何被称为“黑色乡村”的证据(奥威尔曾经描述过:甚至白雪都因为上百个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而变成黑色),但却无功而返。很多事物由本来的面貌已被改变成了昨日曾经的、或今天现实的状态,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现实存在的英国铁路是一桩公认的国家丑闻;但截止到 2000 年,大不列颠所拥有的蒸汽机铁路和蒸汽铁路博物馆的数量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整个欧洲此类博物馆有 120 个,而英国就占了 91 个之多。大部分火车都不再上路运营了,不能上路的还有那些努力把现实和虚幻与非凡的漫不经心交织在一起的火车:为参观约克郡而坐上“西行列车”的夏季游客受邀乘坐托马斯蒸汽机火车,沿基思利到豪沃斯的路线去参观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故居。

在当代英国,历史和小说结合得天衣无缝。工业、贫困和阶级冲突已被淡忘和平息。深层的社会对比差距被否认或趋同。即使是最近的饱受争议的历史,也只能在怀旧的电

影作品中看到。这种全民族的记忆的大删除,是英国新政治精英们的标志性的成就。依靠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和影响力,新工党成功地废弃了历史;而英国繁荣的遗产行业却适时地变成了“历史”。

英国人种植和培育“遗忘花园”,在援引历史的同时又竭尽全力否定历史的这种能力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方面,法国对民族遗产的着迷可与英国一较高低,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法国,对确认和保护民族历史上有价值的物品和场所的着迷,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它开始于对逝去的 1914 年前的世界表示出怀旧的农业展览,并且在维希政权做出努力,用过去理想化的乡村代替当时生活不方便的都市之后,又得到了加速发展。

战后,在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时期,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对民族历史和地方历史保护中,累积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有形的教育——作为当代一种长久的、对民族独特历史(在痛苦不堪和动荡不安的世纪之后)的警醒。但在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法国,确切地说是密特朗和希拉克总统时期的法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引发评论的已经不是昔日的荣耀——或者说是昔日的悲剧——的延续,而是它的中断。过去——过去的革命,过去的农民,过去的语言,而首先是不久前的过去,从维希政府到阿尔及尔——对未来几乎不提供任何指导。经历了人口变迁和两代人的社会地理变动,曾经毫无断裂的法兰西历史似乎注定要在民族的整体记忆中消失。

对记忆消失的焦虑产生了两种结果。其一是官方宣布的遗产、大量由公众支持的遗迹、由国家贴上“遗产”标签的人工制品越来越多。1988 年,依据密特朗政府文化部长雅克·朗的要求,法国文化遗产中受官方保护的项目名录急剧扩大,而以前该名录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遗产,如尼姆附近的嘉德水道桥或位于埃格莫特的“勇敢的菲利普的堡垒”。

73 雅克·朗和他的继任者所采取的方法很具有启发意义。在法国的新“遗址”中,位于巴黎热马普码头、有着碎块状外墙的“北方旅馆”就是其一,它被马塞尔·卡内于 1938 年带着坦率的敬意拍摄的怀旧电影杰作用来做了片名。但是卡内的拍摄全部是在摄影棚进行的。对电影中从未出现过的建筑物(或建筑物外观)的保护,依据个人好恶,可以被看作一种微妙的法国式“后现代”讽刺,也可以被看作在官方以假乱真的做法下出现的、注定虚假的事物的表现。

密特朗个人对国家遗产的突出贡献,与其说是保护遗产或对遗产分类,还不如说是在现实中制造了遗产。自路易十四以来,还没有别的统治者在其任期内留下数量如此众多的建筑和典礼。密特朗在任 14 年的政绩,不仅仅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纪念堂、庄严的就职典礼、名人下葬和重新下葬,还体现在通过巨大的努力,确保了总统自身在国家遗

产中的位置:从巴黎西部拉德芳斯雄伟的凯旋门出发,到卢浮宫优美的金字塔和巴士底狱旁边盛气凌人的现代主义歌剧院,再到塞纳河南岸饱受争议的新国家图书馆。

在密特朗忙于简洁优雅的纪念碑式建筑、让国民真实地记住了自己的同时,人们也感觉到国家正在隔断与祖宗的联系,正是这种令人痛苦的感觉,促使一位杰出的巴黎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了《记忆中的地方》一书,该书是一部巨型文集,包含三个部分,共7卷,长达5600页,在1984—1992年间陆续出版。这部巨著旨在辨认和阐明法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地方和范围:名称和概念,地方和居民,现在是或曾经是法国的工程和象征,包括从大教堂到美食烹饪,从国土到语言,从计划中的城镇到法国人心目中的法国版图。

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什么出版物可以与这本书相媲美,很难想象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诺拉的《记忆中的地方》一方面记录了全体法国人的一种令人惊讶的自信:那就是人们坚信800年的历史留给法国的是少有的集体遗产,并且将它以这种方式来回忆和展示;另一方面,正如主编在前言中所阐明的那样,该书还表明了一种焦虑感,担心这些集体的、共同经历的标志即将永远被人们遗忘。

这既是怀旧,也是不安。担心总有一天——而且很快地——风景优美的高速公路两旁的泥土色信息指示板对法国人将不再有任何意义。如果委婉提示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以起初只提到其标志、后来又直接以提名的方式再次提起兰斯的大教堂、尼姆的古罗马圆形剧场、沃日奥葡萄园的葡萄树、圣维多利亚山或者凡尔登战场又有何意义呢?如果偶遇这些名字的普通游客想不起来它们原本的含义,也唤不起他们打算唤起的感情,法国人还能得到什么呢?

英国的遗产行业表明了它迷恋的并非是事物的本质——怀旧是真的,而它所纪念的“过去”却是赝品(对虚假历史的真实怀旧)。相比较而言,法国人对其精神遗产的迷恋还是有一些文化真实性的。“法国”总是以一种讽喻的方式表现自己:见证各种“玛丽安”,即共和国的各种描述和化身。法国人用大量物质的或者精神的象征形式,集中表现对失去的法国本性的遗憾,这样做倒还是比较恰当的。这就是法国。如果它们被放错了地方,或者不再让他人共享,法国就不成其法国了——这就是夏尔·戴高乐所说的“没有荣耀,法国就不成其法国”的含义。

这类假设是政客、知识分子以及各种政治信仰派别的人们的共识,这也是《记忆中的地方》如此成功的原因所在。它让成千上万的法国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法国特质的存在,而这种特质在渐渐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也被法国人慢慢淡忘。在诺拉的这本大部头的书中,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建筑、基督教的实践和标志——浓墨重彩,占据主要地位,关于“犹太人”只有简短的一个章节,而且大多作为被同化、排外或迫害的对象出现的,而对“穆斯林”却只字未提。这就非常说明问题。

这并不是由于疏忽。法国人的记忆殿堂里没有为伊斯兰教预留位置,如果事后再制造出一个位置来,这将与这个项目的目标背道而驰。“疏忽”不过是表明了法国与他的邻国一样,很难容纳数以百万计的新欧洲人。肩负起草欧洲宪法任务的“欧洲大会”的105个代表无一不具有欧洲背景。从葡萄牙人到波兰人,和欧洲大陆的其他政治精英一样,他们首先代表的是白人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

或者更准确地讲,这是原来信奉基督教的人们的欧洲。虽然欧洲基督教分支众多,从乌克兰的东仪派天主教到威尔士的卫理公会教派,从横穿喀尔巴阡山脉的希腊天主教到挪威的路德教会,但真正在实践他们信仰的基督教徒的人数却在日益减少。在20世纪末,西班牙鼓吹仍有900座女修道院和寺院,占全世界总数的60%,但实际信仰人数也一直在下降,这种状况与修道院地处偏僻的乡村落后地区以及老龄化不无关系。在法国,仅七分之一的成年人承认会去教堂,但平均每月只有一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这个数字甚至会更低。甚至在波兰,基督教也在日趋衰落,全体公民对曾经非常强大的天主教等级制度的道德训词越发是充耳不闻了。在世纪之交,超过一半的波兰人(其中绝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赞成堕胎合法化。

相比之下,在阿拉伯、土耳其或非洲裔居民仍被广泛视为“外国人”的国家里,伊斯兰教的吸引力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对年轻人。对于他们而言,伊斯兰教越来越成为他们的团体身份和集体自豪感的源泉。然而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曾极其努力地想融入本地、入乡随俗,安特卫普、马赛、莱斯特的年轻男女叫嚷着说,他们既认同比利时或法国或英国是他们的出生地,也认同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家族根源,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开始穿戴传统服饰、佩戴宗教标志——这样做有时是迫于家庭压力,但更多时候是对上一代人的妥协态度的一种抗议。

正如我们所见,政府当局的反应也因地方传统和环境而异:只有法国国民大会凭借世俗共和主义的正义热情,以494对36的投票结果,选择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任何宗教标志。但此项启动于2004年2月、以薄纱(信仰穆斯林的女性头饰)为目标的举措,应该放在更广阔的、也更复杂的背景下理解。在很多地方,种族偏见正在被极右派转变成一种政治利益;欧洲的反犹太主义40年来首次出现上升势头。

在大西洋彼岸,反犹太主义已经成为对欧洲怀有恐惧症的政客和新保守派的博学者们讲话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法国、比利时或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复辟了欧洲的黑暗历史。在2002年2月刊登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很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甚至将欧洲再次出现反犹太主义表述为“为‘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而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战斗——也是最后阶段?”美国驻欧盟大使洛克威尔·施纳贝尔在布鲁塞尔的一次特殊集会上告诉美国的犹太问题委员会说,欧洲的反犹太主义“正在向1930年的糟糕形势

发展”。

这是很具有煽动性的言辞,而且是被深深误导了。在当今欧洲,人们还感觉不到反犹太的情感,但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欧洲人除外,因为他们是中东危机的直接受害者。通过卫星转播,在整个欧洲都可以看到阿拉伯电视台经常播放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报道。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主要是)郊区的年轻人被所见所闻激怒,同时也受到阿拉伯和以色列当局的鼓励要把他们当地的犹太邻居和以色列一样看待的刺激,他们开始攻击他们的犹太邻居:在犹太社区建筑物上涂鸦,亵渎他们的公墓,向学校和犹太教会堂投递炸弹,甚至还有袭击犹太青少年或犹太家庭的情况。

在新世纪的前几年,对犹太人和犹太组织的攻击之所以引起关注,不是因为他们攻击的规模,或者是他们的种族特征,而是因为他们所固有的种族对立的特性。这与过去欧洲出现的反犹太人的情形不同:对于因为情绪不满而要寻找替罪羊的人们而言,犹太人不再是选择的目标。的确,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很低。2004 年 1 月进行的一次法国民意测验发现,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中虽然有 10% 的人承认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不喜欢“北非人”的比例更高,达到 23%。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攻击,包括对来自其他国家(例如土耳其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塞内加尔人,等等)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攻击,要比对犹太人的攻击多得多。在有些城市,这种种族攻击甚至在当地蔚然成风。

新型反犹太主义的麻烦一面是,当犹太人再一次成为受害人时,这次的凶手却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唯一的例外出现在德国,在德国复活的极右势力没有费心去区分德国的移民,即犹太人和其他“非德国人”。显而易见,德国是个特例。其他国家的当局都担心,他们对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社区的疏远超过了对假定的法西斯主义复苏的疏远。或许他们是对的。

美国仍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视为遥远的挑战、异端和敌人,这一点可以从它提高安全等级并且抢先发动战争得到说明。与美国相比,欧洲政府有充足的理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尤其是在法国,中东危机不再是外交政策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内问题。在巴勒斯坦遭受迫害的阿拉伯人的愤怒和失败情绪转移到了生活在巴黎的、愤怒的、沮丧的同胞们身上,这种转移不足为奇——毕竟它是另一种帝国遗产。

第 24 章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在社会的某个部门,当商业法则表现出最糟糕的情形时,集体行动 771
和公众积极参与精神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免费医疗服务的建立
就是一种成功的范例。
——奥纳林·贝文

我们希望诺基亚公司的员工感觉到,我们都是合伙人,而不是
老板和雇主。也许这只是一种欧洲式的工作方式,但对于我们来说,
它确实管用。
——约尔马·奥利亚(诺基亚总裁)[1]

欧洲人想要保证将来的生活没有风险,他们已经吃过了
太多这样的苦头。
——阿尔封斯·凡尔普拉茨(比利士国家银行行长),1996 年

当你还年轻,还是单身的时候,你适合去美国。
但当你上了一定的年纪,你还是应该回到欧洲。
——对匈牙利商人的民意调查,2004 年

[1] 引自 T. R. 雷德《欧洲的美国》(纽约,2004),第 131 页。

如果不带热诚或愤怒的情绪来观察,那么可以说,
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雷蒙·阿隆

20 世纪末,欧洲形势迅速变得复杂多样:其地缘、国家和联盟组成的格局瞬息万变;欧洲大陆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前景和心态对比鲜明;欧洲大陆内外通讯和交流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五花八门的错误划分使得原本清晰的民族或社会分野变得模糊不清;对过去的评判和对未来的预测仍无定论;这些都让人们更加难以认清何为集体经验。20 世纪末的欧洲缺乏 19 世纪末所具有的同质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们对上一个世纪末充满自信的叙述中可以清楚看到。

虽然如此,但在各行各业仍能察觉到,一种显著的欧洲特征在形成。对于高雅文化——尤其是表演艺术——国家依然积极扶持,至少西欧国家是这样的。每个国家的博物馆、画廊、歌剧院、乐团和芭蕾舞团每年的开支都完全来自于公共基金的慷慨拨款。778
“后撒切尔”时期的英国被误认为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例外,它通过国家发行的彩票减缓了财政部在文化扶持方面的一些经济负担。发行彩票只不过是另一种募集公共资金的方式:和传统的资金征收方式相比,甚至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倒退。〔2〕

这方面(所需)的公共基金数额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不禁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无限制地支付这样庞大的开销。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德国,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对这样一大笔的开支心存疑虑,因为通常一座德国影院或剧院支出的 80% 以上都来自公共补贴。然而,这一水平上的文化又代表各个地区所处地位和门面,事关重大,所以柏林尽管经济停止不前,财政亏空,但仍不惜重金资助三座专用的歌剧院:德国歌剧院(即前西德歌剧院)、国家歌剧院(前东德歌剧院)和喜剧歌剧院,其他还有柏林室内乐团及交响乐团。这些歌剧院和乐团都耗资巨大。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汉堡、杜塞尔多夫、德累斯顿、维尔茨堡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也都一直在扶持许多国际一流的芭蕾或歌剧团,每年都承担着演职人员们的薪水、各类保险金和国家津贴。截至 2003 年底,德国总共有 61.5 万人被国家认定为全职的文艺工作者。

法国也一样,就连偏远的城镇,艺术(尤其是剧院艺术)都很盛行。这里主要是得益于文化部提供的政府基金,这些基金分配到地方直接对艺术进行资助。密特朗总统除了建造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和其他一些博物馆之外,对卢浮宫、巴黎歌剧院和法

〔2〕 这样做的还不只是英国。2004 年 9 月的一个星期内,西班牙的政府发行的“胖子”彩票吸纳了 592 0293 欧元的资金。

国戏剧院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其数额之大是路易十四以来无人能比的。此外,还投巨资建立地方博物馆、地方艺术中心、地方剧院公司,以及在全国性的电影院网络,其目的在于保存经典和推广现代电影。

然而在德国,高雅艺术具有让德国人引以为豪的世界主义特征(德累斯顿歌剧舞剧院的指挥是俄罗斯人弗拉季米尔·杰列维扬科,获得授权演出的舞蹈作品出自美国艺术家威廉·福赛斯之手,热情洋溢的观众却是德国人)。相比较而言,法国出资扶持艺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和展示本国丰富的艺术遗产——法国文化的精粹。高雅艺术在法国一向被公认为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所以在法国学校的课程中尤其强调法国戏剧的这一准则。若非如此,简·布朗这位伦敦的女校长怎会要去法国寻求发迹,她曾在1993年禁止学校观看《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演出——因为这场戏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用她的话就是“荒淫无耻的两性间的”故事)。

虽然法、德两国对文化的公共投资规模最为引人注目,其实欧洲每个国家都是支持艺术的主要的——通常甚至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在“文化”这个公共生活里最不重要的领域中,既不是欧盟,也不是其他私营企业,而是国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几乎是唯一的扶持者。就连在东欧国家(老一辈人仍清楚记得国家完全控制文化生活时所带来的恶果),依靠贫困不堪的公共财政拨款来扶持,仍是应付市场的致命冲击的唯一办法。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表演艺术虽然值得关注,但远没有达到令人振奋的程度,通常在技巧上来看颇有才华,但几乎都表现得一贯谨慎保守。任何在维也纳或者布达佩斯看过《魔笛》演出的人,几乎能看出这样的反差。然而在欧洲共产主义失败之后,艺术实验所能得到的经济预算相当之低——索非亚尤其成了后现代过于考究的编舞和演出实验的温床——因为几乎没有资金来源,许多一流的音乐家、舞蹈家、甚至演员都去了西欧。加入欧洲也可能意味着一种褊狭。

另外一个原因是欧洲高雅艺术的观众现在都来自欧洲各国:大城市里的国立剧团的演出,拥有的国际观众越来越多。各个国家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已经欣然打算跨国界和跨语言去进行交流,正如(去其他国家)追求衣服穿着或事业生涯一样,他们有时间、有办法去自由追求娱乐和艺术熏陶。对一场戏剧、一次展出或一场舞剧的评论通常会出现在多家媒体的报纸上。一个城市里一场成功的演出,比如在伦敦,或者阿姆斯特丹,常常可能会吸引远至巴黎、苏黎世或米兰的观众前来。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新观众是否真正精通高雅艺术——是否并不只是故作阔气——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节,例如一年一度的奥地利萨尔兹堡文化节和西德拜罗伊特定期举行的巡回演出,仍然吸引着一批老观众。这些观众不仅对演出的内容耳熟能详,而且也熟悉社交礼仪规矩。但是总的趋势却是要不遗余力地在年轻观众

中间普及传统作品(他们对经典作品和原作的语言通常是不大懂的),或者委托制作一些给新一代的观众看的创新的、浅显易懂的作品。

对于那些推崇时新歌剧的人来说,“新潮”的歌舞团和后现代的艺术表演都表明了欧洲文化场景的转变:朝气蓬勃、勇于创新、无视传统,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还深受大众欢迎——如此转变,倒是适合这个十分依赖公众支持、必须取悦广大观众的行业(的发展)。然而在批评者看来,伦敦的新的艺术场景(所谓“英伦艺术”)和法兰克福备受争议的威廉·福赛斯的芭蕾、巴黎不定期上演的由经典作品改编而成的荒诞歌剧一样,证实了他们的悲观预言,即这种艺术“越多越糟”。 780

由此看来,欧洲“高雅”文化——之前曾经只是为了迎合它的恩主心目中传统的共同标准——现在却在利用一批新观众群的文化不安全感。这批人对文化糟粕和精华没有足够的把握去辨认究竟,但他们却对时尚的东西顶礼膜拜。其实并不像文化悲观主义者一贯宣称的那样,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史无前例的。至少从莫里哀时代起,未受过教育的暴发户的焦虑一直都被用来作为文学和戏剧作品讽刺的主题。所不同的是,这一文化转型是全欧性的。从巴塞罗那到布达佩斯,观众群的结构现在都惊人地一致,舞台剧目也面目相同。对于批评家来说,这种现象完全证明了艺术和它们的顾客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为欧洲垃圾作品制造出了欧洲崇拜。

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欧洲联盟是否使其人民变得更加具有世界性,还是仅仅是把各自的狭隘性混合在了一起,这不只是《法兰克福汇报》和《金融时报》艺术版关注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金融时报》、《世界报》,发行范围较小的还有意大利的《共和报》,现在都是真正的全欧性的报纸,通常在欧洲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然而,大规模发行的小版面报纸因为语言和地域的局限,它们在各处发行量都在下滑——英国下滑的幅度最大,西班牙下滑的幅度最小——民族传统不再像以前那样同流行的报纸杂志关系紧密(在这一方面英国又是例外,在英国国内,大众媒体煽动并利用了本国人民的恐欧情绪)。在东欧和西班牙,免费报刊杂志的长期缺失,意味着很多人——尤其是不住在大城市的人——统统错过了报纸时代,他们直接从前文字时代过渡到了电子媒体时代。

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视——如今对欧洲人来说信息、思想和文化(包括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主要来源。电视和报纸一样,是和英国人的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媒体。英国的电视观众人数在欧洲占据首位。其次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相对比较落后的东欧国家。虽然面临着地面商业电视台和卫星(转播)频道电视台的竞争,但传统的国有电视台仍然拥有相当巨大的观众群体。它们还极力效仿日报媒体的做法,急剧减少自己的国外新闻覆盖率。因此,20世纪末的欧洲电视体现着一种奇特悖论。各国电视上播出的娱乐节目没有什么差别,引进的电影、电视连续剧、纪实节目、游戏节目、其他内容在欧

781 洲各地都能看得到。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些被引进的节目是否配了音(譬如意大利)、添加了字幕或是仍保留原版语言(这种情况在一些多语种并存的小国家里越来越多)。电视节目的播出风格——例如新闻播报——非常相像,很多都是从美国地方新闻播报那里借鉴而来的。〔3〕

另一方面,电视又是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甚至狭隘封闭的媒体。因此,意大利电视一定是意大利式的——从它那过时的杂耍秀、生涩的访谈秀,到那些长相出众的著名主持人、拍摄极少包装的年轻女人时所采用的特殊镜头视角(都体现着它的意大利风格)。德国政府对所有的电视节目几近垄断,而相邻的奥地利地方制作的脱口秀则体现着一种道德严肃性。在瑞士(比利时也是如此),全国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电视频道,并用不同的语言播报不同的事件,而且各个地区电视的运作方式也迥然各异。

正像批评家所严厉指出的那样,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和自己的商业对手竞争过程中,已经摒弃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和早期作为英国道德仲裁者及仁慈教育者的理想。但尽管立场保守(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英伦特色。你若是不相信,可以去拿 BBC 播出的节目和法国有线电视 2 台、法国电视 1 台相类似的节目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两个国家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无论是对学术或是政治热点也好,对当局或当权者也罢,它们的态度和半个世纪之前一样,仍各有特点。在这样一个年代里,大部分的集体活动和公共组织都越加衰败,但唯有电视是人民大众普遍拥有的。它极其高效地发挥着加强民族特色的作用,同时又使彼此高度缺乏了解。

除了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电视台很少会对邻国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而且现在甚至比以前电视的初始阶段时还要封闭。在那个时候,因为对技术的着迷和对邻国的好奇,电视台拍摄了很多外国城镇、海景的纪录片和实况转播等等。但是现在对大部分观众来说,欧洲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了——当然,麻烦不断、贫困不堪的东南欧除外。旅游和欧洲电视的其他节目早已“面向世界”了,它们的注意力已经投向了欧洲之外更远的地方,完全忽略了欧洲内部的其他地方,这样一来,那些属于观众原本应该熟悉的土地,现在却对他们知之甚少。

一些重大的公共场面——法国的帝国风格公开葬礼,英国、比利时、西班牙或挪威的王家婚礼和丧葬仪式,“后共产主义”时期各国国内的纪念活动、总统致歉,等等——

〔3〕 但是还没有完全拘泥于美国的做法:美国电视的体育节目经常是由白种男性主持人主持,并搭配一个黑人男性。而社会记录片或传真节目通常由白种女性主持人主持,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则没有肤色和性别的限制。

都只能算是地区性的事件,仅在本国内的各电视台向国民播报,其他国家关注的人很少。〔4〕在欧洲,地方性的选举结果,除非具有重大意义或跨洲影响力,才会在国家级的大众媒体上播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欧洲人都对邻国发生的事情了解很少。这种对欧洲选举的出奇的淡漠态度不只是来源于对布鲁塞尔(欧共体和北约组织总部所在地)呕心沥血工作所持有的那份怀疑和不满,它是大部分欧洲人身上那种非欧洲精神自然生成的副产品。

不过,全欧洲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体育运动。有一个卫星电视频道——“欧洲体育”——专门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转播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从爱沙尼亚到葡萄牙,每个国家的电视台都在体育赛事播出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即便这些赛事很多都是欧洲范围的,甚至经常都没有本地方或本国参加,他们也愿意转播。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人们对观赏性的体育比赛的兴趣与日俱增,而参与运动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在地中海地区的3个国家里,人们都对深受大众欢迎、面向大众创办的体育日报有强烈的需求,例如法国的《队报》、西班牙的《马卡报》和意大利的《体育报》等。

尽管许多国家以自己国家有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而自豪——例如捷克的冰球、立陶宛和克罗地亚的篮球、法国联赛和英国一年一度的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但以欧洲大陆而论,这些赛事虽然有时也能够吸引几百万的观众,但毕竟是小型赛事(法国联赛是唯一的现场观众人数在最近几十年来真正地不断增加的体育赛事),西班牙的斗牛比赛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增加收入的文化遗产产业而得到复兴,但对年轻的西班牙人来说并没有多少的吸引力。就连英国传统的夏季运动——板球——也滑落到了娱乐的地位,尽管英国也曾做过大量的努力,力图使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具有可看性,但最终它也只能成为一个没有商业性利益的、仅供娱乐的糟糕的5天。要说真正把整个欧洲联在一起的,还是足球。

这种情况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足球,但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足球运动员只限于自己本国内踢球。观众也只能观看本国的足球联赛。相对来说并不很频繁的国际足球赛,在一些地区被人们带有情绪地看作战争历史的重新上演。那时候,英国和德国之间,或者是德国和荷兰之间(波兰和俄国很少比赛)比赛的队员,没有谁会想到以后有《罗马条约》的签订,以及“关系更加密切的联盟”。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关于黛安娜王妃之死及其跌宕起伏的后半生似乎应该算是一个例外。然而即便是相当多的人通过电视观看过她的葬礼,很快他们就完全失去了兴趣。一直在表达着自己缅怀之情的只有英国公众。

83 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欧洲各个国家的运动员相互并不熟悉。在场下也没有什么接触。1957年,威尔士的中锋队员约翰·夏尔以闻所未闻的高价6.7万英镑从利兹联队转到都灵的尤文图斯队,这一历史性事件在当时成了英国和意大利两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消息。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的足球俱乐部里还几乎不大能看到外国队员的身影。只有在意大利,具有开创精神的足球俱乐部经理们已经开始四处猎取有天分的队员。50年代战绩辉煌的皇家马德里队对自己拥有像匈牙利人费朗茨·普斯卡斯这样出类拔萃的运动员确实感到非常自豪,但他几乎不能算是皇家马德里的代表。这位匈牙利的前国家足球队队长,是在苏联驻军匈牙利之后,从布达佩斯来到西班牙的,后来加入了西班牙国籍。那时他和其他匈牙利球员一样,在国外是无名小辈。转折点出现在1953年11月,他带领匈牙利队在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比赛。对手英国队一个队员发出感叹:“看那个小胖子,我们输定了。”结果匈牙利队以6:3大获全胜,这是英国队首次在主场踢球被打败。

这一代人之后,尤文图斯队、利兹联队、皇家马德里队等等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足球俱乐部都拥有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队员。一个来自斯洛伐克或挪威的天才队员,以前只能在捷克的科西策地方或者挪威的特隆赫姆地方拼搏,偶尔在自己的国家队里露一露脸。但现在他们却有机会去加入大的球队,在英国的纽卡斯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赢得出场机会和经验,同时还享有相当优厚的待遇。2005年,英国队的经理就来自瑞典。阿森纳队——英国顶尖的足球队——在21世纪初是由一个法国人管理的。北伦敦俱乐部甲级队的球员分别来自法国、瑞士、德国、瑞典、丹麦、冰岛、爱尔兰、荷兰、西班牙、巴西、象牙海岸和美国——当然还有一些来自英国国内。运动员、经理,包括观众,都让足球成了不分国界的运动。诸如曼彻斯特联队等先进的俱乐部,利用自己辉煌成绩,将自我形象做了重新包装,这一行动无论是在近到英国的兰开夏、远至拉脱维亚的商业市场,在宣传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这样一批足球明星,他们未必是最有才华的,但是却爱大肆炫耀自己出众的容貌、美丽的妻子和绯闻缠身的私生活,从而使自己能在欧洲公众生活中、在专门报道影视新星和小贵族的大众娱乐媒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大卫·贝克汉姆这位球技一般但十分擅长自我推广的英国足球队员在2003年从曼彻斯特联队转到皇家马德里队,这件事在一时成了欧盟各国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在第二年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杯足球赛中,贝克汉姆作为英国队的队长,痛失了两个罚球,促使英国队丢尽脸面,提早退出比赛,但他的这种尴尬的表现丝毫也没有影响球迷们对他的热情。

更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虽然英国队离开比赛,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英国的电视观众对接
'84 下来的那些小国家之间(葡萄牙、荷兰、希腊、捷克)比赛的兴趣,尽管英国球迷并没有对

这些比赛下什么赌注。虽说国际比赛场上群情激昂,彩旗挥舞,队员们如狼似虎,观众竞唱国歌,但是人们对观看比赛——任何一场比赛——的着迷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爱国热情。〔5〕到了那一年夏天在葡萄牙的赛事高峰时期,英国广播公司对比赛的转播仅在英国国内就吸引了2 500万观众。欧洲杯的官方网站 Euro.com 点击率多达4 000万次数,对赛事的点击率达5亿次之多。

足球运动深受大众欢迎,自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作为一种业余运动,它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除了一个球以外,它不需要其他任何设备。任何人随处都能想玩就玩,不像网球、游泳、体操,要有一定经济收入的人才能玩,而且在许多欧洲国家还缺少那些必需的公共设施。无论你身材高大与否,对参加比赛都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而且这种运动也没有太大的危险性。足球运动在过去一直都是低收入职业,是工业城镇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们的一种选择。但是现在,它竟然成了穷小子获得成功、闯入繁华生活、得到很多利益的一条捷径。

而且,不管这些运动员多有才华、多受人欢迎,任何一个运动员个人必然还是自己球队的一分子。他们不可能像法国那位一直没有成功的自行车运动员雷蒙·波利多一样,成为一种得不到报答的民族热情的象征。足球也太过于直接,无法像美国的棒球那样被赋予太多的寓意。足球不像北美的职业团体运动,它是面向所有人的(甚至包括每一个女人)。总之,足球是一种非常有欧洲特色的运动。

足球作为欧洲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时它甚至不仅取代了战争,而且也取代了政治,所以它在报纸上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多。就连政界人士也到处对这些运动场上的英雄们表现出了尊重,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虽然政治在欧洲失去了自己的竞争优势,但以前常挂在嘴边的热门话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帝国主义和革命者)的消失,并不等于说公共政策的特殊热点话题就不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不再使公众舆论产生分歧。然而,你要是还想用传统的政治观点来描述当前的政治选择和联盟,就要比以前更加困难了。

传统的两个政治极端——极左和极右——现在经常联系在一起,来反对外部势力,对抗他们共同害怕的欧洲统一趋势。反资本主义居然演变成了反全球化主义,尽管严格来讲,国内的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破坏性不强的一种势力,但反资本主义对于持本土保护主义立场的保守派和国际主义的激进派都有吸引力。至于政治上的中间势力——中右派与中左派政党之间的原有差异已基本消失殆尽。譬如,从广泛的当代问题来看,瑞典的

785

〔5〕 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外,就是一小撮德国的和英国的(尤其是英国的)疯狂的球迷们经常去国际性的比赛现场闹事,这种行为使别人都大惑不解。

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的新戴高乐主义者之间观点的共同之处,远远比和他们各自的相同意识形态的前辈们之间的共同点要多得多。欧洲的政治形势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仍然保留了用“左”和“右”两个方面考虑问题的传统,但是之间的差别却越来越模糊不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时代变迁的隙缝中幸存的传统派政党,其成员和投票人数也正在与日俱减。与此相仿的还有另一个同样脆弱的群体——即“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末,在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还有巴黎,就曾经有过知识分子踊跃参与政治的第一次热潮,其主要人物有像西奥多·赫茨尔,卡尔·克劳斯、莱昂·布吕姆等。但在一个世纪之后的欧洲,这些人的后继者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也已经迅速被边缘化了。

欧洲大陆知识分子群体的日渐式微,有诸多原因。在英国,这类知识分子一向少见,属于一种孤独的现象,通常是自我放逐的副产品,例如阿瑟·柯斯特勒和以赛亚·伯林。对于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人权、经济转型等等在中欧和东欧地区使政治知识分子动员起来的热点事物,现在的年轻一代毫无兴趣。像哈维尔这些上了年纪的道德学家,以及一度在政治界被尊奉为英雄的米尼奇克,都必将成为无人再愿重温的历史。切斯拉夫·米沃什曾经把美国人对纯粹物质产品的狂热追求描述为“让东欧的知识分子生气的现象”。现在他的这一说法越来越适用于他们自己的国民了。

在西欧,知识分子能起的激励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德国和法国的有品位的出版物的读者仍然定期去听君特·格拉斯或者雷吉斯·德布雷的激情的政治演说,但是知识分子的激励却迷失了方向,不知该把人们引向何处。虽然仍有很多值得道德学家们谴责的罪恶,但要动员起自己的追随者们来,他们缺少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战争,就连专制制度和极刑都已经从这块大陆上被消除了。堕胎、避孕几乎普遍存在了,同性恋也被允许并自由公开了,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掠夺,不管是全球范围的还是部分地区的,都在思想界燃起火焰。但是,既然没有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周密计划,这一场争论比较适合于思想库的智囊们,而不是哲学家。

86 欧洲知识分子唯一能把自己的道德真诚和确立普遍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领域,就是外交事务,这样就不用考虑本国内部政策制定时的大量需要妥协的因素,同时,是非对错、生老病死的问题仍然关系重大。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东欧和西欧的知识分子都热情洋溢地尽力去捍卫正义。像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克尔克罗就已经把自己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克罗地亚的事业。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法国和奥地利——当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借夸大的、甚至莫须有的罪名进犯塞尔维亚时,他们强烈谴责了这样的罪恶行径。根据一般性原则,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对科索沃和波斯尼亚内政的干涉,他们进一步扩展了20年前发起的关于人权的争论,争论的重点是塞尔维亚军队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但即便是在南斯拉夫危难之际,知识分子也没有重归公共政治生活的中心。在巴黎,伯纳德-昂利·利维有幸被邀请去爱丽舍宫做总统顾问,但这就和托尼·布莱尔偶尔会宴请自己喜欢的某些英国记者和作家一样,这些为建立自己的政治形象而精心设计的舞台似的表演,并没有影响到政治家们政策的制定。法国、英国乃至它们的任何一个盟友,都不会因为知识分子们的压力所迫,而在任何方面改变自己的政治计划。满怀热情的知识分子不会像以前那样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了,这在2003年北约组织分裂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那一年欧洲民众(和某些欧洲政界人士不同)都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事件上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对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过于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非常不满。然而对这样的担忧和焦虑,也有对立的声音存在,尽管这是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所发出的,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和组织起来。一些法国作家——仍然是利维、帕斯卡尔·布吕克内——拒绝谴责华盛顿,部分原因是担心太过于直接地和明确地反对美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站在美国反对“激进的伊斯兰”立场上,对美国也很理解。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

曾经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诸如米奇尼克和格鲁克思曼等人,都呼吁人们支持华盛顿的对伊政策,他们在自己早期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中进一步试图说明,在各地为了维护人权而执行的“自由的干涉主义”从普遍原则上来说是有理论根据的,他们还认为美国一贯都是反对政治罪恶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先锋。他们已经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美国总统有他们的理由执行他们的外交政策,但是却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他们原本那些听众抛弃,遭到孤立。

米奇尼克和格鲁克思曼观点的不合时宜,并没有妨碍这些观点对人们的影响。和他们持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2003年5月31日,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这两个欧洲最有名的作家、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战后我们的复兴:欧洲的重生》的文章,他们认为,美国的新的危险的道路给欧洲国家敲响了警钟,让欧洲国家能重新思考自己的共有的身份特征,找回他们共有的启蒙价值,形成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特殊的地位。

与此同时,西欧其他一些同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也相继发表类似的文章,其中有在 787
《共和国报》上发表文章的安伯托·艾柯,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的艾柯的同仁、意大利哲学家吉亚尼·瓦迪摩,在《新苏黎世报》发表文章的德国艺术学院院长、瑞士人阿道夫·穆希格,在《国家报》发表文章的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还有在《南德日报》上发表文章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如果是在上世纪任何时候,如此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这样有名的报纸上,这么一大批的知名人士,都将可能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宣言和行动都将可能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引起不小的波澜。

然而,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发动的这场运动虽然明确地表达了许多欧洲人的共同心声,但还是无人理会。各家媒体并没有大肆报道,也未被支持者运用。谁都没有敦促这些作者拿起他们的笔继续战斗。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包括法国、德国、比利时及后来的西班牙,无疑都基本同意这些文章所述的观点,但是并没有哪个政府愿意邀请德里达和埃柯教授去做他们的政治顾问。这样一场运动最终渐渐地平息了。在德雷夫斯事件的100年之后,让-保尔·萨特的完美典型的50年之后,欧洲范围内重要的知识分子们发出了呼吁——但是没有人响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60年里,欧美之间的大西洋联盟处于混乱状态。从冷战的结束上就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人愿意看到北约组织解散或被放弃,但是它的存在形式却没有什么意义,而它的将来目标也不明朗。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北约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军官极其憎恨和欧洲军官共同指挥战争,他们觉得欧洲军队的指挥官缩头缩尾,在实际行动上几乎无法给美军以有力的支持。

首先,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之后,北约组织被美国的反应逼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布什总统强硬的、仓促的单边主义政策让其北约盟国迟迟不愿意伸出援手,美国又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现在这些事实都使美国——包括它宣布要发动无限制的战争来打击“恐怖”——被看成对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主要威胁。

为了在美国的欧洲同盟军中加进楔子,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003年春声称,欧洲已经分为“旧欧洲—新欧洲”。但是这种新旧欧洲的划分方法丝毫也不能解释欧洲的内部分化形势,而且完全误导了它的对象。只有在波兰,美国才能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尊重。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新欧洲也好,旧欧洲也好,美国的对伊拉克以及其他很多政策都非常不得人心。^[6]但是在欧美苦心经营多年试图联合之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还以这样的方法来分裂欧洲,这不禁让人感叹:现在的美国本身就是欧洲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麻烦。

北约的建立是为了弥补西欧在没有美国的帮助时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欧洲政府一直无法形成自己有效的军事力量,这才使北约一直在起作用。从1993年签订《马斯特里

[6] 2003年1月,由英国和西班牙两国首相牵头,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八国政府签订了一份联合声明,成立八国亲美联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匈牙利和捷克私下表示,他们是在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e Maria Aznar)施加压力下,才签了这份联合声明的,为此他们非常不悦,也感到遗憾。一年之后,阿斯纳尔本人也在大选中失利而下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顾国人的强烈反对,使西班牙参加了入侵伊拉克的联盟。

赫特条约》起,虽然它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制定和修正仍然不明朗,但欧盟至少已经承认了自己需要这样一种共同的对外安全政策。欧洲在10年间已建立了一支6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力量强大,反应迅速,可用来完成干预别国内政和维和的目的。在法国的敦促下,欧洲各国政府正在达成一项协议,打算建立一支自我防御的军队,这支军队可能不受北约的限制而独立行动,这显然让美国大为不快。

但是大西洋两岸之间的隔阂还远不止在军事方面,甚至也不是经济上的冲突。虽然欧盟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能力给美国国会以及个别的美国企业施加压力,使他们遵守欧洲的规章制度,否则会把它们挤出欧洲的市场。这一进步引起了很多美国议员和商人的注意。欧洲不仅走出了美国的阴影,甚至还可以说是欧美关系出现了逆转。2000年,欧洲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达到9000亿美元(而美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额是6500亿美元),美国国内吸引的外来资金有70%来自欧洲,而且欧洲很多国家现在已拥有相当多美国的标志性企业,像布鲁克斯兄弟公司、蓝登书屋、肯特烟草公司、潘佐尔公司、鸟之眼公司、洛杉矶多杰斯棒球队,等等。

经济上的竞争虽然激烈,但还算是一个紧密的整体。真正能够把这两个大洲分开的却是日渐增长的价值观上的分歧。用《世界报》上的话来说,就是“跨大西洋的这两个大洲的价值观正在粉碎”。从欧洲来看,美国,这个在冷战过程中从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熟悉的国家,现在开始变得有点儿异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真挚的宗教感情——这在最近他们得到再度当选的总统身上可以反映出来——对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来说也不可理解了(即使比不上他们的那些更加虔诚的邻居穆斯林教徒)。美国人对于随身携带包
789
括全装备的半自动来复枪在内的各种武器的偏爱,让美国人的生活变得危机四伏、杂乱无章。同时,对于欧洲绝大多数的观察家们来说,极刑的滥用似乎也正在让美国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7〕

另外,华盛顿政府越来越不把国际公约放在眼里,它在对全球变暖问题到国际法等等所有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危机事件中扮演着几乎狂热的角色。2000年布什总统上台之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大西洋两岸的隔阂在很久之前就已形成。但这个新政府越加严厉的态度让许多欧洲的专栏家们坚信他们一向保留的怀疑:这不只是在一些零零散散的政治事件上的分歧。这些分歧越加证明了大西洋两岸的最基本的文化对抗性。

这种认为美国在文化上是完全不同的——或者低等的、或者带有威胁性的——想法

〔7〕“是的,美国大肆宣扬‘要爱你的邻居’,但是他们杀害和强奸他们的邻居,案发率使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感到震惊。”见T·R·雷德《欧洲的美国》(纽约,2004)第218页。

并非首次出现。在1983年,法国文化部部长雅克·朗就曾经发出警告说,广为流传的电视连续剧《达拉斯》就代表着美国文化对法国、甚至对欧洲文化的严重威胁。9年之后,当《侏罗纪公园》在巴黎的电影院上映的时候,他的保守派后任之一在信里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欧洲迪斯尼”于1992年春天开张时,来自巴黎的激进人士、电影导演亚里安·莫努什金更进一步警告说,这座娱乐公园就证明了“文化上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但这是众所周知的文化上势利倾向、不安全情绪的细微变化,以及某种大国沙文主义式的怀旧情绪的集中体现(在法国和在其他各处都一样)。在盟军反攻50周年纪念日,意大利前法西斯民族联盟党领袖詹弗兰科·菲尼在意大利日报《新闻报》上说:“如果我认为美国文化的登陆让欧洲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文化身份的话,希望不会被误解成是在为法西斯辩护。”

21世纪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在欧洲越来越普遍,并开始从文化和政治的领域向欧洲社会生活深处进一步发展。现代欧洲反美情绪的蔓延远远超过了越南战争时期,甚至也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平运动高涨的时候。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大西洋两岸关系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在2004年,有五分之三的欧洲人(在欧洲的另外一些国家里,这样认为的人很多,众所周知的有西班牙、斯洛伐克,更明显的还有土耳其等)都强烈地认为美国对这个世界的领导“很不理想”。

790 这种情况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相比对比尔·克林顿的感情来说,欧洲人对美国总统布什的政策、对他个人都普遍地十分反感。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许多欧洲人也对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大为恼火,可是他们对于东南亚战争的不满还不至于普遍转变成为对整个美国 and 所有美国人的反感,40年之后,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一种情绪(尤其是英国人民,他们强烈反对他们的首相积极和美国结盟的立场):美国正在误入歧途——或者如许多人坚持认为的那样,它一直都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实际上,以前所谓的欧洲“非美国式”的特质,正在迅速成为欧洲人自我身份认同中的最普遍的因素。欧洲人的价值观念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正在——或者说是应该努力地使一切都与美国不同。1998年11月,专门报道文化艺术的法德艺术电视台台长杰罗姆·克莱蒙特警告说,“欧洲的创造力”是防止美国的物质主义的唯一壁垒,他还特意指出,“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布拉格已经俨然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城市:不受限制的市场恣意发展,并且受到利润的无限诱惑。

布拉格在“后共产主义”之初与东欧其他地方一样,无疑被认为是罪恶地向往美国的一切,从个人自由到物质上的富有。从塔林到卢布尔雅那,凡是访问过东欧这些大城市的人,无一不会看到那些富有活力的新贵们——穿着考究的年轻男女。他们乘坐昂贵的新汽车,匆忙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约会中,去购买奢侈品,享受着克莱芒所描述的那个噩梦中

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但是即便是东欧人,也正在和美国模式撇清关系,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和他们的欧洲新联盟保持一致,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反感,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和社会模式来看,美国的道路看来不再是他们的选择了。〔8〕

极端的反美情绪在东欧仍然算不上主流,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这种情绪只是一种间接的、政治上可接受的对民族的共产主义表示怀念的方式,就像在过去一样,是一种反犹太主义的有用的代替品。但是即便是一些中间派的政治家和评论家,他们也不再把美国的制度和措施视为激励自己的精神之源和自己效仿的对象了。长期以来,美国都好像是另一个时代——是欧洲的未来。现在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当然,许多年轻人仍然梦想到美国去。但是正如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工作多年的匈牙利人对采访他的人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一个适合单身的年轻人来的地方,但当你上了一定的年纪,你还是应该回到欧洲去。 791

21 世纪的欧洲是中年人和不愿冒险的人们的乐园,而美国则是适合年轻人和喜欢冒险的人们生活的场所,这种形象的说法甚为流行,尤其是美国人本身也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欧洲正在走向衰老。2004 年,世界上 60 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数比率最高的 20 个国家中,除日本之外,其余全部在欧洲。许多欧洲国家的婴儿出生率都远远低于其人口的死亡率。在西班牙、希腊、波兰、德国和瑞典,每个妇女平均生育不到 1.4 个孩子。在东欧的部分国家(例如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每个妇女平均生育接近 1.1 个孩子,是世界上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最少的国家。以此推算,到 2040 年,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数将减少五分之一,甚至还不止。

似乎没有一种传统办法能够解决欧洲国家已经初现端倪的人口危机。贫穷如摩尔多瓦,富有如丹麦,它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天主教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年轻人过了 30 岁还(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未结婚的)经常和父母住在一起。但在信奉路德教派的国家瑞典,年轻人拥有自己的房子,拥有充足的国家资助的子女抚养金和产假。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人们比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平均拥有的孩子稍微多一点,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也都大同小异。若没有从欧洲以外迅速涌进来的移民的话,欧洲人口还要少,这些移民相比较来说更愿意生育。1960 年在德国,外来人口生育的孩子占这一年总的婴儿出生人数的 1.3%。40 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五分之一。

〔8〕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欧地区,新贵们以欧洲风格进餐、打扮、打电话、开车。他们不再需要效仿美国人去追求时尚,恰恰相反,美国人喜欢用的东西往往被认为是过时的、不上档次的。

实际上,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危机和大洋彼岸的美国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千禧年伊始,美国新生儿的出生率就已经低于其人口死亡率了。但不同之处在于,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的数量相当大——而且他们都绝大部分是年轻的成年人——所以美国总的人口出生率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内要远远超过欧洲国家,虽然在今后几十年里欧美都将要面临支付大量退休金和其他福利义务,但相对来讲,欧洲的福利制度覆盖面较广,所以它面临的形势也将更为严峻。

欧洲人显然正在面临着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如果有一天(什么时候说不定)没有足够的青壮年劳动力来支撑这样一个愈加庞大的退休人群的话,欧洲将会怎么样?现在这些不用纳税的退休人群比过去寿命要长,这对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一种非常严峻的考验。〔9〕有一个办法就是削减退休福利,另一个办法就是抬高享受退休福利的门槛——譬如说推迟人们的退休年龄。第三种选择就是向目前正在工作的纳税人的口袋里收取更多的税额。第四种办法,也只有英国真正考虑过(不过那时也是三心二意的),就是效仿美国,鼓励甚至强制人们向私人保险公司购买社会保险。所有这些解决办法都有可能会上引起爆炸性的反应。

按照欧洲福利国家自由市场的许多批评者们的观点,欧洲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人口危机,而是经济上的僵化,并不是没有(或者将会可能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而是有太多试图保障人民有权享有工作和收入的法律存在,这些法律、法规甚至也保障有权享有越来越高的失业补贴和收入,致使大家缺乏工作动力。如果这种劳动力市场疲软现象得到了解决,越来越多的人都将会愿意投身到劳动大军当中去,那么在职纳税人的负担将会减轻,欧洲僵化症方能够彻底根除。

这一针对欧洲僵化症的诊断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免太过片面。无疑,战后经济繁荣高峰时期制订的行之有效的福利制度,现在成了政府的巨大包袱。在德国,一个失业工人在失业后的32个月内可以领取他最后一周工资的60%(如果他有孩子,就是67%),32个月之后他们仍然可以继续无限期地领取最后一周工资的53%(或57%),这样的福利制度最终是否会导致人们懒惰,目前尚无定论,但它确实需要相当大数目的财政支付能力。此外,还有一系列旨在保证在岗职工利益制度的建立,让欧洲很多国家的企业主(尤其是法国)很难解雇他们的全职职工,他们因此经常不愿意轻易招聘员工,这势必也是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虽然欧洲的福利制度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显得相对保守和缺乏弹性,但

〔9〕 在1960年,法国的每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由4个在职劳动者支撑,到了2000年就只有2个劳动者支撑了。根据目前的趋势,到2020年就会发展到一对一的程度。

这并不说明欧洲的经济效率低下。2003年,从每个小时的工作效率来看,瑞士、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经济效率都和美国不相上下,爱尔兰、比利时、挪威、荷兰和法国都比美国的经济效率还要高。如果说美国总体上的经济效率相比更高的话——比如美国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提供更多的服务、拥有更多的金钱——那是因为美国在职人数比率比欧洲高,他们比欧洲人工作的时间更长(2000年人年平均工作时间超过300个小时),他们享受的假期要比欧洲人少得多,也短得多。

英国人每年法定的带薪假期是23天,法国是25天,瑞士30天以上,然而美国人的带薪假期却连这一半还不到,这还要看他们住在哪里。欧洲人能够特意选择少工作、少赚钱、但高质量的生活方式,欧洲人高额的纳税制度(在很多的英裔美国人看来,这是对经济增长和革新的又一个障碍)给他们带来的是他们能够享受免费的(或者几乎算是免费的)医疗保障服务、提前退休、范围相当宽泛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保障。在整个中学教育上,欧洲人要比美国人接受的教育好。欧洲人过得更有保障——也正是因为此,他们也 longer 更长寿、更健康(尽管他们花的钱要少得多^[10]),贫困人数所占比率也更低。

这就是“欧洲社会模式”,无疑,它的代价是昂贵的。但是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这种模式所承诺的工作上的保障、高昂税额和庞大的社会支付好似政府和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心照不宣的一份约定,根据每年一度的欧洲参数表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认为贫穷是因为社会大环境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无能。调查还显示,如果高税收是为了平衡贫富差距的话,他们宁愿支付。

可想而知,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样的观点也很普遍。在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想法也一样流行。在各阶层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国际性的一致看法,那就是:国家的职责就是保护公民免受来自市场或不幸事件的痛苦折磨。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不应该把职工当成是生产中不必要的一个单位。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应该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经济增长固然是件好事,但不能为了它就不惜一切代价。

欧洲模式还可以分为更多类型:北欧模式、莱茵兰模式和天主教模式(Catholic)等等,在这之下还有更具体的分类。这些模式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不是一种分散的体制或经济制度,也不是一种国家干预的特殊制度。有时候在一些文献和法律中就这样阐述过,它应该说是社会权利平等、人民团结、集体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它对现代国家来说是适合的,也是可能的。总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也不会相同,例如意大利和瑞典。但最后形成的社会

[10] 在2004年,医疗方面的财政支付用去了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的8%,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4%。瑞典政府支付了80%的医疗费用,然而美国联邦政府仅仅支付了45%。余下的部分由美国企业和企业员工自己负担。在美国共有4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一致意见,却是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团结。200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理打算对国家福利支付制度进行一些变革,正如10年之前戴高乐主义者执政的政府要推行类似的改革一样,由此引起了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

794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有人在不断进行尝试,想在保障社会稳定的欧洲模式和富有弹性的美国经济模式之间寻求一条新的道路。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其中一些人曾在美国的商学院或公司待过,这些人对缺乏灵活性的欧洲经济环境非常不满,力劝政府官员们引进流水作业线的做法,在经济发展中引进竞争机制。法国所谓的效仿美国派,开始让左派摒弃其反资本主义情结,保留其社会道德感。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高税收的抑制作用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圈子里也开始讨论起来(即便往往意见不一)。右派也开始认识到福利问题的重要性了,左派现在也感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好处。

试图把双方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和要找一个能够代替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政治的核心——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时的争论——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并非巧合。在20世纪末的一段短时期内,这个结果被称作“第三条道路”,从它的表面上来看,是把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生产热情和对社会结果以及集体利益的应有的考虑联系起来了。这样的做法几乎不算是一种全新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它和20世纪50年代路德维格·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别无二致。但是政治,尤其是后意识形态政治学,讲的就是一种形式。这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形式,后来被克林顿政府成功地借鉴到它的由左派和右派搭建的三角政治中,又被布莱尔政府更进一步地进行实践,他们的实践对政治观察家们起到了煽动性的作用。

当然,布莱尔有其独有的天时和地利方面的优势。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倾向非常偏向右派,在那时候,布莱尔的工党中的前任领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清除工党中的老左派,在“后撒切尔时代”的环境中,布莱尔不断鼓吹妥善分配社会福利的好处,这样的主张听起来就似乎相当进步,显得很有欧洲味道。同时,他还不断宣传自己对私有化的构想和自己对适合贸易发展的经济环境的政治追求,这样的论调就让他自己完全被放置到“亲美”阵营中。他热情洋溢地表示,一定要把英国发展成具有欧洲特色的强国,同时还坚持使自己的国家免受欧盟单一市场中欧洲法制和财政上的统一的限制。

在政治理论停滞不前几十年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出现,既是对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困境的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又是在观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欧洲大陆上对这一条道路的推崇者们,无视自己历史上那些“第三条道路”破产的事实——即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著名的“第三条道路”——而欣然从之。在雅克·达拉斯的领导(1985—1995)下,欧洲委员会不断地出台法令——用已近失传的费边式的官僚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引导欧

洲。布鲁塞尔也似乎很需要寻找第三条道路。它这种令人振奋的做法,使欧盟处在制度的缺席和规则的过度这两者之间摇摆。〔11〕 795

布莱尔全新的政治主张并未使其避免在 2003 年入侵伊拉克事件中做出的灾难性的决定,从而使国内一片混乱,布莱尔自己也被搞得声名狼藉,这让很多国外的政治观察家们意识到,新工党之所以选择第三条道路,是因为英国不愿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事实证明英国正在和美国一样,在穷人的基础上寻求大的发展——欧盟其他国家贫穷人数的比率即便有增长,幅度也很小。这样的事实让英国模式的光环完全消失殆尽了。但第三条道路总会有一个简短的保质期。其名称就暗含着两种极端——极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复存在(之前的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教条理论的想象)。关于理论上的(或者说是言论上的)重大突破的需求就这样消逝了。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私有化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曾一度引起了对公共部门分工和制度的广泛讨论,引起了对社会民主目标是否能够达到、公共资产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利益目的是否合理的质疑。然而到 2004 年,私有化成了注重实效的做法。在东欧,要成为欧盟成员的首要条件,就是完全同意布鲁塞尔对不遵循市场规律的公共部门的抨击。在法国或意大利,变卖公有资产现在成了极能在短期内减少每年度财政赤字、又能和欧盟政策保持一致的两全之策。

即便是托尼·布莱尔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计划,它从成本效益核算出发,给国家预算带来了一定的附加好处(例如他所大力提倡的伦敦地铁半私有化、在医疗服务系统引进竞争机制,等等)。但从这些做法所引起的关于社会原则的争论层面来看,这不过是后来对其客观结果的一种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布莱尔对民众的吸引力消失了(这一点从 2005 年 5 月他的第三次大选选票严重减少这一现象就能看得出来),他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做法,例如减少政府开支、决定退出欧洲社会宪章、减少企业税额、利用各种手段来鼓励内部投资,等等,但英国的生产效率仍然止步不前。用每小时的生产效率来计算,它还是赶不上那些“体制僵化”、受制度束缚的欧盟其他国家。

再者,新工党原本打算通过把债务转嫁到私人企业,来规避即将到来的欧洲国家入不敷出的公共养老规划带来的风险,但是这样的计划在自信地宣告实施后,不到 10 年就破产了。和美国一样,在英国,企业把养老基金投放到反复无常的股票市场之后,就很难实现对它们的员工们的长期承诺了,尤其是和依赖公共福利资金的人数一样多的员工们现在比过去的寿命要长得多。显然,如果国家不重新收回、并把支付养老金的企业的赤字补 796

〔11〕 在达拉斯的继任者的领导下,形势又摇摆回来了:欧盟委员会仍然像过去一样活跃起来,但却是试图引向一种毫无限制的市场经济。

上的话,许多人都将无法享受到全部的企业福利。“第三条道路”看上去和飞牌赌输赢的游戏简直是毫无区别。

21 世纪初,欧洲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左派和右派或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甚至更不是“美国式”或“欧洲式”的问题,因为人民的心里都十分明显地倾向于欧洲。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疑问,一个在 1945 年的历史中就已经被提上日程的疑问,这个疑问悄无声息地、坚持不懈地驱赶走了其他曾经吸引欧洲人民的要求,位居前列。那就是:对于这些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一种未来?他们有未来吗?

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个自治自理、和邻国除了一个共同的边界之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的单一的民主国家了。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丹麦人——甚至英国人——如今都是欧洲人。几百万的印度锡克教徒、孟加拉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塞内加尔人,等等,也都加入了欧洲人的行列。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国家都加入了——或者想加入欧盟,所以他们现在自然也就应该算是欧洲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单一市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商、其成员国在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下唯一的权力来源。

如今的社会固定生产要素(诸如能源、矿产、农田,甚至地理位置)等硬件方面的相对优势比不上教育、研究和投资等软件方面的有利政策时,欧盟在其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正像在市场的构成中,国家的作用——用制定政策来规范市场、劳动关系和商业行为——总是非常重要一样,现在由欧盟来制定这样的法律和法规;欧盟有自己的货币,所以也可以在市场上通过货币本身来发挥着一种近似垄断的权力。唯一留给成员国自己实施的重要的经济活动就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因为英国一再坚持要保留这样的权力。

但是人们是生活在社群中而不是生活在市场中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社群或自愿、或被迫(多数时候是后者)聚集成群,成为国家。在经历了 1914—1945 年的世界大战之后,各地的欧洲人都觉得国家的建立是各民族的头等大事;20 世纪 40 年代的社会大事表就反映了这样的比什么都迫切的需求。然而随着经济繁荣、社会和平、国际局势的稳定,这样的一种需求也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强行公共权力的质疑、对个人权威的期望和取消限制个人能动性政策的要求。而且在超级大国的时代,欧洲的命运似乎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因此越来越显得可有可无。但是,自从 1990 年以来——2001 年以来就更加如此了——这些国家似乎又开始显得举足轻重起来。

早期的现代国家有两种功能紧密相关:征税和发动战争。欧盟并非一个国家,它既不征税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大家都知道,事实上用了很长时间,它才获得了初步的军

事能力,更不用说制定对外政策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反感再进行一场欧洲战争,他们要防御的唯一潜在敌人已经转向了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了。

2001 年 9·11 事件后,为欧洲前途而开的这张“后民族”时代的处方,其局限性暴露无遗。传统的欧洲国家毕竟不仅仅对外作战,也还要维护国内和平。就像是霍布斯在很久以前认识到的那样,这就赋予了国家鲜明的、不可代替的合法地位。最近几年,非武装平民的暴力政治冲突在一些国家时有发生(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重要性——它的警察、军队、情报机关和司法机构——永远存在。在恐怖主义横行的时代,国家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掌控是对大部分民众的安全非常重要的保证。

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是国家的职责所在。没有什么能够证明布鲁塞尔(欧盟)将要或者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负担起这样的责任。从这样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国家是本国公民重要的合法代表,尽管欧盟也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权力,但在这方面却不能和国家相提并论。欧洲人可以享受到越过自己的政府首领直接向欧洲法官申诉的权力,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明白,德国或是英国的国家法庭为何会如此乐意接受斯特拉斯堡或者卢森堡的判决。但是当要想解决或排除枪支、炸弹携带者时,责任(因此也是权力)就一定在伦敦或柏林,试想如果一个欧洲的公民房子被炸弹炸毁了,他到底会怎么办?难道会给欧盟的官员打电话吗?

合法性是一种职责功能——在一些分散的地区,例如超联邦制的比利时政府,有时似乎因为不能保证公民的安全,因此它的合法地位就受到质疑。尽管政府职能源于军事力量,但即便是到了今天也并不止于此。只要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跨国的实体,它就负担着保障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失业人员的正常生活、下一代人的教育等等责任,这个国家专享的、以一定的形式存在的政治合法性也就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在 20 世纪的历程中,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对其公民的福利、安全和生活承担着相当一部分的责任。在最近几年里,它又卸掉了监管公民道德的职责,以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的经济上的职责,但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变化。

合法性也是一种领土功能。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述,从领土方面来看,欧盟如同原始猛兽,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领域。虽然它的法律和制度是有领域性的,其公民可以对自己的地方和对全欧洲进行投票,但却不能够相互在别人国家的选举中投票。和自己的出生地或居住地所在国家的内部事务相比,人们在欧洲范围的日常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微乎其微,这样看来,欧盟的地域影响力就看不出来了。其实,欧盟的确是一个能够提供经济或其他服务的组织,但是这就把它的公民定义为消费者而不是参与者——它是

“由一群被动的人组织的、由陌生人掌管的一个实体”，这就很容易激起一些负面的比较，把它和民主时代以前的西班牙和波兰等国家、或者和阿登纳时代西德静止的政治文化相比较，欧盟就显得虽然野心勃勃但毫无成功希望。

公民身份、民主、权利和义务是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有着公民踊跃参与政治的传统的国家里。公民亲自参与政治相当重要：参与到你感到自己是其中一分子的那个国家之中。即便是在一个有着超速火车和仿真的电子通讯时代，你仍然不知道在例如葡萄牙的玻因布拉市或者波兰的热舒夫市之类的地区怎样才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为了保留这个概念的含义——为了欧洲人怎样从有利的意义上参与政务——他们把可预见的将来寄希望于里斯本或者华沙，而不是布鲁塞尔。如今世界上的大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是或者由集权形式领导，或者政权相对分散，而人们对联邦首都及其全部工作的效率是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的。

表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在 2005 年，欧盟没有取代传统的边界意义上的国家，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不可能取代。在希特勒失败 60 多年后，多重身份、主权和边界一起规定了欧洲及其历史，这些因素自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环环相扣。所谓新的、外面的观察家们很难理解的现象，就是既有法国特色又有欧洲特色，或者既有加泰罗尼亚特色又有欧洲特色——抑或是既有阿拉伯特色又有欧洲特色的可能性。

99 有特色的民族和国家并未消失，正像这个世界还没有统一成为“美国模式”一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展现出了社会形式的多样性和对市场与国家问题上视角的多重性，所以说，欧洲也喜欢民族和传统。我们误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后民族”或“后国家”的世界，是因为太过于注重全球化的经济进程，因而误认为相似的、跨民族的发展模式也一定会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效。单从生产和贸易过程来看，欧洲实际上已形成了跨民族的连贯流程波浪图。但是如果从权力、政治合法性、或者文化亲和力方面来看，欧洲仍然和过去一样，是由离散的国家组成的。民族主义瞬息万变；^{〔12〕}但民族和国家仍然存在。

想一想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欧洲人相互之间的行为，这就相当明显了。如果要从 1945 年的历史碎片来看的话，那就不可能预期未来了。实际上，欧洲多灾多难的各民族、它们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制度在欧洲大陆 30 年战争中产生的复兴，将可能会被看成是比集体创造了一个跨国的联盟组织更有成就。后者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被

〔12〕 这是指在欧洲，而不是在美国。20 世纪末进行的全球性调查显示，在美国，75% 的人表示自己有民族自豪感。在欧洲，只有在爱尔兰和波兰，才会有大部分人怀着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其他地区拥有民族自豪感的人所占总人数的比率从 49%（拉脱维亚人）到 17%（前西德人）不等。

排到了欧洲的大事议程上来了,甚至还可以说是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它的建立。然而,从总体来看,不用说匈牙利和立陶宛,就连德国、波兰或者是法国的复苏,在那个时候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更不可预料到的——实际上就在几十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是21世纪初欧洲居然成了国际美德的模范:在一系列道德和国际关系制度方面,它被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的人标举为效仿的典范。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选择美国模式的幻灭而产生的反响。但是它却赢来了良好的声誉,并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在去除了自己过去的罪孽和动荡之后,欧洲崭新的形象是否能够顺利地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人民怎样对他们中间和他们之外的非欧洲人做出反应。在21世纪之初纷扰频仍的年代,这依旧是一个公开的问题。

早在170多年前的民族主义时代之初,德国诗人海涅对两种集体精神做出了清楚的划分:

我们(德国人)被要求爱国,所以我们就爱国,我们做我们的统治者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绝不是法国人所说的爱国主义,虽然和他们所说的那种情绪有着同样的名称。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意味着他的心是热情的,这种热情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宽广和辽阔,能使人不仅仅爱自己的亲人,还爱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文明世界。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则意味着他的心灵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德国人憎恨所有外来的东西,更不想成为一个属于世界的公民,也不想成为欧洲的一员,他只想成为一个狭隘的德国人。

当然,如今法国和德国不再是批评家们的矛头所指了,但是海涅指出的两种爱国主义 800 的选择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当代欧洲的状况。如果新兴的欧洲倾向于德国式的选择,“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成一种防御性的狭隘主义——2005年春的法国和荷兰的国民公投就预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大多数人都明确拒绝接受提交表决的欧洲“宪法”——那么将会错过大好的机会,欧盟将不会超越其作为组织机构的功能。它最多只能是其成员国自身利益的总和,还有就是在最高层面上共同拥有一个代理机构。

但是,如果欧洲的爱国主义能够突破自我的局限,像海涅所说的理想的法国式爱国主义那样,展开双臂去拥抱整个文明世界,那么更多的事情都是可以实现的。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在此期间,欧洲跌落到深渊,这个古老大陆的复苏是一个缓慢而又不明确的过程。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过程永远没有结束——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提供全球通用的模式。尽管

欧洲对于自己的过去很憎恶——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此——但也只有欧洲人才能够向世界提供一些温和的建议,建议这个世界不再重复欧洲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虽然在 60 年前很少有人能预料到,但 21 世纪将可能是属于欧洲的世纪。

跋

来自死者之屋

——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邪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 803

——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

——汉娜·阿伦特,1945年

忘却,我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历史错误,但它是创立一个
国家的关键性要素;因此历史研究的过程对于民族认同而言
往往是一种威胁……一个国家的本质就是所有的个人
都拥有许多共同点,并且已经忘却了许多事情。

——欧内斯特·瑞南

对这一阶段历史事件的一切研究都必须追踪或联系到奥斯威辛事件
……在这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达到了它的极限。

——索尔·弗里德兰德

海因利希·海涅总结道,对于犹太人来说,洗礼是他们“进入欧洲的门票”。但那是在1825年,当时要被近代世界接纳的代价是抛弃压抑性的犹太民族与世界的分歧和隔阂。而在今天,进入欧洲的代价已经有所改变。海涅具有远见地宣告一个“狂野、黑暗的时代正在向着我们轰隆而至”,人们因此认为他看待问题会比任何人都要深刻,这其实是一种具有讽

刺性的误解。意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的那些人,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首先必须背起一个新的、更加沉重的历史包袱。今天,相应的欧洲标准不是洗礼,而是种族灭绝。

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为了结束他的国家那段痛苦的历史,使波兰与它的欧盟伙伴步调一致,在 2004 年正式承认波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包括来自波兰同胞的迫害。而在次年,即使是将要离职的罗马尼亚总统,为了完成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的雄图大业,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被迫承认他和他的幕僚们长期以来费尽心机否认的历史——罗马尼亚在毁灭欧洲犹太人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它的角色……

当然,完全融入欧洲大家庭的评判标准还有其他种。土耳其继续拒绝承认曾经在 04 1915 年对亚美尼亚人进行过种族屠杀,这将是它申请成为欧洲一员的绊脚石。同病相怜的还有塞尔维亚,在它的政界承担起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的种族屠杀和其他罪行之前,塞尔维亚不得不继续在欧洲的门口苦苦徘徊。然而,这些罪行之所以遭受政治指控,“欧洲”之所以承担责任,确保它们受到重视,并把足够重视它们的人定义为“欧洲人”,皆是因为这一切只是他们罪行的冰山一角:这种罪行就是某个群体的欧洲人想把在欧洲生活的另一个群体赶尽杀绝。这种罪行就发生在欧洲本土,仍在世人的记忆中。

希特勒在欧洲实施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不仅仅是战后国际法律体系中“种族屠杀”或“反人类罪”这些关键领域的根源。它也判定了人们对此评论时的道德立场(在某些欧洲国家甚至是法律地位)。否认或者漠视“浩劫”——也就是“大屠杀”,则被视为文明的公共话语中无法忍受的行为。这就是主流政治家们尽其所能,避免与让-玛丽·勒庞之流的政治蛊惑家们产生干系的原因。现代的“大屠杀”已经远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那个难以否认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欧洲人再也无法忽视的。就在欧洲准备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最后一座纪念馆落成开幕,最后一批幸存老兵和受害者接受表彰之时,对死于战争中的欧洲犹太人的追忆成为欧洲大陆人性回归最恰当的认可和保证。但在过去,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欧洲犹太人所蒙受的灾难从来都没有疑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估计有 600 万犹太人遭到了杀害,这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内便得到了广泛的共识。那些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不管是在难民营还是在原籍国,都是死亡人数的有力证人。在奥地利,被流放的 12.6 万名犹太人,仅有 4500 名从战争中返回。战前的荷兰共有 14 万名犹太人,其中 11 万名遭到驱逐——能够返回荷兰的犹太人不到 5 000 名。在 1940 年至 1944 年期间,法国共有 7.6 万名犹太人(大多数出生于国外)被流放,幸存下来的不到 3%。远东地区的情况更加恶劣:在波兰,战前人口超过 300 万的犹太人,其中 97.5% 被屠杀。在德国本土,截至

1945年5月,60万名德国犹太人只活下来21450名。

重返家园的犹太人幸存者并没有受到夹道欢迎。在多年的反犹太思想宣传的影响之下,各地的当地居民不仅将自己的战争苦难怪在犹太人头上,而且显然因为被他们夺走了工作、财产和住所的犹太人的归来感到沮丧不已。1945年4月19日,在法国巴黎的第四行政区,几百名法国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一名被流放的犹太人要求归还他(被夺去)的住宅。在被驱散之前,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暴乱,示威人群大声高喊“法国属于法国人”的口号。毫无疑问,受人敬重的法国天主教哲学家加伯列尔·马塞尔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但几个月后,他毫无窘迫地在《基督见证人》杂志中如此写道:“那些犹太人过分地自以为是”,他们恨不得“接手一切”。805

难怪后来的法国政府部长西蒙娜·韦伊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回来之后写道:“我们曾经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然而我们当中有几个人是这样的呢。”在法国(在比利时也是如此),幸存的抵抗者在流放归来之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被视为拯救祖国荣誉的英雄。然而,因为人种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受到驱逐的犹太人却无法得到相同的待遇。无论如何,戴高乐(与丘吉尔一样)令人不解地无视遭受希特勒迫害的受难者的人种特殊性,宁愿把纳粹主义理解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背景下的产物。纽伦堡审判的法国检察官弗朗索瓦·德·门松始终对“反人类罪”这一概念感到不安:他更愿意使用“反和平罪”这一术语。而在审判过程中,他自始至终没有提及犹太人被谋杀或被驱逐的事实。〔1〕

将近3年后,也就是1948年1月11日,《世界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的社论,它在动情地谈论“28万名被驱逐出境者,只有2.5万人幸存”的同时,却没有一次提到过“犹太”这个字眼。根据1948年通过的法案,法语中的“被驱逐出境者”一词只适用于因为政治或者抵抗入侵者的原因遭到驱逐的法国公民或居民。被驱逐的法国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被送往的集中营的性质,或者他们到达集中营之后的命运得到任何区分。因此被关进列车,运往奥斯威辛并被毒气屠杀的犹太儿童在官方文件里一律被描述为“政治流亡者”。无意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犹太儿童都在国外出生,他们在法国宪兵的威逼下离开父母,后来在官方文件或者纪念碑上则被称为“为法国而死”。〔2〕

〔1〕 美国检察官泰尔福特·泰勒在回忆录中对此事表示吃惊,但承认当时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的陈述透露了其中的内情。参见泰尔福特·泰勒的《纽伦堡审判之剖析》(纽约,1992年),第296页。

〔2〕 奥尔良附近的皮思维尔镇曾经关过遭到围捕的巴黎犹太儿童,直到他们被运到东部。皮尔维斯镇于1957年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纪念我们为了法兰西而死的流放者”的碑文。一直到了1992年,当地政府才换上了新的纪念碑面板,碑文更改为“纪念1942年7月19日到9月6日期间被拘留在皮尔维斯集中营,之后流放到奥斯威辛并遭到杀害的2300名犹太儿童”。虽然不那么令人欣慰,但这句碑文显然要比前者准确多了。

比利时的天主教各党派在战后第一次议会的会议上反对给予“仅因种族原因被拘留的犹太人”任何补偿,暗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为黑市交易商。事实上,比利时的犹太人被剥夺战后援助的情况愈演愈烈。由于95%从比利时驱逐出去的犹太人都属于外籍或者无国籍人士,战后通过的一项法律条款规定:除非参加过抵抗组织,否则留在比利时的犹太人将不得接受任何公共援助。1944年10月,比利时当局将无法提供比利时公民身份证明的犹太幸存者笼统地归类为“德国”国籍。这个措施从理论上消除了所有战时的“种族”区分,但它也将幸存的犹太人推向“实为通敌外侨”的那一方,因此他们不仅要面临着被拘留的危险,而且也被剥夺了财产(直到1947年才被归还)。这些法律措施随后所带来的好处是这些犹太人能够永久性返回德国,因为他们不再会受到纳粹迫害的威胁。

在荷兰,根据荷兰抵抗报纸《自由荷兰》的报道,当地市民与市政领导人欣然合作,坚决反对那些数量少得可怜的犹太人返回荷兰,就连纳粹分子都为他们自取其辱的行为感到吃惊。作为返回犹太人中的一员,丽塔·库普曼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回来了。只不过希望自己不在这里——挨饿的滋味是多么难受!”事实上,荷兰人在1944年至1945年那段“饥饿的冬天”期间吃尽了苦头,很多犹太人被驱逐之后,空出来的房屋成为木头和其他物资的重要来源,而在阿姆斯特丹,情况更是如此。然而,战时荷兰政府机构相互勾结,积极辨认和围捕犹太人,但战后的政府当局却自认为良心清白,没有义务给予犹太人任何特别的补偿。恰恰相反,他们还为自己拒绝以种族或其他任何标准来区分荷兰人而感到沾沾自喜,从而将失踪的犹太人的身份埋藏在杳无行迹的历史尘烟之中。在50年代,身为天主教徒身份的荷兰首相们甚至委婉地否决了为筹建奥斯威辛国际纪念碑捐款的提议,指责该提议为“共产主义宣传”。

在东欧,承认迫害犹太人的事实的可能性更加微小,更不用说要对此做出补偿了。在战后紧接着的几年里,东欧犹太人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1946年8月,一位名叫维托德·库拉的非犹太裔波兰人从罗兹坐火车到弗罗茨瓦夫,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对犹太家庭的冷嘲热讽。他如此写道:“普通的波兰知识分子意识不到现在的波兰犹太人不能开车,不愿冒险乘火车,不敢让孩子参加学校郊游;他不能去边远地区,宁愿呆在大城市,也不愿意去中等城市,夜幕降临之后出去散步显然很不明智。在受尽6年之久的折磨之后,只有英雄人物才有勇气在这种氛围里继续生活下去。”

在德国战败之后,很多居住在东欧的犹太人继续采取他们战时的生存策略:在同事、邻居、甚至是自己孩子的面前隐藏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最好的情况是能融入到战后的社会生活中,至少也得做出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表象。不仅是东欧如此。在法国,尽管新法律禁止发表战前的公众反犹太言论,维希政权时期的遗风却仍然存在。为后一代人所忌讳

的话题并没有被禁止,为后人所不齿的行为也仍然广为流行。就像在 30 年代那样,左派 807 分子也不免要插入一脚。1948 年,共产党的国会议员阿瑟·拉梅特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到莱昂·布吕姆、朱尔斯·莫奇、雷内·迈尔等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家身上,试图凸显他们与自己党内国会议员的不同出处,并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法国名字”(这种言论其实既失体面,又与事实不符)。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选择:要么离开(一旦以色列建国成功,他们可以去那里,或者去在 1940 年打开国门的美国),要么保持缄默,并且尽可能地远离公众视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确实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渴望去说出真相,并为之作证。用普莱姆·列维的话来说,他是被一种“纯粹,病态的诉说责任感”驱使着,写下了他刚刚经历过的一切的。然而列维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具有启示意义。1946 年他将记录了在奥斯威辛的亲身监禁经历的《如果这是个男人》一书交付给当时最前卫的意大利左翼出版社——艾因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但最终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列维书中对自己所遭迫害和幸存经历的描述是以一位犹太人、而不是以抵抗者的流放经历开头的,这与意大利令人振奋的全国性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报告文学不相符合。

《如果这是个男人》一书转给了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但仅仅印刷了 2 500 本。这些书中的绝大多数一直被遗弃在佛罗伦萨的一间仓库里,尽毁于 20 年后的一场大水灾中。列维的回忆录一直到了 1959 年才在英国得到出版,但只卖出了几百本(该书在美国版本《奥斯威辛幸存者》也直到 20 年后才开始畅销)。法国最知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在很长时间内都拒绝购买任何一本列维著作的出版权;直到他在 1987 年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和影响力才在法国得到认可。与他著作中的主题一样,由于无人愿意去倾听,他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都默默无闻。到了 1955 年,他意识到谈论集中营已经成为了一种“卑鄙”的行为:“你得冒着人们指责你靠受难者身份吃饭,或者指责你有暴露癖的风险”。另一位奥斯威辛幸存者朱丽安娜·泰德西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我遇到过不想了解真相的人,因为意大利人也遭受了苦难,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没有被关进集中营里的经历……他们那时总是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切都结束了’,因此我保持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3〕

即使是在英国,公众也不会去讨论大屠杀问题。布痕瓦尔德是具有代表性的监禁法国人的集中营,其中关押着拥有组织严密的委员会的共产党政治犯。与此相似,战后的英国具有标志性的纳粹集中营不是奥斯威辛,而是卑尔根—贝尔森(被英国军队解放);当战争接近尾声时,电影院开始公映战时拍摄的新闻影片,影片中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却没有

〔3〕 朱丽安娜·泰德希的话引自尼可拉·卡拉乔洛的《避无定所:大屠杀中的意大利和犹太人》(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5),第 121 页。

308 被特别地指明为犹太人。〔4〕战后的英国犹太人也往往倾向于保持他们一贯低调的形象，将往事深埋在心底。作为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代，杰里米·阿德勒在1996年回顾在英国的童年生活时说：“尽管家庭里讨论大屠杀时可以无话不说，但在其他场所他们却是讳莫如深。我的朋友们可以将自己父亲在沙漠里与德国山地守军的战斗经历吹得天花乱坠，而我却对自己父亲的经历感到难以启齿。直到不久前他们都还是默默无闻。从抑制到痴迷，英国公众对这个话题的态度转变经历了将近50年的时间。”〔5〕

回顾历史，最惊人的是那种普遍的特点，即忽略某些事情。遗忘犹太种族屠杀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那些有充足的理由不去回想这个问题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或波兰。以澳大利亚为例，它的人口数量仅是德国战前的十分之一，但它所提供的集中营守卫却占据了所有数目的一半）；它同时还出现在意大利，尽管大多数意大利人没有必要为这场冤案感到羞耻；英国也一样，不同的是英国人是怀着骄傲，甚至是带着怀旧之情来看待那段战争岁月的。当然，冷战的开始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之一。〔6〕但是还有其他原因。除了把战争的起因怪在犹太人头上以外，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无关，并且非常反感把蒙难的犹太人列为头等大事。

“大屠杀”远非是人们所要忘却的全部：“战争过后的那些丰年里……欧洲人把‘集体失忆’当作挡箭牌（汉斯·玛格努斯·恩岑斯伯格语）。几百万欧洲人在战争中与法西斯当局和占领军妥协，勾结战时特务机构和统治者，受尽不为人知的羞辱，百经物质上的困难和个人的不幸，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远离不久前的过去，或者为了达到更好的目的而篡改这段历史。”法国历史学家亨利·卢梭后来所称的“维希综合征”，指的就是人们数十年来一直难以接受那场战争的真相，从而不由自主地试图尘封那段历史，或者为了维持战后脆弱的社会关系而改写历史。而这种“维希综合征”绝非法国所仅有的。

309 被占领的欧洲各国均形成了各自的“维希综合征”。例如，在战争时期不管是在自己的家园里还是在战俘营，意大利人都备尝艰辛，这就转移了公众对意大利人给其他民

〔4〕 在战后的英国，极瘦弱者或者重病人可以形容成为长着一副“从贝尔森出来的样子”。在法国，露天的“鬼屋”被标记为“布痕瓦尔德”，用来吸引喜好探秘的游客。

〔5〕 参考1996年10月4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在英国，并非是犹太人率先在大屠杀问题上保持慎言的。丘吉尔领导下的战时政府决定在对德宣传时，隐瞒了有关死亡集中营的信息，以免激起更严重的反犹太情绪，而战时情报机构的报告则显示这种情绪在伦敦某些地区已经甚为严重。

〔6〕 在美国尤为如此。1995年美国国会“难民委员会”表示：“波罗的海党卫军”部队在意图、意识、行动、规格上有别于德国纳粹党卫军。因此该委员会不会将其所作所为视为针对美国政府的敌对行为。波罗的海党卫军在东部前线折磨和残杀犹太人的残忍和狂热程度，没有哪支部队能出其右，但是，冷战的异常环境使得他们成了“我们的”纳粹。在此，我对莱斯大学的丹尼尔·科恩教授提供此信息表示感激。

族——例如巴尔干半岛,或者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苦难的注意力。荷兰人和波兰人的战争故事将在数十年内维持着国家的自我形象——荷兰人尤为如此,他们重视自己国家的反抗形象,但却尽其所能忘掉这样的事实:2.3 万荷兰人曾经自愿加入党卫军,组成了西欧最大的纳粹分遣队。即使是挪威也不例外,1940 年前后,超过两成的挪威军官志愿加入了维德孔·吉斯林的新纳粹“民族统一党”。尽管解放运动、抵抗组织和流亡者,甚至连敦刻尔克大捷或 1944 年的华沙起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修补、美化国家形象的作用,但大屠杀却对此“毫无用处”。〔7〕

在某些方面,相比之下德国人调查和承认他们的罪行严重性的难度事实上要小一些。当然,在一开始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去纳粹化”是怎样以失败告终的。早期的联邦德国历史教育仅限于威廉帝国时期以前。除了像库尔特·舒马赫这样的政治家在 1947 年 6 月极为罕见地警告自己的同胞最好学会“为了德国和全世界的犹太人说一次话”以外,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德国公众人物都在设法逃避“最终方案”这个话题。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卡辛在 1952 年时评论说:对于他在科隆的学生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谁都不应该再提这场战争。我的学生对战争一个字也不愿意谈。”西德人在回顾这场战争时,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苦难。50 年代末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西德人把战后盟军占领的时期视为“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正如 1946 年的一些观察家所预测的那样,德国人甩掉了希特勒这个包袱:他们把“元首”当作替罪羊献给全世界,从而逃避了惩罚和道义上的谴责。人们对于希特勒所造成的后果确实有着极大的怨恨——但也只是因为他给德国人带来了灾难,与他和德国人对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无关。这些年来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将枪口对准犹太人,似乎是希特勒最大的错误,而不是他最严重的罪行。在 1952 年的一次调查中,将近四成的西德成年人毫不迟疑地告诉调查专家:德国“最好”不要有犹太人居住。

由于附近相对缺乏警醒纳粹暴行的纪念场所,人们对此问题的类似看法有增无减。纳粹煞费心机地挑选了远离“旧帝国”的地点来修建主要的死亡集中营。这不是说地理位置的远近本身决定了人们敏感的程度。事实上“达豪”是慕尼黑的一个郊区,离市中心也就是一趟电车的路程,当地人们也并没有因为它近在咫尺而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一切。810 巴伐利亚议会于 1948 年 1 月通过匿名投票决定,将“达豪集中营”遗址改建成一座“劳改营”,也就是针对“游手好闲,反社会分子”所设立的强制性劳工营。就像汉娜·阿伦特在 1950 年访问德国后所说的那样:“人们对于发生过的事情无动于衷的现象随处可见,但这很难说是他们有意不去哀悼,还是缺乏真情。”1955 年,法兰克福法院宣布豁免一位名叫

〔7〕 当然以色列除外。

彼得斯的医生。他曾经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为纳粹党卫军提供名为“齐克隆 B”的毒气,但却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该毒气曾用于屠杀流亡者”而免于起诉。

然而,唯独在欧洲,德国人无法否认他们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他们可以不去谈论这件事,可以坚持说自己也受了苦,可以将责任推给“一小撮”纳粹分子,但却难辞其咎,把种族灭绝的罪行推到别人头上。就算是阿登纳本人,在公众面前也从来不发表除了对犹太人“受害者”表示同情以外的言论,也没有指证过那些迫害者的身份,最终也不得不与以色列签订了赔款条约。尽管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是作为同胞的意大利人均对普莱姆·列维的回忆录毫无兴趣,但他的《安妮·弗兰克日记》(虽然此书的内容来源比其他书更加公开)在 1960 年之前就已经售出了 70 万本,成为德国历史上销售量最大的平装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德军在东部前线所犯下的罪行进行的调查尽管来得太迟,但它所促成的一系列审判成为德国人自我反省的导火线。这些审判始于 1958 年对战时乌尔姆“干预小组”成员的诉讼,随后阿道夫·艾希曼锒铛入狱并受到了起诉,之后以 1963 年 12 月和 1965 年 8 月间在法兰克福对审判奥斯威辛守卫的审判告终。这些审判过程也是集中营幸存者战后得以公开他们悲惨经历的首次机遇。同时,联邦法律所规定的针对谋杀案件的 20 年“法定时效”也得到了延长(尽管没有被取消)。

这种气氛上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50 年代末所出现的一系列反犹太主义破坏活动,以及日益明显的德国年轻一代对“第三帝国”历史的一无所知。德国年轻一代人的父母不会告诉他们有关于“第三帝国”的任何事情,而他们的老师也绝口不谈。从 1962 年起,西德有 10 个地区宣布 1933 年至 1945 年间的、包括犹太人种族屠杀的所有历史,从此成为所有学校的必修科目。康拉德·阿登纳原先的战后预测也因此被推翻:德国的民主状况要求人们记住、而不是忘记纳粹主义。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行”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将“战争罪行”与“国家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新一代的德国人接受教育,认识到纳粹暴行的本质和恶劣性。而《明星周刊》和《快报》之流的杂志也无法再像 50 年代那样淡化集中营问题的重要性,甚至为“好纳粹分子”歌功颂德。

811 在某种程度上,德国民众也逐渐意识到德国的近代史是多么的野蛮和无耻。

但是这种改变也不应该被夸大。在 60 年代,西德的总理(基辛格)和联邦总统(汉斯·吕布克)职务均由前纳粹分子担任,这与青年时事评论员(参见本书第 12 章)所指出的那个波恩共和国政府的自我形象大相径庭。在道出纳粹的真相与承认德国人应须承担的集体责任方面,两者大不相同,至今大多数的政界人物对此仍旧保持沉默。此外,在 1967 年,有 32% 的德国人认为希特勒若不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将步入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尽管这个比例(其中德国的中老年人占了绝大多数)低于 1955 年的 48%,但

仍然让人感到难以心安。

接下来的10年才是真正的转变时期。持续了6天的1967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被杀事件,以及最后1979年1月德国广播《大屠杀》的电视连续短剧,这一系列事件将犹太人和他们遭受的灾难推到了德国公共议程的前台。其中,《大屠杀》系列片的影响显然最为重大。作为最纯粹的美国商业电视节目,《大屠杀》(如本书第14章所述)情节简单,大部分角色不够真实,叙事的安排纯粹是为了产生最大的情感效应,因此遭到了从艾德加·赖兹到克劳德·朗兹曼等人的恶评和痛骂,被指责为由德国历史改编而成的美国肥皂剧,它把一些本来难以启齿、令人费解的事情变得庸俗而简单。

但这些局限性恰恰说明了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力。这部电视片连续4个晚上在西德的国家电视台播出,据估计有2000万之多的德国人收看了该剧——远远超出了成年人数量的一半。该剧的上映与对马伊达内克死亡集中营的前卫兵的审讯恰好形成巧合,提醒观看的德国人此事还未了结。此剧对公众的影响超乎寻常。6个月后,西德联邦议院投票废除了针对谋杀案件的时效条例(应该被记录在案的是:在投反对票的所有人中,后来当选为总理的赫尔默特·科尔赫然在列)。从此以后,德国人了解“浩劫”主题的深刻程度处在欧洲人的前列,他们活跃在全世界的最前沿,督促公众对于他们国家的暴行保持清醒的头脑。在1968年,总共才有471个学校团体访问了达豪集中营,而到了70年代末,每年的访问数量就远远超过了5000个。

了解并公开承认40年前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如后来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所示,要把它写入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却仍然是个两难的、棘手的问题。坚持将希特勒本人、他所发起的运动和他的罪行看作是特殊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观点在包括迄今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在内的一些保守学者看来,始终是不适宜的。他们坚持认为:要了解纳粹主义,就必须将它放在它的时代和空间背景之中。根据诺尔特的观点,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以及它后来那些更为怪诞的形式,首先是一种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响应:他们追随列宁和他的继承人,模仿后者所创立的部分模式,甚至模仿了他们的恐吓手法。诺尔特在1986年6月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为这种观点进行辩解,称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减轻纳粹的罪行,但如果缺少布尔什维克这个前提,就无法对其做出解释。现在是到了把“大屠杀”置于更为广阔的现代种族屠杀范畴,去重新审视纳粹时代的时候了。

尤尔根·哈贝马斯最先对诺尔特做出了回应。像恩岑斯贝格、君特·格拉斯以及“怀疑的一代”的其他成员一样,哈贝马斯的岁数足以让他将纳粹主义铭记在心,因此他强烈怀疑任何“界定”德国罪责的企图。胡说八道!诺尔特如此回答道:纳粹主义问题的

重点不在于如何“定位”或“历史背景化”——这种念头正是任何一名德国人都无法轻易接受的诱惑。纳粹的罪行,也就是德国的罪行,乃是独一无二的:其范围之广,野心之大,罪恶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诺尔特所理解的纳粹主义背景化,以及势必接踵而来的对德国罪责的盲目相对化,是完全行不通的。

然而,毫不妥协的哈贝马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建立起来的标准并没有得到他的同胞们(包括那些以比较和背景化为学科根基的历史学家们)的长期坚持。针对“大屠杀”问题的讨论在德国公众中初见活跃,并最终于 90 年代达到最高潮:官方大量举办对历史劣迹表示忏悔的展示活动,而德国人则沉浸于如作家皮特·施奈德所说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厌憎”情绪中。但是,这种状态却无法维持长久。让新一代的每一个德国人永远生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中,要求他们为德国所犯下的罕见罪行担负责任,并将它作为衡量自己国籍的尺度,这是最基本、但却极难实现的要求。

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悼念和认错的第一步是要克服“当地人自私”的错觉,整个过程经常需要两代人和数十年的时间。《大屠杀》在德国播出仅两个月后,奥地利也开始播出这部电视片,但其影响却根本无法与在德国的情况相提并论。一直到 80 年代中期,奥地利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被揭露曾经供职于战时残暴占领了南斯拉夫的纳粹国防军,(一些)奥地利人才开始了对本国纳粹历史作严肃的、虽仍然不够充分的审查。当然,在瓦尔德海姆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国际社会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背景不闻不问,这使得奥地利人怀疑世人是以一种独特的高标准来看待他们的。毕竟,奥地利曾经选过一位犹太人(社会党人布鲁诺·克里斯基)当总理,这可不是德国人所能做到的。

然而,没有人对奥地利人抱有很高的期望。由于总体而言他们在近代史上少有麻烦,813 将近四成的奥地利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希特勒的受害者,而不是他的帮凶,并且有 43% 的奥地利人认为纳粹主义具有“两面性”——这恰好证明了他们和其他人共同的偏见。〔8〕与奥地利接壤于阿尔卑斯山脉的邻国瑞士则不同。在 1945 年之后的 40 年里,瑞士为它的战争档案赢得了一枚免检章。瑞士人不遗余力地将犹太人拒之门外,但这个事实却被忘得一干二净;此外,在全球流行的小说和电影作品中,这个国家还被刻画成一座安全的避风港,热情接待任何一名能够抵埠的难民。瑞士人为自己清白的良心而得意洋洋,愉快地享受着来自全世界的、令人羡慕的敬意。

事实上,在 1945 年之前,瑞士人只不过接纳了 2.8 万名犹太人——在战前则仅有

〔8〕 1991 年 10 月,在参观位于越南的犹太人墓之后,盖洛普对奥地利人看待犹太人的态度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 的奥地利人认为犹太人不应进入权力机关;31% 的奥地利人则宣称他们“不想与犹太人做邻居”;整整 50% 的奥地利人则愿意接受“犹太人应对自己遭受的迫害负责”的见解。波兰人则欣然同意这种看法,因此华沙政府可以毫无障碍地对犹太波兰人的身份做出界定。

7 000名。战时难民被拒绝授予劳工证,因此只好依靠政府从犹太富人身上征收而来的救济金维持生活。一直到了1994年6月,伯尔尼政府才公开承认:瑞士当年(1938年10月)为了控制犹太人入境,要求对所有的德国犹太人护照加盖“J”字母印记的做法,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种族歧视”。如果这就是瑞士丑行的极致的话,那也不必过于大惊小怪。事实上伦敦和华盛顿从来都没有往犹太护照上加盖识别标记,但当犹太人急需救助时,他们拥有的英国和美国档案却难以为他们赢得尊重。但是,瑞士人的所作所为却远甚于此。

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官方调查中,人们痛心地发现瑞士除了做尽掠夺黄金的勾当,在战时极力帮助德军、为虎作伥之外(参见本书第3章),瑞士银行和保险公司还有意识地大量窃取属于犹太账户持有者或者由于亲人遇害而提出索赔的犹太人客户的钱财。在1996年第一次得以公开的与波兰共产主义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中,伯尔尼政府甚至把遇难的犹太人的银行账户提供给华沙新政权,而作为回报,波兰银行获得了保险赔偿和共产党接管的所有银行业务。〔9〕一旦类似的证据开始得以呈现,这个国家毫无污点的闪光形象便崩溃了,无论数目多大的赔偿金(是在不甚情愿的情况下答应支付的)、偿付金和“受难者基金”,都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之恢复。德国的《时代周报》在1996年9月13日的社论中提到瑞士终于被“大屠杀”“长长的阴影”笼罩,并为此击掌称好,颇有幸灾乐祸之意。但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由于几乎所有荷兰人都被认为参与了“抵抗运动”,并且尽了全力去阻止德军的计划,他们给人留下了光彩照人的战时印象,但这个形象在更早的时候就受到了源于荷兰本土的质疑和打击。在60年代中期,官方发行了多卷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释了荷兰在战时的细节过程,其中包含了驱逐事件,但涉及犹太人灾难中的受难者、过程、特别是起因等等细节问题时,却只是谨慎地一笔带过。不管怎样,人们几乎没怎么读过那套书。但在1965年4月,荷兰历史学家雅各布·普利瑟所出版的第一本关于荷兰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全史——《灭顶之灾》,仅仅在1965年就卖出了10万册,并且激起了公众对该主题的浓厚兴趣。〔10〕大量的电视纪录片,以及其他关于战争和侵略的节目也随之蜂拥而至。其中有一部题为《侵占》的节目则热播了20多年。接着,官方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在1965年,荷兰政府首次提出为奥斯威辛纪念馆捐款——尽管长达7年之后,荷兰才最终同意为幸存的犹太流亡者发放抚恤金,而早在1947年,蒙难的反抗人士和其他纳粹受害者就得以享受到这种补偿了。

〔9〕波兰人很高兴地同意了——出于这些目的,华沙觉得要将犹太人界定为波兰人并没有什么障碍……

〔10〕《灭顶之灾》于1968年出版英文版本时,书名改为《荷兰犹太人的灭绝》。

荷兰与德国的情况相同,引起犹太人对那段尘封历史的兴趣的是以色列和 60 年代初德国举行的审判。和在其他地区一样,荷兰的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那一代人对近代史产生了好奇心,并且对他们所听到的、或者自己的属于“沉默的一代”的父母没有告诉他们的经历产生了很大的怀疑。60 年代的社会变化促使官方打破了对那段侵略史的沉默:在荷兰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流行的社会禁忌和性禁忌的破除使得当时还很保守的社会出现了深深的裂痕,随之引起了人们对其他惯例和文化常理的怀疑。对于新一代的读者而言,“大屠杀”的核心读物《安妮·弗兰克日记》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的:最终背叛安妮和她的家人的是他们的荷兰邻居,而不是德国人。

到了 20 世纪末,1940 年到 1945 年间的历史阶段成了被研究得最彻底的荷兰断代史。荷兰人曾经协助德国人辨认、逮捕、驱逐和处死他们的犹太裔同胞,这个事实早在 60 年代就众所周知,但一直过了很久,其影响才得以全面呈现:直到 1995 年,荷兰女王贝特蕾丝在访问以色列途中公开承认了发生在荷兰犹太人身上的惨剧——荷兰女王也成了荷兰首位有此表示的国家元首。在 90 年代中期,全副武装的荷兰维和部队曾面对塞尔维亚民兵在斯雷布列尼察围捕和屠杀 7 000 名穆斯林民众时无动于衷,任由事态发展,可能只有到了那个时刻,荷兰人才彻底被历史教训击中了要害。荷兰人终于展开了一场姗姗来迟的全国性辩论,讨论荷兰为了一贯的秩序、合作和顺从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15 荷兰人可以像比利时人、挪威人、意大利人(1943 年 9 月之后)、大部分被侵略的东欧国家的人们那样为自己辩解,说尽管个别官僚、警察等等之类的人与占领军的合作是多么的可耻,但主导力量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德国人。但事实并非如人们过去所相信的那样。在某些地方,这种说法只有一半属于事实。特别是在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或者战争结束前几个月的匈牙利这样的地方,当地的绥靖政府为了牟取私利而从事非法勾当。但在西欧的被占领区,除了一个特例之外,均没有深得人心的地方政权或者合法的国家政府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也无法承担行为责任。没有当地人的协助,德国人是无法像在挪威、比利时或荷兰等占领区那样肆意妄为的(在丹麦,民众没有助纣为虐,犹太人也因此得以幸存下来)。但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发布命令的都是德国人。

这个特例当然就是法国。维希政权与纳粹狼狈为奸,并在纳粹计划、尤其是“最终方案”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构成了法国备受折磨、但却从未完整的战争回忆,也正是这段回忆,让战后欧洲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问题上做出的所有让步和努力为之失色。这并非是因为法国的表现最为糟糕,而是因为法国的作用最为重要。正如本书所述,一直到 1989 年,巴黎都还是欧洲的思想和文化中心,这在“第二帝国”时代之后可能尤为明显。夏尔·戴高乐的杰出成就不仅让法国重新回到世界强国之列,而且还使它成为西欧大陆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也正是法国,或者说法国的政治家、法国的体制和利

益,促使欧洲依照法国提出的条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集体。在法国能够直面历史之前,新的欧洲将会一直被笼罩在一个谎言的阴影之下。

“维希”问题解释起来并不困难。贝当元帅的政权于1940年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投票推上了执政舞台;它因此成为唯一称得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战前民主制度连贯性(尽管有多么虚假)的战时政权。至少在1942年底之前,绝大多数的法国人都把维希政权和它的政治机构看作是法国合法的权力机构。对于德国人来说,要管理像法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需要成立一个花费不菲的战时占领机构,维希政权的存在则是方便至极,这样他们就再也无需为此操心,同时还能从这样的政权手中获取任何想要的东西,例如默认战败、“战争赔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等,而且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维希政权所做的,不仅仅是促使自己的国家和国民适应战败这个事实,省了德国人管理法国的麻烦。在贝当和他的总理皮埃尔·拉伐尔的授意下,法国在没有任何德国压力的情况下率先展开了与纳粹合作的计划,也就是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通过的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法案”。法国当局还做出自行围捕法国犹太人(首当其冲的是许多生于国外的犹太人)的决定,以此满足纳粹业已开始的“最终方案”所要求的名额。在这件事情上,法国政府充分显示了行政上的独立自主,以致大部分被逐的法国犹太人在到达奥斯威辛之前都没有看到过一个外国士兵的影子,直到他们到达德朗塞的铁路调车场(法国北部),才由德国人接管。直到移交之前,整件事情都是法国人在操控着。 816

在法国解放后,贝当和他的同谋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谴责,但却极少有人提起贝当政府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战后的法国政府则更是缄口不提。法国人不只是成功地把“维希政府”挤到民族历史的角落里,将它封存起来,而且根本就没有把维希政府和奥斯威辛联系起来。维希政权背叛了法国。卖国贼犯了叛国和战争罪行。但“反人类罪”这个字眼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法国的判决词上。它只与德国人有关。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0年。英国现代学者在研究法国历史时发现,60年代针对维希时期的法国学术文献——尽管没有多大价值——对“犹太人”问题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关注。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维希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是贝当政权到底属于“法西斯”还是“反动派”,以及它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共和国历史的延续还是断裂。仍然有一批具有威望的历史学家认为贝当政权这个“盾牌”替法国挡住了“波兰化”的冲击,听上去就像是希特勒要像蹂躏东方那样对付被他臣服的西方诸国。不管是在史学研究中,还是在法国人的生活中,任何质疑法国所谓的全国性英勇抵抗运动的行为仍然无法获得支持。

在那些年里,法国当局对海外日渐转变的态度所做出的唯一让步发生于1964年12月,国民议会“反人类罪”的范畴(1945年8月8日的伦敦协议首次给予定性)写入法国

法律,并宣布该类罪行不可宽恕。但这与“维希政权”同样无关。它只不过是正在进行的、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威辛审判所做出的回应,意在加速将来对在法国领土上直接参与纳粹种族灭绝阴谋的任何个人的审判。至于这离法国官方考虑重新审视法国的“集体责任”还有多远,则在1969年逐渐明朗——法国政府在那一年禁止法国电视台播放马塞尔·欧富尔斯拍摄的电影《痛苦和愤怒》。

17 欧富尔斯的电影是一部根据法国、英国和德国采访对象访谈录拍成的纪录片,与战时被占领的法国中部城市克莱蒙费朗有关。影片以战争年代泛滥的受贿和日常的通敌活动为主题,与大屠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很少涉及维希政府。欧富尔斯的目的在于探究战后为了自身利益而虚构的英雄事迹背后的真相。但即便是这样的影片,对于戴高乐执政的最后一年的政府当局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而且不仅仅是当局这么认为。两年后,该影片最终被解禁,但公映该片的是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小电影院,而不是国家电视台。据悉,一位中年妇女走出电影院后做了以下评论:“可耻!——但你能期待什么?欧富尔斯不就是犹太人吗?”

值得注意的、也是法国所特有的情况是,在更加忠实地研究法国战时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的是外国历史学家,其中有两位分别是德国的埃伯哈德·杰克尔和美国的罗伯特·佩克斯通。他们的主要著作都出版于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中期之间,首次利用德国资料来源来揭示法国故意低估维希罪行的严重程度。这是任何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学者都无法轻松对待的主题,因为即使已经解放了30年之久,整个法国的情感神经仍然非常敏感。即便是到了1976年,当获知一次纪念法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受害者的展览的细节之后,“退伍军人事务部”要求其做出某些改变,因为名单上列出的名字“无法得到法国人适当的共鸣”。〔11〕

在那些年里,类似的事情在法国经常发生,这样的情感反应很可能源于受伤的自尊,而不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近在1939年,法国还一直是主要的世界强国。但在短短的30年里,它却遭受了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备受凌辱的侵略,两次尴尬的殖民地撤退,以及一次近乎政变的政权更替。这个“伟大的国家”自1914年以来就累积了如此之多的损失和羞辱,以致整个国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弥补国家荣誉的意识。不光彩的、甚至更加糟糕的历史篇章最好能埋进记忆的深坑里。毕竟,维希政权只不过是法国人所要迫切忘却的一部分历史而已——甚至没有人愿意去谈论发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而在那里,法军的施虐与维希政权相比,只不过是巫见大巫罢了。

〔11〕 参见索尼娅·康伯《绝密档案:当代法国人的恐惧感》,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戴高乐的离职对这种状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新一代的法国人对国家荣誉也少有兴趣,对法国近代史也没有情感投入。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年头里,法国人对大屠杀的了解有所增加,对大屠杀也变得更加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得感谢戴高乐——这位法国总统在1967年11月27日那次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上引发了人们的义愤:由于以色列取得“六日战争”胜利,法国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将犹太人称作是“一个自信而又傲慢的民族”。1985年,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拍摄了名为《浩劫》的纪录片,尽管几乎只涉及犹太人在东方的灭绝经历——或者正是因此,它对法国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法国战时统治者对在该国领土上受到驱逐的犹太人的命运应该担负绝大部分责任。尽管法国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在外国同行的启发下,也在试图证实这一点,但官方的态度却从未转变过。从乔治·蓬皮杜(自1969年至1974年间任总统)到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期为1974年至1981年),再到弗朗西斯·密特朗(任期为1981年至1995年),官方的态度一直保持一致:不管维希政权做过什么,或者在其统治下发生过什么,是维希政权自己的事情。维希政权的问题存在于法国,但可能只是某些法国人的行为所致。维希政权只不过是法兰西共和国史上的一段独裁专制的插曲。换言之,维希不属于“法国”,因此法国公众的良心是清白的。

密特朗总统(生于1916年)是最后一位在成年时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政府首脑,他有特别的原因保持这种虚伪的个性。作为一名前维希政府公务员,密特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掩饰自己履历中的不足和隐晦之处,并且将那些隐晦之处设想为人皆有之的生活经历,从而取得后来的政治成就的。他在公共场合竭力避开任何与维希政权相关的话题;当他开始愿意对大屠杀发表一些笼统的看法时,不管是在1982年的耶路撒冷,还是在国内纪念1942年被围捕的12 884名波斯犹太人的50周年纪念会上,他从未发表过认为法国在某件事上有过罪孽的看法。

这个禁忌是由密特朗本人实施并身体力行地遵守的,而且毫无疑问,也将被他带入坟墓里。这一禁忌最终被一系列的审判打破(这类事情的结果往往如此)。在1994年,藏匿了将近50年之久的保尔·杜维埃被抓捕归案,并受到了应有的审判。作为维希政府秘密警察部门中的积极分子,他于1944年6月在里昂附近杀害了7名犹太人。杜维埃本人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只不过是维希政权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一名与克劳斯·巴尔比(1987年被捕并被审判的里昂盖世太保头目)狼狈为奸的通敌者而已。但杜维埃的受审,加上浮出水面的证据,证明了维希政府与盖世太保的合作关系及其在驱逐、屠杀犹太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其他永远都无法实现的审判,其中较为著名的例子是对雷内·布斯科特(维希政府的一名高级行政官员)的起诉。布斯科特曾于1942年亲自与德国当局协商递交犹太人事宜,他的受审本来为法国提供了一次直面维希政权真

相的机遇——并且不仅仅是维希政权。布斯科特之所以能够在战后的法国安然无恙地生活了数十年,其原因在于得到了包括戴高乐本人在内的高官的庇护。但就在他的审判开始之前,他却在 1993 年被一个“疯子”颇为“及时”地刺杀了。

随着杜埃尔的定罪和布斯科特的消失,法国的司法部门终于鼓起勇气去指控、逮捕和审判另外一名重要人物——莫里斯·帕彭。此人曾经是戴高乐手下的一名政府部长和巴黎的警察局长,在战时曾被任命为波尔多行政区的秘书长。这纯粹是个官僚岗位,帕彭在贝当政府任职时期的节制,使得他战后顺利地成为一名公务员,并且官运亨通。然而,他在波尔多任职期间,曾经授权逮捕所在地区的犹太人,并在遣送犹太人到巴黎并驱逐出境一事上负有直接责任。这在现行的法国法律中被定性为“反人类罪”,帕彭正是因此在 1997 年被推上了被告席。

帕彭在审讯中令人惊诧地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遗憾和懊悔之情。对他的审判持续了 6 个月,并没有找出有关于他本人之外的新证据。当然,这个审判足足迟到了 50 年:来得太迟,以致无法惩罚虽罪行累累却已年至八旬的帕彭,无法为他迫害致死的受难者报仇雪恨,无法拯救他的国家的名誉。许多法国历史学家拒绝以专业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他们坚持宣称自己的任务是重述和解释 50 年前法国发生的一切,而不是将他们所了解的事实用来审判罪犯。^[12] 虽然如此,这次审判还是起到了典范作用。它最终证明了从戴高乐到密特朗的每一个人所精心刻画的“维希”和“法国”之间的界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帕彭是一个法国人,他先后效力于维希政权和共和国政府:两届政府均对他在波尔多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但却从未找过他的麻烦。

此外,帕彭并不是个例——他和他的个人档案确实并无显著之处。就像很多人那样,他所需要的仅是签署对从未谋面、因此也不会在乎的那些人们的处决命令。帕彭案(还有布斯科特案)最让人好奇的地方在于,为何法国政府花了将近 50 年的时间才揪住了就在他们中间的罪犯,还有就是,为何一直到了世纪之末才最终打破沉默。解释可以有很多种,但并不是每一种都能讨得法国政界和国家媒体的欢喜。但是时间的流逝,以及一个时代的终结所带来的心理作用,也许才是最贴切的。

只要密特朗还未下台,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无法公开谈论被侵略的历史耻辱的化身。当密特朗下台之后,情况完全改变了。他的继任者雅克·希拉克在法国解放的那一年,也就是 1944 年,年仅 11 岁。上台不到数周时间,在第 53 个波斯犹太人被围捕纪念

[12] 哥伦比亚大学的佩克斯通教授早于他人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开始了对维希政权的罪行的历史调查。当他的法国同行们正热衷于其他事务时,他在职业道德的感召下做出了回应,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日上,也就是密特朗一直保持慎言的同一个场合中,希拉克总统打破了 50 年的禁忌,首次直截了当地承认他的国家参与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10 年之后,也就是 2005 年 3 月 15 日,希拉克的政府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在新建于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开幕仪式上庄重宣布:“法国曾经是这个罪行中的帮凶。她将永远背负着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

820

到了 20 世纪末期,大屠杀似乎已经成为西欧人身份和记忆问题的焦点。当然,仍有个别历史修正主义者和组织在寻找否认对犹太人种族屠杀的证据(尽管他们更多的是活跃在北美地区)。这一些人仅仅是流离在极端主义的政治边缘,他们对种族屠杀在技术可能性上的否认,也恰好凸显了纳粹暴行的罪恶。然而,为了弥补过去,如今欧洲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损失所举办的认罪、教育和纪念活动随处可见,这确实带来了其他种种风险。

首先,反抗情绪的出现总是难以避免的。在民族负罪感的重压下,甚至连德国主流的政治家也会不时地发泄一下自己沮丧的情绪。早在 1969 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领袖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就曾在公众面前流露出这样的看法,“一个在经济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民族,有权利不再去提‘奥斯威辛’。”政治家们当然有他们的理由。^[13]在 21 世纪初,一种迅速扩散的渴望情绪,也许更能显示即将到来的文化转变:公众在关注犹太受害者多年之后,重提德国本身所受苦难的问题。

文艺界人士(其中包括马丁·瓦尔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同辈,一位在战后联邦德国文学界有影响的人物)如今开始讨论另一个“还未触及的过去”:不是犹太人的种族清洗问题,而是鲜为人知的德国近代史的另一面。他们质问道:为何多年之后我们还不能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焚烧的德国城市?在希特勒时代,起码一直到二战结束前几年,德国人过着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的生活。尽管这个事实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难道是因为我们更应该讨论德国人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么?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数十年之久,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程序、一种习惯。联邦德国是全世界最爱公开表示热爱犹太人的国家;可我们(德国人)还要提心吊胆多久?关于“盟军罪行”的新书的销量巨大,它们讲述了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对汉堡的焚烧,还有战时德国难民船只的沉没(君特·格拉斯 2002 年所著《蟹行》一书的主题)。

821

[13]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于 1985 年访问西德时,曾被建议避开在比特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阵亡士兵墓地(这里埋葬有纳粹党核心组织“武装党卫队”成员),而到另一个集中营进行吊唁活动。德国总理科尔写信警告他说:“这样做会严重影响德国人民对美国的友好感情。”美国人做出了让步,里根于是访问了贝尔森和比特堡。

其次,欧洲官方近来在描述欧洲历史时突出了大屠杀的重要性,这可能带来另一种误读。真正令人难堪的是,对于大多数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来说,1939年至1945年间犹太人所遭受的种种迫害,并不如后来人们的情感需求那样重要。如果说许多欧洲人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对他们犹太邻居的命运视而不见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沉浸于自己难以抑压的、难以承受的历史负罪感中,而是因为——除了少数高层纳粹分子以外的欧洲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是针对犹太人的战争。甚至对于纳粹分子来说,对犹太人的屠杀,也仅仅是一个更具野心的种族清洗和重置计划的一部分。

带着半个世纪之后的认识和情感来解读40年代,这种倾向可以理解,但它却将反犹太思想推向欧洲历史舞台的中心,从而改写了历史。毕竟,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如何去解释欧洲那些年所发生过的一切呢?然而,这样也未免过于简单、过于轻松了。在1940年法国陷落后,大多数法国人民接受了维希政权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迫害犹太人,而是因为它使他们抱有幻想:既能维持安稳、正常生活,又能把损失降到最小。这个政权如何对待犹太人,只与它的冷漠本质有关,犹太人本身就无足轻重。在其他被占领区,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这种冷漠也是欧洲20世纪前半叶道德状况严峻的一种体现,也许今天的我们会为此感到震惊。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欧洲各国还有一些民众,他们亲眼目睹了犹太人的遭遇,并尽了全力去唤醒他们麻木不仁的同胞。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忽视了这种冷漠的存在,认为大多数欧洲人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歼灭战”,一场灭绝式的战争)与犹太人所经历的并无两样的话,那我们就会给自己的记忆涂上另一层不真实的色彩。在今天看来,“奥斯维辛”是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事件。可当时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在当时的东欧,情况也同样并非如此。东欧人直到1989年才扔掉了共产党官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所做的解释的重负。对于他们而言,世纪末的西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专注隐藏着一定的破坏性。一方面,较之西欧世界,1945年后的东欧需要记住和忘却的要多很多。犹太人更多集中在欧洲的东半部,因此遭到屠杀的也更多。大多数的屠杀行径发生于这一地区,同样参与其中的当地人也更多。然而在另一方面,战后的东欧政府也更着力于消除公众对“大屠杀”的记忆。发生于东欧的战争暴行和由此带来的恐怖并不是遭到了忽视,恰恰相反,它们在官方的宣传中被反复提起,也在纪念碑和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只不过问题在于这部分历史对犹太人只字不提。

在东德,为纳粹主义负责的重担完全推给了希特勒的西德继任者们,他们向苏联、而不是向犹太人提供赔偿。在民主德国的教科书中,希特勒被塑造成了资本巨鳄的工具,为了追求巨额的商业利润而发动战争,占领别国领土。沃尔特·乌布利希在1950年发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纪念的不是德国的受害者,而是1100万名“为抵抗希特勒法西斯而牺牲的战士”。在东德领土上曾经有过的集中营——著名的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曾一度被改作政治犯的“特别隔离室”。多年以后,布痕瓦尔德已经被改造成了纪念馆,它的导游手册使用“对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对失利战争的报复,对所有抵抗者的残忍迫害”等字眼来描述“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企图。在同样一本手册里,在奥斯威辛那个决定生死的岔路口的照片下引用了德国共产党员恩斯特·台尔曼的一句话:“为了消灭党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资产阶级不惜使用一切手段”。^[14]这样的文字直到东德共产党垮台之后才被删去。

这样的例子在共产主义的欧洲可以说随处可见。在波兰,想要否认或者掩盖位于特列布林卡、马伊达内克、索比堡的灭绝营里发生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一些集中营的遗迹已经不复存在了,不断逼近的苏联红军迫使德军在逃之夭夭之前,煞费力气地清除了残存的痕迹。而保留有集中营遗迹的地方,如距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几公里远的奥斯威辛,则被回顾历史的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在奥斯威辛,估计有150万人惨遭杀害,其中有93%是犹太人,但战后共产党建立的纪念馆却只按照国籍列出了遇难者的名字,例如波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等等。波兰的中小學生排队浏览过那些令人震惊的图片,参观过陈列着的一堆堆鞋子、头发和眼镜,但却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一切大多数是犹太人的遗物。

的确,人们曾经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原址上,缅怀过那里发生过的生生死死。然而,发生于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人起义,却被一年后的波兰人的华沙起义挤到波兰人的记忆之外。在共产党执政下的波兰,没人会否认德国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但很少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波兰落在苏联的控制中,加之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欢迎、甚至协助过共产党接管波兰,这两种原因使得波兰人对德国占领时的记忆变得模糊。无论如何,波兰人自己蒙受的战争苦难冲淡了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关注,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之抵触,而这个“苦难比较”问题将会在数十年内毒害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这种并列比较 823 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合时宜的。300万波兰人(非犹太血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虽然低于乌克兰部分地区或犹太人的死亡率,但仍然是个惊人的数字。可是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又的确有所不同。对于波兰人来说,要在德国的占领之下生存下来是艰难的,但是从原则上来说是可以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你在德国的统治下可能幸免于难,但在原则上你是必死无疑的。

人们庄重地悼念了那些曾生活在纳粹傀儡政权下的受害者,却极少注意到这些受害

[14] 引自伊恩·布鲁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2)。

者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他们被标明了国籍(“匈牙利”),尤其是社会身份(“工人”),可他们身上的种族以及宗教信仰特征却被有意回避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参见第6章),人们给第二次世界大战贴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标签,以此教育后人,但却忽略了它的种族主义性质。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甚至设法涂掉了刻在布拉格犹太人会馆墙上的“大屠杀”中犹太人遇难者的姓名。

在改写这一地区的当代史时,战后的共产党政府当然不会忘记利用人们深远持久的反犹情绪,这也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们要竭力掩盖相关证据的原因之一(70年代波兰国内禁止提及任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反犹思想言论)。如果说相比之下东欧人对犹太人的困境不够关注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冷漠无情,或者只顾自己的生存,而是因为苦难和不公足以让他们生活在新怨恨和记忆中。

在1945年至1989年间发生的驱逐、囚禁、虚假公审和“正常化运动”,让苏维埃集团里的每个人要么自身受到了损失,要么就是导致他人受损。从受害的犹太人和被逐的德国人那里没收过来的公寓、店铺和其他财产,往往几年后又被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再次没收,使得1989年后解决历史赔偿的问题遥遥无期。那些在共产党掌权时期受损的人应该得到补偿么?如果补偿,那么谁有权获得这些补偿?是那些战后(1945年)才得到财产、但仅仅几年后再次失去的人么?还是那些在1938年到1945年间被夺去了生意和住所的人的继承人?以哪个时间为准?1938年?1939年?还是1941年?每一个日期不仅牵涉到在政治上敏感的、对国家合法性和种族合法性的定义问题,还牵涉到道义优先权的问题。〔15〕

824 同时,共产主义本身有着特有的内部历史问题。那些请求苏联坦克阻挠1956年匈牙利改革的人,或者要为镇压1968年“布拉格之春”负责的人,是否应该为这些罪行受到指控?许多身受1989年剧变之苦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但一些前共产党领导人也在受害者之列。那么,哪些人值得后人的关注呢?是默默无闻的斯洛文尼亚人,还是被收缴了土地的匈牙利农民?或是那些曾经驱逐过他们、却在几年后也成了受害者的共产党干部?哪些受害者、哪些记忆更为重要?谁说了算呢?

共产党的垮台随之引发了种种苦涩的回忆。关于如何处置秘密警察文件的激烈争论只是整个事情的一方面(参见本书第21章)。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倾向于通过改写历史来摆脱共产主义的历史阴影。曾经公认的真理如今彻底地失去了权威,似乎成了公开的谎言。可这种禁忌的破除自有它的风险。在1989年以前,所有的反共分子都被批为

〔15〕 当捷克议会于1991年投票表决战后所占财产归还问题时,那些1948年后被没收财产的人的权益明显地受到了限制,这样就把共产党人执政之前、在1945至1946年被逐的苏德台德国人排除在外。

“法西斯分子”。然而,如果认为“反法西斯主义”也是共产党的谎言的话,那么人们在回顾历史时,就很有可能以同情甚至支持的目光来看待所有至今被贬为反共分子的人,包括那些法西斯分子。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作家重新成为主流。在东欧共产党倒台之后,就有不少国家的议会通过了动议,表彰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元帅,或巴尔干地区和中欧地区的类似人物。他们直到最近还被痛斥为极端民族主义者、法西斯和纳粹的帮凶,如今却可以因战时的英雄主义而立碑了(罗马尼亚议会甚至为安东内斯库默哀一分钟)。

还有一些禁忌也随着失去威信的反法西斯措辞一道消失了。如今,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红军和苏联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新近独立的波罗的海3国要求莫斯科承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非法性,以及斯大林对其国家独立主权的单方面破坏。波兰人在1995年4月最终促使俄方承认:卡廷森林里被杀的2.3万名波兰军官的确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害,而不是德意志国防军。此后,波兰人要求俄国档案向波兰调查官全面公开。直到2005年5月,波兰人所提出的要求似乎都无法得到俄方的同意。那一段记忆仍然还是人们心头的一道伤疤。〔16〕

然而,俄罗斯人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记忆。在苏联的卫星国看来,苏联版本的当代史显然是荒谬的,但许多俄罗斯人却认为它说出了不少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苏联的军民,从数目上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红军确实从德国的铁蹄下解救了东欧一大片地区,而希特勒的落败也的确让苏联人民感到由衷的满足和欣慰。在1998年后,许多俄罗斯人震惊地发现,昔日的兄弟国家显然对他们毫无感激之情。而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在1945年逃脱出德国的魔掌,完全是因为苏联红军做出的牺牲。 825

但除了这几点以外,俄罗斯人的记忆出现了分歧。事实上,这种分歧产生了两个民间组织,各自宣扬彼此截然对立的、针对本国共产主义历史的批判理论。刊物《纪念》于1987年由一群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创办,目的是为了获取苏联历史的真相并将之公布于众。它的成员注重于人权侵害,坚持承认历史、防止历史重演的重要性。比它早两年创立的《回忆》同样致力于重现历史、尊重历史。然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仅限于此。《回忆》的创立者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共人士,大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他们想要展现的是一种改进过的俄罗斯历史:删去其中的苏联“谎言”,但同时不受与俄罗斯传统不符的思想、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短短几年之内,《回忆》就发展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治阵地,它以俄罗斯被忽视和“被诋毁”的历史为武器,抵御来自“世界主义者”的挑战和

〔16〕 在普京总统执政时,俄罗斯仍坚持认为这些波罗的海国家是由苏联红军解放的,而此后是它们自愿加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

干涉。

大打“迫害史”这张政治牌,成了维系前苏联核心国及其成员国的最后纽带,即便它们各自的回忆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对低估了他们的历史苦难和损失的国际社会,他们都感到愤愤不平。那些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受害者怎么办?为什么他们还没能像纳粹迫害下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那样得到赔偿和纪念?千百万名战时纳粹政权受害者战后沦为新政权的受害者,承受了无休止的压迫,他们又该怎么办?西方社会为何如此地漠视?

然而,想要对共产主义的过去历史一概而论,全盘否定,亦即把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历史解读为一以贯之的独裁史和罪行史,是对外来者或集权政府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和压迫的完全记录,这样做也有其他的风险。首先,这样的历史是一部糟糕的历史,完全抹杀了在苏联前期的几十年里人们发自内心的参与热情和投入积极性。其次,新东正教对当代政治也有所影响。如果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或其他国家的东欧人并没有主动参与到他们过去历史的阴暗面里;如果东欧的历史从1939年(对于俄国说来,则是从1917年到1991年)完全是他人造成的话,那么这一整个时期就成了其民族历史中的细枝末节,同战后法国人的意识中的维希政权相差无几,但持续的时间更长,留下的噩梦般的记忆也更加可怕。最终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也是相似的:1992年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捷克政府禁播了BBC一部关于1942年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遇刺的纪录片,原因是剧中出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捷克人示威支持战时纳粹政权的片断。

随着“后共产主义”东欧修改记忆的风潮的兴起,对比较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做法的禁忌也在消失。事实上,政治家和学者们已经开始支持这类比较了。而在西欧,这种并置比较的做法还存有争议。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的直接比较并不是争议所在,因为很少有人质疑这两位独裁者乖戾专横的本性。然而,将斯大林前后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归为一类的建议,将给西方自身的历史带来不安的因素,并且不仅是对德国而言。对于许多西欧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是人类共同命运前进过程中失败的衍生物。但对于中欧和东欧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是20世纪威权主义犯罪原理在局部地区的成功应用,也应当如此为人们所铭记。欧洲各国也许能统一起来,然而欧洲人们的记忆深处却仍有隔阂。

让欧洲头疼的历史记忆问题,西方的解决办法一直是牢记它们,更确切地说,是把它们刻在石头上。在21世纪初的几年内,从斯德哥尔摩到布鲁塞尔,西欧冒出了各种为纳粹主义压迫下的受难者建立的纪念碑、纪念馆和展览馆。正如我们所见,有一些是由先前的遗址修补或“改正”而成的,但更多是新建的。还有一些致力于公开的教育功能,2005年1月在巴黎开放的“大屠杀纪念馆”就是其中之一。它结合了两个现有的场馆——“无

名犹太烈士纪念馆”和“当代犹太人档案中心”。巴黎的“大屠杀纪念馆”还同时拥有一面石墙,上面刻有 7.6 万名从法国被遣送到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名字。它仿效了美国“越战纪念碑”的做法,同时也吸取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和耶路撒冷“雅德法希姆大屠杀纪念馆”的设计理念,但规模要小得多。的确,绝大多数此类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是完全用来纪念“大屠杀”的,而于 2005 年 10 月 10 日在柏林开放的那座纪念馆却令人印象最为深刻。

这一批新近开放的纪念馆所承载的信息的清晰度,与前一代那些纪念石碑的搪塞含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表达得最清楚、也最直接的,就是柏林的大屠杀纪念馆。它紧邻勃兰登堡门,占地 1.9 万平方米,非常壮观。它清楚地向世人表明,它是一座“为所有在欧洲遭到屠杀的犹太人建立的纪念馆”,其用词远非泛指普通的“纳粹主义的受害者”。^[17]在奥地利,拒服兵役的年轻人现在可以选择为国家赞助的“纪念服务”组织工作一段时间,在其中主要的几座大屠杀馆内实习或担任导游,以此代替兵役(“纪念服务”, 827 设立于 1991 年)。毋庸置疑,如今的西欧,尤其是德国,已经拥有充足的机会来正视他们可怕过去。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 60 周年时提醒他的听众时说的那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种族屠杀的记忆,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这些记忆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

然而在其他地方,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在波兰,新建立的“民族纪念研究院”想方设法鼓励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展开严肃的学术调查和研究。然而波兰政府对曾经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公开道歉,激起了波兰民众的强烈反对。更令人遗憾的是,波兰团结工会的英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列赫·瓦文萨对 2000 年出版的《邻居们》一书所做出的反应,就是这种反对情绪的集中代表。《邻居们》是美国历史学家扬·托马斯·格罗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人遭波兰邻居们屠杀的情况做出的很具影响力的研究。瓦文萨在一次广播采访中抱怨道:“格罗斯”这个人显然是要在波兰人和犹太人间散播不和的声音;他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一个想凭这本书赚钱的犹太人”。

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将犹太人的受迫害历史融入当代历史记忆中的难度,在匈牙利的经历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2001 年,维克多·奥尔班政府设立了“大屠杀纪念日”,定于每一年的 4 月 16 日举行纪念活动(同时也是 1944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布达佩斯建立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的周年纪念日)。3 年后,欧邦的继任者匈牙利总理彼得·迈杰希为匈牙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揭幕。这座纪念馆位于布达

[17] 这座纪念馆并非毫无争议:除了很多人不喜欢它过于抽象的设计理念以外,还有一些人,包括前柏林市长、基督教民主党人艾伯哈德·迪普根,他批评它把柏林变成“忏悔之都”。

佩斯市,原先用于拘禁犹太人。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这座大屠杀纪念中心门庭冷落,只有稀稀落落的游人在参观展厅或翻看资料,而且以外国人居多。与此同时,大批的匈牙利人涌向了城市另一边的“恐怖博物馆”。

“恐怖博物馆”(“恐怖之屋”),顾名思义,是一所展示恐怖事件的博物馆。它讲述着从1944年到1989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暴力、折磨、压迫与独裁事件。博物馆中的时序安排富有深意。它如同杜莎夫人蜡像馆般重现了阴暗恐怖的秘密牢房,行刑工具以及审讯室(这座“恐怖之屋”曾是秘密警察的总部)。对成千上万的参观学童和其他参观者而言,“恐怖博物馆”所呈现的匈牙利历史,对1944年10月至次年4月间掌权的费伦茨·萨拉西的“箭十字党”暴徒政权和战后成立的共产主义政权之间并不做任何区别。而且,展示“箭十字党”党徒以及他们积极参与残害6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的罪行的展厅只有3个。而这栋巨大建筑的多数空间全被用于分门别类地、带有根本偏见而详尽地展示共产主义政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这种现象所传达的信息并无特别隐晦之处,那就是想说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但除此之外,布达佩斯的“恐怖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和陈列内容显然表明了博物馆馆长们的观点:共产主义政权不仅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带来的危害也远远超出了他们之前的纳粹政权。对于许多老一辈的匈牙利人来说,这样做,看上去似乎更符合他们的经历与感受。在共产主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的立法里,这种信息表达得更加明显。其法律禁止在公开场合出现任何与匈牙利不民主的历史有关的标志:不仅包括纳粹十字标志和“箭十字”标志,还包括如今随处可见的红星、镰刀和锤子标志。匈牙利并没有对这两个标志所代表的不同政权做出区分,而用匈牙利总理欧邦在2002年1月24日为布达佩斯恐怖博物馆揭幕时的话来说,匈牙利仅仅是“关上了令人厌恶的20世纪的门”。

但那一扇门关起来并非那么容易。如同中欧和东欧的其余国家,匈牙利仍然为欠下的前债所困扰。^[18]同是那些敦促莫斯科履行责任、承认对其造成伤害的波罗的海国家,却在质询自身责任的时候明显迟缓起来。自从赢得独立以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没有起诉过它们国内任何一名仍在人世的战犯。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政权受害者及反共产主义抵抗力量纪念馆”于1997年在锡盖特成立(部分资助来自“欧洲议会”)。尽管前总统伊利埃斯库承认其国家参与了“大屠杀”,纪念馆中还是将两次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各种铁卫团积极分子、其他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和反犹太

[18] 2004年3月,包括彼得·埃斯特哈吉和乔治·康拉德在内的84名匈牙利作家退出匈牙利作家联盟,抗议其对反犹太主义的纵容。此次抗议的导火索是诗人康奈尔·多伯伦泰对大屠杀幸存者伊姆雷·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按多伯伦泰的说法,这个奖,是对一位只是沉迷于“他那个少数民族”的“恐怖经历”中的作家的安心钱。

分子列在纪念名单之列。他们摇身一变,反成了遭到共产主义迫害的烈士。

东欧的评论家们可以举出当代西方政治文化中“受难者崇拜”的思想,来支持他们所坚持的“纳粹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的主张。他们评论道,我们正从胜利者的历史走向受难者的历史。那么好,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再讨论下去,其逻辑就是:即便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出于截然不同的意图——即便根据雷蒙·阿隆的理论,“一种丑恶的哲学,和一种可以给出丑恶解读的哲学,两者之间有着不同之处”——但是对它们的受害者而言,这种安慰微乎其微。人类的苦难不能由作恶者的目标来衡量。以此推理,对于那里遭受惩罚或者遇害的人而言,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劳改营同纳粹的集中营都是一样的。

与此相似,现代国际法学和政治措辞中对“权利”(以及对践踏人权做出赔偿)的强调,为那些感到自己的苦难和损失没能得到承认和赔偿的人提供了根据。一些德国保守党人从国际社会对“种族清洗”的谴责中得到提示,重新提出德国团体的索赔事宜——这些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他们质疑,为什么自己所受的苦难就显得那么次要?不管是斯大林对波兰人所做的,还是最近米洛舍维奇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所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总统贝奈斯对苏台德区的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两样?到了21世纪初,社会名流圈里已经有人开始讨论是否在柏林另建一座纪念馆,即一所“反驱逐纪念中心”,用来纪念所有的遭受种族清洗的受难者。 829

新近这种思想逆流暗示了,所有形式的集体受难从本质上来说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差异,因此在纪念它们时应该给予同等的待遇。这激起了来自最后一位仍然建在的华沙犹太人起义领导者——马瑞克·埃德尔曼的猛烈反驳。2003年,当他在反对建立那个纪念中心的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他说:“好一个纪念!他们受了那么多苦么?就因为他们没有了房子?背井离乡当然是件悲哀的事。可犹太人失去的不仅是他们的房子,而且还有所有的亲人。遭受驱逐是苦难的一种,可这个世界的苦难太多了。病人也受苦,可没人给他们立纪念碑”。(《克拉科夫天主教周刊》,2003年8月17日)

埃德尔曼的反应及时地提醒了我们,过度沉浸于纪念仪式,把关注的焦点投向受害者而不是行凶者,这样做会带来种种风险。一方面,值得回想的记忆和经历从理论上讲是无穷尽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博物馆和纪念建筑来铭记过去,把回忆的责任留给了他人,这也是一种遏制过去、甚至是遗忘过去的方式。只要在我们身边仍有人因为亲身感受而确切地记得过去,这也许并不成问题。但如今,正如在2005年4月10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会上,81岁的约尔格·塞布伦在提醒那些幸存者时所说的那样,“对过去的积极的回忆正在逐渐关闭”。

即使欧洲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世人永远记着过去的罪行(这也是那些纪念馆和博物馆想要达到的设计理念,即便它们还不尽如人意),这也将无济于事。回忆本身总是

让人争论不断,各成一派:让一些人坚信不疑的,其他人可能不以为然。而且在通往过去的路上,回忆是一个不可靠的向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就是依靠一种错误的记忆而得以重建——也是依靠人们对过去的遗忘。作为对过去的弥补,1989年以后的欧洲在另一种过度的回忆上再次重建,大一统的公共记忆成为各民族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石。前一个欧洲是不能持久的,而后者亦是如此。一个安定的社会,需要一定程度的忽略甚至遗忘。

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提倡人们健忘。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有所记忆,才可以有所忘却。法国人只有实事求是地理解了维希政权,而不像曾经那样选择错误的记忆,才可能放下这段历史,继续前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波兰人——对曾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犹太人的记忆,他们仍旧理不出头绪。西班牙人也是一样。自从它转向民主制度之后的20年里,西班牙对国内战争的惨痛记忆一直讳莫如深。对于那场战争及其后果的公众讨论,直到现在才得以展开。^[19]而德国唯有正确评价、真正反思罪行累累的纳粹历史,完成一次长达60年的否认、教育、争论和共识的轮回之后,才可能开始与那段历史共处,不再为此牵挂烦恼。

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要追溯过去,依靠的是“历史”,而不是“回忆”本身。这里的“历史”具有双重含义,既是指时间的流逝,也是指对于过去事实的专业研究,而后者更为重要。对罪恶的铭记——尤其是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恶——是永远不可能令人满意的。在如此深重的罪行面前,任何纪念方式都会显得单薄无力。^[20]这种罪行是如此的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人们在回忆时都很难冷静地想象那段历史,这也使得对它的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否认都成了可能。由于不可能被真实地记录,这种罪行注定要以不真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在这种挑战面前,回忆本身也无能为力:“只有那些历史学家,那些拥有他们职业中最核心的品质,即对事实、证据、证物一丝不苟、充满热情的人,才能为过去的真相把关。”^[21]

记忆本身是靠自己来论证和强化的。与之不同,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清醒。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带给我们的是不安,甚至混乱。因此挥动着历史这个道德大棒,来攻击、斥责一个曾经犯下罪行的民族,并非总是谨慎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又的确需

[19] 2005年3月17日,马德里最后一个佛朗哥塑像于黎明时分被悄悄地搬走了,当时有百余名围观者。

[20] “我们这些幸存者,并不是真正的目击者……。我们是……极其侥幸的少数人:我们只是靠搪塞、靠其他特征或者是好运气而没有被赶尽杀绝。然而那些不幸的人,那些看到了‘戈耳贡女妖’的人,不能够活着回来讲述那些经历,或者是他们回来后已经变成了哑巴。”普莱姆·列维,《溺死者与获救者》,纽约,1988年,第88页至84页。

[21] 约瑟夫·哈伊姆·耶鲁沙尔米《铭记:犹太人的历史和回忆》,西雅图,1982年,第116页。

要人们去认识,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有需要再重新认识。在苏联时期有一个很流行的笑话:一名听众打电话到“亚美尼亚广播电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预测未来?”回答是:“当然,没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未来。可我们的问题在于过去:它老在变来变去。”

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不仅仅发生在极权主义社会。即便是这样,欧洲对互相矛盾的种种过去、对它们在欧洲人的集体自我意识中所占据的地位的严格调查和拷问,依然是欧洲近几十年来还未被人们赞颂的成就,也无法成为欧洲统一的根基。然而,如果没有后人的继续努力,这种成就是一定会消失的。欧洲野蛮的近代史,作为战后欧洲重建时所努力抵制的黑暗“反面”,早已被欧洲的年轻一代遗忘。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纪念碑和博物馆也将会蒙上灰尘,被日渐冷落,只会有一些狂热的爱好者和受难者的亲友参观,正如同今天“西线战场遗址”的命运一样。

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还想知道为何在奥斯威辛的焚尸炉上重建欧洲曾经显得如此重要,那么只有历史才能帮助我们回想起来。这个崭新的欧洲,是由那些代表着可怕 831 的过去的符号和象征联结在一起的,它的建立是个不同寻常的成就;然而,它将与那个过去永远捆绑在一起。如果欧洲人想要维系这条至关重要的纽带,而欧洲的未来还要为欧洲的现在提供劝戒和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历史应该在今后每一代人中得以传承下去。“欧洲联盟”也许可以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一种回应,却永远不能成为历史的替代。

索引

Index

(页码为原书页码)

A

Abandonment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废除固定汇率\453—454

Abbas, Ferhat 费哈特·阿巴斯\286

Abetz, Otto 奥托·阿贝茨\68

Abortion 堕胎\488—489

ACC (参见 Allied Control Councils) 同盟国管制委员会

Accident and sickness insurance 意外事故与疾病保险\72

Acheson, Dean 迪恩·艾奇逊\128, 149, 154, 156, 243, 272

Action Programme of the French National Resistance Councils 《法兰西民族抵抗委员会行动纲领》
\66

Adamec, Ladislav 拉迪斯拉夫·艾达梅克\618, 619

Adams, Gerry 格雷·亚当斯\468

Adenauer, Konrad 康拉德·阿登纳\56—57, 59, 61, 126, 157, 244, 245, 247, 252, 265—268,
334, 417, 497

作为基督教民主党成员\80, 81, 147

作为西德第一任总理\147

与以色列签订的赔款条约, 810

向犹太人作赔偿, 271—272

Adler, Jeremy 杰里米·阿德勒\808

Adorno, Teodor 西奥多·阿多诺\492—493

Advertising 自我宣传\349—350

Afghanistan, Soviet invasion of 苏联入侵阿富汗(参见 Soviet Union 条)

Age of Theory 理论时代\398—401

Aggrieved memories 痛苦的记忆(参见 Memory 条)

Agrarian Parties 农业党\131, 132, 175

Agrarian reform 农业改革\77—78, 515

Agriculture 农业(参见 Farmers/farming 条)

Agro-towns 农业城镇\385, 623

Akaev, Askar 阿斯卡尔·阿卡耶夫, 656

Akhmatova, Anna 安娜·阿赫玛托娃\193

Akhromeyev, Sergei 谢尔盖·阿赫洛梅耶夫\643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作为中国在欧洲的代理人, 431

歧视与压迫\679—681

经济改革\430

米洛舍维奇屠杀阿尔巴尼亚族人\680—682

民族斯大林主义\430

人口统计\669—670

Albright, Madeleine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681, 682

Alexander, I, Czar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19

Algeria 阿尔及利亚\285—289

Alive, Gaidar 盖达尔·阿利夫\656

Allende, Salvador 萨尔瓦多·阿连德\561

Allied Control Councils (ACC) 盟军管制委员会\106, 121, 126

法国行动\113

Allied Military Government 同盟国军政府

保护法西斯分子\61

重建欧洲的努力\39—40

Almodóvar, Pedro 佩德罗·阿尔莫多瓦\524

- Althusser, Louis 路易·阿尔都塞\404
- Amalrik, Andrei 安德烈·阿玛里克\576,583
- Amendola, Giorgio 乔奇奥·阿曼多拉\207
- America Houses 美国国会两院\224,351
-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美国犹太人联合资源配置委员会\186—187
- Amnesia, collective 集体失忆\61—62
- Andreotti, Giulio 朱利奥·安德烈奥蒂\475
- Andreyeva, Nina 尼娜·安德烈耶娃\604
- Andropov, yuri 尤里·安德罗波夫\317,442,592,612,648
- 安德罗波夫之死 594
- Andrzejewski, Jerzy 杰尔齐·安德尔泽也夫斯基\199
- Angola 安哥拉\512
- Angry Brigade 愤怒旅\469
- Annan, Noel 诺尔·安南\128
- Antall, József 姚哲夫·安塔尔\632
- Anti-Americanism 反美主义\353,788—791
- Anti-Communists 反共分子\217—225
- Anti-Fascist purges 反法西斯清洗\47—51
- Anti-Fascist rhetoric 反法西斯言辞\215—216
-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181—187,775—776,804—805
- 东欧的反犹主义\434
- 德国的反犹主义\810
- 波兰的反犹主义\434—435
- Antonescu, Ion 伊昂·安东内斯库\45
- Antonioni, Michaelangelo 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382,388
- Apartheid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298
- Arab oil embargo 阿拉伯石油禁运\455
- Aragon, Louis 路易·阿拉贡\224,353
- Arbour, Louise 路易斯·阿博尔\681
- Arthitecture of 1950s and 1960s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建筑\385—387
- Arendt, Hannah 汉娜·阿伦特\321,810
- Armenia 亚美尼亚\656

Arms race 军备竞赛\247—249,592

Aron, Raymond 雷蒙·阿隆\204,210,216,218,222,223,384,411,560,562,828

Arsenal 阿森纳足球队\783

Artisans 工匠\757

Artistic and cultural initiatives 艺术与文化创新\377—384

Arzhak, Nikolay 尼古拉·阿扎克\425

Ataturk, Kemal 凯末尔·阿塔土尔克\765

Atlantic gap 大西洋隔阂\787—791

Atomic bomb 原子弹

参见 Nuclear weapons

苏联原子弹计划\118

Atomic Weapons Establishment at Aldermaston 奥尔德马斯顿的原子武器机构\255

Attali, Jacques 雅克·阿达利\553

Attlee, Clement 克莱门特·艾德礼\68,69,81,111,122,230,358,363,730

Auschwitz 奥斯威辛集中营\181,199,822

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儿童\21

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审判\416

Australia 澳大利亚\32

Austria 奥地利

基督教社会党人\260—262

腐败\263

民主政制\260—263

欧盟成员\716

自由党\743,745

大联合\262

作为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2,52

战后德国和奥地利地理\55

欧盟成员资格\3

人民党\261—262,743

战后待遇\52—53

按比例\262—263

承认大屠杀\812—813,826—827

社会民主党人\369

战后对待纳粹分子\52—53

Austria State Treaty of 1955 《奥地利立国条约(1955年)》\ 246,261

Automobiles 汽车\339—341

英国\356—357

德国\355—356

Avignon Summer Festival 阿维侬夏季戏剧节\378

Ayer, A. J. 艾雅尔\222

Azerbaijan 阿塞拜疆\656

B

Baader, Andreas 安德里亚斯·巴德尔\416,470

Bader-Meinhof Group 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470

Baby boom 婴儿潮\750—751

经济后果\347—350

应对教育变革\391—394

西欧\331—332

Bacilek, Karol 卡罗尔·巴西莱克\190

Badoglio, Pietro 彼特罗·巴道格利奥\47

Bahr, Egon 埃贡·巴尔\497,611

Bahro, Rudolf 鲁道夫·巴赫罗\573

Baker, James 詹姆斯·贝克\641,643,674

Balcerowicz, Leszek 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583,606,686

Balladur, Edouard 爱德华·巴拉迪尔\733

Ballistic weapons 弹道武器\248

Baltic republics 波罗的海诸共和国

参见 specific nation-state

手拉手横跨波罗的海\645—646

独立运动\645—647

人口 644—645

苏联阻止其分离权\645

苏联的军事行动\647

- Banham, Rayner 雷纳·班汉\386
-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国际结算银行\94
- Barre, Raymond 雷蒙·巴尔\553
- Basque separatists 巴斯克分裂分子\464—466,702
- Battle of Algiers 阿尔及尔战争\223—224
- Battle of the Book 书之战\223—224
- Battle of the Bulge 巴齐战役\103
- Bauer, Tamas 塔马斯·鲍尔\583
- BBC (参见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 Bach, Joseph 约瑟夫·贝奇\245
- Beckett, Samuel 塞缪尔·贝克特\379
- Beckham, David 大卫·贝克汉姆\783
- Belarus 白俄罗斯
- 宣布独立\656
 - 独立运动\650
- Belgium 比利时
- 反对扩大欧盟\732
 - 天主教徒\264
 - 基督教社会党\264
 - 煤生产\88
 - 达索/阿古斯塔丑闻\747
 - 共产党\88
 - 弗兰德斯地区\708,710
 - 弗莱芒民族主义分子\710
 - 犹太人\805—806
 - 语言之争\710
 - 语言社群\710—712
 - 地理\709
 - 穆斯林\741
 - 民族分离主义\708—713
 - 支柱\264
 - 战后民族化\362

- 繁荣\713
- 公共部门公司\362
- 惩罚战时内奸\46
- 生存理由\712—713
- 地区\710—711
- 分裂运动\708—713
- 社会民主党人\370
- 国家投资公司\556
- 瓦龙人\710
- Bell, Daniel 丹尼尔·贝尔\478
- Belloc, Hilaire 希莱尔·贝洛克\217
- Bělohradsky, Vaclav 瓦克拉夫·贝罗拉德斯基\492
- Bender, Peter 彼得·本德尔\611
- Benelux Agreement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协议》\155
- Benelux countries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
 - 参见 specific nation-state
 - 天主教政党\263—265
 - 支柱\263—265
- Beneš, Edvard 爱德华·贝内斯\25,71,114
- Benjamin, Walter 沃尔特·本雅明\5
- Bergen-Belsen 卑尔根-贝尔森\54,805,807
 - 幸存儿童\21
- Beria, Lavrenti 拉夫连季·贝利亚\309
- Berlin 柏林
 - 遭摧毁\16
 - 作为开放城市\250
 - 作为间谍中心\250
- Berlin, Isaiah 以赛亚·柏林\218,560,564,785
- Berlin airlift 柏林空运\146
- Berlin crisis 柏林危机\146—147,250—256
- Berlinguer, Enrico 恩里科·贝林格\495
- Berlin Uprising 柏林起义\177

Berlin Wall 柏林墙

勃兰登堡门\614,640

建造\252—253

拆毁\1,614—615

开放\614—615

Berlusconi, Silvio 西里维奥·贝卢斯科尼\704,746

Beveridge, William 威廉·贝弗利奇\74,75,81

Bevin, Ernest 欧内斯特·贝文\91,95,111,124,125,147,149,159

Bibó, Istvan 伊斯特凡·毕波\318,322

Bichelonne, Jean 让·皮歇洛纳\68

Bidault, Georges 乔治·比铎\80,95,115,125,156

Biermann, Walf 沃尔夫·比尔曼\204,573—574

Bierut, Boleslaw 博莱斯拉夫·比埃鲁特\180,312

Big Three 三巨头\101

Bil'ak, Vasik 瓦西克·比拉克\580

Birth rate 出生率

东欧\330—331,791

计划增长\73

战后\237

妇女运动兴起之后\490,536

美国\791

Bizone Economic Council 双占区经济委员会\125

BL (参见 British Leyland)

“Black International” “黑色国际”\158

Black market 黑市\37

德国\87

Blair, Tony 托尼·布莱尔\546—547,705,729,744,770,786,794

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795

第三条道路经济模式\794—796

Blanco, Luis Carrero 路易斯·卡里罗·布兰科\465

Bloc of anti-Fascist parties 反法西斯政党集团\131

Blocher, Christoph 克里斯托夫·布洛克\745

- Blum, Léon 莱昂·布吕姆\81,139,219,286,785,807
- Blum-Byrnes accords 布吕姆—巴恩内斯条约\232
- BMC (参见 British Motor Corporation)
- Bodnaras, Emil 埃米尔·鲍德纳拉斯\135
- Bohemia, Plzen demonstrations in 波希米亚的比尔森示威游行\176—177
- Bohemia-Moravia, Communist Party of 波希米亚—莫拉维亚共产党\130
- Bohlen, Charles 夏尔·波伦\106,150
- Bohley, Bärbel 巴贝尔·保利\615,638
- Bolkestein, Frits 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725,768
- Böll, Heinrich 海因利希·伯尔\198
- 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104
- Bombing campaigns 轰炸行动
- 轰炸纳粹德国\16
 - 美国轰炸塞尔维亚,678
 - 西方盟国和红军轰炸\16
- Bonner, Yelena 叶琳娜·波纳尔\575
- Borowski, Tadeusz 塔德兹·波洛斯基\199
- Bosnia-Herzegovina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637
- 内战\674—678
 - 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673—678
 - 1995 年后的经济\679
 - 战争后果\684
 - 种族清洗\675—678,679
 - 种族状况\668
 - 高级代表\679
 - 塞尔维亚族人\674
 - 美国行动\678,683—684
 - 西欧行动\683
- Bossi, Umberto 翁贝托·博西\704
- Boulier, Abbé 艾比·波利埃\217
- Bourdet, Claude 克劳德·波尔岱\64
- Bourdieu, Pierre 皮埃尔·布迪厄\479,564

- Bousquet, René 雷内·布斯科特\818
- Boutros-Ghali, Butros 布特罗斯·波特罗斯-加利\683
- Brandt, Willy 维利·勃兰特\269,377,419,471,496—500,529,591
 获诺贝尔奖\498
 间谍丑闻\498
- Brasillach, Robert 罗贝尔·勃拉西拉克\51
- Braudel, Fernand 费尔南·布罗代尔\399,400
- Brecht, Berthold 贝托尔德·布莱希特\177,204,276
-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布雷顿森林会议\107—108
 实施终结货币体系\453—454
- Brezhnev, Leonid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311,424,438,496,500,501,503,583,590,
 593,648
 去世\594
- Brezhnev Doctrine 勃列日涅夫主义\443,604
- Briand, Aristide 阿利斯蒂德·勃里昂\153
-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英国广播公司\206,781
 道德责任\229—230
 讽刺节目\482
 全球广播节目\344
- British Leyland (BL) 英国雷兰汽车公司\356,357,358
- British Motor Corporation 英国汽车公司\356
- Brockway, Fenner 芬纳·布罗克韦\111
- Brook, Peter 彼得·布鲁克\380
- Brooke, Alan 艾伦·布鲁克\111
- Bruckner, Pascal 帕斯卡尔·布吕克内\786
- Brusati, Franco 弗朗科·布鲁萨提\335
- Brussels, Treaty of 1948 《布鲁塞尔条约(1948年)》\125,149,245
- Buback, Siegfried 西格弗里德·布巴克 470
- Buber-Neumann, Margarete 玛格丽特·布伯-纽曼\215,222,560
- Buchenwald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61,81,807,822
 幸存儿童\21
- Budget deficits 预算赤字\458

Bukharin, Nikolai 尼古拉依·布哈林\178

Bukovsky, Vladimir 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425,575

Bulgaria 保加利亚

农业集体化\169

内奸\698

共产主义失败\626—627

“祖国前线”\43

解放\626—627

月工资\740

和平条约\134

农村集体化\169

外人视角\754

苏联影响\134

土耳其少数民族\626

Bulgarian Socialist Party 保加利亚社会党\627

Burke, Edmund 埃德蒙·伯克\695

Burma 缅甸\293

Buses 公共汽车\341

Bush, George H. W. 乔治·布什\608,632,640,659

倡议同叶利钦会见\655

Bush, George W. 乔治·布什\786

欧洲对其政策的看法\787,789—790

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787

Butlin, Billy 比利·布特林\342

Byrnes, James 杰姆斯·巴恩内斯\106,109

C

Cabral, Amilcar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512

Caetano, Marcello 马切罗·卡埃塔诺\512

Cagol, Mara 玛拉·卡戈尔\474

Calfa, Marian 马里安·卡尔法\619

Callaghan, James 詹姆斯·卡拉汉\458,461,538—539,591

-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CND) 核裁军\255
- Campaign for Real Ale (CAMRA) 散装啤酒运动\486
- Camping 野营\342
- Camus, Albert 阿尔贝·加缪\51,198,210,218,219—220,285,400,478,560,562,564
- Canada, acceptance of displaced persons by 加拿大接受移置人口\31,32
- CAP (参见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 计划\68
- 从共产主义过渡\685—700
- Capitalism, European 欧洲资本主义\361
- Calos, Juan 胡安·卡洛斯\518,519,521
- Carlyle, Thomas 托马斯·卡莱尔\72
- Carnogurský, Jan 扬·恰尔诺古尔斯基\662
- Carrillo, Santiago 桑提亚哥·卡里约\496,520,522
-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590,593,622
- Cassola, Carlo 卡罗·卡索拉\207
-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520—521,701—702
- Catholic “black international” 天主教“黑色国际”\158
-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48
- 对道德与个人关系的管辖\373—377
- 介入政治\374—375
- 波兰天主教会(参见 Poland)
- 在战后欧洲\227—229
- 铁托攻击天主教会\49
- Causasus 高加索\652
- CCF (参见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 CD (参见 Christian Democrats)
- CDU (参见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 Ceausescu, Nicolae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69,385,430—431,575,622—626,628,754
- 遭遇政变\625
- 经济政策\623

同意的绰号\624

被处死\625

人口政策\625

布加勒斯特革新\624

Censorship 审查制度

捷克斯洛伐克(参见 Czechoslovakia)

东欧\571

英国\376—377

苏联放宽检查制度\599

西欧\571

西德电影\270—271

Central Europe 中欧\573

接纳各国加入欧盟\717—723

不同政见者\575,576

穆斯林\74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223

Cernik, Oldrich 奥德里奇·泽尔尼克\441

Charles, John 约翰·夏尔\783

Charter 77 《七七宪章》(参见 Czechoslovakia)

Chernenko, Konstantin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594,603,612,648

Chernobyl nuclear reactor disaster 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灾难\597—598

Chernomyrdin, Viktor 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688

Chesterton, G. K. 契斯特顿\217

Chetnik partisans 契特尼游击队\34—35,49—50,140

Chiaromonte, Nicola 尼古拉·齐亚罗蒙特\222

Children 儿童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儿童的影响\21

婴儿死亡率\22

战后疾病\22

China 中国

阿尔巴尼亚作为欧洲代理人\431

毛泽东革命后乌托邦\406

苏联同中国竞争\422

Chirac, Jacques 雅克·希拉克\551,552,681,729,748

承认大屠杀\819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基督教民主党\61,80—81

投票人的历史性支持\484—485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 基督教民主联盟\56—57

Christian Democrats (CD) 基督教民主党人\157—158

Christianity in Europe 欧洲基督教\774

Christian Socials 基督教社会党人\260—262

Christopher, Warren 沃伦·克里斯托弗\684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9,52,115,122,161,275,380,538

倡导欧洲大会\155

作为基督教民主党人\81

铁幕演说\110

作为三巨头之一\101—102

CIA (参见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nema 电影

后共产主义国家观众\691—692

美国人的影响\351—352

电视对电影的影响\346

黄金时代\230—233

欧洲电影的质量\380

Cioran, E. M. 齐奥兰\754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 (参见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vic Forum (参见 Czechoslovakia)

Civilian losses, World War Two 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民损失\18

Civil rights 民权\502,564—566

Civil wars 内战\32—35,674—678

Claes, Willy 威利·克拉斯\747

Clay, Lucius 卢修斯·克雷\56

Clayton, William 威廉·克莱顿\111

Clément, Jérôme 杰罗姆·克莱蒙特\790

Clementis, Vlado 弗拉多·克莱孟蒂斯\60,185,189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594,682,790,794

对塞尔维亚的轰炸\678

CND (参见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Coal shortfalls 煤短缺\87,114—115

Coca-Cola Company 可口可乐公司\221

Cohn-Bendit, Daniel 丹尼尔·科恩-本第特\409,412,421

Cold War 冷战

开始\102,126

文化竞争\223—224

在中东和非洲\297—298

新冷战\591—622

看法\8

地区经历\247

第二次冷战\590,592

Collaboration horizontale “卧式合作”\43

Collaborators (与法西斯)合作者,内奸\33—39

定罪\44

界定\44

战后清洗\42—51

惩罚\50

共产主义失败后的处理\698—699

Collective amnesia 集体失忆症\61—62

Collectivization 集体化\168—170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参见 specific nation-state

崩溃\279—280

非殖民化\278—280

重要性\278

Comecon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经互会(经济互助委员会)\171,578—579

Cominform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16,125

抨击南斯拉夫\145

解散\311

成立\143

Comintern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141,142

Commercial television 商业电视\345

Commissariat Général du Plan (France) (法国)计划总署\70—71

Common Agricultural Fund 农业共同基金\527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农业共同政策\306—307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657

Communism 共产主义

魅力\88

剥夺财产\823

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大爆炸方式\686—687

导致失败的特点\628

失败\585—633

对抗策略\144

控制\131

衰落\401—402

早期对共产主义的热情\200—202

经济遗产\685—700

共识幻灭\446

对未来的热情\199

欧洲作为对立面\630

经济失败\427—428

垮台\602,604—627,824

五年计划\67,167

戈尔巴乔夫在垮台中的作用\632—633

内部分裂\657—659

效率低下\427

知识分子的态度\216,560—562

媒体在垮台中的作用\628

错误统治\194—195

表演艺术\779

1948 年的政策\133
污染\571
在战后德国\59—60
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406
另类建议\426
失败原因\627—633
罪责\823—824
结果\194—195
公开目标\131
转移压力的战略\132
向资本主义过渡\685—700
从纳粹的过渡\193—194
外部过渡\685—700
垮台后纳粹合作者的待遇\698—699
与社会主义联合\132—133
对纳粹法西斯分子的看法 60—61

Communist myth 共产主义神话\6

Communist parties 各国共产党\79

参见 specific nation-state

国家机器\191—193

选民历史性地支持\484

Communists 共产党人

决心加入\200

知识分子的奉承\200

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人\197—217

犹太人\434,435

改建\693

斯洛伐克\439—440

审判\178—179,178—181

Communist worker unions clashes with Socialist worker unions 共产党工会与社会党工会的冲突\219

Comprehensive welfare systems 综合福利制度\74

Compulsory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强制性失业保险\72,74

Concentration camps 集中营\18

参见 specific camps

囚徒\13

幸存者\21,24

德国公民参观集中营\56

Concept City Guerilla Manifesto 概念城市游击队宣言\470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501,565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CF)\222—223,384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Unity Movement 欧洲统一运动代表大会\155

Connolly, Cyril 西利尔·康诺利\206

Conservative parties 保守党派

美国的看法\218

选民历史性地支持\484—485

Contraceptive rights 避孕权利\488—490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保护人权国际公约》\242

Cools, André 安德烈·科尔斯\747

Corvalan, Luis 路易斯·戈瓦兰\575

Coty, René 勒内·科蒂\287

Council of Baltic Sea States 波罗的海国家委员会\754—755

Council of Europe 欧洲委员会\155,159

《保护人权国际公约》\242

戈尔巴乔夫的演讲\632

开除希腊\508

Council of European Regions 欧洲地区委员会\533

Counter-culture politics 反文化政治\398

Counter-Reformation 反改革\227

Coup d'états 政变

反对鲍里斯·叶利钦\654—655

捷克斯洛伐克(参见 Prague coup)

东德\614

反对埃利希·昂纳克\614

希腊\507—508

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政变\424

反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625

葡萄牙\513

罗马尼亚\625

苏联\645—655

西班牙\521

Craxi, Bettino 贝蒂诺·克拉克西\746

Crichton, Charles 夏尔·克里奇顿\300

Crime, post-war 战后罪行\37

Criminal syndicates 犯罪辛迪加\741

Cripps, Stafford 斯坦福·克利普斯\163

Crisis of 1947 1947年的危机\86—88

Croatia 克罗地亚\637

宣布独立\673—674

战争后果\684

联合国维和部队\676

联合国安全地区\676,677

乌斯达莎政权(参见 Ustase regime)

同塞尔维亚族少数民族的战争\674

Croce, Benedetto 贝内德托·克罗齐\198,207,222

Cuban Missile Crisis 古巴导弹危机\254

Cultural divisions, rise of 文化分野的出现\197—198

Cunhal, Álvaro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513,514

Curcio, Reneto 雷纳托·库尔奇奥\474

Curzon Line 寇松线\101

Cynicism 愤世嫉俗,犬儒主义\37,481—482

Cyprus 塞浦路斯\508—509,510

Czarist foreign policy 沙皇外交政策\119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接受苏联影响\137—139

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途径\687

分裂\637,659—664

审查\440,442,444,571

《中央委员会行动纲领》\440—441,444

77 宪章\569—570,616,618,619

民权民主党\662

民权论坛\618—620,661,662,700

内奸,699

为不公正处决者辩护委员会(VONS)\570

各共产主义政党\79,138—139,616—622,700

文化自由\437—438

捷克地区\439

民主共产主义\441

非斯大林化\311—312,436—437

不同政见者运动\566—568,617

分裂\637,659—664

东德难民\614

经济改革\437,687

环保主义\492—493

环保主义者抗议活动\617

排除出马歇尔计划\92

特别人民法庭\50

共产主义失败\616—622

作为完全的民主社会\437

政府计划\71

历史问题\659—661

实行军事专政\444—445

收入分配\437

调查委员会\436

约翰·列侬和平俱乐部\617

抵制共产党政权非法性法律\700

60 年代初的自由化情绪\437—438

解放\616—622

清洗\699—700

国有化\71

政治犯\192

污染\57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均产值\171—172

布拉格政变(参见 Prague coup)

布拉格的母亲抗议活动\617

布拉格之春(参见 Prague Spring)

布拉格作为西方的窗口\443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均产值\171—172

民主运动\445

民权论坛组织原则\619

公共反暴力政党(PAV)\661,662

清洗改革派\445—447,616

对非斯大林化的反应\311—312

1968 年的改革事件\440—443

改革运动\440—446

解散政府\618

1989 年事变\618—620

权利与自由\569—570

中等教育统计数字\437

秘密警察\699

斯洛伐克地区\439

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会\437—438

人性化社会主义\441

社会紧张\439

苏联集团各国反对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446

苏联入侵\444

苏联军事行动计划\443

苏联压制布拉格改革\443—444

斯特拉霍夫事件\440

学生运动\440,445

屈从于苏联\92

从民族斯大林主义过渡到改革化共产主义\436

天鹅绒式分裂\659

天鹅绒式革命\620

Czechoslovak Socialist Republic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620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637

反对欧盟扩大\732

建立捷克共和国\661—663

历史问题\661—663

月工资\740

私有化\690

D

Dachau 达豪\81

Dalton, Hugh 休·达尔登\88,123,275,770

Dancing 舞蹈\234

Daniel, Larissa 拉丽莎·达尼尔\446

Daniel, Yuli 尤里·达尼尔\425

Danish Progress Party 丹麦进步党\486

d'Argenlieu, Thierry 梯也利·德·阿冈利厄\283

Day of Remembrance (GDR) 纪念日(东德)\822

Dayton Accords 《戴顿协议》\678

Death toll, World War Two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17—19

de Beauvoir, Simone 西蒙娜·德·波伏瓦\198,210,212,215,216,488,489

Debray, Regis 雷吉斯·德布雷\761,785

Declaration of Liberated Europe 《欧洲解放宣言》\101,103

de Gasperi, Alcide 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80,81,150,157,258

de Gaulle, Charles 夏尔·戴高乐\61,63,65,66,81,89,113,115,147,273,283,410,
431,549,815

阿尔及利亚问题\287—289

去世\308,550

致力于国内政治现代化\290

- 外交政策\291
- 与美国关系\291—292
- 确立政治改革\290
- 六日战争后的新闻发布会\817
- 反对美国出售潜艇核导弹\293
- 对 1967 年 5 月“事件”的反应\411
- 重新执政\287
- 投票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308
- Delors, Jacques 雅克·德洛尔\543,554,715,732
- de Maizière, Lothar 洛塔尔·德·梅齐尔\638
- de Man, Hendrik 汉德立克·德·曼\68
- de Menthon, François 弗朗索瓦·德·门松\805
- Demographics 人口统计
 - 参见 Birth rate
 - 战后\330—337
 - 21 世纪\791
- Denazification 去纳粹化\56—61,105
- Deneuve, Catherine 凯瑟琳·德纳芙\488
- Denmark 丹麦
 - 反对欧盟扩大\732
 - 宪法\364
 - 惩罚内奸\46
 - 作为福利国家\366
- Deportations 押解出境\22—23
- Depression of 1970s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萧条\456—457
- Derrida, Jacques 雅克·德里达\480,786,787
- de Sica, Vittorio 维托里奥·德·西卡\209
- de Spínola, António 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513—514,524
- Détente 缓和\501
- Deutschland im Herbst* 《德国之秋》\472—473
- Dewey, John 约翰·杜威\222
- Diary of Anne Frank, The* 《安妮·弗兰克日记》\810,814

- Dimitrov, Georgy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34,141,190
- Diseases, post-war 战后疾病\22
- Displaced persons 被移置者\16—17,22—23
- 接受\31
- 犹太人\31—32
- 从中区分难民\29
- Disposable income 可支配收入\337—338
- Dissident movement 不同政见者运动
- 中欧\575,576
- 捷克斯洛伐克\566—568
- 东德\573—574
- 匈牙利\568—569
- 波兰\569
- 罗马尼亚\575
- 苏联\425,566—577
- Djilas, Milovan 米洛万·德吉拉斯\20,35,129,140,143,200,202,429,430
- Doctors' Plot 医生阴谋案\184,309
- Dollar crisis 美元危机\87
- Dubcek, Alexander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440—443,446,447,618,620
- Duclos, Jacques 雅克·杜格劳斯\137
- Dulles, Allen 艾伦·杜勒斯\94
- Dulles, John Foster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243,244,248
- Dunkirk Treaty 《敦刻尔克条约》\124,125
- Durafour, Michel 米歇尔·杜拉弗\550
- Durham miners union 特勒姆矿工工会\163
- Dutourd, Jean 让·杜图尔\761
- Dutschke, Rudi 鲁迪·杜契克\407,416,419,421
- 试图谋杀\420
- Duverger, Maurice 莫里斯·杜维杰\353

E

Eagleburger, Lawrence 劳伦斯·伊格尔伯格\666

Eastern Europe 东欧

- 参见 Soviet Union
- 接受各国加入欧盟\717—723
- 受屈辱的记忆\823—824
- 农业改革\78
- 对欧盟的反感\732
- 反犹主义\434
- 出生率\331—332,791
- 检查制度\571
- 作为廉价度假胜地\763
- 内奸\34
- 战后内奸\43
- 战后年代的集体记忆\750
- 战后控制\101
- 计划经济下的萎缩\172
- 向往做美国人\631
- 与西欧的区别\195
- 经济历史\170—172
- 环境保护主义\492—493
- 对美国的感受\790
- 作为前苏联集团国家\688—690
- 全球化的后果\736—746
- 客籍工人\741
- 硬通货债务\582—583
- 强调工业\328
- 婴儿死亡率\331
- 坚持“回到”欧洲\572—573
- 犹太人\806—807
- 克里姆林宫的怀疑\190—191
-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组成与分裂\637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地图\148
- 马克思主义\426—427

物质性破坏\16—17
犯罪记忆\823—824
货币借贷\582
月工资\740
怀旧\768—769
迫害公民\191—192
污染\570—571
战后人口统计\330—331
惩罚公民\191—192
对非斯大林化的反应\311—313
承认大屠杀\821—826
对犹太人的报复\43
修正主义者\426
权利与自由\567—575
销售国有商品\688
性旅游\763
60 后一代\426—429
苏维埃化与俄罗斯化\194—195
斯大林主义\426
美国的东欧战略\318—319
20 世纪 90 年代的转型\637
地下写作\571—572
城市规划\385
美国的暗中行动\318
对美国的看法\8
福利制度\74

East Germany 东德

加入西德\639
为统一采取行动
加入联合国\499
德国结盟\638
对强硬派年轻激进分子的吸引力\420

预备役\574—575

内奸\697—698

政变\614

要求变革的示威游行\613—614

驱逐不同政见者出境\573—574

不同政见者运动\573—574,615

德累斯顿党\615

立国\147

撤除官方档案\642

东德共产主义失败\610—616

资助西德学生运动\420

戈尔巴乔夫访问\613

强硬派学生激进分子\420—421

告密者\697—698

基础设施\643

知识分子\203—204

莱比锡示威游行\613—614

解放\610—616

马克\146

新论坛\615,616,638

开放柏林墙\614—615

民主社会主义党\615

和平运动\574—575

改革\614

承认大屠杀\822

难民\250—252

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的难民\614

逃往匈牙利的难民\612—613

解散政府\614

1989 年易帜\613—616

安全部门\697—698

社会统一党\132—133

- 苏联的再教育和去纳粹化计划\59—61
- 对前东德人的补贴\643
- 旅行法\614
- 操纵选举\612
- 西德担保\611—612
- ECB (参见 European Central Bank) 欧洲中央银行
- ECJ (参见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欧洲法院
- Eco, Umberto 安伯托·艾柯\787
- Economic crisis 经济危机\453—462
- Economic flexibility, attempts to create 试图创造经济灵活性\793—794
- Economic recovery 经济复苏\82
 - 国际贸易(参见 International trade)
 - 劳动生产力\326—327
 - 在 20 世纪 50 年代\325
 - 政府计划的作用\328—329
 - 生活水准(参见 Standard of living)
- ECSC (参见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欧洲煤钢委员会
- écu (参见 European Currency Unit) 欧洲货币单位
- EDU Treaty (参见 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 Treaty) 《欧洲共同防御条约》
- Edelman, Marek 马瑞克·埃德尔曼\829
- Eden, Anthony 安东尼·艾登\155, 164, 245, 247, 294—295
 - 辞职\298
- EDF (参见 European Defence Force) 欧洲防御部队
- Educational policies 教育政策\391—394
- EEC (参见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欧洲经济共同体
- EFTA (参见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 Egypt 埃及
 - 英国的非殖民化\294—298
 - 军事入侵埃及\296—297, 319
- Eichmann, Adolf 阿道夫·埃希曼\416, 810
- Einaudi, Luigi 路易奇·爱因诺第\218
- Eisenhower, Dwight D.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28, 103, 106, 107, 152, 243, 247, 296

- 新面貌政策\248,249
- 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319—320
- Eisenhower Doctrine 艾森豪威尔主义\297
- Eliade, Mircea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203
- Eliot, T. S. T. S. 艾略特\205
- Eluard, Paul 保尔·艾吕雅\212
- Emigration 移民\330,333—335
 - 东德\250,252
 - 匈牙利事件之后\318
 - 影响\334—335,337
- Employment relations 雇佣关系
 - 工业雇员待遇\407—408,413
 - 劳动争议/罢工(参见 Labor disputes/strikes)
 - 服务与专业雇员待遇\408
- EMS (参见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欧洲货币体系
- End of the Ideological Age, The 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384
- Engholm, Björn 布容·英格霍姆\611
- Engineering industries 工业\83
- English as dominant language 英语作为主导语言\758—760
- ENI (参见 National Agency for Hydrocarbons)
- Ensslin, Gudrun 古德龙·恩斯林\416,470,471
- Environmentalism 环境保护主义\490—496,570—571
-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汉斯·马格努斯·艾森伯格\275,416,420
- ERDF (参见 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会
- Erhard, Ludwig 路德维格·艾哈德\266,304,305,351,355,417,497,794
- Erlander, Tage 泰奇·厄兰德\158,364
- ERP (参见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欧洲复兴计划》
- Estonia 爱沙尼亚\644
 - 宣布独立\655
 - 独立运动\645—646
- ETA (Euskadi Ta Askatasuna) 埃塔组织\465—466,520—532,702,746
- Ethnic cleansing 种族清洗\24,27

清洗犹太人(参见 Holocaust)

塞族人执行的清洗\675—678

清洗塞族人\679

Ethnic minorities 少数族裔\741—742

EU (参见 European Union) 欧盟(欧洲联盟)

Eugenics 优生学\368

Euro 欧元\529, 725—727

Eurocommunism 欧洲共产主义\495—496

Euro.com website 欧洲共产主义网址\784

EuroDisney 欧洲迪斯尼乐园\789

Europe 欧洲

青少年的反叛\234—235

美国化

美国大众文化的吸引力\224, 230—235

战后出生率\237

边界国家\752—755

边界线\752—755

资本主义\361

中欧(参见 Central Europe)

基督教\774

阶级界线\757—758

殖民地(参见 Colonialism)

大城市的国际性\739—740

精华实质\749—768

东欧(参见 Eastern Europe)

意识形态政治的终结\449

害怕被排除出欧洲\753—75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感觉\13

民族国家的未来\796—800

全球化的影响\736—746

向美国投资\788

伊斯兰教\774—775

- 战后生活 \227—237
- 语言问题 \758—761
- 作为大熔炉 \8—9
- 穆斯林 \9,741—742
- 受照顾国家 \372,384—385
- 遗忘大屠杀的需要 \808—809
- 1942 年的地图 \15
- 怀旧 \749—768
- 核武器化 \248—249
- 作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 \630
- 战后农耕 \305
- 加入欧洲的代价 \803—804
- 劳动大军的生产力 \792
- 对艺术的公共津贴 \778—779
- 推动经济整合 \302—309
- 对移民的反应 \742—746
- 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反应 \786
- 战后的娱乐休闲活动 \234
- 地区之间的差别 \195
- 战后的地区 \227—229
- 斯堪的纳维亚与大陆不同的福利国家 \365—366
- 国有工业 \361
- 交通运输系统 \762
- 下层社会 \739—741
- 普通劳动人口 \757
- 城市规划 \385—389
- 预测核战争 \255
- 福利资本主义 \362
- 福利国家 (参见 Welfare states)
- 西欧 (参见 Western Europe)
- 恐外症 \742
-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302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欧洲中央银行 \726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 欧洲煤钢共同体 \226—227, 242

与英国 \159, 164

与法国 \157—159

European Community (EU) 欧洲共同体(欧共体) \630

英国成员资格 \526

决策 \528

希腊成员资格 \527—528

管理困难 \528

负面经济整合 \528—529

20 世纪 70 年代的补充 \526

20 世纪 90 年代的补充 \527

与挪威的自由贸易协议 \526

行动主义与扩张时期 \526

贫困国家 \526, 527

葡萄牙成员资格 \516, 527

《庄严宣言》 \529

西班牙成员资格 \523, 527

European Convention 欧洲代表大会 \729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欧洲人权代表大会 \155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 欧洲法庭 \303, 732—733

European Currency Unit(écu) 欧洲货币单位 461, 529

European Customs Union 欧洲关税同盟

英国的态度 \159—164

法国的态度 \156—159

欧洲关税同盟国际委员会 \153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EDC) Treaty, 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 \244—245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 \303—309, 529, 530

成就 \308—309

农业共同政策 \306—307

希腊成员资格 \510

国际贸易 \326

问题\309

地区性资助项目\530—534

“隧道之蛇”条约\461

终止与希腊军人集团的谈判\508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EFTA) 欧洲自由贸易协会\307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欧洲投资银行\530

European model 欧洲模式\7—8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 欧洲货币体系\461, 529

对公共部门私有化的影响\557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欧洲议会选举\526—527

European Payment Union 欧洲支付联盟\94, 242

European project 欧洲项目\302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ERP) 欧洲复兴计划\91—98

参见 Marshall Plan

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ERDF) 欧洲地区发展基金\530—531

European Social Model 欧洲社会模式\793

European Union(EU) 欧洲联盟(欧盟)\630

接纳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717—723

优点\732—736

农业补贴\723, 734

作为对历史的回答\831

对欧盟的反感\731—732

成员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733—734

军队\735, 788

奥地利的成员资格\3

益处\732—736

双边加入谈判\721

预算\723, 725

面临的挑战\723—732

《农业共同纲领》\723

共同货币建议\715

20 世纪 90 年代关注的问题\719—720

立宪条约\729—730

接纳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代价\718

部长理事会\728—729,731

民主的缺陷\730—731,733

不同意美国的价值观\788—789,790

早期协议\529—530

经济利益\732

同美国的经济竞争\788

欧盟实施的经济控制\796

经济问题\723—725

冷战结束对欧盟的影响\713

欧盟扩大\720—722,731—732

欧元\529,725—727

《欧洲宪章》\729

农业支持款\723

外交政策\734

吉斯卡召集会议\729—730

政府/官僚体制\727—730

南斯拉夫战争的重要性\680,683,734

《1992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参见 Maastricht Treaty of 1992)

1957—2004 年地图\714

2004 年以后的地图\724

军事\735

尼斯会议\728—729

控制护照\534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努力\153—154

加入欧盟的代价\803—804

私有化作为成为欧盟成员的前提\795

快速反应部队\788

以往有罪行的民族国家的承认\803—804

与传统领土的联系\798

公民安全责任\797

- 提高税收能力\725
- 加入的权利\718
- 《申根协议》\534
- 安全利益\734
- 统治制度\727—730
- 领土\798
- 贸易政策\734—735
- 《阿姆斯特丹条约》\713,720
- 选民总数\730—731
- 作为世界最大的内部单一市场\796
- Eurosport television channel 欧洲体育电视频道\782
-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欧洲之梦歌唱大赛\482—483
- Euro-zone 欧元区\726
- Evian Agreement 《埃维昂协议》\289
- Exports, declining market for 出口市场衰退\457—458
- Extraordinary Assize Courts 特别巡回法庭\47
- Extraordinary People's Courts 捷克斯洛伐克特别人民法庭\50

F

- Fabius, Laurent 洛朗·法比尤斯\554
- Factory Acts 《工厂法案》\75
- Falangists 长枪党\525
- Family allowance 家庭津贴\73
- Farmers/farming 农民/农耕
 - 农业共同政策\306—307
 - 衰退\327—328
 - 法国\305
 - 地主\78
 - 东欧农业劳动人口比例\328
 - 占 GDP 比例\327—328
 - 西欧农业劳动人口比例\327
 - 战后状况\77—78,305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盟国军政府保护法西斯主义\61

对西方的好处\198

意大利\33

抛弃法西斯主义\197—198

抵抗法西斯主义\63—64

谴责法西斯主义\47—51

Fascist Arrow Cross 法西斯箭十字\60

Fascists 法西斯主义者

盟国军政府保护法西斯主义者\61

意大利清洗法西斯主义者\47—48

Fashion trends 时髦潮流\395,396—397

Fassbinder, Rainer 雷纳·法斯宾德\19,276,277,416,417,472

Fatherland Front 祖国前线\43,131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参见 West Germany 联邦德国

Fejtő, François 弗朗索瓦·费吉托\209,217,426

Fellini, Federico 费德里科·费里尼\382

Feminism 女性主义\487—490

Ferry Luc 吕克·费里\481

Festival of Britain 不列颠的节日\163

Fight for peace 为和平而战\223—224

Final Solution 最后解决方案(参见 Holocaust)

Fini, Gianfranco 詹弗兰科·菲尼\704,789

Finkelkraut, Alain 阿兰·芬克尔克罗\761,785

Finland 芬兰

欧盟成员\716

苏联友好条约\139

First Vatican Council 第一次梵蒂冈会议\374

Fischer, Joschka 约斯卡·菲舍尔\493

Fischler, Franz 弗朗茨·费什勒\767

Fish, Hamilton 汉密尔顿·费什\89

Five Year Plans 五年计划(参见 Communism)

- Flanner, Janet 詹妮特·弗莱纳\46,66,89,222,237,244
- Flick, Frederich 弗里德利希·弗立克\58
- Floating currencies 浮动货币\453—454
- Food rationing 食物配给\21
- Food shortages 食物短缺\21—22,86
- Foot, Michael 迈克尔·富特\545
- Football 足球\782—784
- Forced labor 强迫劳工\24
- Forced population exchanges 强迫交换人口\25—26
- Forced repatriations 强迫遣返\30—31
- Ford Foundation 福特基金会\223,350
- Foreign workers, attitude towards 对待外国工人的态度\457
- Forsythe, William 威廉·福赛斯\780
-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福柯\400,479,480
- Fourastié, Jean 让·福哈斯蒂耶\324
- Four-class system 四等级制度\738
- Four-Power Agreement 四大国协议\252
- Fourth (Workers') International 第四国际(工人国际)\402
- Fraga, Manuel 曼纽尔·弗拉伽\521,522—523
- France 法国
- 流产法\488—489
 - 《法兰西民族抵抗委员会行动纲领》\66
 - 帝国非洲领地\283
 - 与阿尔及利亚\285—289
 - 反对共产党人\217—218,562—563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法国的呼吁\150
 - 艺术与文化的首创性\377—378
 - 对待欧洲关税同盟的态度\156—159
 - 反对欧盟扩大\732
 - 按照法国来打造欧洲形象\164
 - 战后天主教会\228
 - 计划总署\70—71

《共同纲领》\550
共产党\79,88,143,211—213,321,494—495,550,551
大屠杀共谋\815—820
对德国的关注\114
科西嘉民族分子\704
对马歇尔计划的批评\96
减少农村人口\548
政治分野\548—549
国内政治现代化努力\290
密特朗的经济政策\552—554
殖民地斗争的影响\289—290
德国哲学的影响\480
作为帝国\114,281—292
欧洲迪斯尼\789
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关系\157—159
《埃维昂协议》\289
电影制作\380—382
法兰西人民阵线\551
民族阵线\744—745
美国左派政策\744
1967 年总罢工\410—411
德国问题\115—117
政府计划\70,329
作为欧洲大国\112—113
传统遗址\772—774
大屠杀纪念馆\826
进入法国的移民\744—745
帝国财产\281—288
战后决策内容\113—114
指导性计划\329
作为新欧洲的倡导者\153
知识分子\209—217,560—565

犹太人(参见 Jews)

联合军事入侵埃及\296—297,319

劳工争端/罢工\410—411

工会\738

法国左翼\551—552

失败与屈辱\817

“五月事件”\409—413

爱国民兵\42

现代化\548—549

穆斯林\741,775,776

南特示威游行\409—413

民族化\552—553

“新浪潮”电影导演\381

“街垒之夜”\412

北非殖民地\285

核能力\249

秘密军队组织(OAS)\288—289

法国共产党\79

文化遗产\772—773

60年代的政党\408

政治社会学\547—548

人民共和运动(MRP)\80,81

战后农业生产\305

战后民族化\362

战后立场\112—117,817

战后清洗内奸\42

公共部门私有化\554

公共艺术资助\778

惩罚内奸\46

对移民的反应\744—745

地区非中央化\704

同苏联的关系\115—116

- 对法语作为重要语言地位衰落的反应\760—761
- 振兴法国\548
- 利维埃拉\342
- 舒曼计划\156—159
- 1967 年仓促大选\410—411
- 社会党\212,549—551
- 国家控制工业大公司\552—553
- 炼钢工业\154
- 学生示威行动\409—413
- 戏剧\379
-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13
- 2004 年的失业现象\737
- 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741
- 维希政权(参见 Vichy regime)
- 没有牺牲者的革命\409—413
- 越南独立\283—285
- 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看法\304,305—306
- 在越南的战争\283—284
- Franc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464—465,504,516—519,702
 - 去世\519
 - 经济奇迹\517
- Franco-Russian Treaty 法俄条约\115
- Frank, Josef 约瑟夫·弗兰克\189
- Franks, Oliver 奥利佛·弗兰克斯\98
- French Communist Party(PCF) 法国共产党\212—213
- French language, provincializing of 法语的地方化\759—761
- French Socialist Party 法国社会党\212,549—551
- Friedman, Milton 密尔顿·弗里德曼\537
- Fullbright Program 富布赖特项目\223,351
- Furet, François 弗朗索瓦·福海\563

G

- Gahrton, Per 佩尔·加尔顿\717
- Gaillard, Felix 费利克斯·盖拉德\287
- Gaitskell, Hugh 休·盖茨凯尔\370
- Gali, József 约瑟夫·加利\318
- Gallo, Max 马克斯·加洛\761
- GATT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参见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
- Gauche Américaine 美国左翼\794
- Gauck, Joachim 约阿西姆·高克\698
- GDR(参见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07
- 罗马尼亚加入\431
- 西班牙成员资格\516
- Generation Gap 代沟\352, 391—392
- Genocide(参见 Holocaust, 大屠杀)
- Genscher, Hans-Dietrich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666, 719
- Geographic rearrangements 重新划分疆土\27
- Georgia 格鲁吉亚
- 宣布独立\656
- 独立运动\652
- Geremek, Bronislaw 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588
- Gerhardsen, Einar 埃纳尔·基哈德森\364
- German Basic Law 《德国基本法》\79, 147, 269
- German Communist Party(KPD) 德国共产党\59
-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GD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见 East Germany)
- German language, provincializing of 德语的地方化\758—759
- German philosophy 德国哲学\480
- German problem 德国的难题\117, 497
- German Question 《德国问题》\102, 105—106, 242, 246
- German War Crimes trial 德国战争罪行审判(参见 Nuremberg Trials)
- Germany 德国

英美对德国的战略\122—123

反犹主义\810

英美联合占领区\124

英美联合占领区经济委员会\125

黑市\87

天主教中心党\80

作为欧洲的中心\763—764

基督教民主党(CDU)\56—57

战后的共产主义\59—60

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243—244

致力于繁荣建设\275—276

两德分裂\111,126—127,242—243

东德(参见 East Germany)

经济奇迹\35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见 West Germany)

对双重传统失落的感觉\47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见 East Germany)

对大屠杀的负罪感\820

仇恨罪\742—743

大屠杀纪念馆\826

移民统计数字\740

勤勉服从\275

知识分子\203—204

犹太人\809—812

作为欧洲之未来的关键\98—99

制造业\355—356

战后德国与奥地利版图\55

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黑九月谋杀犹太运动员\413

穆斯林\74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641

纳粹党(参见 Nazi Germany)

认识德国遭受苦难的需要\820—821

- 怀旧\769
- 东德人\769
- 战后妇女的过分表现\19
- 物质性摧毁\16
- 战后关于德国问题的决定\122
- 战后边界条约\498—499
- 再教育和去纳粹化计划\56—61
- 对艺术的公共资助\778
- 惩罚战犯\54
- 重新武装\243—244, 272—273
- 承认大屠杀\809—812
- 复苏\85—86
- 地区经济差异\756—757
- 怨恨希特勒\809
- 重新统一\614—615, 638—643
- 革命恐怖主义\470—473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力\4
- 关于结束占领德国的条约\244—246
- 关于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641
- 统一条约\639
- 战争赔款\123—124
- 西方盟国关于对待德国问题的协议\122
- 西德(参见 West Germany)
- Gerö, Ernő 厄尔诺·格罗\314, 315
- Gheorghiu-Dej, Gheorghe 盖奥尔格·乔治乌-德治\169, 184, 190, 430, 622
- Giannini, Guglielmo 古利埃尔墨·齐亚尼尼\51, 52
- Gide, André 安德烈·纪德\283
- Gide, Charles 夏尔勒·纪德\153
- Gierek, Edward 爱德华·盖莱克\583, 587
- Gimes, Miklós 米克洛斯·吉姆斯\318
- Ginzburg, Evgenia 叶芙盖妮娅·金斯伯格\560
- Giolitti, Giovanni 乔万尼·乔利蒂\257

- Giscard d'Estaing, Valéry 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489,527,528,529,550,551
 对维希政权的态度\818
 《欧盟宪法条约》\729—730
- Glasnost 开放性\597
- Glistrup, Morgens 摩根斯·格里斯特鲁普\486
- Globalization 全球化\736—746
- Globke, Hans 汉斯·格劳伯克\58
- Glucksmann, André 安德烈·格鲁克思曼\562,786
- Godard, Jean-Luc 让-吕克·戈达尔\381,382,388
- Goma, Paul 保尔·戈马\322,575
- Gomulka, Wladyslaw 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180,190,312—313,426,432,445
 反犹主义\434—435
 对学生运动的反应\433—434
- Goncz, Arpad 阿帕德·冈茨\318
- Gonzalez, Felipe 费利佩·冈萨雷斯\466,519,522,523,525,595
 丑闻\746
- Gorbachev, Mikhail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524,611,639,640
 在欧洲理事会上的发言\632
 简历\594
 经济改革\595—597
 退出阿富汗的策略\601—602
 论德国统一\640,641—642
 开放性\597
 处理波罗的海事务\646—647
 强硬派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603—604
 入侵阿富汗\601—602
 重大战术错误\653—654
 激进改革派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604
 共产党的改革\597
 作为改革者\594—595,599—600
 同西欧的关系\601—604
 丧失权力\654

受冷遇\656—657
谴责勃列日涅夫的主张\604
下台\657
对卫星国要求独立自主的反应\602,643
在卫星国获得自主方面的作用\632—633
苏联外交政策转变\600—602
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604
对流行音乐的容忍\602
对立陶宛的最后通牒\647
访问东德\613

Gorbanevskaya, Natalya 娜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575
Gorz, André 安德烈·高兹\739
Gosplan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578
Gottwald, Klement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92,138,185,186,200—201
政府计划的资本主义\68
共产主义的五年计划(参见 Communism)
定义\69
经济\72
信念\69,362
政治结果\71—72
战后经济复苏中的计划\328—329
目标\71
西欧\68—69,328—330

Graham, Billy 葛培理\608
Gramsci, Antonio 安东尼奥·格兰西\207,402,403,479
Grand Narrative 宏大叙事\563
Grass, Günter 君特·格拉斯\276,416,420,642,742,785,812,821
Great Britain 英国
放弃巴勒斯坦\293
非洲独立\298—299
严峻的时代\162—163
反共分子\217—218

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59—164

艺术与文化首创精神\377

在亚洲控制的土地\280

核武器计划\112,160

对欧洲关税同盟的态度\159—164

自治地区\704—707

反对欧盟扩大\731—732

巴恩斯利作为传统工业的典型\770—771

英国广播公司(参见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英国雷兰汽车公司(参见 British Leyland)

英国汽车公司\356

英国民族党(BNP)\742,744

英国石油公司\542

英国通讯公司\542

核裁军运动(CND)\255

散装啤酒运动(CAMRA)\486

检查制度\376—377

电影观众\230,346

50年代的电影\299—301

殖民主义\278—279

英联邦\160,293,298,301—302

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336

共产党\321

英国共产党\205

对苏联的关注\111—112

保守党\538,540—547

对付法国\291—292

帝国幻想的灭亡\301

决定分裂德国\111

体育运动主导地位的衰落\301

撤离南亚\293

倚赖美国\302

撤消公共部门\542—543

战后国内政治\161

战后经济状况\159,755—756

经济衰落\357—358

与西德相比的经济表现\354—359

经济战略\537—538

埃及非殖民化\294—298

1940年《紧急权力法案》\68

帝国\160

欧洲煤钢委员会\159,164

欧洲共同体成员\526

欧洲经济共同体\303,307—308

费边社员\205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546

第一流的福利与服务制度\371

外国人的生活与工作\740

与爱尔兰之间的受难节协议\707

政府计划\68—69,330

承认塞浦路斯独立\508—509

传统工业\770—772

印度人\741

移民统计数据\742

马歇尔计划的影响\161—162

帝国海外领地\278—279

工业衰落\356—358,383

工业关系\371—372

工业不稳定\539

知识分子\205—206

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706—707

爱尔兰共和军(参见 Irish Republican Army)

犹太人\807—808

联合入侵埃及\296—297,319

劳工纠纷/罢工\69,370—372,545—546

工党\69,370—372,545—546

自由化改革\376—377

战后生活\226—227

伦敦种族骚乱\336

制造业\356—358

战后军费开支\162

矿工\538,542

道德与个人关系\376—377

穆斯林\741

全国医疗服务法\75

全国土地基金会\770

民族分离主义\704—707

国家大剧院\379

国家信托基金\770

新法西斯主义\744

新工党\546,794—795

新欧洲移民\335—336

北爱尔兰\466—469

怀旧\770—772

核能力\249

作为核大国\160

《淫秽出版物法案》\376

20 世纪 50 年代的乐观主义\299—300

欧格里夫作为传统工业的典型\771

《贫困法》/财产测试制度\73,75

人口统计\331

战后关注的方面\110

战后经济与制造业决策\357—359

战后劳动力\358

贫困率\738—739,795

价格与收入政策\538

铁路私有化\544

国有资产私有化\542—544,795

对艺术的公共资助\778

电影的配额制度\231

1965 年的种族关系法\336

定量配给\162—163,235

对移民的反应\744

作为欧盟结构性基金的接受者\756

拒绝加入欧洲共同体\303

地区经济差异\755—756

地区分离主义\704—707

不愿与欧洲大陆融合\159—161

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资源\14

重新安排经济战略\539

撤出帝国领地\292—302

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705—706

社会民主党\545

社会民主党人\370—372

英国社会民主党\401

社会正义改革\161

南非独立\298

《威斯敏斯特章程》\293

1977 年钢产量计划\460

苏伊士运河危机\294—302

撒切尔主义\540—547

工会\358

乌尔斯特(北爱尔兰省)\466—469

1977 年失业率\539

1985 年失业率\543

无法治理\540

大学制度\393

美国出售潜艇核导弹\292—293

维多利亚社会\388

越南团结运动\407

福利国家\74—75,162—163,537—547

威尔士民族主义运动\704—705

不满的冬天\539,540

撤离中东\293—29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161—162

Grechko, Andrei 安德烈·格列奇科\443,444

Greece 希腊

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05

作为马歇尔计划的受益国\91,505

中心联盟\506,507

内战\35

KKE 恐怖分子\504—505

共产主义政党\505

共产党人\141

政变\507—508

塞浦路斯情势\508—509

经济援助\528

政变后的经济政策\507—508

欧洲共同体成员\527—528

开除出欧洲理事会\508

希腊团结党\506

军人集团\507—508

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510

军事\505—506

全国激进党联盟\507

新民主党派\509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510

政治形势\506—510

战后清洗内奸\48—49

对共产党人的判刑期\505

晚近政治历史\506—510

地区间冲突\505

与土耳其的关系\508—510

回归民主\509—510

右翼政治集团\506—508

恐怖主义\504—505

作为西方同盟者\505—506

Greene, Graham 格雷厄姆·格林\217

Green parties 绿党\493—494

Gromyko, Andrei 安德列依·葛罗米柯\590,599

Gross, Tomasz 托马斯·格罗斯\827

Grossman, Vassily 瓦西里·格罗斯曼\599

Grósz, Karoly 卡罗伊·格罗斯\609,632

Group 47 四七社\199

Gruša, Jirí 叶尔基·格鲁沙\561

Guala, Filiberto 费利伯托·加拉\345

Guest workers 客籍工人\334—335,741

Guilty Men 有罪的人\64

Gulag Archipelago 《古拉格群岛》\464,559,560,561,565

Gysi, Gregor 格雷戈尔·居希\615

H

Habermas, Jürgen 尤尔根·哈贝马斯\276,416,420,642,786,812

Haider, Jörg 尤尔格·海德尔\3,694,743—744,745

Hájek, Jiří 伊利·哈耶克\569

Halimi, Gisèle 吉赛拉·阿里米\488,489

Hall, Stuart 史都华·豪尔\481

Hallstein Doctrine 荷尔斯坦因决议原则\270

Hammerskjöld, Dag 达格·哈马舍尔德\317

Hands across the Baltic 手拉手“横跨”波罗的海\645

Haraszti, Miklós 米克洛斯·哈拉扎梯\567

Harich, Wolfgang 沃尔夫冈·哈里希\322,574

- Harriman, Averell 埃佛莱尔·哈里曼\106
- Hartmann, Detlef 戴特勒夫·哈特曼\473
- Harvest failures 歉收\86
- Hate crimes, German 德国仇恨罪\742—743
- Hauser, Wilhelm 威廉·豪瑟\58
- Havel, Vaclav 瓦克拉夫·哈维尔\438, 493, 568, 569, 574, 616—621, 620, 631, 661—664, 695, 719, 720, 785
- Havemann, Robert 罗伯特·哈沃曼\573
- Hayek,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537, 560
- Healey, Dennis 丹尼斯·希利\150, 462, 539
- Heath, Edward 爱德华·希思\346, 526, 538, 541, 542
-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203, 276, 480
- Heine, Heinrich 海因利希·海涅\164, 209—210, 799—800, 803
- Helsinki Accords 《赫尔辛基条约》\501—502, 566—567, 590
- Helsinki Final Act 《赫尔辛基最后法案》\613
- Helsinki Rights movement 赫尔辛基权利运动\502—503
- Hermlin, Stephan 斯蒂芬·赫姆林\57
- Herri Batasuna 埃里·巴塔苏纳党\465, 466
- Herriot, Edouard 爱德华·埃利奥特\42, 211
- Herzen, Alexander 亚历山大·赫尔岑\210
- Herzl, Theodor 西奥多·赫茨尔\785
- Heuss, Theodore 西奥多·胡斯\271
- Heydrich, Reinhard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826
- Heym, Stefan 斯蒂芬·海姆\615
- High culture 高雅文化\778—780
-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392—394
- Hindus 印度人\741
- Hippies 嬉皮士\397
- History 历史
- 有别于历史的回忆录\830
 - 作为怀旧\768—776
 - 历史的不确定性\562—564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ory revolution and 历史学、社会学、理论革命\399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9

参见 Nazi Germany

奥地利作为第一个受害国\2,52

被希特勒驱逐出境\23

希特勒分割欧洲\40

最后解决方案(参见 Holocaust)

德国人怨恨希特勒\809

大屠杀(参见 Holocaust)

入侵波兰\13

20 世纪 60 年代西德对希特勒的看法\417—418

政策作为经济奇迹的源泉\355

战后德国对希特勒的看法\811

苏联红军在打败希特勒中的作用\54

希特勒统治下欧洲的统一\154

Hitler's New Order 希特勒的“新秩序”\68

Hobsbawm, Eric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769

Hochhuth, Rolf 罗尔夫·霍赫胡特\416,420

Ho Chi Minh 胡志明\283—285

Hoggart, Richard 理查德·霍加特\399

Holbrooke, Richard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675

Holland 荷兰(参见 Netherlands)

Holocaust 大屠杀

各国在大屠杀中的共谋关系\803—820

东欧承认大屠杀\821—826

需要忘却\808—809

大屠杀幸存者的统计数字\804

电视系列片\811

西欧承认大屠杀\803—820,826—827

Holocaust memorials 大屠杀纪念馆\826

Homelessness 无家可归(参见 Displaced persons)\739

Homogeneity, post-war 战后同质性\28

- Honecker, Erich 埃利希·昂纳克\583,611—614,629,769
 针对昂纳克的政变\614
- Hook, Sidney 锡尼·胡克\222
- Hoover, Herbert 赫伯特·胡佛\106
- Horkheimer, Max 麦克斯·霍克海默\492—493
- Horn, Gyula 居拉·霍恩\613
- Hotlin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热线\255
- Household appliances 家用电器\338—339
- Housing shortages 住房短缺\82,235—236
- Hoxha, Enver 恩维尔·霍查\583
- Human rights 人权\502,564—566
- Hume, David 大卫·休谟\706
- Hungarism Republic 匈牙利共和国\610
- Hungarian Socialist Party 匈牙利社会党\610
- 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323,610
- Hungary 匈牙利
 作为马歇尔计划的受益国\91
 检查制度\571
 内奸\698—699
 共产主义政党\130,136—137,608—610
 不同政见者运动\568—569,609
 东德难民\612—613
 经济\608—609
 革命后的移民\318
 共产主义失败\608—610
 大屠杀纪念馆\827
 形象\608
 犹太人\434
 立法改革\609—610
 解放\608—610
 混合经济\428—429
 货币借贷\582

新经济机制\428—429

人民阵线\137

杀戮平民\192

政治对立\609

对非斯大林化的反应\313—315

改革派经济学家\428

1989 年事变\609—610

针对苏联的革命\314—318,319—323,824

自我监察\571

社会主义\136—137

苏联的影响\136—137

“恐怖之屋”\ 827—828

Hunger winter, Dutch 荷兰饥饿的冬天\21

Hurd, Douglas 道格拉斯·赫德\639

Husak, Gustav 古斯塔夫·胡萨克\445,492,566,583,616,660

下台\619

Hussein, Saddam 萨达姆·侯赛因\681

I

Idea of Europe 欧洲理念\752

Iliescu, Ion 伊昂·伊利埃斯库\625,626,687,693

承认参与大屠杀\828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见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migration 移民

进入英国的非欧洲人\335—336

西欧对移民的限制\457,740

Imported labor 输入的劳动力\333—337

Indentured servants 契约仆役\741

India 印度\293

Infant motality rate 婴儿死亡率\22,331—332

Inflation 通货膨胀\87,454

Inflationary wage settlement 通货膨胀工资解决方案\460

- Informers 告密者\37
- Ingrao, Pietro 彼德罗·英格拉奥\207
- INPS 国家社会保障局(参见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al Security)
-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IRI) 工业重建研究所\258,555
- Insurance 保险
- 事故与疾病险\72
- 强制性失业险\72,74
- Integrated Mediterranean Programs 地中海整合计划\527
- Intellectual Left, influence of 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198
-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
- 参见 Dissident movement
- 特点\198,199
- 共产党人恭维知识分子\200
- 西欧状况\203—209
- 衰落\695
- 消亡\785—786
- 东欧知识分子\199
- 东欧知识分子的命运\202—203
- 法国知识分子\209—217,560—565
- 自由派知识分子\218
- 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198—199
- 巴黎知识分子\209—217,560—565
- 西欧知识分子\198—199
-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中程核武器条约》\600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European Customs Union 欧洲关税同盟国际委员会\153
-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t Nuremberg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参见 Nuremberg Trials)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7,174
- 英国贷款\297
- 罗马尼亚加入\431
- 西班牙成员资格\516
- 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IRO) 国际难民组织\29
- International trade, increase in 国际贸易增长\325—326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War Crimes at The Hague 海牙国际战争罪行审判庭\676—677,681,683

Inter-state warfare 国家之间的战争\750

Investment capital, free flow of 投资资本自由流动\736—737

Ionescu, Eugène 尤金·尤奈斯库\754

IRA 爱尔兰共和军(参见 Irish Republic Army)

Iraq 伊拉克

托尼·布莱尔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影响\795

欧洲对美国入侵的反应\786

脱离英国而独立\293—294

美国入侵\786,787

Ireland 爱尔兰

血腥星期日\468

爱尔兰共和军(参见 Irish Republican Army)

民族主义运动\706—707

北爱尔兰\466—469

IRI 工业重建研究所(参见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 爱尔兰共和军\466—469

学徒进军\468

试图谋杀玛格丽特·撒切尔\542

要求\468

全面影响\469

IRO 国际难民组织(参见 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

Iron Curtain 铁幕\124

Islam in Europe 欧洲的伊斯兰教\774—775

Israel 以色列\32

联合军事入侵埃及\296—297,319

六日战争(参见 Six Day War)

赎罪日战争\454—455

Ital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War Orphans 意大利国家战争孤儿院\362

Italian Peace Treaty 《意大利和平条约》\142,143

Italy 意大利

堕胎法\489

行动党\66

反共分子\217

自治区\703

反对欧盟扩大\732

贿赂丑闻\746

战后天主教会\228,258—259

基督教民主党人\258—260,361,475,476,746

内战\33—34

共产主义政党\79,88,207,321,402,415,475,495

腐败\260

第159号法令\47

作为民主政体\256—260

经济中介与控股机构\258

经济奇迹\413

移民\333—334

特别巡回法庭\47

国会极左派\414

极左派恐怖主义\475—476

极右派恐怖主义\475—476

迷恋毛主义\415

法西斯主义\33

电影制作\382—383

政府计划\69—70,328—329

工业雇员待遇\413

工业重建研究所\258,555

知识分子\206—209

劳动纠纷/罢工\413—416

土地改革\78—79

重要岁月\476,477

龙巴德团\703—704

黑手党\476,477,746

马克思主义者\415

南部地区\257

莫罗事件\475

穆斯林\741

北部联盟\703—704,732

旁系恐怖主义团体\474

意大利共产党\79,144,207—208,495

意大利社会党\207

皮莱利公司劳动纠纷\413,415

60年代的政党\408

人口统计\331

战后国有化\361—362

战后清洗内奸\42,47

南部的贫困\257

私有化\556

公共部门公司\361—362

清洗法西斯分子\47—48

红色旅恐怖团体(参见 Red Brigades terrorist group)

冰箱生产\338—339

地区经济差异\755

地区分离主义\702—703

社会党\746

分裂\702—704

1969年的罢工运动\413—416

学生运动\413—416

恐怖主义\473—477

从轴心国转变为民主同盟者\48

对待“有关系的”内奸\51

大学制度\394

Izetbegović, Aliza 阿利扎·伊泽特贝戈维奇\678

J

Jäckel, Eberhard 埃伯哈德·杰克尔\817

Jakeš, Miloš 米洛什·雅克什\616,618

Japanese occupation of European colonies 日本占领欧洲殖民地\282

Jaruzelski, Wojciech 沃伊季奇·雅鲁泽尔斯基\589,591,605—608,698

Jaspers, Karl 卡尔·雅斯贝斯\205,222

Jendretsky, Hans 汉斯·扬德雷茨基\184

Jenkins, Roy 罗伊·詹金斯\376,545

Jennings, Humphrey 汉弗莱·詹宁斯\163

Jeune Europe 青年欧洲\68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182—183,189

Jews 犹太人

阿尔及利亚犹太人\289

反犹主义(参见 Anti-Semitism)

比利时\805—806

英国\741,807—808

共产党人\434—435

死亡人数\24,804

作为被移置者\31—32

荷兰\806,813—814

东欧\806—807

纳粹种族灭绝的后果\36

法国\741,804—805,807,815—820

德国\809—812

在德国占领之下\38

大屠杀(参见 Holocaust)

匈牙利\434

对犹太人的苦难无动于衷\821

以色列(参见 Israel)

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谋杀\473,811

穆斯林袭击犹太人\775—776

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43
波兰\434
波兰承认犹太人的苦难\803
波兰惩罚犹太人\43
战后东欧\181—182
战后欧洲\803—831
战后德国对犹太人的看法\58
承认犹太人的苦难\803—808
罗马尼亚承认犹太人的苦难\803
俄国\741
斯大林对犹太人的态度\181—187
被解放的犹太人的人数统计\24
大屠杀幸存者人数统计\804
瑞士\813
维也纳\3,263
西德的赔偿\271—272

Jobert, Michel 米歇尔·若贝尔\733
John Paul II, Pope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585—587
Johnson, Lyndon 林顿·约翰逊\497,790
John XXIII, Pope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374
Joliot-Curie, Frédéric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221
Jospin, Lionel 里奥内尔·若斯潘\745
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 (Ginsburg) 《旋风之旅》(金斯伯格)\560
Judgement/beliefs, independence of 脱离末日审判信念\479

K

Kádár, János 雅努什·卡达尔\315,317,318,428,583,608—610
 去世\610
 下台\609
Kádáriszm 卡达尔主义\428—429
Kafka, Franz 弗朗茨·卡夫卡\5,437—438
Karadžić, Radovan 拉多万·卡拉季奇\676—677

Karamanlis, Constantine 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506,507,509,510,524,525

Kardelj, Edvard 爱德华·卡德里奇\143

Kazin, Alfred 阿尔弗雷德·卡辛\809

Kefauver, Estes 埃斯蒂斯·凯弗威尔\108

Kennan, George 乔治·凯南\19,54,88,89,106,108,120,123,126,154

Kennedy, Jacqueline 杰奎琳·肯尼迪\383

Kennedy, John F. 约翰·肯尼迪\248,251,252,383

古巴导弹危机\254

美国向英国出售潜艇核导弹\292—293

Kathly, Ann 安娜·凯斯里\136

Keynes, Maynard 梅纳德·凯恩斯\73,90,107,115,357,536,537

Khrushchev, Nikita 尼基塔·赫鲁晓夫\246,247,248,309,385,422,639,648

攻击斯大林\310—311

柏林冒犯\250—253

有控制的非斯大林化\310—312

古巴导弹危机\254

不喜欢罗马尼亚\430

处理匈牙利事件\314—318

厨房辩论\581

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政变\424

会见铁托\320

领导改革\423

释放古拉格囚犯\310

秘密报告\310—311,321

苏联战略\310

不可预测的性格\424

Kiesinger, Kurt-Georg 库尔特-盖奥尔格·基辛格\417—418,420,496,811

Kis, János 雅诺斯·基斯\694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501,502

Kiszczak, Czeslaw 切斯拉夫·基斯沙克\606

Kjaersgaard, Pia 皮娅·克亚斯伽尔德\744

KLA (参见 Kosovo Liberation Army) 科索沃解放军

Klaus, Václav 瓦茨拉夫·克劳斯\661—664,687,695,699,732

Klíma, Ivan 伊凡·克里玛\571

Knowledge, power resting upon monopoly of 基于垄断知识的权力\479

Koestler, Arthur 阿瑟·科斯特勒\199,210,217,222—224,560,562,785

Kohl, Helmut 赫尔穆特·科尔\56,498,529,591,611,640—643,748

德国统一\638

Kohout, Pavel 帕维尔·科胡特\200,438

Kolakowski, Leszek 勒塞克·科拉科夫斯基\426,432—433,561

Komarov,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183

Konrád, George 乔治·康拉德\568,572,576

Koopman, Rita 丽塔·库普曼\806

Korean War 朝鲜战争\151

Kornai, János 雅诺斯·科尔内\428

Kosovo 科索沃

北约军队占领科索沃\682

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的行动\673—683

Kosovo Liberation Army (KLA) 科索沃解放军\680

Kostov, Traicho 特莱科·科斯托夫\141,178—179,190,213

Koštunica, Vojislav 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682

Kovács, Béla 贝拉·科瓦茨\136

Kovaly, Heda 海达·科娃丽\199

KPB 德国共产党(参见 German Communist Party)

Kraus, Karl 卡尔·克劳斯\5,785

Kravchenko, Victor 维克多·克拉夫钦柯\213—214,224

Kravchuk, Leonid 列昂尼德·克拉夫楚克\650

Krefeld Appeal 克雷菲尔德呼吁书\591

Kreisky, Bruno (Chancellor, Austria) 布鲁诺·克里斯基(奥地利总理)\369,812

Krenze, Egon 埃贡·克伦茨\614,628

Krivine, Alain 阿兰·克礼文\412

Kryuchkv,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可夫\654,655

Kuchma, Leonid 列昂尼德·库奇马\687,689

Kula, Witold 维托德·库拉\806

Kun, Béla 贝拉·孔\403

Kundera, Milan 米兰·昆德拉\438,572—573,720

Kuroń, Jacek 雅契克·库伦\432—433,436,569,587—589,751

Kyrgyzstan 吉尔吉斯斯坦\656

L

Labor disputes/strikes 劳动纠纷/罢工\459

法国\410—411

意大利\413—416

波兰\588

葡萄牙\512—513

西班牙\517—518

西欧\407—415

Labor productivity 劳动生产力\326—327

引进劳动力\333—337

人口运动\333—337

Lacan, Jacques 雅克·拉康\479—481

Lady Chatterley's Lover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376

Lafontaine, Oskar 奥斯卡·拉封丹\611

Laker, Freddie 弗雷迪·雷克\342

Lambrakis, Grigoris 格里戈里斯·兰姆布拉基斯\506

Lang, Jack 雅克·朗\772,789

Lange, Anders 安德斯·朗格\486

Langer, Oskar 奥斯卡·兰格\192

Lanzmann, Claude 克劳德·朗兹曼\811,817

Lasky, Melvin 梅尔文·拉斯基\204

Latvia 拉脱维亚\644

内奸\698

宣布独立\655

独立运动\645—646

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观点\690

Latv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645

- Laurent, Jacques 雅克·劳伦特\217
- Laval, Pierre 皮埃尔·拉伐尔\49,50,815
- Lawrence, D. H. D·H·劳伦斯\376
- League of Hungarian Students 匈牙利学生联合会\314—315
-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27
- Leclerc, Annie 安妮·莱克勒克\479
- Lefebvre, Jacques 雅克·列斐伏尔\747
- Legitimacy 合法性
- 作为能力功能\797
 - 作为领土功能\798
- Leisure travel 休闲旅游\341—343
- Lend-Lease agreement 土地租借协议\90
- Leonhard, Wolfgang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560
- Leopold III, King 利奥波德三世国王\79
- Le Pen, Jean-Marie 让-玛丽·勒庞\694,732,742,745,804
- Lepper, Andrzej 安捷依·莱佩尔\693
- Levels-of-Industry agreement 工业等级协议\124
- Levi, Carlo 卡罗·列维\257
- Levi, Primo 普莱姆·列维\807,810
- Lévi-Strauss, Claude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399,400
- Lévy, Bernard-Henri 伯纳德-昂利·利维\562,720,786
- Lewis, Norman 诺尔曼·路易斯\257
- Liberal intellectuals 自由派知识分子\218
- Liberal Parties 自由派政党\131,132
- Liblin Committee 卢布林委员会\102
- Liebkecht, Karl 卡尔·李卜克内西\612
- Ligachev, Yegor 伊戈尔·利加乔夫\599
- Limited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255
- Linguistics issues 语言学问题\758—761
- Lippman, Walter 沃尔特·李普曼\108
- Lithuania 立陶宛\644
- 共产党分裂\646

独立运动\645—646

民族拯救委员会\647

Lithuanian Reorganization Movement 立陶宛重组运动\645

Litvinov, Pavel 巴威尔·李维诺夫\446

Litynski, Jan 扬·利廷斯基\434

Lloyd, Selwyn 塞尔文·洛伊德\319

Löbl, Eugen 欧仁·洛贝尔\60

Loebl, Fritz 弗丽齐·罗埃布尔\192

London, Artur 阿图尔·伦敦\199,213

London Agreements 《伦敦协议》\245

Long Telegram 长电文\108

Lotteries 彩票\778

Losonczy, Géza 格莎·罗松齐\199,318

Lübke, Hans 汉斯·吕布克\811

Lublin Committee 卢布林委员会\135

Luca, Vasile 瓦西尔·卢卡\135

Lukacs, György 乔治·卢卡契\402,403

Lüneberg trial 吕纳堡审判\54

Lustration 祭礼净化\699—700

Luxemburg, Rosa 罗莎·卢森堡\402,403,612

Lyotard, Jean François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480

M

Maastricht Treaty of 1992 《1992年马斯特利赫特条约》\529,713,715—716,788

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影响\716

冲击\716

Macciocchi, Maria-Antonietta 玛利亚-安东尼埃塔·马乔基\406

McCloy, John J. 约翰·麦克罗伊\39,58

Macedonia 马其顿\637

宣布独立\673

独立\680

引起地区性敏感\680

Macmillan, Harold 哈罗德·麦克米伦\75,147,252,254,291—292,298,299,301,302,541

Mafia 黑手党(参见 Italy)

Mahler, Horst 豪斯特·马勒\472,473

Maisky, Ivan 伊凡·马伊斯基\119

Major, John 约翰·梅杰\543,544

Makarios, Archbishop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509,510

Malenkov, Georgy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309

Maléter, Pál 帕尔·马勒特\318

Malia, Martin 马丁·马利亚\658

Malraux, André 安德烈·马尔罗\289,377—378,670

Manchester United 曼彻斯特联队\783

Mange, Etienne 艾蒂安·芒热\747

Mann, Klaus 克劳斯·曼\215

Maoism 毛主义\406—407

意大利迷恋毛主义\415

Maps 地图

比利时\70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148

欧洲联盟(1957—2004)\714

欧洲联盟(战后—2004)\724

1942年的欧洲\15

战后德国与奥地利\55

1973年的南斯拉夫\667

Marcel, Gabriel 加伯列尔·马塞尔\805

Marchais, Georges 乔治·马歇\550,551

Marcuse, Herbert 赫伯特·马尔库塞\404

Margolius, Rudolf 鲁道夫·马戈留斯\199

Maritain, Jacques 雅克·马利坦\222

Marriage of Maria Braun, The 《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19,276,472

Marshall, George C. 乔治·马歇尔\90,125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149

申请援助\45

- 作为对苏联扩张的阻碍\92
- 受益国\90,96,505
- 益处\96—97
- 共产党反对马歇尔计划的行动\144
- 结果\95,96—97
- 欧洲支付同盟\94
- 法国批评马歇尔计划\96
- 生产力使命\93
- 自我限制的方面\93
- 总成本\91
- 西德\125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209,401
 - 早期著作\403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 参见 Communism
 - 东欧\426—427
 - 失败\563
 - 辉煌时期\401—402
 - 再发现\402—403
- Masaryk, Jan 扬·马沙吕克\92,139
- Masaryk, Tomáš 托马斯·马萨利克\137—138,621,754
- Massacres 屠杀
 - 米洛舍维奇下令屠杀阿尔巴尼亚族人\680—682
 - 塞尔维亚人屠杀\677—678
 - 乌斯塔莎屠杀\674,675
- Mass exterminations 大规模屠杀\18
- Mass media 大众传媒\780—782
- Mass tourism 大规模旅游\341—343
- Master Narrative 主人叙事\559,563
- Mastroianni, Marcello 马切洛·马斯特洛亚尼\382
- Material damage, World War Two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物质性破坏\16—17
- Mauriac, François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67,198,218

Mauroy, Pierre 皮埃尔·莫鲁瓦\552

Maurras, Charles 夏尔·莫拉斯\511

Mayer, René 雷内·迈尔\807

Mazowiecki, Tadeusz 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588,608,629,631

Mazzini, Giuseppe 居塞佩·马志尼\210

Mečiar, Vladimír 弗拉基米尔·麦恰尔\662—664,687,700

Medgyessy, Péter 彼得·迈杰希\827

Media 传媒\345—347,780—782

在共产主义倒台中的作用\628

Mediterranean Europe 地中海欧洲

参见 Greece;Portugal;Spain

民主转型\504—526

地中海一体化计划\527

Medvedev, Zhores 若列斯·梅德维杰夫\575

Meinhof, Ulrike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470

Meir, Golda 果尔达·梅厄\183

Memory 记忆

东欧的悲痛记忆\823—824

俄国的悲痛记忆\824—825

西欧的悲痛记忆\803—820,826—831

东欧对战后岁月的集体记忆\750

区别于记忆的历史\830

西欧对战后岁月的集体记忆\749—750

Men, post-war shortage of 战后人口短缺\19

Mendès-France, Pierre 皮埃尔·孟德斯-法朗士\244—245,284,285,304,411,565

Menzies, Robert 罗伯特·孟齐斯\295

Merker, Paul 鲍尔·莫克\189

Merleau-Ponty, Maurice 莫里斯·梅洛-庞蒂\210,215

Messia conference 麦西拿会议\302

Michnik, Adam 亚当·米奇尼克\433,434,436,567,568,573,574,588,589,605,606,607,628,694,697,698,720,785,786

Mickiewicz, Adam 亚当·密茨凯维奇\210,433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衰退对中产阶级的影响\462

单一目标政治网络\486

Mielke, Erich 恩利希·米尔克\642

Mihajlović, Draza 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34,49

Mikhoels, Solomon 所罗门·米柯埃尔斯\183,187

Mikolajczyk, Stanislaw 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奇克\135—136

Mikoyan, Anastas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314

Milans del Bosch, Jaime 哈伊梅·米兰斯·德·博斯克\521

Milices Patriotiques “爱国者卫队”\42

Military losses, World War Two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失败\18—19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706

Millett, Kate 凯特·米利特\479

Milošević, Slobodan (President, Serbia)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塞尔维亚总统)\671—673,
678,679—683

被指控为战争罪犯\681

屠杀阿尔巴尼亚人\680—682

在南斯拉夫灾难性大分裂中的作用\684

Milosz, Czeslaw 切斯拉夫·米沃什\199—201,203,209,571,573,785

Mining jobs, disappearance of 采矿就业的消失\458—459

Mitscherlich, Alexander 亚历山大·米茨切里希\416

Mitscherlich, Margarete 玛格丽特·米茨切里希\416

Mitterrand, François 弗朗索瓦·密特朗\411,529,540,549—554,591,772,773

接纳中欧、东欧国家加入欧盟\719

生平信息\549

经济政策\552—554

作为欧洲主义者\553

论德国统一\639—640

经济现代化\554

承认大屠杀\818—819

社会政策\552—553

Mladenov, Petar 佩特尔·姆拉德诺夫\627

- Mladić, Ratko 拉特克·姆拉迪奇\675,676—677
 屠杀穆斯林\677—678
- Mlynář, Zdeněk 兹德内克·姆莱纳尔\166,201,447,566,595
- Mňačko, Ladislav 拉迪斯拉斯·穆纳斯科\438
- Mnouckine, Ariane 亚里安·莫努什金\789
- Moch, Jules 朱尔斯·莫奇\807
- Moczar, Mieczysław 米奇斯拉夫·莫查尔\434,435
- Modrow, Hans 汉斯·莫德罗\615,638
- Modzelewski, Karel 卡莱尔·莫泽勒夫斯基\432—433
- Moldova 摩尔多瓦
 宣布独立\656
 作为欧洲国家\753—754
 客籍工人\741
 独立运动\650—652
 月工资\740
 人民阵线\651
- Mollet, Guy 盖依·莫雷\286
- Molotov, Vyacheslav 符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91,103,121,125,137,311
 拒绝法国的对德国计划\115
- Molotov-Ribbentrop Pact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104,215,644,645,824
- Monnet, Jean 让·莫奈\70,96,154,156,727
- Monnet Plan 莫奈计划\70—71,114
- Montand, Yves 伊夫·蒙当\524
- Monty Python 《巨蟒之灾》\482
- Moravia, Alberto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8
- Moreau, Jeanne 让娜·莫罗\488
- Morgenthau strategy 摩根索战略\105,125
- Moro, Aldo 阿尔多·莫罗\475
- Morrison, Herbert 赫伯特·莫里森\160,280
- Mortality rate, World War Two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率\17—18
- Moscow Conference of 1947 1947年莫斯科会议\124
- Moscow Declaration of 1943 1943年《莫斯科宣言》\53

Moscow Treaty of 1970 1970 年《莫斯科条约》\498—499

Moscow Trials 莫斯科审判\178

Mosley, Oswald 奥斯瓦尔德·莫斯莱\68

Motor scooters 小型摩托车\341

Mounier, Emmanuel 伊曼纽尔·莫尼埃\211,217

Movement for Peace 和平运动\221—222

Muir, Edwin 爱德温·缪尔\754,769

Munich Olympics Black September murders of Jews 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黑九月谋杀犹太人
\473,811

Muschg, Adolf 阿道夫·穆希格\787

Muslims 穆斯林

袭击犹太人\775—776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673—678

在法国(参见 Feance)

在英国\741

姆拉迪奇屠杀穆斯林\677—678

在苏联\593

在西欧人口中的比例\741—742

Mussolini, 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33,208—209

N

Nagy, Imre 伊姆雷·纳吉\313,315—320,323,442,609,610

Nanny states 受保护国家\372,384—385

Nanterre demonstrations 农泰尔示威\409—413

Nasser, Gamal Abdul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294—297

Nastase, Adrien 阿德里安·纳斯塔塞\754

National Agency for Hydrocarbons (ENI) 国家炅局\258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al Security (INPS) 国家社会保障局\258

National Investment Bank and Industrial Guarantee Fund 国家投资银行与工业保障基金会\555

Nationalists 民族主义者\693

Nationalization 国有化\71

National Stalinism 民族斯大林主义\430

捷克斯洛伐克过渡到改革的共产主义\436

Nation-states 民族国家

参见各个具体的民族国家

未来\796—800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见 NATO)

Navarro, Carlos Arias 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519

Nazarbaev, Nursultan 努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656

Nazi Germany 纳粹德国

轰炸行动\16

对占领/征服的地方的作用\14

所占领国家\13—14

最后解决方案(参见 Holocaust)

大屠杀(参见 Holocaust)

战俘集中营\19

再教育与去纳粹化计划\56—61

对纳粹德国的抵抗\33

作为经济奇迹之源\355

对待东欧人\17

对待被占领的国家\39

对待西欧人\17

Nazism 纳粹主义

德国人的观点\58

德国人对纳粹主义的认识\809—812

过渡到共产主义\193—194

Negri, Toni 托尼·奈格里\475—476

Németh, Miklós 米克洛斯·纳密斯\582,632

Nenni, Pietro 彼德罗·纳尼\207

Netherlands 荷兰

战后的天主教会\228

天主教党\263—264

天主教人民党\264

大屠杀中的复杂情况\806—809

- 丹麦人民党\742,744
- 政府计划\70
- 帝国领地\280—281
- 犹太人\806,813—814
- 富图恩名单党\742,744
- 穆斯林\741
- 国家投资银行与工业保障基金会\555
- 支柱\263—264
- 人口统计\331
- 新教徒\263—264
- 惩罚内奸\46
- 对移民的反应\742,744
- 承认大屠杀\814
- 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看法\304
- Neutrality Act 《中立法案》\112
- New Brutalism 新野兽主义\386
- New Left 新左派\403,405,408,420—421
- Newspapers 报纸\780
- Nimier, Roger 罗杰·尼米尔\217
- Nixon, 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431,501
 - 放弃固定汇率\453—454
 - 厨房辩论\581
- Nizan, Paul 保尔·尼赞\212
- Nolte, Ernest 恩斯特·诺尔特\811—812
- Non-combat deaths, World War Two 第二次世界大战非战斗死亡\18
- Nora, Pierre 皮埃尔·诺拉\773
- Nord, Lega 北方联盟\744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49—153,242
 - 在南斯拉夫的行动\682
 - 接纳希腊加入\505
 - 作为虚张声势\150—151
 - 实施 1922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716

未来的作用\787—788

德国对北约的贡献\243—244

德国作为成员\641

西德并入北约\245—246

核武器化\248

对北约的观察\150

首要目标\152

美国轻待北约盟国\787

Northern Ireland 北爱尔兰\466—469

Norway 挪威

宪法\364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挪威的影响\366

欧洲共同体与挪威\526

作为冷战的前沿国家\366

惩罚内奸\45

作为福利国家\366

Norwegian Progress Party 挪威进步党\486,487

Nostalgia 怀旧\768—776

Novomesky, Ladislav 拉迪斯拉夫·诺伏梅斯基\438

Novotný, Antonín 安东尼·诺沃提尼\436,439

对学生运动的反应\440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

反弹道导弹条约\592

奥尔德玛斯顿村原子武器研究机构\255

弹道核武器\248

英国(参见 Great Britain)

核裁军运动\255

法国\249

戈尔巴乔夫/里根谈判\600—601

中程核武器条约\600

《禁止部分核试验条约》\255

欧洲核武器化\248—249

苏联(参见 Soviet Union)

《核不扩散条约》\444

美国(参见 United State)

西欧对部署核武器的态度\590—591

西德\273

Nuremberg Trials 纽伦堡审判\53—54

益处\54

德国对纽伦堡审判的态度\58

苏联出席纽伦堡审判\54

Nyers, Rezső 雷兹索·尼尔斯\632

O

OAS 秘密军队组织(参见 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

Obersovsky, Gyula 古拉·奥伯索夫斯基\318

Occupation 占领\36—39

日本占领欧洲殖民地\282

德国占领苏联造成的物质破坏\166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占领科索沃\682

战后红军占领\137

抵抗占领(参见 Resistance movement)

苏联集团各国抗议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446

苏联占领匈牙利\297

结束占领德国条约\244—246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参见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EC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参见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hnesorg, Benno 本诺·奥内佐格\420

Oil 石油

阿拉伯石油禁运\455

危机\455, 456

历史价格\455

价格迅速提高\455, 456

俄国\765

Old Left 老左派\403,404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参见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ration Danube 多瑙河行动\443
Ophuls, Marcel 马塞尔·欧富尔斯\816—817
Orban, Viktor 维克多·奥尔班\323,610,629,827
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 (OAS)秘密军队组织\288—289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516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93—94,159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455
Orphans 孤儿\21
Orwell, George 乔治·奥威尔\205,771
Osborne, John 约翰·奥斯本\300
Ostpolitik 东方政策\497—500,573,586
Outsourcing 外包\737

P

Pacelli, Eugenio (参见 Pius XII, Pope) 尤吉尼奥·帕切利(教皇庇护十二世)
Pachman, Ludek 卢德克·帕奇曼\200
Padover, Saul K. 索尔·帕多维\100
Pakistan 巴基斯坦\293
Palach, Jan 扬·帕拉赫\445,617
Palestine 巴勒斯坦
 黑九月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谋杀犹太人运动员\473
 从英国独立\293
Papadopoulos, George 乔治·帕帕多普洛斯\507
Papagos, Marshal Alexander 亚历山大·帕帕戈斯元帅\506
Papandreou, Andreas 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507,510,525,528
Papandreou, George 乔治·帕潘德里欧\506
 议会政府\506—507
 政治紧张局势\506—507
Papon, Maurice 莫里斯·帕彭\818—819
Paris intellectuals 巴黎知识分子\209—217,560—565

Paris Peace Treaties 巴黎和平诸条约\134

Paris Peace Treaty 《巴黎和平条约》\109

Paris Treaty 巴黎条约\157

Parri, Ferruccio 费鲁乔·帕利\66

Partakhov, Krastyn 克拉斯廷·帕尔塔柯夫\175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PSI) 意大利共产党\79,144,207—208,495

Party for a Drastic Reduction in Taxes, Rates and State Intervention 彻底降低税、费率、国家干预的政党\486

Pasolini, Pier Paolo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416

Patocka, Jan 扬·帕托斯卡\492,569

Patrascanu, Lucretius 卢克莱修·帕特拉斯卡努\109,190

公开审判\184

Pauker, Ana 安娜·鲍克\130,133,135,184,190,191

Pavelic, Ante 安特·帕凡立克\23,35

乌斯达莎政权(参见 Ustase regime)

Paxton, Robert 罗伯特·佩克斯通\817

Payments deficits 克付赤字\458

PCF 法国共产党(参见 French Communist Party)

Peaceniks 反战分子\591

Peace treaties 和平条约\121

意大利和平条约\142,143

巴黎和平诸条约\109,134

保加利亚和平条约\134

德国和平条约\123—124

Peasants 农民

战后状况\77—78

农民革命\406

Péju, Marcel 马塞尔·佩居\212

Pelican, Jiří 伊利·佩利康\441,573

Pension system 退休金制度\73

基金\535—536,791—792,794—795

Percentages agreement 份额协议\101

Perestroika 改革

东德\614

苏联\599,603

Performing arts 表演艺术\778—780

Permanent Committee of the World Congress of Partisans of Peace 世界巴勒斯坦和平大会长期
委员会\221

Persil certificates “帕西尔”证书\57

Pétain, Philippe 菲利普·贝当\49,113,154,815—816

Petkov, Nikola 尼古拉·佩特科夫\134,175

Petroleum 石油(参见 Oil)

Pfimlin, Pierre 皮埃尔·弗姆兰\287

Philip, André 安德烈·菲利普\88

Pinchuk, Viktor 维克多·平丘克\689

Pineau,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比诺\319

Pinter, Harold 哈罗德·品特\353

Pisier, Marie-France 玛丽-弗朗斯·皮希尔\488

Pithart, Petr 彼得·皮特哈尔特\567,619

Pius IX, Pope 教皇庇护九世\374

Pius XII, Pope 教皇庇护十二世\48,228,374,380

Plan for the Level of the Post-War (German) Economy 战后(德国)经济平衡计划\105

Planning, governmental 政府计划(参见 Governmental planning)

Pleven, René 勒内·普利文\244

Pleven Plan 普利文计划\244,246

Plumb, J. H. 普拉姆\241

Plzen demonstrations 比尔森游行\176—177

Poland 波兰

边界协议\498,500

反犹主义\434

从共产主义演变到资本主义的道路\686—687

反对欧盟扩大\732

天主教会\178,427,586—589,605

《工人权利宪章》\569,587

内奸\698

保卫人权民权委员会\569

保卫工人委员会\569,587—588

共产主义政党\135—136,604—608

不同政见者运动\569,587—588

经济改革\605—606,686—687

作为战后苏联经济计划的例外\172—173

共产主义失败\604—608

华沙大学自由演讲\433

重划领土\27

希特勒入侵\13

本土军队\102,136

移民统计数字\740

民族记忆研究所\827

知识分子\588

犹太人(参见 Jews)

库伦-莫泽列夫斯基事件\432—433

劳工罢工\588,606—607

解放\604—608

军事管制\589,591,605

经济改革部\605

月工资\740

私有化\690

对非斯大林化的反应\312—313

承认大屠杀\822—823

承认犹太人的苦难\803

抵抗占领\36—37

报复犹太人\43

修正主义者\426,432

1980—1981 年变革\588—589

权利与自由\569

社会主义\135—136

团结工会运动\588—590,605—608

苏联的影响\135

苏联承认团结工会\607

学生运动\432—436

支持美国政策\787

统一工人党\432,606

华沙大学\432—433

Polish October 波兰十月\313,433

Polish Peasant Party 波兰农民党\135

Political reforms 政治改革\79

Political refugees 政治难民\31

Political satirists 政治讽刺作家\482

Politics 政治

反文化\398

生态派候选人\493

电视对政治的影响\346

足球替代政治\784

绿党\493—494

妇女在政治中的作用\490

Pollution 污染\570—571,686

Pompidou, Georges 乔治·蓬皮杜\410,489,499,529,733

对待维希政府的态度\818

对1967年5月“事件”的反应\411

Ponto, Jürgen 尤尔根·蓬托\470

Poor Law / Means Test system, British 英国《贫困法》/财产测试制度\73,75

Poos, Jacques 雅克·普斯\676

Popieluszko, Jerzy 泽西·波皮鲁兹科\605,696

Pop music 流行音乐\348—349,351,395—396

戈尔巴乔夫容忍流行音乐\602

朋克摇滚\481—482

Popper, Karl 卡尔·波普尔\563

Popular Front era 人民阵线时代\6,66,104,130,286,408

- Population statistics, post war 战后人口统计\28,330—337
- Population transfers 人口转移(参见 Emigration)
- Portugal 葡萄牙
- 非洲殖民地\512
 - 农业改革法\515
 - 安哥拉起义\512
 - 武装力量运动\513—514
 - 共产主义政党\513—514,515
 - 政变\513
 - 民主政治\515
 - 帝国领地\280
 - 劳工罢工\512—513
 - 列宁主义共产党\513—514
 - 失去果阿殖民地\511—512
 - 军事\511,515
 - 私有化\556
 - 晚近政治历史\510—516
 - 社会党\514
 - 生活水准\511
- Post-war agreements 战后协议\101
- Potsdam Conference 波茨坦会议\113,122
- Potsdam Declaration 《波茨坦公告》\26,251
- Poujade, Pierre 皮埃尔·布亚德\487
- Poulidor, Raymond 雷蒙·波利多\784
- Poverty 贫困\793,795
- Powers, Gary 盖利·鲍尔斯\251
- Pozsgay, Imre 伊姆雷·波茨盖依\610,628
- Prague coup 布拉格政变\125,139,149,156
- Prague Spring 布拉格之春\441,566,595,617,660,696,824
- Presser, Jacob 雅各布·普利瑟\814
- Priestley, J. B. 普利斯特莱\350
- Prisoners of war 战俘\19

Privatizations 私有化\795

英国国有资产\542—544

在前苏联集团各国\688—690

法国公共部门\554

作为加入欧盟的前提\795

西欧公共部门\555—558

Property rights under occupation 占领之下的财产权\38

Protestant churches 新教教会\229

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 临时爱尔兰共和军\468—469,706

PSI (参见 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意大利共产党

PSOE (参见 Spanish Socialist Party) 西班牙社会党

Public architecture of 1950s and 1960s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公共建筑\387

Public subsidies for arts 公共资助艺术\778—779

Pucheu, Pierre 皮埃尔·普谢\154

Pugo, Boris 鲍里斯·普戈\655

Punk rock 朋克摇滚\481—482

Puskás, Ferenc 弗朗茨·普斯卡斯\783

Putin,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普京\694,697

Q

Quisling, Vidkun 维德孔·吉斯林\809

R

Racial hygiene 种族清洗\368

Radice, Lucio Lombardo 卢齐奥·龙巴铎·拉迪齐\207

Radio Free Europe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224,319,344,433

Radios 广播电台\343—344

RFA 红军旅 (参见 Red Army Fraction)

Raffarin, Jean-Pierre 让-皮埃尔·拉法兰\820

Railroads 铁路\341—762

撒切尔的铁路私有化\544

Rais, Stephan 斯蒂芬·拉伊斯\192

Rajk, László 拉兹罗·拉吉克\136,179,189—191,213,313,314

Rákosi, Mátyás 马迪亚斯·拉科西\130,181,190,313—314

Ramette, Arthur 阿瑟·拉梅特\807

Rapes by Red Army 苏联红军强奸\20—21

Rationing 配给\235

英国政策\162—163,235

Ratzinger, Cardinal Joseph 红衣主教约瑟夫·拉辛格尔\585

Raznatovic, Zeljko 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675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590,591—592,600,631

Real Madrid 真正的马德里\783

Rearmament by Western Allies 由西方盟国重新武装\151—152

Recession 衰退

对20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的影响\462

福利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缓解困难中的作用\459

Recreational travel 休闲旅游\341—343

Recycled communists 循环再生的共产党员\693

Red Army 苏联红军

轰炸行动\16

处决逃兵\165

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181

大规模灭绝\18

战后占领\137

战后力量\117

强奸\20—21

在打败希特勒中的作用\54

Red Army Fraction (RAF) 红军旅\470—471

Red Brigades (RB) terrorist group 红色旅恐怖组织\473—477

资金来源\477

绑架阿尔多·莫罗\475

战术\474—475

Redistributions of property 财产重新分配\38—39

Red scare 红色恐怖\103

- Reform economists 改革派经济学家\428
- Refrigerators 冰箱\338
- Refugees 难民\22—32
 - 区别于难民的被移置者\29
 - 政治难民\31
 - 遣返难民\29
- Rehn, Elizabeth 伊丽莎白·雷恩\679
- Reitz, Edgar 艾德加·赖兹\416,472,769,811
- Renault, Alain 阿兰·雷诺\481
- Renault, Louis 路易·雷诺\51
- Renner, Karl 卡尔·伦纳\261
- Renoir, Jean 让·雷诺瓦\5
- Reparations, German 德国赔款\123—124
- Republic of Moldov 摩尔多瓦共和国\651
- Republic of Saló as collaborators 作为纳粹合作者的萨洛共和国\33—34
- Resistant movement 抵抗运动
 - 内奸\42
 - 解除武装\44
 - 整合\65
 - 合法政府对抵抗运动的看法\64
 - 缺乏政治经验\66—67
 - 作为政治\64
 - 抵抗引起的惩罚\42
 - 作为民族自豪感的依据\41
 - 怀疑\64—65
- Resistance Party 抵抗运动党\66
- Resnais, Alain 阿伦·雷奈\270,524
- Retirement 退休
 - 支撑退休人员的成本\535—536,791—792
 - 降低退休年龄\535
- Retribution 惩罚
 - 例子\42,43

需要\41

Reuter, Ernst 恩斯特·路特\276

Revisionism 修正主义\426

Revolutionary terrorism 革命恐怖主义\470—473

Revolutions 革命

参见 Coup d'états

1989年苏东易帜中美国的作用\631

1989年苏东易帜的特点\628

捷克斯洛伐克\618—620

东德\613—616

法国没有牺牲者的革命\409—413

匈牙利1989年易帜\609—610

匈牙利的反苏\314—318, 319—323

农民\406

波兰1980—1981年\588—589

60年代的性革命\396

理论革命\398—401

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620

1989年的暴力事件\629

Reynaud, Paul 保罗·雷诺\735

Riots 暴乱\469

Rips, Ilia 伊利娅·利普斯\446

Rivette, Jacques 雅克·里维特\381, 481

Rocard, Michel 米歇尔·罗卡尔\565

Rohmer, Eric 埃里克·侯麦\382, 563

Rokossowski, Konstanty 康斯坦蒂·罗科索夫斯基\312

Romania 罗马尼亚

堕胎法\622

农业集体化\169

农业改革\78

农业城镇\385, 623

反犹主义\183—185

从共产主义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方式\687

博爱骗局\689

内奸\689

共产党\130,131,184,430—431

政变\625

不同政见者运动\575

经济政策\623

经济改革\430—431,687

作为欧洲国家\753—754

实验监狱\192

共产主义的失败\622—626

婴儿死亡率\622—623

劳工罢工\622

解放\622—626

蒂米什瓦拉屠杀\625

月工资\740

民族拯救阵线\625,626

民族斯大林主义\430—431

迫害公民\192

私有化\689

配给计划\623

承认犹太人受难\803

承认西德\431

同西方的关系\431

农村集体化\169

农村系统化工程\623

秘密警察\624,625,626

被看作外人\754

苏联的影响\134—135

Romanian Workers' Party 罗马尼亚工人党\622

Rome Treaty 《罗马条约》(参见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作为三巨头之一\101—102

戴高乐对他的看法\291

Rossellini, Roberto 罗伯托·罗西里尼\209

Roudy, Yvette 伊维特·胡迪\488

Rousset, David 戴维·罗塞特\214—215

Rousso, Henry 亨利·卢索\808

Roy, Claude 克劳德·罗伊\322

Rugova, Ibrahim 易卜拉欣·鲁戈瓦\680

Rumsfeld, Donald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787

Rural Party 农村党\486

Rusk, Dean 迪恩·腊斯克\253,254

Russell, Bertrand 伯特兰·罗素\222

Russia 俄国

痛苦记忆\824—825

从共产主义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方式\689

亿万富翁\689

经济改革\689

作为能源生产/供应商\765

作为欧亚大陆帝国\764

世纪之交国家的健康\765

留给欧洲的遗产\764

民族主义者\693—694

任人唯亲\689

寡头\689,691,765

私有化\689

S

Sagan, Françoise 弗朗索娃·萨冈\488

Sakharov, Andrei 安德烈·萨哈罗夫\255,575,599

Salazar, António 安东尼奥·萨拉查\491,504,510—512

Sante, Luc 吕克·桑特\226

Sartre, Jean-Paul 让-保尔·萨特\43,198,200,210,211,216,353,401,406,482,562

Satirists, political 政治讽刺作家\482

Savater, Fernando 费尔南多·萨瓦特尔\787

Scandals 丑闻\746—748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羡慕社会民主模式\367

与大陆欧洲福利国家的区别\365—366

社会民主模式的黑暗一面\367—368

环境保护主义\494

历史性的经济萧条\364

政治过程中的农民\365—366

继承的社会利益\364

穆斯林\741

种族清洗\368

红—绿同盟\365

单一政治网络\486

社会民主党人\80,363—369

绝育计划\368

社会民主模式的成功\367

税率\486—487

福利国家\365—369

Scapegoats 替罪羊\188—189

Scargill, Arthur 阿瑟·斯卡吉尔\541

Schabowski, Günter 君特·沙博夫斯基\614

Scheel, Walter 瓦尔特·谢尔\498

Schengen Agreement 《申根协议》\534,718

Schleyer, Martin 马丁·施莱尔\470

Schmidt, Helmut 赫尔穆特·施密特\248,266,498—500,528,529,591

欧洲货币体系建议\461

Schmitt, Carl 卡尔·施米特\480

Schnabel, Rockwell 洛克威尔·施纳贝尔\775

Schneider, Peter 皮特·施奈德\416,417,812

Schroeder, Gerhard 葛哈德·施罗德\729,827

- Schumacher, Kurt 库尔特·舒马赫\126,219,268,809
- Schman, Robert 罗贝尔·舒曼\156,157—158,164
- Schuman Plan 舒曼计划\156—159,268
- Schumann, Maurice 莫里斯·舒曼\80
- Schüssel, Wolfgang 沃尔夫冈·舒瑟尔\743
- Scotland national movement 苏格兰民族运动\705—706
- SEA 《单一欧洲法案》(参见 Single European Act)
- Second Cold War 第二次冷战\590,592
- Second Vatican Council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374—375
- Second World 第二世界\407
- Seifert, Jaroslav 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311
- Semprun, Jorge 约尔格·塞布伦\321,829
- Separatist movement, western European 西欧分离主义运动\701—713
-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 9·11 恐怖袭击\787,797
- Se questo è un uomo (Levi) 《如果这是个男人》(列维)\807
- Serbia-Montenegro 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黑山)\637
- 在科索沃的行动\673—683
 - 歧视与压迫阿尔巴尼亚族人\679—681
 - 讨厌阿尔巴尼亚族人\670
 - 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战争的影响\685
 - 塞尔维亚族人的种族清洗\675—678
 - 对塞尔维亚族人的种族清洗\679
 - 米洛舍维奇作为总统\671—683
 - 北约空中打击塞尔维亚\677
 - 私有化\689
 - 被看作外人\754
 - 轰炸萨拉热窝\677
 - 美国的轰炸行动\678
- Sereni, Emilio 埃米利奥·塞伦尼\207
- Serge, Victor 维克托·谢尔盖\560
- Serres, Michel 米歇尔·塞尔\761
- Seventies generation 70 年代一代人

文化\478—479

玩世不恭\481—482

经济危机\453—463

社会压抑与性压抑的联系\479

流行文化\481—482

作为“后一切事物”时代\478

朋克摇滚\481—482

社会变迁\463—477

恐怖主义(参见 Terrorism)

Sex trade 性交易\741

Sexual fulfillment 性满足\404—405

Sexual revolution of the Sixties 60年代的性革命\396

Sharett, Moshe 摩西·夏雷特\271

Shelest, Petro 佩特罗·谢列斯特\442,445

Shevardnadze, Edvard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600,647,652

Show trials 公开审判\426,436

反犹\184—185

卢克莱修·帕特拉斯卡努\184

民族共产党人作为牺牲品\190—191

目的\187—188

斯兰斯基审判(参见 Slansky trial)

苏联\178—181,185—187

Shtern, Lina 丽娜·斯特恩\183

Shuchkevich, Stanislav 施坦尼斯拉夫·舒斯凯维奇\656

Shultz, George 乔治·舒尔茨\600

Siegfried, André 安德烈·齐格飞\353

Sik, Ota 奥塔·西克\428,437,439

Silone, Ignazio 伊格纳齐奥·西洛内\198,208,219—220,222,223,561

Silva, Aníbal Cavaço 阿尼巴尔·卡瓦科·席尔瓦\515

Šimečka, Milan 米兰·西迈斯卡\426

Simone, André 安德烈·西蒙\213

Single European Act(SEA) 《单一欧洲法案》\529,531,532,713,736

Single-issue parties and movement 单一问题政党及其运动\486—487

Sinyavsky, Andrei 安德雷·西尼亚夫斯基\424—425

Six Day War 六日战争\434,811,817

Sixties generation 60年代一代人\391—421

理论时代\398—401

文化\478

幻想的终结\447—448

流行潮流\395,396—397

法国各政党\408

嬉皮士\397

意大利\413—416

政治\398

流行音乐\395—396

实际成就\447—448

理性主义文化\478

作为知识分子革命\407

性革命\396

意义\407—413

在苏联集团\422—449

苏联\422—425

理论革命\398—401,481—482

对世界的看法\394—395

西德\416—421

Škvorecký, Josef 约瑟夫·史考沃雷茨基\438

Slansky, Rudolf 鲁道夫·斯兰斯基\185—186

Slansky trial 斯兰斯基审判案\185—187,189,190—191

Sling, Otto 奥托·斯林格\189

Slovakia 斯洛伐克\637

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途径\687

落后状态\660—661

创建\661—663

经济改革\687

历史问题\660—661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637

宣布独立\637—674

南斯拉夫攻击斯洛文尼亚\674

Slump of the Thirties 30年代的衰落\4

Smallholders Party 小农党\136

Smith, Adam 亚当·斯密\706

Smith, Walter Bedell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150

Snake in a tunnel accord “蛇洞汇率制”\461

Soares, Mário 马里奥·索瑞兹\515,525,557

Soccer 足球(参见 Football)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参见 West Germany)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人\80,132,133

参见 specific nation-state; Welfare state(s)

信念\363

激进转型\369—370

任务\363

Socialism 社会主义

信念受攻击\561

作为一种说法\559

相信其优越性\363

捷克斯洛伐克\441

经济制度的缺点\577—584

机能障碍\583

匈牙利\136—137

认同城市劳动者\405

波兰\135—136

污染\571

与共产主义联盟\132—133

Socialist parties 社会党\131—132

葡萄牙\514

西班牙\519,522

历史上支持社会党的选民\484

Socialist worker unions clashes with Communist worker unions 社会党工会同共产党工会的冲突\219

Social planning 社会计划, 参见 Welfare state(s)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险\361

Social system, imposition of 强加的社会制度\129

Social transformation, groups affecting 影响社会转型的团体\406

Sociology of knowledge 知识社会学\479—480

Sokolovski, Vassily 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126, 145

Solana, Javier 哈维尔·索拉纳\681

Solidarity movement, Poland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参见 Poland)

Sollers, Philippe 菲利普·索莱尔斯\761

Solzhenitsyn, Aleksandr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424, 464, 559—560, 561, 583, 602

Sontag, Susan 苏珊·桑塔格\720

Sotelo, Calvo 卡尔沃·索特洛\521

South Africa 南非\298

Souvarine, Boris 鲍里斯·苏瓦林\560

Soviet-era housing 苏维埃时代住房问题\385, 580

Sovietization and Russification of eastern Europe 东欧苏维埃化与俄国化\194—195

Soviet Union 苏联

解体\657

合并波罗的海国家\30

导致冷战的行动\129—153

导致帝国的行动\167—168

农业集体化\168—170

与波兰的边界协议\498, 500

美国对苏联扩张的反应\106—107

军备竞赛\247—249

原子弹\247

波罗的海诸共和国\644

干扰 1984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590

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灾难\597—598

教会\178

改革俱乐部\599

联合政府\130—131

垮台\585—633,643—657

集体农业失败\423

苏联共产党\656

与中国竞争\422

与西方对比\20

有控制的非斯大林化\310—312

政变\654—655

打击知识分子\424—425

古巴导弹危机\254

50年代和60年代的文化改革\424

货币改革\167—168

谴责1922年的联盟条约\657

经济制度的缺点\577—579

不同政见者运动\425,566—577

不信任西方\103—104

战后经济状况\117,166

经济改革\423—424,581—584,595—597

经济停滞\577—584

1989年选举\600

环境灾难\597—598

强制赔款\167

战后经济计划的例外\172—173

卫星国共产主义的失败\604—627

资助恐怖主义\477

五年计划(参见 Communism)

外交政策\119—120

与芬兰的友好条约\139

前台政府\130—131

德国赔款\167

开放性\597

戈尔巴乔夫对卫星国要求自治的反应\602

国家计划委员会\578

赫尔辛基权利运动\502—503

占领匈牙利\297

匈牙利赔款\167

匈牙利事件\314—318,319—323

俄罗斯共和国的重要性\652—653

作为商品进口国\581—582

强加军事专政于捷克斯洛伐克\444—445

合并东欧国家\130,166—167

卫星国独立\643—657

国际货币基金捐助者\108

入侵阿富汗\551,590,591,593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444

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政变\424

解放卫星国(参见各民族国家)\602,604—627

德国占领造成的物质破坏\166

军事两难困境\593

军事损失\18—19

军费开支\592

金融借贷\582

垄断经济决策\167

作为多民族帝国\27

穆斯林人口\593

核能力\247—248

在乌克兰的核武器部署\590

公开辩论\599

多瑙河行动\443

战后的机会\176

改革\599,603

在波兰和东德的迫害\180

谋划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443

 工业计划\170

 波兰的反对\172

 对六日战争的立场\434

 后斯大林时代\309—318

 战后立场\117—121

 战后对叛国罪的政治审判\175—178

 胜利的代价\166

 战俘营\19

 私营小农场\423

 再教育和非纳粹化计划\58—61

 惩罚公民\191—192

 苏联红军的强奸\20—21

 倒台原因\657—659

 承认团结工会\607

 放宽检查制度\599

 宗教\178

 遣返各民族居民\30—31

 压制布拉格改革\443—444

 权利与自由\567—575

 在打败希特勒中的作用\54

 罗马尼亚遣返者\167

 统制共产主义国家间的贸易\171

 农村集体化\168—170

 卫星国(参见各民族国家)\602,604—627,643—657

 替罪羊\188—189

 科学家\575

 第二经济\579

 确保邻国的忠诚\167

 外交政策转变\600—602

 公开审判(参见 Show trials)

 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尔审判案\425

- 60 年代一代人 \422—425
- 同南斯拉夫分裂 \144—145
- 对胜利的破坏 \118
- 各国宣布独立 \656
- 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参见 Zionism, Soviet support for)
- 电视所有权 \599
- 领土企图 \101—103
- 铁托造成的尴尬 \142
- 90 年代的转型 \637
- 对待乌克兰 \648—649
- 核不扩散条约 \444
- 暴政与恐怖 \175
- 对自己公民的不宣而战 \191—192, 202, 750
- 地下出版物 \425
- 战争机器 \166
- 西方同盟国不信任苏联 \103—104
- 西方同盟国遣返公民 \30
- 犹太复国主义 (参见 Zionism, Soviet support for)
- Spaak, Paul-Henri 保尔-昂利·斯帕克 \68, 164, 245, 302—303
- Spain 西班牙
 - 堕治法 \489—490
 - 自治省份 \520—521, 701—702
 - 巴斯克分裂主义者 \464—466, 702
 - 加泰罗尼亚 \520—521, 701—702
 - 战后天主教会 \227—228
 - 中央民主联盟 (UCD) \519, 520, 521
 - 共产主义政党 \495—496
 - 宪法 \520, 521
 - 政变 \521
 - 民主协调同盟 \519
 - 民主选举 \520
 - 民主政府 \521—522

- 经济政策\516—517,522
- 埃塔组织(参见 ETA)
- 费利佩·冈萨雷斯丑闻\746
- 埃里·巴塔苏纳党\465,466
- 帝国领地\279
- 劳动关系\517—518
- 蒙科洛协议\522
- 军事\517—518
- 国家稳定计划\516
- 政治反对派\518,519
- 民众联盟\521,522—523
- 私有化\556
- 近期政治历史\516—523
- 地区经济差异\755
- 地区认同\520—521,701—702
- 宗教自由\518
- 不愿回顾历史\523—524
- 性态度\524
- 社会党\522,523
- 分裂\520—521,701—702
- 旅游业\517
- 过渡到民主\519
-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PCE) 西班牙共产党\520
- Spanish Socialist Party (PSOE) 西班牙社会党\519
- SPD (参见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
- Speer, Albert 艾尔伯特·斯皮尔\68,154,355
- Sports 体育运动\782—784
- Sputnik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248
- Spychalski, Marian 马里安·斯贝查尔斯基\190
- Srebrenica massacre 斯雷布雷尼察屠杀\677—678
- St. Tropez 圣·特洛佩\342
- Stagflation 滞涨\456

Stalin, Josef 约瑟夫·斯大林\9,88,100,106,115,122,129

导致冷战的行动\129—153

钦服者\216

反犹\181—187

封锁柏林\146

去世\309

流放\23

划分欧洲\40

作为帝国缔造者\167—168

与铁托不和\141

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310—311

斯科拉斯卡波雷巴会议\143—144

作为三巨头之一\101—102

和平运动\221—222,272

个人崇拜\174—175

战后计划/决策\117—121

意图取代斯大林的权力斗争\309

提议德国统一\243

对红军强奸的反应\20

公开审判(参见 Show trials)

铁托的决裂\142,173,175—176

对波兰的看法\102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166—193

Standard of living 生活水准\337—353

广告\349—350

汽车\339—341

野营\342

可支配性收入\337—338

婴儿潮一代对生活水准的影响\347—350

家用电器\338—339

家庭预算\337—338

收入增长\338

美国的影响\350—353

休闲旅游\341—343

带薪休假\342

流行音乐\348—349,351

收音机\343—344

娱乐旅游\341—343

电视\345—347

旅游\341—343

交通堵塞\343

Stavation 饥饿\22

Star Wars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星球大战”(战略防御计划)\592,593

State-led planning 国家领导的计划(参见 Governmental planning)

Stateless persons 无国籍人\30

State warfare 国家战争\750

Staudte, Wolfgang 沃尔夫冈·斯陶特\271

Steel industry, disappearance of 钢铁工业的消失\459

Steel Pact 钢铁条约\153—154

Stepinac, Cardinal Alois 红衣主教阿罗伊·斯特皮纳克\49

Sterilization programs 绝育计划\368

Sticker, Dirk 德克·斯迪克\149

Strang, William 威廉·斯特兰\110

Strauss, Franz Josef 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252,417,820

Stresemann, Gustav 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154

Structuralism 结构主义\399—402

Student movements 学生运动

捷克斯洛伐克\440,445

法国\409—413

意大利\413—416

波兰\432—436

西德\418—421

Suárez, Adolfo 阿道弗·苏亚雷斯\519—521,524

Suchocka, Hanna 汉纳·苏霍茨卡\719

Sudetenland 苏台德地区\14

Suez Canal Company 苏伊士运河公司\294—295

Suez crises 苏伊士运河危机\294—298

教训\299

Summit Meeting at Geneva (1955) 1955年日内瓦峰会\246—247

Supermarkets 超级市场\338

Svoboda, Ludvík 路德维奇·斯沃博达\440

Sweden 瑞典

宪法\364

欧盟成员\716—717

作为纳粹同情者\84

人口统计\331

企业私有制\367

财富\366—367

作为福利国家\366—367

Switzerland 瑞士

联邦老年与幸存者保障法案\75—76

犹太人\813

作为纳粹同情者\84

非法买卖劫掠来的犹太人财物\813

Syberberg, Hans-Jürgen 汉斯-尤尔根·西贝尔伯格\471, 472

Szálasi, Ferenc 弗朗茨·萨拉西\50, 827

Szász, Béla 贝拉·萨兹\314

Szelenyi, Ivan 伊万·泽兰尼\568

Szilágy, József 约瑟夫·齐拉吉\318

Szlajfer, Henryk 亨利克·兹拉耶弗\433

Sztójay, Dome 道姆埃·茨托亚伊\50

T

Tajikstan 塔吉克斯坦\656

Tachiani, Alberto 阿尔伯托·塔奇亚尼\246

Tasca, Catherine 凯瑟琳·塔斯卡\761

Taylor, A. J. P. J. P. 泰勒\69

Taylor, Telford 特尔福德·泰勒\26—27, 53

Tedeschi, Giuliana 朱丽安娜·泰德西\807

Teenagers 青少年\347—350

Tejero Molín, Antonio 安东尼奥·特赫罗·莫林·莫利纳\521

Television 电视\345—347, 780—782

Terrorism 恐怖主义

巴斯克分裂主义者\464—466, 702

后果\477

德国\470—473

希腊\504—505

爱尔兰共和军(参见 Irish Republican Army)

意大利\473—477

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黑九月谋杀犹太人\473

20 世纪 70 年代\464—469, 470

巴勒斯坦\473

红军旅(RAF)\470—471

红色旅(参见 Red Brigades Terrorist Group)

革命者\470—473

9·11 袭击美国\787, 797

苏联资助\477

Tertiary education 高等教育\392—394

Tertz, Abram 艾勃拉姆·德尔兹\425

Thälmann, Ernst 恩斯特·台尔曼\822

Thatcher, Margaret 玛格丽特·撒切尔\526, 539—547, 590, 604, 739, 771, 794

成就\547

谈中欧与东欧国家加入欧盟\719

简历\539—540

经济政策\540—543

其政策对保守党的影响\544

谈德国统一\639

爱尔兰共和军试图谋杀撒切尔\542

铁路私有化\544

作为激进派\545

社会政策\543—544

Thatcherism 撒切尔主义\540—547

Theatre's golden age of modernism 现代主义戏剧的黄金时代\379

The Hagu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War Crimes 海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676—677, 681, 683

Theory revolution 理论革命\398—401, 481—482

Third Way economical model 第三条道路经济模式\794—796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406, 407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14

Thompson, E. P. 汤普森\560

Thorez, Maurice 莫里斯·多列士\65, 88, 143, 213, 220, 436

Timoshenko, Yulia 尤丽娅·季莫申科\688

Tiso, Father Józef 约瑟夫·蒂索神父\35, 50

Tito, Josep Broz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34, 42, 140—142, 173, 320, 583, 660, 666

攻击天主教会\49

与斯大林决裂\142, 173

经济改革\429—430

让苏联尴尬\142, 175—176

Titoism 铁托主义\178—180

Togliatti, Palmiro 帕米罗·陶里亚蒂\48, 65, 81, 88, 207, 208, 228, 321, 495

Tökés, László 拉兹洛·托克斯\624

Toruńczyk, Barbara 芭芭拉·托鲁尼茨耶克\434, 695

Toubon, Jacques 雅克·杜邦\761

Tourism 旅游业\341—343

性交易\263

西班牙性产业\517

Touvier, Paul 保尔·杜维埃\818

Trade, international 国际贸易(参见 International trade)

Trade union 工会\332—333

英国\358

Traffic jams 交通堵塞\343

Train stations 火车站\388

Transist radios 半导体收音机\344

Transnistrian independence “德涅斯特河岸”共和国独立\651—652

Transportation systems 交通运输系统\762

汽车(参见 Automobiles)

损坏\82—83

铁路(参见 Railroads)

Treaty of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条约\713,720

Treat of Brest-Litovsk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18

Treaty on the Final Settlement with Respect to Germany 德国问题最后解决方案条约\641

Treaty of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核不扩散条约\444

Treaty of Paris 巴黎条约\505

Treaty of Rome 罗马条约(参见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尔赛和约\27,105

Trial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Anti-State Conspiracy Centre 对叛国阴谋集团首领的审判\180

Trieste Accords 《的里雅斯特协议》\246

Triolet, Elsa 艾尔莎·特里奥莱\224

Tripartite Declaration 《三方共同宣言》\296

Trotsky, Leon 列昂·托洛茨基\402

Trotskyist parties 托洛茨基派政党\402—407

Truffaut, François 弗朗索瓦·特吕弗\381,382

Truman, Harry 哈里·杜鲁门\28—29,90,91,105,106,109

下令研制氢弹\247

Truman Doctrine 杜鲁门主义\127,505

Tudjman, Franjo 弗拉尼奥·图季曼\669,672,673,678,684

Tudor, Corneliu Vadim 科尔内留·瓦迪姆·图多尔\693

Turkey 土耳其

申请加入欧盟\766—768

塞浦路斯情势\508—509,510

面临的问题\766

给欧洲的遗产\765—766

作为北约成员\766

奥斯曼遗产\765—766

同希腊的关系\508—510

U

Ugrešić, Dubravka 杜勃拉芙卡·乌格雷西斯\430

Ukraine 乌克兰

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式\687

宣布独立\656

宣布主权\650

经济改革\687

客籍工人\741

对苏联的重要性\648

独立运动\648—650

月工资\740

任人唯亲\689

人民的改革运动\649

人口\649

鲁柯(改革者运动)\649

Ulbricht, Walter 沃尔特·乌布利希\58,59,131,151,445,581,822

Ulster 乌尔斯特(北爱尔兰)\466—469

Underclass 下层社会\739—741

Undernourishment 营养不良\21—22

Unemployment benefits 失业福利\536

Unemployment rate 失业率\332,457,737

• Ungovernability 无法控制性\462,469

英国\540

United Kingdom 英国(参见 Great Britain)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在波斯尼亚的行动\682,683

接纳东德和西德\499

联合国大会\107

处理塞尔维亚种族清洗问题\676

在克罗地亚的保护力量\676

安全理事会\113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on for Refugees 联合国难民问题高级委员会\32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21

援助南斯拉夫\140

食品供应\29

遣返与安置援助\28—29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54

United States 美国

接受被移置人员\32

在波斯尼亚的行动\678,683—684

导致冷战的行动\129—153

对战后欧洲娱乐活动的影响\230—234

流行文化的魅力\224,230—235,351—352

军备竞赛\247—249

试图分裂欧洲\787—788

出生率\791

轰炸塞尔维亚\678

破坏 1980 年奥运会\590

共产党人对美国的言辞暴力\220

共产党对美国的看法\220—221

作为欧洲大陆的警察\590

古巴导弹危机\254

在欧洲的文化交流与信息计划\223

同共产主义的文化战争\222,223

对付法国\291—292

同欧盟之间的价值观分歧\788—789,790

蔑视国际条约\789

与欧盟的经济竞争\788

欧盟对美国的保守看法\218

50 年代和 60 年代欧盟对美国的了解\350—351

电影出口\231—233

- 外国投资\788
- 看待德国统一\640—641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83,104—105
- 对 50 年代和 60 年代欧洲的影响\350—353
- 对德国的意图\105—106
- 入侵伊拉克\786,787
- 在欧洲投资\788
- 捆绑住欧洲的问题\249—250
- 1955 年的军事力量\247
- 作为对战后欧洲的楷模\8
- 作为面对欧洲的最严重问题\788
- 核能力\247
- 撤出欧洲的计划\249
- 缓和政策\501
- 东欧政策\318—319
- 战后政策\102—110
- 作为在欧洲的力量\104—105
- 重新武装计划\592
- 再教育与非纳粹化计划\56—58
- 降低在欧洲的军事责任\109
- 向英国出售潜艇核导弹\292—293
- 9·11 恐怖袭击\787,797
- 冷落北约盟友\787
- 支持法国在越南的军队\284
- 《核不扩散条约》\444
- 价值观\788—789
- 越南战争\407
-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美国情报署\223
- Unity Government 联合政府\131
- Universities 大学\392—394
- 学生运动(参见 Student Movements)
- UNRRA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参见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rban planning 城市化计划\385—389

Uri, Pierre 皮埃尔·乌利\96

U. S. Control Commission 美国军事管制委员会\39

USIA 美国情报署(参见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 Most-Favored-Nation status 美国最惠国待遇\431

USSR (参见 Soviet Union) 苏联

Ustase regime 乌斯达莎政权\34,35

 罪行\49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656

V

Vacation days 假日\792—793

Vaculík, Ludvík 鲁德维克·瓦楚里克\201,438,568,576,621

Vadim, Roger 罗杰·瓦蒂姆\342

Vajda, Mihály 米哈利·瓦依达\567

Valletta, Vittorio 维托里奥·伐莱塔\51

Varda, Agnès 阿涅斯·瓦尔达\381

Vatican II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374—375

Vattimo, Gianni 吉亚尼·瓦迪摩\787

Verheugen, Günter 君特·弗尔休根\768

Versailles Treaty 《凡尔赛条约》\27,105

Vichy regime 维希政权

 在大屠杀中的复杂性\815—820

 法国的立场\816—820

 对待犹太人\815—820

Vichy syndrome 维希综合征\808—809

Vienna 维也纳

 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难民\3

 犹太人\3,263

 在 1989 年\2—3

 战后立场\262—263

Vienna Congress of 1815 1815 年的维也纳国会\119

Vietnam 越南

从法国独立\283—285

分裂\285

美国支持在越南的法国军队\284,285

Vietnam Solidarity Campaign 越南团结运动\407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407

对美国经济决策的影响\453—454

西德反对越南战争\418—419

Vilar, Jean 让·维拉尔\378

Vittorini, Elio 厄里奥·维托里尼\198,480

Vlaams Blok 佛兰芒集团\711,732

Vogel, Hans-Jochen 汉斯-约申·沃格尔\497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广播电台\344

Volkswagen 大众汽车公司\355—356

von Weizsäcker, Richard 理查德·冯·魏茨泽克\497

Voting rights for women 妇女的选举权\79

W

Wajda, Andrzej 安杰伊·瓦依达\589

Waldheim, Kurt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812

Walesa, Lech 列赫·瓦文萨\587,588,605,606—607,629,698,827

Wales national movement 威尔士民族运动\704—705

Wallace, Henry 亨利·华莱士\110

Walloons 瓦龙人\710

Walser, Martin 马丁·瓦尔泽\416,420,820

War Crimes Trials 战争罪行审判\53

参见 Nuremberg Trials

War criminals, punishment of German 惩罚德国战争罪犯\54

Warsaw ghetto uprising 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起义\102,822

Warsaw Pact 华沙条约\246

宣布在捷克边境的行动\443

匈牙利宣布退出华沙条约\317

军事力量\590

Washing machines 洗衣机\339

Watson, Sam 山姆·华生\163

Waugh, Evelyn 伊维林·沃\217

Webb, W. L. W·L·韦伯\559

Wehler, Hans-Ulrich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399

Wehrmacht (纳粹德国)国防军

解体\105

实施大规模灭绝行动\18

Weil, Simone 西蒙娜·韦伊\489,805

Weiss, Peter 彼得·魏斯\418

Welfare capitalism 福利资本主义\362

Welfare state(s) 福利国家\72—77

参见 Social Democrats;各民族国家

福利国家制度下公民的利益\792—793

尝试降低福利国家标准\793—794

现代福利国家的受惠者\462

益处\75—76

支持退休人员的成本\535—536,791—792

经济自由化\535—538

欧洲社会模式\793

财政\73—74,76

政府开支\361

错误假设\536

、生活方式\792—793

巅峰岁月\361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衰退期减少困难中的作用\459

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365—369

斯堪的纳维亚与大陆欧洲福利国家的区别\365—366

支持福利国家\76—77

可持续性\535—537

Wells, H. G. , H·G·威尔斯\205

Western Allies 西方盟国

- 轰炸行动\16
- 不信任苏联\103—104
- 人道主义援助\28
- 相互之间不安宁\100—101
- 再教育和非纳粹化计划\56—58
- 重整军备\151—153
- 遣返苏联公民\30
- 苏联不相信西方盟国\103—104

Western Europe 西欧

- 接受被移置者\31
- 在波斯尼亚的行动\683
- 痛苦的记忆\803—820,826—831
- 农业改革\78
- 对欧盟的期待\731—732
- 艺术与文化创意\377—384
- 对共产主义的态度\202
- 对部署核武器的态度\590—591
- 婴儿潮\331—332,347—350
- 出生率(参见 Birth rate)
- 天主教会卷入政治\374—375
- 审查制度\373
- 内部和平\463
- 对战后岁月的集体记忆\749—750
- 殖民大国(参见 Colonialism)
- 商业方式\383—384
- 共产主义\143—144
- 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的损坏\17
- 出口市场萎缩\457—458
- 国防开支\735
- 制造业经济的消失\458—459
- 与东欧的区别\195

经济危机\453—462

经济复苏(参见 Economic recovery)

环境保护主义\490—492,493—496

食物短缺\86

全球化的影响\736—746

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601,604

政府对私人事务的影响\373—377

政府计划(参见 Governmental planning)

绿党\493—494

20 世纪 70 年代国内生产总值\456—457

移民(参见 Immigration)

石油的重要性\455

从原殖民地进口劳动力\335—337

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劳动力\333—337

工业雇员待遇\407—408,413

婴儿死亡率\331—332

有影响的小说\380

和平安定\463

劳动纠纷/罢工\407—408

自由化改革\376—377

吸引老于世故的人\383

大规模移民\333—335

物质性损害\16—17

痛苦的记忆\826—831

道德与个人关系\373—377

民族化运动\701—713

私有部门的国有化\556—557

和平运动\574

政治效忠\485—486

20 世纪 50 年代的政治变迁\256—277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变迁\391—421

20 世纪 70 年代的政治变迁\484—503

- 政治党派\484
- 政治稳定\242
- 人口迁移\333—335
- 战后人口统计\330—331
- 公共部门的私有化\555—558
- 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前景\464
- 临时政权\65
- 成批生产商品的质量\383—384
- 地区经济差异\755—757
- 地方分离主义运动\701—713
- 权利与自由\564—566
- 服务业与专业雇员的待遇\408
- 单一目标政党运动\486—487
- 社会性支出\536
- 滞涨\456
- 移民统计\740
- 现代主义戏剧的黄金时代\379
- 工会\332—333
- 失业\332,407
- 大学制度\393—394
- 城市化计划\386—389
- 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看法\561
- 对共产主义的看法\561
- 对核裁军的看法\255
- 对美国的看法\8
- 面对暴力挑战\464
- 投票习惯\484—485
- 福利制度\74
- 妇女劳动力\487—488
- 妇女的政治作用\490
- Western European Union (WEU) 西欧联盟\245
- West Germany 西德

加入联合国\499

美国化\274

艺术与文化创意\378

柏林示威游行反对伊朗国王\420

被驱逐出境者和被剥夺公民权者集团\270

波恩政府\266

上议院\265

下议院\265

赎回政治犯\573

电影审查制度\270—271

基督教民主联盟\80,266,496—498

基督教社会联盟\267

共产主义的言辞暴力\220

消费主义\276

权力分散\265—266

事实上的社团主义\266

德国马克\145

与东德的外交条约\498—500

国内事务\270—271

东德资助西德学生运动\420

东德难民\250,252

与英国相比的经济表现\354—359

与东德关系的结果\573

环境保护主义者\493

既定体制\145

日耳曼种族\269—270

议会极左派\418—419

1965 年的《外国人法》\336

外国工人\457

自由民主党\498

政府计划\70,329—330

绿党\493

客籍工人\335

强硬派青年激进分子\420—421

国产影片\274

认同美国\417

社会民主党的幻想\611

加入北约\245—246

工业产值\158—159

被驱逐者融入西德\26

知识分子\203—204,416

国际贸易\326

一号公社\419

州\378

文学期刊与政治期刊\204

毛主义者\419

北约成员资格\265

新左派\420—421

怀旧电影\274

核武器\273

反对越南战争\418—419

外交上的东方政策\497—500,573,611

议会结构\265—266

政治党派\266,408

政治稳定\265—277

人口统计\331

私有化\556

激进知识分子\417

重整军备\151,152—153,272—273

承认东德\497—498

红军旅\470—471

宗教团体\265—266

赔偿犹太人损失\271—272

革命恐怖主义\470—473

性自由与政治\419

60 后一代人关注大屠杀\418

社会民主党\267—269,370,496—498,611

社会民主党学生组织\419

1957 年的社会保险改革法案\372

《明镜》周刊事件\417

东德的赞助\611—612

谋杀罪的时效\810,811

学生运动\418—421

失业率\457

被驱逐回来者\269—270

对加入欧共体的看法\304—305

对纳粹主义的看法\416

西方盟国的再教育与去纳粹化计划\56—59

经济奇迹\265

WEU 西欧联盟(参见 Western European Union)

Will, George 乔治·威尔\775

Williams, Raymond 雷蒙德·威廉姆斯\399

Wilson, Harold 哈罗德·威尔逊\299,346,371,538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673

Winter of 1947 1947 年冬天\86

Wojtyla, Karol (参见 John Paul II, Pope) 卡罗尔·沃依蒂瓦(教皇保罗二世)

Wolf, Christa 克里丝塔·沃尔夫\204,572,615

Wolf, Markus 马尔库斯·沃尔夫\583

Women 妇女

基督教民主党与妇女\80

避孕权利\488—490

妇女劳动力\332—333

惩罚内奸\43

选举权\79

投票权\79

在劳工总数中\487—488

Women's 妇女运动\487—490

Working population, politics of 就业人口的政治\405

World Bank 世界银行\107—108

 罗马尼亚加入世界银行\431

 西班牙的成员资格\516

World Congress of Intellectuals 世界知识分子大会\22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107

World War One, unresolved problems from 第一次世界大战未解决的问题\4

World War Two 第二次世界大战

 轰炸行动(参见 Bombing campaigns)

 作为平民的经历\13—14

 造成的破坏\82—83

 经济影响\83

 战后复苏\83—85

 作为社会革命\35

 作为普遍经历\14

X

Xenophobia 恐外症\742

Xoxe, Koci 科奇·霍谢\178

Y

Yakovlev, Aleksandr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601,604

Yalta Conference 雅尔塔会议\101—102

Yanaev, Gennady 根纳迪·雅纳耶夫\654

Yeltsin, Boris 鲍里斯·叶利钦\323,604,647,653—658,686,689

 针对叶利钦的政变\654—655

 被选为总统\654

 同布什的最初会见\655

 权力\658

 作为总统\657

Yom Kippur War 赎罪日战争\454—455

Younger, Kenneth 凯尼斯·杨格\158

Yugoslav Emergency Relief Act 《南斯拉夫紧急救援法案》\174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阿尔巴尼亚族人口\669—670

攻击斯洛文尼亚\674

解体\637

灾难性的解体\665—685

共产主义的政党\130,140—145

外交部长联络组\681

《戴顿条约》\678

国防开支\174

信仰布尔什维主义\140

方言\668—669

经济危机\671

经济改革\429—430

种族清洗\675—678,679

民族共存\668

作为苏联战后经济计划的例外\173

历史问题\666—671

极度通货膨胀\671

借贷\173—174

1973 年版图\667

人民阵线\14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均产值\173

宗教\669

同苏联的关系\320—321

与苏联决裂\144—145

斯雷布雷尼察屠杀\677—678

乌斯达莎屠杀\674,675

战争罪行审判

战争

西方援助

Z

Zantovský, Michael 米哈依尔·赞托夫斯基\663

Zdanov, Andrei 安德列依·日丹诺夫

两种文化理论

Zhirinovsky,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693

Zhivkov, Todor 托多尔·日夫科夫\445,583,626—627

Zionism, Soviet support for 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

Zone of European privilege 欧洲特权区

Zweig, Stefan 斯蒂芬·茨威格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欧洲的惩罚政治》(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著)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 20 世纪》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大幻想? ——欧洲论稿》

《并非完美的往日:1944—1956 法国知识分子》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 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1939—1948 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主编)

《1871—1914 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1921—1926 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本书译者

林骧华	(前言与鸣谢,导言,索引,第1—3章,全书统校)
唐 敏	(第4—10章,第12—13章)
梁 薇	(第11章)
司建国	(第14章)
胡 荣	(第15章)
张守柱	(第16章)
孙钦美、陈先奎	(第17章)
张 欧	(第18章)
杨万斌	(第19章)
冯智强、陈敬岩	(第20章)
薛初晴	(第21章)
张小丽	(第22章)
张忠魁	(第23章)
庄彩云	(第24章)
宋 柯	(跋)

POST WAR

汉娜·阿伦特在1945年曾说过：“邪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而占主导地位的战后欧洲史书的内在主题，却是用一种自怡自乐的甚至抒情的方式来尝试叙述1945年之后欧洲复苏、像凤凰一般再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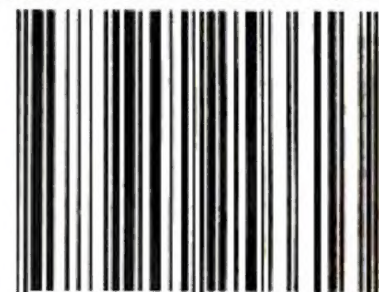
托尼·朱特坦率地提供了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填补了上述主流叙述的空白。他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展现出战后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面貌，描绘了人在这段风诡云谲的历史中的活动轨迹。这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场的故事。现在，作者说：“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可以说在短时间内很难有人能超过托尼·朱特的成就。

——诺曼·戴维斯，《卫报》



ISBN 978-7-80225-661-3



9 787802 256613 >

定价：88.00 元

（上、下册）